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二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再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李 大 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相互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

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做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主义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王家没有颠复，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

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　寄自昌黎五峰

（原载《每周评论》35号，1919年8月17日出版）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1]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一九二一年二月）

陈 独 秀 等

一、陈 独 秀 的 信

适之，一涵兄：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2]，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君处。（望道君已移住渔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候到粤再谈。

弟　独秀（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夜。

二、胡 适 的 信

仲甫：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始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于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

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分。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

三、胡适的信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陈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分，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意，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绝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想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

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的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十一月二十二日

慰慈赞成此议。适。

一涵赞成此议。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王抚之。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弟兄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此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四、鲁迅的信

适之先生：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以为三个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仁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办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树（1921）1月3日。

五、李 大 钊 的 信

适之兄：信已传到我手。我因为昨天想到你那里去，好带给你看，故未传给他人。不意那位办北京晓报的方先生到辛白先生处邀我去谈，所以未得到你那里去。前天见了玄同，他说此事只好照你那第一条办法，但关于研究系谣言问题，我们要共同给仲甫写一信，去辩明此事。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象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点醋意，真正讨嫌！起明、豫才的意见，也大致赞成第一办法，但希望减少点特别色彩。我三两日得了工夫，定去看你，好和你谈谈。守常。

六、陈 独 秀 的 信

适之兄：六日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③，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④，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

弟　独秀　白　二月十五日

---

①　原件存北京大学。

阴法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本相："……他（胡适）说：1919年6月中，"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七月间，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争论，就是他进行这种阴谋的表现。艾思奇说：这个争论"是五四文化运动中无产阶级思想代表人与富于妥协投降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人——李大钊同志与胡适中间的思想方法上的争论，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在这个争论中，显示了当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五四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1951年史学周刊第十七期）

②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有"本志特别启事云"："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以后凡直接在本社总发行所定购一卷以上者，在此期限内发行的特别号（例如前次的劳动节特别号）概不加报价及邮费。特此预先声明，以免误会。"

③　按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全部稿件，被法租界巡捕房派包探到印刷厂抓去，以致不能按期出版，直延至1921年4月1日才出刊。第九卷第一号"编辑室杂记"里，曾有下列的声明"本志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本社既须找寻原稿重编一道，又须将印刷地点改在广东，所以出版便不能如期了。劳爱读诸君，屡次来信询问原由：本社非常抱歉——这也许是中国应该向我们抱歉！"

④　按：信里所提的"你们另办一个报"，就是一九二二年胡适等所主办的努力周报，和流产的"努力半月刊"或"努力月刊"。（胡适的停刊信里说：努力暂时停办，将来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

但亦不放弃政治。俟改组就绪，再行出版。）

阮无名中国新文坛秘录：（一九三三年南强版）有一篇最小的问题与最大的发现记录胡适回答读者的一封信，揭露了胡适的真实面目。原文云："……在努力周报停刊的时候，胡适他们有努力月刊的筹备，可是很久仍不见这刊物的出版。后来有一个读者，便在1924年8月20日的晨报附镌上提出关于这刊物的质疑，并要求胡适本人的答复。……可是胡适当时并没有答复，代替他出场的，却是努力的主将之一的高一涵。他在同月二十八日的报上，发表了这样一封答复的信："努力是胡适之先生独办的报，当然只有胡适之个人决定他的生死；我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就是发表意见也不能代表努力社的主张，可是适之先生现在北戴河养病，……所以做小卒的我，便不得不越分回答几句话。努力月刊的倡议在去年秋天，商务印书馆一听到这个消息，便要求归该书馆承办（或包办），同时亚东图书馆也想代为发行，两家竞争的结果，总让商务印书馆战胜。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适之先生想得一点稿费来报酬常期投稿的穷朋友，本是办报人应该有的善意；但是教我想出来为三块钱至五块钱去替那些持商务印书馆股票的人争红利，老实说心中总有一点痛！所以我这个小卒对于商务印书馆要包办的努力月刊，不得不暗地里抱着不合作主义了。……"1924年9月，就在高一涵短文发表的次一个月，在12日的报上，胡适是自己出马，来答复了一篇文章——如其说是答复读者的质问，还不如说是反对高一涵的答复，向商务印书馆赔罪来得确切。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努力的问题，它的内容是：

"……我个人的主张，是努力应该继续出版。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个独立正直的舆论机关，那是不消说的了。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运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独秀文存卷一）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政治生活十五）这种现象使我们感觉努力真有急急出版的必要。……至于一涵先生代我作答，我自然是很感谢的。但他提及商务印书馆的一层，未免有点失实。商务印书馆对于努力的关系，并不是资本家对待脑筋苦力的关系，办杂志也不是挣红利的好法子。……努力社有几社员现在商务编辑所，这是第一层关系，商务管理部有几位老辈，对于我个人的友谊，是第二层的关系。当努力周报出版以后，张菊生、李拔可诸先生皆曾表示赞成我们的主张。后来商务发行部自己提议，破例为我们代售努力，并代理定阅。以一个几百万资本的大公司，自动的破例经理这三个铜子的生意，这是谋挣红利吗？周报停办后，我们感于无钱办报的困难，所以主张先筹点资本，然后办月刊；或仿从前新青年的办法、由一家书店发行，但发行人须出一点编辑费，以供聘用助手及酬报外来投稿之用。那时商务与亚东都愿任此事，但我和独秀知道亚东的困难，故劝他们让与商务，商务代发行的杂志，本有'二千以外的销数，每分抽版税三成'的规定；广告费也有二成的税。我们因周报曾销过八千，故以六千分为底子，计算版税与广告税，作为月刊的编辑费。但投稿人愿酬与否，全由各人的自由。这其间有什么'资本家之威'可言。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其事有可取者，还应该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诛心的苛刻论调。今日那班处处畏资本家的阴谋的人，同时又往往为拳匪曲说巧辩：——这真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一段不是对一涵说的，因为一涵并不至于颂扬拳匪。）……"

关于努力周报的主张，中国青年第九十五期（1925年9月）读报杂感有引胡适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二期上发表的一篇国际与中国，对于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有下列的见解可作参考：

一、直奉战争时，英国没有援助吴佩孚。美国愿意废督裁兵，若说美国与日本企图共同利用曹锟、交通系，更是笑话。

二、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美国确实援助中国，彼时许多美国学者、舆论家并不替资本帝国主义者做走狗。

三、新银行团消极组织某一国单独借款，比贪图高利借款给政府的国内资产阶级好得多。

四、外国投资者希望投资所在安宁和统一，民国元年拥袁世凯就是为此，并非恶意，他们希望中国的和平统一，不下于中国人民。

五、日本侵略促进了中国人民之自觉，在巴黎、华盛顿两会，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是自觉了，中国目前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

〔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一九一九年七月）

胡　适

本报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

“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是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作一种教训吗？”什么的教训呢？这个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来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

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骂痛恨"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是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功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些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

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挂要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附〕三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

胡　适

我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承蓝知非和李守常两先生做长篇的文章同我讨论，把我的一点意思发挥得更透彻明了，还有许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们两位。

蓝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点：他们都说主义是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李君的话），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态度”（蓝君的话）。这种界说和我原文所说的话，并没有冲突。我说，“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播传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我所说的是主义的历史，他们所说的是主义的现在作用。试看一切主义的历史，从老子的无为主义到现在的布尔扎维主义，那一个主义起初不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

蓝李两君的误会，由于他们错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凡是可以指为这个或那个的，凡是关于个体的别特的事物的，都是具体的。譬如俄国新宪法主张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矿产，水力，银行，收归国有；把制造和运输等事，归工人自己管理；无论何人必须工作；一切遗产制度完全废止；一切秘密的国际条约完全无效……这都是个体的政策，这都是这个那个政治或社会问题的解决法——这都是“具体的主张。”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朵里听见了一个“布尔扎维主义”的名词，或是只记得一个“过激主义”的名词，全不懂得这一个抽象名词所代表的是什么具体的主张，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过激党”，便硬把“过激党”三个字套在某人某人的头上。这种妄人脑筋里的主义便是我所攻击的“抽象

名词”的主义。我所说的“主义的危险”，便是指这种危险。

蓝君的第二个大误会是他把我所用的“抽象”两个字解错了。我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如现在官场所惯用的“过激主义”，便是一例；如现在许多盲目文人心里的“文学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蓝君误会我的意思，把“抽象”两个字解作“理想”，这便是大错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象的。譬如一个科学家遇着一个困难的问题，他脑子里推想出几种解决方法，又把每种假设的解决所涵的结果一一想象出来，这都是理想的。但这些理想的内容都是一个具体的想象，并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我说：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是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算不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这不是极力恭维理想的作用吗？

但是我所说的理想的作用，乃是这一种根据于具体事实和学问的创造的想象力，并不是那些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

蓝李两君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那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这个分别，请两君及一切读者不要忘记了。）如此所说的主义，我并不曾轻视。我屡次说过，“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工具”。我又屡次说过，“有了学理做参考的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方法”。我这种议论，和李君所说的“应该使社会上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和蓝君所说的“我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根据，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因为蓝李两君这两段话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见相和。如果蓝李两君认定主义学理的用处不过是能供给“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根据，——如果两君认定这个观点，我决没有话可以驳回了。

但是蓝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对的和我所恭维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说，“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问题愈狭，现实的色彩亦愈甚。”这是我所承认的。但是此处所谓“理想的分子”，乃是上文我所说的“推想”“假设”“想象”几步工夫，并不是说问题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都是具体的，都只是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决没有空空荡荡不能指定这个那个的问题而可以成为问题的。

蓝君说，“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这里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

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更容易使人误解了。试看他所举的例，如法国大革命所标示的自由平等，如中国辛亥革命所标示的排满，都不是问题本身，都是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什么要排满呢？因为满清末年的种种具体的腐败情形，种种具体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体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排满的目标，作为解决当时的问题的计划。这问题是具体的，这解决也是具体的。法国革命以前的情形，社会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激刺引起一般学者的研究。一般学者的答案说：人类本生来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会的结果。故法国大革命所标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对于法国当日情形的具体解决。法国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们眼里自然很抽象了，在当日都是具体的主张，因为这些抽象名词在当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废王室，废贵族制度，行民主政体，人人互称“同胞”，……等等，那一件不是具体的主张？

所以我要说：蓝君说的“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错了。他应该说：“问题的范围愈大，我们研究这种问题时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难，格外复杂，思想的方法应该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进一步：他应该说，“问题的范围愈大，里面的具体小问题愈多，我们研究时绝不可单靠几个好听的抽象名词就可敷衍过去，我们应该把那太大的范围缩小下来，把那复杂的分子分析出来，使他们都成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简单问题，如此然后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举几个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齿虫蛀了，这都是很简单的病，可以随手解决。假如你生了肠热症（Typhoid），病状一时不容易明了，因为里面的分子太复杂了。你的医生必须用种种精密的试验方法，每时记载你的热度，每日画成曲线表，表示热度的升降，诊察你的脉，看你的舌苔，化验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来，化验血里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断定你的病是否肠热症。断定之后，方才可以用疗治的方法。一切大问题，一切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里面所含的具体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时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复杂繁难了。补救这种繁难，没有别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体的大问题分作许多更具体的小问题。

分析之后，然后把各分子的现象综合起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意义。譬如医生把病人的脉，血，小便，热度等现象综合起来，寻出肠热症的意义，这便是“综合”。但是这种综合的结果仍旧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肠热病），仍旧要用一种具体的解决法（肠热病的疗法）。并不是如蓝君所说“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

以上所说，泛论“问题与主义”，大旨只有几句话：“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种主义的起初都是一切具体的主张，决不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但是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必须经过一番理想的作用这一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说，主义的原起虽是个体的，主义的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但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

一种抽象的理想”。

蓝君和我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蓝君便不然。他说：

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与具体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为愈具体，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故往往有一种主义，在主义进行的时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团结也非常坚强。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主张分歧，立刻成一纷扰的现象。

蓝君这几段话简直是自己证明主义决不可和具体的方法分开。因为有些人用了几个抽象名词来号召大众；因为他们的“主义”里面不幸不曾含有“实行的方法”和“具体的主张”；所以当鼓吹的时候，未尝不能轰轰烈烈的骗动了无数信徒，一到了实行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便闹糟了，便闹出“主张纷歧，立刻扰乱”的笑柄来了。所以后来扰乱的原因，正为当初所“鼓吹”的，只不过是几个糊涂的抽象名词，里面并不曾含有具体的主张。最大最明的例就是这一次威尔逊先生在巴黎和会的大失败。威总统提出了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公道，正谊，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释迦耶苏在日多得无数倍，总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到了克里蒙梭，鲁意乔治，牧野，奥兰多等一班大奸雄，他们袖子里抽出无数现成的具体的方法，贴上“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的签条，——于是威总统大失败了，连口都开不得。这就可证明主义决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没有具体主张的“主义”，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所以我说蓝君的“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类一桩大毛病，只是世界一个大祸根，并不是主义应该如此的。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想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如果是为了实际的改革，那就应该使主义和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决不可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我常说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小孩子看见月亮，喊着要上天便是“目的热”，不管如何上天便是“方法盲”。蓝君所说的“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便是犯了这两种病。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话也带着这个毛病。他说：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便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

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首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庸医杀人”的大罪了。

蓝君对于主义的抽象性，极力推崇，认他为最合于人类的一种神秘性，又说：“抽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愈增多。”这种议论，自然有一分真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该承认人类的这种“神秘性”实在是人类的一点大缺陷。蓝君所谓“神秘性，”老实说来，只是人类的愚昧性。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不要说别的，试看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试看现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的？人类受这种劣根性的遗毒，也尽够了。我们做学者事业的，做舆论家的生活的，正应该可怜人类的弱点，打破他们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使他们以后不容易受这种抽象名词的欺骗。所以我对于蓝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类的“神秘性，”实在很不满意。蓝君是很有学者态度的人，他将来也许承认我这种不满意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对于人类迷信抽象名词的弱点，该用什么方法去补救他呢？我的答案是：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附〕四论问题与主义

（一九一九年八月）

胡　适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

上一期里，我已做了五千多字的“三论问题与主义”一篇文章。后来我觉得还有几点小意思不曾发挥明白，故再说几句。

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我曾说过：

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

若要用这种参考的材料，我们自然不能不做一些输入的事业。但是输入学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做得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我对于输入学理的方法，颇有一点意见，写出来请大家研究是否可用。

（1）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都是当时的某种不满意的情形所发生的。这种时势情形乃是那学说所以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不懂得这种原因。便不能明白某人为什么要提倡某种主义。当时不满意的时势情形便是病症，当时发生的各种学说便是各位医生拟的脉案和药方。每种主义初起时，无论理想如何高超，无论是何种高远的乌托邦（例如柏拉图的共和国），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这些药方，有些是后来试验过的，有些是从来不曾试验过的。那些试验过的（或是大试，或是小试）药方，遇着别时别国大同小异的症状，也许可以适用，至少可供一种参考。那些没有试验过的药方，功用还不能决定，至多只可以在大同小异的地方与时代做一种参考的材料。但是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先须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譬如药方，若要知道某方是否可适用于某病，总得先知道当初开这方时的病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初诊察时的情形写的越详细完备，那个药方的参考作用便越大。单有一个药方，或仅仅加上一个病名，是没有什么大用的，是有时或致误事的。一切学理主义也是如此。一种主义发生时的社会政治情形越记得明白详细，那种主义的意义越容易懂得完全，那种主义的参考作用也就越大。所以我说，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

（2）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论主”两个字是从佛书上借来的，论主就是主张某种学说的人。例如“马克思主义”的论主便是马克思。学说是时代的产儿，但是学说又还代表某人某人的心思见解。一样的病状，张医生说是肺炎，李医生说是肺痨。为什么呢？因张先生和李先生的经验不同，学力不齐，所受的教育不同，故见解不同。诊察的判断不同，故药方也不同了。一样的时代，所老聃的主张和孔丘不同。为什么呢？因为老聃和孔丘的个人才性不同，家世不同，受的教育经验不同，故他们的见解也不同。见解不同，故解决的方法也不同了。即如马克思一个人的事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知道马克思的学说，不但和当时的实业界情形，政治现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密切关系，并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个叛犹太教的犹太人等事实），所受的教育影响（如他少时研究历史法律，后来受海智儿一派的历史哲学影响等），都有绝大的关系。还有马克思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学思想，如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及唯物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无形元素，我们也不能不研究。我们须要知道凡是一种主义，一种学说，里面有一部分是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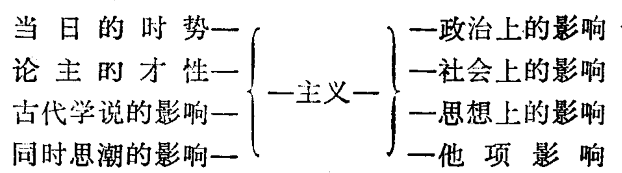
日时势的产儿，一部分是论主个人的特别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现，一部分是论主所受古代或同时的学说影响的结果。我们若不能仔细分别，必致把许多不相干的偶然的个人怪僻的分子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我们对于论主的时势固然应该注意，但是对于论主个人的事实与教育也不可不注意。我们雇一个厨子尚且要问他的家世经验，讨一个媳妇尚且要打听他的性情家教；何况现在介绍关于人生社会的重要主张，岂可不仔细研究论主的一生性情事实吗？

（3）输入学说时应该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上面所说的两种条件，都只是要我们注意所以发生某种学说的因缘。懂得这两层因缘，便懂得论主何以要提倡这种学说。但是这样还算不得真懂得这种主义的价值和功用。凡是主义都是想应用的，无论是老聃的无为，或是佛家的四大皆空，都是想世间人信仰奉行的。那些已经充分实行或是局部实行的主义，他们的价值功用，都可在他们实行时所发生的效果上分别出来。那些不曾实行的主义，虽然表面上没有效果可说，其实也有了许多效果，也发生了许多影响，不过我们不容易看出来罢了。因为一种主张，到了成为主义的地步，自然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一种无形的影响，范围许多人的心思，变化许多人的言论行为，改换许多制度风俗的性质。这都是效果，并且是很重要的效果。即如老聃的学说未通行的时候，已能使孔丘不知不觉的承认“无为之治”的理想；墨家的学说虽然衰灭了，无形之中，已替民间的鬼神迷信添了一种学理上的辩护，又把儒家提倡“乐教”的劳力灭了许多；又如法家的势力，虽然被儒家征服了，但以后的儒家便不能不承认刑法的功用。这种效果无论是好是坏的，都极重要，都是各种主义的意义之真实表现。我们观察各种效果，便可格外明白各种学说所涵的意义，便可格外明白各种学说的功用价值。即如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唯物的历史观，一是阶级竞争说（他的“赢余价值说”，是经济学的专门问题，此处不易讨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化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这种唯物的历史观能否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社会主义的根据地，已不靠这种带着海智儿味的历史哲学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附带影响一真意义一是不可埋没的。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迭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这种种效果固然是阶级竞争说本来的涵义，但是这些涵义实际表现的效果，都应该有公平的研究和评判，然后能把原来的主义的价值与功用一一的表示出来。

以上所说的三种方法，总括起来，可叫做“历史的态度”。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学者，对于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能用这种历史的态度去

研究他们。

我且把上文所说三条作一个表：



这样输入的主义，一个个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一个个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我们可拿每种主义的前因来说明那主义性质，在拿那主义所发生的种种效果来评判他的价值与功用。不明前因，便不能知道那主义本来是作什么用的；不明后果，便不能知道那主义是究竟能不能作什么用的。

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害。

〔附〕新思潮的意义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胡　适

（一）

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做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研究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西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

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六卷一号页一〇）。

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固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固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残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派。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很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二）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

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

又如文学革命的问题。向来教育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于大多数人是无关系的，故文字的艰深不成问题。近来教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渐渐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实在不适用，于是文言白话就成为问题了。后来有人觉得单用白话做教科书是不中用的，因为世界决没有人情愿学一种除了教科书以外便没有用处的文字。这些人主张：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学的利器；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已全体一致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案，况且用国语做文章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这个大概有几层解释。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释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功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但是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很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

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这个道理很容易解释。凡社会上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定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这许多人虽然不能提出什么新解决，但是他们平时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细细分析出来，加上评判的研究，指出不满意的所在，提出新鲜的救济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要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反对便是注意的证据，便是兴趣的表示。试看近日报纸上登的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可有反对的吗？可有讨论的吗？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反对，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证据。研究问题的文章所以能发生效果，正为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不但如此，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的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十部“纯粹理性的批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

总起来说：研究问题所以能于短时期中发生很大的效力，正因为研究问题有这几种好处：（1）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的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为问题是逼人的活问题，故容易使人觉悟，容易得人信从；（4）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5）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的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这是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付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功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功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注）参看：

（1）“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问题与主义”。

（3）“再论问题与主义”。

（4）“三论问题与主义”。

（三）

以上说新思潮的“评判的精神”在实际上有两种表现。现在要问：“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

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合；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这是不消说的了。

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情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必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说思想向来没有修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么样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领介绍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附〕我的自述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胡　适

以上三篇通信，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这真是我的歧路了！

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伏庐的怪我走错了路，我也可以承认；燕生怪我精神不贯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所以“变节”与“变节而又迟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写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工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

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以下。）我那时说：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但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我的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我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辨护的文章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论文章也就流产了。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况且几年不谈政治的人，实在不容易提起一股高兴来作政论的文章，心里总想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汇呢？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象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败，他们确然也还谈谈，因为骂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华盛顿会议中，英美调停，由中日两国代表开议，国内的报纸就加上一个"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们反对过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极力反对。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无条件的屈服呢？外交问题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决呢？这些问题就很少人过问了。

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说我谈政治"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他可错了；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目的

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

我的朋友们，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孙伏庐说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夺去的我，替文化史夺回来。我很感谢他的厚意。但我要加一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只成一与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上；我做一段二百字的短评，远不如做一万字李觏学说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这一点“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政论态度，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认常燕生的责备，但我不能承认他责备的理由。他说：

至于思想文艺等事，先生们这几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见了，难道还期望他尚能再有进步吗？

他下文又说“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这些话我不大懂得。燕生决不会承认现在的思想文艺已到了山顶，不能“再有进步”了。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这也是我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的一个原因了。

（原载《胡适文存》2集（3））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陈独秀 辑

（一）东荪先生"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

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况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尝对我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说美国农夫比中国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见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们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或则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这个教训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骛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二）"正报"记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

某报记者说，游历内地所得的教训，就是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振兴实业一途，此外一切主义，现在的中国都不配讲。我们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记者所得的教训，我们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句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句话更是不错。但是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受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着人的生活；要用适当的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某报记者从前主张现在却自己说不配主张的社会主义。所谓人的生活，就狭义的说，总不外衣食住三者能

够充分享用，不至于缺乏；就广义的说，如个性的伸张，美感的满足，艺术的享乐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范围内。现时中国多数人欲求狭义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说不到广义的生活上去，所以最要紧的在使多数人得着狭义的生活。这个问题决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现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绅士、土豪的骄奢淫佚，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们的亏。假如再听他们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绅士、土豪的奴隶、牛马外，别无生活门径，恐怕还有求为奴隶、牛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若说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底下去讨生活，正如有人说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某报记者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

（三）望道先生"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昨天"时事新报"第二张上，载着东荪君"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个时评，他开头就说："有一部分人住在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我们看了他这段话，极想问他，——你东荪是不是这一部分里的一个人？如果说不是，那么，"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我们为甚么讲社会主义"底下，为什么写着"东荪"两个字？

"我们为甚么讲社会主义"这篇文，固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也有许多地方很明显地表示出他的态度。譬如第六段里有：

"……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第七段又说：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凡是改造人生而合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无不把他综合起来。……"

这样看来，可见东荪君认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一切方法底总名了。既然认社会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便只可说，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为甚么时评上却说：

“……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

这话怎讲？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你同情于舒君底话，说：“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又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须处处都成通商口岸和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谈论主义的资格吗？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吗？东荪！你曾说：“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现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晓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甚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赞美、鼓吹，——反而忍心诅咒呢？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你旧路了吗？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该过于责备“贤者”；但假使我们都如此，社会将来更要沉静下去，使你灰心底机会，不是更多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四）力子先生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前天东荪君底“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已有望道、江春两君批评过。两君有一相同之点，即都根据东荪君平日主张社会主义的论文施以反诘，并非凭空掊击。我不知东荪君何以自解？或者东荪君要说：“我那个题目，写得明白，是由内地旅行而得的；我从前住在通商口岸，不知道内地情形，所以主张社会主义；现在我到内地旅行了一趟，受了教训，所以我又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照这样说，便只可算是东荪君受了教训而忏悔了。但我有两层意思要请问东荪君：

一、做新闻记者的人要有怎样的常识？对于社会有所主张，应当先有怎样的审察？

新闻记者，负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的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的大势也没一处可以疏忽。所以新闻记者虽然坐在编辑室里，而眼光直须注射到世界全部分，即使各种详细的情形不能尽知，而大体总应了如指掌。东荪君既为新闻记者，虽然“住在通商口岸”，而对于“内地的状态”总不应全无审察。我在东荪君这个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叙述旅行内地所得的状态，只有两句话：一，“中国人穷到极点了”；二，“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单讲这两句话，真是“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东荪君从前竟全没知道么？难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时候，眼光只注射到高大的洋房，宏敞的商店，而对于民穷财尽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内地以后方才明白么？其次：我再在东荪君底时评里面，细心寻觅他旅行内地所得教训的本体，也只有两句话：一，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这两句话实在只是一句，是一般小学生作文时摇笔即来的陈言，更是一般通商口岸底富商、大贾人人常说的门面话。东荪君竟非到了内地旅行以后全不觉得么？东荪君果真如此，便来做新闻记者，便毅然对于社会有所主张，东荪君真太胆大了！我不相信东荪君如此，所以我也不能相

信东荪君现在是真感触到内地底贫乏，才有这样一个时评。

二、中国贫乏的原因在那里？谈论甚么社会主义等是否足为开发实业的障碍？

这一层的讨论最关重要。因为“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在谈论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并且也认为必要；不但认为救现在的中国应当如此，并且认为谋求人类底幸福本须如此。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在应否增加富力、开发实业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者，都能预想到社会主义实行以后工业怎样普遍发展的情形，并且深信，要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几句话确可以代表社会主义底神髓。货不弃于地，力尽出于身，富力还愁不增加么？实业还愁不开发么？社会主义只反对“货藏于己……”的资本主义，所以资本主义者当然不免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硬说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谈社会主义。这不是资本底愚昧，便是资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说法；东荪君难道也认定谈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那里，是由于谈了社会主义的缘故么？振兴实业的话，也不知说了多少年，东荪君不去推求所以至今贫乏的原因，偏要归罪于一二年来谈论主义的人么？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用罗素先生底话。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底复辙。东荪君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话啊！舒君新城底话，很足代表现在一般企业家底思想；但我们即使让步，也承认“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但到了实业开发以后，中国有没有这资格呢？罗素先生教训我们不要再蹈欧美资本主义底复辙，正是恐怕“有了这资格”以后，已是焦头烂额，感受十分痛苦；那么，现在谈论社会主义，至少也可以算得“曲突徙薪”，怎能说是“必定无结果”呢？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底方法；现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谈论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谈论社会主义者也正急欲救穷；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敢断定东荪君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东荪君即使真是到了内地才觉得开发实业的必要，也不必牵连到社会主义，说是必无结果。

以上两层意思，假使东荪君无法解释，那么，他这个时评底真正动机究在哪里呢？

还有一句话，要请教东荪君。“人的生活”四个字究竟怎样解释？

我以为“人的生活”底严格解释，一定要兼顾到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东荪君似乎专注重在物质一方。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何尝能得着“人的生活”？东荪君说：“现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人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绝不能知道这少数得着人的生活者究在那里？如果单讲丰衣足食，难道乡村间就没有这种人么？通商口岸与都会有多少贫民窟，东荪君也知道么？陈独秀先生说日本贺川丰彦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曾来上海调查贫民窟……，东荪君也能发一发良心么？内地底农夫固然很苦，通商口岸底工人何尝不苦？东荪君区别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拿是否通商口岸与都会做标准，东荪君真太迷信“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了。开发实业，不用社会主义做基础，我敢断言，都会底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得着东荪君所谓“人的生活”者愈是少数，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

底渊薮。吸收乡村间的血汗，来装点都会的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贫乏，固然要陷于牛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现在的中国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别——而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明知中国人现在未得着“人的生活”，而又要阻断中国人将来能得着“人的生活”的途径，这未免太忍心啊？请东荪君再仔细想想！

（五）东荪先生“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

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于数天中静察他的言行，觉得他不单有真学问，而有真性情，我方明白必定有真学问乃能有真性情。他到中国以后，零星讲演虽有好几次，他对于不十分研究的东西决不乱讲。他不愿住阔旅馆，他怕应酬，他不说敷衍话，他每天非读书不可，所以他此次在京所讲，都是他最近研究有得的科目。他不愿拿常识来对付中国人。他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缘故，他仍旧说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他真是个学者，真是个有良心的学者。

因他不说敷衍话，所以报载他在讲学会的答辞，我觉得很象他的话。他好象是说，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没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诀窍，区区的这几句话就非常的中肯。我对于教育与实业两层自然是完全赞同，至于劳农主义，我以为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太早，故很以罗素先生的话为然。但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主张，就贵在实行，若不实行，则和高论又有何区别呢？所以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的这番话，而要去切实的实行啊？

（六）独秀致罗素先生的信

罗素先生：中国人底知识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顶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尚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七）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

（前略）至于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贫，以中国除少数区域外，本物产不丰，在锁国时代犹足自给，近则每况愈下。弟尝究其贫乏之由来，以为有二大原因：第一为远因，曰物产未开发。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则由于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资本缺少与不能集中则有数因，曰民力本不甚丰，曰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而其最大之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工商业之经理人即所谓企业者也，而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则侵吞股本，故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苟非资本家自兼经理人，则未有不失本者也。以此之故，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加以连年兵祸，百业俱停，致实业无法发展。第二为近因，曰外货之压迫。夫外货挟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自不可抗。盖自近世资本主义兴，欧洲各国遂为资本之阶级国家。此种资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俾达其商战上营利之目的。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贫困者，尤在近因。弟尝言欧美之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永无翻身之日。至于中国现有一二资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谓为真正之资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债，或中外合办，次则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资料，盖在此种外国资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资本家极不易产生。我侪对于此种非纯正之中国资本家止能认为拾外国资本家之余剩，补外国资本力之空隙。设有人攻击中国资本家，弟则以为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不忍。须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资本家，亦不过如在烈日下熄二三盏电灯耳，其结果则外国资本势力更为侵入。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况外国资本势力已占优势，更进一层，易如反掌。一班贫民但求得目前之生活，论遑将来之利害。故吾知中国资本家倒后，外国资本立即侵入，则一班贫民必欢迎之不暇也。可知问题不在中国资本家，苟中国物力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前途必不堪问。然二者互为因果，即外国资本主义不倒，则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则无丝毫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之力。弟以为联络各国社会党，谋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固为上策。然吾民能力甚微，能补助于人者究有若干，未敢自信，则于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国资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耳。特吾之开发实业，非欲造成强厚之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吾人固知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绝对不能造成，不过吾人之意在培养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吴稚晖先生言，人类止有两种，一种坐轿的，一种抬轿的。吾以为中国阶级果能如此，则社会主义宜可兴矣。顾中国现状犹未到此，乃尚有多数人，求为抬轿的而不得者焉。弟以为第一步当使社会上无此种求生不得之人，则始有抵抗能力。他日尽归类于资本、劳动之两阶级，而有阶级战争，则进一步矣。须知使求生不得之贫民为劳工，乃进步之现象也。夫在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之社会，易言之，即在未发生阶级战争之社会（或稍稍发生而不成形），社会主义之说决不能入人耳，而动其心。可以日本之例证之。日本之有社会主义，数十年矣，当时如堺利彦等恒为社会所轻视，今则此辈偶出一书，辄风行全国，获利颇厚，此无他，实因日本利用欧战期间大扩充实业，

实业大发达之结果，演成两极端之阶级，同时因教育之普及，受教育者亦降为劳工，劳动阶级遂自觉矣。工人能读此类书籍，故销行乃广。若夫中国，不但虽价廉至一文，工人亦无钱买，且学生教员之购买力亦有限。近来因杂志、书籍之渐渐增加，而学生之家庭亦多有担负不起者，则中国一班人民之贫困可想见也。即以马克思而论，彼之著述不过预料资本主义自身之必倒，然资本主义若未至推车撞壁，恐亦未能即倒。今日欧洲资本主义已推车撞壁，故始呈此末路之现象。以此之故，弟确信中国将来必演成资本与劳动之两大阶级。弟尝见日人所办之某杂志，有调查中国劳动状态一篇，其结论曰：中国所要求者，非改良劳动，乃创造劳动也，其言殊当。盖中国资本家不出，外国资本家必入而取代，故弟认中国资本家之有无不成问题。惟中国贫困至此，对于一切皆无力抵抗，为可忧耳。故为救急起见，宜设法养成抵抗能力，则莫急于开发实业以增加物产，先救济物质生活。而开发实业之法，不外私人企业（即资本家）与共同企业（即协社CooPerative society）。弟以为对于私人企业可不加妨碍，对于共同企业宜设法创造，而不必拘于理论，当以地方情势为衡。弟以为近来鼓吹之诸新说，止协社于现在之中国有实现之可能性，其余概为空谈。弟向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近则以为，人类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属最善，而在中国则不知须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即以劳农而言，决不能实现。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惟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借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矣。弟默察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故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所可虑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弟觉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现在国内遍地皆兵，而无一人有裁兵之权，兵一日不安顺，则祸一日潜伏。彼时所呈现状，必有非吾人所能料者。此种观察，或弟之神经过敏亦未可知。惟弟既见到此，即不愿自欺欺人。此后有教育事业可办，则拟专心于教育。否则译书、著书、专研究一二门哲学，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也。未识兄何以教之？东荪顿首。

（八）东荪先生“长期的忍耐”

颂华兄鉴：来函论旨颇有可商榷处，请为公陈之。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乃事实，愿公特别注意者也。至谓保障平民之政治与法律，则现在一班人民不求政治与法律，但求得食与得衣。其故有二：一曰不知衣食与政法有关；二曰饥寒交迫，实无暇远虑。彼野蛮人之无高远观念者非不为也，实来不及也。公谓有二问题，曰开发实业是否采集产主义；曰应否暂时采用Dictatorship。吾以为两问题即一问题，盖所谓集产机关归诸公共管辖之下。而所谓公共管

辖，即为政权之行使。欲以政权行使于经济方面，则政治方面必有强有力之组织与组织的分子。故肯定第一问题，即同时肯定第二问题。惟中国目前之情形则与第二问题大相矛盾。夫做Dictator不难，而难于得其拥护者。中国之老实的百姓决不知何为拥护，即拥护焉，亦无丝毫之力。然则以兵为拥护者乎？果尔则非Dictator，乃傀儡耳。今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固亦难矣，而况绝无拥护者。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则第二问题不能成立也，明矣。第二问题不能肯定，则第一问题必随之而倒。公谓开发实业必借外债，将来人民受两重乃至三重之压迫，与吾所见相同，惟吾以为此乃无可幸免。公谓社会革命将莫由兴，吾则以为不然。惟其如此，方有社会革命。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般的缺乏。盖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决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公此行宜以国内情形时时徘徊于脑际，于是乃能以国内情形与彼土情形相较，又与彼辈主义及政策相较。若将本土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止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于我也。匆匆敬复。

东荪上

（九）东荪先生“再答颂华兄”

颂华吾兄惠鉴：昨上一缄，所述犹有未尽，今再续陈。兄读室伏高信论列宁之“乌托邦”一文，当知列宁之思想为梯阶之三段。曰贵族国家至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至无产国家，曰无产国家至无国家；又曰原始经济至资本主义，曰资本主义至共产主义，曰共产主义至无产主义。其是非姑不论，若以中国言，则Bourgeois之政治迄今未成，资本主义之经济迄今未成，比者自治运动开始，谓Bourgeois方在发端可也。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谓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可也。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今日中国之大患，一曰无知识（Ignorance），二曰贫乏（Poverty）。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即以此次旱灾而论，平日不知植树，荒已经年不知呼救，且数百年来，难得间年不荒，而绝不思丝毫之挽回，对于关系生命之食粮问题尚不动念如此，则此种但知伸手取食之人民，何事可为！须知无知与贫乏互相因果，即因无知而致贫乏，又因贫乏而愈无知，二者双轨并行，竟陷吾民于求生不得之境，可悲也已！罗素先生观察中国未久，即已洞见症结。其言曰，中国目下之所急者止在教育，次则实业。弟向以为救中国不在轰轰烈烈之事业，而在坚忍冷静之事业，意亦在此。特教育与实业有关，盖人之精神生活，必待其物质生

活在最小限度以上而始能维持，衣布衣者与衣绸衣者可同等发挥其精神生活，而不得衣者则不能焉。何也？超过最小限度以下故也。管子云：衣食足知礼义，即此之谓也。今中国人大多数所以不能发挥其精神生活者，实由于物质生活之太不堪，故教育所以救济精神生活，而实业所以救济其物质生活，要在巧为联络以各尽其利。今当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则惟有约少数同志自办，而前有学校之工场化一篇，即本此旨也。恽君代英撰“未来之梦”一篇，述其一生之志，在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而于实业之兴办，则采资本主义之方法，以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可谓独具只眼。弟以为苟此种人士而能多，各分头进行，既不问中央政治，复不问地方政治，亦不谈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谋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此时吾辈若为出风头计，为将来卷土重来计，未尝不可自标为劳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究其实不过个人之招牌，于中国之实际丝毫无关也。弟已看破此层，以为世人之目吾为社会主义者与否，乃另一问题。若以为社会主义是新潮也，吾安可不使人以此目我，此乃好名之事，吾辈必不屑为。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弟自信对于经济学无甚研究，惟对于Guild Socialism则信之甚笃，以其兼摄Anarchism之长处故也。此种新制度，彼先进民族尚未实行，况论吾国。故此制之在中国，吾辈子孙能否见之，尚属问题。弟之所信，既在辽远，则于现在不能不筹有事业可办。夫吾辈既誓不为资本家，不助资本家，不佣于资本家，则实业一途断矣，唯有从事于教育而已。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然不以资本主义之方法，决不能竟存于现在经济制度之下，现在经济制度既无法颠覆，既颠覆亦与民生无利，故止有协社为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惜吾辈亦无此种才能。弟日昨致函君励、虞裳，谓弟以前常觉有制定一种吾辈所托命之主义之必要，近来觉此必要实不甚急迫；盖吾辈所必要者，乃寻常之事业，而非新奇之主张，主张愈新奇，其去实际愈远。雁冰君谓抄近路或许可能，弟则以为抄近路绝不可能，吾人当万分无赖之时，必择一种主义而信为灵药。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弟向为詹姆士所说之硬心肠人，绝不愿持绝对论以自慰。须知此乃环境太坏之一种反动，此太坏之环境实为问题之根，吾辈当硬着心肠，以向此问题之根而求逐渐改造也。于此之际，苟目睹资本主义兴焉，Bourgeois兴焉，皆当认为当然之阶级，与其拒之，不如希其速来。人谓中国之问题即世界之问题，此言是也。此谓世界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中国问题之解决，而非谓中国自解决其问题而能致影响于世界。曩者吾等以为，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今则知其为梦想矣。盖吾国于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若夫伪劳农国则三五年内或将出现。意在造真而竟成伪，此计必仍归泡影。至于十年以后，则欧美之资本主义或即自倒，亦未可知。故曰，欲以中国问题而解决世界问题，必无是处。至于伪劳农国之危险，兄可以想象得之。罗素谓俄国政界第二流人物皆为旧日帝政时代之官吏，令人可厌。兄试思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书至此已觉太长，不复缕述。总之，弟之意在静观世变，先筑基础，而兄之职，在平情研究，以拓将来，二者实相待相成也。

东荪上言

（十）东荪先生“他们与我们”

我读了“继军阀而起者谁？”一篇，使我冥想了好几天，我觉得这种观察真是透彻。

须知人民愈不聊生，而对于财阀的兴起必愈以好感迎之。我今天骂财阀，人民将骂我们太捣乱了。平心论之，我们果真有捣乱的能力倒也罢了，无奈我们实在没有捣乱的能力。须知现在捣乱的乃是军阀，碍挠资本主义的发生乃是武力主义。将来必有一天资本主义与武力主义大斗法，而武力主义又必败在资本主义手里。至于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本领。我们骂军阀提倡自治，这班绅阀而要做财阀的，便借了来大吹大擂，得其所哉；我们骂资本主义，一班丘八先生也会借了实行他的“抢产主义”。可怜啊！我们说说来说去，是供人傀儡罢了。不过我们须知，丘八先生的抢产主义，不问他假借何种名义，总是要实现一次的；而绅阀的资本主义，挟了外国的力量在其后面，也是不问如何，总是要成功的。所以我们要睁开眼睛，自己认一条安身立命的路，去慢慢地走。

但我们的走，须得是做事。若专是发言，便无办法。

我个人在这种预测中看出一条路来，就是觅一个基础事业而不供双方利用的，忽着寂寞而实地去干。

（十一）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

（前略）他对于资本制度，我问他要反对呢，还是提倡呢？要反对又怎样反对呢？并且我还问他，要如何方能把社会弄好，不致有大危险。他说：“只有发展实业。”但是他又说，要有三个办法：一、由资本家发展实业；二、由国家发展实业；三、由劳动阶级自身发展实业。他还说，这三个法子，最好由国家来发展。因为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若归劳动阶级，又恐怕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结果。但我接着告知他道，中国政府如此腐败，只有破坏的能力，没有建设的思想，天天在那里添招军队，争权位还争不清，那有闲工来发展实业呢？他说，这样看来，国家既靠不住，结果仍归到资本家，看你赞成中国的资本家，还是赞成外国的资本家？不过将来要想平均经济，外国资本家很难处置，中国的还容易商量。我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他说：那末可输入外国劳动阶级。但中国工业程度又如此低下，亦必须中国资本组合起来，才能容纳。

我可以参一句话，无论用资本制度或劳动阶级，还是要从教育下手。要使人人明了这种道理，将来才可以处置一切。

但又有人说：与其实业发达之后，劳动阶级与资本家必生猜忌，弄出乱子来，不如不发展实业，还可以过安全日子咧。但我可有两个答案：

一、发达实业才有收入，才有经费创办其他各事业。比于湖南现在倘若实业发达了，收入必充足，必不致创办一种事都没有钱。

二、如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失败的原因，就是俄国原来实业不发达，一旦外人封锁，不供给货物，就难支持。并且中国地大物博，东西洋的原料渐渐不够用了，中国人自己不赶快把实业开发，别人须来开发，那是阻不住的。

这样讲来，资本家必定要经过的。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此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不过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因此我就问及罗素，新银团对于我国投资的事情。他说这是些资本家的野心，想垄断中国政权，束缚中国政权，束缚中国生死，真是将来不好办的一件事。（后略）

（十二）东荪先生致独秀底信

独秀先生：得你的责问，具答如下：

我以为中国现在贫穷到极点了，第一个急务就是增加富力。至于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资本主义，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在这种现状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省与县）绝对不会变成强有力；政府而不能强有力，则劳农主义永远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不能拿欧洲何种现成的主义来无条件地应用。

至于说不是抬轿的人即是坐轿的人，以现状论，抬轿的人，不以为苦，而反以不得抬轿为忧，则其穷苦可知。今我们执抬轿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为迂了。而此种穷困，实为一般物力缺乏的结果，换言之，即国民经济全般的不足，而非仅由资本家的榨压。所以我们的注眼处，宜广及经济界全体。总之，我的意见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国，能实行一种主义，我以为中国以后总不外乎地方自决。

二、勿论地方如何自决，而以中国民族的根性与时代的趋势，决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无强有力的政府，则劳农主义不能全部实行。

三、中国物力太穷乏，而穷乏的原因不是纯由于资本主义，故救穷乏也不当专在打破资本主义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若以倒国内资本主义而为倒外国资本主义之手段，其间是否有密切的关系，我尚未敢断言。

东荪上

（十三）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

东荪先生：前次质问先生底信有两个要点：（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而得此较好的生活？先生来信对于我质问底这两要点没有回答一字，却把论点移到地方自决、物力穷乏、外国资本主义上去，我实在有点

失望。

我见了几篇驳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资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说的三句话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话是什么？就是：

（1）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

（2）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

（3）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观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底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论，都会中新富豪拿资本到乡间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资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象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资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贵底结果，中产社会渐渐都沦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资本家兼并土地和资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资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输入商品包含在内）打倒手工业底缘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间了。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贫乏。先生所谓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谓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谓少数就是掠夺阶级的资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闸北或营盘口贫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内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训。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榨压，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运命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底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

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的很清楚，兹录如左：

> 教不变的蠢才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松沪护军使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态度，真可谓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训你们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资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资本家不可。资本是资本，资本家是资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资本不是长在资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们要求资本；惟是中国眼前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资本家。"（后略）

以先生底知识，当然能分别资本与资本家不是一物，但资本与资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资本便牵连到需要资本家并资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说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资本主义，可见别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见自然能救一般的贫乏，那么，以何因缘，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底贫穷非欢迎资本主义不可？

杨端六先生"与罗素的谈话"中，也说资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险，已是不好了。又说资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杨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资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与劳动阶级都不可靠，结果仍归到资本家，仍只希望资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一般的贫困；而且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见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见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阶级都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训练劳动阶级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马上便主张仍归资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经过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象政客猎官利用权门不费事便可得现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创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门得现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应该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象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 volution呢？（三）诸君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杨端六先生所谓"中国的资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资本来"。先生也说"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最大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视投资为危途，则资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来，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

而先生等又不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将以何法来开发中国底实业呢？

资本主义果然是好的，无论中外都应该欢迎；若是坏的，无论中外都应该反对。我们急于要排斥资本主义，本来不限于中国人，大部分还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压迫我们一天紧迫似一天，真是罗素先生所谓“束缚中国生死”了。

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造成外国资本家群来掠夺底好机会；他们始而是经济的掠夺，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夺，渐渐就快做中国底主人翁了，按诸产业竞争的原理，手工业遇着机器工业必然要失败的，小规模的机器工业遇着大规模的也是要失败的；以组织力薄弱的中国资本家遇着组织力伟大的欧美资本家，那能够不失败，将来那能够不降入劳动阶级。所以我曾说过，我们中国人别轻视劳动者，不久我们都是外国资本家底劳动者；我又说过，那时革中国资本家命的，不是可怜的中国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国穆耦初、虞洽卿先生们。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所谓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

前文所论三项，虽然不过是就先生底立论添点蛇足，却是我们重要的争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话也要请教于先生：

中国底贫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观的说话，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现在没有谈论甚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谈而特谈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甚么资本主义呢？

先生屡说不赞成采用欧美现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现成的？

先生说：“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请先生去问问招商局，开滦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纱厂，商务印书馆，他们的股票是否都归经理人所有？

先生说中国资本家可怜，请问死在开滦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马克思固预料在“果”上资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车撞壁的必倒状况。先生既然觉得资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们推车撞壁，而不教他们曲突徙薪呢？

先生说中国地域如此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请问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吗？

先生既主张“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张“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则全国中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状况，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资本主义底主张相冲突吗？

先生预料十年内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赞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谓“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说？

先生一方面预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张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请问既是必然发生，宣传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们所赞成两方所争论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传那真的来纠正他，岂是颟顸官僚的闭关政策所能了事的吗？

先生说："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又说："宜吾辈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患无劳动者也。"我以为先生若欲在理论上拥护非劳动者的先生们专政，反对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还可说彼此各有一是非；至于显然的事实却不可以任意颠倒，请问怎样才是真正之劳动者？请问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车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

先生以为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组织，资本主义方在萌芽，应该先经过Bourgeois的政治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才说得到社会主义，然这样完全听着自然的Evol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Revolution，马上在中国成立的Bourgeois阶级的是不是中国人？

在全社会底一种经济组织、生产制度未推翻以前，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决没有单独改造底余地。试问福利耶以来的新村运动，象北京工读互助团及恽君的"未来之梦"等类，是否真是痴人说梦？既然还没有何种主义的区别，全中国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谋什么大同盟呢？

先生说："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则他日设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为反社会主义者矣。为个人计诚得，其奈事实何！"这话说得真痛快，但请先生自省已否犯了这个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还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为十年内决无建立真正劳农国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抛弃从前"中国与俄联盟，建立劳农国家，以两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资本主义"底主张，是不是太想得现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学生底速成思想也传染给先生了呢？

先生说："今中国之主张劳农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我要请问先生：今中国之主张资本主义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关能有几人？同是旧日党派，究竟那一个是进步的？

我今总问先生几句话，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要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打破现状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思想？先生说："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请问先生只望何人来做出现成的Dictator，做出现成的兵和帅，好供给先生解决中国底问题？

通观先生底议论，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现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针"两大毛病？

（原载《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

社会主义批评

——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说都建设在伦理上面，他们眼见得穷人底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或相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底经济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经济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们固然不应该跟随着他维持现状，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们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阶级底苦恼，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简单的均富论，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证明出来现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经济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①，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设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说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面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现代生产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现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简单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了；资本既然是私有，结果有资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并且自己还可以不做工，只拿出资本来雇人替他做工生产；没有资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劳卖力给有资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结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阶级和被雇的劳苦阶级底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现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底种类额量，不受国家之统计调节，资本家乘时投资，争加产额，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

①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现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认明现社会底经济的事实。

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谁也不能据为己有，谁也不能租给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由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许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现在代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纺纱厂，资本一百万元，一年赚了净利一百万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钱八元，一年工价全额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经理以下各职员底薪水至多不过十万元，再就算上资本家底官利二十万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纺纱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职员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万元，是应该归他们全收的，但他们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资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像这种不平均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许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马上完全撤废工银制度，终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间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资本家底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二）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底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底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尤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纸币是金钱底代表，金钱是资本底代表，都不是资本底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底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與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穀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穀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

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榖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底积聚和资本主义底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渊之别。（二）由于机器盛行　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鱼，有一架纺线车便可以纺纱，有一架织布机便可以织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资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资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们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织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资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气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资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资本家掠夺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资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资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资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资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资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渐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换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资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梦想得到的了。一方面资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底生产品成本轻货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资只能糊口，那里还有钱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给资本家做劳动者；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阶级底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资本主义既这样强盛，压迫得劳动界无路可走，何以还说能讲社会主义呢？不然不然。正因为剩余价值替资本阶级造到这样强盛的地位，而资本阶级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也正含在这剩余价值里面。马格斯说："有产阶级锻炼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资本阶级是剩余价值造成的，将来破坏资本阶级的也就是剩余价值。一定有人说：资本家占了剩余价值，资本无限增加，机器无限增多，生产品无限产出，岂不是很好的现象吗？岂不深合生众食寡为急用舒的孔门经济学说吗？殊不知在共产社会里生众食寡为急用舒或者是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资本制度之下生产品增多，剩余价值也随着增多，此种无限增加的剩余价值复变为资本，不能用为社会公共增加福利，乃为少数的资本家所私有，于是乃由剩余价值造成生产过剩，由生产过剩造成经济恐慌（Crisis），所以说生众食寡为急用舒在资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现象。上面的话或近于抽象了，再详细说一下：在理论上看起来，社会上最怕的是贫乏，生产品多多益善，生产过剩是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许多许多，本算是好现象；但这种生产过剩的好现象，在资本制度之下反变成了社会底危机，乃是因为生产额超过了需要额，这就叫

做供过于求，这便发生销路底困难，过剩的额越大，发生的困难也越大；例如社会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现在产出一千五百匹还不大紧要；若是产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产过剩额到了这步，社会上必然发生经济恐慌。因为资本制度之下的产业状况是极端自由的，是无政府的，无论何项产业资本家都可以自由联合自由投资增加生产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产品卖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资本家自由收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劳动者所得仅足糊口，生产较需要过剩了几倍，资本家虽然可以奢侈些，也断不能把同样的销费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资本阶级底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劳动界因购买力不增加，不能多销，那生产过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发生滞销，跌价，停工，社会的经济恐慌，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必然的现象总括说起来，乃是资本制度之经济的自然结果，因为资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资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底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则社会上消费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费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经济恐慌。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溃的危机如马格斯所指示，而马格斯身后数十年资本阶级何以不但未曾崩溃并且日见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马格斯学说失了效验。各国资本家拚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拚命推广制造业，拚命寻求殖民地将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销售了，才能够弥缝一时表面上没有十分现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是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费了许多生命财产，结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约。因此资本主义便不得不和军国主义结了不解之缘，因为镇压殖民地或与他资本国争夺商场都非有强大的海陆军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骗人的话，其实都不外销纳剩余的生产品，好免国内的经济危机，好维持资本阶级底权利；试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底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两洲底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扩张在中国朝鲜底商场，还美其名曰保全东亚和平是一样。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言是怎么失败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资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败底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别比威尔逊坏些，乃因为他们的国家组织都立在资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他们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销纳，如何救济经济危机，如何维持他们资本阶级底地位呢？威尔逊总统不过说得好听点，如果他美国当真抛弃了军国主义，他美国在国外底殖民地和商场抛弃不抛弃？如果抛弃了，国内底剩余生产怎么样？所以威尔逊总统底主张不但在巴黎和会失败了，并且此时美国底海陆军备仍然是有加无已。日本鉴于美国底情势，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业底威权，也不能不竭力增税扩张海陆军备到现状一倍以上，日本当局非不知这税太重了全国底工人农民小学教员下级军官底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机，但是他们更知道没有充分的武力保护商业不能输出剩余生产乃是更大的危

机，所以明知道扩张军备是毒药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扩张军备是陷井也不得不从上面走过去。资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资本制度的国家保护商业的军备扩张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竞争扩张军备是无限的，相互争得的殖民地或商场是有限的：我相信生产过剩的弊害资本家终是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军备无限的扩张是资本阶级杀人适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当初资本阶级是拿殖民政策或国外商场救济了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我更相信将来资本阶级正因为互相争夺殖民地或商场，酿成国际资本阶级大倾覆的更大危机，我相信欧战底结果，国际资本阶级底基础已经大大的动摇，我更相信将来再经过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战争，便到了资本阶级底末日，即国际的崩溃。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运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

一定又有人说：资本主义在欧美是要崩溃的了，是可以讲社会主义了；我们中国资本制度并不甚发达，更没有到崩溃的地步，如何能讲社会主义呢？像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恐怕很有许多人相信，其实他最大的缺点，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如果他断定欧美资本制度要崩溃能讲社会主义，他便不应该说中国不能讲社会主义仍要采用资本制度。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底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到是各国资本制度底崩溃还未现实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们到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们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底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三）应讲何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底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们应该择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除了“废止资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说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一，无政府主义

二，共产主义

三，国家社会主义

四，工团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

右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马格斯和无政府两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张阶级战争，是出于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他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没有国家没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资本阶级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政治总会侵害工人底自由，试问呻吟于资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们的自由在那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阶级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底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底权利，这样公平的调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调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们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说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评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绝对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没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绝对的，而且艺术必须有绝对的自由，脱离了一切束缚，天才方可以发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论到政治经济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那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经济而言：现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统一机关用强制力

去干涉调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说：我们可以自由联合，公议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的情形发生；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没有一个统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调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张各个的绝对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么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调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转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统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像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监守公物而自盗，强力迫胁不悦己的妇女，这种人无论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说：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底一四五已经略略批评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较的讨论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马格斯，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张利用有产阶级底议会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议会派；内中无论是柯祖基底正统派或是柏伦斯泰因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温和两派，温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维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维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马格斯，而两派底主张彼此却正相反对如左表：

共产主义底主张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张
阶级战争	劳资携手
直接行动	议会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第一，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资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资本阶级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资本阶级的政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张绝对

的阶级战争的，是不独反对与资本阶级妥协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张阶级战争的温和派提携的。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二，不赞成阶级战争的人自然要向议会讨生活；但我们要知道议会制度本是资产阶级专为供给及监督他们的政府底财政而设立的，要拿他来帮助劳动者，来废除资本私有制度，岂不是与虎谋皮吗？选举底怪现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议员，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取革命的行动，没有一句主张采用议会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许有产阶级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阶级战争销灭有产阶级做到废除一切阶级所必经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问俄国共产党：有产阶级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张无产者一阶级专政？俄国人答道：你们何以不主张全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问道：一阶级专政岂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们所谓民主政治底内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阶级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说不合乎民主政治，说不是马格斯主义；其实马格斯在哥塔纲领批评中明白的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间，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则那面的革命的变形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说：“（一）纠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阶级，（二）颠覆有产阶级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说：“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们跑上权力阶级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渐次夺取资本阶级的一切资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组织权力阶级的劳动者手里”。可见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马格斯底主张，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第四，俄国底共产党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组织，是他们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终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浓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采，俄国共产党还未统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阶级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人有说马格斯当初所主张的俄国现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张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说：“无产阶级都没有丝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阶级在他们国里争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脱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阶级全体指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阶级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别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阶级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呵！”。马格斯所主张的国际运动的色采是何等浓厚，可惜自称为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记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

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应该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原载《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一九二一年四月八日）

李　达

近来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这确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的真谛若能充分的阐发出来，批评者就不会流于谩骂，信仰者就不会陷于盲从。而且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越发鲜明，竭智尽力，各为其主，而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两方面，皆可同时发展，以待最后之决胜。所以我说现时讨论的人越多，越是好现象。

《改造》杂志二月号特辟“社会主义研究”一栏，一时知名之士如梁任公、蓝公武、蒋百里、彭一湖、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一班人，均有长篇文字，表明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的文字均有点研究，我读了非常感佩。但是这几篇文字之中，也有误解社会主义的，也有同情于社会主义的，也有积极赞成资本主义的，也有恐怖伪劳农主义的，我觉得这种地方，却也应该详细研究分别讨论。只是我没有许多闲暇作从容的论辨。所以只就梁任公一篇代表的文字，讨论一个大概。

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篇文字，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于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试作一个疑问质询梁任公，或者对于主义上有些少的阐明补正也未可知，这也许是梁任公所说“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的一点反应了。

梁任公本文的旨趣，约分五层，兹摘录大概如下。

（一）误解社会主义。梁任公首先误解社会主义为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所以说，“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因此推论中国产业不发达，生产机关极少，不能行均产主义。所以又说：“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罔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于是又论到社会主义运动，说“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以内，为分配平均之运

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此一层是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议论。

（二）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梁任公又以为中国生产事业极其衰落幼稚，中国人消费所需之生产品，皆仰外人供给。而制造此类消费品的资本家、劳动者和工厂，均在外国而不在中国，中国人受不到外国资本家的恩惠，中国无业人民又不能到外国工厂做工。中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工厂绝少，游民最多，并无劳动阶级。既没有劳动阶级就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说，“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社会主义既不可行，则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然不能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而且要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做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此一段是梁任公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立言。

（三）高唱爱国主义，排斥外国资本家。梁任公看见国内无业游民过多，贫困日甚。加以受外国产业革命影响，“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人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所以中国生产事业，必须由中国资本家自己开发，以便造成多数生产机关，吸收本国多数无业游民使为劳动者。所以说：“中国生产事业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咀咒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末了又说：“欲使中国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至少亦须在吾国内生产而供给之。”若对于本国资本家采抗阻态度，“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于吾辈之主义为大不利。”“然则所当采者为何？则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是已。所谓矫正态度者，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姑容。”由此一段可推知梁任公爱本国、爱本国资本家、劳动者之热情，故发而为排斥外国资本家、劳动者之言，也许是爱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一种表现了。

（四）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梁任公既然主张用资本主义开发本国产业，而资本制度发生的恶果，当然要循外国资本制度的旧径，发出无穷的弊害。要想补救此种弊害，只有采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不可抗阻，亦不可坐视。所以说：“惟当设法使彼辈（资本家）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又说，“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弃娆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此一段是他提倡温情主义，施行社会政策的主张。

（五）误会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劳动者地位改善，所以反对；又误解为均产，所以反对；又误解为专争分配所以也反对。又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利用游民，所以说："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有增加游民。"又说："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之前途，无益而有害。"这是梁任公反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最精刻的地方。但是依他所主张的运动方法却不外以下两层。即对于劳动者，"第一，灌输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工会次第成立，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行社会主义运动。但梁任公所主张的工会运动，不在敌抗本国资本家，而在敌全世界资本家，所以说："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又说："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他主张运动的规模非常之大，而所用的手段又非常之小。未知是否有效，实有讨论之余地。

以上梁任公论社会主义运动的大概，以下逐条讨论：

第一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运动又是什么？我以为这应该首先在这里说明。

社会主义成了现实的势力活动而来的，还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瓦特发明蒸汽机关以来就引起欧洲产业革命的导火线，新机械陆续发明，归特权阶级所有与利用。家庭工业变成工厂工业。手工业者骤然失业，不得不到特权阶级的大工厂中，做机械的奴隶。新机械不须劳动者多年的练习，又不须专用男性，而吸收妇女与少年。劳力供给过多，惹起男女的竞争，助长工银的低落，占大多数的消费者无产阶级，不能消纳工厂中的生产品，资本阶级不得不向海外觅销场，于是惹起国际战争；于是惹起经济恐慌；于是贫富的悬隔愈甚；于是欧洲的劳动者觉悟他们实在是被引到错路上来了。他们觉悟他们自己的正当权利，于是觉悟到以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资本主义给了他们一个好教训——但这教训的代价不小——使他们知道以自由竞争及私有财产为根本的社会组织是毕竟要使他们陷于资本主义的迷途而把自身做他的牺牲的；要谋社会全体的福利只有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产制度永远除去，而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阶级由对峙而斗争，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以成，这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

所以社会主义在根本改造经济组织谋社会中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

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的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至于所采取的手段，有急进缓进的分别，然就现时最新的倾向而言，一方面在联合一切工人组织工会，作为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学习管理生产机关，一俟有相当组织和训练，即采直接行动实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他一方面则联络各国劳动阶级为国际的团结，行国际的运动，以期扫荡全世界资本阶级。

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而在此产业革命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先前恃丝

业、茶叶、土布业、土糖业，以至制钉业、制铁业谋生的劳动者，今皆因欧美、日本大工业的影响，次第失业，又不能赴欧美、日本大工场，去充机械的奴隶，得工资以谋生。加以近年来，国内武人强盗，争权夺利，黩武兴戎，农工业小生产机关，差不多完全破坏。中国无产阶级的厄运，实不能以言语形容。所以我说中国人民，已在产业革命的梦中，不过不自知其为梦罢了。

中国旧有的小生产机关，既然受了欧美、日本产业大革命的影响，差不多完全破坏，而新式生产机关又非常的少，因此之故，中国大多数无产阶级的人民，逐由手工业者变为失业者，专成为欧美、日本工业生产品消费的失业劳动者了。所以中国的游民，都可说是失业的劳动者。

我并不主张利用游民实行革命。但是劳动者不幸失业而成游民，若有相当的团体训练，何以绝对不许他们主张自身的权利？梁任公一定要他们回复到了赁银奴隶的地位以后，才准他们发言，是何道理？

至说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不同的地方，也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

所以在今日的中国而讲社会主义运动，在如何设法得以造出公有的生产机关，如何方能避去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生的弊害，而不专在于争生产品的分配。梁任公即误认了这对象，而主张“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这明明是主张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梁任公这公例，我就首先不承认了。前提既然不当，以后因此前提演出来的推论，当然也是不对。

照以上所述看起来，我们晓得欧美社会主义运动，决不是梁任公所说的“劳动者地位改善”；也不是他所说的“均产”；也不是专在于争分配了。

第二，要想为中国无产阶级谋幸福而除去一切悲痛，首先就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要使他们获得生活必需的资料，首先就要开发生产事业。所以发达生产事业的一件事，无论是资本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是绝对承认的，只不过生产方法不同罢了！

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今就这两种生产方法分别比较于下。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一切生产机关，概归最小数资本阶级所私有，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均为劳银的奴隶，完全受资本阶级所支配。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劳动者制造出来的剩余生产尽归资本家，自己仅得些小工资过活，还不能赡养一家。资本家专讲自由竞争，对于生产力绝对不谋保持均平，供给与需要不能相应，只顾盘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增加生产力，谋生产多量的商品，增加自己的私产。一时需要减少，生产过剩，其结果资本家别谋妙法填补，劳动者却因此大受恐慌，招来失业的苦痛，这就是产业组织不受政治力支配的恶果。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却不是如此，一切农工业生产机关，概归社会公有，共同劳力制造生产物，平均消费。商品生产可以全废，生产物不至于压迫生产者。人与人的生存竞争完全消灭。生产消费完全可以保持均平。一

人利用他人、压迫他人的事实绝对不会发生，也没有经济恐慌、人民失业的危险。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是有秩序、有政府的状态。这两者的利害得失，我想无论何人都容易判别出来。

世间不懂社会主义的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洪水猛兽一般，当着这社会主义潮流澎湃而来的时候，这类人就大惊小怪，好象对于项城称帝、张勋复辟一样，纷纷议论顺逆的态度。他们以为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就破坏生产机关，或者将生产机关分散，生产事业就要永远停止，人民就得不着生活资料了。梁任公误解社会主义为均产主义的说法，也就是因为忘记了社会主义更有很好的生产方法的缘故。他或者不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有很好的生产方法，而以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必不可免的过程。那么，我就要告诉梁先生。若忧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自觉，这是个教育的问题；若忧劳动者自己没有发达生产的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资本家要雇劳动者，共产的劳动者只须自己出气力。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

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我想无论何人都当承认的。中国生产事业虽十分幼稚，远不如欧美、日本，然在稍远的将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必有追踪欧美、日本的一日。据现时趋势观察起来，欧美、日本的社会改造运动。已显然向着社会主义进行，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就中国现状而论，国内新式生产机关绝少，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着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欧美各国的经济组织，正如旧式不合理想的大建筑物一样，规模太大，转换不易，要想根本改造，实在是最难之事。请看欧美社会改造运动家，那样的努力，那样的牺牲，犹然达不到改造的目的，这就是最好的实例。梁任公说："吾辈畴昔所想念，总以欧美产业社会末流之敝至于此极，吾国既属产业之后进国，正可惩其前失，毋蹈其复辙，……及至今日，而吾觉此种见解什九殆成梦想。"然据我的推想，梁任公所说的不过是没有经验的"梦想"。因为他并未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并没有努力运动，又岂能期望社会主义自然实现吗？

梁任公主张要设法使中国国境以内建设适当之生产事业，以吸收失业游民使不至冻馁而死，资本阶级纵掠夺剩余生产亦可姑容。这样说来，我们的目的若果是专在使游民得衣食资料，那就有两条近路可走：第一，设法不开发工业，极力奖励旧式手工业生产，或者提倡国货，排斥外货，依梁任公所说："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照这样办，我国的生产事业也可望发达，游民可以减少，劳动阶级可以成立。社会运动得有主体，新社会亦可以实现了。第二，就是完全抛弃国家主义，主张将中国全土交各强大之资本国家共管。各国就可以用最大的加速度的生产力在中国开发产业。此时中国游民，不患不能得生活资料了。中国全国人民若尽成为劳动者，则以劳动阶级资格和世界资本阶级为最后之决战，世界的社会主义就可实现了。单凭思想，这两条办法，或者也可以试办。只有一层，就第一办法说，现在已不是闭关自守的时代，而且受不起外部的压迫，要维持旧式生产事业是绝对难办到的；就第二办法说，是

爱国主义者所绝对不肯承认的。除了这两法以外，若一方面要采用欧美式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固执国家主义来谋本国实业的发展，那就是大大的烦闷了。我们有件事应当注意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背面，存有军国主义。若美、若英、若法、若德，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军国主义最强盛的国家。欧美姑且不说，就说新具工业国的日本，日本的工业发展的路径，不皆是海陆军助长而成的吗？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梁任公认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这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罢。

至于梁任公说，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惟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任公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

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的，全国四万万人（由某种意义说，都可算是劳动者），虽然有许多无业的游民，然而都可以叫做失业的劳动者。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

若依梁任公说，中国若是没有劳动阶级，当然就没有资本阶级了。政治方面没有贵族和平民阶级的中华民国，又没有资本、劳动阶级，就可以算作无阶级的国家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是梁先生有意制造社会革命，就不应非难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了。我有一句好笑的比喻，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陷于“循环定理”吗？

诚如梁任公所说，资本主义可以达到社会主义，因而我们一面去“挖肉做疮”，那么，梁先生亦觉此法遇缓否？若是梁先生不怕亡国，我看还是照我前边说的话，让外国资本家到中国来开发实业，到了程度，中国社会革命自然也可以成功的。否则，索性慷慨点，也不要讲什么主义。世界的趋势，是必须要实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必须灭亡的。让他们外国的资本家来到中国做逋逃薮，�火余光，也必须熄灭的，等他将熄灭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一齐起来，联合世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同扑灭此荧荧余烬共建社会主义的天下，岂不省事！

第三，资本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并不是振救失业贫民的方策。我们要知道劳动者的失业，就是因为新机器发明产业革命招致而来的。一架机器可抵数十百人的劳力。在资本制度的社会里，新机器增多一架，就增多失业者数十百人，所以在今日产业革命正在开始的中国，若更奖励资本制度的生产，并不曾将产业革命的流弊根本除去，产业革命还是产业革命，不过将外国人的资本家变成中国人的资本家罢了。若果中国提倡资本主义生产，效力速，则一时间产业革命的影响烈，旧工业之下的失业者亦愈众。而能“丐

余沥以求免死者”不过千分之一二而已。然而同时外国商业的掠夺不能说就可以抵制得了的，则又无非使中国的劳动者受一个两重的压迫罢了，救济一语还是空谈。效力迟咧，不消说了，梁先生对于资本主义所抱的希望都成泡影！要等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面可以和外资抗衡，一面可以尽数吸收国内的劳动者，其中要经过如何长的时日，恐怕那个时期未到，“而我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且相索于枯鱼之肆”了！我们在这里做梦，外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且将匿笑于其后”了！只有抱着国家主义的人，听见自己国内也有资本家，也有兵强国富，才眉飞色舞罢了。

其次讨论温情主义。梁任公既然主张资本主义，其当然的顺序，要归结于施行社会政策的。这种滑稽的办法，我们实在不敢苟同。现社会中经济的组织，不外两个大原则，就是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这两大原则就是现社会中万恶的根源，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把这两原则完全撤废。讲社会政策的大都不然，只主张藉资本阶级的国家的立法，施行几项温情政策，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还是依然存在，资本家仍可以行自由放任主义，积极的发展自由竞争，无限制的扩张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简单说，社会政策就是处理社会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梁任公正在欲实行资本主义藉却就提倡社会政策，在方法上已是南辕北辙；还有一层，社会政策在欧美各国说起来，是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发挥以后所生的必然的结果，若果在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未发达的国家说，社会政策就行不去，而且也不能一一见诸实行的。就中国说，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代，人民因产业革命所蒙的苦痛尚浅，若能急于此时实行社会主义，还可以根本的救治；若果要制造了资本主义再行社会政策，无论其道迂不可言，即故意把巧言饰词来陷四百兆无知同胞于水火之中而再提倡不彻底的温情主义，使延长其痛苦之期间，又岂是富同情者所忍为？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社会主义是社会健康的标准，社会主义运动是治病而复于健康的药。只要问中国现在的社会病不病。什么病便下什么药。一定要把中国现在的病症移做资本主义的病症而后照西洋的原方用药，这种医生是不是庸医？“庸医杀人！”中国人民的元气已经丧到不能再丧了。梁任公对于资本主义所取之矫正态度说：“惟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太过，非彼辈之福。”梁先生以为靠这一句空话，资本家便能奉行，劳动者便能安乐了么？资本家若果能有著明深切之觉悟，他们一定能觉悟到他们的最后命运——就是他们终于不能存在而必须让给社会主义的世界。若是没有觉悟，他们一定惟利是图。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智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社会改造论者的空言是无补的，有实行力者唯有劳动家，而劳动家却被温情主义缓和了。梁任公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历程。

提倡某种步调与社会中事实有某种步骤是不同的。因为社会实况的中间，实行温情主义的时候，就有反对的呼声。反对的呼声，就是促劳动者觉醒的。提倡的人可不能自

四

已反对自己。所以我说由梁任公的温情主义的主张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

第四，资本主义是国际的，并无所谓国界。资本主义既是侵略，所以无论何种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国际的势力必须采用国际的对抗方法。

资本家在各国蔑视国境，并且超越国境营国际的生活。如所谓银行团国际信托等等，均有国际的生活，为国际的行动。各国资本阶级驱使劳动阶级如牛马。所以在现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必须历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国际的方针，和资本阶级国际的行动挑战。

劳动者没有祖国。社会党划分人类，以阶级不以国。若要假设一些纵线将国与国分开，就可另引一横线与各纵线相交，将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截为两段。社会党只注重这横分线，不注重纵分线，社会党因为要增加本阶级反对别阶级的力量，想把所有的垂线取消，因为这些垂线纷乱劳动阶级的心理，妨扰劳动阶级的自觉，阻碍自己主义的进路，所以要谋国际劳动者的团结。

所以就社会主义者的立场而论，不论本国外国，凡见有资本主义，就认为仇敌，总要尽力扑灭他；也不论在本国或外国，凡见有掠夺压迫的资本阶级，就认为仇敌，总要出死力战胜他。社会主义没有国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国界。我们不能说外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应该反对，本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就不应该反对。我们不能说本国资本家对于本国劳动者有所爱护，别国资本家对于本国劳动者更加虐待。资本家务必掠夺劳动者，然后方能大行其资本主义；我们不能说本国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所生的弊害比外国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弊害少。外国资本家把商品舶到中国卖，席卷金钱，存在自己衣袋里；中国资本家造出商品在中国卖，席卷金钱，也是存在自己衣袋里。同是一样的藏在自己衣袋里，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向他们领取分文使用，在劳动者有什么区别？

况且就现在的资本家说，他们并不排斥外国劳动者；不但不排斥，而且非常欢迎。资本家雇佣劳动者，不问国界，也不问是亡国奴或是未开化的人民，只要他们甘愿受低廉的劳银做工，资本家无不欢迎。中国的劳动者遍布世界，各国资本家很欢迎他们，而且对于本国的劳动者反不愿雇佣，因为本国劳动者要求高价的劳银，并且有时不肯受虐待。总而言之，资本家是虎，我们不能说，本国的虎比外国的虎不会食人；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抵抗外国的虎，不必扑杀本国的虎。资本主义是流行世界的瘟疫，瘟疫的菌能够流播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本国的瘟疫不可怕，而外国的瘟疫可怕；我们也不能说，只可消灭外国传来的瘟疫，不必消灭本国的瘟疫。劳动者没有祖国，所以要谋国际的团结，要扫灭全世界所有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的教训。要谈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人，至少要了解这一点；不然，就要说门外汉的话了。

第五，梁任公要谋中国劳动阶级的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梁先生的目的，可说是非常远大，可是所主张的手段，只说要对劳动者灌输智识，助长组织，而先从疾病保险入手以促成真正的工会，藉工会以与世界资本阶级作战，以期达到那远大的目的。这种手段，如何的迂缓固不待言，而且这也并不算是什么革命的手段，实不过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派的劳动运动罢了。我想借此机会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略述一个大概。

社会主义运动的手段很多，我只举出最重要的三种：一为议会主义，二为劳动运动，三为直接行动。这三种手段，究竟那一种宜于中国，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先就议会主义说。议会主义主张劳动者组织团体为参政的运动，想藉立法机关，成立改善劳动地位或矫正资本阶级的法案，慢慢的改造社会。这种手段，没有多大的效果，我们看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先例就知道了。社会党要和作对的资本阶级在议会中妥协，试问能够得到什么利益么？不过要求资本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欧美各国社会党，得了多年的经验，受了俄国革命的提醒，多能觉悟到议会主义已经破产而倾向于有效的急进的方面了。

再说劳动运动。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大的武器。可是劳动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而不是全部，社会党若专靠行劳动运动，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工会本是社会主义的学校，是劳动者学习支配管理生产机关的教场，学会了组织训练，准备组织劳动者的国家。可是不能利用罢工的手段来举行革命。因为举行总罢工实行革命，劳动者非皆有相当的教育和训练不可。劳动者既然有如许的教育和训练，其结果当然要实现新社会了。然而事实上决不能与理想相合的。所以劳动运动只可作为一种必要的手段，却不能算作社会运动唯一的手段。

现在说直接行动。现代各国进步的社会党都觉悟了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手段，都晓得采用了。直接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直接行动，可分两种：一种是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一种是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用突发的总罢工的手段，实行革命。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就用政治的优越权，从资本阶级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

以上三种之中，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者究应采取何种手段，我却不大留心这事。可是就我的推测而言，或者不得已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议会主义的手段，在欧美曾经实验过，并没有多大的效果，可说是已经破产了。劳动运动的手段，只于工业国相宜，而于农业国不相宜。其理由俟有机会再行详述。所以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专恃劳动运动恐怕不甚容易。除了这两种手段以外，只有采用直接行动的一法。而直接行动的两种之中，我看或者要用劳农主义的。工团主义的直接行动，专靠总同盟罢工的武器，也只能适用于工业国。所以俄国的革命运动，就要采取另一种方式，即劳农主义的方式了。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中国社会党人，若也抱着与梁任公同一的宗旨，想组织中国的劳动阶级和世界资本主义宣战，我看还是不必去办疾病保险式的工会，不如采直接行动，和各国劳动阶级为适当之联络，共同努力运动，反为有效。我并不是不主张劳动运动，只我不过不认劳动运动为社会运动的全部罢了。

我的讨论说完了，现在我把这篇讨论文字的大旨，简单明了的条陈于下：

一，中国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在社会主义上会合。

二，为中国无产阶级谋政治的经济的解放，作实行社会主义的准备。

三，采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努力设法避去欧美资本制产业社会所生之一切恶果。

四，万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陆向无产阶级磨牙吮血，则采必死之防卫手段，力图扑灭。

五，联络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图巩固的结合，为国际的行动，与世界资本阶级的国际行动对抗。

为达到上列的计划，采必要之运动手段：

一，网罗全部劳动者、失业的劳动者，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为作战之训练。

二，培养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

三，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

四，社会党人不与现政党妥协，不在现制度下为政治活动，要行有效的宣传为具体的准备。

（原载《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出版）

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三日）

旋

我们同志们和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讨论，已经有好多次了。对方的答复，我也曾仔细的看过几遍。我总觉得他们的答复除了泼妇式的骂街以外，别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我以为与其和他们对骂，不如从根本上把他们执迷不悟的地方矫正一回，所以我今天作出这一篇久已想作的文字来，希望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有以教我！

（一）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是非革命的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的建设，一定要在旧的社会组织破旧了以后才能行的。所以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工夫就是"革命"。这一层本是极其浅近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讲"管理蚕食"，先不必说蚕食的可能不可能，就说是可能了，中国就没有许多的大工场。中国的急务是振兴工业，制造劳动者，而要避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是失业的，没有工作的。请问使他们往那里蚕食去？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又说，先使劳动者有了管理的能力了，然后再革命（？）我以为劳动者练习管理是革命后的事。在革命前是不可能的——就说是可能了，中国人是受外国资本家的单纯榨取的，大半都不是工场劳动者，我不知道让他们往那里练习管理去？我们听够了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一句话就是（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情形，各时有各时的不同状况，不能预定）唉！可怜！我们并不是不吃这块已经可得着的面包，我们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嗜好，所以宁可饿着！这个说法对吗？各地有各地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状况，所以英国人，古代人不能为我们现在的中国来想改造方法，但是现在我们中国人即想改革中国，能以不想一个具体的方法吗？你们怕革命，你们怕革命后打破了你们的饭碗，你们就不必讲改造。冒着改造的招牌，暗中延长旧社会的命运，你们的心真可诛了！你们的肉尚足食乎？

（二）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老实说吧！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们所主张的完全是资本主义！张东荪说："资本主义是不可可免的，我们只好听之。"徐六几的说法更滑头了："社会革命之真意

义，是要生产的新方式的树立，使社会上全体建设物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是如此，至于他所用以表现的方式是暴烈，抑是和蔼，都不关重要”。既说树立生产的新方式，而又不主张革命，则树立方法自然是舍资本主义以外别没有了。你们主张资本主义就主张资本主义好了，又何必带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假面具呢？骨子里主张资本主义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此种“暗娼式”的行为，可怜亦复可恨！

（三）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不主张国家经营产业的

现在说到根本问题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产业自治”“废止工钱制度”不是伊的特点。伊的特点就在乎这两重组织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代表消费的国家；一个是代表生产者的基尔特。我以为此种组织在中国一定不可能。中国与英国不同。英国是产业已经发达了，社会主义在英国所应当做的工作，只是把管理权由资本家移之于劳动者就可以了。中国则不然，中国是要把资本由财阀，军阀，……的手中没收过来，从新起头来振兴工业，制造劳动者。此种任务不能不归之于革命后共产党所站立的国家的手中。此种趋势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况且非把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他的力量不能充足。有国家政权的扶助，没收，建设，才能以迅速。有人怕国家的权太大了。我以为这是不足惧的。第一，我们所说的国家，不是现在的国家；第二，同时，劳动者的自治也是非常注重的。我们看一看现在俄国的经济组织，立刻此种畏惧就可以没有了：俄国现在管理产业的最高机关自然是“最高公共经济委员会”了。此会乃六十九人组成。其中，三十人选自产业组合；十九人选自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人选自地方经济委员会；七人选自人民委员会；二人选自消费组合。其中除选自人民委员会者为代表政府，选自消费组合者为代表消费者以外，其余的六十人，或直接或间接，皆选自工场中劳动者。我以为此种组织既然可以调节，又可以集中，比那不可能的两重组织强的多了。

（四）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说到辩论的焦点了。无产阶级专政不过防掠夺者的死灰复燃就是了，本没有什么奥妙。并且在革命之后，人人都要劳动，自然都变成了无产阶级了，有什么可怕呢？关于独裁政治的必要，我可以再引列宁的话以证明之：“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底过渡期间内，独裁政治底必要，实有两个重大的理由，这是不难知道的。第一，对于那班剥削者底反抗，若没有峻严的压制，就不能征服并破坏资本主义。因为那班剥削者的资本家底财富和他们在组织上，知识上底优点，不能即时递夺，所以他们在这个长时间内，总想图谋推倒这可恶的（在他们看来）贫民底权威。第二，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纵使没有对外战争，但没有对内战争，是不能想象的；无数千万的人由一方面到他方面的犹豫和去就，以及最大的不安，不定，和混乱底状态，总是难免的。旧秩序下腐败的分子，必居多数，而且和小资本阶级关系很切（因为每个战争和恐慌底牺牲者，都是资本阶级），在这个变化中间，他们当然要打内商量的。于是这些腐败的分子，除了犯

罪，奸猾，贿赂，和投机等事以外，就没有别的表现。要免除这种事情，只有用时间和铁腕。”

在中国一般人都习为滑头，欺诈，游惰，……尤其非用此种“铁的管理”不可。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问一问你们：“如若有人谋破坏新组织，你们如何？如若有人不工作而掠夺，你们如何？”

以上四段，都希望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与我以满足的答复。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讨论要论点针锋相对，不要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不管我的话是如何说法，只是把你的说过了的话再重说一遍。

（原载《先驱》3期，1922年2月15日出版）

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答张东荪与徐六几——

（一九二二年七月一日）

新　　凯

一，作这篇文字的旨趣

自从我作了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今日的中国究竟怎样的改造两篇文字之后，很惹起了些风波。先驱与社会主义研究就大打起其笔墨官司来了。我对于东荪，六几，……所答复的，有许多不能赞同的地方；并且他们所答复的是真正盲而且聋的答复。对于我所说的，他们一点也没有看，只是再把他们所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重复说了一遍。对于此种各自东西的辩论，本没有再理他们的必要，不过，有许多的地方他们错认了我的意思，并且我也认为我还有没十分发挥尽致，所以再作这一篇，以求教于中国的热心于社会主义者。

二，革命的必需

社会主义是用以代替私有制度，资本制度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这种新的组织是旧社会中的治者阶级所反对的，我们要实现这个新组织，不能不先打倒旧组织，赶起旧的治者阶级。我们相信旧的社会制度，资本制度，是打建在武力上边的。我们不是消极的无抵抗主义者。我们相信惟有武力才能打破武力；惟有强权才能打破强权。我们知道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都是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器。所以我们主张先要把呻吟的旧社会制度的多数劳动者，赶快武装起来，以他们的强权，武力，来解除旧社会中治者阶级的武装，也就是先要推倒了现在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再另行建筑劳动者的政府，军队，报纸，学校，……，以监视旧的治者阶级：这种急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叫作“革命”。我们相信惟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看革命为第一义。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实现，就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同志看革命为社会主义的灵魂。

基尔特社会的态度则不然，他们是不主张革命的。六几说：“阶级争斗和祈祷一样，一个个心上都满怀着兄弟样的亲爱，且受此种兄弟样的亲爱的鼓舞。革命是孤注的，……”他们主张求资本家的同情，不用剧烈的革命。这种手段和跪在强盗旁边，求他开点恩少抢一些是一个样子的可笑！这种“叫化式”的阶级斗争，先不必说他可耻不可耻，简直是办不到。现在的治者阶级，是处于优越的地位的，你劝他退让，我想他一

定是不肯的。

他们——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主张部分的，零碎的解决的！东荪说："他却于政治以外，无论在社会何方面，但求划一部分便操练起来。"此种部分的，零碎的解决，表面上看来，仿佛是又容易，又可以避免革命的损失，其实，不先把政治问题先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最温和的，最初步的工作，当然是传播了，但是，不革命——就是不先作一个全的，彻底的改革——就办不到。"劳动组合"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所认为第一步必须办的事情，也就是东荪先生所首先要操练的，但是，不革命则劳动组合恐怕也是不容易办的吧！湖南此次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之死我以为正可以证明政治势力的伟大，全部改革的必需与革命的万不可缓。我们固然不能怕死而不去做此等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旧社会中提出某一部来操练如何的困难，我们再看看俄国革命以前和以后劳动组合员数目的增加如何的可惊，我们便可以知道革命的重要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就不作，但是我们要以同一的力量想作较多的事体，自不能不于劳动组合，……的种种运动达到了某一个程度——可以推倒旧制度的程度——……后，先革命起来，以增加我们进行的加速度；这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某部操练的理由。

又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了，我们不反对革命，我们是反对以革命为第一义，所以六几说："我们第一着必使劳动组合自由组织起来"。我们所说的革命日期自然不是今天，也是需要预备的，所以我们不反对劳动组合！不惟不反对，并且是极其注重的。不过，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之下，所以运动劳动组合的态度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不同，我们现在的运动劳动组合的一部分的目的是预备作为革命的一种武器，一部分是建设将来新社会一点基础。所以我们的劳动组合是作战机关，是预备作总攻击的机关。我们的劳动组合是时时不忘革命时时想推倒现社会制度，以使他自身作一个长足的进步的。我们的劳动组合是不安于现在的制度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主张"管理蚕食。"他们的劳动组合是安于现社会的。他们的劳动组合是想在现社会上一点一点的求管理权的。我们的劳动组合是革命的劳动组合。我们所反对的是此种蚕食的劳动组合。

中国与西洋的情形是绝对不相同的。在西洋尤其是英国……所需要的是如何可以使劳动者得着了管理权，如何可以使劳动者代替资本家。中国则不同了。中国的病是布遍全身的。中国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只不是劳动者得管理权的问题，一切政治，经济，内部，外部，上层，下层，生产分配，……无一不需改革。管理蚕食的劳动组合，为获得管理权的罢工是不够用的。先不必说管理蚕食的劳动组合，为获得管理权的罢工的可以得到管理权与否，就说是可以得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需要不是只在劳动者的管理，所以我们的劳动运动要使他成一个作战的武器，用他的武力以打破现社会制度，以谋全部分的改革；这是我们提倡革命的劳动组合的态度。

劳动组合固然是新社会的基础，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情形，则不能视劳动组合为唯一的要务。中国的工场劳动者非常之少。中国将来的革命事业的任务不象西洋完全设在劳动者的肩上的一样。中国的革命事业一定要分担在劳动者，有良心的学者，学生，兵士，

失业者，穷困阶级，……的身上，我们的任务是革命后如何把一切的军士，失业者，穷困者，……变成工场劳动者使他们执掌政权，所以我们与其说是作劳动组合运动还不如说是作革命运动。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中国大喊而特喊其“劳动组合第一义”真是不问中国社会状况如何的盲而且聋的主义者了。

总之：我们现在的工作，无论是组合劳动也罢，运动军队也罢，宣传学生也罢，罢工也罢，暴动也罢，暗杀也罢；……，他的目的都是为打破现社会制度的也就是为革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主张革命，我要问他们：仍然使现在的军阀，政客，……来执掌一切，所有改造的事情，能不能以实现？

三，政治与经济

我们因为政治势力的伟大，所以主张实现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有人就说我们是忍了下层的改造，是偏重于政治的改造。其实不然。我们是说政治的权力是现在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非先夺了治者阶级的武器以除去障碍，再运用这个武器以增加前进的速度不可。譬之上山，我们先要拔了荆棘，开出一条大道来；再把这个荆棘束立在道旁，作为我们的一个屏壁，然后我们才能以开步走，达到我们的目的。下层运动，我们不惟不反对，并且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不过我们所主张的不是单纯的，忘了上层的下层运动。忘了上层的下层运动是足践荆棘的上山者，结果恐怕是要被荆棘刺的体无完肤。成功与否固不可定，即或成功也未免太走迂路了。我所举的白话文一例是证明社会上发动的事情，经了政府的帮助，前进的越发加快。东荪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一切事情都应当由政府发动，未免太冤枉死我了。况且东荪也说：“凡社会自己在那里活动而政府从旁援助没有不是事半功倍的”。东荪既然知道有政府的援助可以事半功倍，而又不主张先得了政权，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难道东荪先生以为现在督军，巡阅使的政府可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援助者吗？

政治是立在经济的基础上的，我们承认。我并不是说，一经革命之后，共产党有了政权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以为革命不过是据了向共产主义之路上的荆棘罢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还要再向前走才行。

现在的俄国，我们也不承认他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们只承认他已经向共产主义猛进就是了。我们以为解决了政治问题之后，再振工业办学校，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了，经济的条件满足了，才能以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我们何常偏重政治？我们何常忘了经济？

我们再听的一句，就是“从经济的势力到政治势力”。这话在中国也是要研究的。中国与英国不同。英国的国家中已经充满了大工场。社会上的阶级已经分成单简的资本家与劳动者二种，所以在英国如若使劳动者先有了经济的势力，或者还可以再得着政治的势力。在中国则不然。中国大部分是手工业及农业。他们不和工场劳动者一样，他们怎样能得到经济上的势力呢？中国的病不只是劳动者的没有管理权——经济的势力，所以由经济的势力到政治的势力，在中国无从说起。中国的病是土匪式的军阀的压制病与外国资本家经济的侵掠，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侵掠病，也就“贫乏”与“混乱”二病。混乱病是需要政治为势力的改造，贫乏病，一方面需要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需要与全世

界劳动联合起来的政治活动的。外国的资本家的政治势力固然是立在经济的劳力上边，但此二者是平行的。由历史上看来，他们是先有政治的势力，后有经济的势力，后来是又以经济的势力促进政治的势力，同时有了政治的势力，他们的经济势力也是越发的巩固。我们要打破他们的势力，无论是经济的势力是政治的势力，都另取一个方式，不能报照英国，使劳动先有了管理权——经济的势力——然后谈到政治势力的，因为中国受资本家的榨取是单纯的榨取，没有工作，失业的榨取。中国要打破外国资本家，一定先要解决了国内的政治问题。共产党有了政治的斧子，没收了现在军阀，财阀，……的资本，从新旅兴机器的生产，同时与西洋的劳动联合起来，共同推倒外国的资本家才可以的。由此看来，治中国的特殊病么应当用特殊的药品，不能照画需的，以在英国方法，由经济的势力到政治的势力的方法，实行于中国；并且是无从实行的。我们的标语是："有了政治势力再创造经济的势力。经济的势力有了，共产主义就达了"。

关于政治与经济二者，现在的昏乱者多了。他们误解唯物史观。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非经资本主义不可。就是现在的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骨子里所提倡的实在是资本主义。他们天天的说经济势力，说劳动组合说局部操练，而又不主张革命，则自然是非先行资本主义不可了。所以东荪说"资本主义是不可免的，我们只好听之"。六几说："社会革命之真意义，是要生产的新方式的树立，使社会上全体建设物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要是如此，至于他所用以表现的方式是暴烈、抑是和霭，都不关重要"。其实，因资本主义违共产主义，固然经济的条件是满足了，但是政治的条件不容易满足，所以在西洋社会革命是较中国有特殊的困难处（中国也有中国的难处）。而此经济的条件，也不是非资本主义不能满足的。国家的独占就是不行资本主义而要满足经济条件的一种方法。再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定律是大的压倒小的，中国要想以资本主义未满足经济的条件也是不可能的。

四、政党与军队

我说了一个"运动军队"的方法，惹起东荪先生不组党不加入军队的宣言。我恐怕有很多的人对于这一点也有怀疑，所以再多说几句。

东荪说："我们不组党。不想以党的势力执政柄以支配全国。"东荪所犯的罪是由不完全的特殊者而推到普通的一种论理上的错误。因为现在法律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法律的都不好，由现在的政府的不好而推到一切政府的不好，由现在的政党的不好人，而推到一切政党的不好，是同样的不对。现在娼妓式的政党的不好是不错，东荪主张不组织政党是对极的，我很希望东荪先生如此。不过，东荪若说一切的政党都不要组织，因为"中国人先天上有'恶化'政党的根性"我就不以为然了。我以为，政党也不过是一种改造政治方针相同的人的一种团体的结合就是了。他的不好是分子上的不好，不是制度上的不好。中国人有没有"恶化"政党的根性，我是外行，不能知道。如若中国人真是如此，那是中国有"恶化"团体行动的根性，那末，中国就不必有团体的活动了。东荪先生也不必组织今人会了。一个人回家好了。

东荪又说："我们不与任何军队发生关系，不问是感化或是利用……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说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军队绝对不能用于有益于社会的方面——除了消灭他

们”。中国最坏的人不是兵。兵固然是可恨了，但是他们的罪恶纯粹是由于环境与智识。就以现在的兵而论我以为比那寡廉鲜耻，利已，滑头，欺诈，……的政客们还强的多。兵也是现在经济制度下压迫出来的失业者。他们就是变相的“劳动军”他们就是“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脑筋简单，他们对于现社会所流行的滑头，自私病染的还少一点。我们要是真肯和他们相接近，感化他们，他们是很有希望的。在此地，我要申明的就是绝不要再蹈了辛亥的复辙。我们一方面感化军队以抵御反抗者，一方面强行军队的劳动化，以使他们为生产者。我以为补救中国的军队，只有这个方法。东荪先生说，除非消灭了他们，我不知道东荪如何消灭他们？惟有有枪的才能压服有枪者。要消灭了军队，仍然是需动立军队的。

五、手段与目的

社会是连续的。社会是不能粘土式的，可以抱他随我们的意思来控什么样子，就成为什么样子的。英雄不能造时势。英雄只能看明了时势而与以若干的权力就是了。所以我对于末来的社会状况如何，只是豫测而不敢肯定。我们只有用我们看明了现在社会的病症，用想出来可以实行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实行下去。我们看方法是很重要的。没有方法的社会主义就是玄想的社会主义，一点也没有用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以为要先立定了目的再想方法去达到。他们是不重方法的。六几说：“他们所着重的，在目的，在社会改造根本原理，在他们眼光中，方法却微乎其微。……诚以手段随敌而异”。所以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天天的横写他们所玄想的社会，而不去想方法。其实，社会是不容如此的。社会是连续的。我们只有第一步而没有第二，第三，……步。

我们听够了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一句话就是：“各地有各地不同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不同状况，不能预定”。各地有各地的情形，各时有各时的状况，所以英国人，古代人，的方法不能用之于中国，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想改造中国现在的社会，可以不想一个具体的方法吗？

现在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已经承认他们以前所说的管理蚕食……是英国的方法而不是中国的方法了，但是又创造出来一个“农民基尔特”的新方法。此种方法，我看也不是一种有用的方法。农民是保守的。我不知道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是不是想变更现在的制度，现在的生产方法。如若要想更变，则只恃农民是不中用的。如若不想变更，则又何用你们来谈改造呢？总之：社会不能完全随人意以变更的。我们要看好了中国现社会的病症，用可能的方法一步一步的作去，不能把英国人造好了的玄想强拉到中国以来使中国社会与之相合。

六、专政与自由

“自由”是两个好字，用他的时候可是要加以斟酌。我们爱自由。我们视自由为神圣。但是因为我们爱自由，因为我视自由为神圣的缘故，所以才不能把自由轻易的给予了治者阶级，资本家军阀，……，所以我们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防有产阶级的死灰复燃，我们不能不剥夺他们的政权，剥夺他们的出版，集会，……的种种反革命的自由，强迫他们工作，强迫服从劳动者的管理。所以布哈林说：

“共产党并不但不给“与国为仇”的有产阶级以各种自由（言论，出版，集会，……），

而且常常去禁止有产阶级的出版，解散国贼们的集会，不准他们造谣，诬捏，以引起恐慌。压制他们所有恢复权力的行动。无产阶级的专政，确就包含了以上种种权的行使。可以谈到报纸，我们先要问这报是有产阶级的呢，还是劳动者的呢？……”

“劳动革命，……不能容反对革命党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因为他们固守他们的政治信条，而等待时机以攻击劳农。”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列宁尤其说的明白：

“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底过渡期间内，独裁政治底必要，实有两种重大的理由，这是不难知道的。第一，对于那班剥削者底反抗，若没有峻严的压制，就不能征服并破坏资本主义。因为那班剥削者的资本家底财富和他们在组织上，智识上底优点，不能即时递夺，所以他们在这个长时间内，总想图谋推到这可恶的（在他们看来）贫民底权威。第二，一切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纵使没有对外战争，但没有对内战争，是不能想象的；无数千万的人由一方面到他方面的犹豫和去就，以及最大的不安，不定，和混乱底状态，总是难免的。旧秩序下腐败的分子，必居多数，而且和小资本阶级关系狠切（因为每个战争和恐慌底牺牲者，都是资本阶级，）在这个变化中间，他们当然要打内商量的。于是这些腐败的分子，除了犯罪，奸猾，贿赂，和投机等事以外，就没有别的表现。要免除这种事情，只有用时间和铁腕。”

但是革命后到了一些时期，有产阶级的固有势力完全没有了，并且他都安于工作了，那时社会上的人都是无产阶级，也就人人都专政了。还有什么专政之可言呢？所以布哈林又说：

“劳工手里统治国家的权力就是一把斧子，拿他可以抵抗资本家。在一个共产制度里边，没有有产阶级的存在，没有阶级的区别，没有国内国外的危险，到那时候，这斧子就当没有了”。

在中国一般人都习为滑头，欺诈，游情，……尤其非用此种“铁的管理”不可。我想，在革命初起之后，一般的军阀，财阀，政客，绅士，自利的智识阶级，……一定用他智识上，财力上，外援上的优越群起反抗新组织。一般自私的人，欺诈的人，土匪，……一定要乘机掠夺。游情者，旧日的治者，……一定不肯工作。在这个一时的纷乱之下，非用一种铁腕不可。

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是反对此种专政的。他们迷信普遍的自由。他们不知道，要有普遍的自由，非先剥夺阻碍自由的一部分人的自由不可。这一点不必和他们多说。我想，如若他们真想改造社会，遇着这种情形，他们也自能觉出专政的必要来的。

无产阶级专政是压服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是强制有产阶级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消灭阶级的一种手段：这一层，由上边很可以看出来的。六几说：“社会所以出马，并不是要使无产阶级管其他阶级而是把阶级这个东西根本废掉呢。”我要问一问六几所谓其他阶级者到底是什么阶级？无产阶级？有产阶级？如是，有产阶级，不管理他们，不镇服他们，他们能以老老实实的不行反革命吗？

基尔特社会主义又攻击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的消费者的专政，所以六几说：“社会自身不能支配人，支配人的自然是他所容许专权的人，这个专权的

人就是消费者，……“专政的人们既是社会所允许的人则他们的专政自然是没有不当的了。至于说是消费者的专政，则我有点意思：我以为在社会革命之后的共产主义初期社会中，不一定非手拿铁锤的，才能叫作劳动者。一切作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人都可以叫作劳动者。如此看来，在劳动者的国家中掌政权的人，他们既然是选自劳动者，他们又是为劳动者来作事的，我想也不能以消费者看他们。要是说：“纵使管理国家事务的人们他的本身是无产者，……但他一变管理了国家的事务，马上就失他本来身分……一变而为消费者了。”我不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家中的执掌政权的人是不是上午要入工场，下午要入国务院呢？如是如此，我恐怕在社会革命后的初期，社会主义者又要没收财产又要监视反革命者，又要……一切政治的活动多的很咧，恐怕不是两重人格的人所能作得到的吧！我们再退一步说，我们就承认劳动者的国家中的执政者的是消费者，我以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再告诉你们我们不惟主张消费者专政，并且我们还主张少数人专政呢！我想，朋友们听了这话之后，一定要大惊失色。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慢慢的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一定不是全无产阶级专政。以中国而论，一般无产阶级如此的愚，尤其不能是全无产阶级的专政。如若要全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张勋，康有为，……执政权最为适宜。现在社会上的人民程度是曲线的。群众是盲目的。如若使全体人民都专政，恐怕惟有复古，退化之一途。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也不过是“无产阶级中的知识阶级，”“知识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专政罢了。如若基尔特社会主义不主张复辟，恐怕此种现象是当然的，也是必然。再进一步说，我以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不惟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是要服一二个人的意志才好。惟有这样，一致的人们的执政才是有力的专政，才是可以前进的专政。有人说了：“这一二个人要是怀私心怎么样？”这一层是不可能的，其详见 CT 先生在共产党月刊上所作的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之中不多说了。

这种专政自表面上看来，和以前的“君主专制”是差不多的。其实不然，。（1）君主专制的专政是为专制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为自由而专政，根本上是不同的。所以在劳动者的国家中，少数者的专政是不得已的，并且时时的希望劳动者能有政治上的活动。专政的程度是日渐其减的。（2）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所谓一二个人者，他们有无产党，无产阶级监督。（3）无产专政的劳动者的国家中，是有劳农会一种武器的。这种劳农会是和劳动者相密接的。劳动者有了这个武器是不怕那一二人的专政的。

七，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

我们已经知道，要解放人类全体，惟有先解放无产阶级，惟有使全人类都工作，都变成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示，就在乎他的武器——劳农会。这个劳农会是一切权力的中心。他的权力是所有的劳动组合，工厂委员会，海陆军人的组合，……造成的。有产阶级是不能加入劳农会中的，除非他们也工作，也变成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国家的政治组织的特色就在乎此。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则不然。他们的政治组织，国家，是代表消费者的。消费者不一定都是劳动者，于是有产阶级也就有了政权了。有产阶级一有政权，则无产阶级一定是失败。因为有产阶级的手中，有各种机关，报纸，杂志；有多量的金钱，可以行使贿赂；还有无数的走狗替他

们助威来恫吓胆小的奴隶；他们在知识上，经验上，……都是占优越位置的；所以权力容易到他们的手中。在表面上看来，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都有政权的，其实，政权一定还是落在有产阶级手中。所以我们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把压制生产劳动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但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说：“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天下没有阶级的互分，似乎找不到资本家……。”我要问他们：阶级的互分是一天二天能以去掉的吗？在社会革命后的国家中，有产阶级的势力仍是潜伏的，仍是想机会而谋复辟的。他们的地位较之无产阶级仍是优越的。如若仍与以同等的机会，我想他们一定是能以战胜无产阶级的。

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中，我们所不敢赞成的，就是政治与经济的二重组织。我们固然看政权是有力量的，但是我们看经济尤其重要，因为政治是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是用以扶助经济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的国家也不过是作没收财产，监视反革命，强迫游惰者工作，……之用就是了。阶级的区分没有了，用不着什么没收，监视，强迫，……了，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政府所作的事情，虽不能完全没有了，但总可以用他种社会的活动来代替他，无需乎国家与政府。六几说：“……当阶级区别废除以后，……因为经济的组织不适宜于成就社会上的某种事物，而政治组织都适宜于社会上某种的缘故，又因为社会上各种机关未必能和人们所表现的意志和等的缘故……国家还是必要。”我要问一问六几：所谓社会上的某种事物是什么事物？此种事物可不可以由社会上某种组织以代替之？譬如军队？可不可以民团代之？教育可不可以由社会上公办？为什么非要国家不可？我以为在很远的将来，经济组织一定日渐其大，政治组织一定日渐其缩，一切意志不相等的原因，多半是偏于经济，这一点小事更无需乎国家！

由以上看来，我们是以经济为主，以政治为经济之辅，所以我们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并重是不敢赞成的。

八，大规模生产与集中

工场越大，生产越进步。美国的托拉斯，一方面固然作了罪恶，一方面对于生产可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中国的需要不只是把管理权由资本家移之于劳动者就完了，并且还需要高度的生产，此高度的生产的造成非要大规模的生产不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主张大规模生产。他们竟以中国的手工业的小规模生产为不必改变。他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立于大规模的生产上的。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的最要之点在乎生产工具公有。此种公有非大规模的生产一定不能办到。手工业的家庭生产，我不知如何的使工具公有？

怎样才能达到大规模的生产呢？我们的答案是“管理集中。”管理集中有几种好处：

现代的生产已经达于最复杂的地位了。如若煤矿工人交的出煤少了，一切工场和铁道就要停止；如果没了石脑油，汽船就不能开行了；汽船不能开行，运棉花的就没有了，纺织场只好停工。所以非要管理集中，才能以有明了的统计与计划，钢铁场才能以使煤矿的煤，煤矿才可以使铁器场的铁器，彼此互相抵销，节省许多麻烦，并且惟有管理集中才能以确知全国生产实状；才能使生产，分配得其调剂，才能以一定的计划来工

作，给各劳动者以适当的地位；才能不至有一点材料上，人力上，的不适与浪费；才能以防止各工场间的竞争……。

管理集中的必要是说了，但是集中到什么地方去呢？此种任务自不能不归之于劳动者已经获得的国家手中了。况且，在社会革命之后，一切没收资本，没收私藏燃料，原料，防止欺骗与投机，防止工具的毁坏，强迫罢工者，怠业者的尽力工作，……的事业，都是要使政治侵入经济范围的。所以国家的管理生产是当然的也是必然的。有人怕国家的权力太大了。我以为不要紧。共产主义的国家是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国家是与劳动者息息相通的。劳动者是参与于种种建设事宜的。我们再看一看俄国的现在经济组织更可以明白了：管理计划全俄经济的最高机关自然是“国民最高经济议会”了。此议会由六十九人组成。三十人选自产业组合；十九人选自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人选自地方经济会议；七人选自人民委员会；二人选自消费组合。除一小部外，绝对多数皆直接间接选自劳动者。所以与其说是国家无宁说是劳动者管理。

九，结论

统观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误点：（一）只谈了将来，忘了现在，就是远视眼。（二）不敢有大破坏急剧改造，就是庸懦性。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其实反是延长资本主义底生命，这一点，我是深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惜的。

社会主义者不是说的，是要作的，所以关于理论上，我对于他们也不十分穷追，不过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既视劳动组合为第一义，我很希望他们在这第一义上实地的去用一番工夫。

（原载《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1日出版）

〔附〕 一 个 申 说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张 东 荪

我作了一个小小的短评引起了无边的风浪，在我却是非常的荣幸，在社会也成了一个大悬案。当时和我驳论的人很多；有些是我所畏敬的师友，我无不答复，——如周佛海君就写信数次讨论此问题；——有些我明知其为手指五弦目送飞鸿，所以我不屑和他们辩论，（即有人骂我狂妄我也愿受）。后来刘南陔君要求我做一个比较的正式说明。我遂作了“现在与将来”一篇。不料此问题却更进一步，引得任公先生和老友志先都加入讨论。他们的文章寄到上海的时候，我读了真是说不出来地快活。因为快活之余不由得不再申说几句。

任公先生给我的书所论和我所见完全相同。不过我的前作和任公的此信都是偏于一方面，即是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的方面。至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方面，虽于其中得了几个暗示，然而尚都未详细说明。现在我要申说的就是要补足这一方面。——专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应该如何。

我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不象公彦君主张资本主义与社会政策，因为资本主义，正和社会主义相同，也不是一国要实行，就能单独实行的；设使世界全球的资本主义皆倒了，中国虽是工业幼稚，然而也不能单独维持资本主义。至于社会政策，我以为也和社会主义一样，同是一种正待试验的东西，决不能说在实验上已经证明社会政策比社会主义好些，社会政策若单独一个一个地实行起来，因为社会是连带的，未必有十分效力，例如增加工资必生出物价腾贵，而工人都兼为消费者，结果仍受影响；若同时把一切社会政策实行岂不是即等于社会主义了么。我又不象一湖君只在消极方面设法减轻必然的伪赤化之黑暗，因为我始终固守我的阶段说。我的阶段说是什么？简言之，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特此所谓社会主义其内容或经多少变化亦未可知，要总不是现在有缺点的社会主义（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不过，在我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上最圆满罢了。）我承认各种社会主义皆有缺点；但我相信，以人智之进步，终久会依着现在社会主义之根本的趋势，发见一个比较上最圆满的社会主义。大凡最晚出的比较上必是最圆满的。——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最晚出的，所以他在比较上是最圆满的。不过基尔特社会主义是英国的产物，虽其根本原理可以普遍应用，然而不能不有多少变化。所以我在时事新报上曾发表一个意见，就是劝罗素先生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正未可知。总之，不但基尔特社会主义如此，其他一切社会主义都是正在研究修正中。我敢说学问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个东西，信仰上的社会主义等于各种宗教本不需有真理为其根据，只要有一种热烈的感情就够了。至于学说上的社会主义则尚在创造修改之中，迄今未见大成。不过常人往往把两个混合为一个，成了一个学说与信仰相混合的社会主义。我常看见佛教的信徒用种种诡辩以回护佛教，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其实仍是从信仰的动机而出，不过外面穿了一件理性的外套罢了。现在一班爱护社会主义的无一不是如此。所以我又敢说非有极冷静的头脑不能把这混合的东西剖分开来。——或减少其混合的程度。我以为我们非把学理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分开，则我们不能在学理更把社会主义推进一步，换言之，即不能创造出来一种更圆满的社会主义。若说起创造新社会主义真是谈何容易，以我们学术幼稚的民族而说此大话岂不是太不自量了么？然而我以为不然，我们不妨和世界先进民族共同研究，或则亲阅先进民族的实验，或则取鉴先进民族的失败。须知世界各国也都正在那里研究，并未尝有一定不变的主张，换言之，即是各国也都正在学理方面下工夫，并不是已认为学理早完成而只须实行。所以我们的研究虽不必有多大把握然而以世界各国共同研究继续用功的结果未必我们于其间竟绝无所得。因此我的意思对于社会主义不取消极态度而取积极态度。我有一句要言：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

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更换言之，我们要创造新社会主义便不能不把他推得很远。为什么我们要注重于未来呢？这便是，我的阶段论所在了。我以为中国之前途有两条路，但是顺着一个方向，现在正在前进而尚未到分岔的时候。所谓两条路就是“共管”与“赤化”。共管不消说自然是各国共同管理中国了。（各国共管之议论见诸外人文字者不一而足，高君践四李君寿彭曾为我们择译其二三种，已登于时事新报。）我所谓绅商阶级之勃兴乃是共管之一方面。——或可说有密切关系。我固然明白若没有共管一层，绅商阶级是不会勃兴的，至于赤化则无论总是假的。能否把赤化弄假成真，能否使绅商阶级成立，这个关键与其说在中国自身不如说在国际变化，苟英美的资本主义尚有四十年之寿命；同时俄国因通商而反失其向外发展的力量，① 则赤化必不成而共管必实现。这一阶段，虽有许多可说，然为费篇幅起见，暂不详述。不过这一阶段以后必有真社会主义出现。我给颂华君一函，曾说中国的问题虽即是世界的问题。然不能即以中国为题而解决世界问题之钥。必定世界有变化，中国方能同时变化。我们既看定中国现在绝少劳动阶级而只多游民，则第一可断言赤化不能弄假成真；第二可断言共管之翻身即为社会主义之世界。中国彼时之变化必与世界全体之变化同时发生。在世界全体之变化未熟以前，中国不能有多大的变化。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积极地研究社会主义。（将来世界必行社会主义可见所引罗素的话。）

现在我须说几句研究社会主义之方法，我以为我们研究当分两种：一种是自己研究；一种是使全国人有机会共同研究。第一种可以不必详说，因为大家都已晓得了。第二种就是充分尽量把学理的书籍翻译出来，使人家都得着共同研究的机会。但是民国元年的时候只输入了“社会主义”四个大字，多一个字也没有。这两年来，却有了Propaganda（此字译为宣传太轻而译为煽惑又似乎太重），而不象日本那样真面目的介绍，与学理上的商榷。因为这种事业必须学者来干，不单是热心的青年所能济事。所以我敢说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社会主义的Propaganda 一湖君虽然说尽量把社会主义不是抢产杀人的道理宣传出来，然而我相信这种宣传决不能减轻伪赤化的危险，因为这是一种消极作用，天下决没有不与积极作用相连的消极作用而能生效力的。我们要消极作用生效力则我们必须在消极作用背后建立一个积极作用方可。换言之，我们决不能单纯免去伪赤化的危险，我们要免此危险则建设一个真赤化——（or wbat not）我并不反对一湖君的主张，不过以为我们的任务不当止于此罢了。公武君说真的决不能引起伪的，固然不差，但是种种Propaganda却不能算真的。我并无丝毫权力能禁止他人做这种“煽动”事业，但我总以为中国现在绝对没有煽动的必要。

现在我总结几句如下：

一　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总当认为最后的目标，宜努力随着各民族的共同研究去创造。

二　我们对于不需要的Propaganda当避免。

（原载《改造》3卷6期，1921年2月15日出版）

---

①原文此处有一注释：“日本二月‘改造’杂志有罗素一文（原文已译登‘时事新报’）其中一段与我所见绝同。其言曰：……。”（这里是一段英文，因为篇幅限制，所以把它略去。——编者。）

〔附〕现 在 与 将 来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张　东　荪①

罗素先生说：“吾到俄国，即相信自己亦为一共产党人；然与一班深信共产主义之人来往后，我之疑念转加一千倍，不惟不信共产主义，即凡人类所最崇仰与冒苦而求之一切信条，吾亦不敢相信。”他又说：“……则吾深幸西方人之有怀疑态度。”我自听了罗素先生这些议论以后，我本来潜伏在心中的怀疑态度便发了出来。我在“时事新报”上撰了一个时评，表示我的怀疑点，——但是对于实行上怀疑不涉于原理——大旨和罗素先生在京的演说，说我暂不以社会主义赠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即实行社会主义必没好结果，相同。于是许多朋友就写信来问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一一答复却很麻烦，不如做一篇文章罢。

我这篇就是提出几个问题而求其解答。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现状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从现状的潜伏趋势里推测未来呈何状？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先从现状来讲，有普遍的要素几点：（一）大多数人民无知识，和原始人类的状态所差未必甚大，我名这个为“无知病”；（二）大多数人民困于生计，因本来物产不丰，加以连年天灾人祸，以致愈贫，我名这个为“贫乏病”；（三）自民国以来，连年内乱，以致兵匪愈增多，我名这个为“兵匪病”；（四）自前清以来，关税、外交完全失败，外国的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而为一，以压倒中国，我名这个为“外力病”。

就第一和第二而说，所以中国没有市民（亦称公民），则被治者中便从来没有对于政治上、经济上之有力的阶级，所有的□原始生活的农民与人性变态的兵匪，此外工人、商人都是很少的。总之，工人与商人都不成为有力的阶级。就第三而说，自然是军阀当道。就第四而说，中国全在外国经济力压服之下，国内产业不易发展，亦是一因。总之，由前清帝制经革命的过渡，无形中把政权蜕移于军阀之手。惟连年内乱，自从政客发明勾结军队之妙术以来，军阀遂自形分裂。于是由分裂而互攻，愈互攻而愈分裂，末日便到了。

说到这里已转到第二问题。我以为军阀虽到末日，然其消灭之路有二种：一、一部分蜕化为财阀，而他部分为新兴阶级所灭；二、为等于军阀者所灭。因为倒军阀只有武力与经济力，而空口是不行的。第一种是平和的或渐进的，第二种是革命的或急变的。取了这一种便不取那一种。先说前一种，军阀之蜕化为财阀，百里已经详说了，不必赘述。至于新兴阶级，百里亦提过：“抑更有间接影响者，则民主政治之气焰是已。西洋所谓民者何？市民是也。市民者何？商而有钱者也。”我近来觉中国各地的商会渐渐地增加势力，而交通口岸的商会尤有能力。试看现在的自治运动，便是中产阶级渐起的明

证。须知中产阶级的渐起并不是凭空的，必根据于实力；而实力之最大者止有二种，即武力与经济力。我们须知中产阶级能起立一分，便是他们背后的经济力强了一分。因为中国大多数人都贫到求生不得，所以经济的企业便迎合而来。须知现在的贫乏虽则因军阀的掠夺而生分配不均，亦是一个原因，然而根本必是由于一班生产的缺少，所谓一班的贫乏，而非单纯的分配不均。则可知将来必有一种新兴阶级，名他为财阀亦无不可，但不能说都是军阀变的，军阀虽则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蜕化为财阀。我们还要晓得财阀必定亦有和军阀开战的时候，必定亦有一部分军阀是灭在财阀手里，因为财阀可用经济力制垂毙的军阀之死命。更有一因，就是中国的实业，不论中国自己开发与否，外国总是要来大开发而特开发的；不过外国势力一来，中国自己的企业亦必乘势而蜂起。到那时，外国的势力便不啻给中国财阀以保障与后盾，则末路的军阀更无法相抗了。我预料新银团必成，铁路统一必成，这便是外国势力助中国实业家以打军阀的。至于这种实业，南通便是个好例。现在仿南通的，亦不知凡几。将来或有大结合的一天，便是新兴阶级的完成。这是从第一种而讲。那第二种便不同了，因为第一种虽有趋势而成熟必甚缓，现在不过方在开端罢了。在其迟迟而行的中途，则军阀自身不能无变化，这是一个原因；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待，这又是一个原因。因为有了这些原因，于是第二种却是可能的。但因为他是突变的，所以我们难以详细推测。不过有一点可以预知，就是劳农主义的宣传。工人听了不过是罢工，没有什么要紧；农人不识字，他是不听的；商人因利害相反，听了就反对；独是兵寄生阶级之贫困者，一听便可入几分。将来的变化如何虽不敢说，然在这种环境，对于无论何人都使他不能安生，则必定发生变化。变化的招牌最可利用者。却莫若这个主义，所以我疑心有伪劳农主义出现。

但是历史与学说有教训于我们，就是凡一种主义的政治，都是一种阶级的要求。如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建筑在市民阶级（亦名为第三阶级）上，就是因市民阶级全体的要求而产出来的，不是因少数市民所组织的政党之奋斗而成功的。市民阶级的政党，如所谓自由党、进步党、共和党、民主党等，虽则始终奋斗，然而假设市民全体无实力，不蹶起，终不会有今天。各国的社会党不能算不奋斗，虽终因为劳动阶级全体比较上知识薄弱，能力不厚，所以尚未到最后的那一天。最近日人山川均说，非知识阶级自觉了，加入于劳动阶级，用脑者与用手者互相提携，则无产阶级不能完成。不但知识阶级加入于劳动阶级要费许多时日，并且即如俄国农民，虽是劳动阶级之一类，而尚不能一致进行。可见这些事都非经过相当时间的工夫不可。论到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经验的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所以民国元年的社会党立刻消灭，正是为此。而现在只能谈到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亦是如此。上海一隅虽发生了许多工会，然都是无聊的政客所为，与工人无关。只有机器工会比较真正，所以他宣言不涉主义。而况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将自觉而未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个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最可怪的是中国前几年在未创成市民阶级的时候，就有了什么国民党、进步党，近来又在未创成劳动阶级的时候，又要组织起社会党来了。总

之，党的奋斗与阶级的自觉是相待相成的，须知并不是党的组织必定后于阶级的自觉，不过党的组织若不在阶级自觉的萌芽之初，则除了静待以外，无法发展。可见凡是一种主义的运动，都是以党的奋斗为先锋，以阶级自觉为后盾。并且无论他的思想是否改进的，而其初发于运动必是顺应的，所以议会主义失败而直接行动主义方为有力。党是代表那阶级的，若他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所以纵有人热心运动，然只能缩短程途，而断不能一跃而跻。这是说真正劳动者的国家之组织尚早。

然而有人说，我们不必等劳动者完全自觉，因为完全自觉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妨暂时用狄克推多制贯彻劳农主义，一方再和俄国联合以谋互助。我以前亦作过这个梦。——不过我不赞成狄克推多而只赞成与俄国通力合作，以共产主义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罢了。现在我以为不必从理论上去反对，只须从事实上把中国一看便知其不可能了。请略述如下：

第一，国中无人有狄克推多之质格。凡是在未来二、三年内可以起来活动的人，必定其人在过去二、三年已为社会所共知。以现在社会上知名的人而论，绝没有这种人；不是能力不够便是学识不够。

第二，狄克推多不是自己一个人要做的即可做的，必须有相当的拥戴者方能压制反对者。中国劳动阶级为数极少，决不能为拥戴者，即拥戴亦无实力。除此以外，只有失掉人性的兵与恶习已成的党人及穷无所归的一部分寄生阶级。第一种虽较有力而不受管辖；第二种则绝无法支配；第三种虽无力而害事有余。总之，这些人若不满其兽欲则立刻变为反对者，以此辈为拥戴者乃是绝对靠不住。

第三，中国民族的根本性虽有狄克推多的倾向然仍有一个相反的倾向潜伏于其背后。如所谓舆论民喦即是，很足以为此制的暗礁，所以中国历史上绝无强大的狄克推多。近来加以民治的潮流与自由的呼声，此暗礁乃渐大，必有充足的能力阻狄克推多制之成立。

第四，近来的新趋势是分化，——由国治降为省治，由省治降为县治，——此趋势与狄克推多相反。因分化的缘故，则第一是各地自决，不受统一的命令；第二是社会自动，不受政权的命令。这种精神上的趋势，看来必继长增高，不可轻视。

第五，中国向来没有组织，无法提纲挈领。

以上是说狄克推多的劳农制不能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尚有三个理由可决其必是昙花一现。

第一，中国民族的根性最怕大更张。若有极大的更张，必不能实行（但长期间无形的推移当然不算）。

第二，中国人习惯向来是求速效，若不见速效，立即反对。

第三，是外国的压迫。须知中国的资本主义简直就是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因为除了外国资本的实业以外，中国自己办的很少。外国资本势力侵入中国恐数倍于俄国。中国要打破资本主义而行共产主义，就是要打破他们在中国的势力，他们必定不肯放过。无论各国国内社会党如何活动，然而以现在各国政府的势力，推翻我们这种空浮的劳农

革命总是绰乎在余。日本即可以大活动，而日本国内社会党人的势力又最薄弱，决不能牵制。至于说俄国能帮助我们，这乃完全的梦想，事实上绝不会有的。

此外如食粮的分配与生产机关的转移，或都能发生极大的混乱与惨杀，而阻其进行，致于失败。

据以上所说，则真的劳农制度决组织不成，而伪的劳农革命或可一度发生。我所谓伪有二个意思：一个是破坏的意思，一个是假借名义的意思。就是只能是破坏的，不能是建设的；只能是假借的，不能是真正的。破坏乃是自然的趋势，可从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而讲，即人心的不安与生活的难得，这个两方面是互相因果的。因为人心太不安，则人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就是觉得现在的环境太不堪忍耐了，赶紧离开了罢，无论变什么样子总比现在好些。这种心理乃是变动的促进力。还有一种，就是正在厌恶现在环境，而又未想出若何改变的时候，忽听见一种传说，这种传说又说得天花乱坠，于是便动了念。既经动念以后，加以环境的更加恶劣，迫得他不知不觉地愈加相信起来了。所以这种盲目的、厌恶现状的心理是非常可怕的。本来政治的腐败与内乱的频数，都是使生活日见艰难的。民不聊生则挺而走险，所以破坏是自然的趋势。至于假借名义，虽不敢断言，不过已经有些党人，一面干护法分脏的勾当，一面自命为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一旦把固有的招牌用完了，必定利用这个招牌，因为这是世界的新潮，可以骇倒一切。况且这个主义究竟没有试验过，一班人心容易倾向。我们推论到此，便知真的劳农主义决不会发生，而伪的劳农革命恐怕难免。至于伪劳农革命发生，不消说不能福民而必定是害民，则不必我多说，只须一想便可推知了。并且这个假东西亦断无继续存在下去的道理。天下凡成立的东西，必是实体不是假现。假现必是一刻即消灭的。所以我敢说，假定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这个内乱完了以后，差不多仍恢复未乱以前的状态。或者亦许弄假成真，但非经过长期的混乱不可，这事总是万中之一。

说到这里，请转到第一种。创造新兴阶级的趋势，在上面已略说过，现在再详说一下。

中国现在既有贫乏病，则开发实业为唯一之要求。虽开发实业不限于资本的企业，然在中国现状之下，真正的政治集权共产主义，如俄国劳农制度，决不能发生，则除了资本的企业以外，只有协社的企业。须知协社的企业既然可在资本主义下实行，便是与资本主义可以并行。协社主义既然不能驱逐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以外国势力的后盾与固有的基础，加以经济学上的原则，必定发展。所以在开发实业以裕民生的大要求下，我们虽可极力提倡协社，然而无法阻止资本主义的进行，这一点是须大注意的。况实业发展不论何种方法，总是增加富力及于一班人民。虽其分配的程度不同，然不能说只有资本家得利而贫民丝毫无所增。即使有人说劳银铁则，然现在有求为劳工而不得的人甚多，此说尚不适用。就现在人民太贫得求生不得而讲，既使资本主义的企业发达，终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将来。我们没有法子破坏他的缘故，亦就在他能利于目前。我们若在此时即破坏他，便是我们认题未清，其详见下。此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军阀的推倒丝毫无能力，而能倒军阀的只有他们，因为他们乘着国内的要求与外国的势

力，其来不可侮，而有制军阀死命之能力。军阀倒后，实业稍发展，则可得平和的秩序。我们在平和的秩序下可以从容宣传文化。且实业兴后，虽阶级分明而无求生不得之人，方有讲教育的余地。因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有关，物质生活有最小的限度，在此以上虽有种种程度，而精神生活都能发展，如穿布衣的与穿绸衣的都能读书，过此以下则不能发达，如没有衣服穿的人不能读书。我们须得认清这种趋势虽决不是福利人民，但不能说他没有增加富力的事。我们认定这种趋势只是把阶级分明起来，造成一个绅商阶级（即市民阶级，不过市民二字译得不切，亦就是第三阶级），同时造成一个劳动阶级，而把求为劳工而不得的人吸收进去，却是他的好处。现在有许多人在上海与工人联络，我说这是利用资本家。若资本家不开了这几个工厂，又往那里去联络工人呢？为什么不到内地去，就是因为内地没有工厂。可见工厂在先而劳动运动应在后。现在中国内地所实行的，未尝不是同业公会制度。中国这种畸形而兼幼稚的同业公会，自然不能及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所主张万分之一。这种畸形的同业公会很难改良与发展，只要稍有此中知识便能知道，决不能和机器生产的工厂竞争。在生产太缺乏的中国现状下，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实是竞争中之第一优胜者，无论什么他都胜过去的。所以外国经济力能势如破竹而来，便是明证。加以各国共产主义的革命，在近数年内未必发生，则世界的资本主义未消灭一天，则中国一天势必须着此轨而进。以上是说在开发实业的大要求下，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工厂必日增一日，乃是不可抗的。这事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愿意亦是如此，不愿意亦是如此，乃是一个自然的趋势。

以上所说纯是推测，现在由推测周围情势的结果断定我们的使命，便入了第三问题。我们当自问是不是确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如其是，则须有自知之明。第一，须知我们自己没有打消军阀的能力。譬如我们天天骂安福部，然而打倒安福的是吴佩孚，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实力。第二，须知我们对于应付贫乏病，以增加生产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虽有方法却不及人家的来得有速效。我们有了这两点自知之明以后，我们便知道现在还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对于现在尚是不合宜。什么人合宜于现在呢？我看就是绅商阶级。其理由已如上述，不必再说了。我记得君励与稚晖在德国的时候有一段趣话。那时正在推翻袁洪宪。君励说，我代表立宪党，你代表国民党，我要求国民党先让立宪党执政五年。稚晖不答应，原来他们都没有得国内的消息，那里晓得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呢！不过各国政党认自己不宜活动的时候而让他党活动，却是常有的。我以为这个让德，我们是应当有的。这个阶段的原理，本是马克思教我们的。马克思对于阶段的次第是“预见”（自然的逆睹），不是“约束”（人为的安排）。即列宁亦然（见日本“改造杂志”上室伏高信氏“列宁之乌托邦”一篇）。我相信这些阶段未必有一定的期间，可以由少数人的继续努力而生变化。所以罗素不赞成唯物史观的太硬性，想亦是为此。但是不能十分越价，这一层要大注意的。可见马克思之经济进化论是有相当的价值。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所以我说绅商阶级适于现在。譬如说，有一个资本家在他的工厂里设补习学校，并不减少时间而移其二三点钟于授课，如其缺课照工作时间扣资，因为现在的工人已染恶习，不能不强制。同时又定出分红制度，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但不交出而贮蓄于银行，怕他拿去嫖赌用了。此外立疾病保

险金与老年抚养金，更在厂里立娱乐的地方。若更进一步，缺课而可不扣资，并兼收工人的子女，分红而可领出。这种温情主义本来不算什么，然对于现在的中国却不能不算最适宜。现在的人都欢喜谈工人苦状，而对于工人苦状的真原因多不看见。要晓得工人受苦固然是事实，但直接受自资本家的很少很少，而通通是受自工头的。我尝说中国愈是下级社会愈是寡头制度。我近来以观察所得，知道企业的所以不能发达原因，全在中间阶级的做恶。近于资本家的是经理、账房、掌柜等企业者，近于劳动者是工头。企业者专门侵吞股本，以致有钱者视投资为畏途，故中国绝少不自经营的资本家。工头专门剥虐工人，以致工人道德堕落，终年怠业，则工人的受苦全在劳动界自身的制度，可以无疑。现在人只听工人一方面的话，自然是只看工人的苦痛。若问一问彼资本家，必亦有一大篇话未尝不是句句实情。在现行制度下，亦不能十二分苛责资本家，因为从井救人总不是人的常性。我相信工人的种种不好不是天生的，而是历年来制度所迫的。但既然迫坏了，则非慢慢地改好不可。若能把制度逐渐改良，而使工人逐渐培养，则将来自然可有结果，设一旦开放，亦必没有多少好处，所以我认为温情主义比工厂立宪主义在现在中国为有益于工人。我这话不是完全理想。我听见人说，聂云台就在那里办学校、办保险；久大盐公司就废除工头制度；我的朋友蔡衡武先生所办的织袜厂就不限钟点，好的工人每月可得四十元。其余的还有，只不必多说罢了。又如陈嘉庚以家产兴办大学；张季直的预定遗嘱说所有私产都移为地方公有；无锡容氏亦办了十几所小学，试问你能说他们不是最合宜于现在么？现在亦有人组织工会，乃是想改良工人的生活，当然不能与社会主义并为一谈，我想主张社会主义而干此事的人，亦决无如此自己解嘲的。这讲的是工人。至于农人，要晓得中国向例地主与佃户多是平分收入，甚至于佃户得六成，地主得四，所以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废了地主，农人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须知农业的不进实由于天灾兵祸。兵祸能破坏农业不下于工业，这是很容易知道的。至于天灾，亦大半由于农民太无知识，不知设法防御。无论何国，凡是农民总是最富于保守性，因为农人都是守旧的，所以一切改革若以农民为基础总是不行的。故我以为农业在现在没有速成的改良法，而只有以教育的力量救济农民的无知病，有了知识以后，自然能开发地利。这是说革命性的更张与农业无甚关系，于是我们可以明白工人、农人在今天所需要的，只是取得教育与改良生活。取得教育非长期不可，改良生活虽有种种的方法，然而因为必与取得教育相关，总以平和的、渐进的为佳。所以我认新兴阶级的推移是合宜的。但是有人说，将来教育全由资本家来包办却危险万分，我以为不然，天下最笨的就是讲教育主义。试看日本五十年来讲的忠君爱国主义，何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反比在无严格的教育主义之中国来得蓬蓬勃勃地发达呢？要晓得人是活的，死物可由人制造，要他方就方，要他圆就圆，人是活的，不能由他人来制造。你教给他的主义，因为环境关系可以变化，而你教给他的识字、读书、学算等等的基础工具，他却取得了。他取得这个工具便可以自由使用，如工人在资本家设的学校里识了字，我们便可把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给他看，若是他不识字，我们便无办法。所以这一层是不足虑的。总之，绅商阶级的发生，我认为等于前二十年的练兵。前二十年的练兵是个潮流，不能抵抗，若没有练兵的这一回事，革命必不成功，前清不会

推倒。但革命以后造成军阀，亦是由此而来。可见无论什么都有时代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合宜，在那个时代便是弊窦。我虽然很承认百里所说的："财阀政治，资本主义之刻鹄而类鹜者也"，"黄金崇拜之怪象，殆将百出而不穷，而外状之淫汰骄侈将与内在之卑鄙龌龊成正比例而进行。"然而我却以为这是必然的阶段，不可越过。

于是我们可以解决第三问题了。就是问我们在这个期间究竟作什么是好？我以为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现在即宣传社会主义、劳农主义，并进一步组织团体；第二是在静待中择几个基础事来做。从第一而说，我们是制造伪劳农革命。在无人赞成中，忽听见有人赞成，自然是空谷足音了。一个人在空谷中不堪寂寞，固是人情，然而对于足声却不可不细细辨别，须辨出足音是人的足音还是兽的足音，若来的是兽，不但不能慰寂寞，并且反被它吞了。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兵啊，匪啊，党人啊，求生不得的寄生阶级啊，这些人能成事么？所以我说在现在决不会发生真的劳农革命，上面已说得很详，不必再述。若明知其假，而希望弄假成真，虽是一种理想，但我的良心是反对这种理想的。于是可知，我们不但不当取第一条路而当取第二条路，并且还有一个附带的义务。请先说取第二条路的方法。必有人以为天下决无静待而不做事的道理，凡是一个主张不去努力实现他，如何能有成功呢？既然主张这个主义，便应得努力去做，不必多所顾忌。我对于这番话完全赞同，因为我亦如此想。但做事须有次第，有方法。我所说的静待，不是绝对的一事不做，乃是依着做事的次第与方法而做事，读者不可惑于静待二字的表面上意义。现在我把我们可以做的事列举出来。

第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这个普通的文化事业有很大的力量，第一是授人以基本知识；第二是打破旧思想、旧习惯；第三可以陶养人格。所以我们不论何种学说与主义，都当忠实地介绍过来。这便救济无知病之一法。

第二是广义的教育事业。这个教育或为学校制或非学校制，只要能授知能于无知能者即为一种教育。这亦救济无知病之一法。

第三是切实的研究。平心而论，我们虽倾向于社会主义，然已确定的不过是个倾向罢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内容，究乏深切的研究。这是何等大事，岂可漫无研究而就随便主张呢？与其看了几本书就深信不疑，不如看了几本书就动了怀疑之念。哲学的起源是怀疑，愈怀疑愈研究，研究的结果方有肯定，这是当然的理。若是并无研究，而就以耳食之谭来干宣传事业，实在要不得。至于看了几本书，一路看书一路宣传，亦未必妥当。最好是从容地彻底研究，不必急于确定。因为不愿意"轻信"，方有"真信"；因为要求"真信"，方不愿意"轻信"，所以现在中国的现状不能立刻实行何种主义，正是给我们以从容研究的时机。我们不患不能干宣传事业，而患所宣传的是半生不熟的，凡是半生不熟的，必定易于被人利用。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第四是协社的实行。我以为在这商业组织的社会下，商业愈发达，则消费协社愈需要，差不多消费协社是唯一的急需物了。至于因利协社，在乡村亦是非常需要。消费协社发达了，生产协社方能发达，因为两者有密切关系。总之，协社在今天已不是主张的问题。乃是实际需要的问题了。这是我们对于救济贫乏病的可能方法。

至于附带的义务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于伪劳农革命的发生，既不当赞助，亦无法

阻止，却不可不表明这事与我们无干系。同时我们谈主义便不能不慎重一下，往往随便说一句话，而他人听了便发生很大的风波，这种事是常有的。现在既然情形如此，好象晒干了的薪，一点火即大烧起来，则我们不能不对于火柴的抛下加以检点了。因为若能幸免总是好的。

我的话已完，总结如下：

一、我从现状中潜伏的原因上推测将来有两种趋势：（一）渐造绅商阶级的趋势；（二）暴发伪劳农革命的趋势。——一缓一急；一必然一可能。

二、绅商阶级果成，则劳资两阶级方能分明，其结果先好后坏。因为初起必是合时宜的，而后来必定是不行了。

三、绅商阶级初起的好处，在吸收求生不得的人为劳动阶级，于无形中增加些富力，亦稍微提高些知识。其最大的好处，就是瓜代军阀而免去内乱。

四、伪劳农主义万一发生，必是纯粹破坏的，绝难转到建设方面，不过在许多内乱上加一个内乱罢了。所以我们对于影响上应得谨慎，因为我们不主张弄假成真。

五、我们当有自知之明，我们无力打倒军阀而只能眼看军阀与绅商阶级的瓜代；我们无力阻止绅商阶级的发生，纵我们极力鼓吹劳农主义亦不过引起一个伪劳动革命。

六、所以我们只能干文化教育与协社等事业，而于主义的详细内容，则须研究后再确定。

七、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代绅商阶级而兴，或则军阀消灭后，求生不得的人已大部分吸收了以后，社会上免去伪劳农革命的内乱，社会主义的运动方可发生。

最后我再声明一句，就是这篇的见地是折衷历史的自然阶段说与理想的人为创造说，调和性善的人生观与性恶的人生观，以明我个人的立脚点，不专求他人的强同。

附识：以上所称的我们，乃是告趋向于社会主义者。至于我个人，此后拟专研究哲学。只希望将来由上面所谓我们者造成新社会后，做一个分子，尽相当的义务。

（原载《改造》3卷4号，1920年12月15日出版）

①张东荪（1886）浙江杭县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集团“研究系”的骨干分子。曾任“研究系”在上海出版的报纸“时事新报”的总编辑。1919年9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幌子下贩卖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益深入时，他从1920年11月起发表一系列的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动言论，因而遭到“新青年”、“共产党”、“觉悟”（“民国日报”付刊）等报刊的痛斥。后来和张君劢等组织“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继续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成为蒋介石国民党的帮凶。解放以后，仍未改变其反动立场。

〔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梁启超*

东荪我兄：奉书及大著“现在与将来”稿本，诵悉一切。承征鄙见，仆方縻精力于他种著述，对此问题，不能有刻入详尽之解答，谨拉杂略述所怀：

我近年来，对此问题，久在彷徨闷索之中，欲求一心安理得之途径，以自从事，而苦未得。所谓闷索者，非对于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尚有所疑问也。正以确信此主义必须进行，而在进行之途中，必经过一种事实——其事实之性质一面为本主义之敌，一面又为本主义之友。吾辈应付此种事实之态度，友视耶？敌视耶？两方面皆有极大之利害与之相缘。而权衡利害，避重就轻，则理论乃至纷纠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积思此事，脑为之炎，今勉强截断众流，稍定祈向，然终未敢自信也，谨以质之执事。

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

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

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而言，详下文。）

故在欧美倡此主义，其旗帜极简单明了，亦曰无产阶级与有产抗争而已。中国则有业、无业乃第一问题，而有产、无产转成第二问题。欧美忠实求业之人，略皆有得业之机会，但其操业所应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夺。社会主义运动，则谋所以抗正之，恢复之。其事为适合于多数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对之能亲切而有味也。我国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国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欧美有业无产之人所处之境遇，在我国一般人视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守，惟恐失坠，欲其冒险以从事于向上之运动，闻之将掩耳而走。抑此类人在全国中不过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辈若专为此类人谋而忘却其他，则社会所能救济者几何？是故“劳动者地位改善”之一语，在欧美言之，则一针见血也；在中国言之，则隔靴搔痒也。彼求进一工厂，每日做十二点钟不停手之工，尚且费几许情面乃能得之，今乃告之曰：“汝何不加入‘八点钟同盟’也”，彼方踯躅街市，无所栖托，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价”，此真“何不食肉糜”之类也。故今日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地位取得，然后改善乃有可言。

然则，中国人何故失却劳动地位耶？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乱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国资力之朘削压迫。质言之，则我国人之职业直接为外国劳动阶级之所蚕食，而我国人衣食之资间接为外国资产阶级之所掠夺也。以最显著之事实言之，三十年前，食于丝者几何人？食于茶者几何人？食于土布者几何人？食于土糖者几何人？

乃至食于制针、制钉者几何人？而今则皆何如者？欧洲工业革命之结果，昔之恃手工业、小商业自养之人，次第失职，踧而走集于都会工厂，变成仰佣钱为活之一阶级。然彼犹有工厂可投，有佣钱可得，不过佣钱觳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劳力之结果被人掠夺一部分而已。吾国国内，曾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而世界工业革命之祸殃，乃以我为最后之尾闾。畴昔食于土布者，今失业矣，能否在门治士达纺织厂佣得一辨尼？畴昔食于铁工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必珠卜铁厂佣得一仙？畴昔食于制糖者，今失业矣，能否在台湾糖厂佣得一钱？故外国资本家之对于其本国劳动者也，虽掠夺其劳力结果之一部分，然犹出其余沥以为河润瘵焉，而未至于死也；我国人则被其掠夺，并余沥而不可得，乃搤吾吭而绝吾粒。外国之劳动者欲恢复其被掠夺之部分，则直接向本国资本家算帐而已；其在我国，则本国人尚不配作掠夺者，而须间接向外国资本家算帐。倘终不能有向外国资本家算帐之能力，则虽本国资产阶级永远不发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外国资本家若悉数将其势力移植于我之通商口岸乃至内地，以从事掠夺，则我之对付彼辈，可以全仿彼国劳动阶级对付彼辈之成法，毫无问题。今也不然，彼辈势力之移植，虽著著进行，然为势甚缓。以今日及最近之将来的情形而论，彼辈依然安坐伦敦、纽约、巴黎、大阪以择吾肉而吸吾血。吾国之社会主义运动，无论若何猛烈，彼辈曾不感丝毫苦痛。彼辈所最愿望者，则吾国长在此种不死不活之纷扰中，生产力日益涸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费终不能免，我既无力自给，彼乃凭借旧势益恣侵略，而彼辈在本国因受劳动阶级反对所生之损失，乃于我焉取偿。信如是也，则我虽将国内资产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铢黍冈失其平，而我社会向上之效，终茫如捕风。譬犹污池垂涸之水，大鱼跳梁，一口多吸，诚属可憎；然苟终无术以济其涸，则虽无大鱼，而群鱼之必涸死，固旦晚间事也。中国现象，若循以前之趋势而无所更张，其结果，则所谓阶级者，非自国内纵分，而自国际上横分。压制阶级掠夺阶级之大本营，在伦敦、纽约、巴黎、大阪诸地，而凡居于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压制被掠夺之阶级也。对于外部压制掠夺者丝毫不能抵抗，而惟内部之被压制被掠夺者互争锱铢之短长，终复何益。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

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毫无意义。

此公例者，不必再加说明，吾信无论何人当皆承认。既承认矣，则连属而起者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极衰落、极幼稚之生产事业可以苏生萌达，一面又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

试将社会主义家所提出数种主要救济方法一检校之。其第一法，则将原有生产机关由直接在该机关内服劳役之人共同管理也。此法是否为最良之法，姑勿深论，然欲行此法，必先以国内有许多现成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去？若必勉强将国内现有区区百数十家之工业、矿业所收容工人多则千数少则数十者，施行共管制度，无论各该业现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借曰诚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过数万人，其于全国数万万人失业救

济之问题丝毫无所补益，而固有之生产力，或因此大蒙打击，决非计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产事业相当的发展之后，容或有采择之余地，今日提倡，决非其时。其第二法，则将生产事业归国家或地方经营也。此法虽原来未有之业，亦可以政治的权力创造之、助长之，在产业幼稚之国，本为合宜，然欲行此法，当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组织为前提。若欲以行诸今日之中国，则国有铁路，即前事之师，有心人何忍更倡此论，为蠹国之徒资利用者。若曰："到社会革命实行之后，政治必清明。"此结论是否正确，非届时不能证明。借曰正确矣，然当革命未成以前，是否应将生产问题全置不理？生产事业不发达，是否能有劳动阶级？无劳动阶级，是否能有真社会革命？然则谓俟社会革命政治清明后乃实行集产主义者，直陷于循环论理而已。其第三法，则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以从事于互助的生产也。此法最中正无弊，无论随时皆可以实行，吾辈当以全力提倡，无待言矣。顾所当问者，第一，吾辈以言论提倡，而事实之应现能否如吾所期？第二，仅恃此一途，是否可以充生产发达之量，以完此"救济失业国民"之责任？以吾所见，其在乡间与农业、手工业等有关系之协社，成立发展，颇不易易。盖乡民最富于保守性，一制度之信受奉行，必费极长之时日也。至于消费协社，必在工业发达之都会始能存在，质言之，则劳动阶级之产物也。劳动阶级未发生之国家，消费协社能否有发展之余地，吾殊不敢言。夫吾辈既认此为中正无弊之一法门，则宜勿问其集事之难易与收效之迟速多寡，尽吾力以提倡之，且实行之，固也，然断不能谓专恃此而遂可以达吾辈奖励生产之目的。盖吾辈在最近之将来，对于协社，无论若何提倡、若何实行，最多不过能增长生产力百分之一二，而我四万万同胞，受外国资本家之压迫而失业者，什九已相索于枯鱼之肆也。此三法者，前两法既非今日所可行，后一法虽可行，而收效甚缓，若是乎中国之生产事业，倘长此终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线之转机，则主其事者，什九仍属于"将本求利"者流。吾辈若祝祷彼辈之失败耶，则无异自咒诅本国之生产事业，以助外国资本家张目；若祝祷彼辈之成功耶，则是颂扬彼磨牙吮血之资本主义，与吾辈素心大相刺谬。以吾之愚蒙，对于此一问题利害冲突之两方面，积年交战于胸中而不能自决，有生之苦闷，莫过是矣。

因此复引起次问题：

第二，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努力防资本阶级之发生乎，抑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乎？若采后一法，则现在及最近之将来，对于资本家当采何种态度乎？

吾辈畴昔所想念，总以为欧美产业社会末流之敝至于此极，吾国既属产业之后进国，正可惩其前失，毋蹈其复辙。彼其病源所在，既经多人批却导窾，洞悉无余蕴，治病之药，亦粲然具陈于吾前，吾但审择而采用焉，即可以使我将来之产业界不致为畸形的发达，而现在欧美纠纷艰险之现象可以不复发生于吾国也。及至今日，而吾觉此种见解什九殆成梦想。吾辈先事预防之计划或者在农业方面犹有办法，然农民最富于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且在今日之世界，农业亦断不能离工商业而单独存在，则问题依然归宿到工商业。既归宿到工商业，则此种极可厌可憎之畸形的发展（即资劳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恐遂不可逃避。而此畸形的发

展，从一方面观察，虽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其可欢迎之点奈何？夫中国今日不能不奖励生产事业以图救死，而生产事业，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前既言之矣；然则今后中国若有资本阶级出现，就令其掠夺行为与欧美资本家相等，或且更甚，然最少总有一部分，得丐其余沥以免死。其可欢迎者一矣。不特此也，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此其可欢迎者二矣。然则资本阶级应专认为社会主义之敌耶，抑一方面应认为敌，一方面又应认为友耶？其界限遂纷纠而不易明。

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而闻者或不谓然，谓：“中国他物或缺乏，何至并劳动阶级而缺乏？除去少数穿长衣服坐车子的人，此外皆劳动阶级也。吾辈言社会主义者，但求与穿短衣服跑腿的人共事，则盈天下皆是，何至缺乏？”此其言虽近似，然细按之，则大戾于名实也。劳动阶级者，非游民阶级之谓。劳动阶级者，以多数有职业之人形成之（其中有一时偶失职业，或求职业而未得者，当然可以为附属品）。此项有职业之人，结合团体，拥护其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毋俾人掠夺，此在道德上为至当，在事势上为至顺。若夫无业游民，则与此异。彼本来并无所谓因操业所得之正当利益，则更何拥护之可言？故劳动阶级可以责人掠夺其剩余，可以向人索还其所掠夺，游民阶级则不能有此权利。游民而分有业者之利益，其事还同于掠夺。今穿短衣服跑腿的人虽盈天下，然其中实分为劳动者与游民之两大类，断不容并为一谭。其属于劳动者之一类，则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其属于游民之一类，则决不可以为社会运动之主体者也。

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

今论者徒见国中游民之多，而谓吾之社会运动已得有主体焉。此最误谬之观察，不可以不明辨也。

问者曰：“今国中游民诚多，然农民与散工亦正不少，何得遽云无劳动阶级？”应之曰：“今通行‘劳动阶级’一语，本含广、狭二义。广义的解释，自然凡农民及散工悉含在内；狭义的解释，则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而社会运动之主体，必恃此狭义的劳动阶级。中国则此浅义的劳动者未能成为阶级，故谓之无阶级也。而况乎以今日生产衰落之趋势，农民及散工，次弟失其业者日众，行见并广义的劳动者而亦变为游民矣。故吾辈渴望劳动阶级发生，其情乃益迫切也。”问者又曰：“今之游民，非好为游民也，以无从得职业故，不得已而为游民。子言社会运动，必将彼等排而外之，毋乃不可？”应之曰：“吾非终排而外之也，俟彼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则彼自能进而为社会运动之主体焉，非他人所得而排，亦不待他人之劝也。”然则如何而能使国中多数人弃其游民资格而取得劳动者资格耶？曰：舍生产事业发达外，其道无由。生产事业发达，凡吾国人消费所需，皆由吾国人自生产而自供给之，最少亦须在吾国内生产而供给之（此指外人投资在中国办生产事业而言）。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给于伦敦、纽约、巴黎、大阪，然后我多数人之职业，不至为伦敦、纽约、巴黎、大阪

之劳动者所夺，然后我之游民可以减少，而我之劳动阶级可以成立。劳动阶级成立，然后社会运动得有主体，而新社会可以出现。社会主义运动不可逾越之阶段，殆如此。虽然，于其间有不容忘记之一重要事实焉。曰："劳动阶级发生，资本阶级亦必同时发生，二者殆如狼狈之相依而不可离。吾侪既希望吾国有真正之劳动阶级，而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实为孪生兄弟，若是乎，资本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至。吾侪在今日，不可不先有彻底的觉悟，然后根据此觉悟，以讲救治之计划。质言之，则对于资本家当持何种态度，实今日言社会主义者最切要之问题。概而论之，态度有四：

（一）抗阻态度　极力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见其有将发生之机会，则务摧坏之。

（二）旁观态度　我辈自从劳动方面用功，将资本家之行动置之不论不议，待其稔恶自毙。

（三）矫正态度　奖诱警告资本家，唤起其觉悟，使常顾及劳动者之利益，以缓和劳资两级之距离。

（四）疏泄态度　设法使生产事业，不必专倚赖资本家之手，徐图蜕变为社会公共事业。

抗阻态度可采乎？吾以为不可。在今日采此态度，必妨害本国生产，徒使外国资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碍劳动阶级之发生，于吾辈之主义为大不利。其理由既如前述。不特此也。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殆已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阻。吾国之资本家，虽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资本家，在其本国，各皆已陷于穷蹙之地位，势必以中国为逋逃薮。中国秩序稍恢复之后，各国之资本，必如狂澜倒卷以注于吾土。吾侪欲以微力遏之，必备极艰劳而无寸效。且吾亦何苦如此？彼投资我土，虽云掠夺吾劳力结果之一部，最少尚有余沥以及我，以视昔之隆隆海舶，载糟粕而来，刮脂膏而去者，不犹愈乎？而况乎其结果必能为我产出劳动阶级以作将来自树立之基也。故吾以为资本阶级之发生，吾辈欲抗阻之，其事为不可能，且亦诚无抗阻之必要。

然则采旁观态度何如？吾以为亦不可。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局之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过渡之事物，而一任其自然之运，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

然则所当采者为何？则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是已。所谓矫正态度者，将来勃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许容。惟当设法使彼辈有深切著明之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掠夺太过，必生反动，殊非彼辈之福。对于劳力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智识之给与，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矫正之手段，则若政府的立法，若社会的监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

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垂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原属不得已之办法，却不能恃资本家为国中唯一之生产者，致生产与消费绝不相谋，酿成极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时有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相为骈进。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转机，则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便当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之下，渐

图举办；一面各种协社，须极力提倡，以传教的精神策进之，但使能得数处办有成效，将来自可联合扩充，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以移于协社之手，则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以成立矣。

然则对于资本家以外的人，当采何种态度耶？申言之，则对于现在极稀微之劳动社会，当采何种态度耶？对于现在大多数之游民又当采何种态度耶？再申言之，则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今日可行否耶？吾以为吾辈既属望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则现在向此方面下工夫，实万不容缓，不能以其人数尚少而漠视之。下工夫之法，第一，灌输以相当之智识；第二，助长其组织力。先向彼辈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劝其办一两件（如疾病、保险之类）。办有成效，彼辈自感觉相扶相助之有实益，感觉有团体的好处，则真正之工会，可以成立，一处成立，他处仿行，次第联合提携，以产出全国总工会，然后将来之劳动阶级得有中枢，而一切运动乃有所凭借也。若以言现在之群众运动乎？各工人所在之工厂，若有损害工人利益之行为，工人起而为示威反对，自非得已，至于在今日而劝之为主义的运动，或为他种政治问题的运动，则吾殊以为不宜。虽有乌获于此，若童时使扛百钧之鼎以绝其脰，则终无以成其勇也。凡力未充而滥用之，其所失则亦类是。今日之劳动阶级，方在髫龀，甚力至脆薄可怜也，殊不足以恐胁强有力者使之屈伏。若有彼此抗持之事起，厂主闭厂解雇，不患别募之无人应，彼何惧焉？而工人既无团中公积以供罢工时之宿粮，相持不一二日而其群涣矣。若是则运动一度，必失败一度，而其力亦削一度，其气亦馁一度，此自杀政策也。故吾以为我辈今日对于劳动阶级之态度，当以促成工会为第一义。必有组织完善之工会，然后可以言作战，而战之胜败，则视工会力量之强弱为断。须知吾国劳动阶级将来之敌手，非中国之资本家也。中国资本家区区鸡肋，抑何足以当尊拳？吾确信在稍远之将来，必有全世界资本家以中国为逋逃薮之一日。而中国劳动阶级最后之战胜，即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之时，庄子不云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我国劳动阶级既负此绝大责任，则所以培植之者安得不豫，而所以爱护之者安得不勤。又须知我国人组织能力本甚薄弱，工会组织又属难中之难，在今日而言工会，只能谓之在胎教时代，并呱呱堕地之声且未闻也；如何而使之产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殇夭，如何而使之能自动以负荷责任，此真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所当寤寐思服者也，吾以为吾辈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著。此著若就，以后无事不办。若以无组织之群众，作无气力之运动，是犹责胎儿以杀敌致果，其必无幸矣。

至于对游民阶级，吾以为惟当尽力设法，使为逐渐豹变为劳动阶级，然后与之共事。当其未豹变以前，则宜勿与为缘。若利用游民以行社会主义运动，其结果必至毁灭社会主义何也？

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能增加游民。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事理之无可逃避者也。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夫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夫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

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必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薄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运动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

综括以上大意，其所推论事理之要点如下：

一、非奖励生产事业，则全国人非久且瘵死，更无何种主义之可言；

二、奖励生产事业之结果，资本阶级必发生，其相缘之毒害亦随而发生；

三、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

四、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

五、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运动之前途，无益而有害。

根据以上事理以为吾辈今后进行方针如下：

一、对于资本家采矫正态度，在现行经济制度之下，徐图健实的发展；

二、极力提倡协社，使尽量分取生产事业，以移入公众之手；

三、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强立，以为对全世界资本阶级最后决胜之准备。

以上所论，不知能否对于尊论有所发明补正？仆对此问题之解决，今犹在苦闷求索中，殊不敢自谓有真知灼见。冀普天下同主义之人有以教之耳。

启超谨复

（原载《改造》3卷6号，1921年2月15日出版）

●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戊戌变法时期最有影响的政论家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1898——1901）、“新民丛报”（1902——1907）、“国风报”（1910——1911）等杂志，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抗。辛亥革命后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后来和共和、统一两党合并为进步党，1916年后又演变为“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领袖之一，先后做过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的部长。1919年赴欧洲考察，目击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没落，得到两个结论：一是科学破产，所谓物质文明没有出路了，因此，所谓东方的“精神文明”要“复兴”了；一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高涨，中国有预防的必要。回国后在“改造”杂志三卷六期（1921年2月15日出版）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支持张东荪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谬论，因而受到“新青年”的批判。1923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教授。

〔附〕对于中国共产派及其反对者的忠告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

张东荪

前天本报上香港专电说孙中山要河南那一块地收归国有以便实验共产主义。这个消息是否可靠，我们远在千里无从证明。不过因此使我觉得对于共产主义只有一种态度是可取的；对于现在热心共产主义的朋友只能进这一个忠告。

这种态度是甚么和这个忠告是甚么？我现在用极简单明了的言语述之如下：

一、我们虽则不赞成共产主义，并且对于一切共产主义的运动也都不赞成。不过只有一点是我们所赞成的，就是划定一个区域去试验一试验。

二、这个划定区域必须与现在社会十分隔离，所以依我想起来，以广东海中的琼崖岛为最宜。

三、但取这个地方来试验时对于土地须给价，对于私有资本须赔偿。

至于我为甚么赞成这个办法，提出这个忠告，却有理由多端，述之如下：

第一、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计却有三点：

甲、须知共产主义在世界并没有完全试验过，即偶有实验而成绩却不甚好。例如苏维埃俄罗斯，与其说他实行成功不如说他试验失败。所以有学问上良心的人对于全世界尚没有成功榜样的东西，苟不去充分的试验，决不敢冒然主张与率然轻信，今为中国共产主义者计，与其闭目乱吹不如切实试验。

乙、须知经济组织是国际的，单独一国要想经济革命必受压迫而失败，所以社会革命这件事是一时做不成功的，既不能完全推翻现社会，而同时却在现社会内到处捣乱，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不如将对于现社会的零星捣乱暂时收起而择一个地方为建设的试验。

丙、须知中国即使实行共产主义，以中国民族性的不同，必不能全抄别人家的旧文章，但是要加以改变，则非试验一回是不会发现的，所以试验非常要紧。

第二、为反对共产主义者计也有二点：

甲、一班反对者认共产主义为最可怕的东西，虽共产主义者说得天花乱坠也不相信，然而究竟是否可怕不妨看一看实物，实物若果是可怕则反对起来必更能动人，所以果真亲眼看见共产主义的真相是很坏的，我敢说要结反对共产的同盟是很容易的，现在空口反对是不中用的。

乙、反对者大部分是对于共产主义所想象的社会并不十二分反对，而对于由现社会变到这个社会的过渡方法（即社会革命）以为必有大损失，所以非常反对，我以为这种反对是合理的，因为社会是不能全体大变化的，只有蚕食式的变化，果真共产主义者不到处乱闹，而只想从一处以成绩来吸引人而变为蚕食式的渐变，则反对者是可以容纳

他的。

照以上的话好象我不怀好意，希望共产主义试验失败，以便世人以失败的榜样为有力的攻击，其实我却无此存心，所以我对于试验还有二个忠告：

第一、非吸收外资不可。

第二、非限制人口不可。

若这两个条件不备，试验必定失败。

以上是我立在旁观地位向共产主义与其反对者双方而进的一个忠告，我很希望他们双方都能采纳，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是不赞成共产主义，我是信服基尔特主义之一人，不过我以为基尔特主义在中国要实现为期更远，第一步须为原理的宣传，这种宣传是很平和的，第二步是择业试验，也和共产主义的必须择地试验差不多，这些非本题所论，故不多述，至于上述的忠告，自信于双方都有大利，很希望双方都来思考一下。

（原载上海《时事新报》，1922年4月10日出版）

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蔡和森

独秀先生：闻公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欢迎资本主义，两方驳论未得而见，殊以为憾。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专恃革命说则必流为感情的革命主义，专恃进化说则必流为经济的或地域的投机派主义。马克思主义所以立于不败之地者，全在综合此两点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上没有第二阶级，无产阶级以下没有第五阶级。因为交通发达的结果，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业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国、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因为西方工业国、文明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常常可以掠夺一些殖民地或势力地带以和缓他本国"剩余生产"、"剩余劳动"的两种恐慌，而分余润于其无产阶级（贿买工头及工联领袖，略加一般劳动者的工资，设贫民学校以及可以买工人欢心的慈善事业，使工人阶级感怀恩惠），因此西方大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常常受其资本家的贿买、笼络而不自觉，社会党、劳动党中改良主义、投机主义盛行，而与资本主义狼狈相倚，此所以社会革命不发生于资本集中、工业极盛、殖民地极富之英、美、法，而发于殖民地极少，工业落后之农业国俄罗斯也。因为俄罗斯在经济地位上久已隶属于西方工业国，而他那

上古式的农业生产法又抵挡法（小机械农业）、美（大机械农业）机器的农业生产法不住，所以农产品一入国际市场，不能与法、美相竞，因此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由此就可推论中国社会革命了。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到了那步田地？自身的生产方法还是三代以上的，自己不能供自己的需要，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这种经济侵略孰能御之！大机器生产品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生产者一批一批的失其职业。现在中国失业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换言之，就是为经济压迫不能生活者的人数到了那些田地？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三万万五千万人惟有两条路走：（一）流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以至饿死、乱死、战死、争夺扰攘而死……（二）三万万五千万人公然自行提出其生死问题于中国社会，及为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五大强之前，请其依我命（们）的意见解决。如其不能，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运命。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理想家、大学问家都也把持不下地。这是最大多数的生死临头问题，纵然革命的经济条件、生产条件不具足，革命后会被围困、封锁而饿死，但使群众一旦觉悟，与其为盗贼、土匪、流氓、痞子而饿死、乱死、争夺扰攘而死，死得不值，毋宁为革命而战死、而饿死，死得荣誉。社会革命的标准，在客观的事实，而不在主观的理想，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程度之深浅，而不在智识程度道德程度之深浅。自来一般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好以他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指挥群众如此如彼的做去便是，这真愚妄极了。我敢大声唤破这种迷梦：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熏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任凭你们怎样把你们的理想、学说绣得好看，雕得好玩，总与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不能接近，不过在资本家的花园里开得好看，在资本家的翰林园内供他的御用罢了。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有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饥民要面包，兵士要停战，工人要工厂，农民要土地，乱七八糟爆发起来，任凭那些中产阶级学者及自命为理想的改造家，凭依军阀、财阀而结为神圣同盟，也是过〔遏〕制不住的。今日中国大多数的生活问题迫到了这个田地，贤人派的力量纵大，恐怕有点过〔遏〕制社会革命的自然力不住！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不由命运而完全由于私有财产制)，便诿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三）任其自然实现，时间延长，牺牲数量太大，无产阶级每日直接间接死于穷困者不知若干，直接间接死于战争者不知若干。若过三、五、十年，再经一次世界大战，纵少又要死伤四五千万。具此三个理由，所以我们无产阶级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上去死；明日由曹琨、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上去死！天灾、人祸、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

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革命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不过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在计划上讲起来，殊有于未革命以前，做一个大大的经济变化运动之必要。这个运动怎样做呢？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无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迫令政府即向五国银团大借实业外债；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独秀先生！现在英、法、美、意的劳动运动，刚才接近第三步，还没达到目的，我们若有识力、有决心，必可于最短时期突过欧美的劳动运动。我以为社会运动为社会革命之起点，社会革命为社会运动之成熟，即综合 evolution et revolution 之意，如此才可立于不败之地，而不致流为卤莽灭裂、毫无计画（划）的感情革命主义和审时度势、坐以待毙的投机主义。我深以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盖承此纷争破产之后，四五年中，资本主义必勃然而兴，与其待军阀、财阀勾结五大强来巩固资本主义于中国，不如由无产阶级先发制人，取其利而避其害。盖生产之三要素，中国具二而缺一（有劳力、原料而无资本），全国生命遂握于五大资本帝国之手。若我们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之计，则必受制于人，则必坐待资本主义之来而无可如何，则必待五大强国社会革命之后我们才能革命，那就真闷死人，真不值，真不经济了！先生！劳动解放绝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说中国没有大中产阶级，阶级战争用不着的，固然是忘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而说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对于本国几个可怜的资本家的战争，也同是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也同是忘记了外国资本家早已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故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你看现在中国的中产之家有几多能自给其生活，教养其子女，而不感穷困者？故以我来看，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独秀先生！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不过无产阶级专政与中产阶级专政有大不同的两点：（一）中产阶级专政是永久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无产阶级不专政，则不能使中产阶级夷而与无产阶级为伍，同为一个权利义务平等的阶级，即不能取消阶级；不能取消阶级，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二）中产阶级专政假名为“德莫克拉西”，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叫做“狄克推多”，因此便惹起一般残〔浅〕人的误会和反对。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以上拉桑〔杂〕写了一长篇，请先生指正，并请交换意见。和森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

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从前惟《星期评论》差善），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甚想以我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意欲择定〔言〕论机关之同趣者发表之。

（在法国蒙达尼）

（原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出版）

共产党的根本主义*

（一九二一年五月七日）

《共产党》短言

欧洲有许多报上常说：共产党是什么一个怪物，有何魔力，使他们的党势在欧美各国都有一日千里之势？我以为这个疑问很容易解答。资本主义不能够解决现社会致命的困难，维系现社会最大多数的人心，这是不可掩蔽的事实了。继他而起的，无政府主义，除无政府党外，都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方法实现的空想；议会派的和平改革在英、德、法都试验过不行了，在政治腐败的国家更不必试验了。因此大家既不取无政府的空想，又不取议会派敷衍现状的方法，不趋向主张破坏而且有建设方法的共产党还有何路可走？

共产党和议会派不同底要点：是主张阶级战争，不赞成在资本阶级的政府底下讨恩惠；和无政府主义不同底要点：是主张在现在及近的将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有相当强制力的法律，不赞成一概不加限制的自由。

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主张劳工专政，不合乎德莫克拉西。我要问他：是不是要让资本家、帝制派都有政权才合乎德莫克拉西？有人责备俄国共产党用武力对待反对派，不合乎公理。我要问他：是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的英、法军队打破莫斯科，驱逐共产党，或是让柯尔恰克、丹尼金统治俄国才合乎公理？

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是怎样呢？就是主张一切生产及交换工具都归公有，不许私人把财产用做生产或交换工具来增加他的私有财产；却不是“平均财富”这类浅陋的主张，也不是“彼此通财”那样普通的习惯，我们不可认错了。

（原载《共产党》4号，1921年5月7日出版）

* 原题为：“短言”。——编辑者。

共产党在中国的使命*

（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

《共产党》短言

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

我们中国经济底组织及状况，在世界各文明国中，不用说是很幼稚的了；但是这幼稚的经济底组织及状况，一方面固然是悲观，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乐观。乐观在那一点呢？正因为他们的组织及状况很幼稚，改造起来不象欧美那样伤筋动骨。现代的经济变动是世界的不是国别的了，大家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经济的使命。

君主政治的滋味，世界各民族中，总算我们中国人尝得最足了。代议政治在中国虽说试验底岁月尚浅，而就一般的教育缺乏及中上阶级之腐败无能力看起来，代议政治在中国比在欧美更为无缘。所谓国会、省议会、县议会，无一不演出种种怪状丑态，简直到了末路了；所谓“议字号”的先生们，在人民头脑里比粪坑还臭千百倍。什么武力统一，最好也不过象民国元二年光景；什么联省自治，不过是武人割据改换了一个名称。试问南北各派政党，那一派免了鼠窃狗偷，那一派有改造中国底诚意及能力？全国民在这彷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

（原载《共产党》5号，1921年6月7日出版）

* 原题为：“短言”——编辑者。

陈独秀与区声白讨论无政府主义的信*

（一）区声白致陈独秀书

独秀先生：

先生前天在法政学校讲演，对于无政府主义批评，弟有很多怀疑的地方，兹特列举出来望先生指教。

一"……先就经济而言：现在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多数，也不许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据我所知，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若照先生说，"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就是以少数压服多数，无政府党人是绝对不敢赞成的。但是先生所批评的不知是那一种无政府主义？如果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共产的无政府主义、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极端反对的，我很希望先生声明一句。

二"……那知一面赞成绝对自由，一面又赞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

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证：中国有一种旧习惯，每逢一地方遇了火警，各地方的居民都很踊跃同往救援，无论在冬天雪夜，一闻告警，即争先恐后跑到患灾的地方，救灾的时候，无论怎么危险亦没有畏避的，患灾者对于他们亦没有什么酬报，社会亦没有替他铸铜象、大总统又没有给他一个嘉禾章，又没下过一度命令——各地方居民如不联合救火的就杀无赦，法律又没有规定不救火的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如果是邻近的，尤可说是恐怕连累，但是很多在城中由极东跑到极西的，因一处地方的灾难，各地

---

* 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区声白是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多次以通信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攻击并竭力鼓吹"绝对自由"等无政府主义思想。从选录的陈独秀致区声白的信以及无懈的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一段情况。——编者注。

方的居民竟能以一最短促的时间自由联合起来，可见联合与自由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又如五四运动，一天之内而联合数万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运动，更联合全国之学生、各地方之工商各界举行罢课、罢市、罢工以对抗北京政府，这都是自由联合的。法律没有规定，如不联合就要处无期徒刑，又没有军队来强制他，如不遵从就格杀勿论。不特是这样，能够以法律绳人。军队压人的北京政府，竟要屈服。于此更可证明法律之无用，军队之无能，而自由确可以联合，有联合就不能自由一言之不足信。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我很愿意先生把无政府主义各派别分清一下再下批评。总之无政府党人所持的态度是科学的，进化的，即如巴枯宁之主张由未善而至于较善，克鲁泡特金之主张由较未幸乐而至于较为幸乐，亦即是由最不自由而至于较为自由。若是先生所说的"绝对的自由"，不知是那一个无政府党人之所主张，还望指教。

三"……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张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废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错的。因为我们固然不满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绝对的废除，如果绝对的废除，便发生种种困难。但凡有社会组织，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许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须是如此。发癫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不会有人主张放任发癫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癫是极端的现象，由发癫以至最轻的精神病者或强汉，都应该受法律之制裁。又如两性恋爱，以两男恋一女，或二女恋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剧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象中国人赌钱、吸鸦片烟这等恶习，是不是应该有法律禁止呢？"

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如果无论善人恶人都不能去干涉他，那么，无政府党人之暗杀官僚，推翻资本家是什么意思呢？先生所批评的想必又是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们主张反对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敢赞同的。至于先生恐怕法律废止之后，如有发癫的人就怎么办，这是很容易的事，把他送到癫狂院医治便得了，因为发癫是由于生理上的关系，没有甚么罪过。若果疾病都要受法律制裁，虽民主主义的国家亦没有这种的法律。至于强汉之杀人放火，我们准可以善言劝导他，并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使他悔悟。假使先生问这时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怎能够处置他呢？人类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没有政府，没有法律，便连饭不会吃的。我举一个例：比方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有少数不良分子想破坏大学，后来经共同的意见把他拘禁起来，这是不是法律？总之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一种公意，凡事皆由公众会议解决。公意是因事实之不同而可随时变更的，不象法律是铜板铁铸的，由几个人订定，不管他人如何，一定要他人遵守的。且订法律的时候也没有得遵守法律之人的同意，这是不对的。由此可以证明无政府之不难实现，若果依照自由、自立、自主的原则向前进行，沿途都是康庄大道，除了盲目的人外，断不致撞得头破额裂的。

（二）陈独秀答区声白的信

声白先生：

在《群报》上看见你的来信，对于我的意见加以纠正，我很感谢。先生所见也有些和我不同的地方，兹条复如下：

（一）照先生的意见，"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不是自由吗？"我现在要设一个例，请问先生依无政府主义应如何办法：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先生说："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种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若因为两派有重大的意见，并且由于两派的同意，退出一派，这种不幸的事，就是资本主义之下的生产或他种团体也是有的，并不须到了无政府时代才有这种妙法。但是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产业界的好现象，偶一为之，已经不妙，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无他办法，照这样常常纷乱起来，大规模的生产团体里，一日之内不知有多少事务，一日之内便不知有多少人退出，多少人加入，在事务和技术的经验上、熟练上、秩序上看起来，非闹到由停顿而破产不止，我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完全不适用于经济方面。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各人的有各人的意见，人人同意已不易得；一社会内各团有各团意见，人人同意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一团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我不知道一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所以就是对于资本制度深恶痛绝的无政府党或社会党，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仍然是资本制度支配他们的生活，没有方法可以退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二）我所说“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的道理，上面已经说过，因为联合无论大小，都要有一部分人牺牲自己的意见，才能够维持得比较的长久一点；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己〔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这种散沙的现象，至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先生举出两个自由组织的例，一个是救火，一个是五四运动，实在是妙想天开了！

先生要晓得，救火是一桩偶然突发的事，他的目的极其简单；五四运动是一时的群众运动，若是拿这两个方法用在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来证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真是破产了。人间社会是何等复杂，其间感情利害目的是何等纷歧，至于生产事业上时间的适应及分业的错综更是何等麻烦，拿一时突发的状况和群众运动的方法去处置，我以为是常识所不许。因为社会组织和生产事业都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决不是一时乌合的勾当。

再进一步讨论，即以救火说，七手八脚的各人自由行动是否比有组织的救火会更为有效？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跟着有许多必然要做的事，是否都是用毫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做出来的？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由此可见，先生所引的自由联合的例，纯然是用在偶然突发的事件和政治问题之群众运动，尚且不尽是自由联合，何况是重组织尚秩序关系复杂的经济方面，生产事业上自由和联合更是不相容的了。

先生说：“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这几句话我十分赞成，我希望先生认清了这个观念，切勿贪图超越这个观念以上的空想。但先生要注意，先生主张对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扩充至少数人甚至扩充至多数人，在先生仅仅是不承认他个人的自由，在他是个人受了多数人的压服了；先生若说因为他不顾社会的福利，他便说，自古受人压服的人都是被人说不顾社会福利呵！自古压服人的人都是说为了社会福利呵！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三）先生说：“无政府党所不干涉的人，是善人不是恶人。”这句话我也十分赞成。不但无政府的社会，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我们对于法律的观念，是由社会上有选举权的人多数意思，决定几条必要的法律，好维持社会上公共的安宁秩序。先生的法律观念是临时的一种公众意见，这就叫做“自然法”。按自然法多由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法却是万分危险。过于〔去〕铜板铁铸的法律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法律当然要修改，但不能拿这个做绝对废除法律的理由；至于先生所谓随时变更的公意，却实在不敢领教了。第一，我们实在没有这种预知的天才能够适合随时变更的公意而不违背；第二，随时变更的公意完全是群众心理造成的，这种公意有

时固然能为善，有时也能作恶；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象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的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先生还说是康庄大道，还说是除了盲目的人断不至撞得头破额裂，我们实在不敢附和。

（三）区声白答陈独秀书

一、来书云“有一条大街，住户一百，内有数户的住屋因公共利益的关系必须拆毁，而此数户的住民因为他们自己交通或职业或特别嗜好之关系，决计不愿迁移，这时候若不拆屋，那主张拆屋的多数人之自由在那里？这时若竟拆屋，那不愿迁移的少数人之自由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既不主张多数压服少数，更不主张少数压服多数，请问上列的这件事如何办法呢？”

我前次不是向先生说过吗，“至于不顾社会的福利，只要个人有绝对的自由，这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所主张，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不敢赞同的。”巴枯宁说：“人之穷居独处，不得谓自由。人之自由，乃众人以人视之、以人待之，故自由非独处乃联合。自由者乃人权也。人将来不维持以强力而维持协约”。我们借社会方能生存，个人为社会之分子。故欲求个人之自由，当先求社会之自由。来书既云“因公共利益的关系”便是社会的自由；又云“因为他们自己……之关系”便是个人的自由，我们自然赞成社会的自由，而反对妨碍公共利益之个人的自由。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主张拆屋的多数居民可因他们的需要而互助他；如因交通上之关系，附近热诚之居民，如不与交通上有重大之关系，可自行迁移而让与之。至于职业上之关系，则共产之世，人人共工作，相同的工作无论什么地方都有，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这一条街上才能够工作？迁移了后便不能工作吗？至于特别嗜好不知指什么，建筑好么？同一的建筑一定很多。空气足么？那一处没有相同的空气。如此仍不迁移，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所屏斥亦奚足惜！有人难我说：“你们主张自由，这岂不是侵犯他人的自由吗？”不知这种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的自由并不是自由，而且是自由的大敌。资本家何尝不自由，我们为什么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夺大多数工人之自由以为一己之自由；官吏何尝不自由，我们为什么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夺大多数人民之自由以为一己之自由。总之，无政府之世，众人协约而为群，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自由契约是共同订定、共同遵守的，与几个人订定强他人遵守之法律不同），共同工作，互相协助，出之于感情。其中之人，亦恐为众人所不谅，或众人之干涉，即设有不肖，断不敢犯众怒！若有不践行信约的，可为众人所屏斥。总之无政府党人既然能推翻政府和资本制度，那么，迁移的小事是很容易解决的，我们何必过虑呢？

二，来书云，“我现在假定反对的不取消极的退出手段，而取积极的固执主张，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无论何种事业在这状态之下，依无政府主义如何处置呢？”

我们如何能够合起来做事，合起来做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既然有了共同的目的，便可共同订定一种契约。如果违反了契约的，当然要退出。比方我们欲组织一个大工厂，我们就找一班人来，彼此相约说：“我们每天作工四小时，如果赞成的就请加入，以后如有不践行信约的应受众人所屏斥。”他们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且这种契约是共同订定的、愿意的、自由的，不是强迫的。那么，先生所忧虑纷扰的现象断不发生的，一团内各人之联络是这样，一社会各团之联络也是这样，更何纷扰之足云。

三，来书云，“我们要明白：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除非自杀或是单独一人逃到深山穷谷没人迹的地方，绝对没有方法可以自由逃出。……因此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无效果的。因此我们应该觉悟，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

先生以上所讲这一段说话我十分赞成，但是不免有点误会。我所讲的自由，是指推翻了现存的制度而说，不是处于现存之制度就能够实现自由。处于各种恶制度之下，一举一动都不能自由，所以欲得自由就要推翻现存制度。至于“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这种消极的手段，断不能有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我也不赞成的。所以共产的无政府主义者多置身于工团派的运动，且用革命的手段以扑灭现存的制度，实现无政府主义，断不是想个人逃出社会以实现无政府主义，先生请勿误会。

四，来书云，“先生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我以为无政府主义已经由先生打得粉碎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

我确是反对个人的及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但是我不反对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然先生竟说我把无政府主义打的粉碎，于论理上实在讲不去。比方袁世凯是人，我反对袁世凯，然不是反对人。先生竟因我反对袁世凯，便说我反对人，我是不能承认的。先生既不相信有人人同意及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我没有强力一定要先生相信，先生亦没有强力使我不信。但是如果做事不必人人同意，那么，陈独秀可以和王敬轩合起来办杂志，康有为可以和孙中山合起来组织政府，真是妙极！既然意见不同，还不许人自由退出，你想他人服从你，他人也想你服从他，相争不下，必至于杀戮，这种悲惨之现象，吾实不忍言，不堪言。至于先生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我也不能不怀疑，因为先生在女子师范演讲（演说辞见正月廿四日“群报”），先生说：“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

又说："正当的人生，就是我不压人，亦不受人所压。"这几句话真可为无政府党人的格言。我请问先生物质上的生活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生活有什么分别？为什么"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政治上、经济上的生活，便不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和"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又有没有冲突？

自由之与联合绝对的没有冲突，我前函已经证明了，但是先生还没有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今再为之说明。克鲁泡特金在"面包略取"第十一章自由契约说："吾人自由团结、做共同的事业，其结果很是庄严。比方欧洲十七万五千里铁路，纵横如网，四通八达，自马得利地到彼得堡，自加立师到君士坦丁，不停留也不换车，更便宜的是旅客如有携带的零碎东西，仅用一方纸片，写明去处，投于车站，再不费什么手续就可给你带到目的地了。建设铁路的方法，就是依自由契约，互相讨论，使各路线彼此联络。这不是政府的命令，也没有政府的监督，和与什么道路大臣、独裁官、大陆会议、调理委员会都不相干的，万事全由诸小社会的契约就成功了。"克鲁泡特金又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他的根据和原理"说："十九世纪还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状态，帮助这同样的无政府趋势，他就是自发的力量逐渐广大，大的组织一天一天发达，结果便全用自由的契约。欧洲蛛网一般的铁道，始初是由各处自己建筑，后来才联络一气，运载搭客和商品，直接经过许多路线，却未尝有一个欧洲铁路的中央部去管理他。这是那些以契约而做出来的最动人的实例。如果五十年前，有人敢预说那这么多的分立公司所筑的铁道，最后能措成一个完全的网形，如今日一样，他必定被别人目为呆子了"。这是自由联合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的铁证。既然有了一种自由契约，那么如果两方合意，便可联合。联合一年也可、两年也可，何得云"东挪西变"、"一堆散沙"？如果他违反了自己承认的契约，便失信于社会，不用你去惩罚他，他自己也站不住。就现在而论，凡经营商业的人，全靠契约来维持，很少有胆敢破约的。所以维持社会秩序最好的东西是"信权"不是"法权"。中国的孔老二也知道"民无信不立"，这是一个例呵！然且自由乃相对待的名称，巴枯宁说："人之穷居独处不得谓自由"，必要以一己之自由尊重他人之自由，方得谓之自由。所以人与人相交，你不侵犯我的自由，我也不侵犯你的自由，便是真自由。个人与个人结交，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个人的自由。团体与团体相联合，互相敬重其自由，便是社会的自由。所以孤立便不能自由。以上反复申论，自由与联合不特没有冲突，我可简直说："惟联合才能自由，惟自由方能联合。"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五，来书云，"五四运动发生之前，各校各班的学生是否有组织，组织时是否人人同意？……五四运动后的学生联合是否人人同意，是否有多数同意用法律的形式惩罚少数不同意的事？"

总上几句说话，先生都以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断难得人人同意，这也是我所承认的，但虽然不同意，有一部分能够愿意牺牲自己的意思以就他人，不用武力，也不用法律，这是自由的同意。我见五四运动的时候，各干事都是自由认定的，如果不干又没有人用法律惩治他的，这是我亲眼的事实。至于学生联合，确是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就不能联合，所以去年广东就有两个学生会。

六、来书云，“先生既不赞成这种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但不知在先生眼中，不顾社会福利的少数人与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有何分别？依先生所谓共产的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不顾社会福利的个人或少数人，一概予以自由，还是加以裁制呢？”

凡是只享权利而不尽义务，或是只顾一己之自由而侵犯他人之自由，都是叫做个人主义。凡是主张个人主义的是个人主义者，并不是指一个人而言，无论他是少数人或是多数人或是一个人，都不赞成。如资本家掠夺工人之幸福以为一己之幸福，如官吏掠夺人民的幸福以为一己之幸福，这都是个人主义。我们之反抗他，并不是干涉他人的自由，因为他们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自由的魔敌，我们之铲除他，就是为自由之保障。至到无政府共产之世，虽然不能说是绝对的没有，虽有亦是很少很少，我们准可善言劝导他，说明个人主义不能生存的道理。如果仍不觉悟，我们就可对他说：“朋友，我们和你作的事，然而你常不尽责任，且常侵犯他人的自由，我们和你共事的人因此不能不和你分开。去罢！去找寻那不管你偷闲及受得你气的人去罢。”先生一定问我，如果他不肯去就怎么办？因为人人都有廉耻的，断没有受人驱逐还不去的道理。

七，来书云，“自古以来，无论如何专制暴君时代也未曾订过一条法律要干涉善人，我们所以不赞成绝对的废除法律，也正为要干涉恶人。先生既不反对干涉恶人，可见也不是主张绝对废除人干涉人的法律。彼此意见相同，便不须讨论了”。

我确是主张干涉恶人。恶人不过是侵犯他人自由之人，我们之所以干涉他，完全是正当之防卫，断不能说是干涉他人之自由，但是先生竟因我主张干涉恶人，而说我不主张废除法律，未免近于武断。法律不过是一部分之人要来压制他部分人之一种方法，未必能够干涉恶人，有时反侵害善人，是不公道的、不平等的，所以无政府党人主张废除法律而代之以自由契约，必要共同合意才订立的。因为将来之社会团体，如蛛网之密布，各团体均有一种自由契约，由各会员共同订定共同遵守的，不象法律是一部分人订立要他部分人去遵守的。法律禁止奸淫，而执立法者可以宿娼纳妾；法律禁止抢掠，而官吏可以大扒特扒。陈独秀反对安福部要受法律制裁，吴佩孚反对安福部则可领大功；张勋反对共和而主张复辟，而可以消遥法外，陈独秀主张共产就要被逐出境；约法上大书特书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而政府可以随时干涉人民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照此看来，政府之法律，可谓一点的价值都没有，我们绝不可再作法律万能的梦想罢。

八，来书云，“五四运动我们固然可以说是善的，但义和拳和荷兰市民迫害斯宾挪萨，巴黎市民杀死柔勒，以及欧洲中古虐杀异教徒，象这类群众心理所造成的公愤，未见得常加于社会上恶人。若照先生主张用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实在要造成一个可恐怖的社会。”

先生所举出的几个例，皆由宗教迷信迫之使然，科学进步便可消灭，在近日已经很少见，何况是在科学昌明之无政府时代，因为无政府党人所提倡的是科学真理，所反对的是宗教迷信，所以无政府主义进一步。科学也进一步，到了实现的时候，盲目的群众心理断没有出现的。而先生拿宗教迷信之群众心理比方科学昌明之群众心理，未免时代错误了。

（四）陈独秀再答区声白书

声白先生：

前天在《群报》上看见你的答复，现在再略陈鄙意如下：

一，先生不赞成个人绝对的自由，我很佩服你的见解比别的无政府党好得多（我在《广州晨报》上见过几篇文章，一面说他们是共产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们曾反对过；一面却口口声声说："我们主张极端自由，不是多得少得"；"我们既赞成安那其，而要求绝对自由。"）但是先生所主张对于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之办法，我却有点怀疑：一、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途无路了！二、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先生说："便甘与群众为敌，虽为众人屏斥亦奚足惜。""不顾公共利益的个人自由，是自由的大敌。""既志愿而为一群，则必共守信约。"这些话我们都很以为然，因为若不共守信约，屏斥一群之敌，便不能保这群底组织及利益。换一句话说，信约既定之后，我们便不能容认不顾公共利益的少数人有"主张极端自由"、"要求绝对自由"之余地了。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至于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二，天下事始而赞成继而反对、始而愿意继而不愿意的情况很多，爱情的夫妇还有决裂离异的时候，何况别的事。先生说："既然能合起来做事，焉有不履行信约的。"我便问你：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么，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三，在这一段，先生和我的意见不甚相差，便不必讨论了。但先生要注意的，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四，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着？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

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反乎自由的事三种：（甲）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象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这种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是不应该有的；（乙）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丙）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我们所讨论的是（乙）（丙）两种，我在女子师范演说的是（甲）种，先生如何并为一谈呢？自由平等虽是好名词，但不可当做万应丸到处乱用呵！譬如资本家之自由也是先生所不承认的了。

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人人同意的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五，法律底作用在消极的制止，我们未曾主张并且自古也少有订一条法律积极的要人做一件什么事。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可见一方面主张人人同意及自由，一方面又说主张大团结、大联合，直〔真〕是自欺欺人！

六，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七，契约是各团体一部分人的私约，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范围作用都不大相同。在社会学上，团体、群众、社会这三样大有分别，万万不可以混同。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法律的大作用只是保护社会公共的安宁利益及裁制侵犯他人法律上的自由。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藉法律侵害善人，执法者不守法律，法律本身都不受过；凡是这等弊病，就是公约、契约都不能免。因北京政府的法律之无价值，便可以推定现在及将来各国底法律都无价值吗？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便可以绝对废除吗？世界上凡不是万能的东西都应当绝对废除吗？无政府主义万能吗？科学万能吗？教育万能吗？世界上何物万能？

八，有群众便有群众心理，并不是古代或宗教时代特殊的现象。法人杀死柔勒及五四运动和宗教迷信有什么关系呢？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五）区声白再答陈独秀书

一，来书云“你说施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我请问照你的说法，善良教育未普遍以前，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了，那末，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善良教育呢？这才真叫做走途无路了”。

无政府共产实现是不是要等到善良教育普遍之后，我虽不能断定，但是在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好的分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但是施行善良教育，现在就要去做，这是教育家之责任，不必要等到私产政府倾复之后。即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处在最腐败顽固北京政府的底下，都可以施行他的善良教育；不必要等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一班人通通做了大总统阁员后，才能够施行善良教育。假使他们做了大总统阁员，一班教育家的头脑还没有改变，也是没有用的。即如处于现在私产政府之下，就要去宣传社会主义。不必要等到社会主义的政府成立后才去宣传社会主义。若果说处于私产政府之下不能去宣传社会主义，一定要等到社会主义的政府成立后才能够宣传社会主义，等到无政府共产实现后方能够施行善良教育，这才真叫做走途无路了。现在各国的无政府党、社会党，车载斗量，这都是人民宣传的力量，各国私产政府没有设立几千百个社会主义学校、无政府主义学校制造出来的。施以善良教育，也都是我们人民的责任，不必倚靠政府的。

二，来书云，“你说‘假使遇了这种人，我们准可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我请问照这样告诉他，他仍然固执，那便怎么样呢？即以你对于岭南学生而论，你总用过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效果如何呢？”

人之所以固执，皆因没有知识，和不知合群的道理的缘故，如果与公众没有妨碍的，准可听他自由，但是如果与公众有妨碍的，就拉他到学校去教训他，对于教育上更要加倍的注重，不过三两个月也便不固执了。至于我对于岭南学生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们，总比用武力强迫他们信从我的主张效果大得多。因为我对于他们用一种诚恳的态度，他们对于我便有感情，既有感情，那么我所讲的话，他们便可相信，若果我对于他们怒目相视，他们对于我必发生一种恶感，那么我无论讲什么他都不听了。

三，来书云，“先生所谓信约，也可以说就是法律。不过是名称不同。但先生说信约是共同订定的，法律是几个人订定的，这种全称肯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因为自来共同信约不见得尽是全体共同意思，并且有时还是一二人煽动群众盲行的；反之，自来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至于成立法律底手续，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

信约（或自由契约）和法律完全不相同，断难混合为一，信约之英字为Contract.他的定义为an agreement between two or more persons（两人或多数人的合意），法律之英字为Law，他的定义为 a rule of action, prescribed by the supreme power ofastate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的行为规律），所以信约一定要经过守约的人之同

意，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至于信约一定要经两方同意方能订立，断没有一方面可以订立的，如果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这就是法律，不是信约了。先生说我说法律是几个人订定在逻辑上殊欠妥当，我请问先生立法权是不是放在几个代议士之手中，抑或在于人民全体？先生既说"法律底实质多半根据在全社会的习惯及心理底基础上面"，更要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好过定一种全国死板板的法律，因为各地方的社会习惯常有相差很远，若强一地方以从他地方之习惯，实为人生之最大苦事，如不遵从，就要受法律所制裁；且各地方的人民常因天时、气候、地理之关系，心理也不一样，以心理不一样的人民，一定要遵守同一样的法律，你说有道理没有？至于先生说"几个人订定法律底时代，不用说欧美，就是中国和日本也过去数十年了"，我请问先生满清的法律是谁人定的？就是现在的中国和日本是不是代议制度？代议制度是不是议员才有立法权？几个代议员能够代表人民全体否？不知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先生反去崇拜讴歌，我实在不敢附和。我更问先生，中国和日本的治安警察法是不是政府几个人订定的，抑或人民全体定的，治安警察法有根据于社会的习惯和心理的基础上面没有？可知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保护政府治安罢了，什么保护人民都是欺人的说话！

四，来书云，"若是不履行信约怎么办？若是取退出的办法，那末，一个家庭、一个学校、一个工厂还可以退出，试问社会如何退出？"

无政府的时代没有法律，维持社会的秩序全靠信约，如果有人一旦疯狂起来，破坏了他们自己所定的契约，若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们准可原谅他；但是如果有意的，我们就可以宣布说"某人破坏契约，以后大家请勿上他的当"便得了。因为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除了疯狂的——当可绝迹，纵有，亦居极少数，断不能与大多数的人为敌的，万恶的资本制度都可推翻，少数之破坏分子，亦何难解决。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得了。先生又问社会如何退出？凡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叫做一个社会，不必要人类全体才可叫做社会。如果社会不能退出，我请问先生，社会是不是一个地球，抑或一个监狱？

五，来书云，"我们还以为工团派的组织不适于革命，然在无政府主义看起来，工团派已不免有权力集中的倾向，其实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我看法国"劳动总联合会"会章第二十七条"本会(总联合会)以联合主义及自由底原则为根据，保障及尊重加入各团体底完全自治权"(见"新青年"8卷4号)，与权力集中完全相反，先生所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至工团派的组织为什么不适于革命和为什么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先生没有说明理由，我不明白，还望指教。

六，来书云，"先生一方面不赞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人人同意及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的社会；一方面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又赞成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请先生自己想想矛盾不矛盾，一切无政府主义都已经打碎了没有？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

个人的无政府主义是主张个人绝对的自由，不承认有所谓社会，更不承认有他人的意

见，我既说人人同意，可见得不是以一人之意见而侵犯他人之意见。又有社会可以自由退出，因为个人主义是不加入社会的，所以没有社会可退出。可见得我所主张的是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反之，以一方面之意见，不许他人自由退出，如日本之不许朝鲜独立，只顾一己之权利以侵犯他人之权利，方算个人主义。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是任由他人压服都不抵抗的，我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的社会，所以我就不赞成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请先生想一想何尝有矛盾，何尝把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打碎。

七，来书云，"抵抗主义中是否含有压服多数人或少数人的意思？（我原文是"我更不能相信有不用强力及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抵抗的无政府主义"，先生改为"不相信'绝对不赞成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的'无政府主义"。删去"抵抗的"三字，语意大不相同，请再细心看一下。）"

先生原文确有"抵抗的"三字，一时忽略，很是抱歉。但是抵抗和压服完全不相同，抵抗是把被人夺去的权利取回来，压服是要把他人的权利据为己有。即如朝鲜现在为日本所征服，他们一旦起革命脱离日本而独立，也不过是取回朝鲜的自治权，何尝有压服日本的意思；又如一个盗贼把我的东西夺去，我只要夺回自己的东西，岂有把贼所有的东西都要夺为已有的道理。一方面反对人做贼，一方面自己又想去做贼，这种以暴易暴的办法，实在不敢附和。

八，来书云，"为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又云，"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

不知先生说"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如果我压迫人，或人压迫我，都是不正当的人生。"先生之所谓"人"是全称的，不是特称的，断没有一群或团体以外之"人"才算是"人"，一群或团体以内之"人"便不算是"人"。凡是二人以上之集合都可叫做一群。如果除了一群之外便只有一个人，一个人怎能够说"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可见得先生之所谓"人"是指一群或团体以内之人，并不是指一群或团体以外之人。我请问先生"不施压于人，亦不受人所压"和"多数压服少数或少数压服多数"有没有冲突？至于在一团之内，因意见之不同，有时我牺牲意见来就你，有时你牺牲意见来就我，这都是很平等的，如果讲到压服，只可有一部分人的意见，不管他部分人的意见怎么样的了。比方一学校之内，校长发表强迫学生遵守的命令，这可算是压服，如果学生自治会的决议案，学生大家去遵守，这种便不能叫做压服。因为讨论的时候，各个人都可参加在内，没有指定那一个应该服从那一个。所以牺牲一己的意见以就他人也是很公道的，因为今日我可以牺牲意见来就你，他日你也可以牺牲意见来就我，没有压服与不压服。至于校长的命令便不同了，因为他只有一己的意见，没有经过学生讨论过，且学生一定要服从他的意见，他可以不服从学生的意见，这方算是压服。至于对待少数顽固派的办法，我上文已经说过了，若社会上还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断不能成功。所以社会革命以后，只有少数的顽固派，断没有多数的顽固派。

九，来书云，"先生所引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

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倘然能够这样，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

克鲁泡特金所引出各种的联合都是以自由契约而联合的。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比方我说“把东西放在口内吞落肚下去”，我虽不说明“吃”字，人人都知到是吃了。先生既承认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我不过证明自由联合之可能，并没有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至于处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不满意于其主人，都可以解辞职务，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各团体之分子反不能自由退出，先生想必以为现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罪恶未深吗？

十，来书云，“广东有两个学生会，是好的现象吗？这正是自由便不能联合底好例。多谢先生举出。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如果都象广州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大团结、大联合如何能成立呢？”

先生既多谢我把两个学生会不能联合底例举出，但是有一件事先生还要多谢我的，就是这两个学生会没有经过武力，现在因得两方的同意，又自由联合起来了（见3月4日“群报”）。可见得大团体大联合一定要同意及自由才能够成功的，如果只有一方面的意见，怎能够联合呢？若不是自由的联合，如日本之并吞朝鲜，英国之灭亡印度，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这是好的现象吗？那么，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先生以为如何？

十一，来书云，“先生说人人都有廉耻，受人驱逐的必定走。我要请问：倘若他不顾廉耻，坚不肯去怎么办？我还要请问，驱逐他到什么地方？”

我又请问，比方先生在北京提倡新文学的时候被恶气所压迫，为什么先生又肯去呢？姑退一步讲，只是先生才能够有廉耻心，在别人一定坚不肯去，我们就用几个人抬他出去。谁人抬呢？阿保、阿胜、阿茂、阿寿。抬到什么地方？就是抬到出于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便得了。如果他再来，就给他一个闭门羹。

十二，来书云，“各团体内虽有自由契约的裁制，而无关系之各团体间及个人之于其他团体抵触时，法律的需要便发生了”。

个人与个人间既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小团体，团体与团体间也是以自由契约集合而成更大的团体，无关系之各团体及个人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就可找第三者之团体出来就理排解。如有恃强欺弱的，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象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便得了。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如果自由就不能联合，为什么英、法、日都能够联合呢？可见联合是不必要武力的，只求两方的契约便得了。

十三，来书云，“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这是心理学说及我们眼见的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

先生所说的一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一二人可利用群众，大的科学家就不能利用群众？反要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未免自相矛盾了。总之，我主张固定的事，就用一种自

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就由公众的意见来解决。法律是死板板的，不能更改的，如果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这就成为一种公意，不是法律了。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定法律的人怎能够有预想的天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又不能不借公众的意见来解决了，此又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完善的地方。

（六）陈独秀三答区声白书

声白先生：

你在《民声》上答复我的话，越说越支离了，不能不再详细告诉你一次。

一，这段里面，有一句原文为“在私产政府之下有何法、何人施行普遍的善良教育呢？”《群报》上脱了“普遍的”三字。我的意思是：在私产制度之下的教育，无论倚靠政府不倚靠政府，全体，至少也是百分之九十九有意或无意维持资产阶级底势力及习惯，想在这种社会状况之下实现善良教育而且是普遍的，我想无人能够相信。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所办的教育即或假定是善良的，然要靠这一点星星之火，慢慢地达到你所说“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施之以善良教育，达到无政府共产实现的时候，一定很少很少”的状况，真是河清难俟了。

据你的话，可见善良教育未曾普遍以前，这种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很多很多，试问你如何处置他，这便未免是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大障碍了。如此看来，请你还是快去努力施行善良教育，且慢谈无政府主义。你说“假使善良教育还没有普遍，我们对于不良的分子，就要请他去受善良的教育；因为用教育来训练他，使他悔改，使他觉悟，总比用法律惩治好得多。”你这种说话和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意思相近，但孔子还不过是说政刑之效不及德礼，并不曾主张绝对废止政刑；因为维持社会底方法不限于一端，政刑教化用各有当，不可偏废；我们也相信教育的功效好过法律，我们且相信教育是改良社会底最后最好的工具，但不能迷信教育万能，更不能妄说教育的力量还未灭尽恶人以前即可以教育代替法律，因为若有许多许多个人主义的顽固派一定不肯去受善良教育，请问你又如何办？我想你们无政府党又要说我：“是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他所预防的弊病——不可能的证据，完全是被现世的景象骇昏了所致。”这几句话正是你们无政府主义者致命的病根底病根所在。我只简单请问：你们所说进化的无政府社会，是用人力从这现世的万恶社会渐渐改造出来的，还是用符咒把现世的社会沉到海底，突然另外出现一个崭新的无政府社会和现世的景象没有连续的关系呢？办教育不必倚靠政府，现时资本家私立学校都做得到，这并不待无政府党底指教。你所谓“人民的责任”，请问这人民若兼指资本阶级，他们的教育可会有真是善良的一日？这人民若单指无政府党社会党，善良的教育一时又何能普遍？

二，我问你在岭南的效果如何，不过希望你实地感觉“用诚恳的态度把正当的理由告诉他”，不见得人人都肯听从，因此可以悟得有时不得不用势禁以济理喻之穷（能理喻自然更好），并不是劝你以武力强迫怒目相视对待岭南学生。岭南学生对于你诚恳的传

播主义反对宗教等說話果有感情，果然相信吗？这件事何、刘、陈諸君都知道，说谎话是最可耻的事呵！

三，自狭义的契约说起来，和法律底范围作用都大不相同，前函已说过，你何以未看清楚？但自广义说起来，法律也可以说是一种契约，有人称法律是社会的契约（或称民约），前函所以说："法律是全社会众人底公约"，可说："至于他的名称，叫做法律，叫做公约，叫做契约，都没有什么大不可。"你所说的契约和法律底不同，更足证明法律底必要；因为若无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间契约底标准及监督，便必然会发生两个弊病：第一是没有监督无以制裁违背契约底责任者，第二是没有标准无以制裁侵害甲种人权利的乙种人底契约发生。救济这第二个弊病，正是近代发达的国家制定进化的统一的法律之大功，这种法律进化的大功在我们人类进化历史的过程上是断然不应该藐视的。古代各部落各地方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状况和信仰习惯，遂有种种不同的法律，因此遂发生种种冲突种种战争，后来因为国家进化法律进化，这种部落的法律地方的法律含有地方性的国家法律渐渐消灭，国内的冲突战争也跟随着渐渐减少；所以近来颇有人主张建设统一世界的大国家，订立更进化的更统一的有强制力的国际法律（现有的国际法因为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设〔没〕有强制力，所以无效。），好渐渐消灭国界，消灭国际战争，我们应该承认这个理想是进化的，而且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真想不到你们竟然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竟然以为全国统一的法律不好，竟然主张使各地方及各团体自行订定自由契约！难怪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退化的学说，因为照他的主张实行起来，在经济上必然要回复到手工业时代，在政治上必然要回复到部落时代。即让一步，依你所说，国家所订定违反各地方的习惯心理强制各地方一体遵守的统一法律不好，要依各地方的习惯心理自行订定自由契约才对；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第一是这种地方自行订定的契约底性质，第二是他的效能。第一关于性质方面的研究：（一）请问你既然力说法律和契约不同，为什么称国家订定的是法律，各地方自行订定的是契约？（二）你若说有制裁力使人必须遵守的才是法律，我们真不明白任人不必遵守的契约是一种什么东西？（三）若说国家统一的法律是不能尽合各地方的习惯心理的，我请问各地方内各村落各团体各个人间底习惯心理是否都是一样？（四）若以是否经过同意分别法律和契约底不同，代议制是你们不赞成，那末，个人间团体间的契约还容易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若地方的契约（其实就是地方的法律）要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岂是容易的事？(五)即令可以经过人人直接的同意，试问又如何经过定契约时还未曾出世之人的同意？(六)即说不避麻烦，凡在一个地方范围以内有一个新出世的人都要征求他的同意通过一次，那末对于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如何征求他的同意？（七）如果不经过他的同意，别的契约不用说，关于儿童直接身受的儿童规约，是否也和你所谓只有一方面创制权的法律相同？（八）若说契约底同意权应以相当的年龄为限，现象怪极了；因为你们主张对于未出世的人还不能剥夺他的同意权，试问为什么已出世的人反来要到相当年龄才有同意权，这种规定年龄的契约又是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创制权呢？第二关于效能方面的研究：（一）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准许吸鸦片烟或赌博，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二)在无政府社会里，倘有一

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拥戴出一个皇帝或选举出一个总统，别的地方别的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三）倘有一地方一团体自行订定契约有损于他地方他团体底利益或有害于他地方他团体，他地方他团体对于这种自由契约底效能怎么样？照以上两层研究，在性质方面，你所说的地方的契约，实质上就是地方的法律，无论他是否好过你所谓全国死板板的法律，这是地方法和统一法良否比较的问题，不是根本上法律应否存在的问题，你拿他来否认法律，算是文不对题；在效能方面，正赖有国家最高权力所制定统一的法律，以为各个人各团体各地方契约底标准及监督，才可以维持各种契约底效能。你说立法权是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不在人民全体；请问瑞士及美国都有全民直接投票的创制权，是否立法权都放在几个代议士手中？请问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得人民全体底同意？代议制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何所证明代议制度在二十世纪已经破产，真是跟着一般浅见的人瞎说！不但没有可以容纳全世界人、全国人、全省人、全城人开会的会场，就是全民投票也不是常常可以举行的事。全国交通开会议时，若全体人员到会，岂不因之交通断绝？又如你们若开全世界无政府党大会，果能全体党员列席吗？所以除了用代议制度没有办法。你有何种理由可以举出一个中国和日本底治安警察法便全称肯定所有政府制定的法律都不是保护人民的？你说："法律是没有经过守法的人同意，如果法律有经过守法人的同意，为什么守法人未出世以前，法律已先他而存在？"你主张全体同意竟极端到这样可笑，我且问你：你们所急于实现的无政府制度，是否必须一一得到未出世人的同意，是否不许无政府制度先他而存在？你倘没有充分的理由回答我，我便不能不可怜你脑筋坏了！

四，你说：现在之不顾廉耻，甘犯众怒者，皆因私产制度迫之使然，到了共产之世，这种人当可绝迹。我说；这种人不绝迹如何能够到真正共产之世。我再正告你一次：共产之世仍旧是我们这万恶的私产之世渐渐改造出来的，并不是用符咒把这腐败的旧私产之世沉到海底，突然另外现出一个新的共产之世与旧的私产之世没有连续的关系呵；你说：如果他一定要甘与社会的幸福为敌，极其量我们就用对待资本家的手段对待他便了。我们不知道你所说对待资本家的手段是什么？用手枪炸弹对待他，未免小题大做了；用刑法制裁他，你们是反对刑法的；没收他的财产，那时已无私产了；剥夺他的选举权，你们是反对代议制度的；用诚恳的态度劝告他，他是不听的；拉他到学校去受善良教育，他是不肯去的；送他去到远方，未免是以邻为壑；终是没有办法，只好任他为恶而已。你所说的乃是合一群人而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契约，不论人数之多少，都可以叫做一个社会，这是团体不是社会，你是学哲学的人，难道团体与社会还分不清楚吗？一个社会里可以包含许多团体、许多机关，社会和单一的、有界限的家庭、学校、工厂、学会、党派等团体不同，也正和单一的有界限的监狱等机关不同，所以不能退出。若但是退出这个社会，跑到远方，远方那里也有社会；除非跑到空山无人的地方或是自杀，才算是退出了社会。

五，你只看见第二十七条自由自治等合味的名词，你可曾注意到第三条加入底限制及课各团体底义务？又可曾注意到第四条所说"本总联合会由一个国民委员会支配之"？又可曾注意到第五条所说：管理委员会是由国民委员会指命的，各团体间底冲突是由管

理委员会裁判的？又可曾注意到第九条所说“国民委员会实行各国民大会底决议干涉关于劳动者阶级的一切问题，决议一般性质的一切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我们正因为他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底自由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

六，我原来知道你是不相信Stirner派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人人同意人人可以自由退出社会，这种思想仍旧建筑在个人的自由权上面，系这样一面赞成社会的联合一面又主张个人的自由之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Stirner反社会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有了社会的组织，个人的自由便要减削，社会的组织越宠大越复杂，个人自由减削的分量越多。我原来知道你也不是相信Tolstoi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的，但你却是相信不以多数压服少数的；象这样矛盾思想，不但是你，克鲁泡特金正是如此；我看还是Tolstoi无抵抗的思想彻底得多，圆满得多，因为抵抗便需要强力，便会发生多数压服少数，甚至于少数压服多数的事；例如主张无政府共产革命的人，在一个社会里无论是多数或是少数，当然要抵抗资本阶级，当然要压服了少数或多数顽强拥护政府及私有制度的资本阶级，然后无政府共产社会才能够实现的。假定我如果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宁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而不相信克鲁泡特金；因为斯悌纳否认社会的组织，在理论上才算得把个人自由底障碍根本除去了；托尔斯泰看穿了抵抗，强力，政府，国家，法律，军队，这些事是必然相因而至的东西，他又看穿了个人的自由在农业手工业时代多过机械工业时代，大交通大工业越发达，法律的强制力之需要也跟着发达，个人的自由遂跟着减削，所以他极力反对工业交通等一切物质文明。这两人底学说思想是否向着人类历史进行的线路逆行，这是另一问题，可是他们的学说思想都是一贯的而不自相矛盾，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至于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的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矛盾的学说，不但不是真的无政府主义，并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你若真相信无政府主义，我劝你还是相信斯悌纳和托尔斯泰才对，因为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只有求教于反社会的个人主义及无抵抗主义；若离开了个人主义和无抵抗主义，那强力，政治，法律等，一切抑制个人或团体自由的事便必然不免，所以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我所以说你若是反对个人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便是把无政府主义打得粉碎。

七，抵抗必须强力，只这一点已经使你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露出很大的破绽。你现在说抵抗和压服完全不同，并举朝鲜独立及夺回贼赃为例；请看朝鲜已经抵抗了日本几次，若不由抵抗达到压服日本的程度，日本如何肯让他独立？你若不能压服盗贼，那能夺回自己的东西？你既然不敢附和“以暴易〔暴〕的办法”，那末，将来推倒资本阶级以后，你们无政府党一定反对以资本阶级压服劳动的办法压服资本家了，难怪有人

说无政府党是资本阶级底好朋友！

八，我在女师底演说是："我的意思以为物质上的生活，能够做到平等自由，便是正当的人生，因为人人都是人类，不应该受他人的压迫"。这几句话分明是指物质的生活上普通事项而言，前函已分析说明这是属于反乎自由的（甲）类，是指一阶级无理的压迫他阶级，一个人无理的压迫他个人，好象资本家之于劳动者，男子之于妇女。并且珍〔郑〕重告诉你，现在讨论的是（乙）（丙）两种，女师底演说是（甲）种。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你如何仍旧并为一谈？政治上革命者压服顽固党，教育上教育者压服受教育者，和物质的生活上人人不应受无理的压迫，试问有何冲突？在一群之内，人人能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意见以就他人，那自然极好；我所问你的是：若在一群之内处于万万不宜分裂的境况，而少数的顽固党对于一个关系一群存亡的问题，坚不肯为社会公共利益牺牲私见以就他人，拉他去受善良教育，不但他不肯去，而且也来不及了，请问此时除了压服他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好方法？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你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上若有多数的顽固派，则社会革命不能成功？又有何种证据断定社会革命后没有多数的顽固派？俄国底十月革命是不是少数人的运动？现在他革命以后，在国民全体上看起来，是不是顽固派仍居多数？我们中国倘有一万万人献身社会革命运动，你想能否成功呢？你是否反对以一万万人压服三万万人呢？

九，你这一段话我大部分莫明其妙，所说的比方，我想多数读者也都莫明其妙。我并未曾说你说过惟资本家方能够联合，我只说："倘然能够这样（即指资本家的产业联合而自由，而人人同意，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先生讴歌崇拜了"！我曾问你：克鲁泡特金的两段话仅是说明"联合"之可能，未曾说明"联合而且自由"之可能；欧美各国间在资本家管理之下大规模的生产联合很多，试问其中办事都须得人人同意吗？都是自由而无强制执行的事件吗？你既然理屈词穷，最好是一字不答；我真想不到你竟然说出"既以自由契约而联合，便可依照自由契约而行使他的自由，这是人人都晓得的"这样可怜的含糊搪塞的话来，将我问的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人人同意及有无强制执行等话，一字未答；并且你自己硬说这种联合有联合之可能，便可以不必再行讨论了。你虽不敢再行讨论，我还是要再行讨论；我还是要严重地问你：资本家生产联合里办事，是否有须得人人同意的自由及无强制执行的自由？倘能够这样自由，便不必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也足令你讴歌崇拜了；倘不能够这样自由，这种联合而不自由的自由联合（近代资本主义之下，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契约，自由联合，都是资本家底不法自由，资本家产业联合是自由的，联合起来办事的条规是不能自由的）。在你引来证明你"自由之与联合绝对没有冲突"的主张上，试问有何意义？在雇佣制度的资本主义之下，劳动者用去劳力的最大部分是替资本家做工，不但可以解辞职务，就是怠工罢工都是合理的；在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完全是替社会和自已做工，不但无正当理由不应该自由退出，并且怠工罢工都应该受相当的制裁；你们倘不能了解这个道理，你们倘以为这样不自由的办法比现在雇佣制度资本主义的罪恶还深，你们还是去跪在资本主义脚下享受那奴隶的自由罢！

十，广洲两个学生会现在已经联合起来没有，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所讨论

的问题如是：一切社会，一切生产机关，一切交通机关，如果都象广洲学生会那样不同意便自由分裂，分裂之后不同意再分裂，分之又分至于个人而后止，如此小团结小联合都不成，大团结大联合更怎能够成立呢？即令广洲两个学生会已经联合拢来了，这因为他是学生会还不碍事，倘若是生产机关或交通机关，那分裂到再联合起来期间的紊乱损失，谅无人能够否认。我们并非有意反对人人同意自由联合的理想，乃因为这理想在许多事实上分明是不可能的，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计，不得不承认有强制那不合理的不同意部分服从那合理的部分之必要。这种情实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邻国及陆荣廷之掠夺广东远非一类，何得举以为喻？

十一，社会和团体不同，不是单一的，不是有界限的，不是有门可闭的，抬出和他有关系的人之团体外头，还是不曾离开我们的社会；若说送到远方，把这种（常不尽责任而且常侵犯他人自由的）人送到远方底社会，岂不是以邻为壑吗？

十二，个人与个人间的契约，尚可望拿道德名誉信用来维持，有许多人不顾名誉道德信用，还是有法律制裁的必要，至于各团体间及个人与其他团体有冲突时，这便复杂了，便非道德名誉信用所可维持的了。找第三者排解，这本是现在的社会中常有的事，正为有恃强欺弱的人不容排解，所以才有法律制裁的必要。照你说：“我们就可联合起来干涉他象协约国之对待德国一样”，那末，你虽反对法律的制裁，却很赞成武力的制裁了；因为协约国若不用武力，如何能干涉德国？你说：“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也如协约国一样，不必要有一中央统治机关来干涉他的；所以不必要一国压服那一国，一地方压服那一地方”。我对你这段话有三个疑问：（一）协约国果然未曾压服那一国吗？(二)协约国之上倘然有一个中央统治机关——强有力的中央统治机关，国际的强弱吞噬纷争岂不可以减少一点吗？（三）将来各地方各团体之联合，果然也和协约国一样吗？将来政治上的自由联合，你举协约国为榜样；将来经济上的自由联合，你引克鲁泡特金所举欧美资本家的共同企业为榜样；恐怕有人听了你这些说话，会以为无政府的自由社会已经在欧美各国实现出来了。

十三，可以利用群众心理的一二人，乃是置身群众之外，有自动的意识来利用群众之野心家；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中，个人的意识为群众心理所压迫，往往失了理性，被动的无意识的随着群众走，所以不能利用群众；请问这有何矛盾？我们始终所讨论的，是法律可不可以绝对废除的问题，不是法律有没有万能的问题，这一层你要弄清楚。固定的事，自由契约的力量能维持，那自然无问题；现在的问题，乃是自由契约的力量不能维持时如何办？我对于绝对废除法律的疑问就在这一点。一时的事，成为法律条文未备的，或法律条文已与现社会生活状况不相应而一时未及修改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就公众意见来解决的先例。但这种公众的意见，非万不得已断然不可以轻用，其理由有三：(一)是因为公众究竟是什么？有何标准范围？(二)是因为所谓公众的意见，是否野心家在那里利用群众心理？(三)是因为多数知识浅的人所发真〔表〕的公众意见，是否合乎其是非也是一个问题。拿这种惝恍迷离不负责任的公众意见偶然来补助法律，已经是非常的革命的现象了，倘拿它来代替有固定性的比较可信的法律，真是大错而特错。天下事虽是千变万化，法律也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法律的人虽没有预想的天才，

但他也不能禁止后人以相当的手续加以修政〔改〕的。未经相当的手续修改以前，法律自然是应该死板板的不能更改，这种死板板的因〔固〕定性正是法律的好处；倘毫无固定性，随时都可以由人民自己修改，所谓人民到底是些什么人，多少人，如此野心家烂仔都可随时以人民的名义修改于自己不便的法律，无政府党主张以公众的意见代替法律之大缺点正在此处，你如何反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最定〔完〕美的地方？

在以上讨论的范围以外，有二点不得不附告读者：（一）声白虽相信无政府主义，却也极力赞成阶级战争和革命的行动；现在和我讨论的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若劳农俄国现行制度，他也认为革命时代过渡时代之自然现象，并不加以非难。（二）声白底思想是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不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什么虚无主义无抵抗主义个人的无政府主义，他一概反对；他的行为算得是一个纯洁的青年，绝不象一般“下品的无政府党”，我很为中国无政府党可惜少有声白这样的人！

（原载《新青年》9卷4号，1921年8月1日出版）

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无　懈

读我这篇文章的人，先要把我底题目底意思弄清，然后脑筋中才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就是：（一）我这个共产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说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为什么不主张资本主义，而要主张共产主义？因为这个问题已不成为问题了，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二）我们这个共产主义，并不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乃是现在在俄国实行着的共产主义；就是资本阶级因为吓人吓己，把我们叫做过激派的过激主义。

既然把上列两点弄清白了，就可知道我底题目底意思，乃是：我们为什么不主张无政府主义，而要主张共产主义？

这个问题，已由马克思和巴枯宁实际地打了好久官司，（我们底共产主义乃是马克思底正统派）经久被马克思打赢了的，所以现在本不必多说；因为现在还有许多人说我们底共产主义，是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是彻底的；我们底共产主义，是不易实行的，无政府主义，是容易实行的；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在讨论之先，又要必须先声明的，就是：我并不是根本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底原则，我是承认的；我并且承认他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的目标。我底意思，乃是说他设若不经过一种阶段，决不能实现；即退一步说能勉强实现，也是办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所主张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乃是为达到无政府主义造一个阶段的共产主义。

怎样说他不经过一种阶段，不会实现？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第一是强权。强权这种东西，从历史看起来，本来是个坏东西，因为他并不是拿起来扶弱抑强的；乃是拿起来加压弱的。所以有了强权这种东西，世界上就弄出种种不平等，不自然的状态。什么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就从这里生出来了。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他不问时候怎样，闭起眼睛来乱反对强权，我们就不能赞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简直连口里都不愿意说强权两个字。那么，我就要问他们，他们要打破一切支配阶级，要推翻旧社会一切的组织，究竟有什么妙策？是采取无抵抗主义，人家打他底左嘴巴，就把右嘴巴让给他打；人家抢他们底外套，他们就把内衣也脱给他；希望支配阶级，自羞自愧，来放弃一切特权呢？或是象十八世纪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家一样，去劝支配阶级，要他们良心发现，放弃一切特权呢？现在的支配阶级，他底欲壑是没有底的，你越让他，他就越要前进。所以用第一种方法，不独不能使他们自羞自愧，放弃一切特权，来行无政府

主义；并且还是增长他们底气焰，使被支配阶级自趋于灭亡的境遇。支配阶级，因为遗传习惯底种种势力，决不能就因为你一劝，就良心发现，情愿放弃一切特权，来行无政府主义的。所以第二种方法也无效。这不独我这样主张，就是无政府主义家他们自己，一定也是承认的。那么，要推翻支配阶级，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得不用暴力革命了。然而暴力革命，是不是用强权？是不是用强权来打破强权？无政府主义家要闭着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就不该用强权来革命了。要用强权来革命，就不该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了。要反对一切强权，就是不能打破旧社会组织。不能打破旧社会组织，就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现在就说无政府主义，因为要打破旧社会组织，承认革命是必要的；等到革命以后，然后人人自由、平等，无所谓强权不强权。但是他们这种主张，未免把支配阶级这种东西，看得太不中用；把社会革命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须知社会上底一种阶级，并不是和一个动物一样，把他一刀杀死，他即刻就死，并不要什么手段，防他再生的。社会组织这种东西，并不是象一个物件，例如碗盏一样，把他一棒打碎，即刻就碎了，再不要什么手段，来铲除他底根本的。支配阶级就因为暴力革命，被推翻了，失掉了特殊地位，失掉了权力；但是你不能保他不谋复辟运动呀！社会组织就因为一时的革命，大概破坏了；但是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组织，并不是一时的革命，就可根本打破的呀！例如既倒的支配阶级，未必肯甘心把私有制一概放弃，来服从共产制呀！设若照无政府主义家底主张，于社会革命以后，就废弃一切特权，我试问既倒的旧支配阶级，来谋复辟运动，你用什么方法来防止他？不肯把私有财产交给社会，你用什么方法能使他交出？就说于他被推翻的时候，同时就把他底财产收归社会；但是他以后还是保存他所得的东西，不肯放弃私有权，你有什么方法来使他放弃？既没有强权，那么，他们当然可以自由行动。从第二个问题说，他不肯放弃私有权，无政府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从第一个问题说，那就不堪问了。旧支配阶级虽倒，他底势力还大呀！他有为他尽忠的科学家、学者、牧师、军人等替他活动呀！既没有强权来压他们，他们又何妨来谋恢复呢？设若他们底势力一恢复了，那么，那时的反动，就要使他们对于被支配阶级的压制，比以前更甚了。无政府主义所要求的平等在那里?自由在那里?不过使被支配阶级受一层更深的压制，更烈的痛苦罢了。但是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他本身底过，这乃是没有经过某种阶段，即刻就行无政府主义底过。所以我说不经过某种阶段，无政府主义是决不能实现的。

某种阶段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我们底共产主义是以劳动专政为原则的。就是以劳动专政防止旧支配阶级底复辟运动，使他不能复活；铲除旧社会底根本，使他不能妨碍我们底建设。共产党世界联盟，给与美国I，W，W，的信内面，有几句话很说得透彻，我现在把他引来："要打破资本家底国家，破坏资本家底帮手，解除资本阶级武装，没收资本家底财产，转付到全体劳工阶级底公共管理之下——要做许多事，非有政府不可——非有国家不可。这国家便是劳工专政的国家。在这国家里，劳工们运用他们底劳农会，可以用铁手来拔去资本制度底根了。"（见本志第2号第20页）我现在把他转过来说，就是：不实行劳动专政——我们底共产主义——资本阶级（现在的支配阶级）底一切势力就除不掉；资本制度（现在的社会组织）底根就拔不掉的。资本阶级底一切势力，既除不掉；资本制度底根，既拔不掉；那么，什么改造都做

不成了。还说百年以后才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的第一理由。

为什么说即使实现，也办不好？原来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本上有两种缺点：一是人性问题；一是经济问题。现在先说人性问题。

无政府主义家，以为人性都是善的，个人底行为，就是不受外部的势力，例如宗教，法律，等底制限，也不致于做什么恶事的。就是虽然没有法律，强迫人做工，人们还是愿意去做；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每人应取多少，人们也不致于取过所需。其外虽无法律制限，强者也不致于来欺侮弱者；智者也不致于愚弄愚者，总而言之：各人都是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行动；而又不妨碍别人底自由。但是人类底性情，不是象无政府主义所想的一样，这样单纯的呀！生性懒惰，不肯作工的人也有；生性贪欲，自私自利的人也有；象拿破仑，威廉这辈人，想支配一切人类的人也有呀！无政府主义家能保生性懒惰的人，虽无强迫也来做工；生性贪婪的人虽无限制也不浪费；生性好权势的人虽无拘束也不致于压制别人吗？设若果象无政府主义家所想的一样，人性都是善的；那么，为什么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一直到今，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互相争夺，互相侵犯，互相排斥，互相残杀的历史呢？未必社会组织，一到了无政府的状态，人性即刻就可以变好吗？原始时代的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设若人性都是善的，那就应该保存当时的状态，一直到今，不应该生出什么站在上面的支配阶级，和压在下面的被支配阶级，致使人类的历史，直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了。原始时代的无政府社会，不能保存到现在，就足以证明人性并不是如无政府主义家所想的一样单纯，一样善良。若说人性生来是善的，因为社会组织不好，人类受了环境的影响所以变了的；那么，现代社会底恶影响，原始时代，当然没有，为什么人类要互相争斗，演成个人争斗；部落争斗；国家争斗；阶级争斗；民族争斗等恶剧来呢？总而言之：人性决不象无政府主义家所想的一样，都是善的。所以从人性方面来看，无政府主义是不能完全实现的。现在就退一步，假定人性生来本是善的，因为受了环境底影响，才恶化了。但是现在不论已死的过去的人类，和未生的将来的人类，只拿现在生存着的人类来说。现在生存着的人，是不是个个都是善的？既然说受了环境底影响，所以恶化了；那末，现在生存着的人，当然不是个个都是善的了。即使说大部分人都是善的；但是要实行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大部分人是善的就能做到的。例如一万人之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是善的，只有一个人是恶的，也是不行的。假设旧社会就完全破坏，无政府主义就立刻实现；试问怎样对待社会中的不良分子？一切人类都是自由，不应该干涉个人底行动；那么，这些不良分子，他本有能，他不肯尽；他只需十，他要取百；他底体力，智力，比众优胜，他要来强压别人，指挥别人；你怎样对付他？不用强权来对付他，无政府的社会即刻就要破坏；用强权来对付他，无政府主义底原则，即刻就要违背。用这个方法，也是破坏无政府主义；用那个方法，也是破坏无政府主义。总而言之：社会底分子，不限定个个是善的，无政府主义就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性。所以即使人性本来完全是善的，而于现存社会一破坏，即刻就来行无政府主义，我敢保险办不好。

现在从经济方面来讨论。

经济方面，单就生产和需要来说。原来生产和需要，都要保持一致平均，社会的经济状态，才不致于紊乱。所谓一致，即是质的问题。就是现在需要布，就赶快要来生产布；现在需要铁，就要赶快来生产铁。所谓平均，就是量的问题。例如现在需要千匹布，就只要生产千匹布匹来供给；现在需要千磅铁，就只要生产千磅铁来供给。要保持一致，调和平均，就要把一切生产机关，归一个中央的，或比较范围稍大的地方的机关管理。这个机关调查社会要需要什么就知会生产者生产什么，不要生产不需要的东西。作量需要，大概要若干，就知会生产者生产若干，既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下面，（一）没有这个中央机关，不知道社会一般所需要的是什么？要多少？（二）个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全是自己底自由，没有什么限制。一定要他生产什么，生产若干。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社会一般所需要的是这样，各个人生产者他不知道，任意去生产那样；需要是那样，他也不知道，任意去生产这样。又需要的量是百，他任自己底意，喜欢生产千就生产千，或喜欢生产十，就生产十。他既不知道要生产百，也没有什么机关一定要他只生产百。在这个状态下面，从需要方面说，就是要生经济上的缺乏；从生产方面说，就是要生经济上的恐慌。总起来说，就是要使经济生活不安，经济状态紊乱。这乃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下面，必然要生的不可免的现象。既然有这种现象，那就是无政府主义根本上缺点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虽然有这种缺点，却不能说他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不过在近百年间，他还是要占在候补者的地位罢了。因为他底经济上的缺点，有法子来补足的。就是每个人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归自己个人来生产，一点也不要他人底供给；或最小的地方区域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illegible]该地方自己生产，一点都不仰给外地；那末，这个生产和需要底不一致，不平均的缺点，就可以免得掉了。但是要到达这种状态，生产手段和生产器具，非发达到一百二十分不可。自从机器发明，生产器具和手段，自然是一天一天地发达起来了。但是要做到个人能够独立自给，那就还差得多；就是小地方区域能够独立自给，也是做不到。所以我说无政府主义，现在还居于候补的地位。设若不等到生产器具，发达到这个田地，即刻就来实行无政府主义；那末，上述的经济上的缺点，一定是不可避的，所以我又敢保险无政府主义办不好。

既知道因为有人性上和经济上的两缺点，无政府主义最近就实现也弄不好；那末，就可知道我们主张共产主义为第二理了。我们底共产主义底原则，就是不做工的人不准吃饭；做了多少工，才能得多少报酬；以强权底正当用法，防止强权的滥用，就是以强权来维持公理，正义，人道。所以在我们底共产制下，虽不能保没有懒人，却没有人不做工；虽不能保没有贫人，却没有不做工而得报酬，和所取的报酬，过于他应得的；虽不能保没有想欺弱的强者，却可保没有强欺弱的事实。又生产机关，既归国有，则生产和需要就能一致，平均，而经济状态不致于紊乱。这就是我们在现在和最近的将来的状态下面，要主张共产主义的第二理由。

有人又以为共产主义没有无政府主义彻底，所以来反对他。不错，就理想上说，共产主义确是不如无政府主义这样彻底，但是一种主义，我们只要在理想方面，空想一想就可了事，还是要在实际上来实现呢？要只是学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好方法，一个

人坐在房里，脑筋内空想出种种好社会组织，拿来自慰；那么，无政府主义，确是比共产主义好得多，但是一到实际上来说，就不得不先让共产主义来干事了。无政府主义不易完全实现，已由上述的人性问题和经济问题来说明了，现在无须多说。既知道他不易实现，我们就应该取一种比较容易实现，而可以医治现社会所生出的一切恶弊的方法。我们理想固要高尚，而只是理想，于现实是毫无益处的。所以我们要从最高尚的理想着想，而从比较容易实行的东西下手。比较容易实行些的东西，固然比较地不彻底。但是天天渴想而不得的十分彻底的东西，和比较容易实现的比较不彻底的东西，我们到底是取那样？再具体的说，就是：我们情愿在旧制度下面讨生活，为旧社会底牺牲，受无穷的痛苦，而不愿实行不彻底的共产主义呢？或是要赶快救济目前的恶症，解脱目前的痛苦，而不空想不能救治目前的恶弊的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呢？再举个例说，就是我们情愿挨着饿，不吃手边的粗饭而求在数百里以外的珍馐呢？或是暂吃粗饭，先充一充饥，而不死等着不能救目前的饥饿的珍馐呢？我想一个人只要不是有精神病，没有舍目前可充饥的粗饭而不吃，硬挨着饿去求不易得的珍馐的。现在社会底大多数人，正如饿得不得了的人；共产主义，就是比如在目前的一碗粗饭；无政府主义，比如就是数百里外的一碗珍馐；那么，这个大多数的人内的大多数，不肯向着无政府主义而要向着共产主义走，乃是自然的趋势。你赞成固好，你就反对也是无益的。巴枯宁在劳动者之中的势力，为什么没有马克思的大？现在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大潮流，那一个势力大些？这些就是证明无政府主义，就现在的状态说，乃是画的饼，实际不能拿来充饥肠的。要想拿来实际充饥的，就不得不是共产主义了。总而言之：我们要救眼前的恶弊，就不得不取能够即时见效而不流于空想不能实现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第三理由。

以上专就一般的理论，说明我们主张共产主义的主要理由的。但是就是就中国特殊状况而论，也是可以应用的。中国有行共产主义的必要，我已于本志第1号详说过，现在不必多说。至于中国有实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等到有空工夫再说罢。

热心改造社会的朋友呀！你们不要只向空想方面走呵！你就空想出一个天国，一个黄金世界，社会上实际受着苦的人，不能受你们丝毫的益处！你们总要脚踏实地，向着实现方面实行去！实行！实行！这就是我们底口号。

（原载《共产党》4号，1921年5月7日出版）

夺 取 政 权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无 懈

社会改造！社会革命！这种思想，这种呼声，这种运动，最近就是在暮气沉沉的中国，也如旭日东升一天天地高起来了。因为处在这现在这样恶劣，残忍，恐怖，烦闷的社会状态，社会组织之下，设若还不知道起来革命，改造，那真是感觉麻木，差不多和木石一样了，中国人既然也是人类，也有感觉，也有理知，当然也就忍不住现存社会底压迫，要讲点方法来改造他，所以现在社会改造的呼声，运动，乃是时代底要求，现存社会底产物，不但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反是救人济世的福音！

但是改造这种事业，并不是开起口来只管说，闭着眼睛乱去运动就可以成功的。第一，要问我们究竟要向着什么目标去改造？第二，要问应该怎样去改造？换句话说：就是第一要定改造底目的；第二要讲改造底手段。没有目的的改造运动，固然是毫无价值；目的既定而不讲究确实的手段去一步一步地实现，这种目的也是空想的，拿来自慰，解闷还可以，要来实行改造社会那就没有用了。

我们应该向着什么目的去改造？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本志第1号"俄国共产政府成立的三周年纪念"一文中说明中国要照着共产主义底原理去改造，又在本志第4号内的"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共产主义？"一文中把我们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区分明白了。做一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以共产主义为我们改造底目标。现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改造的手段。

我们应该用什么手段去改造？我答道：第一就是要夺取政权！

夺取政权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别作文说明的必要，因为他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唯一手段，我们既然主张共产主义，当然要从夺取政权入手，这是不待多说已经明了的事。然而中国现在还有两派号称社会改造的人，标榜社会活动，讳言政治，来反对主张夺取政权的，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说一说夺取政权的必要。

这里要先申明一句的，就是我所谓的夺取政权，并不是说用什么议会主义去和有产阶级鬼混，想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乃是说要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有产阶级，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

那两派人讳言政治？一是一般稍有觉悟的青年；一是无政府党人。我现在把他们分头说起来。

我也不用什么高深的学理来反对他们，也不把马克思、列宁底话搬来作论据，单只

平平凡凡地就实际上来论断他们底理想是空想而无实现的可能性。

现在一般稍有觉悟的青年，看见十年来共和政治闹得乱七八糟，社会事业因而停滞，遂对于政治失望，以为政治是靠不住的，要以社会活动来改造中国，于是有提倡从下面改造起，以为下面的基础稳固，上面的政治自然要好的；有提倡部分的改造，以为各部分若都改造了，由各部分而合成的全部也自然要好的。其实这种想法，乃是大错特错，果真能如他们底愿，下面确实都改造了，上面的政治，能如他们底预料，自然要归于好，也未可知；果其能如他们底愿，各部确实都改造了，以各部而合成的全部，能如他们底预料，自然要归于好，也未可知，但是设若下面不能如他们底愿得达到改造的目的，上面究竟怎样办？各部分不能如他们底愿得达到改造的目的，全部又怎么办？然而实际上确是这样。上面的政治没有改造，"实际"这位老先生，是不许下面得完成改造的；不从全部改造下手，"实际"这位老先生，他是不许各部分能完成其改造的，读者不信，我试从政治，社会那方面说来。

先就政治方面来论：我们既生活于现存的政治之下，那末一切的活动，没有不和政治有关系的。设若我们能够不管政治，去到各方活动，改造，政治也不来管我们，让我们去活动，改造；那末，我们就可从别方面去改造，谁还一定说硬要从政治改造起呢？但是我们虽然不愿意去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我们：就是我们虽然不去反对政治，政治却要来反对我们；我们虽然不去破坏政治，政治却要来破坏我们，政治决不因为我们不去管他，他也就不管我们了。那末，我们去做那一件事，可以脱出政治底势力范围呢？所以你要去办一种社会事业，他不是来妨碍你，使你不能成立，就是来阻止你，使你不得发展，甚或把你苦心经营，著有成效的事业，连根带株一起打翻。即使他不是专门地来摧残，而他所产生的恶影响也足以使我们底企图不能成功，现在举几个具体的例来证明：设若你要去办学校，立医院，他们打起仗来只要两炮就请你底事业化为灰烬；你要去办报纸，设若稍触他们底忌讳，不是即刻转闭，就是禁止邮递；你要去办工厂，开矿山，他们就要先把你底资本敲去一半，此外还要时时孝敬；你若想去教育人材，他们不是停办学校，就是积欠薪水。总而言之：现存的政治势力，设若不根本推倒，无论你用好大的力，在那一方面活动，他不是站在你前面来阻拦。就是跟在你后面去破坏，在这种破坏势力底下面，请你去从下面改造！请你去从各部分改造！所以我们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反过来说，就是设若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推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就不独可以免掉政治上的种种障碍，并且可以得政治上的种种帮助。但是我并不是要大家都不要办报，都不要办学校，都来抢夺政权的，我底意思是至少也不可忘记夺取政权的必要，至少也要一部分人来献身于这种活动。我又不是说把政权一夺取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一切社会事业都自然而然地要归于好的；我是说设若现存的政治，让他照这样继续下去，一切社会改造，都是做不成功的。所以我奉劝各位抱改造志望的青年，切不可蔑视政治，切不可以为夺取政权，乃是阴险政客，卑鄙官僚底行为，我们要结合无产阶级底全体，用革命的手段，来夺取政权，以为改造底第一步。

再论设若我们不先夺取政权，现存社会要使我们底改造不成功。因为现存社会底一

般心理，习俗，都是和我们底改造相反对的，不信试看下文。

要论一般社会对于改造是什么态度，先要论改造对于一般社会应取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未免太滑稽了。因为既然说改造社会，当然对于社会取矫正，打破的态度，还能取顺从的态度吗？话虽这样说，然而有许多自命为社会改造的人，而怕拂逆社会一般的恶因袭的。他们拿着"中国不适于……"这句话来反对一切。你既主张土地公有，他就说"中国农民不适于共产制度"；你主张劳农专政，他就说"中国人民不适于劳农制度。"中国人民是否适于共产制度，劳农专政，暂置不说，但是我们既认现存的风俗，习惯，制度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就要来把他破坏了，而创造一个较好的新的，断不能因为社会喜欢这个旧的，不适于新的，就仍旧地不管他，譬如一般社会心理是习于保守的，我们就决不能怕反逆社会一般心理，而不来鼓吹进取；社会一般心理是只顾目前，我们就决不能怕反逆他而不来鼓吹图久远。总而言之：对于旧社会，要取打破的态度，决不能取迎合的态度。决不能取迎合的态度；那末，我们要改造，就无往而不遇反对了——积极的或消极的。我们要去开矿，他们就说破坏了风水，取积极地态度来反抗；去乡村去办学校，他们说是教洋书，不送子弟来入学。这些从社会心理，迷信而来的障害，只要有点实地经验的人，没有不感觉痛苦的，记得我们乡村有几位热心的师范生，把村内的一个什么庙，费了多少心血改为学校，不幸五六月间接着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于是农民就聚众围那个学校，说都是他们把菩萨赶走了，以致菩萨作怪不肯下雨。其结果不独学校被拆毁，连办事的几个人，差不多有性命之忧。诸如此类，社会的因袭，妨碍种种革新改造的势力，比较政治的还要大。但是我们怎样来排除这一切反对和障害呢？用教育去开化吗？这固然是好的，然而他们不来受教育你便怎样？去演讲劝导他们吗？这也是好的，但是他们不来听，或听而不行，，你便怎样？所以于教育以外，还要讲个积极地强迫手段来行，这个手段就是用政治上的势力来压制，要做一种革新事业，若要等到全社会都觉悟了，乐于从事，而没有一个人反对的时候才敢着手行，恐怕人类底历史，早在几千年以前就停滞了。一般社会上的人，差不多都是偷安因袭的，没有一种势力在后面逼迫，他们决不肯动的，岂但不动，还要来积极地反对。我听说南通底教育，实业，被张謇很办得有个样子了，我心中不佩服张謇，而佩服南通的人民，因为他们不起来反对。后来一个南通的朋友反对我说，何尝没有人反对，就是现在还有人恨张謇，不过他拿着清朝状元，民国总长的招牌来强迫，所以拆房屋修马路，毁庙宇办学堂，破风水开矿业，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于此越信要排除社会底恶劣习俗，内为"改造"这位先生清道，非用政治的力来强迫，是不成功的。

上面是从政治社会两方面，证明若非先夺取政权，决不能达到改造的目的的；换句话说，就是改造的大事业，决不是从下面改造起或部分改造所能成功的。一般有觉悟的青年，你们切不可忽视政治呀！

然而一定有人问我道："据你上述的妨碍，只要政治一清明，就是有产阶级执政，也可除去的，为什么要无产阶级专政呢？"这个疑问也很有理。不过我上面虽只举出教育实业两问题，然而不是说社会改造，只有振兴教育，开发实业这两件事，其余都可以不做的；我是说就是极平常，极和平象兴教育、办实业这两件事，都这样受政治上社会上

的反对，还说其余的根本改造？这种根本改造，就是革有产阶级他自己底命，即使他底政治清明，他能办到这一点吗？所以我说夺取政权，要夺取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反对政治的另一派，就是无政府党人；现在应说到他们底错处了。

无政府党的人，不独反对有产阶级底政治。并且反对无产阶级底政治；不独反对过去，现在的一切政治，并且反对将来的一切政治；总而言之：他们根本地反对政治。他们底根本原理对与不对，我暂且不来批评，但是他们要以社会革命而推倒有产阶级，这确是和我们一样的。我现在只问他们不要政治能否推得倒有产阶级？有产阶级推不倒，他们一切的理想是不是梦想？根深蒂固的有产阶级，并不是两三次暴动，就可以推翻的；他们底势力，不单表现在政治上的。即使以几次暴动，成功把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推翻，然而他们为政治势力底后盾，为政治势力的源泉的其余一切政治背后的势力，就非民众暴动所能推得翻了。政治背后的势力还存在，他们是不是有恢复的可能性，我们推翻有产阶级这种大事业，是否可以说是完全成了功？若是照无政府党底理想，在几次暴动，有产阶级在政治上失了脚之后，即刻把政治废了，设若他们来运动复活你便怎样？你拿着"无强权"这个好招牌来号召，他们要以"强权"来破坏无政府党底理想社会，而谋复辟你又便怎样？让他们去运动吗？那他们老实不客气地要请你们滚开。不许他们去运动吗？那么，没有政治上的权力来压制他们，就绝对做不到。总而言之：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不可。不信试看俄国。无政府党对于俄国现在的建设，当然是不满意的，我也就让一步，不说他底建设怎样好，然而俄国底有产阶级，帝制余孽，已不能死灰复然，是不是事实？即使共产党失败，我敢断言俄国决不再返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帝制是不待说的）至多也不过是社会革命党或少数派代他内兴罢了，然而社会主义的俄国，还是自若。但是能够使俄国得到这个状态的，究竟是谁底功呢？只要不瞒着良心的说话，没有不归功于共产党底劳农专政制的。设若请无政府党来办，我恐怕现在俄国还是罗曼诺夫王朝，充其量而言，也不过是有产阶级底共和国。这并不是控告无政府党，其实一定要是这样。设使1917年3月革命后，或同年11月革命后，就照着无政府党底理想把政治都废止了，强权也不要了，试闭目一想将成什么状态？苛尔加克从东方打起来，台尼金来南方打起来，毓台里希从西方打起来，无政府党除掉扯起两根飞毛腿跑，还有什么方法？再从内面看，有产阶级底支持者技师、工匠、教员、医生、看护妇都罢业或怠业的时候，无政府党能使人民可以不穿衣，不吃饭，不能？无政府党总是开口不要强权，闭口不要强权，设若不要强权，究竟俄国要变成什么样子？在过去的俄国这样，在将来的中国亦然。无政府党诸君哟！你们不要在那里乱叫"废弃一切强权，废弃一切政治"，自鸣得意，自夸理想高尚；你们要知道有产阶级在那里暗笑你们，暗骂你们是蠢子呢！然而表面上是很欢迎你们的，他们不独不怕你们鼓吹"废弃一切强权"，并且唯恐你们不这样鼓吹呢！你们不要强权，他们好安安然然地来要；你们不要政治，他们落得来收起，向你们说一声谢。无政府党真是有产阶级底好朋友，佩服佩服！无政府党诸君呀！共产党主张宜民专政，是实实在在从实际方面想出来的，并不是空想，也不是想满足少数人底政治欲，不如此，有产阶级且不能根本推翻，还说什么建设理想的

社会！你们要自觉，切不要为有产阶级底恩人，无产阶级底敌人！

讳言政治的两派人底错处，上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再总起来说几句。

无论什么东西，总不能说他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即使这些东西的本身，都是有利的，然而因为用他的法子有差异，所以也不免生出弊病来。然而我们评论什么事，切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弊病，就没却他许多底利益，尤不能把用他的方法所生出的弊病，当做他本身底弊病，俗语说："吃五谷生百病。"我们是不是因为五谷能生百病，就不吃了，设若不吃，恐怕还要死得早点。再举个例说，我们日常生活，一天都缺不得的水火，是不是一点害处都没有？火能烧死人，水能溺死人。然而我们是不是因为火能烧人，就绝对不用火；水能溺人，就绝对不要用水呢？政治也是这样。他本身并不是一定有害的，只看你底用法如何。有产阶级拿着政治上的势力来压迫无产阶级，以维持他们底特权，固然是政治的坏处；然而无产阶级拿政治上的势力来铲除有产阶级，使社会致于无阶级的区别，就不能不说是政治的好处了。设若因为政治有时也生出弊病，就绝对排斥他，又何异于因水能溺人，就绝对不用水，火能烧人，就绝对不要火呢？无产阶级诸君呀！你们切不要信不要政治，可以改造社会的。要改造社会，非先夺取政权不可。有产阶级拿着政治上的权力，禁止你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把他们捆得死死的一点也不能活动，你们也要努力把政权夺起来，把他们送给你们的赠品，原封送还，也要把他们捆得死死的一点也不许动，然后才能照着我们底理想社会，一步一步地建设起来，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一切政治上的权力，都要归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革命底信条，革命底标语。

（原载《共产党》5号，1921年6月7日出版）

〔附〕师复言论摘录*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

师复先生传

…………

先生于1884年6月27日生于中国广东香山县。

1901年，为提倡革命计，在香山城创设演说社。后到日本留学一年，同盟会正在东

* 刘师复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和活动家。他的著作经其党徒辑录刊行的有"师复文存"、"伏虎集"、"无政府主义讨论"等书。从这里选印的几篇论文中，可大体上窥见其反动的观点和主张。无政府主义党徒文定所写的"师复先生传"，不仅说明了他的身世，也多少反映了无政府派在我国活动的概况。文中说明其个人生活琐事者皆删节。

京组织，先生为他们努力号召；等到会已成立，就回国主持香港某报笔政，以鼓吹急进主义。

……1907年，政治革命党人，准备在钦廉起事。

其时广东提督李准，摧残革命最利害，一般视革命如蛇蝎的大官僚，一向依他如左右手。先生以为不先把他除灭，革命党要举事，障碍太大了。于是携了炸弹秘密地到广州去，待暗杀的机会。有一天，探得李准要出来了，就预备在他所经过的路中，将他结果。那知先生刚刚出门，轰然一声炸弹爆发，头伤了，胸伤了，手也伤了，血泉汹涌，卒然倒地。但是先生还是十分忍痛地起来，将其他制成的炸弹，投到溺壶去，又焚毁留给家人的书信，将这些从容布置完备了，于是所谓一批狗官的走狗如警察侦探之类，才聚集起来，捉住了先生，送到医院去。先生深恐家人受惊，当时伪称三水李德山。有友人某，不愿先生死于贼手，欲与以毒药，但因为贼辈监视太严，不得下手，而先生，遂得保有余年，以为无政府主义努力。先生在医院一月，伤始全愈，但左手却被医生割断。自此以后，只能以一右手做事。办民声印刷部时，先生亦以只手排字，摇机。

……先生将伤医好了以后，官吏审讯许多回，但是先生坚不告诉真情，终于以嫌疑入狱。

……出狱后，即到香港，结合有志于单独行动的个人，组织暗杀团，以反抗强权为揭橥。所谓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先生在狱中经过种种刺激及研究以后，在此时已发生了。1907年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刺李准于广州南门，很得先生擘划的力。后来先生又欲到北京刺清摄政王载沣，经过上海，而满清已被推倒，于是往游西湖，住白云庵一月，心社的戒约就在此时创议。先生以为无政府主义，从此已有传播的机会，而当时最急要的并不是单纯的破坏，于是回到广州，发起晦鸣学舍，以提倡无政府主义。1907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法国巴黎编印新世纪周报，介绍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不过到1910年夏间，因故停刊；当时文网及密，邮禁很严，又未能输入内地，所以影响很小。等到晦鸣学舍成立，他们一面编印晦鸣录，一面选录新世纪论著，刊行小册子，于是无政府主义的种子，逐渐传播国内了。先生又以为都市太繁扰，想约同志到乡村居住，半耕半读。曾在新安的赤湾，觅得一地，从香港航行，约两小时可到；面临零丁洋，右傍宋帝陵，有田七十亩，荔枝五百株，拟名之为红荔山庄，后来又成了泡影。先生为人孤介，寡嗜欲，薄荣利，很慕托尔斯泰的做人。在1912年又和几个朋友，实行组织心社。这心社的戒约，是（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坐轿及人力车，（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他的重视人道，反对强权，废止家族，反对迷信的主张。在这寥寥十二戒条中都完全备具了。先生对于戒条，躬行实践，不肯丝毫放松。后来当生病很重的时候，医生屡次劝先生食肉，先生以死自矢，终不破戒。

……1913年，南方各省，反对临时总统袁世凯的专横，在湖口起二次革命军，国民党人，多以为袁氏专制政府推倒，党务进行必较易，加入的颇多。但先生以为以政府倒政府，终无善果，于是屹然不动，专心一意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中国很有价值的无政府主

义杂志民声，即于此干戈扰攘的时期中产生。特立独行，不废于物，这是先生最值得敬佩而为一般人所最不可及的。后来南军失败，龙济光到广州，民声被禁止，晦鸣学舍被封，袁世凯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先生于是将全部迁到澳门，继续出版二期。那晓得袁世凯令外交部照会葡国公使，李开仙照会葡领事，晦鸣录又禁止在澳门出版。当时广州政府甚至使人欲以摩托车劫先生往前山，幸先生闻讯戒备，得不遭毒手，然亦可见先生所经历的危机之多了。晦鸣录在澳门被禁以后，先生转徙数地，百折不挠，终于在上海恢复。当时勉同志文中，有“杀戮囚辱，固无政府党之乐乡”先生不怕挫折的精神，于此可见。1914年，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为实行社会革命运动之准备。成立时草一宣言，说明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及无政府党联合的必要。又刊布“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一文。一面反痛驳当时伪社会主义者江亢虎谬误，从此以后，国人对于无政府主义的真义和价值，很易了解，而无政府主义的种子，广布于国内了。自“新世纪”发行以后，中国虽然也有怀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但是没有国际间的联络，各国同志，无从知道中国同志的进行状况。先生编印“民声”以后，在“民声”中特设世界语部以为言论交通的机关，又和世界各团体各同志，相互通讯，交换杂志，讨论问题。1914年8月，复至书于万国无政府党大会，报告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传播主义的过去及其进行现状，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组织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联络（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于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始和世界发生关系，这也是不能不敬佩先生的远识的。1914年8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大罢工的风潮，先生曾著一文，指示中国劳动运动的进行方针，而归结于革命的工团主义。文未刊布，而先生已辞世。

（摘自文定：《师复先生传》，载《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无 政 府 浅 说

政府果为何等之物乎？果于吾人类有何等之利益乎？吾人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赡，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之幸乐，无取乎政府之指挥也，亦无需乎政客之教训也。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杀人行凶之军队，以侵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是故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

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野蛮之世，一二枭悍者自据部落，称为己有，奴役其被征服之人复驱其人与他部落战，互为敌国，此国家之由来，政府之从出。自今思之，无价值已甚。彼时兽性未去，固无怪其有此，固今则已由兽域而入于人境矣，以光天化日之人境，而留此兽域之产物，果何为者乎？

政客乃为之辩曰：政府之作用，将以为民御外侮平争端，而非以凌人也。则诘之曰：凡政府皆不凌人，又安得有所谓外侮？必政府本为凌人之物，然后得借御侮之说以

自饰。且以御侮言之：两国相争，必有胜败，果胜者为能御外侮为良政府乎？则其能胜者，必其能凌人者矣。今世之所谓列强皆是也。至于人民之争端，亦非政府所能平之也。夫政府所执之法律，不过集录社会固有之习惯而已。（此为近世无政府大家克鲁泡特金之说）使习惯而可敬守也，则已无所可争；既有争矣，又岂其固有之习惯所能平之者乎？争之根源固别有所在，不清其源而欲治其流，吾未见政府之能也。

今世界政府之恶已显著矣，欧美之民，已渐知政府之无用而厌恶之矣。无政府主义之发明，既如旭日当空，无政府之世界，不难实现者也。

顾世人之闻无政府说者，胸中往往有数疑问同时并起。今当有以解其惑：

疑者曰：无政府则无法律，无法律则秩序破坏而扰乱以起。释之曰：法律非能止社会之扰乱者也。扰乱之起由于争，人之有争，由于社会组织之不善，非法律所能为力。观于都市之地，法律最严密，而争讼犯罪者最多；乡野之地，往往为法令所不及，而争讼犯罪者绝少。此法律无益于社会之明证。人之生也，必求满足生活之欲望。生活之欲望在衣食住，衣食住赖乎物产。物产者，土地生之而人力成之者也。故论正当之道理，凡能出力以致此生产者，当然能满足其生活之欲望。乃事实则不然。社会之私产制度既成，有金钱者斯得最高之生活，而不必为出力生产之人。人见金钱之万能也，于是相率而金钱是争。纷纭扰攘，孳孳屹屹，无或出此。争之而得，则骄奢淫佚，视同类为牛马；不得则弱者转沟壑，狡者习诈伪，拙者卖身(奴婢妾)，卖力（雇佣及车夫），卖皮肉（娼妓），以为苟且之生活。其强悍不训者则挺而走险，以劫掠为生涯，视杀人为儿戏，于以成今日悲惨黑暗罪恶危险之社会。究其原因，则莫非私产制度为之阶，虽有法律，曷足济乎？无政府则剿灭私产制度，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贫富之阶级既平，金钱之竞争自绝，此时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既无所可争，又何扰乱之足虑哉？

或又谓人民程度不一，教育未普及，一旦无政府，未明真理者尚多，必有率其旧社会之恶，习惯以为不秩序之行为者。此说为反对急进派者最普通之论，即今日之心羡无政府主义者，亦往往怀此心理，以为必俟教育普及然后无政府可实行，因之不敢主张急进者比比然也。不知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有政府。若万恶之政府既去，人类道德，必立时归于纯美，不必俟久远高深之教育者也。何以言之？强盗劫掠，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盗之源起于贫，人之有贫，由于富人之垄断财产。富人之所以能垄断世界公有之财产而贫民莫敢谁何者，以有政府法律为之保护也，若无政府则私产制度同时废绝，世界之产物，世界之人共作之共用之，既无贫富之阶级，强盗劫掠之事，自然绝迹于世矣。杀人者，今世之所谓不道德之行为也。然杀人之原因。十八九由于争财，否则争色。财之争由于私产制度以财产为私有，色之争由于婚姻制度以妇人为私有；而二者之所可存立，又无非根据于政府之法律。（所谓民法）若无政府则私产绝，婚姻废，财与色均无可争，杀人之事又必绝迹于社会矣。又如自私自利不顾公益，亦今世最普通之不道德行为也。惟将来无政府之世，无私产；无家族，社会为个人之直接团体，个人为社会之单纯分子，人人各为社会尽力工作，所获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己与人共享受之，所作所为，无一非为己，

亦无一非为人。此时既无公私之可言，即私利亦无非公益，则不谋私利之公德，又自然人人皆备矣。其他种种，凡今日所称为不道德云云罪恶云云者，苟一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必由于恶劣之社会有以致之，而非其人之罪。无政府即所以改革此恶劣之社会，而铲灭今日所谓罪恶所谓不道德之根苗者也。至谓无政府之真理，愚民未易遍晓，此则先觉者之责任，但能将此种无政府组织之良善，用种种方法，竭力传达于众，使家喻而户晓之，自然无所谓阻力。而此事亦非甚难，盖由今日以至于无政府，其间必费多少时日，多少精神，以从事于主义之传达鼓吹。当传达鼓吹之时，即所以使人知无政府之真理。及乎知者渐众，群起而推翻政府，此时纵有少数不明真理者，无政府党人不难设法晓之。盖此种道理，非有深妙玄微之处，实人人所能知，人人所能行。最要之道德格言，不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二语。使知之固易，行之亦不难者也。倘或有一二枭悍之人，故意与众为敌，敢于破坏公理者，是谓拂乎人性，为社会之公敌，人人得而摈斥之。既能推翻强力之政府者，岂并此区区而不能去之哉？是故今日欲实行无政府，惟有竭力于传达，才者从事于鼓吹及实行之备，不才者亦请先自信之，此实为今日凡知有无政府之名词者所当留意，断不必袖手以望教育普及者也。今日教育之不能普及，由于经济之不平等；由于政府之保护私产。故有政府之世，断无教育普及之理。（欧美诸国名为教育普及，实则仍为富人教育普及耳。）且有政府之教育，大抵与自由教育之原理相反，一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盲学说盘据于人心，实无异为无政府之敌。故谓教育普及而后可实行无政府者，无异谓地球诸星尽灭而后可无政府也。

或又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共产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设人之好逸乐者多，惟取所需而不尽所能，将若之何？则应之曰："好逸恶劳人之天性"，此语盖大不然。凡人居室既久，便欲游行，苦坐既疲，即思运动。此无他，人之耳目心思四肢百体，皆有运动之本能，无时或息，故断不能无所作为，不必人之强迫也。且人类由兽域而进于人境，其最显而易见之差别，即在于两手。人之有手，即表示其天赋工作之良能。故"好动为人之天性"实可断言。至今人之好逸乐而恶劳苦则有由矣：私产制度阶之后也。私有财产之制既行，贫富之悬隔日甚，金钱之势力日大，富者驱策贫民如牛马，社会上凡百职务，为人类生存所不可一日缺者，（如农工等）富者皆不必自作，而惟贫者独任之。富者逸而荣，贫者劳而辱，不知不觉之中，遂造成社会上一种好逸恶劳之心理。（实即好富恶贫）而富者于个人一身之事，亦可以金钱买他人之臂力腿力（如仆役车轿夫等等），以代其四肢百体天然之运动，又复加以烟酒声色赌博种种懒人之生活，以消遣其无聊之光阴。为之既久，精神销烁，生理损耗，由是人身体魄脑髓天赋好动之本能，亦因之而消失；谓为好逸恶劳，亦固其所。至于贫者，终日劳苦，为社会效无量之血汗，曾不得丝毫之报酬：耕田者饥，织布者寒，造屋者无片瓦，厨夫制精美之馔，而自食乃馂余；凡劳力所得之结果，皆为富者所掠夺。无论如何勤劳，只以供少数富贵者之牺牲，而一己不与焉，而社会中多数之同胞不与焉。愈勤苦而所得之幸福愈寡，则其失望而懒，固人情所应尔。盖与其偷惰片刻，尚得片刻无聊之安逸，犹愈于盲勤以供富者之淫乐也。呜呼，此其人之罪，实贫富不平等所造成之果耳！罪恶哉金钱！幸福之蟊贼，犯罪之根苗，悉在于此。故无政府必反对私产，同时以共产主义代之。私

产既废，自无因贫而为人奴隶之人，凡人皆躬亲力役，不至习为骄奢淫逸，柔弱不能事事。且人人平等，无有富贵尊卑之别，自然无视工作为贱役之理。人人各执一业，合之而成协助之社会，凡所工作，皆以供全社会之生活，人与我同在其中，而非徒供少数人之牺牲，愈勤劳则生产愈丰，而社会之幸福愈大，亦即一己之幸福愈大，此时尚有人好逸恶劳，吾不信也。且今人每日工作时间八时至十二时不等，劳动过甚，致害生理，虽有可以省力之机器，而富者以佣价值贱之故，不肯出资购器以代人工。若共产之世，已无金钱贸易之关系，凡百工作，皆可以机器代之，人但司其机关，虽甚污秽及辛苦之役，皆无难变为安闲之事业，即克鲁泡特金所谓污秽之矿坑，亦可使之精美与大学之试验所相等者。盖既无资本家之靳其金钱，自然事事皆可利用科学之结果。而所谓文明之幸福，不至为富贵者之专利品。劳力与时间同时并省，无所谓苦，盖惟有乐耳。试观今日之世，富贵者逸乐不事生产，以大多数官吏政客商贾海陆军人律师警察奴隶娼妓盗贼流氓乞丐棍徒以及全人类半数之妇女（凡以上各种无益于社会生活之人，统而名之曰游民），所需之衣食住，均责之于农工两类之人，工人之中，又耗其一部分于无益之物及杀人之具。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世界人类职业之统计，难得确数。然以上所指游民，必居农工两类之三四倍。平均计之，即以一人而供三四人之所需，亦即以一人而养三四人也。是今人大多数皆见养于农工者，而反视农工为贱役，农工所得之幸福，必不及各种游民。冤哉不平之社会。）焉得而不劳。若彼时人人工作，苦乐平均，加以各事利用机器，又无战舰炮台军械等等耗损，人人皆从事于人生正当之工作，其时物产之膨胀，必不可思议。据法国无政府家某氏统计布算之结果，谓将来每人每日作工二小时，已足供社会之所需，今姑假定为一倍之数，每人每日作工四小时，时间短小，工事轻易，劳动之苦脑将变为游艺之幸福矣。今人逸乐无聊亦往往为游乐旅行游戏体操等等消遣之事。然则每日作工数小时，亦不过消遣之事耳。又何不肯作工之足虑乎？

又有虑无政府时代人类既无竞争，社会将无进化者。不思进化乃天演之原则，向上为人类之公性，断无退而不进之理。世界之进化，全赖科学，今人之发明科学，岂皆为竞争私利计者？盖大抵怀改良社会图谋进化之心耳。顾今日发明科学之所以难能者，则以有私产之故。人非富者，不能得最高等之教育，既得之后，又以谋衣食之故，暇时无多，而机器试验之助力；亦非有资本者不能。欧美科学研究会，及科学发明家，往往借富人之资助；此科学为金钱所操纵之明证。若行共产，则教育平等，人人皆有科学之智识，所谓发明，非复少数人所专有之事。每日工作之时既短，研究之时自多，复人人可得试验之器械，斯时凡思想之缜密者，必能潜心研究，科学之发明，比之今日，将有一日千里之势矣。且今人困于私产制度之下，日谋衣食，但求得多金而已足，其猥琐龌龊之态；不可向迩；若彼时则生活丰赡，处于协爱之社会，思想必异常高尚，无有不思为社会谋幸福者。何不进化之足云？

此外又有一最普通之疑虑：即恐一国无政府，他国遂从而侵割之是也。疑此者大抵习惯于有政府之下，迷信政府为万能。而不知政府亦人耳，非有万能。所谓御侮者，不外倚赖军队，军队习惯于服从命令，已无独立性质，一旦驱以御侮，其视听命令之心，必重于御侮之心，故不足恃。若人民自为防卫，纯由于保障人道抵抗强权之公理，故必

视政府之军队为有力。观于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以平民抗拒联军；1808年西班牙人战退了拿破仑第一；此得以人民抵御外侮之最著而有征者。是可见御侮不必久练之兵，而以军国主义为名提倡扩充军备者，皆不过为政府之私利，而非专以御侮也，不宁惟是，平民既有推倒政府之能力，可以胜一国之军队，即可以胜他国之军队。且无政府党无国界，既推倒一国之政府，且将分其余力，助他国之无政府党以推倒他国之政府。今日无政府党已遍布各国，一国之政府去，其他各国之无政府党必相继而起，各谋去其政府。此时凡所谓政府者，方自顾不暇，岂有余力以侵略无政府之国哉？试观今世所称司战大神之德皇维廉第二，对于无政府党尚为之恐怖，至有"无政府党能合万国为一团体，各国政府不能合万国为大同盟，"之言，于此可见政府之为远出人民之下，显然无疑者也。

以上反复申论，皆所以证明无政府主义不但理论正确，且必可以实行。然则闻斯说者又何庸鳃鳃过虑乎？

一九一三年八月

（摘自《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

何为无政府共产党乎？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果何在乎？试以简明之语条述之：

（一）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悉数取还，归之社会公有，废绝财产私有权，同时废去钱币。

（二）一切生产要件，均为社会公物，惟生产家得自由取用之。（例如耕者自由使用田地及耕具，而不必如今日之纳租与地主或受雇于耕主，工业者自由使用工厂之机器原料以制造物品，而不必如今日之受雇于厂主。

（三）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皆当从事于劳动。（如耕织，建筑，交通，教育，医药，保育，以及其他等等，凡人类正当生活所应有之事业，皆为劳动。）惟各视其性之所近，与力之所能，自由工作，而无强迫与限制。

（四）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亦均为社会公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一切幸福人人皆得共同享受之。

（五）无一切政府，（无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凡为统治制度之机关，悉废绝之。

（六）无军队警察与监狱。

（七）无一切法律规条。

（八）自由组织种种公会，以改良各种工作，及整理各种生产，以供给与众人。（例如长于农事者可联合同志组织农会，长于矿业者可组织矿会。）公会之组织，由单纯以至复杂。惟组织某种公会者，即为某种工作之劳动者，而非首领非职员。任此者亦视为劳动之一种，而无管理他人之权。会中亦无章程规则以限制人之自由。

（九）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

（十）儿童满六岁以至二十或二十五岁，皆入学受教育。无论男女，皆当得最高等之学问。

（十一）无论男女，由学校毕业至四十五或五十岁，从事于劳动。此后休养于公共养老院。凡人有废疾及患病者，由公共病院调治之。

（十二）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道德上人人自由，无所谓义务与制裁，使"互助"之天然道德，得自由发达至于圆满。

（十三）每人每日劳动时间，大约由二小时最多至四小时。其余时日，自由研究科学，以助社会之进化，及游息于美术技艺，以助个人体力脑力之发达。

（十四）学校教育，采用适宜之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之不同语言文学，而远近东西全无界限。

以上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之最终目的也。欲达此种目的，当用以下之手段：

（一）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务使多数人晓然与吾人主义之光明，学理之圆满，以及将来组织之美善，及使知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

（二）当传播时期中，各视其时势，与地方情形，可兼用两种手段，既所以反抗强权，伸张公理，亦所以激动风潮，遍传遐迩，无异迅速有力之传播。

（三）公民大革命，即传播成熟，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及资本家，而改造正当之社会也。

（四）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故吾党万国联合，而不区区为一国说法。现在传播时代，各同志各就其地位之所宜与能力之所及，从事于（一）（二）两种方法，将来时机既熟，世界大革命当以欧洲为起点，如法德英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均已传播极广，一旦起事，或数国合举，或一国先举，其余诸国必皆闻风响应。工党罢工，军队倒戈，欧洲政府将次第倒毙，吾党之在南北美及亚洲者，亦当接踵而起。其成功之迅速，必有不可思议者。若就今日中国言，则最要者莫如急起直追，致力于传播。庶免欧洲一旦有事，而东方传播尚未成熟，反足为世界进化之大梗也。

以上又即吾党用以达吾人目的之手段也。

抑诗人对于吾党主义，往往多所疑虑者，无非以为"难行"而已。或则疑今日人类之道德不齐，一旦无政府，必有种种纷扰，及规避劳动任意夺取需要品之流弊，或又疑大地人类众多，传播势难普及，各国政府之强权，终非少数之无政府党所能敌，此两种疑虑，大抵为今日一般人所通具者，今当有以解释之：

1．吾人已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须先传播吾人主人，要求平民多数之赞成。倘多数人晓然于此主义之美善，则少数人之未明晓者，感之固自易易。曾何患其纷扰？况无政府之人民，非必具有若何高深难行之道德。无政府之道德，不外"劳动""互助"而已。二者皆人类之本能，非由外烁。但使社会改善，生活之状态日趋于适，此种天然之美德，必能自由发展。且彼时之劳动，乃最愉快之事，非如今日之苦恼者也。科学发明，复无金钱之束缚，凡事皆可使用机器，无论何种工作，必求其轻捷省时，合于卫生。故每日数小时之工作，无异于体操游艺，人亦何乐而避之？夫既有机器

之迅速，加以作工者之众多，生产之丰富，当不可思议。需要品惟有过多，无虑不足。又何所用其夺取？倘仍冥顽强暴之人，必欲他人为之服役，而已则饱食安坐者，吾人当本反抗强权之大义，摈之社会之外，彼少数人岂能为患哉？

2．凡事不合天然之公理者其传播难。今无政府共产主义，实人人良心上所同具之公理，其传播又岂极难；但视吾人之毅力何如耳。试观欧洲无政府主义之出世，不过六十余年，党人从事运动传播者，不过四十余年耳。然今日欧洲各国已异常发达，近十年间，其进步更有一日千里之势。无政府之团体，偏布各地，无政府之书报，汗牛充栋。在中国人闻而咋舌者，在欧洲则已视为老生常谈。今日万国无政府党大会于伦敦，已预定有万国联合机关之组织。万国革命之实行，且将不远。尤可喜者，欧洲社会，除资本家外，即是工人，今日之工党，脑中皆中深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义理，观近年工党之活动，即为无政府实行之朕兆。政府所恃者不外军队，而各国皆行征兵制度，当兵者亦无非平时之工党。故在数年前，已常有政府调共禁压罢工，而军人均不肯从命，甚或倒戈相向者，盖不肯为政府以攻其兄弟朋友也。然则将来一旦大革命起，军人亦将反抗政府，此实可断言者。彼食肉之政府与资本家，何足惧哉？若就中国今日情形论之，此主义之传播，诚不若欧洲之广，然吾东亚同志，苟能群策群力，牺牲二十年之时光，竭力从事于传播，吾敢决吾主义行将偏布于东亚大陆。此时欧洲之进步，当不可思议，实行之时期，必为吾人所亲见，慎勿视为不可实现之理想也。

鸣呼，欧洲战云，弥补天地，以亿兆人之生命，为彼富贵者之牺牲，府之罪恶，至是而完全揭露矣！战事完结之日，即为宣布政府资本家死刑之日。无政府风潮，必将汹涌而起。愿吾东西平民，急从好梦中醒觉，奋步疾追，幸勿瞠乎落后也。

一九一四年八月

（摘自《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

1914年7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聚会既华，乃公布宣言书于众曰：

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府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

资本制度者，平民第一之仇敌，而社会罪恶之源泉也。土地资本器械均操之不劳动之地主资本家之手，吾平民为服奴隶之工役，所生产之大利，悉入少数不劳动者之囊橐。而劳动以致此生产者反疾苦穷愁，不聊其生。社会一切之罪恶，罪不由是而起。故吾党誓歼此巨憝，废除财产私有权，凡一切生产机关，今日操之少数人之手者（土地工厂及一切制造生产之器械等等），悉数取回，归之社会公有。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无男无女，人人各视其力之所能，从事于劳动。劳动所得之结果，——衣食房屋及一切生产——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

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蟊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故政府必废，将来之社会，各个人完全自由，无复一切以人治人之强权，是之谓“无政府”。行无政府于共产社会，是之谓无政府共产主义。

抑“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斯时也，社会上惟有自由，惟有互助之大义，惟有工作之幸乐。

吾人所欲实现无政府共产之社会，所用之唯一手段则曰“革命”。（革命者，非但起革命军之谓之也，反持革命之精神，使吾平民自己之实力，以与强权之战斗之一切行动，皆曰革命，）对于真理之障碍物，以“直接行动”铲除之，无所容其犹豫。

吾党乃宣言于支那之平民曰：无政府共产主义，乃光明美善之主义，出汝等于地狱，使入正当愉快之社会者也。“无政府”乃社会进化必至之境，近世纪科学之发明，与夫进化之趋势，皆宛与无政府之哲理相吻合。故谓“无政府”为理想世界无从实现者非也。无政府之社会，人人自由，人人自治，以独立之精神，以互助之大道，其组织之美善，必远胜于政府之代谋。故不必虑无政府即秩序扰乱也。无政府党万国联合，不但为一国说法。故中国无政府他国必来干涉之说亦不必虑也。吾人之反对资本制度，乃主张废除资本之私有，非但反对大资本家而止。故中国尚无大资本家社会革命非所急务之说亦不足以阻吾人之前进也。人类之罪恶，实生于社会制度之不良，吾人改造现社会之组织，即所以灭除人类罪恶之根苗。改造社会，同时即改造个人，故人类道德不良不可无政府之说亦无由成立也。总之无政府共产乃人类天然生活之本则，社会进化之要道，亦为20世纪不可避之趋势。吾人可无庸疑虑者也。

又宣言于支那之同志曰：无政府共产之实行，赖乎吾党之实力。而欲增进吾党之实力，则联合全体，一致进行，实为今日惟一之要务。凡我同志，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相同者联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为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联合会未成立以前，则以本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各使散在各地之同志，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

又宣言于世界各国之同志曰：“万国联合”，已为吾党今日一致之趋势，吾人虽不敏，窃愿互相携手，向此同一之途径而行。当支那无政府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暂以吾社为交通机关。凡世界各国吾党之团体或个人，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凡吾党之国际的行动，本社同人愿勉力担任之。

我辈向前进！

无政府万岁！

一九一四年七月

（摘自《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晦鸣录发刊词

二三人相聚读书论道于一室，名之曰晦鸣学舍，又取其所读论者借铅椠纸墨布之于外，从而名之曰晦鸣录。其在宇宙，直微尘耳，非所敢列于当世报章杂志之林也。虽然，真理之在天地，本无所间于远近大小，惟潜心澄虑不为物蔽者乃得之。故二三人其势虽微，苟能以正确之真理为准的，不篰于一家之学说，不篰于一党之督见，独立不倚，以达吾良心上之是非，其所言乃往往足以代表真理，而为人人心中所欲言。斯则所谓“平民之声”矣。

“晦鸣录”即以平民之声自勉，其言论即直接为平民之机关。今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推原其故，实社会组织之不善有以致之。欲救其弊，必从根本上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社会一切强权，而改造正当真理之新社会以代之，然后吾平民真正自由之幸福始有可言。“晦鸣录”所论列，即悉本此旨。斯非了亮优美之平民之声乎？

今敢约举所记载之纲要于下：

共产主义；

反对军国主义；

工团主义；

反对宗教主义；

反对家族主义；

素食主义；

语言统一；

万国大同。

此外凡一切新发明之科学，足为生活改良人类进化之母者，亦得附载，并以希望语言统一之故，特设“世界语部。”一方面传达世界语于支那，一方面披布支那社会之真相于全世界。复以世界语及华文两者征集文件，互译而并载之，使东西两文明日益接近。行将导东亚大陆之平民与全世界之平民在携手而图社会革命之神圣事业。支那泱泱大国，固不乏深识远虑之士，其诸有以教我乎？

一九一三年八月

（摘自《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

按：此次如火如荼之风潮，劳动界之进步，一似有不可思议者。殊不知非也。罢工要求加价之举，各业均常有之。即以上海之漆业水木业论，十年以来，行此者以不下数次。此次风潮，亦不过循其庸腐之古方而已，并非于劳动界所处之地位有所觉悟也。故

所执以为要求之理由，与夫所用之手段，亦皆最旧之故技，而未尝有所进步。如结队游行时，或手执香火，或肩负神牌，或提高鲁班先师之灯笼。如此等等可笑之举，不一而足。以是之故，社会上一般人均轻视之以为无意识之举动，官吏则指为流氓痞棍所煽惑，故卒未由得良好之结果。考其原因：实由工人智识缺乏之故。工人现在所处之经济地位，实为人类以下之地位，愈贫愈愚，于是工人之智识程度，亦几几乎退至人类以下。凡此实"资本制度"为之贼也。故工人欲增进自己之生活地位，第一须增进工人智识。然方今资本压力重于万钧，欲增进工人之智识，又不能不先有团体。于是本报所竭诚献议于中国一般之劳动家者，不外六字，曰"团团体求智识。"各行各业之劳动家；皆当独立一团体，名曰某业工团或工会，大略如向来之公所会馆，惟惟广而改良之，且绝对不宜与资本家所立之公所会馆同处一地。（向来工人方面，多有为资本家利用而行同一公所者此最为受愚之事。）团中费用，由会员每月纳最微之月金。若人数太少之行业，可合二三行或三四行而为一工团。团中最要最急之事，即为平民学校，每行至少设立一所。人数众多者当多设之以为会员及会员之子弟求学之地。教授或以夜半或以星期日、当各相其地方及行业之情形而异（参观答悟尘书）。其人数众多会费收入较丰者，可兼出一工人报，复由各分业之工团，联为一工团联合会，或曰总工团，以为全体之交通机关。此城之工团，当与他城之工团时通声气，互相联络。工人之智识既渐渐增进，团结力亦必日见进步。及乎势力既厚，声气宏大，资本制度之死命，将由此工团操之矣。

顾此种进行，有当注意之点三：（一）此种工团之根本目的自然为反抗资本制度，惟今日工人智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目前之要图，实在乎多设平民学校。平民学校无论何人皆可举办。惟由工团为之，则其事轻而易举也。迨乎工人之入学者渐众，工人之自觉心发生，然后乃可以与资本家抗斗矣。至于最普通之条件，为今日所可行者，即要求增加工价及减短工作时间是也。二者皆社会革命时机未熟，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法。工价当就各地方之生活状态得一略优之率，工作时间当以每日不得过八时为限，而星期日休息，尤不可无。此为工团设后可以次第要求者也。（二）工团之组织吾无政府党及社会党皆当为之鼓吹，且加以赞助，惟仍当以各业之工人自为主体，吾人但予以指导，以养成其独立战争之能力。更当由小而大，由简单而复杂，先从各业作始，然后联络各业而组织总机关，万不可徒骛虚名，苟且立一总工团或工党本部之名目。其实空无一物，徒呼号奔走，耸恿各地方，设立支部，此等无实力之团体其收效必不良，且往往为不肖所利用。前年上海之"工党"即作此弊也。（三）工团之宗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味。如英美等国，皆有劳动党加入政界，为政党之一，遂为一般无耻之政客所利用。而各国之工人，亦往往受社会民主党之煽惑，皆以政治思想未罢脱净尽之故。法国总工会章程第一条曰："本会宗旨，在保护工人道德上经济上各种权利，此会组织纯立于政治之外，惟持工人自己之实力，灭除贫富之阶级，不得以工会之名目及势力，协助政治家，而为运动选举者尽力。"不恃政治而惟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是即用革命手段以反抗资本制度也。是可见革命的工团主义之精神矣。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病中作

（转自《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

我亲爱的同志乎！吾党在欧洲之现状，诸同志知之稔矣。若其在东亚之实况若何，则知之者必居最少数，且即知之，亦决不能详。吾于是知君等之亟亟欲闻吾东方同志之报告与意见也。此次大会，吾人未能躬与其盛，殊为抱歉。然窃喜得乘此机会，陈述中国无政府党之短期历史及吾人之主张与夫对于大会之意见于我最亲爱而尚未能握手之诸君之前。诸君幸少留意。

当中国未革命之前，人民言论行动绝对不能自由，故凡革命党多必避居于东西各国，以是之故，得吸受各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思想而转贩于国人。1907年6月21日，吾党之在巴黎者始发刊华文无政府七日报，名曰“新世纪”，主笔政者为李石曾君，是为吾党第一之言论机关。同时在留日本之张继刘光汉等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于东京，与日本党人幸德秋水辈游。是会不但研究社会主义，实研究无政府主义者也。至次年刘氏复密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是时东京之中国留学生数以万计，张刘以著名之革命党，提倡斯道，以故留学生社会中，对于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诸名词，颇耳熟而能详，惜其时学生之思想，大抵亟亟于种族革命政治革命，而对于社会革命之义理，不免冷淡。未几刘氏返国而为端方之幕宾，张氏亦去东京而走巴黎，于是东京社会主义之声响阒然沉寂，而巴黎之“新世纪”遂为独一之机关矣。“新世纪”继续出版者三年，编辑李君不但热心，且精研学理，多与法比党人游，凡克鲁泡特金 P. kropotkine及其他诸大家之著述，时时译为华文，复别刊传播小册子多种。虽当时满洲政府文网綦密，邮禁殊严，“新世纪”绝不能输入内地，然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种子，实由此报播之矣，至1910年4、5月间，竟以他故停版，至今言之，犹为惋惜。李君现仍居巴黎，潜心译著，欲以科学教育灌输无政府主义，欧洲之中国留学生感受其思想者殊众。

1911年10月，中国革命军兴，南方各省次第独立，江亢虎乃在上海发起“中国社会党”其党纲有八：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就表面观之，颇类社会民主党之主张。惟江氏宣言非政党，且不运动选举，而对于资本制度之解决，则只主张遗产归公，而不主张土地资本公有，又批评共产集产已为均不可行，而仍赞成自由竞争，此则视社会民主党为尤下者也。尤异者，江氏尝自称主张无政府社会主义，然忽又批评无政府以为不能安居不能进化，又谓无政府党采用强权，其矛盾而可笑于此可见矣。

1912年5月，晦鸣学舍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灌溉而培植之，刊布多数之印刷品，介绍其学说于内地，一时风气颇为之披靡。凡一般研究社会主义者，皆知无政府社会主义之完善，且知国家社会主义之无用矣。

无政府之思想既渐发生，故是年（1912）10月“中国社会党”大会时，遂有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两派提议分离，惟江亢虎则骑墙中立，提议在“中国社会党”之

内，分组两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无治党”一“中国社会党之民主党”两党皆冠以“中国社会党”之名，皆须奉其所订之八条党纲（前所举），其说颇堪发噱。开会后无人赞成，两派分离之议亦无结果，卒有愤愤乐无等宣布脱党，别组一“社会党”主张一实行共产，二尊重个人，三教育平等，四破除国界，五破除家族，六破除宗教，其思想及其组织虽与吾人见解微有出入，然不能谓非昙花一现之无政府的社会党也。惜发起仅一月，即为袁世凯所禁止，不能自由运动矣。

1913年夏间，袁世凯复借内乱之名，解散“中国社会党”。袁氏之骄横暴戾，固不待论，而“中国社会党”亦以分子复杂实力缺乏之故，一经风潮，立即瓦解，当是之时，全国之中，硕果仅存者惟一广州之晦鸣学校耳。风雨飘摇，传播事业仍孜孜不已。至是年8月28日，其机关报“民声”乃乘南北战争风潮最烈之时而出世，直接鼓吹无政府主义，仅出二期，遂为龙济光所禁止，并封晦鸣学社。袁世凯及黎元洪且通电各省拿禁。诸同志出走澳门，期继续吾人事业，而彼等复怂恿葡人干涉，“民声”不能公布，虽曾在澳秘印两期，然侦缉过严，举动悉不自由，不得已复去而他适，“民声”得续刊至今。

最近一二月间，上海同志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本社之设，一方面传播主义，一方面联络世界同志期为一致之进行，又一方面则鼓励内地之同志各就其所在地设立传播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及实行革命运动之预备，此则本社之目的也。

此外如常熟则有无政府传播社“Antauenghis la Venko”，南京则有无政府主义讨论会，广州不日亦将有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团体成立，凡此皆足为传播机关者。至言论机关除“民声”外尚有“正声”出版于南洋，在中国工人中传布颇广。

以上即中国无政府党十年来之历史及现在之实况也。

无政府主义之在中国，所谓襁褓时代之婴儿耳，吾人述之亦殊滋愧。然而无足怪也。当满清时，国人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遭最痛苦之苛政，受最腐败之教育（大多数人且并此亦无之）。人格全失，新思想何由发生。及其季年，欧美日本之新思潮虽渐渐输入，而其间有志者又皆岌岌于政治革命之一途，未暇留意于社会之革命。迄乎清室既倒，宣布共和，吾人以为可以乘此机会自由传播矣。不料袁氏秉政，其专制乃胜于满清，不独吾党备受摧残，即温和如“中国社会党”亦且不能相容。言论集会之自由，剥夺净尽，以吾党之幼稚，而处此艰难之恶境，其不能有若何猛厉之进步。固有由矣，是故吾党今日在中国之运动，有较欧美为易者，亦有较欧美为难者。何以言之？中国之无政府同志几皆主张共产主义，而无主张个人主义 Individuelipmo（亦译独产主义）者。思想既一致，门户之见自泯，易一；中国向无社会民主党，亦无人倡集产主义之学说，至江亢虎所倡之社会政策，则自“中国社会党”解散后，声响已寂，虽江氏仍在美洲期传播于中国之侨民，然信者绝稀，不足为吾人主义之大梗，易二。然既有二易，亦有二难。中国工人智识极低，全无普通教育，识字者稀，即或略识之无，亦鲜能读书报者，各行业虽间有工会，然绝无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故欲激发之使能抵抗资本家，颇非易事，难一；中国政府既嫉视吾党，在内地不能自由行动，吾党之书报均被禁止，官吏之难待平民，稍不如意，即加杀戮，故皆相戒不能阅读及收藏无政府书报以期免祸，

因之传播事业异常棘手，难二。虽然，吾人固绝不畏其难，抱至死不挠之精神，竭尽能力，以与境遇战斗，非至达吾目的不止。

今度大会，吾人虽未能赴会，然窃有无限之欢祝，无限之热诚，邮贡于我大会之诸同志，并欲有所提议于大会者如下：

（一）组织，万国机关——吾党万国机关 Tutmonde Organizaoj 之议，发起者已非一日，今则时机已至矣。吾党散在各国，非联合则声气不通，势力不厚，其要固不待言。然图精神之联合，不可无联合之机关，此万国机关之所由不容缓也。顾此种机关，其性质只为吾党交通声气之枢纽，而决非权力集中之主体，其职务只在联络各分会及各小团体倡导吾党事业，而无统辖各分会及各小团体之权。

（二）注意东亚之传播——此事固吾东亚党人惟一之责任，惟吾等势力幼稚，外围之压迫复酷，苟非得欧洲诸国吾党之先进，本其所经验，竭力相助，以匡吾等之不逮，则进步倍觉其难。今日无政府主义之传播略广者，仅欧洲一小部分耳，欲图世界革命之实现，不可不注意于人口极众地积极广之亚洲也。

（三）与工团党 Sindikatistaro 联络一致进行——吾人恒言无政府其目的，工团主义 Sindikatismo 其手段，明两者之不可须臾离也。近来工团党与吾党之联络，似尚未达圆满之域，吾党不可不留意。

（四）万国总罢工——总罢工之议，吾党历年运动，均未得圆满之效果，是皆吾党未能联合之故，目下奥塞战争，全欧之和平，势将破坏，窃谓宜即乘此机会与工团党及反对军备党携手运动，实行万国总罢工。则吾等之进步，必有一日千里之势。

（五）采用世界语——吾党散在各国，言语不一，此实为不能联合之一原因，窃谓宜采用世界语，以收语言一致之效。凡吾党之正式文字，均以世界语为主，而各国语为辅。并多结团体传播世界语于吾党（如“自由星”Liberiga Stelo 之类），多刊世界语印刷品，从事于万国传播，此举不独足收言语统一之效，且于东亚之传播有绝大关系，盖东方同志之谙世界语者颇多故也。

以上卑无高论之意见，想诸君早已见及，惟诸君有以教之。并引领以祝大会之成功。

无政府万岁！

大会万岁！

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启

（转自《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

〔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一九一九年五月）

黄凌霜*

马克思的学说大约可分为三大要点：（一）经济论，（二）唯物史观，（三）政策论。世人对于这些学说的批评多得很。那攻击社会主义的人，不必说了。（例如W.H. Mallock 所著的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hlism 第十八页说：马氏的经济学，“在现在的科学界”，正如古人分元素为四种。或如 Thales 万物皆出于水的理论之在现今的化学。）社会党，不满意于这种学说的人，也是不少。无政府党对于他的政策论，绝对的不赞成，早已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争论，更不必说了。作者批评马氏的学说，对于他的经济论和唯物史观，以德人 E.Bernstein 的批评为根据，对于政策论的批评，以俄人 Z.Kropotkin 的批评为根据。现在且把马氏学说的缺点和他的好处写出来：

（一）经济论

马氏的经济论大约见他所著的《资本论》 Das Kapital 他的演绎的经济学以余值说Theory of suplus Value 为根据。他所发明最重要的社会学原理，就是唯物的历史观。materialist conseption of history 这本书第二三两卷，是他的遗稿。后来他的朋友Engse 才将他印出来。有许多人说马氏始初的观念：——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必与生产方法相应；不然社会革命就不免了。自从古代的共产或半共产的部落解散，国家制度成立之后，新旧战争最烈的，就是阶级战争；所以社会阶级一日没消灭，这种战争一日不能停止，到了资本家的社会，就是无产或是劳动的平民，和资本主决战，而最后的胜利，却在劳动家——不对。我以为不然。为什么呢？这种现象，征诸历史事实，是的确无可疑的。马氏经济论最缺点的地方，还在他的记载，有不尽不确的地方。他所根据来做演绎的统计，有许多没有证明他所要证明的东西。他的价值说，与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上，最为重要，他的学说，所以卓然成一家言的，也不外乎这两要点。不知这两种观

---

* 本书编者注：黄凌霜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刘师复的追随者。五四运动后，他曾混入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当小组内讨论纲领时（当时北京小组曾拟定了自己的临时行动纲领），他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列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因而被清除出去。黄凌霜等还曾组织过“心社”，企图以此作为无政府主义派立党的基础；还曾出版过“民声报”等刊物鼓吹无政府主义。黄凌霜翻译了一些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并写过不少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里选录的就是他根据伯恩斯坦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对马克思学说妄加批评的一篇拙劣的文章。——本书编者注

念，在他前头的社会党，和社会学者，早巳说过了。马氏不过说得较着明白罢了。（即如强夺说 ausbeu tungs th-orie 令人信以为创自马氏。其实蒲鲁东 Prodhon 在他所著的“什么是产业？”Qu'estce que la Proupri'eté？第一章已屡言“财产是脏物”“财产所有主是盗贼”）又马氏所引以为演绎根椐的统计证明，有许多地方不特不够，也有不着边际的。此外有一极危险的论调，就是他屡次指出关于某问题的现象，后来却忘记了这些现象的存在，而犹申论不已。却不自知他后来的论点，和先前的，已有不对呢。例如资本论第一卷记载资本家增加的历史的趋势，到了最后的一部分，却说资本家减少，是一种已经成立的事实，而他的统计，又证明资本家没有减少，但有增加。至在他处，还要极力说这种事实的确当！

马氏所用的方法，还不出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之外。他虽然说过若是要这个方法合于理性，必要将他转过来，搁在一个唯物的根据之上；但是他自己却不能处处依着这个范围立论。难道马氏不知严格的唯物方法的断案，不能离事实太远的么？他的著作；本来要以科学为根据，不从预存的观念，和从表面观察所谓现社会的进化律，推演下来，以为断案；然而他最后的断案，却是一个预存的观念！简单说：马氏不过把辩证的事业，代了前人辩证的观念罢了。空想会弄坏了科学，马氏恐怕不能自辞其咎罢。

以上将马氏“资本论”的经济学不当的地方，说出来。但是他的“余值说”“工值说”，就现在看起来，他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那些劳动家所生产的东西，他们自己所得些少之外，还有许多盈余，为他人所掠夺，这是无论何人不能否认的。他的工值说，是社会主义的根据。他的信徒 Gronlünd 以此为他的“思想之母”，“Idée mére”，说得倒是不错。那反对马氏主义最烈的无政府党，对于马氏这些重要的证明，也无异辞，他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二）唯　物　史　观

马氏历史哲学的方法和原理的发明，可算是最大的创造。为学问界开一新纪元。他所说的生产者在历史进化上的重要，可谓发前人之所没发。况且他能证明他们社会机体的形式和意义的影响，所以姑无论他有时出自假托，到底可算是他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有人将马氏这种发明，和达尔文的发明相比。较马氏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Zur Kritikder politi schen okonomie 出世，恰和达氏的“种原论”同时。马氏在他的历史的哲学序中，说明社会机体进化的原理，和达氏所发明的生物机体进化的论据，很是相近。

（三）政　策　论

马氏的政策论详见他和 Engels 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书”（Manifest der Komin unistichen partei, The communist manifesto.）（马氏所谓共产主义即今日的集产主义，和他同时在万国劳动会相对抗的无政府党巴枯宁 Bukumin 自称为集产主义，

实即今日的共产主义。）这些宣言书中有十条件，可算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什么样呢？其大意如下：

（一）废除产业。

（二）一切交通机关，收归国家管理。

（三）一切工厂及生产的机器，并为国有。

（四）设立工兵，而犹注重农兵。

批评这种主张的人，以无政府党为最多。这是因为他们的共产方法，与马氏的集产方法，有根本不对的缘故。无政府党人以为国家的组织，从历史上观之，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现在教育，国教，和保护领土种种大权，都在政府掌握之中。若更举土地，矿山，铁道，银行，保险，等等都给了他，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厉害（这是克鲁泡特金 Kropotk-in 的话见英国百科全书他所著的 Anarc-hism 一条。）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且社会主义，不应当压制个人的自由。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又要设立什么工兵农兵，这不是压制个人的表征吗？此外还有他们所主张的分配问题，也有可批评之点。社会是对个人而言。既称为社会主义，那么，社会的物，概当属诸公有，不要为个人所私有，这才对的。马氏的集产说，以衣食房屋之类，可以私有，是明明尚有个人财产，根本上已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对。况且同一房屋，牛马的圈厩，既为公有，人居的房舍，则为私有，在理论上也说不过去。还有一层，他们主张按各人劳动的多寡，来给报酬。那么强有力的，将享最高的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能力微弱的缘故，或关乎生理，非其人懒惰的罪，而结果如此，还说什么幸福呢？无政府共产党想将国家的组织改变。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会社，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由单纯以趋于复杂，以办理社会所应需的事，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他们所主张的劳动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四个大字 To each according ot hiscapacity 他们所主张的分配原则，就是“各取所需”四个大字 Ty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争论的焦点，就在这个了。

马氏的学说，在今日科学界上，占重要的位置。我这种批评，究竟对不对，我可不敢武断。今更引马氏致友人书数语，做这篇的结论。他说：“我们决不学那些空论家，想以自己的主义，征服世界。说道：‘这就是真理，跪下来罢！’我们由世界自己的原理中，抽出新的原理来，我们不叫人：‘你的奋斗，是不好的，你离了他罢。你听我的话，跟着我来战斗就够了。’我们不过说明奋斗的真目的，就使他不赞成，也要自己找出一个必要达到的目的来。”作者很愿传播新思想新学说的人，都有这种态度。

（原载《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出版）

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二二年七月）

凌霜、独秀答

仲甫先生如晤：

申江别后，忽已易序，抵俄后，以邮便不通，遂鲜音候，南望天末，我劳何如？在俄经过情形，想先归诸人早已奉知，不必再叙；但其中委曲非见面不能详白。生等于十三日离满洲里，翌晨即安抵哈尔滨，是晚趁车南下，顺道往北京一行，逗留数天，即返沪上，重领教益。生此次去国，对于政治经济方面之观察，略有管见，将来拟提为论之，贡献诸国人。生未去国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尚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确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书不尽意。奉此致候。

凌霜草于京奉车上十六日

凌霜兄：

精研笃信安那其，在中国当推兄为第一人。今竟翻然有所觉悟，真算是社会改造之大幸；捧读来信，很喜，且极钦佩吾兄有自白思想变迁之决心与之勇气。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巴特金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彻，所以法国无政府党读此书后加入共产党的很多很多。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行这些理想，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这道理吾兄一定是明白了，尚请向旧日真的安那其诸同志详细解释，以免误会才好。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说很容易，做起来着实是一件艰难的大事业，千头万绪，不是容易可以实现的，尤其在中国更不容易实现；因为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不可。尊兄以为如何？

独　秀

（原载《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出版）

北洋军阀对进步刊物的摧残[1]

阴法鲁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教育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到了这时，中国人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从这时开始，起来领导、组织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酝酿新文化运动。创刊于一九一五年的"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到这时也举起特别鲜明的大旗，提倡民主与科学，并且登载了李大钊先生所写的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新青年"影响所及，全国各城市都相继涌现了新的报刊：北京有"新潮"、"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国民杂志"、"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评论"，湖南有"湘江评论"，浙江有"教育潮"，成都有"星期日"，河南有"心声"等，对新文化运动都起了导引或发展的作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更大大鼓动了人们的革命斗争情绪。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曾有这样的介绍：

"湘江评论"长沙落星田湖南学生联合会

……"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进步力量蓬蓬勃勃地起来了，社会上的反动旧力量和具有各种不同立场的派系也都有他们的刊物，固执偏见，抗拒进步力量。那时——"五四"前后出版的杂志，据我们的约略统计，共有一百六十多种，品类是非常复杂的。但全国范围内杂志的主流则是奔赴进步的方向。这一进步主流，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忌恨和敌视，在这般反动派对于进步思想用了许多方法加以打击都宣告失效之后，于是枪杆出动了，他们挟持着政治权力，向着所有带有进步色彩的舆论和报刊，实行蛮横的镇压和摧残了 。

在"五四"之前，一九一九年三月，北京政府的总统徐世昌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打击编辑新潮杂志的北大师生。信上说：

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辩难，因辩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讨论纠纷，喜为抨

[1]原载大公报一史学周刊（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

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生之幸也。

傅增湘企图恐吓反对旧势力的青年们，但蔡元培先生复信说：

敝校一部分学生所组之"新潮"出版之后，又有"国故"之发行，新旧共张，无所缺畸。在学生则随其好尚，各尊所闻，当事之员，亦甚愿百虑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纳之。……据"新潮"编辑诸生言，办此杂志之初心，原以介绍西洋近代有益之学说为本，批评之事仅属末节。……"新潮"持论，或有易致骇怪之处，元培自必勉以敬慎将事，以付盛情。……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

蔡先生批判了顽固派的"微词"，申述了支持进步青年的态度及大学里"兼容并包"的用心。接着，皖系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嗾使议员张元奇在参议院提议查办蔡元培，弹劾傅增湘，进一步威胁北大的进步分子。

一九一九年四月，反动军阀江苏省长齐耀琳下了这样一道荒谬"训令"："近阅坊间出版之著作物，间有主张破除吾国旧有伦教，毁裂吾国固有文学，以期改造社会者。……为特令各县知事转告各校校长，对于主张悖谬之出版物，严禁购阅，以黜邪说，而极品学。"① 当时上海的"民国日报"即发表评论说："卑劣至此，诚堪浩叹。……吾知此令一出，新思想出版物反因之而风行矣。"

一九一九年五月，五四爱国运动正在进行中，京师警察厅认为北京学联出版的刊物"五七"，"对于此次风潮，意存鼓荡，且词句之间弥加激切"，竟"禁止发行"（但仍继续秘密出版）。北京政府又认为"进化杂志、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洋等印刷品"，"妨害治安，败坏风俗"，"专以鼓吹社会革命、无政府、同盟罢工、共产等'邪说'为宗旨"，而一律"查禁"。

一九一九年七月，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呈报内务总长称："查见有人散布"五七报"、"成民报"、"救国周刊"各报纸，核阅内容：指摘政府，妨害邦交，论调极为偏激。……理合检同原报，呈请鉴核，转咨教育部查核办理。"

一九一九年八月，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刊载了若愚的一篇"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主张司法官的任务是神圣的，不应当作军阀的"鹰犬"。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朱深看到之后立即派武装爪牙封闭每周评论社，检查已出版的各期上的文字，竭力搜索加罪于进步分子的借口，一方面又派人到邮局检查，见有"每周评论"字样的刊物就予以扣留。检查员工作慌张，把一切有"评论"二字的杂志全部扣留，因此连上海的"星期评论"也在北京绝迹。

反动统治阶级不知道在其时的什么刊物上看见介绍"马尔格时"的学说，传播社会主义的文章，因此发了一道"内阁令"，叫警察厅严查出版物，遇有"马尔格时"的书籍，就要收没。象蠢猪一样的警官们开会讨论如何执行这项任务。一个警官提出问题："'马尔格时'和'马克思'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作主席的警官回答："一个名

①按：伪江苏省长公署训令"各校各县严禁购阅主张悖谬之出版物"，全文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什么话。"

字是四个字，一个名是三个字，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从此，北京报纸杂志上就只见“马克思”的学说，不见“马尔格时”的学说了。

一九一九年八月，“湘江评论”出了第四期，就被反动军阀湖南省长张敬尧封禁停刊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天津警察厅向北京政府内务部检送“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认为该刊内容如“告国民”、“告军人”及“非暴动”各则，“语多偏激”。教育部于是令北京大学：“亟应严饬该周刊编辑人员，嗣后务宜研讨学术，妥慎立言，勿得再有此等偏宕议论，致受法令干涉。”作贼心虚的统治阶级总在阻挠青年们接触现实问题。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反动政府下令邮局停寄“新青年”。这个问题引起“新青年”内部的不同的意见：胡适无耻地主张“新青年”要改变内容，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向统治阶级投降；假如不改变内容的话，他自己就去另办一个杂志。李大钊反对分裂，反对停办，坚持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斗争到底。鲁迅主张不必发表“不谈政治”的宣言，绝对不妥协。陈独秀这时只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在这场风波中，更显示了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坚强领导作用及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卑鄙破坏作用。

一九二一年二月，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致国务院咨呈说：“前因探闻北京大学校刊发一种报纸，系鼓吹社会共产主义，曾函请教育部严行取缔查禁，嗣准复称，已由部自行查禁在案。乃近日查得北京大学校内刊发“先驱”半月刊，内容多系鼓吹社会主义。该月刊甫经出版，若不赶速严禁，深恐为害地方。检同该月刊一分，希迅行教育部从速查禁。倘该部未便自行取缔，即由本总司令部督同警察厅，前往该校取缔。”北京大学回复：“查本校各种印刷物并无“先驱”之名，且该刊编辑者系属匿名，亦不知何人所办。”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京师警察厅致函北京大学，查禁北大新生社出版的“新生”。借口是“揭登稿件内有对于‘党军’行动迹近鼓吹情事，于大局治安不无妨碍。”

同年三月九日，京师警察厅的特务在北大沙滩一带巡查，遇见一位口操湖北音的学生携带“下层”杂志，沿街喊卖。杂志注明由北京大学第一院出版。特务们到了第一院号房，“发见此等刊物堆积甚多”，该厅即致函北京大学“迅予严禁发行”，所持理由是“内容言论，颇近鼓吹革命，赞成党军。”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京大学学生郭新启编印“共鸣杂志”，呈报警厅，警厅不许发行。九月二十五日，警察到郭新启寓所搜查，查到这种刊物，就把他拘押起来了。

〔附〕段祺瑞关于日本田中少将在苏联宣布废除帝俄侵略密约制造谬论策动破坏的报告及反苏命令

（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督办边防事务处训令第十九号令督理边防军训练处

据日本武官东乙彦抄送该国田中少将在巴黎来电一道到处查内中所述过激党列宁一派注目中国欲使投入旋涡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央亚西亚等情自应严密查禁以戢萌除函国务院转饬各省区一体知照外合行令仰该处即便转饬所属遵照原电抄发此令附抄件

督办　段祺瑞

照抄巴黎田中少将报告书要旨

过激派之列宁一派以蔑视人道正义而逞其虐待暴行为文明及自由之公敌而为文明国民之所敌视彼今尚能维持其命脉者虽原因于列强厌倦长期之战役无余力加彼以铁拳而彼之奸险手段及恶辣之传布政策亦大为有力此固世间所周知之事实被堕其术中以起大患者不少即如德意志其尤甚者也西欧诸国有鉴于此乃大加警戒过激派不易达其目的也乃注目于中东及极东就中着眼中国欲使投入旋涡其划策进行不难审而知也左之事实亦其一例

据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列宁政府曾以支那语之印刷物配布于中国及中央亚西亚其要旨曰俄国劳农政府破弃俄国帝政时代与日本及中国所缔结之秘密条约且废弃拳匪事件之赔偿及俄国在中国之所有特权劳农政府欲支那代表者商议国境与其他问题而过激派者为支那人民唯一之同盟者因情谊之关系支那人民即与过激派政府开始公式之国际关系已送此劝告于我前进军之代表者矣我军欲从沃木斯克捷克及日本其他联合诸国解于西伯利亚故正前进中

（《北洋政府督理边防训练处档案１０１７——７２》中政史资料一辑１２册）

〔附〕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关于压制旅苏华侨归国和防范苏联革命影响的文电

（一九二〇年五、六月）

其一，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

大总统钧鉴国务院边防处内务部外交部钧鉴据喀什朱道尹电称迭据俄属倭什华约麻木头专差报告现在安集延有多数旅居华民买买提阿吉五素栾阿吉等在安集延设立议会演说自由胁逼华商缠民到会该华商总义六密告该麻木头专差密报前来理合电闻敬祈示遵等情前来当经增新复电云俄过激党欲传播过激主义或分派代表各处联络或发行报纸以资鼓吹不破坏全球不止中国从共和成立八年于兹政治之腐败民生之憔悴甚于前清窃恐过激主义必将遍传于吾国至于新疆有赁回缠与俄西土耳基斯坦人种同宗教同而地壤又复相接尤易受过激派之影响据该道尹电称旅俄华缠有在安集延设立议会演说自由情事自应密为调查严为防范此等政潮断非兵力所能压制亦非阴谋所能解决全在改良政治实行民生政策庶可消患于未萌民好好之民恶恶之大学千章之精义也所欲与聚所恶无施孟子七篇之要旨也吾辈服官边境惟有以爱民之实心行爱民之善政官民一体或可以勉支危局舍此别无良法仰即知照并密饬所属一体遵照仍将防范情形随时报查为要省长杨增新佳印等语理合电陈敬祈鉴核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佳

其二，一九二〇年六月八日

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边防处参谋部陆军部外交部内务部钧鉴本年五月卅日接准外交部艳电开英使函称据喀什领事电有华人数百名在俄属费尔干省受过激党委托将军械散给该省及附近地方华人意图在新疆鼓动革命已受过该党军械及创办经费百数十万卢布并以此事已转达本处道尹等语究系如何情形希迅饬查明严加禁阻以遏乱源并电复等因准此查俄属安集延及塔什干等处华侨设立议事会演说自由各节前迭据喀什道尹瑞墀来电当于五月佳真文巧等日转电政府并电令朱道尹严加防范各在案施于五月廿八日复据朱道尹电称顷接塔什干华商总会密派专差窝斯泼瓦墩报称现在倭什华侨亦设立议事会该会内有由莫斯科来之汉人二百余名陆续尚到来者其形迹多系军人如中国红胡子之类又有由喀什潜逃之会匪湖南人张开元亦入会内并迫令华侨回缠一律入册各正经华人万分惊慌请作主等语除详情由邮陈外恳祈核示等情适俄新党政府派来代表已到伊犁当即电饬伊犁道尹许国桢等设法调查其文曰据各方面探报旅俄安集延塔什干等处华侨受人煽惑纷纷设立议事会开会演说自由冀图破坏中国沿边一带秩序又据报称塔什干所设议事会内有由莫斯科来到之汉人二百余名陆续尚有到来者其形迹多系军人并迫令华商一概入会各等语查华侨设会

虽在俄国而其内容则系受俄过激派之影响并有该派暗助华侨以冀实行破坏我国边局之说如不事先预防不但于边局安宁有莫大之危险亦恐于中俄商务有无穷之妨害现住伊犁俄代表即系由过激派政府派遣而来难保其不知此中内容可由许道尹就近与俄代表密商请其转陈该国塔什干政府设法取缔以免发生事变仰即体察情形酌办具报等语拍发在案去后兹据许道尹复电称奉电悉华侨受俄过激党影响在俄各处组织党会一节前在俄七合省崴而两城亦发现此项事实均系喀什缠民开会鼓吹将商约阿皮孜及其家属并富商十余家一并监禁经道尹在霍城向俄新党代表玛里宁等提出抗议始行释放未几俄新党复行鼓惑华侨将商约阿皮孜等再行监押当经鱼电呈报嗣于五月七日接奉麻电复派通晓俄文学生顾德善赴俄萨玛尔籍接洽俄新党商务员之便先要求将拘押之中民及财产迅即释放发还该俄商务员等当即电询塔什干据复业经释放并将为首滋事之华侨五人监押道尹于此次谈判时曾提出关于该党以文字或语言煽惑中民之事切实质问该代表等答以绝对无有倘有发生此项事实即当以中国军法处置等语该党居心叵测未可遽信兹奉前因理合呈复等情前来增新查此项过激派以平等自由为宗旨以不分官民阶级为政策以不分国界不分种界为标说当此民穷财尽人心思乱之际最易被其煽惑中国人民贫多富少易乱难治加以改革以来九年于兹政治则愈趋愈下民生则益困益贫木蠹虫生蚁穴堤溃吾恐过激主义始则侵淫于边地继则蔓延于内省终且普及于全国横流即决狂澜莫挽大乱将至言之痛心现在补救办法惟有内外一心及早改良政治实行民生主义以系人心而维国本庶可消患于未萌若不速从根本解决惟竞争个人之权利不复问大局之安危其极也民变而不知有官兵变而不知有将俄国前车可以为鉴兹据各该道尹所陈各节则知英使所称华人受过激党委托诱令各处华侨串通边民鼓动革命等语不为无因而由莫斯科分赴沿边之汉人二百余名尤应严防盖西藏独立外蒙独立皆有汉奸为之作俑新疆若无汉奸则回缠尚可相安未必遽叛祖国也现由增新一面饬属对于奸宄则严加防范对于边氓则善为抚绥标本并治以图补救断不使发生事变贻政府西顾之忧理合详细电陈敬祈鉴核新疆省长兼督军杨增新齐印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37》中政史资料一辑12册）

〔附〕美国和北洋政府勾结查禁革命报刊的有关文电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其一、江苏交涉员致内务部呈文

（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日）

呈为陈呈事准驻沪美领事函称查本年三月廿六日贵署致驻沪领袖领事函内附有某种印刷品目录清单一纸其内容系关于中国境内之过激党主义未悉尊处可否将此项书件检送

敝署相应函询倘能觅获所有费用若干本总领事自当欣然担负拨还贵署并希各种各检三分饬送敝署若不能取得三分则每种各运一分来署无不感激之至等由卷查此事前准
沪海道尹咨称奉
江苏督军省长令开准
内务部咨准国务院据报俄国列宁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社会革命党颇为活动查得过激派传播印刷物并来华之德俄人姓名开送清单请为转行查禁等由当经前杨交涉员分别函致领团查禁在案兹准美领函索此项书籍沪地无从设法觅取理合据情转陈
钧部如曾觅获此类存籍拟恳酌寄数册以便转给是否有当仰祈鉴示遵切为公便谨呈
内务部

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83》）

其二、美国芝加哥宪报访员亨德对遏止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说帖

国务院致各省区督军等电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日）

各省区督军省长都统鉴密顷接美国芝加哥宪报访问员亨德关于防止过激主义说帖一件内称为中国计预防止过激主义之鼓吹首在监察与中国人民有特别关系的俄人禁止过激主义之书籍监视东清路界内之华工其中国人曾服务激党而回国者因其接近国人较易尤须严为约束等语查所陈不为无见堪备采择特电查照希即饬属严密防范为要院灰印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87》）

其三、内务部致上海交涉员电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交涉员鉴密关于过激党煽惑印刷品闻上海英法美等领事因检查甚为严厉并派有暗探轮流检阅各小说书店及邮电机关此种办法是否专行之上海一隅有无具体规定施行手段如何统希就近确探详细电复为要内务部经印

其四、交涉员许沅复内务部电

（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

北京内务部钧鉴前奉经电以上海英法美等领事团检查过激党煽惑印刷品有无具体规定饬

确探电复等因奉此迭经派员探悉两租界工部局均于上年设有特别机关时派探在租界内注意侦查凡于过激主义有关之事件立即查办至各种印刷品出现时先行购阅如有涉及过激者即行禁止送公廨办理邮电事件捕房不能派探检查据云并无具体办法等语合仅电复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叩元印

（《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41》中政史资料一辑15册）

〔附〕国务院关于拟订惩治“过激党人”专条案致内务部公函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经启者奉

大总统发下步兵统领王怀庆呈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恐酿事变拟请饬订专条从严取缔以保治安文一件附印刷品六件相应抄录原呈并检同附件函达贵部查核办理可也此致内务部

呈为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恐酿事变拟请饬订专条从严取缔以资遵守而保治安恭呈具陈仰祈钧鉴事窃维言论自由原属法律所赋予而主张越轨亦为法律所不容拔本塞源事贵慎始燎原星火忽则必张窃以国家成立之要素有三曰土地人民统治权所谓统治权者命令强制人民即治者统治被统治者之权力也破坏统治权即破坏国家破坏国家即为人民之公敌乃自俄国扰乱以来社会无政府共产主义传播中土过激潮流方兴未艾而首都重地竟有散布印刷传单书册等件任意煽惑劳工主张共产反抗政府邪说横行其祸甚于洪水猛兽外省地方亦多有此项文字鼓吹查社会无政府主义原系欧洲一不良学说各国政府以其有碍国家政治进行均严加防范以遏乱萌俄之纷扰足为殷鉴我国边境与俄毗连于是此种谬说乘机流传当此时局蜩螗中原多故南则干戈扰攘祸乱迭乘北则五省旱荒饥民遍野深恐党人利用机会扰乱治安高月时艰杞忧遏极此等越轨言论本属内乱罪范围自可援用刑律条文惟事关国家安危又未可与普通犯罪同日而语非议订专条从严惩办恐不足以资制止查民国初元各省土匪蜂起刑律惩罪未足示儆

袁前大总统转颁惩治盗匪法治乱世用重典故不数月而萑苻敛迹过激党人之言行虽不能以盗匪相衡而宗旨悖逆危害国家则有甚于盗匪之行为拟请饬下院部议订惩治过激党人专条并将为该党印刷运送之人一并拟定惩治附条提交国务会议一俟通过请以教令颁布俾使各省一体遵守而保公安所有过激党人煽惑劳工拟请饬订专条从严取缔缘由是否有当伏乞鉴核训示施行谨呈

大总统

兼署京畿卫戍总司令步兵统领王怀庆

本卷附

1 劳动音
2 一个兵的说话
3 告少年
4 怎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幸福呢
5 直隶年荒的由来
6 北方人还不该死吗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5》中政史资料一辑15册）

〔附〕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建议饬订反共专条法律扼杀革命呈稿

（一九二二年）

呈为防止过激主义拟请饬取缔惩治专条法律以杜煽惑而保治安恭仰祈
钧鉴事窃自欧战告终俄国内乱社会主义之传播为风起潮涌弥漫全球欧美各国以此等主义与国家现行政治不能相容虑其有碍社会主公安一致主张严加防遏中国为新造共和国家当此新旧蜕嬗之际人民思潮尤易受此等主义之激刺京师为国家根本重地年来竟有散布印刷传单书册煽惑劳工主张共产抵抗政府者××负维持治安之责检查所及迭与京师军警长官商榷深恐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曾于九年十二月呈请政府饬拟取缔专条在案年来彼党在中国之势力日加一日滋蔓淫寖及各省查彼党对于中国之步骤先取宣传主义其宣传之方法不敢公然用讲演而务在散布多数印刷品于四方冀此等主义深入人心则宣传之效果即以昭著此彼党在中国所用之入手办法也窃谓近年各地检查虽较前为严而对于取缔彼党办法政府尚未有专条法律无可遵守遇事则措置甚难谨再重申前请拟恳饬下院部详查欧美各国取缔彼党之办法比类参考速订取缔惩治过激党人及代党人运送物品发行文字专条法律提交国务院会议咨送国会通过即以教会颁布遵行并将取缔办法由政府照会各国公使查照与各国为同一之进行以资防止××负维持京师治安之责为京师计为全国计不惮一再陈请所有拟请防止过激主义饬订取缔惩治专条法律各缘由是否有当伏乞鉴核施行谨呈

敬再呈者查欧洲社会主义派别纷歧有国家社会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有无政府主义俄国所传之布尔塞维克派即主张共产之一种社会主义也布尔塞维克俄文译言多数又为过激故今通称为过激主义此项主义大抵原本于马克思之学说马氏之书力诋资产阶级为世界扰乱之媒而主张民众与资本家为阶级上之奋斗欧美操政权者多属资本家故

对于马氏之书多深恶之其书以科学方法阐发名理中国青年学子读其书醉心于其说理想中辄欲实现此等主义于中国野心家利用其机会乃有秘密党会之组织其机关多在东南方面通商口岸有提倡无政府者则多数崇奉克鲁泡特金有提倡共产者则多数崇奉马克思此中国近来言社会主义之派别也近闻中国共产党有一种特新计划拟与资产阶级中言民主主义者相携手而为革命上之运动缘彼党有鉴于工众方面知识之不足乃易其方针转身与言民主主义者相联合利用政治手腕以达其施行目的中国言民主主义者多乐承受之窃谓此种计划一经传播势且引起政治上无穷之纷争隐患方大深为忧之盖以中国比年内部之不能遽现统一其原虽多而就大端言之无外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两问题而已今幸国会重开此两问题渐能融合而统一和平已有实现之希望若听彼党传播其新计划将于两项旧问题外发生新问题彼党党人必乘机于各方面挑拨耸动问题愈多纠纷愈甚而统一之实现愈难且彼党利用之手腕大都注重于工人军队方面以中国工业之幼稚军纪之急待整饬使有多数党人从旁煽惑傲扰状况何敢设想此其对内之隐患一欧美各国对于中国之眼光昔分两派一为资本家多数希望中国能早日统一和平冀得安稳投资而扩张其商业此为和平统一派一为政治家利用中国内部之相争借为口实提倡共同管理以平分利权此为侵略派今当欧战告终之后各国内力不能充足故侵略主义亦不能实行且欧美多系资本家操纵政权故此两派中以前一派为占优胜就欧战一事而论实大不利于列强而为中国修明内政之最好时机急起直追犹虞弗及若听彼联合治家运动革命内部之纷扰将无已时列强见中国之不能实现和平统一也恐亦将易其和平方针而重提共同管理之前言外交事件愈难办理此其对外之隐患二有此近患二端而复旁考彼党年来进行之猛则与夫欧美各国对于彼党防遏之从严则在中国今日严重防止过激主义实为急不容缓之图××负维持京师治安之责既有所见不敢不言伏乞
钧座对于防止过激主义饬令取缔惩治专条法律即予核夺施行不胜激切待令之至××
谨再呈

（《北洋政府京师卫戍总司令部档案1024，103》
中政史资料一辑15册）

〔附〕吴佩孚仇视苏联帮助外蒙发展工业并进言检查在华苏联代表越飞来往函件电致王怀庆函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三日）

懋宣老伯尊鉴顷奉
手书敬悉一切蒙古素为我国属地捍蔽三区屏藩畿辅诚如
争论所云政治经济息息相通者也俄劳农以侵略之野心计诱外蒙组织公司专任俄国总

理适用俄国法律一切铁路矿山电气事业悉罗而置之公司独占权范围以内是何异举蒙古版图归俄国唇亡齿寒舔糠及米可惧甚

老伯巡阅王边见闻较近呈请

总统请予严查阻止诚属急要之图惟兹事得之报探已否成为事实尚难确信越飞在华应向切实责询以明真象设彼故意隐秘似可责令邮电机关检阅其往来函电马迹蛛丝必得其绪果如探报所言自应急起直追相机破毁且中俄之于外蒙犹德法之于阿尔萨斯均为国际和平之藩蔽地势至为重要侵略主义又为现今各国所不许劳农悍然为之恐友邦亦未肯容许也蒙古为我国疆域应由我国自行撤查劝禁劳农系俄国局部政府应由外交部为严重之交涉并将其计划宣告友邦期国际之赞助辱承

垂询敢贡区区是否有当尚希

斟酌行之专复敬请

勋安

任 吴佩孚拜启

（《北洋政府热察绥巡阅使署档案1025，55》）

〔附〕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等给大总统的报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

据报称于十一月七日下午二时北河沿北大第三院举行苏俄共和纪念日讲演大会此会名为中俄协进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团体所发起实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人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杨廉何孟雄罗章龙黄日葵毛一鸣阮永钊等所主办闻是日发布之传单小册子等印刷品亦有苏俄来华代表团助洋二百元借以联络学生对俄同情而鼓吹其共产主义也查是日共有四五百人莅会由青年团中人为招待员及散放纪念号之传单场中悬一全世界劳动者快联合起来啊横联届时由李守常（即大钊号）为主席宣布开会并陈述苏俄纪念日即俄国劳农政府前五年十月革命成功之历史并论中国应仿行俄国革命实行劳农专政以打倒军阀资本家及抵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而与苏俄携手进行之必要故庆祝纪念日引起吾人之感化云云继续讲演者有北大教授陈启修谭仲逵等俱言中国不平等不自由之现状非联合起来努力奋斗实行改造不足以解放而共享幸福等等论说最后为奏乐摄影及电影等事六时散会查北京现有组织之团体为革命运动而足以扰乱社会图谋破坏大局者有二（1）为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信仰克鲁泡特金学说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然组织自由契合而为大同主义者之宗旨欲推倒政府为无政治无法律宗教一切束缚之理想但北京方面该党缺乏经济之补助势力

非常薄弱人数亦在廿余名虽比较为最激烈为党亦无所施其能为仅有时发出少量之印刷品以资宣传耳如景梅九之国风报冯省三在时言报副刊及陈空三陈德荣王伯时吕传周刘果航陈树声等所发之社会运动半月刊上鼓吹无政府主义及组织世界语学会等消极行为也（2）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即过激派之集产党信仰马克思学说仿行劳农专政预备创设劳农政府集权集产于一般劳工会如苏俄现状然专鼓动工人罢工及利用群众运动以掀起大风潮为手段其近来进行甚为速顺其号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部设于上海以陈独秀为首领由俄国政府汇款及陈炯明捐助为活动上之财源北京方面各校中以北大居多数共有党员三百余人之多并于政治上极力活动且在各团体及工会积极扩张势力近顺潮流组织民权女权运动大同盟劳动组合书记部中俄协进会等团体如请愿国会宪定劳动立法更组废止治安警察条例会以引起劳工平民之同情对于各处罢工之事必派人到场鼓吹并代为拟文筹划一切今累发文言攻击政府军阀资本家并力谋中俄携手攻击外交界为亲美派而不赞同不与越飞会议默查该党潜势力日渐膨胀将为大局之害闻其中央执行部联络一般学界如胡适李石曾辈进行其所谓好政府之预备也北京青年团其主要人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邓飞雄何孟雄刘仁静杨廉郭春涛宋天放李敏羹范鸿劼阮永钊朱务善等把持事务以上该两党大略情形合函报告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5》中政史资料一辑15册）

中国共产党宣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

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要是生产工具收归共有共用了，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就自然跟着消灭。社会上个人剥夺个人的现状也会绝对没有，因为造成剥夺的根源的东西——剩余价值——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取得了。

B．对于政治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因为政权、军队和法庭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在生产工具为少数人私有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要是私有财产和赁银制度都废除了，政权、军队和法庭当然就用不着了。

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　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私有财产是现社会中一切特殊势力的根源，要是没有人能够聚集他的财产了，那就没有特殊阶级了。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

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是会使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这种势力是在那里继续增长，这正是资本家的国家内部阶级冲突的结果。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

所以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阶级争斗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因为这是以生产工具的发达为转移的。在封建国家的时候，阶级

争斗也是一样的存在；但是与在资本家的国家下面的阶级争斗是有分别的，因为资本家的国家下面阶级争斗是格外紧迫，其势足以动摇全世界。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这种争斗的增长，是历史的法则。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增雄厚。

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目的是要组织一些大的产业组合，并联合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总联合会，又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

并且当了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

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3．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

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所以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斗争也日见紧迫，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争斗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当着资本家正被打倒，开始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时候，这种状态是自然的。在一定的时期，这种俄罗斯的政况是必然的，所以这种政况在各国也是会必然的。因为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

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势力的斗争，现在在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当着各国的无产阶级还在和资本主义争斗，还没有得到胜利的时候，我们设想俄罗斯在她领土之内，单独可以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大错而特错的。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即时不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又已经推翻了，她便不得不保卫自己，抵抗国内外的仇敌，这是很显明的。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这就是说要用一个阶级的力量来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而这个阶级是要造成将来的世界，并受历史的使命，要成就这件事业。

再说罢，这并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而且这种

阶级争斗的状态，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得要经过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但是决不是说，资本主义势力的余迹，如反对革命的势力，都已消灭了。也不是说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结果，共产主义就很容易很简单的实现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

一直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生产事业也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开始活动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

《共 产 党》介 绍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的一个理论性的机关刊物。1920年11月创刊，十六开本，每期五十页左右。现在看到的有第一至第六期，出版于1920年11月7日到1921年7月7日，正好反映了党在筹建时期的情况和活动，以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理论认识，对我们研究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是有重大意义的。

自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传入中国，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被用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武器。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五四爱国运动，掀起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大规模的政治罢工走上了中国革命的午台，显示了伟大的革命力量，从而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基础，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结合。经过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革命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开了，一部分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要推动和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带到工人中间去，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和要求，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愈来愈加明显和迫切，因此1920年5月，便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广州等地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

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一方面继续在知识分子中活动，另一方面则立即开始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从1920年8月上海小组就创办了小型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对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教育工人组织起来争取自由和解放。接着北京、广州小组也创办了同类性质的刊物“劳动音”和“劳动者”。同时，“新青年”从八卷一期（1920年9月1日）起也改组为党的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开始系统地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文章，并且同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从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重要宣传工具。但是这时“新青年”仍保持着统一战线的面貌，以便于继续联系原来的民主主义读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材料毕竟还不占多数。为了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介绍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以便直接推动建党的准备工作，在1920年11月又创办了大型的半秘密性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和“劳动界”等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准备工作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它们也成了党刊的直接前身。

“共产党”月刊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根据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需要，着重地宣传了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大量地介绍了有关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形的

材料，同时继续介绍了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并译载过列宁的若干重要著作，如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它所发表的第三国际的一些重要文件和关于介绍第三国际成立情形及其意义的长文，关于“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列宁的历史”的文章，以及关于介绍俄共在各种群众团体中的党基层组织的情况的翻译材料，对于当时正在各地着手建立共产主义者组织以便准备建党的人们，是非常迫切需要的。这些材料不仅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和组织机构，提高了他们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而且给他们指出了实际行动的榜样。这个刊物还特设了“世界消息”专栏，用大量篇幅来介绍共产主义运动在各国迅速发展的情况，报导了世界各国，如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日本、葡萄牙、丹麦和希腊等许多国家共产党建立（或正在建立）的消息及其斗争的情况，并全文译载了“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另外，还登载了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罢工斗争的材料。大量刊载这些报导和材料，可说是“共产党”月刊的一个重大特点，而所有这些材料，显然对党的筹建工作是有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的。

“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及其与其他一切党派的区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方向。“共产党”月刊发表了许多文章来论证共产主义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些文章按其性质来说，实际上是对党的纲领问题的初步的、不完备的探讨。在这些文章中初步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驳斥了所谓“中国无地主、无资本家，没有阶级的区别，不能提倡社会革命”①的谬论。他们指出，中国不但有本国的资本阶级，而且有国际的资本阶级，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着最严重、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中国的贫苦农民几千年来就遭受着封建地主的最残酷的压榨和抢夺，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的田主、佃户两阶级，自古以来就有的了。”②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照着共产主义的原理”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们反对当时的省自治运动，认为这是“绅运动”，其“结果真正的平民得不到一些好处，反加多一重压制，加多一层抢掠罢了。”③他们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政策”和工会运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活动，而主张效法俄国革命，实行以工人为主的城市武装起义，即他们称之谓的“直接行动”和“无产阶级突发的群众运动”，推翻反动剥削阶级的政权，“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然后无产阶级就借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④。当然，他们当时还没有、而且由于理论水平和实际经验的限制也不可能看出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因而他们的论点有一些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他们一开始就坚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也证明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党的建

① “社会革命底商榷”，第2号。

② 同上

③ “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第3号。

④ “社会革命底商榷”，第2号。

设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

"共产党"月刊所发表的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中，有一篇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没收了第一页的残缺不全的论述农民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根据事实材料有力地驳斥了所谓中国农民都有自己的田地、"中国农民底生活并不是痛苦的，也不是受十分压制的"的胡说，指出了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尖锐的对立。作者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农民中的阶级区分，说明在中国农村有四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一）地主，在乡下叫做"土财主"，他们拥有很多土地，但自己不耕种，而是雇人耕种，或是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二）靠自己的土地、自己耕种来养活全家的中等农民；（三）单靠自己的一点土地不能养活全家，而不得不另租田主一些土地的"下级农民"；（四）是"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的田谋生活的"穷光蛋"，这是最贫穷的农民。在这四种人里面，第一种人数最少，第二种人数也少，第三和第四种人数最多，他们是和第一种人即地主、土财主直接相对立的。所以共产主义者应该特别注重、特别关心的，也就是他们的"目的物，乃是占农民全数内面的大多数的第三、四种农民。"接着作者从"佃户和田主间的分配方法"，彻底揭露了地主对贫苦农民剥削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并论述了农村土地集中和阶级分化继续发展的趋势，指出"一地方的土地，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大多数农民的日常生活、命运、生命都悬于这些少数人之手了。这就是社会上贫富的悬隔越深，阶级的区分越明，一般农民的生活越苦的原因了。"由于这种分析，作者完全有根据的断言，在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强有力的革命要求，因而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你们靠着吃饭的土地"。作者还向农民说明，地主一生下来就一点活儿都不干，坐着吃好的、穿好的，你们一生下来就象牛马一样地做工，倒反要挨冷受饿，这并不是你们的运气不好，他们的运气好，而是由于"少数自私自利的人做出来的恶制度"；他们的土地并不是从娘肚子里搬出来的，而是"从你们手里抢去的"，因此你们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完全是应该的。同时作者还向农民保证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一定帮助他们获得土地，帮助他们求得解放。这篇文章证明，在建党的准备时期中，已经有人能基本上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和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注意到农民问题对中国革命的特殊重要性，认识到"中国农民占全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① 因而在当时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到农民中去做革命工作的任务。

"共产党"月刊在对中国革命纲领问题进行探讨时，就曾警惕地注意到防止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一开始就主张采用俄国革命的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共产党"月刊除发表了象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样的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著作之外，在其他一些

---

① 以上均见"告中国的农民"，第3号。

文章中也对第二国际及各国右翼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思想、特别是他们的“议会政策”进行了驳斥和批判。他们指出，德、英、法、美等国的社会党，多采取议会主义政策作为革命手段，可是理想与事实相反，根本达不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即使无产阶级能在议会中占到几个席位，要想通过解除自己阶级痛苦的法案也是断然办不到的。这时就是不唱高调而求贯彻自己阶级的几分之一的主张，也非与资本阶级妥协不可，非得资本阶级的同意不可。“照这样成立出来的法案，无非哀求资本阶级政府行非驴非马的社会政策。社会革命的目的简直成了一种空想。”①而这也恰恰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有无产阶级底专政，然后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底专政，就一定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了。”②德国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因为它有了坚强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作者进一步指出：“我底意思，我们总不要怕牺牲、怕流血，拿着修正派（从革命到议会）的哄人自哄的话来主张议会主义。关于这一点也应该‘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照着共产党（多数派）底直接行动去做。”③在第三号“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一文中，比较深入地揭露了第二国际及其领袖们的罪恶活动，指出他们已完全背叛了革命，堕落成为“中等社会”即资产阶级统治和压迫无产阶级的帮凶，因而也就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为自己宣判了死刑。它指出：“第二国际，是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是资本家代表的组织。而第三国际是有最进步工人的万国联合会，这些工人是立志或者推翻资本主义，或者死亡的。”第三国际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战斗组织，“是被压迫的世界有希望的明星。”

“共产党”月刊在探讨中国革命纲领的问题时，所面临的主要是张东荪等假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两方面的敌人。它曾和“新青年”一起同张东荪等人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斗争，坚持中国应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不过由于这一派是公开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他们的活动一般又限于知识分子中，因而这一方面的任务主要是由“新青年”担任的。而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以社会主义自讦，而且他们有的人还实际从事工人运动，因而反对这种思想的斗争任务就主要落在“共产党”月刊的身上了。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无政府主义就传入中国，在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有人借着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因而使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较广的传播。我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长期以来又受着暴虐、腐败的专制统治，容易使人对国家、政治、法律等产生极端厌恶的感觉，所以无政府主义的流行是有一定的社会根源的。无政府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学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空想，与社会主义毫无共

① “社会革命底商榷”，第2号。

② “俄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 ，第1号。

③ 同上。

同之点。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中间横着一条鸿沟，……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个人主义理论，他们的个人主义理想是与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① 当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来宣传这种反动思想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有直接阻碍作用的。而且当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办刊物进行理论宣传，还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些地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并进而在工人中进行活动和组织工会；在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也曾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混入进来。所以，只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和深刻批判，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获得胜利，才能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在理论上更加坚强，也才能团结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这场斗争是有重大意义的。

"共产党"月刊由第一期到第五期，在社论性质的"短言"栏中，无一不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此外还有一些专门论文，如"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夺取政权"、"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也都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而发的。在这些论文和短言中，首先从正面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空谈"自由"、"正义"，而反对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他们正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到彻底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倒资本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就不会成功："要把有产阶级势力连根铲尽，非一时的暴动所能成功的，至少非有比较长期的压制不可，而要实行比较长期的压制，非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的手上来不可。"② 而且即使"社会革命成功了，政权拿在劳动阶级手里，阶级斗争仍是要继续进行……在此时期内若有人主张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杀害劳动阶级；若是劳动阶级肯把政权及自由给资本阶级，便是劳动阶级自杀。"③ 所以他们公开宣称："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阶级一天一天趋于消灭，国家也就一天一天失其效用。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是要拿国家撤废一切阶级的。"④ 他们还拿俄国革命为例来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们指出，尽管全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俄国实行围攻，而国内的贵族、资本家又到处捣乱，但社会主义的俄国依然屹立不动，并且日益发展，这是谁的功呢？"只要不瞒着良心说话，没有不归功于共产党的劳农专政制的。设若请无政府党来办，我恐怕现在俄国还是罗曼诺夫王朝，充其量而言，也不过是有产阶级的共和国。"⑤ 他们嘲笑无政府主义者开口"不要强权"、闭口"废除政治"的狂言，实际上完全是适合资产阶级的口

---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3页。
② "夺取政权"，第5号。
③ "短言"，第3号。
④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第5号。
⑤ "夺取政权"，第5号。

胃的："无政府党诸君哟！你们不要在那里乱叫'废弃一切强权，废弃一切政治'，自鸣得意自夸理想高尚；你们要知道有产阶级在那里暗笑你们，暗骂你们是蠢子呢！然而表面上是很欢迎你们的，他们不独不怕你们鼓吹'废弃一切强权'，并且惟恐你们不这样鼓吹呢！你们不要强权，他们好安安然然地来要；你们不要政治，他们落得来收起，向你们说一声谢。无政府党真是有产阶级的朋友，佩服佩服！无政府党诸君呀！共产党主张劳农专政，是实实在在从实际方面想出来的，并不是空想，也不是想满足少数人的政治欲，不如此，有产阶级且不能根本推翻，还说甚么建设理想的社会！你们要自觉，切不要为有产阶级的恩人，无产阶级的敌人。"①

"共产党"月刊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理论，指出他们的经济理论也是错误的。它指出，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则主张分散，主张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生产不能平衡，供给与需要不能适应，造成和资本主义一样的混乱状态。因此"无政府主义派主张的生产组织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差不多"。在分配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所高唱的立即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主张，也是不实际的、反动的，因为这种理想"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能办到。譬如今日行了社会革命，明日组织新社会，而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②此外，"共产党"月刊还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这种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出的论调是同共产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不相容的。

"共产党"月刊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把它和马克思主义严格区分开来的同时，也希望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识错误，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当时大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由反对黑暗的军阀政治和从所谓反对强权、主张自由的愿望出发而走上了歧途的青年，所以采取这种争取他们觉悟的方针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这个正确策略中也产生了一种偏向，即放松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无情打击。"共产党"月刊的几乎所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都强调一种观点，即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是对的"，承认它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承认它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的目标"③，有的甚至荒谬地认为共产主义是达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阶段。这样，他们就在理论上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分歧，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无政府主义乃是一种把小生产理想化的反动空想，它根本不可能推翻

---

① 同上。

② "社会革命底商榷"，第2号。

③ "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第4号。

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产生这种偏向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的限制。

诚然，“共产党”月刊还存在着不少缺点，但是它所宣传的主要东西却是当时各地正在积极要求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着手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先进知识分子所非常需要的；而且是完全公开出版、以向广大知识分子进行宣传为主要任务的“新青年”月刊所不能提供的。这个刊物的出版有力地帮助了建党的准备工作，从而也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痕迹。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共产党》短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意大利的社会党及英美共产党，也都想继俄而起开辟一个新的生产方法底试验场。

中国劳动者布满了全地球，一日夜二十四小时中太阳都照着我们工作。但是我们无论在本土或他国都没一个是独立生产者，都是向资本家卖力，我们在外国的劳动者固然是他们资本家底奴隶，在本土的劳动者也都是本国资本家底奴隶或是外国资本家底直接的间接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什么劳动者选议员到国会里去提出保护劳动底法案，这种话本是为资本家当走狗的议会派替资本家做说客来欺骗劳动者的。因为向老虎讨肉吃，向强盗商量发还脏物，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

（原载《共产党》一号）

《劳动界》介绍

“劳动界”周刊于1920年8月15日在上海创刊，每期16页，32开本，内容略分为国外劳动界、国内劳动界、演说、读者投稿、时事、小说、诗歌、调查、通信、闲谈等10栏。目前见到的“劳动界”共有1——23期（其中缺13、21）。

“劳动界”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册子，略带小报的形式。“劳动界”用朴素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说明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价值、劳资对立、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工人阶级寻求解放所必须遵循的正确途径等等，文章简短精悍，颇受工人欢迎，被工人誉称为自己的“喉舌”和“明星”①。

“劳动界”的出版，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早尝试。它的宗旨是要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向前发展。所以在创刊号中指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因为“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而创办“劳动界”的目的，“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②。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劳动界”一开始就歌颂了劳动的伟大，说明了“劳工神圣”的道理。它向工人指出：“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因此“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就饿死了”。总之，“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都全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有人说什么“劳工神圣”③。但是，“劳动界”决不仅是讲些“劳工神圣”的空话，而是尝试用浅显的语言向工人解释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道理。它首先说明：“钱不过是代表劳力的一种东西罢了”，钱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有了钱，就有房子住，衣服穿，饭吃。但是房子，衣服，饭是从那里来的呢？都是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造出来的，那么，钱尊贵就是由于有了工人和农夫的劳力，“如果没有工人和农夫的劳力，钱是没有什么尊贵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上海地方钱是很多的，但是，如果那几十万的工人都罢了工，工场也不能出东西了，粮食也不能进来了，我怕上海的人都要饿死在钱堆里面呢！”可见，“如果说钱尊贵，劳力就比钱更尊贵了”④。再进一步，

---

①见“劳动界”第5册，通信栏。

②“为什么要印这个报？”，第1册。

③“两个工人的疑问”，第1册。

④“金钱和劳动”，第2册。

刊物用具体的例子解释工人在对原料加工的过程中逐步增加了它的价值的道理，指出树木在山上时是不值钱的，工人把它砍下，就值钱了，如果再搬到街上、锯成板子，那就更加贵了。另一方面，同是人工做出来的东西，皮鞋就比布鞋贵，也是因为人工费的多少不同。在劳动创造价值的道理说清楚后，很多文章就进一步揭穿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向工人们指出：既然“值价钱的不是东西的本身，是劳动者的工作”，那末，“劳动者要工钱，就是卖我们自己的工。”“买货就是买工，买工就是买货；卖货就是卖工，卖工就是卖货。”然而在这些雇佣和买卖关系里，“有一桩很蹊跷的事，便是我们到商店里去买东西，那东西的价值，是要商店定的；行东、厂主、雇主向我们劳动者买工，工的价值却要行东、厂主、雇主定的。我们自己底工，要他们定价值；由我们的工做出来底货物，也要他们定价值”①。正因为这样，“那般资本家，什么老爷们、少爷们、太太们、小姐们一点没有劳动，他们偏偏有那丰富的衣食，高大的房子，美丽的器具使用”。而我们做工的人“倒反不及那般坐吃的资本家有那样好的衣穿，好的吃食，好的房子住，好的器具使用；我们有时还要一碗糟米饭倒没有吃”。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般资本家强盗去了！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②。而工人之所以流了一百滴汗自己吃不到三四十滴，这完全是由于社会上分成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缘故，完全是由于做东家的有钱的人“把我们劳力做出来的钱拿去了，来压制我们的缘故”③。这样，“劳动界”就不但用事实向工人们说明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而且提高了工人的理论认识。

“劳动界”分析了资本家所以能对工人肆行剥削，是由于“资本家生产制”造成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乃是社会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且也是必然要被消灭的东西。在“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一文中写道：“诸君！全世界的‘资本家生产制’，一致破灭的时期，快要到了。‘资本家生产制’，这一个制度，就历史上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东西。旧日的社会组织，靠他去打破。到得旧组织打破了，旧组织下面发生的旧思想，也跟着崩坏了的时候，这‘资本家生产制’本身的罪恶，也就完全被世人经验出来。于是他自己本身，也就免不了灭亡的浩劫。”又说：诸君！你们想想，你们那些工场的股东们，他们可以做纱厂、丝厂的股东，同时又做绸缎店、百货店、银行、当铺的股东，同时又做房子地皮的所有者，同时又做衙门里的顾问谘议，同时又挂起嘉禾文虎章，同时又可以做米店豆行的老板，可以做学校、孤儿院、慈惠堂、平粜局的董事，社会国家无论那一种事业，那一个机关，他们都可以操纵，可以管理。他们的这种特权，是从那里来的？……他们的特权，并不是直接从占领许多金钱生出来的，是由于占领一切由金钱所能代表的财货生出来的。他们占领着这许多财货拿这些财货做特权的基础，要一切需用财货生活的人替他们工作，而且对于人家工作制造出的货物，并不给

① “价值和公道”，第7册。

② “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第14册。

③ “金钱和劳动”，第2册。

相当的代价。”同时指出：资本家生产制，是因为有了机器出现才发生的。又是用机器的新工业组织，加在私有财产这一个旧制度上才发出的。倘若没有机器这一个怪物出现，资本家生产制不会发生。倘若机器这个东西，不是出现在私有财产制的社会里，是出现在共有财产的社会里，资本家生产制也不会发生”。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是永世不变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得无产阶级“得着一个受共同训练、过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的机会。……有了这一个机会，于是在‘平等的自由团结’里面，要求‘平等的自由幸福’，建设以平等、自由、互助为基础的新社会，这一个全世界人类一致协同的新要求，就由全世界劳动阶级的人，一致协力地活动起来了。”①

“劳动界”指出，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私有制必然为公有制所代替。“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制造出来的货物，一部分作为下次再行制造的资料，一部分作为社会的财产，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资料大家享用。这时候大家都要做工，都能得饭吃得衣穿”。这是社会问题和劳动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所以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②并且进一步指出，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乃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历史使命。“劳动界”对工人们发出呼吁说：“弟兄们呀！我们要减轻我们的劳苦，要增高我们的生活，要脱离资本家的奴隶，要得到那‘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乐境，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要我们自己努力去做呢！弟兄们啊！我们的责任既是这样大，我们为什么还要饮恨吞声的服从那资本家，不去实行社会主义，不去打破那资本家的阶级；难道我们自己不去奋斗，还望别人来替我们奋斗吗？我们要知道，实行社会主义，是我们劳工的责任！何以故呢？富翁丰衣美食，但是不能去讲什么社会主义的；官僚，武人，他是作威作福，不能去讲什么社会主义的。只有我们劳工们，知道资本家的万恶，知道现在种种不平等的待遇，大家想想，实行社会主义，是不是我们劳工的责任？”③同时，他们还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例，肯定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完全有力量、有可能来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人的社会本是由人作成的。人本要他怎么样，他就可以怎么样。所怕的只是大家不肯去想，不肯去作。常言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家如果肯去想，能够想出一个比现在好的世界来，更奋力以创造之，他没有不发现的。……你们没听说么？现在世界已经有了真正纯粹由农工劳动，由穷人作主的地方了（便是北边的俄罗斯）。既然有了这样的好榜样，你们为什么还不努力？几个人的力量如果小，你们为什么不联合？你们不要畏难！你们不要说人家程度够你们程度不够。通通是人，只看去想不去想，只看去作不去作，那里有什么程度的问题？这一个人能作的事，别一个人或者有不能作的。但若一群人，这一群能作的，别的群是没有不能作得的。”④这就极大地鼓舞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向一切反动剥削阶级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

① “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第10册。
② “劳动者与社会主义”，第16册。
③ “今日劳工的责任”，第15册。
④ “打破现状才有进步！”，第6册。

仅仅从理论上来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使这种通俗化了的理论和工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工人们的罢工斗争联系起来，促进工人们的团结，引导工人们去组织真正的工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适应着这种要求，“劳动界”一方面用社会调查、小说、诗歌、工人来信、等等，来揭露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另一方面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报道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国内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罢工斗争。“劳动界”对于中国工人（特别是上海工人）的工资、休息和工作时间、政治待遇……等等，都作了比较真实的报道。特别是关于工人生活的调查和工人罢工的记载，是研究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资料，它比官方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记载自然是要可靠得多。

为了团结工人，有效地向资本家进行斗争，“劳动界”一开始就号召工人组织能真正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新式工会。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五四”以后在上海和其他地方，涌现出了不少用“工会”为名的团体。主持人很多是高级职员、资产阶级分子和别有用心的政客；它们只能引导工人阶级走上改良主义的歧途，最终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劳动界”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揭穿这些黄色工会的真正意图，向工人们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象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① “劳动界”号召工人：“觉悟的工人呵！赶快自己另外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呵！”②

要组织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新式工会，首先还必须使工人认识到“联合底力量”。在“劳动者的唯一‘靠著’”这篇文章中，把“劳动联合”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向工人们指出：“劳动者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改善自己的境遇，唯一的靠着，就是‘联合’”；“热心联合的是好友！反背联合的是叛徒！”③ 地方性的帮会组织和封建的地域观念，始终是中国工人团结的障碍之一。工人们的不同帮口常因互相争夺就业的机会而起冲突。例如1920年12月上海浦东烂泥渡鸿升栈、华通栈的运输工人，因江北、湖北、山东三帮争夺工作，互相排挤，以致演成决斗。“劳动界”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马上向工人们呼吁：“我敬爱的劳动兄弟啊，我们浦东烂泥渡底江北、湖北、山东各帮弟兄们，因为想争夺工作，要约期去决斗了。将来三方胜负怎样，我虽不能预料；但无论哪一帮胜或哪一帮败，至于吃亏便宜，总该都是我们劳动兄弟们自己去受罢！”④ “劳动界”还向工人们指出，在“资本制度底下底工银制度”，不知杀死了多少工人兄弟？而现在为了这种要命钱而去决斗，“山东、江北、湖北各帮底兄弟们！你们休争罢！大家想想，这是谁叫我们这样苦斗”！

---

① “真正的工人团体”，第2册。

② “真正的工人团体”，第2册。

③ 第17册。

④ “谁叫我们这样苦斗”，第17册。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迅速地提高了工人的组织觉悟，终于组成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上海机器工会。“劳动界”详细地报道了机器工会的组织情况。此外，对上海电器工会、印刷工会以及湖南劳工会等组织也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劳动界”并没有对劳工会寄以过高的希望，而认为这个“稍强人意的劳工会”也有“不满人意”的地方的。对于湖南中华工会的本质，也进行了彻底的揭露，指出这个工会的特点是：首领制组织，大人先生做会员，会长坐官轿，对职员用委任状。而会长陈某，“本是个武夫，却又带着政客性质，一口牛皮，吹得呜呜叫”①。“劳动界”第20册报道了“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的情况，李启汉同志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说：“我们从前只是各人苦着，饿着；我们想要免去这些困苦，就要大家高高兴兴的联合起来，讨论办法；我们不独得到这样的游艺而已；什么金钱万能，劳工无能，我们都要改革，打破！”杨明斋也在会上发表了演说。23册还发表了一个“劳工俱乐会”的章程。

由于多方面教育和启发的结果，“劳动界”不断收到了工人的来信和来稿，表示他们对自己力量和前途的信念。机械工人李中在来稿中说：“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利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俄国已经是工人的俄国，……这个潮流，快到中国来了。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这个潮流的主人翁，就要产生工人的中国。”② 这是工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宣传，提高了阶级觉悟的证明。工人李中的这种认识，实际正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普遍认识。此外，钳工陈文焕、店员慕痴、湖南工人何量澄等也常常投稿。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最早的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投机分子（如沈玄庐）或很不坚定的分子（如李汉俊），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是很多的，而且领导人陈独秀本人也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是“劳动界”的主要撰稿人，也就自然会影响刊物的思想质量。陈独秀就常常暴露糊涂思想，他说过这样的“可怜的话”：“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一不是跟着外国底新思潮凑热闹，二不是高谈什么社会主义，不过希望有一种运动好唤起我们对于人类底同情心和对于同胞底感情，大家好来帮助贫苦的劳动者，使他们不至于受我们所不能受的苦恼。”③ 他又替中国工人提出这样的“可怜的要求”：就是我也不敢希望我们中国底工人们马上就有外国的这样大大的运动，说句极没出息的话，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再说得可怜一点，眼前只求得着‘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这三样好处，也可使工人们牛马似苦恼减轻一点”④。当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表示反对工人参加政治运动的时候，陈独秀竟也随声附和，劝告劳动界“快快觉悟吧！诸君若真心从事劳动运动，务必要专心在工会组织和工人

---

①“湖南工会的怪现象”，第19册。

②“一个工人的宣言”，第7册。

③“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思”，第4册。

④“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第11册。

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倘若夹杂着政治运动来出风头，那结果必然和民国元二年的工党劳动党一样”①。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似乎忘记了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外，还有无产阶级的政治，除了工党以外，还有共产党！这些言论已初步暴露他的低估工人阶级觉悟和忽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此外“劳动界”的某些文章中竟把公开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罗素说成是“现在世界学问最大见识最高并最切实的罗素先生”②，甚至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不独是教育界的明星，也是劳动界的明星；简直算起来，他是人类社会的明星。因为他注意于社会根本的改造问题，如反对资本制度，提倡共产主义；反对雇佣制度，提倡工农的自由组合；废除资本家，大地主和主人。”甚至还说：“可惜我们中国的劳动界还没有什么觉悟，并没有什么教育，不能领会罗素的学说。总是他来到中国，我们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受他的影响。将来的社会，定然有革新的希望”③。对于一个工人报刊来说，这都是丧失立场的话，同时也说明，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成熟，鉴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是很差的。此外，“劳动界”虽然对于工人罢工的情况作了不少报道，但是对工人当前的实际斗争却缺乏有力的指导，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主义倾向，这一点也是应当指出的。当然，这些方面并不是“劳动界”的主流，它的主要成就还是它最早的向工人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①“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第15册。

②“打破现状，才有进步”，第6册。

③“罗素与工人”，第11册。

《劳动界》发刊词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

（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为什么要印这个报？因为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无论是热天，无论是冷天，天还没有亮就扒起来，上的上工场里去，到的到田里去，做的做事情去。天黑了，大家都睡了觉的时候，方才能够休息。天天顶少也要做上十五六点钟的工，睡觉顶多也不过五六个钟头。他们就是这样苦，这样做得多。他们还是住的没有得好的住，吃的没有得好的吃，穿的没有得好的穿。设若一旦害了病，一天不做工，第二天就要饿起来了。弄得不好，房东还要来赶他们出去。衣服被卧也要当干净。没有小孩子的人，自己还可以做叫花子去，免得饿死冻死。如果有小孩子，喊的喊饿，叫的叫冷，哭的哭，号的号，那就只好看着他们饿死冻死了。

我们再看那做东家，有钱的人，一天到黑一点事情也不做，天天睡到多时候了才起来。起来了之后，不是叉麻雀，就是谈天。不是跑马车，就是坐汽车。不是逛窑子，就是抱小老婆。不是逛大世界，就〔是〕逛戏园子。他们虽然这样一天到黑一点事不做，他们反有大房子住，好东西吃，好衣服穿，有马车坐，有汽车坐，有小老婆抱，有大世界逛，有戏看。

工人同他们这些不作事的东家，有钱的人比起来，已经是苦得不好说了。又还要无热无冷的一天做到黑，那自然是更要苦了。所以工人在世界上是最苦的。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甚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了，或者将来要苦得比现在好一点。

（汉　俊）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

（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本月三日下午五时到七时，上海机器工会在霞飞路渔阳里外国语学社开发起会。各工厂到会的发起人，约有七八十名，外有参观者六人。当由筹备会书记李中为临时主席，报告一切：

第一报告发起本会底宗旨：谋本会会员底利益，除本会会员底痛苦。但是要达到这个宗旨，第一不要变为资本利用的工会；第二不要变为同乡观念的工会；第三不要变为政客和流氓把弄的工会；第四不要变为不纯粹的工会；第五不要变为只挂招牌的工会。这五种工会，都是妨碍我们工人底组织，我们很该留心注意。我希望我们这个工会，不和资本家握手，不和政客流氓握手，不分同乡不同乡，只叫限制绝对的机器工人。我们对于这个会，都要负了极大的责任，去大大地联络，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工会。我们这个会里底会员，都要看作会就是我，我就是会。我是爱护我的，那我就该爱护我们这个上海机器工会！

第二欢迎参观人为该会的名誉会员，并请演说。先由杨明斋先生演说，大意说：我们为甚么要组织机器工会，无非为减轻自己底苦痛，救济自己底生活。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都拉到资本家手里去了。所以我们劳工的生活，也就在资本家手里拿着了。换句话说，就是资本家打了无数的铁锁，把我们锁住了。他们叫我们受苦痛，我们不能不受苦痛。

诸位想想看，资本家拿甚么法来弄得这么大的能力呢？因为他们有组织。例如现在的银行当铺公司工厂银行团商会等，这些资本家的组织，就是压制我们劳工的命呵！他们为甚么要组织这些机关来压制我们劳工呢？因为他们底资本，就是我们劳工替他们挣的；没有劳力，就不会发达。资本劳工愈多，他们底资本也愈发达，所以他们舍命去组织这些机关，以资本收买劳工，图发达他们底资本。那末我们怎样不舍命组织机关，也图减轻我们底痛苦，增进我们底幸福！次由陈独秀先生演说，大意说：现在世界的工会，只有三个团体很有势力。第一就是矿工，第二就是铁道工，第三就是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我听说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就有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但我有一句，请诸位牢牢记着：我说这个工会，将来万一有办到不如意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努力，要把他糟的处所改造，把坏的分子驱出；尽力负责去干。万万不要见得他糟了，大家就让他去糟，个个不管了！

第三报告章程，该章程共分六章，三十二条。第一章是总则，第二章是机关及职员，第三章是入会及退会，第四章是会员底权利及义务，第五章是除名，第六章是名誉会员。今将其重要的记在后面：

第二条　本会底目的如左：

一，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知识，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

一，以公共的力量，着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

一，谋相互的亲睦，相互的扶助事业。

一，研究劳动市场状况。

一，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

一，其他关于增进本会会员福利的各种事业。（但各种事业的细则另定之）

第七条　本会会议分大会及理事会。

主席报告章程之后，经大家讨论议决。

第四讨论本会事务所地点，以杨树浦和南市为标准。

第三条　本会以上海的各业机器工人（但工头不在此内）组织之。但有功绩于本会者，经理事会的承认或推荐，虽非工人亦得认为名誉会员。

第六条　本会为达到第二条目的，准备实行左列事业。

一，设立职业介绍所及失业工人住宿所。

一，会员娱乐机关——球房，浴堂，茶食店，音乐室。

一，教育机关——学校，书报室。

一，救恤会员——遇会员中有疾病，死亡，残废，衰老，生产，家族死亡者，本会以相当经费救恤之。

一，出版——以机关报为主。

一，法律顾问。

一，奖励消费组合。

一，帮助别种职业工人组织团体。

一，帮助别种职业工会的运动。

一，研究工人生活状况。

一，研究经济状况。

大家因为利害的关系，决于杨树浦去设事务所。

第五讨论开会问题，大家以我们工人不能时常来开会，一则做工忙，没有空间的时间；二则要牺牲工钱，还要赔出零用。决议选定一个日子，开一次成立大会，而不再开全体大会；至于选举理事，则由通信选举。

第六讨论事务所之外，暂设经募处，内推主任一人，办事员五人。当即请陈独秀先生为经募处底主任，推李杰陈文焕吕树仁陆征章李中为办事员。

第七讨论成立大会的地点，大家预定青年会；时间由事务所通告（会员到一百人以上，方开成立大会）。

（原载《劳动界》9期，1920年10月10日出版）

《劳动者》介绍

"劳动者"于1920年10月3日在广州创刊，每星期出版一册，先由广州天民报、后由群报总经售。我们见到的有第1至8号。

"劳动者"周刊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刊物。刊物用朴素和热情的语言向工人阐明了劳动创造世界、工人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劳资的根本对立、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以及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等革命道理。当时人们曾将"劳动者"和"劳动界"、"劳动音"誉为兄弟刊。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成立后即创办此刊。创办此刊的目的是为了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教育，从而将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所以创刊号上说："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人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①

刊物一开始就歌颂了劳动神圣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指出："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②既然人类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工人无疑便是"世界的主人"了。但是刊物接着指出因为工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他们的生活却是极低下的："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③他们认为工人创造的财富"都被富人夺去，实在是天下间最不平之事"④，指出和世界上工人阶级比较起来，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更加残酷，是"格外苦恼的人力"。

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刊物对工人阶级所以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根源作了分析，指出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和根本改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⑤同时，他们还揭穿了当时在一些官绅政客中风行一时的所谓以"开发实业、教育、交通"来"救国救民"的欺骗伎俩，认定只有"旧制度崩坏了，新制度实现了，

---

① "劳动者呵！"，第1号。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告工人"，第2号。
⑤ "劳动者呵！"，第1号。

那时候没有安坐白吃的人，一齐致力于生产的劳动”①才能振兴实业，普及教育，发达交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某些阶级调和论者企图缓和劳动矛盾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们责问说：“人家住的是高楼大厦，美华辉煌，你们住的是破屋一间，不蔽风雨，人家吃的是膏粱文绣，食前方丈，你们吃的是粗饭菜羹，不能一饱，人家穿的是绫罗丝锦，巧艳夺目，你们穿的是破衣败絮，仅可蔽体，这是公道的事吗？你们要变更这种不公道的环境，资本家答应吗？劳资可以调和吗”②他们从阶级斗争观念出发，坚定地认为，有资本家的利益，就没有工人的利益，有资本家的自由，就没有工人的自由，因此要资本家“高抬贵手，施点仁惠”是绝对行不通的！根本的办法，就是“由平民振起，由农民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主义去！”③“劳动者”对农民问题也同样重视，他们向农民说：“你是最重要的，必要发奋而起，明白你现时所处的地位，都由于大商家、业主、官吏、军队所赐的，你就要想一个方法，离了他们，才是正当的道理。”④

“劳动者”还以具体、生动的材料揭露了工人牛马般的生活，抨击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及时报导了各地建立工会组织消息和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以不断提高工人阶级觉悟，激励工人斗争意志。此外还登载不少专门向工人介绍苏联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及土地政策的文章。

但是在如何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制度的问题上，已见的八期周刊中都流露出不少无政府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观点，而倾向于搞“经济革命”，做：“实际的劳动运动”；他们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截然分开，机械地把工人运动割裂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两个步骤，认为首先应该搞经济斗争。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只领导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不承认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否认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在进行工人运动的同时，他们又不适当地强调工会的作用，认为工会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这是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的提法。

在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显示出无比雄伟的力量，工人觉悟大为提高的情况下，就更加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又善于指出斗争方向的政党来领导他们，但是在“只要你自己想想”这篇文章里，谈到改变工人的奴隶地位和一切权利时，却仅仅提出走“经济革命”的道路，这显然是很不完善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贬低了政治斗争的意义。有的文章则根本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必要，甚至提出：“政治运动，是和劳工没什么关系的，政治上的要求终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⑤有的文章虽然并不否认政治斗争，也看到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私有制，建立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看成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看到经济斗争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是机械地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划成二

① “最趋时的三件宝贝”，第8号。

② “劳资调和的疑问”，第7号。

③ “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第2号。

④ “和耕田朋友的谈话”，第6号。

⑤ “罢工的意义”，第6号。

步："在劳动运动里面，可以划做两种过程。第一是改进生活景状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而"工人生活的问题，又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所以"必要有了第一层的运动，减除了目前的痛苦，方才有第二层运动的能力。"而且还说"现在第一层运动的影儿还未有"①，换句话说，只有从事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斗争才是当务之急了。有人虽然感到工资与物价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仅仅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不是根本办法，但是他们不是设法去组织政治斗争，夺取政权，而是倒因为果地认为"有了工钱，才有资本家"②，因此必须取消工钱制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推翻剥削阶级，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当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个觉醒了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时，这种说法并不能起到提高工人阶级意识和指出斗争方向的作用。

在一些曾一度混入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里，更是大大宣扬了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例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兼生（黄凌霜）在"实际的劳动运动"一文中说："经济学派上所谓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劳工组合主义；虽不能各自独立成为绝对完善之理想，而同为今后社会进化必经之途径，此固吾人研究社会趋势不咸见不囿方分者所同得之结论。"③他们对工团主义推崇备至，认为只有工团主义才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并且认为只要举行全体工人总同盟罢工，不必组织政党，也不用夺取政权，就可以解决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建设任务了："劳工的总同盟罢工，全国各业的劳动者，都要协同一致，停止工作，不再受雇主指挥，那时的资本制度，马上就要瓦解，于是五金的工人，可以入五金的工厂，自由管理、自由操作，农作的农夫，可以自由使用田土，自由生产谷物，自由去把他分配享用。"④无政府主义者还把工人运动狭隘地看成是组织工会，并且认为只有工会才是领导工人运动的唯一组织："劳动运动之步骤，不外（一）在劳动界内组织行会（二）由行会组织工业联合会（三）集合行会组织全省联合会（四）由各省联合会组织全国工业总会（五）谋东西劳动会之成立进而与万国劳动会携手。"⑤无政府主义者黄兼生对无产阶级专政更是不敢加以肯定，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至将来新社会之改造，利用强权乎，抑自由组合，自己管理乎？则视吾人劳动之效力与能率而定。"⑥

因此，"劳动者"虽然向工人进行了不少阶级教育，但是由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最初无政府主义分子较多，当然刊物也就不可避免地散发了不少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起上海出版的"劳动界"来，质量要差得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距离很远的。

在"劳动者"第2、4、5、6期上连载的"劳动歌"，实际上是"国际歌"的不准确的译文，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国际歌"中译文。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① "劳动者呵！"，第1号。
② "我们为什么要工钱"，第3号。
③ "实际的劳动运动"，第1号。
④ "罢工的意义"，第6号。
⑤ "实际的劳动运动"，第1号。
⑥ 同上。

《劳动者》发刊词

——“劳动者呵！”——

（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

世界上什么人应该享有幸乐呢？是至高贵的人。什么人是至高贵的呢？是至有用的人。这是一个至公平的答案！

可是至有用的人是谁呢？是总统督军呢？是乡下的绅士，商店的头家工厂的东主呢？不是不是。

我们食的东西、穿的衣服，住的房子、是他们种出来、织出来、造出来的么？他们能够驶船、驾车、制造器物么？他们能够发明事物利用厚生么？

这都不是他们所能的。这都是我们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一班人做出来的。

世界要有了米粮，衣服，房子，舟车，器物，方才成功的。所以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可是享有至多幸福的，是不是至高贵至有用的工人呢？

嗳哟不用说了！在现世的制度里，我们看见的：只有总统，官僚，绅士，头家，财主是享福快活的，住的是高楼大厦，穿的是锦绣绫罗，食的是山珍海〔味〕错。

我们至有用至高贵的工人呢，偏偏是：种田的吃不到半饱，纺织的没有蔽体的衣裳，建造的没得房子可住，机器厂里的机工，不是使用人工制品的人，舟车工人不是坐车坐船的。把生活上至穷至苦的景遇，通通放在工人的肩上。

刚刚是一反对的现象：至有用、至高贵、至该享有幸乐的，生活是最捱苦，最难堪，地位都是最卑贱；一般人心理看来，却是最没用的。

这一种的情形，从人类有了历史在现今，从中国数到外国，差不多是一致的，然而我们看见少有不同的：

1．外国做工的人，虽然和我们一样被人家看得卑贱，看得没用；但他自己都认定自己做工是极贵重的，是极有用的。

2．他虽然捱受惨痛的生活。但他自己都天天想法子救济自己，想法子把颠倒的社会弄到平正。不象我们一味放任，听人宰割的。

3．外国工人惨痛的生活，也断不象我们的深切。贫乏的程度，也断不象我们这样难堪。

由此我们可以得两个结论就是：

4．我们中国的工人，是格外苦恼的人。也是格外受得苦恼，不去想法子自救的人。

5．越能想法子自救的，都是越能脱离苦恼的。

唉！我们的苦恼够了，还不想法子自救吗？去罢！不用怀疑！我们唯一的大路，只有自救。

劳动运动是欧美日本的做工人自救的唯一途径。

在这个运动里面，可以划做两种过程。第一是改进生活景况的运动。第二是改革生产制度的运动。

工人生活的问题，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工钱怎样要求增加？工作时间怎样要求减少？工场制度怎样要求改良？疾病死亡怎样〔要〕求保险？工人子弟怎样要求教育？妇孺劳动者怎样要求保护？这是属于第一层的。

工人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和分配的问题。生活的来源是生产。生活的消费是分配。现在社会的制度，所以不良的原因，就在分配不得平均。由工人手中做成的生产品，不能听凭工人自由分配。却要特设一种非生产阶级，不必劳动的，来掌管消费的分配权。我们相信这种制度，是生活问题的祸根。所以第二层的劳动运动，是根本上要求制度改革的运动。是希图做工的，自己起来掌管生产和分配的运动。

必要有了第一层的运动，减除了日前的痛苦，方才有第二层运动的能力。也要有了第二层的运动，把一切大权都拿到自己手里，第一层的运动才算妥当。

属于第一层的运动，现在的欧美诸国，算做了一个结束。今后的运动，正向第二层着手进行。可怜我们却连第一层运动的影儿还未有呵。

我们从这一点看来认定第一层目的未有达到以前，我们应该有先做的办法。现在我们工人还没有组织团结，还没有言论机关。大凡工人所应该晓得的道理，人家已经做了的事情，我们一点还没晓得。如此不用讲第二层运动，就是第一层的也是办不来的。想免除这样困难，印书出报，也许是许多办法当中的一件办法。这是我们出版的唯一原因。但是后头的事情还多着。这一个重大的任务，实在不小，我们很希望我们大家努力注意哩。

（我亦工人）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劳动音》介绍

“劳动音”周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指导工人运动的通俗小报，创刊于1920年的十月革命节（11月7日），版式大小与“劳动界”完全相同。目前我们见到的“劳动音”，只有第一册和第五册（1920年12月5日），停刊年月不详。“劳动音”一开始就批判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过去从事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要缺点，即“只向智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只立一种最高尚最圆妙的自由分配制度为目的，偏不讲求达到目的之方法”①，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流于空谈，“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空想了，难道我们还要做梦！”因此，今后应当“改弦易辙”，积极从事于实际的运动即教育与组织工人的工作，而“劳动音”的出版，正是“真（实）际的劳动运动”的起点②。

创刊号上的“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对读者介绍了出版“劳动音”的目的与它的主要内容。文章首先说明劳动是“进化的原动力”“世界文明的根源”。所以应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③，排斥那种不从事劳动而用强力侵占他人的劳动果实的寄生虫——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劳动者“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⑤。所以“劳动音”的任务就是“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按指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改良社会的组织”⑥。“劳动音”还要向工人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和专门技能，“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⑦，同时报导国内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⑧。

---

① “劳动运动的新生命”的第1期。

② 同上。

③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第1期。

④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第1期。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总之，“劳动音”的宗旨大体上与“劳动界”相同，就是要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但是，从这仅有的两期“劳动音”看来，似乎不象“劳动界”那样重视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而偏重于“实际的劳动运动”即偏重于指导某些具体的罢工斗争。第1期的“劳动音”用很大的篇幅，以“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然而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的标题，报道了“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压迫工人，视工人生命为虫蚁的罪恶事实。第5期的“劳动音”几乎是“南京机织工人大暴动”的专号。

1920年12月，江苏省议会通过取消茧行条例，对南京的缎业资本家的垄断利益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资本家勾结了与议会有矛盾的人，故意不发丝给工人织缎，煽起他们对省议会的不满，怂恿一万余名机织工人包围省议会，痛打了省议员。这件事虽然声势浩大，却不是工人自觉的阶级斗争行动，实际上是工人受资本家利用，作了他们反对议员的工具，但是也的确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威力。“劳动音”对待这一复杂的事件的态度是：“甲、宣布他们暴动的实在情形；乙、揭破他们被动的黑幕；丙、告诉他们暴动的方法；丁、引起一般工人的注意。”①这是非常正确的。“劳动音”一方面揭穿了南京缎商与警察厅长互相勾结利用工人的黑幕，肯定这次暴动是“盲目的，被人家指使的”另一方面，又着重揭示这件事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把这件事看做“饭碗问题”的革命第一声。“劳动音”与一切借此侮蔑工人“受人利用”“轻举妄动”的资产阶级报刊相反，满怀热情地肯定了工人阶级有为自己的生存采用暴力行动的权利，赞扬他们敢于起来反对官府的胆量，并且通过对事件的分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劳动音”说：“现在既然有了这一班人做先锋，好比是一伙稻麦刚发芽一般，我们方且保护他，培养他，还嫌来不及，又那里能够苛求他们，说他们的暴动是盲目的行动呢？我们应当知道，世间的事，一起头总是这样的。只须有人领着他们，指导他们，认定目的去向一定的方向去做，慢慢儿的他们自然会知道什么是他们应当做的，什么是他们不应当做的了”。②“劳动音”向工人提出，议员、官吏、军队、警察、缎商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都应当受到处罚，“议会有不好的地方，就应当捣毁；议员有过犯的时候，就应当打伤。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会，等等，只要他有错，就可以放一把火烧掉他；他那里面办事的人不好，就可以杀掉他。这有什么叫做不可呢？”③最后，“劳动音”号召机织工人今后不要再受资本家利用，要“组织工人会，专办和工人有益的事”，争取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请学生教书认字，增加知识，并且“常做示威运动，每逢有人妨害你们的安全，你们总可以结队出来游行或者用武力解决；就是军队和警察，他们见人多，也必定不敢和你们对抗的。”④“劳动音”的这些号召，虽然多少带有盲动主义的色彩，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

---

①“我们印这本小册子的意思”，第5期。

②“南京机织工人听者！一般工人也听者！”，第5期。

③同上。

④“纪南京机织工人暑动情形”，第5期。

“劳动音”出版后，很快地就在长辛店等处工人中间流传开来，到了1920年12月间，每期能销售二千份。①可见这个刊物在工人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据邓中夏同志说，这个小报后来改名“仁声”，只出版了几个月便停刊了。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①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北京“晨报”，1920年12月21日。

《劳动音》发刊词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

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今天是我们与各位见面的第一次，我们怎样的喜欢！我们愿时常得与各位亲近，来大家谈天谈天，但是我想各位心中一定发出两个疑问：（一）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二）这个《劳动音》里面的文章，又说些什么话呢？我要使各位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第一篇文章，不得不先将这两个疑问详详细细的讲清楚，请各位且瞧下去就明白了。

我们相信“劳动”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第一个要件。因为人类是进化的，一天比一天不同，天天变动，天天进步，由旧的变为新的，由不完善的进为完善的，所以能达到这新的完善的，就是由人类“劳动”的结果，那末，我们就明白，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

但是我们试放开眼光，瞧瞧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所有的人类，都人人能从事有益于人生的劳动吗？我们知道今日各国社会上都有一种最不好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唉！世上那里有这样便宜，这样没道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的做来，他们安安乐乐的拿去，使我们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

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

更进一层讲，各位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你瞧英美法德意荷俄日等国今日的现象，那一国不发生罢工问题，以实行劳动运动，那一国劳动者不有坚固团结的工人团体呢！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纪述世界劳动者的

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

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场的规则等，和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我们出版这《劳动音》的本意，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你们既然明白了，我们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了，请了，第二期再见罢！祝你们努力！前进！

（心　美）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张国焘

长辛店离北京有三十里路程，是京汉路唯一的重要铁路工场所在地，有工人三四千人。地方虽然是很小很不开通，但是工人们是很热心很有见解的。这地方从前所组织的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会，都是工人做中心，救国十人团有工人的团员五百余人。他们屡次赞助学生运动，每次为公益的事情捐款，总在百元以上，从此也可见他们的魄力之一斑了。而且现在还正在进行劳动团体的组织，预备和上海及各埠的劳动者——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联络一致，并进于与全世界的劳动者握手。现在他们觉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由十几个最热心的工人自动的发起一个劳动补习学校，不久就可开学。他们的募捐启事和简章等，我现在把他录在下面。各处的劳动者，你们看看他们的精神，是怎样的好呢！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募捐启事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呢？看下面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辞废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学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学”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们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

附录简章及预算案于下：

（甲）简章

（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

（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

（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

（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

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

（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

（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

（七）本校设驻校办事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

（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

（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

（乙）预算案

（一）开办费

1、制桌凳三十张洋五十元

2、修理校舍洋二十元

3、杂费洋十元

共洋八十元正。

（二）经常费

1、校舍房租每月约十三元全年约一百五十六元。

2、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元。

3、校役一人月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

4、书籍文具等费全年四十元。

5、杂费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

共七百〇六元

发起人　陶善琮　段其伟　史文彬　施五常　郭长泰

　　　　张　珍　李茂银　武明科　邓长荣　陈励懋

（原载《劳动界》15期，1920年11月21日出版）

〔附〕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

文　今

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是在1920年5月1日。在这一天，我国工人阶级破天荒第一次举起了革命的红旗，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了一项伟大的誓言：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地主的土地，建立一个“自由、互助、共有的社会。”

当时，我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政治上没有丝毫权利，每天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这种社会地位促使工人阶级必然起来反抗他

们的统治者。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工人阶级，许多工人都向往着“工人的中国”的早日诞生。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展开时，工人举行了“六三”爱国大罢工，在斗争中，工人认识到了加强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我国最早的革命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就在这个富有战斗意义的五月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起来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悟到自己的力量，已经以一个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国工人阶级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纪念了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上海是我国近代产业的中心，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0年的五一纪念活动，是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上海这次纪念活动，主要是召开了一个“世界劳动纪念大会”。这次大会是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七个工界团体联合筹备的。这些团体大都是新兴资产阶级中一些活动的分子主持的，他们有着浓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其中“中华工业协会”可算是一个典型代表。但是由于有了共产党人的参加和影响，这次纪念活动就具有了革命启蒙运动的性质。纪念活动的经过情形是这样：原定5月1日午后在公共体育场召开纪念大会，后因军警百般阻挠，禁止入场开会，迫使大会临时变换了两次地址，最后坚持在靶子场后面的一块荒地上开了一个简单的纪念会。这时开会的工人已由五千多人减少到数百人，但是工人的斗争情绪仍然很高涨，手里挥动着红旗，嘴里唱着“劳动歌”，并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八小时；最后一致高呼：“劳工万岁”、“中华工界万岁”等口号。为了抗议军警的无理压迫，上海工人在纪念大会之后，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中国工人觉悟的团结的精神，已经足以使压制我们的人胆战心惊。”最后并表示要“在三百六十五日后的五月一日，再表示我们的勇气和人格！”同时，上海各工界团体还发布了一个“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通告里写道：“我们要创造新的美丽的永久和平的人类世界，决定和你们通力合作负担这个责任，现在我们都处在国内国外金钱阶级压迫底下，希望你们先起的同胞给我们……的劳动同胞一个很猛烈的援助。”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上海工人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的由向往到信赖。

北京1920年的五一活动，是以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中心进行的。当时北京城没有什么大的产业，也没有近代工会组织，只有几个行会性质的小团体，如车业公会、电汽业协会等。五一这天，北京“工读互助团”（1920年1月由李大钊等发起的一种本着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的组织，北京大学曾经准予免费旁听）雇用了两辆汽车，沿街进行了宣传，车上各有四个团员，团员们都挥舞着写有“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等字样的红旗。他们一面呼着“劳工万岁”的口号，一面散发着“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这些传单还散发到长辛店工人的手中，很受工人的欢迎。同日，北京大学的校工和学生五百多人开了一个纪念大会，会上由校工们发表了演说，说明了五一节是个什么日子和工人们应当怎样进行纪念等问题。北京大学组织的“平民讲演团”在这一天也有五十人分五个组作街头讲演，听讲的人十分踊跃。此外，“北京学

生联合会”在“五一”的前夕和“五一”这天也散发了大批的传单，如“五一历史”等等。

唐山各工厂的工人，在“五一”这一天没有休假，但是工人们在休息的时间中，也集合了数百人开了一个纪念会，工人们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并散发了一些传单。

广州的工人（包括香港的工人），在这一天，曾经在东园举行了一个较大的庆祝会参加的工人约有五万人；4月30日晚上并举行了一个提灯会。这次纪念活动，主要是由“华侨工业联合总会”等团体筹备进行的。

汕头、漳州、九江等地在五一节也有过庆祝活动。汕头举行了一个有三千多工人和其他各界人士参加的提灯大会；漳州举行了一个庆祝大会（人数不详），并散发了“劳动节歌”和大宗的面包；九江三千多工人举行了五一庆祝会和游行，并散发了一些传单和刻有“劳工纪念”、“毋忘国耻”等字样的馒头。

哈尔滨的工人在纪念五一时，曾经散发了“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文告。另外，据说杭州、苏州等地工人和学生也曾有过纪念五一的准备，但有的因遭到军警的干涉，没有成为行动，有的因找不到历史记载，纪念情况现在还不了解。

上海“新青年”杂志在这一天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值得特别加以介绍。这个纪念号最引人注意的是发表了工人生活的图片三十二幅，工人兄弟的亲笔题词十二幅，并发表了李大钊同志的重要文章——“五一运动历史”。工人的题词不但是非常鲜明动人的，而且有着共产主义的风格。如一个纱厂工人题词说：“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脏物”；一个厨师的题词说：“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还有一个厨师的题词是：“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这些话，直到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战斗的教育意义。

这里，值得说明的一个问题是，1920年的五一运动除了北京、上海有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参加领导外（哈尔滨的纪念活动，是受了苏联共产党人的影响），其它各地的纪念活动，大都是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们为了标榜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为了扩大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当时积极地参加五一节的筹备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是为庆祝而庆祝，为了应潮流、赶时髦的，谈不上有什么革命的气息，相反的却散布了一些“劳资合作”的谰调。广州、九江等地的纪念活动，不仅没有被反动当局所禁止，反而取得了军警的保护，这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1920年全国举行五一纪念的城市不下七、八处，参加活动的工人约有五、六万人。这样较大规模的五一运动，在当时确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反映了我国工人政治觉悟的程度，表现了我国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拿北京的纪念活动来说吧，当时北京是北洋军阀的巢穴，是全国反动统治的中心，但是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挥动着革命红旗的宣传汽车，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的传单。传单上写的不是五一的一般历史，而是吹起了打翻旧中国的号角。传单上说：“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上海工人散发的“五一劳动节”

传单，也是开始反抗统治阶级的信号，传单上有这样几句话："我们不应该为获得八小时工作制而满足，应该进一步收回土地，收回那些强盗们开设的工厂……这样我们才能享受我们的权利。"传单最后大胆地号召全体工人："联合起来，推翻政府、资本家，建立一个新政府。"象这样的宣传活动，在当时如果没有革命的勇气和牺牲的精神是做不出来的。

反动统治阶级对北京、上海工人纪念五一的革命活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五一运动，在我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一开始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除了解放区以外，一直继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反动统治者所采取的无耻手段是：

一、宣布戒严，禁止一切集会。五一前后反动当局一面张贴压服布告，向群众进行恫吓；一面派出大批军警，实行巡逻镇压。这次五一节在北京被捕的工读团员和学生即达二十余人，一直囚禁了十六天才释放了；在上海也有一个散发传单的工人和一个纪念大会的招待员被捕。

二、举行军警示威游行，镇压手无寸铁的工人。上海、北京等地都举行过军警巡逻示威，上海示威的反动军队竟达一万多人。北京军阀政府在五一节后还调动了数营军队驻在后门口，专门监视北京大学学生的行动。

三、实行造谣诬蔑。北洋军阀政府在五一前给上海护军使署的电报中说："此项举动（指上海工人举行纪念会），显是有流氓在内煽动，务希严为禁止。"上海护军使署的布告上也说纪念五一有"不逞之徒"、"激党蓄意扰乱"，并把这次五一纪念硬要说成是"俄国的运动"、"学生的运动"。反动统治者不惜用造谣中伤的无耻手段，来掩盖他们镇压革命活动的卑鄙罪行。

但是，事物的发展，和反动派的主观愿望总是背道而驰的。我国工人纪念五一节并没有因为军警的种种压迫而失败，相反的，"官厅越张惶，劳动节的名词和概念，越容易印入人们的脑筋。"更重要的是工人对反动政府更加愤恨了，工人的斗争意志越发坚强了。有的工人参加了第一次五一示威游行后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革命幻想："五一是全世界工人革命的一天，有一天全世界的工人一齐起来示威，把压迫人的人赶走，世界就是工人的了！"在"上海工人宣言"里也反映了工人在这次斗争中更加坚定了的情况，宣言写道："多谢今天军警的强横行动，竟能使中国人由惊讶而怀疑，由怀疑而认识，由认识而决心，由决心而奋斗。"这次纪念活动，工人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确是获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这正如1920年5月1日上海各界联合会"庆祝劳动纪念会书"中所说的一样："什么是牺牲的结果？群众胜利。呵呵！群众胜利！群众胜利！"

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究竟是在那一年，过去还有种种说法。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在1921年，主要是指的邓中夏同志领导的长辛店工人的五一示威游行；另一种说法是在1918年，因为那时北京的知识分子曾经散发过纪念五一的传单；还有极少数的说法是在1913年，据说当时广州的华侨团体曾经有过庆祝五一的活动。这三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我认为确定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五一节是工人团结斗争的节日，是一个群众运动的节日，如果没有工人群众

参加活动，纪念“五一”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正如李大钊同志所说，没有工人参加的五一运动就“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笔墨运动。”如果把1918年的纪念活动算做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节，那就只能是笔墨运动，而不是群众运动。

第二，五一运动不是群众原始的、自发的斗争，而是工人阶级自觉的开始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活动。纪念活动必须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质，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指导，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影响，那是不可想象的。1920年北京的五一节主要是由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同志领导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值得再说一说的是上海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对这次五一节的影响问题。陈独秀对这次五一运动，根据已有的材料来看，大概是做了三件事：（1）参加了五一纪念的筹备工作，按照他的提议把纪念大会定名为“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同时他还被推举为筹备大会的顾问；（2）他在筹备纪念活动时，曾经讲述过当前劳工运动的要旨，他认为那时工人的斗争，应当从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切身问题入手，然后才能图谋解决其他问题；（3）向反动统治者进行了政治斗争。他曾经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时评，题目是“卢永祥的秘书”，在这篇时评中，他对反动统治者“硬说五月一日是俄国劳动纪念日”的愚蠢无知和爱财如命的本质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揭露。这样，上海的五一运动，就不是“为纪念而纪念”，而是一次富有革命意义的纪念。因此，说第一次五一节纪念是在1913年或1918年，恐怕是忽略了这个纪念活动的革命性质。至于说1921年是我国第一次纪念五一节，这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晚了一年，对历史真实性来说，还不是那么确切。

第三，最重要的是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文件来确定这个问题。1920年5月1日上海“时报”的“劳工纪念日特刊”上说：“今日……是我国工人参加劳工纪念之第一日”；同日，上海各界联合会的告书中也说：“我们中国的工界同胞举行劳动纪念总算今天是第一次哩！”北京的这次纪念活动，也有过“初次的赤旗”的记载。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23年5年1日所发表的“五一节敬告工友”书，这个告书一开头就明确地指出：“中国五一运动今年是第四次了。”依此推算，中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当然是在1920年。

最后，再重复地说一句，1920年是我国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节的一年，今后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统一认识，统一说法。

（原载《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2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大会必需制定纲领（俄文为宪法——译者注）和实际工作计划。拟定了议事日程，听取了关于各个地方小组的活动及其总的情况的报告。这一共占用了两天时间。这些报告里都提到了以下三点：党员很缺少，必须增加党员，组织工人的方法和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地说，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做了宝贵的指示。希夫廖特同志在其发言中谈到了他在爪哇的活动，并向我们建议，要特别注意建立工人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同志把成立远东局的情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们述说了他对俄国的印象。在这个报告以后，根据尼柯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次克，告诉他们代表大会的进程。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给予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在这个期间没有开会。

代表大会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争论以后，做出了最后决定，只有引起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能否得到执行委员会许可做官和做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方面不同意上面的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了。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把国会制认为是斗争和工作的唯一方式。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共同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进攻，我们不应当参加国会，而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而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使我们的情况有任何好转，加入国会，就会使人民有可能认为，利用国会，也只有利用国会，才能使我们的情况好转，才能为发展社会革命事业服务。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

的。起义的机会不会常有，它很少到来，可是我们在平时要做准备。我们应该改善工人的状况，扩大他们的眼界，引导他们参加革命斗争和争取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斗争。因为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但是，我们要向人民指出：希望在旧制度的范围内建立新社会是无益的，即使试作一下也是无益的。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不能强迫他们进行革命。否则，他们会对国会抱有幻想，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采用彻底的手段。

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得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来解决。至于谈到我们是否应该做官的问题，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一般的不应当任重要行政职务。在中国“官”这个词普遍应用在所有这些职务上。但是，我们允许我们的同志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了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在那里，我们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有人说，我们认为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同其他党派共同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还应当竭尽全力与一切分子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①。另一些人主张，在行动上要与其他党派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我们不能失掉原则，在我们的报纸上要批评他们。即使我们自己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便进一步采取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由于这方面的成就一定会加强，代替现在的统治阶级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敢象封建老爷那样压迫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要联合其他阶级压迫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进一步进行斗争，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由此可见，我们联合其他阶级，只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但是，会议对第一种意见，即实际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的建议，作了决定。

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我们的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到自己这方面来，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加选择。鉴于我们的党到现在为止几乎完全是由于知识分子组成的，所以代表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委托党中央局起草了党章。选举了三个同志组成书记处，又选出了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以高呼下面的口号而宣告闭幕：“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本文译自俄文，作者不明。）

---

① 此处意思前后矛盾。——译者注

中国共产党纲领[1]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俄文译稿）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

①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仅有俄、英两种文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均收入本书，以便于研究。俄文译稿译自原第三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版；英文译稿译自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六二年英文版，C．M．维尔巴编。两种外文本均缺第十一条。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①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②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

（英文译稿）

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党纲领如下：

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

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

4．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

四、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

五、介绍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应由当地委员会审查；审查期限至多两个月。审查后经多数党员同意，方可承认申请人为党员。如该地区已成立执行委员会，应由该委员会批准。

六、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

七、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

八、一个地方的委员会成员，经当地书记介绍，可转至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不到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只设书记一人管理事务；超过十人者，应设财务委员一人，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超过三十人者，应组织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章程另订。

---

① 此系俄文版原注。

② 俄文版原注：这一条在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十、各地在党员增加的情况下，应根据职业的不同，利用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组织，在党外进行活动。这些组织必须受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导。

十一、（英文版原注）①

十二、地方委员会的财政、出版和政策都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导。

十三、在党员人数超过五百，或已成立五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选择一适当地点成立由全国代表会议选出之十名委员组成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上述条件尚不具备，应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应需要。有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详细规章另订。

十四、除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征得党的同意外，任何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但士兵、警察、文职雇员不受此限。②

十五、本纲领需经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的代表通过修正案时方可修改。

---

①英文版原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弄错了。

②英文版原注：此条款引起激烈的争论，最后留至一九二二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一九二一年）

一、工　人　组　织

本党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每个地方，凡有一个以上工业部门的，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

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该警惕，勿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玩物。为此，党应特别机警地注意，勿使工会中执行其他政治路线。对于手工业工会，应迅速派党员前去尽快进行改组工作。

拥有会员二百人以上才能成立工会，同时，本党至少要派党员二人到这个工会去工作。

二、宣　　传

一切书籍、日报、标语（揣译，此处俄文为字典——译者注）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

一切出版物，不论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

三、工　人　学　校

因为工人学校是走向组织工会途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必须在一切工业部门中成立这种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补习学校”和“纺织工人补习学校”等等。在这种学校里，除了非常必要的情况以外，不必教若干门不同的课程。

学校管理处和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党聘请的教员可以参加校委员会的会议。

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关，否则无需存在，可加以解散或改组。

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觉得有成立工会的必要。

四、工会研究机构

这种机构应由各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它们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

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应为确定工人的纪律，在实践中实现共产党的思想。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

为了更确当地进行工作，这种机构的研究工作应分为以下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当前形势。研究的结果应经常发表。必须特别注意中国工人运动问题。

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

六、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

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俄文稿译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

——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情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

（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

（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

（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画〔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使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T. S. CHEN（即陈独秀）

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潭秋

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学校的楼上。在学校的楼下，除掉厨子和校役以外谁也没有，因为学生和教员都放了暑假。一个认识的校役则被请为大家每日作饭。另外他的任务，注意不放一个生人进来。假使不是认识的人向厨子解释，那他会根本不知他们是谁，因为他不懂他们的土话，他们讲的都不是上海话。有的讲湖南话，有的讲湖北话，而有些则讲北京话。

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九人里面有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我和董必武；山东济南的代表王烬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食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工作，执行与共产党斗争的专门任务。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为周佛海，现在国民党的著名领袖之一，而周佛海在广东时期，因其进行反党活动，即被党开除。在第一次大会上参加的一共只有十一人，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平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按李汉俊是被李宗仁系的军阀枪毙的），而李达则在五卅为革命浪潮高涨所惊骇，而退出党了。广东第二军代表为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他帮助了他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了党的屡次警告，结果仍开除了党籍，后很快即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家。

取消派领袖陈独秀在第一次大会上未出席。那时他在陈炯明下做广东的教育部长。在第一次大会后，陈独秀参加中共领导很久。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严重时期，他自己的投降政策出卖了革命事业。

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大会的组织是非常简单的。张国焘被选为主席，秘书为毛泽东和周佛海。大会开幕就在上面所说的校内举行的，而大会本身的工作则在李汉俊的家里进行。大会共开了四天。讨论以下的问题：1、目前政治状况；2、党的基

本任务；3、党章；4、组织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有力的争论，部分的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需建立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反对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的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的，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申明首先应真正的组织知识分子，把马克思理论给他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再才能有力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把联合知识分子，使党成为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来与他对立。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李汉俊的观点拥护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用公开的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照例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鲍怀琛。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了这两个都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他。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收入党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通过这些方针成为建立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开端。最后的批准党章改至大会的第四日议事日程上。但这天吃过晚饭后，大会的参加者晚八点集合于李汉俊的家中，主席宣布大会继续工作时，在隔壁房间内发现了一穿长褂的可疑人物，追问这不知名的人，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找社联组织的主席姓王的一个人，后又说找错了，即很快出去了。对的，离李汉俊房子经过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组织。但大家知道这一组织并没有主席更没有姓王的人在。因此这人对我们非常可疑，我们即很快收集了文件隐藏起来了。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真正没有经过十分钟，李汉俊的家中即出现九个侦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因此没有人被捕。

每人因此不得不找寻宿处，回到女子学校我们又不能，因为我们想侦探是从女子学校的踪迹探知我们的。

在开始时计算七天完结大会的工作的，但是因此不得不缩短到五天。同时在上海找不到大会工作继续的适当地点，决定了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到出发前，又得出了结论，西湖不是适当地点，因为那里游人太多。因此即在离上海三里北城的南湖举行。这里虽有游人，但较少。到那里后，我们即租了一只大船，买了食物、酒，好象游人一样在湖上的船中进行大会的工作。

这是大会的最后一天。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出席，因为在搜查后，在他们后面有人

盯梢。那天早上是阴天，但在八点钟后，即有许多游人。当然因此使我们的工作困难，但在十点半钟时，下起小雨来了，游人都散了，因此保证能安心工作，直到晚上十一点的一整天，我们都讨论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除了最后批准党章外，我们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关于设立中共临时中央局的问题，然后举行了中央局的人选。关于对孙中山的态度问题，引起了不大的争论。鲍怀琛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不同的阶级，在中间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中山应对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更坏一些，因为他们自己的武断宣传，使群众徬徨。这一种思想受到了大会代表的打击，对这问题通过了以下的方针，一般的对孙文学说应带有批评性的来对待，但个别的实际上进步的行动应拥护，采取党外形式的合作。通过了这一原则，可以说与今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的合作放下了基石，同时也为发展反军阀和反帝运动的基础。

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那时共产党员一共不过几十人。因此决定不组织正式的中央，为得与存在的个别支部发生联系建立党的中央局，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在临时中央局里选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委员，候补者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

这样即完结了中共的第一次大会。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引导中国人民的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年龄并不大（一共只十五年），而他经过了在斗争中的许多锻炼，和受了大的牺牲。党在成立后，已经领导了全世界闻名的广东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的总罢工。在这些斗争中，党已生长和巩固到这样了，已能组织五卅运动，争取伟大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组织延长到十六个月的香港罢工，进行了上海三次暴动，和举行了历史上的广东暴动，放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开端。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工作人员，无数的工农在国民党制度下受到了牺牲。在这些光荣革命牺牲者的血上生长起来了几十万的英勇中国红军，建立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国共产党在现在空前的民族危机条件下，正为联合全体反封建反帝的力量，来使中国人民得到民族解放及社会解放的最后胜利。

在十五周年时，中共的新政策——全民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受到中国人民广大群众的热烈响应。正在发展着的反日斗争，不可避免的将更加扩大和变为大的历史上的战斗。

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八七会议反对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六次大会反对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四中全会与立三路线及罗章龙右派作了斗争。这种斗争推进了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路上去。

在这十五年的中国革命澎湃发展的英勇斗争中，为革命事业而牺牲许多老的共产党员，另一些则叛变了革命，走进了反革命营垒。在第一次大会时期加入的党员，现在剩下的简直很少了。但在一次大会后，生长起来了新的力量。我们党最好的领袖苏维埃和

红军最好的领袖，在党内党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人——现在领导着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历史的斗争。

在第一次大会时，共产党尚未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他的总路线，同样他的组织原则，都按照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在第二次大会上，中共决定了加入共产国际。直到现在，中共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和巩固，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正因为如此，中共对共产国际的尊敬、信仰和忠实随着本身党的生长在加强着，生长着，巩固着。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李　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五四运动后，由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提高，由于马列主义的介绍、研究与宣传的相当普遍，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先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思想的准备与国际的声援等客观与主观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琴斯基（她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威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了北京，大家对他感到特别高兴。威琴斯基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的政策。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对于这位好朋友，很诚实地和他交换意见，至于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带着好奇心，参加了一两次座谈，以后和他也疏远了，和他经常接触的还有张太雷（因为他懂英文）、杨明斋（华侨，因为他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懂俄文）2人。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威琴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威琴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

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威琴斯基来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1920年8月，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是党成立大会以后退

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7人。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这个组织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当时在全国各地发起组织共产党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钊、张太雷、邓仲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在武汉由陈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汉俊本人也去到武汉）；在广东由谭平山、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在济南由王烬美（山东第五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在东京由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另函约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组织。邵力子、沈雁冰在党发起以后加入了的（以后都又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止，共有八个中国共产党小组，而巴黎小组与国内各小组当时联系很欠缺。

成立共产党的会议是在“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在会上大家提供的工人运动的材料很少，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的会议上也出现了。当时党的上海小组的工作分两部分：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工运工作；宣传方面，决定把“新青年”作为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从八卷一号开始。另行出版“共产党月刊”（报纸16开本，约32面），作为秘密宣传刊物。1920年11月7日出了创刊号，这刊物的内容主要是刊登第三国际和苏俄的消息，各国工人运动的消息。至于工运方面，在上海杨树浦组织了一个机器工会，由李中主持，此外还在上海小沙渡路筹组纺织工会，但未组成。北京、武汉和长沙等地，也开展了工人运动。

党的上海发起组，推陈独秀做书记。另外还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 Y.）因为当时有许多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S. Y.），上海的团部设在华龙路新渔阳里（铭德里）六号，两层两底的房子里，挂了“外国语学校”的招牌，团员有20余人，由威琴斯基夫人教授俄文，团务由俞秀松主持。这S. Y.的组织，除上海外，北京、武汉、长沙也组织了。

本年，孙中山在广州做大元帅，11月，他邀约陈独秀去广州做教育厅长，陈把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担任，“新青年”也交他和陈望道主编，我负责编“共产党月刊”；这份杂志的稿子主要由“新青年”社供给。12月间，威琴斯基回到苏俄去了，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大洋2百元，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都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搞工人运动没有钱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向陈独秀写信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按月支2百元做党的经费，陈独秀没有答应；还有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对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1百元，后来李汉俊未能按月编出，该社即不给编辑费，因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满意，这是他两人之间的冲突的起源；这时候党的经费是由在上海的党员卖文章维持的，往后因为经费困难，“共产党月刊”出至第三期就终止了。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对陈独秀甚不满意，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因此他也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广州来信责备我一顿，说上海的党员反对他，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二人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我觉得党刚才发起就闹起分裂来，太不象话，只得调停于二者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编了，他就把党的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于我，要我担任书记，我为了党的团结，只好接受了。李汉俊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看了考茨基的书才转变过来，他很想做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他的本性原是一个热中利禄的人，所以在党的成立大会开过以后，就跑到国民党去了。

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据我的记忆，当时国内和东京7个小组，共有党员约40余人，巴黎的小组不详。

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12人：

长沙——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陈潭秋。

上海——李　达，李汉俊。

北京——刘仁静，张国焘。

济南——王烬美，邓恩铭。

广州——陈公博。

东京——周佛海。

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均未参加。

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蒲柏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现在该校已改为革命纪念馆）。

党的第一次会议是7月1日下午8时在上海望志路（贝勒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寓所举行的，代表12人全体出席，第三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也到了。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餐桌，周围可坐10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也没有张贴什么标语。当时开会，大家没有一点经验，连怎么开法都不知道，会上有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关于第二个问题，有的说，北京政府不好，南方政府也不好，都是一丘之貉；有的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代表们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马林即席讲话，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有很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党添了一个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努

力革命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他讲话的时间约10多分钟，声音宏大，马路上的人都可听到。他致词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有一个不速之客闯进会场来，张目四看，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个名字，匆忙的下楼去了。马林很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他说“此人可疑，我们赶快转移。”我们离开会场不过一刻多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了10多个巡捕，拥进那个会场，结果扑了一个空，连片纸只字都没有得到。这房子的主人是李汉俊，能说法国话，他和那些巡捕说他家里并无人开会，那些巡捕只好走了。这真危险，假设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7月2日，代表们在住所里互相交换意见，报告各地工作的经验，当时党的工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与工人运动两项。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它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才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其它各地小组的组织却比较散漫些。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议会政策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在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上，时间是7月6日上午10时到下午6时。当天上午7时，大家从上海北站乘车出发，10时许在大游艇上聚齐，马林和尼可洛夫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人注目，未去参加。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组织也分这三部分。宣传方面仍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以“共产党月刊”为秘密宣传刊物。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其次讨论过对于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有人主张应该利用这样的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人反对参加这样的议会，以免陷于改良主义的偏向，当时因为这样的问题还没有到列入日程的时机，对此未作决定。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大意是说中国已有产业工人百余万，手工工人一千余万，这一千多万的工人，能担负起社会革命的使命，工人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剥削和压迫，已陷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只有自己起来革命，推翻旧的国家机关，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没收国内外资本家的资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才能得到幸福生活。宣言草稿中也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本质，主张封建的北洋政府必须打倒，但对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不满。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但多数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政府比较北洋政府是进步的，因而把宣言中的语句修正通过了，宣言最后以“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一句话结束（这个宣言后来放在陈独秀的皮包中，没有下落）。大会最后讨论党的组织问题，通过了一个简单的党章（这个党章和那个宣言一样都没有印行），并决议成立一个中央工作部，设一个书记，一个宣传主任，一个组织主任，工作部地址设在上海，兼负责上海支部，各地支部各设书记一人。中央工作部的书记推陈独秀担任，宣传主任推李达担任，组织主任推张国焘担任，共组成了中央工作部。于是大会宣告闭幕。次日各地代表陆续离开了上海。沈玄庐、李汉俊、陈望道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退出了组织。陈公博也退出，去美国留学去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党的组织阵容相当整齐了，中央与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分别进行宣传与工运工作，逐步表现了成绩。我这里只说起中央工作部在1921年7月以后至1922年7月的工作情形。

9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书记，常与马林、尼可洛夫会商（陈独秀在法租界曾被捕过一次，由孙中山打电话给法领事释放），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3期起至第7期止）。此外，本年秋季，在上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共产主义者（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9种，但在这一年内，只出版了15种，如：“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书，还出版了几种临时宣传性的小册子。“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

10月间，陈独秀和我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我任该校校长，入校学生约20人，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均由该校出身。当时任教者如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但办理不到一年，因经费支绌就停办了。

组织工作由张国焘主持，当时所谓组织工作，是专指工会的组织说的。他在北成都路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了10多个人，在办公桌上工作，一共搞了3个多月，却不曾组织一个工会。有一天，英租界巡捕房去了一个人询问那招牌是谁挂的，他听了这个消息，连夜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招牌烧毁，把一切工作人员都遣散了。他于是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到北京，交由邓中夏同志主持，他自己跑到莫斯科去了。在他离开上海起到第二届代表大会止的期间，上海几乎没有做工人运动。张国焘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带着旧官僚的作风，投机到党里来。他只知个人利益，不顾党的利益，他眼瞏眉动，诡计多端，若与别人有利害冲突，就迁事倾轧，“打倒你，我起来”，这是他唯一的本领，我早就看破他是“大不老实”的人。

马林和尼可洛夫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张和我，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我们工作报告。我的报告很简单，因为每一星期不能有书出版，再则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

个著作者和编辑。张国焘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拮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很少，因为这时的工运，在京汉与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的党主持，北京段由北京的党主持，中央只派了一个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没有好多可以报告的材料。还有陈独秀不住在自己寓所里，另外找了一个女人住小房间，除了他隔几日来与我们相会外，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我们全不知道，据我所知，除了他隔三、五日来我寓所看文件，拿几封信回去（因为党的通信都由我收转）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向马林作汇报，在陈独秀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所以陈独秀汇报了一次，第二次他就不去了。后来他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出来与马林等会面。我认为中国革命而不与国际相联系，太闹笑话了，所以曾和张国焘几次去劝他，他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容易才劝转他，才和马林等相会，但仍然是貌合神离。过了不多久，马林离开上海，先后去武汉、长沙、广州考察，于1921年12月间，回莫斯科去了，大概要向东方局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才回去的。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而实际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他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当时派赴郑州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破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他本人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书架上有一部法文资本论，他从不曾翻看过（他会法文）。他在报纸上写普通的政论是动听的，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则不懂，也不研究。“响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他有时忽发异想，说我们可到四川去，关着门干社会革命去。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在这时已经暴露了出来。

在马林等回国以前，国际来电，要中国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参加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弱小民族会议（这是与当时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的），因此党中央派了二、三十个S．Y团员去到莫斯科，任弼时、罗亦农等人是在这时前去的；瞿秋白同志在这时已到了俄国，他原是由北京晨报社直接派去的。日本、朝鲜也都派代表团去了。

从这时起直到1922年5月止，党中央方面除了间接指导京汉、陇海工运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作。

1922年3月，第三国际拍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 译为国民革命），当时我们不懂国民革命是什么。同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于是党就在7月间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些党员俨然是学者式样，他们就送我们一个绰号，叫做“学究派”。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人就作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是在李达家里召开的，后来分成几个小组流动开会，今天在这里开，明天在那里开。大会的情况比第一次稍有进步。张国焘根据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英文打字的宣传品，分析了国际的局势，同时大家又研究了国内的局势，提出党对时局的主张，因此分成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会上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此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帝国主义），认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农民的问题在会上也提到了一点。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并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从以上情形看出：

1．初期的党正在幼年时期，所以有许多不纯的分子混了进来，其中有地主，如沈玄庐、陈独秀、张国焘；有资产阶级，如陈公博；有投机分子，如李汉俊、周佛海等；有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受不起考验的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许多忠诚的同志们，却代表着党的新生力量，他们是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工人阶级的前卫，终于战胜了腐朽的反动力量，使我党成长壮大，领导了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2．初期的党员们有一部分即使是忠实于马列主义，仍是教条主义者，只知道说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如何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不懂的，幸亏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教条主义才逐渐克服下来。

3．党的初期，由于只高唱无产阶级革命，和劳工专政，所以专只作工人运动，从不曾想到农民问题。幸亏有毛泽东同志纠正这个偏向，指出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正确方向，因而壮大了革命的势力。

4．党的幼年时期，多数同志们幻想着中国革命可由全国工人总罢工来实现，从不曾注意到武装斗争。幸亏毛泽东同志早就注意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终于用武装的人民打倒了武装的反革命。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日

〔附〕扶桑笈影溯当年

周佛海

一个青年，要有理想，有抱负，有野心。否则，便没有灵魂。有了理想，抱负，和野心，而又要刻苦，锻炼，和努力。否则，便是狂妄。不是我自负，我在青年时代，是有灵魂的，同时，也决不狂妄。我幼时的抱负和苦学的情形，在“苦学记”中已经写过

了。不过那篇文章，只写到渡日留学，考进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时为止，现在把那个时候以后，留学期内的生活情形，以及暑假回国，从事社会运动的经过，略述一个大概。

那个时候，我国政府指定了五个日本国立的学校，凡是考进这五个学校中之一的，都给官费。五个学校，就是第一高等（毕业后入帝大），高等师范，高等工业，高等商业，和千叶医专。五个学校之中，最出锋头，最为当时的女学生所倾慕的，是一高的学校，戴一顶两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披风，脚下却穿一双"下驮"（木屐），在街上大摇大摆，昂首高歌，略略做一些出轨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社会人士，还认为可爱。我当时一心一意，想进一高，而一高又非常难考，见着一高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羡慕。现在我居然考中了，两道白边的帽子，也飞到我头上来了。这不单有了官费，经济问题可以解决，同时，我的理想也实现了。所以当时快乐的情形，远超过老童生进学。发榜后，立即向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处预支了一个月学费（那时每月是三十六圆），到房州去避暑，去海水浴。

开学以后，我就用起苦功来了。早上六点半钟起，晚上十一点钟睡，每日的十六、七个钟头之中，休息的时间至多不过二小时。因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学校的功课，已经忙得不亦乐乎，单只外国语一科，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本的古文。但是这些东西，决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课外的工作，比课内的更多。第一，读中国古书。第二，当时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潮，非常澎湃，尤其是俄国和德国革命，对于青年予以不少的刺激，所以我对此很感兴趣，这一类的书籍杂志，努力去阅看。第三，我对于西洋历史和当时的国际情形，也很有兴趣，因为那时正是第一次欧战结束，国际联盟成立的时候，所以阅读这一类的杂志和书籍，也占了我不少的时间。大约早晨起来，到学校之前，读中国书，有时读得起劲，竟高声朗诵起来，不管隔壁的日本同学，讨厌不讨厌。上课回来之后，阅读课外书籍，然后吃晚饭。饭后到帝大门前一带旧书店去翻阅旧书，借以散步，大约一小时。晚上读到十一时以后，从"押入"（壁厨）内里把铺盖拖出来，纳头便睡。星期日上午，还是用功，下午步行到神田的中国青年会看看中国报，或访访同乡。在一高预科的一年之中，每天都是这样，不单是日本同学没有交际，就是中国朋友，也少往来。不单是"芳原"（妓女区）"浅草"（游乐区）没有去过一回，就是影戏院也没有去过一次，只是星期日晚上，中国青年会演电影的时候，偶然去看看。每日唯一的娱乐，就是晚饭后跑旧书店。这个味道，印象很深，现在还常做这样的梦。

因为阅读国际问题的书籍，也有多少心得，一时高兴，做了一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并推测其趋势的论文，投到留日回国学生在上海办的"救国日报"，居然登了出来，而且博得好评。我中学时代的史地教师邓竹铭先生，远道驰书奖励，大为称赞。这便是我的处女作。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预科毕业，照例要分发了。当时日本只有八个高等学校。我因为要选择一个清静的地方，所以要求分发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鹿儿岛在日本的南端，风景秀丽，气候温和，人情朴实，是西乡隆盛的故乡，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时七高，有十三四个中国学生。我任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时，为我做了两年多科长，我任江苏教育厅长时，为我做了五年多的秘书，后来我任宣传部长

时，又为我任秘书的陈天鸥就是当时的同学，先我一年到鹿儿岛。我离开了重庆之后，他现在还在任宣传部秘书。帮忙我十年的老友，现在还沉浮于宦海中，不能展其抱负，我心中委实抱歉，加以现在关山远隔，鱼雁难通，落月屋梁，那能令人不怀旧雨而伤感呢！

第一年除学校功课以外，专门只看社会主义的书籍，国际问题的书籍，没有工夫再看了。读书之外，作文译书的兴趣也大增加。这一年译了“社会问题概观”一书，约六七万字，卖给中华书局，得稿费一百二十元。这个款子，留作暑假回家省亲的路费。当时梁任公一派的人，在上海办有“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载出来，稿费非常丰富。这种稿费，大部寄回家养母，一部拿来买书。

课外的娱乐，就是游山玩水和看电影。海湾中的樱岛，是大正四年发火的火山。我去时山顶常常还冒烟，岛上的枇杷和萝卜，味道特别的好。我和几个同学常于星期摇着小艇，渡海上岛游玩。每日下午，不是一个人骑脚踏车，沿着海岸到名叫矶滨的海岸去看海，就是登学校后面名叫城山的山顶去远眺。看电影的朋友，就是陈天鸥。晚饭后，两人谈起电影，便不顾风雨，由我们住的叫做城谷的地方，步行到电影区天文馆通。来回约有七八里，我们常常在大雨之夜，两个人打一把雨伞，赤着脚穿一双高跟“下驮”，跑去看电影。有时有好影戏，而钱却用完了，官费还没有由东京寄来，两人便只是干着急，希望邮差光临。但是邮差如来，而所送的是平信，仍旧失望，因为汇款的信，都是挂号的。我有时开他的玩笑，由外面进去，大声喊“书留”（挂号信）他以为送汇款的邮差到了，出来一看，原来是我。有时等邮差不到，而周围菜园上肥料，臭得心烦，于是大吟“前后有粪桶，往来无邮差”以自遣。

民国九年夏天，决心回浣陵省母，打一打算盘，除却往来川资外，所得稿费所余无几。想做一套西装，算来算去没有钱做，于是只好穿着学生装回国。那晓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进了。因为那时张敬尧督湘，我们的湘军，群起驱张，战事紧张，道路梗塞。这个情形，我在鹿儿岛完全不知道，这次回家，完全为省母，如今不能达到目的了。回想三年前离家出国之时，母亲自己伤心，而又怕我伤心，躲到厨房，背着我饮泣的情形，恨不得立即就跪在母亲膝下，倒在母亲怀中，去安慰她老人家。但是千里迢迢，除却望白云而洒思亲之泪之外，有甚么办法呢？写到此地，遥想母亲现在不知在甚么地方，不知情形怎样，真是痛不欲生，到了现在还用三国时代的办法来从事政治，实在没有甚么意义！

即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动身之前，去时事新报馆访张东荪。他是“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我因为投稿的关系，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报馆，他还没有到。有个姓俞的编辑出来招呼，不久来了一人，大约是研究系的相当重要的人，随梁任公游欧回国的，姓名记不清楚了，俞替我们介绍。他介绍我说这是周某人，是做文章的。他的介绍实在没有错，但我却万分不高兴。我当时抱负不凡，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当做一个单纯的文人，因此感觉到是一种轻视。文人，自然有文人的价值和重要，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后来东荪来了，却谈得非常投机。他们当时织织“共学社”，翻译名著，请我也译一本，我便担任翻译克

罗泡特金的“互助论”。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译书、看书外，便和几个朋友划船、登山、有时竟跳到湖水中游泳。西湖附近的名胜，没有不到过的。但是西湖夏天热极了。夕阳西下后，湖水把热气反射出来，尤其觉得蒸热。住了三个多星期，因为热不可耐，仍旧回到上海。

到了上海，张东荪告诉我，陈仲甫（独秀）要见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办“新青年”鼓吹新思想，为当时的当局所忌，所以弃职来沪，“新青年”也移沪出版。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现在拟已改为铭德里）二号，去访仲甫。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俄人吴庭斯基在座。吴大意说：“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他的结论，就是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我和雁冰是赞成的。经了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大钊）负责。当时所谓南陈北李。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所以“中国共产党纲”的最初草案，虽然是他起草的，他却没有加入。这个时候，只有筹备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我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的时候，恰当学校要开学，所以就回到鹿儿岛的学校去了。

我为甚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如此，以后如此，现在亦复如此。提起个人享乐，没有这样笨人，做这样笨的事。就是现在，也许有人以为我们的和平运动，为的是个人享受。其实冤枉万分。据我个人现在的情形说，最爱的电影不能去看，最爱的旧剧，不能去听，想去逛公园而不得，想去荡马路而不行。在家好象笼中的鸟，出外好比被押解的囚徒。每日生活，也不过日食三餐，夜眠一榻，不能象以前军阀官僚乱作胡为，穷奢极欲。不单如此，连普通人能享的福，也不能享，普通人能做的事也不能做。这种情形，还是享福？还是受罪？当时虽然是个穷学生，不能预知现在的情形，但是确确实实志不在此。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 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锋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

气之豪，实可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着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回到鹿儿岛之后，除掉上课以外，仍旧是研究马克思、列宁等著述，和发表论文。同时，我想要领导群众，除却论文，最要紧的是演说。所以纠合十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礼拜讲演一次，练习讲说。当时同学都说我有演说天才，说话很能动人。我听了这些奖励，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现在想起来，虽觉可笑，但是在青年时代，是应该有这样自命不凡的气慨的。

我约了几个朋友，租了一栋房子，自己弄伙食。每天有中国菜吃，生活比较在东京舒服。但是穷苦的地方，仍旧很多。一双袜子不破底，决不去换。夏夜蚊子多，没有钱买蚊帐，而又怕点蚊烟，只好拿了张报纸来盖头。蚊子虽然可避，报纸的油墨气，实在难闻！这一年译完了一本“互助论”。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 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出席。开到第四晚时，究竟是马令有经验，他说：“明晚一定要换个地方。我们在此一连开了几晚会，一定使巡捕注意。”我们说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时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紧。于是决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泻，不能出门，一个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进行的步骤，糊糊涂涂也就睡着了。大约十二时左右，忽然醒来，看见毛泽东探头探脑进房来，轻轻的问我道：“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我骇了一惊，问他，才知道是出了事。

原来他们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面生的人跑进房来，因为当时既没有卫兵守门，而汉俊家又是和同乡合住。所以此人上楼，没有人去阻止。他进房来一看，便道：“对不起，走错了。”说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马令机警，他说：“快散了罢，一定是侦探。”于是立即散会，只有公博还留着与汉俊闲谈。不到一刻钟，法国探目，安南巡捕，中国包打听，把房子围住，一涌上楼。探捕问他们为甚么开会，他们说大家都是北大学生，因为要出一种杂志和丛书，所以开会商议。探捕又问为甚么有两个外国人。他们说两人是北大教授，请他们指导。一个中国探捕指着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吗？”原来公博虽然自信他的北京话，说得和北京人一样，而别人听起来，却好象是外国人说中国话。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经了好久的说明，才证明他是广东人。巡捕看见汉俊书

架上，全是社会主义的书，于是大教训一顿，说不应看这些书。问了一刻，也就去了。侥幸巡捕没有搜身。他们两人衣袋内，都放有共产党党纲草案，如果搜出，还有不进巡捕房的道理。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密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径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那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吓得魂不附体。毛泽东以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发现了，吓得不敢回去。在远远的地方，探头探脑侦察了半天，才敢进去。这些话，都是我以后听见他们说的。

我听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后，觉得功亏一篑，实在可惜，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继续开会，但是上海租界内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鹤鸣（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力疾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鸣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鸣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烟雨苍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产生了。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那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分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当时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都先后宣告脱党。公博回粤不久，就赴美留学，无形的退党了。李汉俊，李鹤鸣和我，在十三年前后，都先后脱离了。刘仁静被开除变为托派了。我们当时的最高领袖陈仲甫（独秀），在十八九年的时候，也脱离了。张国焘在国民党兴剿共之师后，在鄂东还活跃了许久，但是二十六年也脱离了，现在在重庆，和陈立夫一起，做反共的工作。我以后二十六年秋，和仲甫在南京见面，二十七年春，在汉口和国焘见面，回忆前尘，都有隔世之感。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是罪孽深重！

大会完毕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分头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动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挥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才想出来的，可见得当时的幼稚了。但是苦干的精神，却可佩服。例如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日本话。我便在工人群居的地方，开一日语夜校。我自己每隔一夜去教两小时。"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做到了。不仅这件事，当时的经费，是俄国供给的。我和马令见面，不是在新世界、大世界，便是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在秘密工作正干得起劲的时候，暑假快完了，我不能不回到学校去上课，所以迭电催促仲甫来沪，以便交代工作，再去鹿儿岛。仲甫果然辞了广东职务，到上海来了。谁知他到上海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现在记不清了，不知为一件甚么事，仲甫和马令，虽然没有见面，意见却不一致。

仲甫是一条硬汉，一定要马令认错，才肯见面。而马令却不肯认错。正在这样相持的时候，有天我在仲甫家商量妥协方法，却被仲甫夫人拉着打牌。滑稽极了，仲甫夫人，杨明斋（俄国回来的山东人）和我三个人，打起麻将来了。仲甫和力子，在楼上谈话。忽然包惠僧跑来说："我刚从辅德里来，路上遇见密斯杨到你那里去了。"原来我的秘密住处，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我那时正和淑慧恋爱着，是鹤鸣夫人介绍的。听了惠僧的话，我就把牌让给他打，回到辅德里，淑慧正在等着，我便约她到法国公园去散步，经过渔阳里，她要去看仲甫夫人，被我阻止了，公园散步之后，我送她回家，顺道去看马令，他托我带一封信给仲甫，竟把第三国际代表的头衔拿出来，信中对仲甫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我带着这封信再到渔阳里，已是黄昏时候了。敲开了后门，忽然一个山东大汉问道："你找谁？"我说："找陈先生。"他说："不在家。"我立即觉得很奇怪，马上退出。我想仲甫家里没有这样的人，何以这样凶？回到辅德里不久，陈望道神色仓皇的走来说："仲甫、力子、惠僧、明斋、和仲甫夫人，都被捉到巡捕房去了。你这里一定很危险，赶快把重要文件烧掉，去躲避一下。"我闻讯之后，非常惊异。后来听见大家说起，才知道原委。原来我走后半点钟，巡捕来包围，把一切人都捉去。惠僧做了我的替身，他不来报告密斯杨的事，当然被捉的是我，决不是他。经过渔阳里时，如果听淑慧的话，去看仲甫夫人，我和淑慧，也都要被捉。这两关，我都逃过了。巧不巧呢？这还不算危险，还有危险的事。原来仲甫到了巡捕房，不承认他自己是陈独秀。巡捕房以为没有捉到陈独秀，所以命令把守他的房子的包打听，不论是谁，凡到陈宅去的，都要捉去。凑巧褚辅成去访仲甫，包打听不问青红皂白，把褚也捉去了。褚到了巡捕房，上级人员是认得他的，问他何事到陈宅去，他当然说是访陈，又问他是否认得陈独秀。他说不认得怎么去看他。捕房人员说带他去看。于是带他到拘留的地方。仲甫看见褚，正要打手式叫他不要指出，而褚却先大声喊道："仲甫，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事情弄穿了。捕房遂通知把守陈宅的包打探说，陈独秀已经捉到，以后来的人不要再捉了，我正是包打探接得通知之后，才去送信的，否则，一定也要被捉去。身上搜出第三国际代表的公文，真赃实犯，还有不判几年徒刑的吗？这些话，也都是以后大家出来，对我说的，我逃脱这第三关，真是大家之福。不然，一干人都要监禁几年。力子和仲甫夫人，当晚就保释了。但是营救仲甫却很费事。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重要的事。

原来民国十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第三国际，认为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会议，所以在伊尔库茨克召集了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以谋抵抗。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六七十人，派去出席。时间非常侷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我毫无办法。商量数次，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都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由我亲自出马。于是把营救仲甫的事，托付力子等人，乘直航长沙的轮船径赴长沙。

渡日的时候，由长沙到上海，所坐的船，不仅不是统仓，而且连四等仓都不如，是坐卧在运沪的米袋上的。这一次因为掩护起见，坐了官仓。第一次吃饭的时候，五六个茶房，站在周围侍候盛饭，我坐着非常不安，因为我这还是第一次经验。我觉得同是一

个人，为甚么我们可以坐着吃饭，他们却要立着伺候？但是过了两三天，也就习惯了，不觉得甚么不安。可见得一个人真诚而纯洁的灵魂，是容易堕落的。不过尊重人道的基本观念，我还是非常浓厚的。跟随我的副官们，不是做错了事，我决不随便责骂，对于其他的属下，更不必说，但是偏有人说我是官僚，架子大。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有许多人我不能接见，实在没有时间。我的时间，是要用在最有效的工作方面，那里能够用去听别人背履历，发牢骚呢？时间实在不够支配，连星期日都要会客，办事，敷衍不周到，自然是必有的事，那里是架子大？也许我的环境使人看起我来好象是官僚，其实我的书生本色，始终丝毫没有改变。误会的事，实在太多。去年由日返国，经上海坐夜车到南京，天气又冷又早，我万想不到会有人在车站接我。下车一看，车前站着财政部和中储的高级同事。我以为只有少数人，所以点头致谢外，就出了车站。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去接的，还有社运会等机关的许多人，看我没有和他们打招呼，事后骂我架子太大。其实我那里知道有这许多人去接呢？这些事不必解释，也不必求人谅解。不过写到此地，不觉自然而然的顺笔写起来，言归正传，离题出轨的话，不要再多说了。

到了长沙，住在当时有名的大吉祥旅馆，连夜去看毛泽东。他那时在曾公祠办了个自治大学，没有教授，也不上课，而名之为大学，可见得五四运动后当时文化界之混乱了。他就住在校内。我进去后，远远看见他在灯下看书，原来是用红笔圈李后主的词。他看见我忽然到来，骇了一跳。我告诉了原委，便连夜商量办法。三天之内，召集了二十余人。当然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农民一个没有，工人却有两三个。我分别见面，指定了集合的日期和地点，并分发川资后，就离开了长沙。当时军阀虽然没有特务工作，也没有蓝衣社，但是却也有他的侦缉队，不过不大灵敏罢了。我上了船走了半天，赵恒惕才派人到大吉祥去搜查。去年决心回家省母，而道路不通，今年到了长沙而不能回家，世界上的事，真是不由人算！不单是不能回家，而且因为秘密工作，连信也不好由长沙发，只好惘惘怅怅，离开长沙。

到了汉口，便去武昌寻陈潭秋，他在一个中学当教员。和他商量，在两日之内，约集了十余人。闲时和他去游黄鹤楼，望着长江景色，真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照例和各人分别谈话后，于是随流而下，到了安庆。这个地方，没有熟人。在上海时，老早托高语罕介绍了两个人，于是拿着信去寻。但是这两人并非党员，而安庆也没有党员，所以比较费事。他们约我游菱湖公园和临江寺，一面游玩，一面说明，住了两天，好不容易才集了五六个人。于是又以安庆两个新友的介绍，到芜湖赭山的第五中学去访一位学生。在此地也约了二三人。经过南京，并不勾留，一直回到上海。这次派赴伊尔库茨克开会的青年，以后大部都到莫斯科去留学。后来共产党的新兴干部，一部就是这一批先生们，一部乃是法国回来的勤工俭学的学生。这两部分人，在共产党内，磨擦得很厉害，而其势力，也互为消长。这是后话。

到了上海的时候，仲甫已经出狱，并和马令见面了。学校早已开学，我便把经手的事，交给仲甫，偕淑慧渡洋，到鹿儿岛去了。去年看报知道仲甫在四川江津逝世，回忆故人，凄怆欲绝。

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鹿儿岛的中国同学，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

道了。到了鹿儿岛，他们暗中对我，非常监视。我的导师门胁先生也警告我，要我注意，否则，有被开除学籍的可能。于是我便老老实实的用功，好在鹿儿岛也没有活动的余地。

日本高等学校每年两次的学期考试，是非常严格的。不单是中国留学生留级的很多，日本的同学，留级的也不少，甚至有留两三年的。一位山西同学，和我同住，每一年级，必留一次，人家只要三年，他却读了六年。很佩服他有毅力，终于毕了业。我是很怕考试的。因为平常课外的阅读和译作，占了我许多时间，学校的功课，除却西洋史一类自己爱好的，和英文德文一类每日要缴卷的东西以外，平日是睬也不睬的，一定要到考前一两周，才临时抱佛脚去连夜赶看。考试的关头，真不易过，就是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考期快到，而许多东西，还没有看，心中着急，急醒过来，原来是梦。可见得考试给予我的印象的深刻了。但是侥幸我一次都没有留级，很顺利的毕业了第七高等学校。

鹿儿岛实在可以留恋，樱岛朝霞，矶滨夕照，时常在我梦中。四年来，屡次经过福冈，飞往东京，总想到鹿儿岛去重游名胜，再访母校，因为时间关系，终不可得。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以偿宿愿。

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当我偕淑慧甫抵京都车站的时候，便服警察，就迎上前来，问我是否周某。因为我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那里的警察，早巳电京都报告了。我们在学校后面的吉田町，租了牧田家的楼上两间屋子住起来，自己开伙食。当时大学生的官费，是每月七十二元。两夫妇每月用七十二元，自然拮据得很，所以不用下女，一切买菜、烧饭、洗衣，都由淑慧自任。有时官费没有寄到，便把衣服或书籍，拿到当里去当。起初去当，倒有些难为情，以后也无所谓了。

当时先生，除却河上肇外，我最爱听以后曾任商工大臣和铁道大臣的小川乡太郎的财政学，小川口如悬河，象个政治家。河上一副冷静的面孔，严肃的声调，真可以领导人走上冷静研究的道路。在大学时期，我每日是过的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只是晚饭后，或偕淑慧到附近田野间去散步，或一个人去跑旧书店。有了好电影，一定去看，但是都是一个人去。因为一则吉田町到电影区的京极，相当的远，我来往都是步行。二则当然买的是最低的等级，常常没有座位，要立着看。当时日本放映时间很长，一立就要立三四个钟头。有时站得太吃力，只好蹲着休息。我是电影迷，情愿吃这样苦。淑慧自然不会这样。所以大概是我一个人去。在京都也组织了一个讲演会，每周练习讲演。有次我的演题，是“资本是甚么”？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说明资本的本质，发生和发展，深得同学的好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情形，犹历历在目。

幼海是京都出世的，当时穷的要命，淑慧生产的时候，当然不能进医院。生产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连夜于大雨中去接产婆，以后时常帮忙淑慧，抚养小孩。她这样的热心，我们非常感激。前年淑慧赴日，特地到京都托警察査了出来，前去拜访。我由东京返国，经过京都时，也去看了她。事隔二十年，我们还特地去访问，日本报纸

对我们这样的念旧情般，都非常赞誉。

多了一个小孩，事情就多得多。有时我正苦心焦思，研究一个理论的时候，小孩大声啼哭，真是心烦。淑慧除烧饭、洗衣外，又加上抚养小孩的事，生产之后，不到四天，就起来烧饭，可见得当时的艰苦了。有次我去上课，她去买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来，刚好那时她回来，已经满房都是烟，小孩闷得气都闭塞了。如果她迟回去十分钟，房子就会烧掉，小孩也要葬身火窟了。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那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那里能革命？那怕你志气比天还高，那怕你野心比海还大，不能生活，甚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锋头。陈仲甫、李守常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那里能够如愿？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一百五十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这件事情，虽然用尽心思，没有办法，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原来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许多共产党都加入了国民党。这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我当时虽然还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约我去广东帮忙。他当时任宣传部长，要我任秘书，每月薪水大洋二百元。（当时广东，都是毫洋。）后来到了广州，邹海滨（鲁）又要我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别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二百二十元，而对我却送大洋二百四十元。当时要求一个每月一百五十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现在每月却有四百多元的收入。加之那时广东，革命空气，非常浓厚，革命工作，非常紧张，事事都表现前进向上的蓬勃气象。所以我由学校一出来，就得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实在是始料所不及。但是这些都是后话，当在学校还没有找得职业出路的时候，实在焦急万状。我想快要毕业的无数青年，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情形的。大家不要着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预先播下了“努力”的种子，虽然一时觉得山穷水尽，终究会出现柳暗花明的境界的。

我不是道学先生，也不愿意学道学先生。老实说，我秉性也不许我这样拘谨。回国以后，也曾有过不少的放诞行为，浪漫事实，但是在留学的八年之中，却真正过的是清教徒的生活。不单是没有一件足以称为“罗曼史”的艳遇，连狎游也没有尝过一次。现在可以回忆的只有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我是爱吃酒的，量虽不大，兴致却豪。在到鹿儿岛的第一年，有一晚和同学痛饮，大醉而归。不知道如何于归途中倒卧在路傍。我当时

住在城山后面一个僻静地方，叫城谷，往来的人，非常之少。仿佛有位妙龄女郎，扶我起来，而且扶送我回家。我进了“玄关”（大门）马上又倒在席上，只说一声“谢谢”，也没有看清这位女郎的面貌，更没有问她的姓名。次日酒醒，也就忘了。两三日后，在赴学校的途中，遇见一个女学生，向我微笑，我以为是偶然，也不注意。不久，又偶着，仍是微笑，并且好象要和我说话一样。我以为是认错了人，但是觉得非常奇怪。第三次又遇着了。本来想问她一句，不过当时脸薄得很，和女人说话，脸就要红。我们用了一个老太婆管家，她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带来同住，也生得相当秀丽，我和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总不敢对她看。就是现在和初次见面的女人说话，也觉得非常不自然。所以当时虽然要向那位小姐谈话，真是欲言而止者再。倒是她走近来先开口道：“那天晚上，你的酒，吃得真太多了。”我恍然大悟，回想起那晚扶我的女郎。以后便常常遇见，因为我们学校的对门，是一所高等女子学校。她到学校去上课，常常途中相遇。路上没有人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谈话，而且越谈越亲密。但是我却没有问她的住址，当然没有去拜访她。如果进一步的追求，当然大有成为真正罗曼史的可能，但我却就中止了。这便是我留日八年，唯一无二的够不上算艳遇的艳遇。

往事如烟，前尘似梦，一一追溯起来，倍觉光阴虚度，老大徒伤。二十年来，经历了事业的艰难，体验了世途的险阻，当年的抱负，昔日的野心，好象过去的事实，如梦一般的消逝了一样，也如烟一般消逝了。今后只希望尽自己一点微力，俾能对于国家和人民，略有涓埃的贡献，以了此残生，其他还有甚么冀求呢？

（转自周佛海《往矣集》）

〔附〕我与共产党

陈公博

前言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厨，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我更不想代共产党守秘密，我久矣和共产党立于反对地位，确认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就是苏俄，只有共产党的专政，没有实行过他们所谓什么共产主义。而且我更根本否认马克思的学说，就是今后，世界各国也不会实行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不想发表这篇文章的理由，在于我和陈仲甫先生有过一重不想告人的公案。仲甫先生在北大是我的学长，以后有过交谊，做过同事，

心内总想在我生时，可以不发表还是秘不发表。本来我在民国十四年由美回国之后，就想发表我和共产党的经过，只因当时国共合作，恐怕因我一篇文章，影响到国民革命的前途。十六年底共党乱平，我在上海办革命评论时，也有过一次想发表，无如当日南京咬定我，广州共党暴动是我勾结共党干出来的，并且上我一个尊号是叫做准共产党。我一生自命是硬汉，素来不喜欢解释，在各人都叫我是准共产党时候，而我却做这篇文章，无异于讨饶，因此我也不愿发表。及至二十一年到南京参加南京政府，也想过在“民族杂志”发表，但那时仲甫先生被共党目为托洛斯基派，已被共党开除，仲甫先生很不得意，生活也发生困难，如果我发表这篇文章，无异落井下石，乘人之危，非大丈夫所当为，及后仲甫先生被捕下了狱，我曾到狱中探视他两次，人是苍老了，发也秃白了，颜也憔悴了，我何忍再发表。及我离开重庆不久，仲甫先生又已逝世，我想文章是决定写的，还是写好留待身后发表罢。

自佛海兄在“古今”发表过两篇文章，附带提起我和共产党的关系，许多朋友闲谈中，问起我参加共党当时的情形，一时我也说不清，因为当时的经过，非三言两语所能尽述，心想这段史实似乎应该叙述一下，恰好周黎庵先生又要我写文章，一时高兴，给了他这个题目。然而事后又懊悔，也曾给黎庵先生一封信，说我和仲甫有过一次纠纷公案，不愿执笔。黎庵先生告诉我，说以当时之人而记当时之事，当为信史，假若不写，反使人发生许多揣测。方焕如先生见了“古今”发表的预告题目，又来函希望我多叙脱离共党事实，因为他曾留学莫斯科，见过共党关于我脱离共党的报告，他很怀疑，所以希望我据实来一次写作。好罢，这篇文章即然决定要写的，迟早发表似乎不生什么问题，然而我对仲甫先生隐忍二十年，今天倒把他和我这重公案翻起来，似乎还有些于中未歉，好在今日事已过去，即不是一种是非问题，更不成一种攻讦问题，而只是一种事实的报告，我想就是仲甫先生今日还在世，也会原谅的罢。

一

这篇文章唤做“我与共产党”，自然我是一个主角，这样就由我个人写起罢。谈及广东共产党的起源，很多人传说，广东的共产党发源于北京大学，以为广东的共产党远在我北京时代就有了组织，其实这是误传的。大概因为广东共产党开始只有三个人，就是我，谭平山，谭植棠，而三个人都是北大的同期毕业生，因此附会流传，遂有这种推想。实在我们在北大时，一些组织也没有，除了谭平山参加过“新潮”社外，我和植棠，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我在广东做学生，已被人目为动如脱兔，而在北京时却静如处女，这一段历史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简单说说。

我在民元时候，本来也是个浮嚣使酒骂座的少年，那时不过二十岁，被人任过军队中短期的参谋官，更被人推举过县议会的议长。何况远在丁未就自命参加过革命运动，而且又在报馆当过了记者，会写几句短评，会做两首歪诗，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到后来卒至折节读书，那就不能不感激我的父亲了。

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

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但那时所有的学校都一律停办，如何有机会去入学校。父亲后来想出主意，叫我入伍学生军，因为父亲认定学生军也是一种学校，入伍无论时候长短，终会学些所不知道的事情。实在说，当时我真不愿意，无如父亲当时直是下命令一样，我只好郁郁脱去军官的服装，去当普通的士兵了。

那知道我入伍三个月，自己觉得样样都不懂，开正步其始以为很容易的，焉知道真正合乎正步的姿势，短期真不容易。每天早起和睡觉的喇叭，我也弄不清，除了食饭号之外，要有同伴通知我才会动作。我把这话告诉了父亲，他这时倒好笑，说那样你连士兵都当不好，那里配做参谋。大约你现在才知道学然后知不足罢。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而又十分惭愧，从此矜平躁释，才决心求知，这是我为什么后来苦苦读书的缘故。

学生军解散之后，没有几个月父亲逝世了，经过两年的教员生活，我决定从父亲之命，找学校求学，那时广州名为高等教育的，只有法专（法政专门学校）和高师（高等师范），我为兴趣考入了法专。但学费从那里来呢？靠着平时报馆的关系，一面做撰述，一面做学生，倏忽三年，便毕业了。在读书的当时，不知不觉发生了思想问题，读了比较行政法，比较国际公法，比较宪法，感觉许多问题无从解答。我想这样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就因学识不广，见闻不多，毕业时听见北大有了哲学系，竟想以哲学为解决思想的锁钥，决心北上，于是在民国六年的夏天，终于一个人孤独的，寥寂的，到并无一个熟人的北京城。

我北上的时候，自己已下决心，就是不管闲事，专管读书，丁未和辛亥时候一段历史，决然把他忘记，而从头做起。在北京三年，真可以说养心性，寡交游。一般朋友固然很少往来，就是蔡孑民先生不过见过一次，陈仲甫先生也见过一次，胡适之先生倒见过二次，而每次见面都是无关宏旨，见孑民先生是请他写一付对联。见仲甫先生是和谭平山去的，为的是问考试日期，见适之先生是好奇，因听说他有一张纸写明“谈话请勿过五分钟”，这是在当时北京讲应酬的社会很少见的。至于其他一次则在五四运动之后，北大教授都处在风声鹤唳之中，上海的国民党本部有人托我请他南下编辑，后来他考虑之后婉谢，通知我还是用电话，这一次算是比较有重要的事了。

在北大时，所来而不大往的都是同班或同住的同学，最熟的要算谭平山，和他族侄谭植棠，其余区声白、何邦瑞等，都是广东人，算起来不满十个。新潮社是成立了。平山加入后来征求我的同意，我告诉他我的思想还未成熟，写文章似乎为时尚早。我这话本来是推托之词，新潮社的人物，我本来不大来往，所知的只有同班康白情，而康先生有一次举动使我发生微微的反感。康先生是我的同班，他每次上课照例是迟到的。恰好一次是上老庄哲学的课，讲授的是马寅初先生，马先生大概看见康先生的迟到，视为常例，平日不以为然，这次他正襟认真起来，问他为何来迟，康先生答他住得太远。马先

生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走路来此不过五分钟，何得谓远。康先生说，先生不是讲庄子吗，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这一场争辩，两方面都似乎不能下台。康先生当时是新潮社的活跃分子，我看见这样的诡辩，不由得对新潮没有好感。自然我以康先生一人而概括新潮全体人物，实在以尺量天，然而我素来有种莫名其妙的怪脾气，好观人于微，既对康先生不满，自然不愿引为同列加入新潮，更没有替新潮写过文章了。

五四运动终于勃发了。我在那天本来没有预备参加，只见同住的同学们说，“我们到新华门请愿”，“我们到新华门请愿”，我在那时正兼广东四报的通讯记者，以新闻采访的兴趣，也随众到了新华门。我记得领队的是法文同班许德珩先生（在他十六年由法国回国时才开始做朋友，加入革命评论），他象疯狂的指挥着同学，排着一条长蛇阵在新华门前请愿。北京的五月已经很热了，旭日当空，汗流浃背。新华门是关着，许多同学似乎站得疲劳要散了，我还忍耐着，以为不来则已，既来则须看到终场。许先生发出命令，叫同学不要走，若请愿不应，预备下跪。他不发命令还好，他一发命令，顿时惹起我莫名其妙的反应。我心想请什么愿，有力量便打进去，没有力量便散去更作后图，为什么要下跪？好！走罢！于是我个人便离开队伍，走到南池子雇了一部洋车，便回公寓看书去了。到了下午，公寓里起了很大的骚动，说同学游行，打进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的住宅，事已闹大了，同学们恐怕要发生意外的危险。我那时预料没有了不得的大事，还是很沉着的采访我的新闻。

五四运动鼓不起我兴奋，其后虽然参加过几次会议，但那是我的职务，不是我的兴趣。那时我是哲学系的班长，出席虽然不能不去，但依然很少发言。只有一次我曾和几个人去发传单，鼓动罢工和罢市。那时已是民七的冬天了，那次运动和五四无关，也非新潮社所鼓动。现在记得似乎还是区声白发起，都是我们几个人自由行动。我明知北京不会罢工和罢市的，但几个人公推我到香厂的新世界发传单，我觉得这样行动比新华门请愿有意思得多，所以我慨然允诺。我还记得那夜是隆冬，香厂新世界游人无几，我跑上屋顶散传单时，看见底下行人寥寥可数。我想这样是没有效力的，但负了这种任务，终要完成，跑上屋顶散了传单之后，便下至三楼听梨花大鼓。心想不久恐怕警察要来搜索了，但迟之甚久，还是鸡犬不惊。我自己也觉好笑，费了很大的劲来发传单，而结果却不发生丝毫影响。梨花大鼓实在听得无味，一个人又到了香厂一家澡堂洗了澡，踽踽凉凉的回公寓去了。

北大那时真有些思想杂进，就以文学系而论，有讲白话文的陈仲甫和胡适之，有主张复辟拖辫子的辜鸿铭，有专讲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有提倡旧文学的刘师培和黄季刚。此外还有许多课余组织，如古代音乐研究会，图画研究会，甚至有研究皮簧梆子的结社，打拳健身的教师，真是鱼龙曼衍，百戏杂陈，不过对于社会主义的组织，还是没有。而我呢？还是我行我素，独往独来，个人的思想确是复杂而在那里变化，往往读书至夜深三四时，还是在那里思索。我可以说未至北京之时，苦于求思想，即至北京之后，苦于多思想。就以唯心唯物两论而说，终日在脑内思维，终无是处。康德的心物调和论，只是心物两论的调停，若夫治学，应于何处下手，安身立命又应在何处下手，的

确是我当时一种极端的苦闷，这个苦闷，直至后来研究经济学理才算解除。

说至此地，我似乎应该说说平山和植棠两人了，平山的原名本叫谭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山，也是由聘三谐声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在民十四回国之后，我很感觉奇怪，为何平山前后判若两人。问问植棠，才知道平山受党的鞭挞而非出自本性，我才恍然大悟。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二

谈起广东共产党的历史，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它的机关报"广东群报"，可是群报的创立当时，远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当我们在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和平山几个人便商议回广东办一个报馆，当日办报纸的动机，并不在于营利，我于报业是有经验的，尤其在广州办报只有亏本。我们的动机也不在于自我宣传，那时我们刚在学校毕业，只想本其所学，在学校教书，根本并没有政治欲。我们的动机的确在于介绍新文化，因为我们离北京南归时候，广州还在所谓桂系莫荣新的掌握中，广州当日报纸也有十多家，除了小报不算，大概可以七十二行商报和国华报作代表，七十二行商报性质近于上海的新闻报，只问广告，不问新闻，更不问社评，国华报则完全类于上海以前风行一时的横报，专门大胆描写色情文字。我们常常批评广东报纸的文字是第四等文字，甚么是第四等？我们也没有标准，只是一种刻薄的批评，以为第三等已是低下了，然而还是不够，所以谥它是第四等。自然当日我们是以介绍新文化为目的，但甚么才是文化，我们当日也没有抉择，只是介绍各种未曾输入广东的学说，这种思想大约是受了蔡孑民先生的影响吧，但当时群报的确是这种姿态。

群报当日设立，股东很少，不过几个人，所谓股东都是同学们，他们也知道投资是失败的，入股只是对朋友一种应酬，集资三千元，结果收股不过半数，也有些名为股东，实际至群报关门，还未交出股本，也有些只交半数，其余就赖着不交。我这个人除非不干，一干便不会回头，无论成败，出了版再说，因此在千辛万苦之中，终于出版。主持群报的就是平山植棠和我三个人，以经验的关系，推我作总编辑，平山编新闻，植棠编副刊，这样便宣告出版。

我知道广东的政治情形，群报是不会长命的，在发刊词上，我结尾一段语，说恐怕不出三日便要关门，那里知道真真三日便关起门来，原因是广州又发生政变了，陈炯明由漳州起师，以粤军回粤为名，驱逐桂系。群报出版当日，陈师已越惠州，官厅恐怕有些报纸替粤军宣传，索性下了一纸命令，所有报纸一律停刊，各报停刊的翌日，也曾集议一次，同业都埋怨我，说我那篇发刊词，真是一篇预言。我那时倒心安理得，因为群报能够停刊，亦一佳事，群报虽然免强出版，我已煞费张罗，股东即不肯投资，不独我的衣物典尽当光，连太太的金钏也上了质库作排字工人的伙食了。各报停刊没有几天，粤军终于占领广州，莫荣新解除兵柄，只身由西江北遁，于是各报又自动出版。

有一夜，区声白先生带了两个人来见我，一个是陈雁声，一个是陈秋霖，他两人本来陈炯明要他接办政学系的机关报中华日报，但忽然为夏重民所夺，所以亟望自己能够办一个报，或者参加一个报馆工作，出一口气。并说陈炯明每月有三百元给他们，意思就是拿三百元来津贴群报。当时我对于他们两位来帮忙是欢迎的，那时我在法政专门母校已当教授，编辑工作一时忙不过来，而平山又那样的名士风度，他高兴起来，看看新闻，不高兴起来，连报馆也不到。植棠对于编辑还没有经验，一切都集中我的身上。可是对于三百元的津贴，我绝不愿意接受，由他们两人分用，作为薪俸。同时我对两位先生声明，群报不能作为任何人的机关，只能介绍新文化，如果同意，就此片言为定。那两位先生也干脆，他们说对于新文化很有兴趣，绝不替陈炯明作个人宣传。自后秋霖和雁声便加入群报阵营。雁声代了平山的职务，秋霖作作短评，写写散文，植棠依旧编副刊，我和平山便专意在法政和高师当教授，只是每天下午到报馆，写写评论，看看大版。

仲甫先生终于在沪上和俄国共产党发生关系了，对于广东，认为是革命策源地，非常注意，于是俄国便有两个人以经营商业为名到了广东，说也奇怪，那两个俄国人当时首先在广东往来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区声白是研究无政府主义的，遂连带和我们往来，那时广东虽然粤军回粤，内部的暗潮动荡不宁，在政治上有胡汉民先生和陈炯明磨擦。在军事有许崇智先生和陈炯明的磨擦，而在改组前的国民党，即无组织，又无训练，也无宣传。我们觉得在北如此，在南如此，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广州共产党，并开始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公开在广州宣告成立。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声势很是浩大，参加分子有各学校的教授，也有各学校的学生，原因是我和平山在高师和法专当教授，所以参加者非常踊跃，老实说，参加的人员决不是对社会主义有研究，而是好新和好奇。其时国民党人也有研究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既多，声势殊震。广州共产党利用这个青年团作外围吸收共产分子，以后林祖涵、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都是由那个青年团慢慢吸收入党的。

青年团成立后，最大的工作厥为一方面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吸收工人。知识分子当日似乎不成问题，至于工人则广东号称产业工人的似乎没有。于是共产党集中注意于机器工会和海员工会，至于职业工人，青年团也尽力的推进。那时候仲甫先生已应陈炯

明之聘来粤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自上海南来，更叫我任宣讲所所长，推进组织的工作。

群报阵营是相当复杂的，陈雁声和陈秋霖始终没有加入共产党，雁声是国民党而不满意陈炯明，秋霖是国民党而同情陈炯明，平山植棠和我则始终超然物外，专心致志于办报和组织。我们常常在工会开会，在各地演讲，我们也不告诉雁声和秋霖，而雁声秋霖也知而不问，恰象两方都有君子协定的模样。

青年团成立之后，虽然做过不少事，但滑稽戏剧也时常排演。有一次德国共党失败，其首领李卜克来西和卢森堡死之，上海中共一定要广东极力宣传，我的主张，以为广东根本不知李卢为何如人，只要文字宣传已足，而上海则主张纪念游行，后来我索性不管，另由他人主持，拿彩亭抬着李卢遗象，满街鼓吹着走。过路人们，以为是甚么牧师和太太死了，故而小出丧，我心想这样太滑稽了。上海当时要做这类事情，也不止一次，我对于上海那班先生不近人情，已骎骎有厌意。中国各地重要都市的青年团依次秘密成立，遂有民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沪的召集。

三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这次大会给我的坏印象不少，大概我后来脱离共产党，要以这次大会给我的恶劣的印象为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为后果。

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是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学的，也有住在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发生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

第一件事就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甚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我心内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为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

许当校长。我争辩着，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甚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甚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极了，我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内倒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人反对，又取消议案，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类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过宣言，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那时孙先生是广东非常国会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徐是北洋军阀左右下的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对，辩论很久，宣言终于通过了。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后来到最终会议，才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第一次大会的文献，没有宣言，不过当日共党是秘密组织的，有无宣言，世间也不注意罢了。

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俄国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他们走后不到三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现在我还记得，有三个法国警察官，有四个中国的便衣密探，至于外面还有多少人，那我被关在楼上是不知道的。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乎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着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为首的法国警察。问谁是主人，汉俊不慌不忙的自己承认。这样搜索，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惟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审问汉俊。他们问汉俊为什么家藏许多书，汉俊是懂得几句法语的，告诉他们他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他们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他们问汉俊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

审讯完汉俊之后，便轮到我了。在搜索时间，我不能发言，我不能起身，但抽烟是可以许可的。自从国焘们走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我们刚刚燃着一枝，法国警察便上来，我坐着没有事做，连续把那余下的四十八枝烟卷吸完，终于被审问了。还幸

他们问得早一点，若再迟五分钟，便无烟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法国巡捕开始用法语问我，我那时还未习法文，旁边一个中国人说："总办大人问你是不是日本人"？这时，我很诧异，为什么那位先生倒以为我是日本人。我想还是直接通话为便罢，遂用英语问他懂不懂英语。这样，他便用英语问我，以下是开始的简单问答：

"你是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气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本人"？我有些开玩笑。

"你懂不懂中国话"？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

"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由广东来的"。

"你来上海什么事"？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这里"，我一想不好，我决不能告诉他我住在大东，在旅馆我还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有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所以这样告诉他。

法国警官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但关于我是否日本人的问题，他还反复研问，我揣测他这样寻根觅究，也许他另接报告，以为我们中日俄党人在这里开什么会。这样又经过半个钟头，那位法国先生便用法语向汉俊演说一番，后来汉俊告诉我，法国人所说的话，大意说知道我们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的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希望我们以后专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我们了。

他们一窝风下楼之后，汉俊便催我急走，我说危险算是过去，我们何必事后张惶，再开一听长城牌享受一下罢，因为我不吸烟又半个多钟头了。尤其是难受的，两个钟头未喝茶，口干得厉害。汉俊重新叫人煮水沏茶，楼梯又响，我那时真有些吃惊，难道他们又卷土重来，谁知那人头探出来的是包惠僧。惠僧问我们法国巡捕走了没有，我说此非善地，你还是走罢，详情明日再谈。惠僧走后，我和汉俊再谈几句，看时计已十点多钟，遂和汉俊告别。

我总以为大风过去，海不扬波了，但出了汉俊门后，倏见一个人隐身在弄口，似乎在侦察，我走了几步，他居然跟着来，我故意走快几步，他也走快几步，我走慢几步，他也走慢几步。我心想今夜终不能回大东旅馆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为有许多文件，倘不烧毁，终须贾祸。路边恰巧有一家商店，还是灯火辉煌陈列着许多商品，我装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样脱身。可以说是灵机一动罢，我记得去年由北京转沪回粤，在上海曾逛过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两场电影，地上露天，屋顶也露天，那个地方异常黑暗，是容易脱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黄包车往大世界，谁知那人也雇了黄包车跟在后头。我到大世界后什么地方都逛一逛，很游闲的逛书场，逛戏场，终在地面的露天电影看了三四分钟，便踱至屋顶的露天电影，在人丛绕了一个圈，从别门下楼雇车回大东旅馆。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了箱子，关好了房门，一口气把文件用火焚烧，全搁在痰盂，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形，湮灭证据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夜是阳历七月中旬，是上海最热的时候，我们的汗闷得出不来，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两人把席子拖下地板，才安稳睡了一觉，热极生风，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我从地板跳起来，打开房门一看，看见走廊寂寞得没有一个人，只是急雨打窗，狂风吹面，我想明明有枪响，有惨叫，那莫不是我变了福尔摩斯的案中人么？我唤起励庄，告诉他我所闻，但两人都猜不出什么事故，我反怀疑是一种梦境。

还是睡罢，到了九时，有一个茶房跑进来，说你们隔壁房间有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我问他什么一回事，他说前日有一男一女投店，今早那男的起身还叫了一碗面，食后出去，我们问他要钱，因为他只交柜上五块钱。他说立刻便回，我们也不注意，不料刚才我入房打扫，那女的已死在床上，经理立刻来看，她身中一枪，并且颈上还有毛巾缠住，看起来大概男的打了她一枪不死，又用毛巾来勒毙的。我听了之后，我也不告诉他今早所闻，恐怕他还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不过我再想，如果有巡捕和侦探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此地不宜耽搁，还是走罢。我去找着总经理，那时大概是郭标罢，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我说我隔壁出了命案，我的太太非常惧怕，所以今日要去杭州一行，把所有行李，暂存旅馆，俟回来还要换一个房间。这种说话，自然郭大经理坦然不疑，我和我的太太，趁着巡捕和侦探没有光临，遂离开旅馆。先在一家饭馆安顿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鹤鸣告诉他昨夜的经过，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会期不定，我更可以从容的游西湖，逛灵隐了。

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的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那个西崽，趁他的大班往青岛避暑，偷了他一根手枪和孔阿琴来大东开房间。到了天明，开了一枪，而孔女士居然不死，那男的急极了所以又加工的用毛巾去勒。大概一时男的有悔意罢，或者独生总比同死为佳。他收拾起死心，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又叫了一碗面吃饱，才扬长而去。此事经已大白，初到的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天热的杭州，等于一个大汽炉，蚊大如蝇，夜热逾昼，我们只好赋归了。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大会宣言发出与否，授权仲甫决定，因为仲甫已被举为中共书记，当日所谓书记，就是党魁。我和各人草草谈了两三次，遂乘船回广东了

在上海还听见一件关于戴季陶先生的轶事，季陶和仲甫约定共同发起共产党，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来了一封信，说他和国民党关系太深，的确不能参加共产党组织，不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正在创办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但和各代表来往很少。佛海正闹着恋爱，共产党人的议论也有赞成也有不赞成，但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的事，为了恋爱，有时性命都不顾，朋友的赞成和反对，更是闲事。佛海夫人杨淑慧女士直至我在民十四由美国回至广东才相识，那时我对佛海的恋爱批评，算是宣告中立。

四

自中共组织正式在上海成立之后，陈仲甫先生不久就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他要急急回到上海，固然以第三国际代表坚持中共的中央机关非设在上海不可为其主要原因，而附带还有一两个原因，也使他对于广东不感觉十分兴趣。其一是自仲甫到了广东以后，一班自命卫道的老先生们群起而攻，他们大概一方面讨厌所谓新文化罢，一方面又恐慌着将来学校的校长和教员们要换了属于新文化的少年们。生活问题常常可以迫人挺而走险，何况广东的教育久已成为他们的地盘，他们为着地盘而战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天经地义。他们制做出仲甫主张公妻共产的谣言，又说仲甫改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的两句格言为"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这种不合理并且荒乎其唐的谣言，居然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社会上全都信了。于是报纸上有直接著之言论来攻击仲甫的，甚至于把他老人家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毒兽。也有广东士绅联名公请罢免他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要求官厅驱逐出境的。这一下无端的谣谤，殊使他心灰意冷。其二，仲甫先生对于写作短文，文笔可算犀利无比，但对于长篇大论，却非所长，尤其他本来不是学教育的，对于教育没有很深的理论。初到广东之时，各方面震于其办"新青年"又为北大文化策源地文科学长的大名，遂排日请他演讲。仲甫即不能公开宣传共产，也不好批评政治，就是口若悬河罢，有时也会干枯，何况他本来不善讲演，多演一会讲，令人多一次失望。教育委员会连仲甫共有三个委员，除他兼任委员长之外，还有许崇清和陈伯华两位先生，由于他的声誉慢慢低降，办事上已感觉不大适意，而且外间已骎骎有了谣言，说陈炯明要更动仲甫，而以陈伯华代之，这也使仲甫急于求去。其三，更有一个不能公开原因，仲甫忽然觉得孤立无援，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不能不离开广东了。他有一位朋友告诉他，某一夜在太平洋西菜馆宴会，同璧胡汉民廖仲恺两先生都在座，谈起仲甫，竟没有人加以好评。仲甫之来粤，本为各人邀请而来，现在楚歌之声四起，似乎不可终日，故不如及早引退。仲甫即已打定主意，遂请假归沪，末后由请假而辞职。

广州的中共那时着着进行，除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外围之外，吸收作正式党员的已有二十个人以上。那时它的主要工作是在工会活动，党员分子倒有一半是工人，恰巧香港的中国海员为着要求加薪罢工，所有香港的海员因为香港政府监视甚严，全行来粤。那一次的罢工本来是国民党的联谊社主持，迫来粤之后，共产党遂于中加紧活动。海员分子是当日共党的唯一目标，此次罢工可以说替共党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后来共产著名的苏兆征就是当日海员领袖之一。

说也奇怪，广州的共党并没有用过苏联一个钱，既没有地址，更没有人事费。那时平山任书记，植棠任宣传，我任组织，平山还是那样的斫弛不羁，植棠则热心而苦于活动不足，因此书记组织宣传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和平山植棠都有职业，在各校当教授，以每月的赢余，充作党的费用，这样辛辛苦苦支持了一年。那时我的思想忽然又发生问题了，我喜欢求知，不喜欢盲从，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又负了广东共产党的责任，但是

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只是一种名词上的宣传，如辩证法哪，唯物史观哪，阶级斗争哪，剩余价值哪，到底它的来源是怎样，意义是怎样，单靠着一本马克思传是不够的（那时我译马克思传已完成四分之三的工作）。靠一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宣言是不够的，靠着上海中共寄来几本小册子也是不够的。并且许多问题自己固然不能解答，闲常问起仲甫也不能解答。而且我当时任宣讲所所长，经济学一门找不到适当教员，只好自己兼任，许多问题，无从找参考书，我想就有参考书，倘不从头研究起，也只有鸡零狗碎的搜罗，成了一知半解的学问。我知道想研究经济,应当从亚当斯密 Wealth of Nations 研究起，但严几道所译的“原富”，以中国的古文，翻英国的术语，佶屈敖牙，意义本浅，转为深奥难通，我看了两三遍，越看越不懂，我当时即下决心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我要到美国的原因有两种，第一是我的英文已有些根底，我已学习英文四五年，而又当过英文教员，到了美国用不着再从新研究文字，比较事半功倍。第二是往美国可以半工半读。我求学自从入法专起以迄北大止，都靠着报馆的撰述和通讯维持，如果到了外国，自然不能再担任。半工半读只有美国，除了美国没有这样方便。当仲甫还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我已表示过我的意见，仲甫也赞成我的主张。

在仲甫离粤之后，第三国际的代表名叫斯里佛烈 Slevelet 的偕着张继先生自沪来粤。斯里佛烈化名西门 Dr.Simon 博士，他是一个荷兰人，在爪哇宣传共产而被当地政府放逐，故改派来中国负了代表第三国际的任务。张继先生和他约我在长堤的西濠酒店谈话，张继先生提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问题，当时他们所谈的还不是国民党容共问题。大约这个问题是斯里佛烈和张先生已经谈过，并且有成议的。当日担任翻译的是张春木，后来改名为张太雷，做了鲍罗庭的翻译。他也是北大的学生，去过俄国，也是中共的委员，至十六年广州共党暴动时在战争中被我们的炮舰击毙。他们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时很诧异，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是他们还要发宣言要反对孙先生的吗，为何变得那样快？

我不赞成这个提议，因为我有我的理由。第一，国民党的主义和共产党的主义究竟不同，今日纵合，终久必分，与其将来分裂，倒不如各行其是，只在党外合作。第二，我尤其坚持我的意见，我先问合并之后，共产党是不是存在，他们说不解散。我说共党既然不解散，则是党员有了两个上级机关。我承认国民党是革命党,共产党也是革命党。如果两个上级机关有不同的命令时，党员服从了国民党即是对于共产党叛党，倘服从共产党时则是对于国民党叛党。两个党是革命党，叛党即是反革命，叫党员何以自处？当时我的立论完全从党的主义和立场去辩论，却从未想到共党要加入国民党实在要吸收国民党分子，和假着国民党招牌来扩展共产党活动的阴谋。假使当时我就知道的话，我也还是反对，因为我的主张以为一党的革命就在于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光是用策略和阴谋，只是一种旁门左道，而非正当革命方法。

斯里佛烈虽然提出这个合并主张，却和我辩论很少，他是比较沉着的，而且他还要去桂林见孙先生商议这个问题，在未有结果以前，他不大愿意发表意见。但张先生呢，却非常热烈的和我争辩，他说国民党已老朽了，须要增加新的血输，所谓新血输就是共产分子。而且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什么不同，现在列宁在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就

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既都同是革命党，则所发命令自然更不会不同，因之党员也不会发生反党和反革命的事实。我们辩论了两个钟头，我还是坚持我的主张，这次辩论只是私人间交换意见，当然没有结论。末后斯里佛烈要我介绍见汪先生。并在教育会会堂作一次公开演讲，宣传俄国革命后种种进步，尔后他就跟着张先生去桂林，回粤之后也不找我，径自回沪。传来的消息，他们此行，没有什么结果，焉知道当日热心主张国共合并的张继先生倒成为后来元老派中的反共大将，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了。

仲甫先生离粤不久，孙先生便由桂林回师转道广东北伐，师次梧州，陈炯明下野退居惠州，孙先生免了他的省长职务代以伍老博士廷芳，胡汉民先生任了北伐行营的秘书长，许崇智率了梁鸿楷、黄大伟。李福林、朱培德出发韶关，入江西北伐去了。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在攻广西时任了总指挥，是时也放弃了广西，把所有陈系军队都带回了广州，广州的城内城外都是陈家队伍，那时形势真可说是剑拔弩张，陈炯明的叛变真是指日间事。

倏然仲甫先生又由沪来粤了，他说是来粤视察党务的，我们开了几次会，讨论今后党的工作问题，仲甫又找着陈炯明的秘书黄居素先生，说要往惠州和陈炯明相晤。我以为仲甫先生是慰问陈炯明之意，人是有感情的，仲甫既由陈炯明请来，现在陈炯明下野，一去存问，也是人之常理，所以我并不加以劝阻。仲甫先生又要我陪行，我说我向来没有见过陈炯明，黄居素几次介绍，我都婉谢。因为我回粤之初，就决定办报而不见大人先生，所以这次我也不愿去。仲甫对我说，他和居素不大熟，旅途寂寞，多一个熟人，比较有说有笑，一定要我同行。后来我告诉仲甫他一定要我去时，我只是陪行，而以不同见陈炯明为条件。但是他们到了惠州去见陈炯明时，我也不是一样寂寞吗，所以我坚挽秋霖一起行。那时在群报的同事中，我最和秋霖谈得来，他虽然是国民党而我是共产党，我从来不劝他相信共产主义，也从来不要求他入党，每天共同工作，共同食喝。夜深工作完毕便一起逛长堤，步着夜月至家才分手。

时间是记不起了，总在将近夏天罢，我们四个人搭广九火车至石龙，由石龙转轮船往惠州。我还记得在船上过了一夜，仲甫和居素同住一仓，我和秋霖同住一仓，早上到了惠州，进了旅馆，九时左右仲甫便和居素给陈炯明接去了，我和秋霖便在惠州城内乱逛。见了一间女子师范，秋霖发起进内参观，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而秋霖坚持着非进去不可，秋霖那时还没有结婚，大约是求偶心切罢，见了女师的招牌，免不了有些遐想，君子成人之美，反正是游览，我何必固执己见。名片递进之后，出来迎接的是一位校长金碧西，谈起来她是市民大学听讲的学生，原来我和她有师生之雅，惠州和广州虽不远，也可谓他乡遇故知了，她带我们参观各教室后，又要请我食饭，又要带我们游惠州的西湖，秋霖大概是兴尽了，而我那时还非常面嫩，总觉得游览地方有了女子同行不方便。秋霖和我是无话不谈的，更不难长日游玩露出粗犷的面目，因此我们都婉辞了。回至旅馆仲甫们还没有回来，大约陈炯明留他午膳了，我们草草食了午饭，买了四五斤荔枝，带了两三瓶酒，遂至西湖雇了一只小艇，到处游览，惠州的西湖比杭州的西湖具体而微，那时陈炯明住在西湖角上一所祠堂，西湖一部分倒成了戒严区域。我们关照船

夫随便在湖上蹓一下，便泊在一个堤下的桥孔，开始纵谈，饮酒，食荔枝，末后更趁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大睡其觉。及至午睡醒来，飞鸟投林，夕阳衔山，我们便回旅馆。仲甫和居素早已回来，我们便又打迭下船回石龙，趁车回广州了。在船上仲甫告诉我，陈炯明不象下野样子，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恐怕广东不免有事，我听了默然。居素和秋霖都目为陈系的人，我在仲甫面前，不好表示甚么意见，更不好说甚么话。

仲甫先生在回沪之前一日，约我在宣讲所谈话，我记得是下午，学生已经放学，因为植棠在我的所长办公室，他拉了我在院后的第二班课堂谈。他说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我们应知有所适从。论道理是应当联孙，论力量是当联陈，问我有甚么意见。仲甫先生到底是刺探我的，还是真要问我主张，我至今不敢判断，但我正色对仲甫说，我们暂时不说道理和力量，孙先生到底是中国一个人，陈炯明纵然了不起，也只是广东一个人，何去何从，先生当知所择。仲甫先生听了我的话，默然一回，说我们看罢。自从这次他离开广东以后，一直至到民国十五年一月国民党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才重相见。

我看见广东的紧张局面，更使我急于离开广州，于是立即筹备赴美，有一天早上，汪先生约我至他家内谈话，说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金章已经离职，要我继任，征求我的同意。当时胡汉民先生主张林云陔，而伍老博士则主张叶夏声，汪先生告诉我，他和廖仲恺先生倒主张我长法专，因我可以专心办教育。汪先生并且告诉我，当日下午就要离开广州赴香港往浙江见卢永祥。我告诉汪先生，我久已想出国，一切都已预备，并且已在交涉署取得护照，现在所余者仅是旅费问题。汪先生也不强我所难，更给了我一封信去见新任广东财政厅长程天斗，就此我们便分别，直至到后来我在十四年回国之后才见面。

陈炯明终于叛变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并通电请孙下野了，叛变那天上午，孙先生率了兵舰回泊白鹅潭，炮击陈军，自此数十天广州终日处于一个震撼飘摇的局面。这样炮火连天的绵亘了数十日，孙先生遂回沪上，陈炯明扭捏了许久，才由惠州回广州。程天斗因事变走香港，我的留学经费又行搁起，不料因陈炯明的叛变，影响到我和陈仲甫的分裂，影响到群报的分裂。那时上海消息非常之消沉，平山虽然似浪漫无所用心，但聪明却不后人，和我商议要我们举他赴沪探听消息，趁早脱离这个是非之地，我自然听他的话，开了一次会，举他为广州共党的代表赴沪。我那时的确无法离开广州，因为我赴美的旅费还未得财厅发给，而且平山既去，广州共党更无人主持，并且我的家事还未了，我去之后，就算工读有了着落，老母的家用托谁维持都是一个问题。在陈炯明叛变之后，我只在报上得一个消息，说上海孙先生已派了许多委员筹备改组国民党，陈仲甫也是委员之一，其余都不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我直到今日才愿意顺便公开的，就是廖仲恺先生被陈炯明认为他这次下野的主动者，在叛变之前一日，骗他到石龙扣起还未放出，末后更解至广州幽囚在西村的兵工厂，更使我逗留在广州。说也奇怪，我和廖先生本来不熟，只在教育会开会时见过几次，他做他的财政厅长，我做我的教授，风马牛不相关。那时汪先生是广东的教育

会会长，廖先生和我都是评议员，我们没有谈过话，没有交过言，只在评议会上偶然相见。那时我很爱骑马，恰巧刘毅夫跟了唐继尧回滇，把他那匹老马硬送给我，所以我每天早上都在东山的百子路跑了一回马才上课。每天驰马之时，也碰着廖先生回办公厅。一个是乘马，一个是坐车，路上碰见点点头，由是遂发生一种不相交言的神交情感。而且从各方面所得的消息，廖先生非常廉洁，在叔季之世，而有这么一个干净人，不由得不使我心折。我听见廖先生被扣，内心真是焦急万分。我知道对于营救廖先生我是无能为力，但相信可以尽万分之一的人事。我不认识陈炯明，更不认识陈系的军人，但我认识金章先生，金先生是法专的校长，外间盛传金先生是陈炯明的幕后策士。我想此时不救廖先生，更待何时救廖先生。我是没有把握的，但金先生素来敬重我，或者因我一言，有转圜余地。我从来没有到过金先生的私宅，为了营救廖先生之故，和他见面好几次。末后廖先生是释放了，我也安心了，由是我遂放心准备离广州出国。这一段的经过，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既没有告诉过廖先生，也没有告诉过廖夫人何香凝，更没有告诉过廖梦醒小姐，倘然今日廖先生还在世，我更不会公开的自述。自然当日营救廖先生的不止我一人，何必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就是我一人干的罢，也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无功可言。这是不是一种正义感呢？我更不敢说，反正是我的一种特别怪脾气罢。

廖仲恺先生释放之后，家事也处置完毕了，母亲生活的维持托了一位杜先生，于是我候船出国。恰在这时张太雷衔了上海中共之命，并携了仲甫先生手书来粤见我。希望我立刻离粤往上海，因为上海盛传我有帮助陈炯明的嫌疑。我看见仲甫的信，真是小说所说三尸神暴，七窍烟生，问张太雷是根据了甚么证据，他说上海许多国民党员都那样说，而且香港的报纸也登载过。我说许多国民党员到底是甚么人也要指出，至于那张香港报是晨报，我也见过，附陈者首名是古应芬，而把我排在第六第七名，头一名的古应芬就不是附陈，末后更往江门组织大本营讨陈的。我没有做过陈炯明的官，没有拿过陈炯明的钱，并且也没有见过陈炯明。陈炯明是红是黑的，我都不清楚。广东我是要离开的，但不能立刻，因为出国护照还没得美领事签字，而且还要候船，我总不能跑到香港和上海等船期，我是一个穷教授，万不能花了许多预备留学的经费无聊的呆住在上海。张太雷又劝我，要留学何必去美国，何不去莫斯科。我的肝火已动了，我为甚么要到美国的理由也不愿再申说，只说我联陈不联陈，陈仲甫应该知道，刚去上海的谭平山也应该知道，何以两人知而不言，他们不止够不上做朋友，而且更够不上做人。至于我要到美国，也早在仲甫在粤时候决定，何以赞成于前，而阻挠于动身的俄顷，是不是跟我开玩笑。我一口拒绝了张太雷，只托他带一封信给仲甫，这封信长至千余言，现在也忘记了，问他还记不记得他问我联孙或联陈，问他还记不记得我的答复。末后附带骂平山，说我们做了朋友和同事多少年，连我的性格和主张都不清楚。我在广东的行动都是公开的，他对我是最知道清楚的，上海这样无稽之言，为甚么默无一语。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似这种卖友之人，连做寻常的朋友都不配，遑能论乎共同艰苦奋斗。我声明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翌日我们在一个木作楼上开会，我把这些经过报告了广州共产党，声明即日起不再负责。那时会场起了很大的

震动，谭植棠刘尔崧发言最多，全体主张广东共产党独立。我自问不愿意再和共产党一起，对于独立与否我不赞一词，只是声明脱离一切共党关系，决心出国，末后谭植棠因为帮我的关系竟被他们开除党籍，两年之后才复加入，而刘尔崧也受了严重警告，其余党员处分有差，这些事都是我到了美国或在回国之后才知道的。我既决心不再问共产党事，遂于十一月上旬翛然附春阳丸渡日本，过上海连岸也不上，省得麻烦，后来在日本一逗留便是三个月，在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二才由横滨渡美。

对于群报的结束，我应该说几句话交代。本来群报的阵营就相当复杂，我在上文也曾述过。因着陈炯明的叛变，雁声起了很大反感，发起老脾气，天天在编辑室骂人。他所骂的自然是陈炯明和陈系的军人，据茅连茹，当然牵到秋霖身上。他们两个人私交本来很好的，至是双方都有些不自然的态度。我佩服雁声，也可怜秋霖，雁声在群报同人眼中本来是一个性情孤僻的怪人。但无论怪到怎样，他在这个时候倒是不畏强御，大义凛然。而秋霖呢？虽然平日同情陈炯明，但围攻总统府，心内终不谓然。可是反对在心头，苦处却说不出口。

正在无法解决之际，群报的恶命运临头了。代陈仲甫而为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伯华先生，平常人都目为一个好好先生，忽然注意起群报。他说群报是共产党的机关，广州在陈炯明掌握之下，不能任共党宣传，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收买，一个办法是封闭。这个严重的恶运临头，在平山未离粤之前我和他及植棠讨论结果，只好出顶，但是附带有个条件，即是出顶之后不能再用群报名称。现在仿佛记得顶费是三千元罢，除发还股东股本之外，恰恰够还债，大约他们早已把群报的账目算好，所以顶费出得不多不少。这一次也算是强制收买，我们辛苦经营的群报不在莫荣新淫威之下横死，倒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夭折了。

五

我到日本之后，倒碰见许多熟朋友，有些朋友是在横滨的华侨学校教书，有些朋友是在东京读书，还有些朋友在横滨领事馆服务，他们或者是广东法专的同学，或者是北大的同学，一时倒不觉寂寞。我在横滨住了十几天，到东京早稻田大学附近一家贷间和朋友居住，不到一个月，我又回到横滨住在一家英日合壁的旅馆候船，眨眨眼又是民国十二年一月了。

那时廖仲恺先生自上海来日，住在中国的公使馆他的兄弟廖凤书先生那里，不知道他怎样知道我在横滨，他派了一个中国的海员到横滨华侨学校找我，要我到东京和他见面。终于一天借着一个书画展览会参观之便，我又到东京的中国公使馆。我记得那时在座的除了廖先生之外，还有许崇清先生和我的亲戚二人。我本来和廖先生很生疏的，这时在异国相见，倒非常亲切。他告诉我沈鸿英和杨希闵的军队已占领广州，但沈鸿英是靠不住的，刚刚接电报，沈鸿英已被杨的军队驱逐至北江，广东大概可告安定，我们可以回粤做些事了。他又问我以后怎么打算，我告诉廖先生我还要到美国留学。廖先生很不客气的劝我不要到美国，他说去了几年，也不过如此，倒不如早回广东做点事。我问

他做什么，他说法专没有妥人接办，你还是当法专校长罢。我默然了一阵，心想又是法专校长问题，然而当时我实在不好多说，因为我求知的心情是没有人可以了解的。当时我在广州教书，据社会的批评，似乎我已是一个名教授。在一个已博有社会微名的人，而说还要求学，是令人难得相信的一件事。可是学问不足，只有自知，我不能以肤浅之学骗人，更不能以肤浅之学骗自己，但若再坚持求学之意，恐怕廖先生不相信，终于默然之后说："再看罢"。见了廖先生之后，我遂回横滨，一夜天气很冷，忽然接到廖先生一封信，说希望我到热海一行，因为那天在座还有几个人，许多话不便谈，现在在热海可以多谈几句，如果来的话，希望接信之后即来，他在热海也不会停留很久的。

我接了廖先生信之后，心里很犹疑，我不怕什么，只怕廖先生又要我回广东。但后来想想还是去罢，因为不见得廖先生会太勉强我，他真迫我时，我还可以把心情尽量告诉他。这次廖先生倒不提出我回粤问题，只是询问我国共合作意见，我告诉他我和斯里佛烈和张继先生谈话的经过，他沉吟了一下说，我们不妨和越飞谈谈。这时我才知道苏俄驻华代表越飞也来了热海。晚上三个人见了面，越飞告诉我苏联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为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而且越飞更郑重的说，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行共产主义。我问越飞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越飞只是摇头不答。我问越飞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越飞倒很老实，说还是一个疑问。廖先生很滑稽的笑着说："公博，你还有什么话说，我们要做革命党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不要做一百年后的革命党，我们努力实行三民主义，不必再讨论了"。廖先生这句话倒使我非常感动。不过我撇开国共的问题不谈，我表示我只能做一个党的党员，不能做两个党的党员，因为我的性格，既然不爱骗人也不爱骗自己。我回横滨之后，在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二日附美国总统号赴美，开船的第二日在船上还接廖先生一个电报，希望我赶速归国，但是我既然决心求学，又焉好半途而废呢！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我研究经济的理由，固然因为经济学上许多问题不能解答，尤其迫我研究经济的，我那时已有一个信念，即以为除了责任之外更没有什么道德，除了经济之外更没有什么政治。前一个思想是我研究伦理学的结论，后一个思想是我研究各国政治史的结论。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它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看马克思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马克思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完了。我在美国第一年除了研究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之外，其余时间都用在马克思理论身上。我最先发觉的就是马克思所说中等阶级消灭的理论绝对不确。照马克思的理论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消灭了封建，第二个阶段，资本主义更消灭了中产阶级，然后社会上仅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壁垒，最后的阶段是有产阶级自掘坟墓而无产革命成功。但是我们空想是无用的，我们要写一本书，谁都可以提出相当的论据，我们必得要调查，从我的调查统计，美国那时距马克思的共产宣

言出世，中产阶级不但没有照他推想消灭，反而增加至百分之十二，其他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大致相同。这个原因，因为在马克思之后产生不少技术工人，这班工人的工资比其他自由职业者的收入还大，于是这班工人遂慢慢变为中产阶级，至于为中产阶级中坚的农民增加数还不在内。这样马克思引为革命基础的产业工人群众根本溃散了。

第二个发觉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不确。辩证法是共产党人所认的秘宝，在辩论中动不动拿辩证法来塞反对者之口。我研究辩证法的结果，辩证法固然不是马克思所发明，也不是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所发明，而是由希腊形而上学的学者斯诺所发明。据黑格尔的辩证法，一切进步都由于矛盾，由矛盾而生真理。A 正面和 B 反面的对立便生了C的真理。不久 D 又作了C 的反面，两相矛盾便生了 E 的真理。这样相反不已，而相生也不已，但我不懂马克思为什么独断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面便停止，而不复有无产阶级的反面？因此我认定共产宣言不是真理而是对工人的宣传，既然他的理论不是真理而是一种煽动宣传，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便根本摇动了。

第三个发觉，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也是片面的观察，据马克思的主张，一个工厂的盈余，都是厂主剥削工人而来的，在一个小小的手工厂，这个理论还有点相似，但施于大产业则马克思的理论完全失了根据，譬如拿一条铁道来说罢，铁道是独占的事业，剩余价值很多，但剩余价值决非单由于铁道上的工人日常工作来的。当建筑铁路时国家给他事业的独占权，沿铁道土地的强制收买，都是造成铁路剩余价值的很大原因。但我想为什么马克思有这些荒谬理论呢？我更研究马克思著书的时代，著书的地点，才恍然大悟。因为马克思写那本资本论时候是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初期，而马克思又在那时因流亡卜居英国写这本资本论。英国产业革命初期的确有这些剩余价值现象，所以马克思据为定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就算有价值罢，也只如亚当斯密所著的原富和马尔萨斯所著的人口论一样的价值，时代一过，事实不同，而共产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真是非常可笑。

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固然不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赞成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我深深感觉在今日的中国舍民生主义实在无法可以建国和复兴，我决然摆开马克思所有著述，而专从研究美国的实际经济着手，留待归国参考之用。我在美国前后三年，中间也好和社会主义者来往，美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斯葛尼宁Scott Neering 就是交游中一个人。他那时还没有去莫斯科，对于苏俄是怀疑的一个人，他只是研究社会主义而不替苏俄宣传，我提出许多问题辩论，他也无法解答。我又提出三民主义和他讨论，他倒承认是中国革命的一种妥实主义。

在美国当时的生活我也顺便一提，我三年中在美国只是去过一次波士顿，去过一次华盛顿，什么黄石公园，什么洛杉矶，我都无力游览，为着我的生活，寸步不能离纽约。中国方面是无法接济学费的，我在夜间只在所谓中国城的华侨学校做教员，月得八十元，借以维持学费。美国华侨的堂斗是骇人听闻的，有所谓安良堂，有所谓协胜堂，各结党徒，以烟赌为业，或者每年发生一次堂斗，或者一年发生数次堂斗，两方面偷偷摸摸开枪打死人。他们开起火，是不问是非的，如果一个姓李的给姓陈的打死，凡是姓陈的都在可以报复之列。大约这是广东乡村械斗的遗风罢，也可以说是部落吞并的余迹罢。华侨堂斗是司空见惯一件事，我在纽约三年也碰过发生两次，关心我的同学们都劝

我不要到中国城，但是不教书又怎样生活呢？我常对我的朋友笑说，你们的盛意是可感的，但去教书是可以打死，不去教书是可以饿死。打或者打不死，而饿是一定可以饿死的，我还是教书罢。

在美国三年真是埋头读书，国内朋友很少通音问，政治上的朋友更是不相往来。一次陈秋霖来了一封信，才知道滇桂军占领广州之后，他到香港替陈炯明办了一个报馆唤做新闻报。我复信劝他慎重考虑，我不赞成陈炯明的为人，这样无意义的事也不宜再干。后来迟之又久，秋霖又寄了我一封信，中间还夹着印红色的新闻报，说他已经反正，脱离陈炯明，拥护孙先生。他这次举动，也算是一种非常行为，是即香港有名的“报变”。我想秋霖是可爱的，复了一封信赞成他的行动。

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应该考博士了。可是当前有一个难题，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制度，凡是博士都要把论文印三百本送给图书馆才能得博士证书。我是没有钱的，也不是清华学生有公费印书的权利的，那本论文排字费就要美金一千元，我就想到廖先生的身上。廖先生那时已做了广东省省长，我想大概他可以帮我一个忙罢，去了一信，要求他给我一千元的印刷费。廖先生托人来了一个通知，说如果我回国，他可以设法汇我一笔旅费，若是考博士，他倒不愿帮助，所以由广东大学汇来美金六百元，恰恰足当回国旅费之用。我踌躇了许久，想想得一个博士头衔终无实用，得了博士，不能归国，也是枉然，决然舍去博士遵欧洲大陆归国。

哥伦比亚是美国著名四大学之一，所谓四大学除了哥大之外，便是耶路，哈佛，丕林斯顿。四大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学龄最少，取得博士也比较容易，美国从前本来嘲笑哥大的博士为半个博士，我既是考了试而没有证书更是半个之半个了。我曾经想写一篇“四分之一的博士”来描写我在哥大的生活，只是因循至今还未执笔，现在索性不再写了。

六

我是在民国十四年二月离开纽约赴伦敦的，此行不过借回国之便顺道游览，由伦敦赴荷兰，转柏林，游巴黎，最后止于罗马。自然因为自己是一个四分之一的博士，少不免在各国参观各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都去访问一次，但实在说那都是走马看花，毫无所得。抵罗马时，读报知道，孙先生在北京逝世了，我看了这段消息，还不敢置信，因为孙先生久病我是知道的，在美国时就有好几次谣传他逝世。可是翌日报纸又说俄国打算送他一具铜棺，这恐怕是真的吧，到中国公使馆去打听，才知道这消息不假。孙先生真的逝世了，心情一时纷乱，好象中国已入于绝望的境地。心想广东局面会变成怎样呢，中国的大局又会变成怎样呢，这么一想真是归心似箭，立即乘车至纳波里，附一艘德国货船回国。我当时实在无心与闻政治，但不知怎样，中国的政治前途倒乱我的心情。

到了香港，才知道东江已下，廖先生正和加伦将军于我抵香港之前一日由港赴汕头，汪先生则以病留滞在上海，我在香港逗留了几日，和秋霖会了面，问问他当日所谓

报变的情形。数年不见，秋霖已是结婚了，秋霖的性质也变了。在群报时代，秋霖好象不羁之马，食宿无时，惟适之安，我还记得，我们常常在看完大版之后，跑长堤，步月亮，现在秋霖则在报馆工作还未完毕即匆匆忙忙回家。这种脾气的突然改变，不止我惊诧，连一般朋友也惊诧，后来他和廖先生一齐殉难，人们还引他脾气突变为一种早死的预兆，自然我是不会相信这种迷信无稽之谈，不过他的脾气改变当时确使我非常惊异。

我回到了广州，廖先生也由东江回来了，汪先生也自沪归粤了，那时正在计划着东江回师，扑灭杨刘，我名义上算是担任广东大学的教授（那时还未改称中山大学），替大元帅府起草了两篇文告，知道广州战事要发生，把老母送至香港，而著名的省港海员罢工正在那时酝酿。

我回广州之时，遇见了植棠，才知道共产党已将我的共产党籍开除，他因为有帮助我的嫌疑也被开除，近来又复了党。我对植棠笑起来，这次的纠纷，我也不再算帐了，到底是我开除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开除了我，竟是一种官司打不清的公案。共产党对于我的行动报告也是分歧而奇怪的，据许多人在莫斯科所看的资料，我被开除的原因是为着帮助陈炯明，而在北京俄国大使馆所搜出的文件，则说我有无政府的倾向，至于何以脱离共产党，原因不明（这种文件是后来我办革命评论时，美国驻沪领事许士顿Huston拿给我看的）。我脱离共产党的原因，直接知道清楚的只有仲甫、平山、植棠，间接知道的只有张太雷，就是在广东共产党面前，我始终没有宣布仲甫和我那一段谈话。

共产党知道我回粤，也曾召集一个会议，讨论对付我的方法，当时最反对我的是以前最同情我的刘尔崧，他简直反对我回广州，但后来有人提议，我的为人要活动起来，反对也会活动，赞成也会活动，我的活动决不会因有共产党反对而受限制，最好是设法使我忙于工作，这样或者使我太过于活动而反限制其活动，这个提议者为何人，共产党人不肯说，然而这个方法倒是一个聪明的方法，终于决议通过了。刘尔崧为什么反对我回广州，据后来得到共产党朋友的报告，说刘尔崧已在工运有了地位，广州工运当日由我一手做成，恐怕我回后，他对工人没有把握，而且他正与各女工会的女领袖多数有了关系，抬出一个政治结婚的好招牌，更怕我抓着他那个弱点。

广州的杨刘扑灭了，国民政府在七月一日成立了，广东省政府也改组了，这些都与本文无关，不去赘说。和我有关的是我的工作，一个是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主任，一个是省政府的农工厅，这两个工作都是极繁重的工作，而又为共产党最注意的工作。在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就有两个俄国顾问，一个是斯乃德，一个是马墨耶夫，最后基散加代了加伦做军事顾问时，更加上一个铁罗尼。我底下三个处长都是共产党人，这是在内的。而在外的，第一军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第二军的政治部主任是李富春，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是朱克靖，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是林祖涵，海军局的政治部主任是李之龙，全都是共产党，这些主任都是军事委员会决定之后交下来任用的，我对第四军和第五军的政治部主任我不愿意再任共产党了。我对第五军任命了李朗如，至第四军呢，正在物色人选，一天斯乃德对我说，我既不愿再任共产党人，那么罗汉比较为宜，罗汉是黄埔的优秀学生，汪先生是可以同意的。我呈明汪先生后便委他去第四军，那里后来一

打听，罗汉也是共产党，直至后来北伐军出发，才改委了麦朝枢。

农工厅的工作也是异常繁重而困难，省政府还未改组，农工厅还未成立，已有沙基的惨案，已有香港的总罢工。香港的工人许多到了广州，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自然在罢工委员会内有着共产党的主持，苏兆征差不多变了劳工政府的领袖。那时广东的工运俨然分为两派，一派是共党，一派是非共党，共党的工运是很幼稚的，然而非共党的工运更是幼稚，两派争夺工会，争夺工人，可以说无一工会不罢工，更可以说无一日不罢工。这两派的主持人都是不可以情动，不可以理喻，露宿请愿，集团游行，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共产党对于工人所开的空头支票太多了，起初要以罢工来吸收工人，终至不能兑现而不能指挥工人，我是一个农工厅长，职务是调停劳工纠纷的，照这样有计划的罢工和无意识的纷扰，真是无从去措手。

廖先生当日不知为什么要我做农工厅，我想大约知道我参加过共产党，对于共产党那一套把戏总有点知道，可以有些办法的罢。我也是凭着这一套，不断和他们冲突、交涉，但是无论如何，也只能相安一时。廖先生在未被刺之前，有一天也忍不住对我说："平山的为人，你得注意"。我笑了一下，心想平山倒容易对付，所难对付的是他后面鞭挞的人们，但我始终不言，因为我不想让他烦恼，就是说恐怕他也拿不出办法，一切的困难，我个人担在身上便算了。实在说，当日的香港总罢工只想罢工一天，为五卅事件的一种示威表示，但以香港英国政府小题大做，而广州又碰上沙基惨案，便势成骑虎。香港总罢工在北伐以后糊里糊涂结束，不能不谓为共党的一种失败。

我在广州工作之时，真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共产党是对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所谓顾问，简直等于监视。而国民党人则许多都以为我是共产党，处处现出了歧视的目光。但我这个人的脾气，一不好分辩，二不好解释，只有埋头工作，完成我岗位的任务。

汪先生和廖先生是知道我的历史的，我回广州时对汪先生说明我的经过，因为汪先生要我任政治部主任，我的主张和经过不能不向他说明。廖先生面前我也说过的，因为廖先生征求我同意做农工厅长，我应该表明过去我和共产党离合的事实。除两位先生之外，谁也不知道我和共产党的纠纷经过，就是我对两位先生也没有提过我和仲甫决裂的原因，在我办革命评论当时，南京还咬定我是准共党不用说，就是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古应芬先生在汪先生离粤北上之时，在他病榻上还苦苦劝，汪先生要离开我，因我是一个共产党。

我回粤之时，真真没有想到从事政治。人最要紧是有自知之明，我不是说对政治没有兴趣，只知我的性格不宜于政治。我有丰富的感情，有锐敏的理智，然而锐敏的理智有时敌不过丰富的感情。政治有时真要冷要辣的，我的手腕或者可以冷和辣，然而我的性格不能冷和辣。自己失败事小，国家贻误事大。我为什么后来从事政治，完全是禁不起廖先生的一激。在我没有回国之前，廖先生已对人说我富于能力，但太聪明。所谓太聪明，就是对于个人的利害太清楚，他这句话是有弦歌之意，使之闻之的。

我回国第一次见他时，我们两个人的对话，似乎也值得说说，因为他有了那一席话，才使我到今日成为政治的斗士。

“好了，你回来了，就搭起擂台罢”，廖先生很高兴的。

我默然了一阵，我不知廖先生意何所指。

“你回来打算做什么”？廖先生见我默然，现出一些奇异神态。

“我打算到广大当教授”，那时我在美已受广大之聘，并且六百元美金旅费就是廖先生叫广大汇给我，作为预支修金的。

“我们不希望你当教授”，廖先生斩钉截铁的说。

“这样廖先生希望我做什么”？我反问着，并说明我性格实不适于政治。

“恐怕你还有理由”？廖先生听了之后说，“性格也可训练的，有了决心，性格也可以改变”。

“实在说，过去国民党没有什么人，而且我也看不顺眼，我原来也是看不惯才不愿干”，我只好直言奉上。

“惟其没有什么人，才叫你加入，有了人，我何必叫你加入”，廖先生非常恳切的。

我又默然，因为我实在想把这几年研究所得来教授学生，若做了别事，实在于我初心违背。

“你对于现在政治是满意了”？廖先生有些不高兴。

“自然不满意”。

“不满意是要干的”，廖先生迫着问。

“我不相信真干的有几个人”，我也不客气。

“你总相信我罢”？廖先生大约知道已到题了。

“我是相信的”，我并不是恭维他，因为我已从各方得来的消息，他真苦干。

“既相信我，那么我们一同干，成功也一起成功，失败也一起失败罢”！廖先生再不迟疑的拿出最后的断语。

经过我们短短谈话，在最后一分钟我便下了决心从事政治。我知道廖先生批评我太聪明，同时我就下决心专做笨事。既不诿过，更不邀功，直到今日，我还是如此。而且我可以在此附带自白，我本来也想过一种优美的生活，食好的，住好的，研究些学问，闭写些文章。但下了这个决心从事政治，立刻人生观都改变了，因为要过优美的生活，尽可做商人，做银行家，做自由职业者，本着我的聪明才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得到。但是要做官了，官是国家的职守，国家要他谋大众福利，而不是要他谋个人福利的，更不是借着官来肥己自私的。而且我真讨厌军阀和官僚，尤其讨厌留学生摇身一变为军阀官僚。我也是一个留学生，今后应该替国家争气，替留学生争气，这个一念之决，遂变为今日之我。穷是人人都怕的，我也怕穷，但谁叫你做官呢？我既然做官，又做了革命时代的官，不独穷而无怨，就是死也是无怨。这或者是一种识力罢，我平常履险如夷，并不真是胆略过人，实在基于一种认识，古语说胆由识生，这是我一生经历认为不磨之论。

我写至此地，可以说说鲍罗廷了。人们都说鲍罗廷在广东的权威很大，这是不错的，因为他有苏俄在后台，而且把握了中国的共产党。可是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鲍罗廷的操纵政治，还在于他的技术。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他多数是列席的，对于小事，他都没有意见，但每逢大案，他必预先和出席的人们个别交换意见，等到大家都无异词，或大多数没有异议时，他才以顾问的资格提出。因此仿佛鲍罗廷所提的议案没有不通过，这样传闻一播，鲍罗廷真似可以左右政局了。他还有空闲的时间，不象我们负责的终日忙于工作，所以有许多时间可以考虑，可以思索，每逢个别谈话，他有许多材料，还有许多理论，怕麻烦的人终于折服了。除了共产党不算，许多投机家便奔走于鲍罗廷之门，声势更加浩大，俨然鲍公馆是一个小政府。我目中的鲍罗廷的确是一个能干的外交人才，至于工作和理论我倒以为中人而已，他虽然是一个外交家，并且擅长辞令，但事实终是事实，我毕竟和他冲突了好几次。

一次在廖先生被刺之后，我继任中央党部的农民部长，截获了中央对于农运共党的两个通令，所有重要报告只要报告于共产党，而不必报告国民党。我拿了这个通令和鲍罗廷交涉，我很沉痛的说："如果这两个通令是伪造的，我便没有话说，如果是真的，那么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否如此？即就我本人立论，如果不拿这个通令公开，我即失了国民党的立场，如果公开，马上足使两党分裂，而危及革命的进展"。鲍罗廷承认这是中共的幼稚行动，并承认以后当为严格的纠正。

又有一次是在民国十五年四月末的时候，鲍罗廷由俄国回粤找我作个别谈话，我因病辞却。但是接连几天，信哪，人哪，电话哪，不断的追来，我心想又有重要问题来了。我病稍愈之后，终于一夜在鲍公馆见面。

"现在国民党已到摇动的时期，我个人以为非找出一个实际领袖不可，陈先生以为怎样"？鲍罗廷很沉着而严重的样子问我。

"党的实际领袖不是有了吗？军事的领袖当然是蒋介石同志，政治领袖大概恐怕不出汪精卫同志和胡汉民同志"，我这样说，心中一方面想鲍罗廷是不是找我开玩笑。

"陈先生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军事和政治的领袖，是说党的领袖，党自从孙博士（鲍是这样称呼孙先生的）逝世了，须得一个来继承。所以我的主张应得再举一个总理，如果碍于总章，我们叫他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鲍罗廷这样解释。

我说："这不是违反了党的总章吗"？

鲍说："总章是法律问题，目前需要领袖是革命问题，我们为了革命的实际，不能不牺牲点法律。"

"总章不也是应革命实际而立的吗"？我这样答，这时我已引起注意，想鲍罗廷的花样真多了。

"不错，总章是应那时的革命实际，目前要一个主席是应现在的实际，为要革命阵线的不破裂，陈先生总得牺牲了法律观念罢"！鲍进一步的追问。

"谁来当这个主席呢？汪精卫同志既萧然而去，胡汉民同志又怫然而行，北方老同志不肯来，目前只有蒋介石同志可以担任。然而两月以来，群情还是惶惑不定，我想介石同志必会谦退而不肯就，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十分疑虑的问。

"我想推举张静江先生"，鲍不犹疑的答我。

"张静江先生身体不大好，恐怕不会干罢！"我更忧虑的问。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主席非张静江先生不可。你知道孙博士一生是不会哭的，孙博士在北京卧病之时，张先生被抬上北京去见孙博士，孙博士一见他便流泪了”，鲍这样说。

“这是什么解释”？我更迫一步的问。

“你不要看轻这一哭，这在革命史上是占极重要的一页的，陈先生请你注意实际，不要注意党的虚文，大家都赞成了，请你不必固执”。鲍终于搓着手很焦急的说。

这次谈话，自然没有结论，也毋庸有结论，我那时还不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出席委员，仅是列席的委员，鲍怕我反对，只是作为一种通知，暗示我不要发生异议。实在我当时对于主席的是否设立，绝没有成见，只是在三月二十之后，汪先生去国，而发生这样严重问题，我恐怕党更要纠纷。至于张静江先生的被提出，是否出自鲍的本心，我无从知之，但是我可以断定就是别人授意的罢，鲍是赞成的，因为国民党的分裂，即是共产党之大利，这一层可以说绝无疑义。后来张静江先生毕竟被举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党毕竟分裂而有宁汉分立之变，而且就以张静江作主席为分裂的借口。当日开中央政治会时，我简直开口不得，谭廷闿先生蒋介石先生首先都赞成了，我还有何话可说。

七

我这个人最奇怪，虽然共产党对我那样的注意，我倒持着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之心，始终以为他们要完成国民革命之后才有异动的，我对共党倒没有首倡分裂之意。国民革命军终在十五年七月出师北伐了，我就任北伐军的政务局长，把政治部主任让给邓演达。在战争的进行中，国共幸而没出过乱子，不过共产党已随战争的进展，抓群众，抓工人，抓农民，当时无论国共也已前知两党终有一日破裂，但谁也隐忍不愿在北伐未完成之前反脸，长江是到达了，汉口是下了，而武昌也破了，共产党大大的活动起来，在武汉当时，人家批评武汉政府是共产政府，这一点我是不承认的，但是当时共产党确是目无政府，武汉方面的总工会势力非常之大，拥有类于军队的纠察队，有枪械，更可以拿人，可以办人，而且他们为要吸收群众，最大的武器是煽动罢工，初下武汉之时，一个月中各工会的罢工竟达三十余次，武汉当时真是人民惶惧，鸡犬不宁，甚至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也对我说，为什么不拿办他们？但我怎样可以拿他们呢？我只管财政，邓演达管政务，邓演达正醉心于无产革命，而当时湖北的省政府还未正式成立，我主持财政委员会，邓演达主持政务委员会，两不相涉，各不相妨，我只能调停，不能直接行动，我只找着总工会的刘少奇，说你们的计划我是知道的，不罢工，工人不会来总工会请求援助。你们也不能吸收工人。但这样罢工是会摇动国民政府，并且妨害国民革命的。你们若再胡闹，他只有不客气。虽然经过我那样词严色厉，罢工之风稍戢，但共产党要扩张势力，依然抓群众，抓军队，两湖的乡区，共产党更开始没收土地，共产党的势力，真足以倾倒政府。

我在七月中旬又和鲍罗廷激烈的辩论过一次，第一个焦点是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第二个焦点是共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主张是：无论那一个革命，若

要成功，首要确定革命的领导权，而革命领导权的谁属，则不能不看人民的需要。中国目前如果需要共产革命，则革命领导权当然属于共产党，国民党无可与争。中国如果需要国民革命，则革命领导权当然属于国民党，共党不能攘夺。否则革命惟有失败，终至复亡。照我的观察，中国共产党纵使不至攘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权，也有企图共同领导的趋势。自国民党改组以至今日，国共两党惹起无数纠纷，分析原因，固由于争群众，争农工，不过一言蔽之，为争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所谓互派代表，都是空言，结果惟有失败。我的第一主张是：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应该专属于国民党。

我对于第二个主张是：阶级争斗是一种事实，如果有阶级争斗事实，我们反对也会争斗。如果没有阶级争斗的事实，我们就是拚命提倡也斗不起来。照马克思的观察，阶级争斗自有他的历程，其最要条件就是中等阶级消灭，使社会上只余一个有产阶级和一个无产阶级，形成两大壁垒，然后始谓之科学社会主义的阶级争斗。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仅二百七十万，我们目前绝不能单单注意二百七十万人的利益而牺牲三万万九千余万人的利益。此二百七十万的无产阶级，数量既非庞大，其质量到底几何能够做社会革命的部队，很成一个疑问。至于中国有产阶级，我只能谥之为有钱的个人，决不能叫他们为有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经济的政治组织，尤其没有操纵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权能，实际支配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有产阶级。所以就中国来说，有产阶级也没有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也没有组织和训练，而最足影响中国社会的还是宣告中立的中等阶级。中国现状如此，如果提倡阶级争斗，其结果形成多数阶级的混斗。此种阶级混斗的终极，第一使民族主义破坏，演成国民革命的危机。第二使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线，减少社会的资本和生产力。第三使社会多数阶级互相仇视，民权主义无法实施。第四生产低落，无产阶级愈减功能，一方面不能建设国家资本，一方面更足妨害民生主义的萌孽。

此外我更根本严酷的批评马克思，申说马克思理论不确的各点。鲍罗廷对于第一个问题，口头上承认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当然属于中国国民党，然而并无具体方法。对于第二个问题，始终赞同阶级斗争，而否认阶级混斗足以酿成国民革命的危机。末后他更补充一句话，凡放弃阶级斗争的就不是共产党，他是共产党所以不能放弃阶级斗争。这次我们谈话虽然不至于面红耳热，两方都避免运用伤害情感的言词，不过我们两个人已至短兵相接，我相信国民党没有几个人象我那样在理论和事实和他激烈辩论过的。

武汉方面终于在十六年夏天继南京方面清党，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不胜感慨。实在在那年三月，如果蒋介石先生肯听我的劝告，早由南昌移驻武汉，必不至有三中全会的剑拔弩张，宁汉也不至于分立。如果在汪先生回国之后，介石先生不急急先成立南京政府，国共问题早有解决方法，也不至于有宁汉的对立。不过这些史实，我目前也不愿谈，只好留待他日有编史之责的平心静气去下断语，我写完这一段话，不禁还感叹一声："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现在我且说清党的当时罢，武汉清党时候对于共产党还非常客气，在七月十三日共产党发表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十五日国民党通过制裁共产党的决议。十三夜谭平山还找我作最后的谈话。这一段谈话可以当国共分裂的最终谈话，也可以当我和平山个人一

段决别的谈话。

我说："现在国共已到不能不分的时期，我们是十年的老友，并且是三年来在国民革命共同工作的同志。今日共产党已发出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则他日我们能否相见，很成一个疑问。今日我们谈话，你应该离开共产党的地位，我也离开国民党的地位，以纯粹革命党的资格来谈话。因我很相信我们为革命并且为群众的需要而革命，断非专站在党的立场而革命。其次今日谈话的焦点，我专讨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和农民暴动没收土地的方法，其他枝节，我们当摒而不谈"。

平山说："这个我同意，对于第一问题，革命领导权当然属于中国国民党，但今日有一先决问题，是中国国民党到底尚能否革命。中国国民党能不能代表农工及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建设一个狄克推多的政府"？

我说："如果谈到这个问题，以我隶于国民党的立场，当然否认你的疑问。而且能不能革命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党的问题，若就个人立论，我不能肯定国民党人个个能革命，但同时你也不能肯定共产党人个个能够革命吧！但现在我姑且承认国民党不能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以建设强有力的政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呢？

平山说："那么我们应该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

我说："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我以为也有相当讨论的价值，但到底中国共产党还应否存在"？

平山说："中国共产党还应该存在"。

我说："我们离开党的立场讨论，就工作方面观察，我看不出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分别。国民党要国民革命，共产党也要国民革命。国民党的成分是农工和小资产阶级，共产党的成分也是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现在既认国民党不能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才要改组或另组第三党，那么这个改组的国民党或第三党当然可以实际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了。我不懂得为什么共产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和理由"？

平山说："因为怕第三党不能真正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不得不拿共产党来推进这个第三党"。

我说："你这种理论，完全证明共产党不肯放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我们既以国民党不足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所以要改组或甚至另组第三党。现在我们又不能信任第三党，必须再以共产党的组织来推进，不难又以第三党不足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而组织第四党，或更组第五党第六党。这种奇异的推进绝没有穷期，而国民革命的寿命已为此一组再组所消灭"。

至此我已承认对共产党讨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已无可再谈，我们于是再进而谈共党以农民暴动没收土地方法。

我说："今日国共所争焦点，除了争夺领导权之外，要算土地问题。国民党的主张是以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共产党的方法是以农民暴动来没收。今日土地问题已不成问题，只在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资本主义的英国已适用轩利佐治一部分的方法，希冀土地有相当解决，至于苏俄也由耕者有其田的策略，企图移转土地的所有权于国家。但就我个人的经验，中国目前土地问题，不在耕作的土地，而在于耕作的资本。河套甘新，丰

腴土地，寂无人耕，察哈尔每亩土地的价值不过七角，张家口附近则竟两角，黄河以北，我以为绝不成问题。至于黄河以南，我们也知人浮于地，但我居住江西三月——江西当然可以代表长江的农业区，据我调查，满千亩者全省不过十家，满五百亩者平均每县不满三家，满一百至五百亩者平均每县不满五家。此所谓一家的人口平均皆有十人至二十人。如果说到纯粹的没收，则此种人家自己分配，每人也不过十亩。如果说到有土地的皆有大罪，则暴动起来没收土地，也不过移转私人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国有土地，还是很远很远。我以为在长江以南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待革命完成，第一将过剩的人口移送于北方，其次则速行建设国营企业，消纳无土地的农民。否则甲攘乙夺，暴动将无穷期，而革命政权将亦随暴动而失落”。

平山说：“有历史到现在，没有以政治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的前例，只有以农民暴动起来没收”。

我说：“如果能一次暴动来解决土地，我也相当的赞同，因为革命也是暴动，不过革命是有计划的有条理的，暴动是无计划的无条理的。然而照我的经验，和我在长江流域的观察，决不能以一次暴动解决土地问题，并且中国的农民问题，还有耕作的智识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决非简单的分配土地可以解决”。

平山说：“如果一次暴动不能解决，则当为第二次的暴动”。

我说：“如果第二第三次暴动都不能解决，那么再用何种方法”？

平山说：“由第二次以至于无数次的暴动，必以农民自己能够解决为止”。

我说：“你的理论是你自己的理论呢，还是莫斯科的理论呢”？

平山说：“这是莫斯科的理论”。

我说：“如果单是你的理论，我也不再辩论。如果是莫斯科的理论，那我不能不加以纠正。我们要知道我们为甚么要革命，就因为要解除民众的痛苦。但革命期间，当有革命的损失，例如生产的停顿和生活的变化，就是革命的损失。革命会不会失败，完全靠着革命后的措施。如果革命后能维持秩序，填补损失，革命即可成功。如果革命以后，不能维持秩序，不能填补损失，反动即可突起。我个人不承认反动是一个坏名词，因为革命没有方法和没有力量才有反动，如果革命有方法有力量，反动必无从而起。象你所说一次暴动不能解决，可以第二次暴动。第二次暴动不能解决，可以第三次以至于无数次的暴动。那么恐怕第三次暴动还没有起来，四方八里已起反动。我的所谓反动，并不指反动派这样简单，就是革命党的本身见没有办法可以维持革命的力量，也会反趋于反动的倾向。根本一句话，关于土地问题，国共两党的方法完全不能相同。共产党为甚么主张农民暴动没收土地，就是不信任国民党的方法，换一句话就是破坏国民革命的方式”。

以上和鲍罗廷和谭平山的谈话，我曾载在我所著的“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及“最切要的只是军事和财政统一”中，经过这次谈话，我和平山便分手，直至民国二十七年春天国民政府退至汉口才复相见。根据平山的谈话，暴动本是莫斯科的政策，就不是莫斯科直接命令罢，最少也是中共主张而为莫斯科所赞成。然而平山毕竟因着南昌暴动被开除了，他的开除党籍自然不完全因为暴动而是为着还套着国民党行动委

员会的招牌。李立三也因为主张暴动被视为立三路线错误而开除了，他的开除党籍自然也不是完全为了土地问题，中间还有带着共党的内讧。莫斯科已承认了暴动是一种政策，又以暴动而开除了谭平山和李立三，大约莫斯科经一次转变，必定要平白牺牲了几个人，如果平情论断，可以替平山和立三叫冤枉的。但最可惜的就是我们谈话的当时邓演达不在座，他已于前两日和铁罗尼假道西北赴莫斯科，倘然他在座知道平山所主张那种的第三党时，不知道他还会不会那样愚笨要组织第三党。

在武汉清党的前夕，空气非常紧张，凡是徘徊或者犹疑的分子都象在转变时代的巨轮中，磨碾了去。一个大转变时代真是不可思议，许多人的态度转变，其突兀的程度有些不可方物。鲍罗廷是辞职由西北转新疆回俄去了，第三国际的代表路易也走了，邓演达偕着政治部顾问铁罗尼往莫斯科了，所留下的加伦将军还住在武汉，至宁汉合作时才由汉至沪归俄。孙夫人宋庆龄平日言论大不满于共党的行为，我在南昌之时，她来信希望我早日回汉口，因为共党太跋扈，不能不制裁，但一听正式分共，表示不同意。外交部长陈友仁先生说到工人运动便头痛，到了中政会决议分共，反又赞同孙夫人的主张，辞外交部长翛然而行。我们在那个时候，对于不赞同分共的都分别优礼送行，武汉的分共在匕鬯无惊之中不数日而诸事大定。

八

政治是残酷的，党的斗争尤其是残酷的，我们对于这次分共很是客气，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书生的气息，温情主义者的行为，可是共产党倒对我们不客气了。共产党首先对我们开火，著名的南昌事变就在分共之后不久发生。

我们未曾分共，共产党已有严密布置了。他们知道最易藏匿的地方不是他们平素运动的工人，更不是广大群众的农民，而是手里拿着武器的军队。共产党在广东就注意第四军，尤其注意在北伐中号称铁军的张发奎先生，在广东时就派了一个姓廖的共产党人做了他的政治部主任。张先生是不会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容易接受人家的高帽，好以极左的军人自居，恭维是极容易的事，这一班共党先生们投其所好，日夕向他包围，使张先生深认共党是他的好朋友。武汉分共，张先生奉行中央命令没有异词，但很想以共党的安全保护人为已任，因此谭平山、高语罕等都潜入他的军中，何况四军里头更有叶挺和叶剑英之流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归四军指挥的更有著名共党的贺龙。我们都替张先生耽心，张先生倒自拍胸脯，说他有把握，共产党绝不敢对他叛变。

在武汉分共之后，武汉政府组织了东征军，拟东指南京，先求长江统一。张先生担任了右翼军事，师至九江，他却自请回粤，不再往东行。他的态度变化，固然因为李济琛先生派了陈可钰到九江，劝他不要打南京，回粤休养，同时也受了自称左派朋友的怂恿，等他回到广东，对他再演黄雀在后的阴谋。我们到了那时，真是无法可想，算算他就是中途退出，军事也不至于没有办法，故也且自由他。殊不知贺龙一至南昌，便暴动起来，率军离开张先生去广东的陆海丰了。张先生一听前军有变，在九江坐了专车亲往镇压，刚至半途，却为他的部下架起机关枪阻不许行。他自己下车大喊我是张总指挥，

而士兵却说，我们不知道谁是总指挥，只知党的命令，张先生知道了那时并非他自己能够镇压的，急急回车，他真心灰意冷了，回到九江，把剩下的军队交给军长黄琪翔率领回粤，自己个人趁了轮船至上海先回香港休息去了。

在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我因反对这个非法组织也回广州了，中间还有四军的驱李运动，因于本文无关，留俟他时再述，至十二月十一晨而有广州共产党的暴动。张先生固然太信共产党，而黄琪翔先生尤其相信共产党，不止他相信共产党，凡与共产党接近的都是好人。南昌事变似乎不足摇动他们的友谊，依然信任叶剑英，信任张云逸，终于在十二月十一早叶剑英首先率领四军的教导团在沙河暴动，焚烧广州，这一段事实我在"军中琐记"中已有记载，现在略而不述。

共产党不是友谊可以感动的，也不是乡谊可以影响的，为着友谊和乡谊，朱培德先生吃了朱德的亏，朱培德是云南人，朱德是四川人，云贵川三省人在外边都是引为同乡的。本来军队中驱逐共产党在武汉方面开始于朱培德的军队，自长沙马夜事变，国共两党还想设法弥缝，明知终久必分，但希望在北伐完成之后，再和平分手。可是在六月底南昌朱培德的第三军已发现"请共产党离开第三军"的标语，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很狼狈的带领其手下工作人员逃回汉口。这一件事是要设法处置的，朱培德来电 汪先生指定要中央派我至江西一行，大约他要我去的原因，第一我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时，他正任江西总指挥，彼此有相知之雅，而且在广东时候，彼此就合得来。第二我既是中央委员，而又在武汉。中央为着这事终要派人调查处置的，与其派别人恐怕传闻错误，不如我去处理还可以比较公平。我到江西之后，第三军凡是公开的共产党员都离开了，然而党部、农会和工会还充满共党分子。我告诉朱先生最好还是听中央命令，万不可轻于举措，致又酿成长沙马日事变的怪剧，朱先生还老成持重，听我的劝告。不过使我感觉奇怪的，朱德还是任他的教导团长，我问他为什么朱德可以留在第三军，他说朱德有同乡之谊，思想也比较纯正，朱德是不会反他的。他自己既然有把握，我又事事听之中央，还有什么意见。不料南昌事变，就由朱德率导教导团，引导叶挺和贺龙暴动起来。迨至所谓行动委员会率领暴动队伍由江西退至海陆丰时，朱德大概知道军事必败罢，把自己一团军队撤至广东的北江，改名王楷来依范石生师长。范石生是在民十一年跟杨希闵的滇军由广西东下驱逐陈炯明的，在我们解决杨刘时，范石生率师正企图回滇，脱离杨希闵，驻兵广西，所以不在解决之列，至到我们北伐，他也回了广东驻防北江。范先生是云南人，恐怕也如朱培德的见解罢，把朱德收容了，并且替朱德掩护了，但后来朱德知道江西共党入了瑞金，不独把自己的队伍带着走，并且把范先生的队伍也拖了不少走，弄到范先生溃不成军。后来范先生不知怎样来到上海做起中医，在黄膺白先生病危之时，我去看他时，在宏恩医院碰见，矫矫的军官一变而为恂恂的儒医，人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而范先生则变为不为良将而为良医了。

最奇怪的，共产党的先生们对于有力量的人是怕的，对于客气的人倒是攻击最烈的，当时我们总以为政治的斗争不在于个人，而在于政纲，所以在武汉分共之时，非常客气，虽然分共，同时还下令保护不违法的共产党人，而共产党首在南昌暴动，继在广东暴动，目的就在以政治方式斗争的我，和待共过厚的张发奎。在广州暴动时，虽然寻

不着我，却以广东苏维埃主席苏兆征的名义大张布告，说已拿获陈公博枪毙，那时我正在河南士敏土厂调兵遣将，过河的侦察兵送上那张布告，我失笑起来，这种“亦且快意”的事，惟有幼稚的共党才做得出。

尤其奇怪的，在理论上共产党倒不怕当日的南京，而最恨他们所谓国民党左派——我自始至终没有自称过左派——因为他们以为右派是没有理论是不怕的，惟有左派才有理论，所以深恶痛绝。在我失败蛰居上海办革命评论时，共党非常注意。共党假名左翼的文艺刊物群起对革命评论攻击；那还不够，更派许多共产分子潜入大陆大学读书，有一次还想纵火烧毁大陆大学。就是大陆大学的学生双十节在上海天后宫开一个游艺会，共产党还出动许多人扰乱会场。他们的计划我预先接有报告的，但使我有些难于处置。那时我和南京已立于反对地位，决不愿事急去求他们，我更不愿报告租界的巡捕房，我不但不愿求到外国人，而且租界当局已经对大陆大学含有敌意。但学生的游艺会早已宣布，势难中止，好！自己办罢，把一班学生分别配置在各据点，等他们传单一散便动手拿人。人是拿到两个，别的共党同志们都鸟兽散了。那天晚上倒很布置得宜，台上的演剧还锣鼓喧天，台下的观众还谈笑自若，而将一场全武行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中，平定下去了。今日上海的电影明星袁美云就是当日在台上和他姊姊袁汉云演投军别窑的一个人，他那时还是九岁的童伶，现在已由平剧转到电影，且作了明星了。倏忽又是十余年，我想我真是老了罢！

自宁粤合作之后，我刚由海外归来，参加南京政府，以后国共已由党的斗争入于军事斗争，我个人和共党直接上无甚可述。我到南京之后知道陈仲甫夫人高君曼女士贫病交困，我到过他的家中。她太凄惨了，住在城南一间草屋，卧病在床，家具破碎不全，絮被也支离散烂。我真为之凄然，只有尽我所能的接济她，君曼夫人因病久失医，终于逝世，我又嘱仲甫的朋友潘先生为之营葬，草草尽一点朋友之责。

仲甫忽为被捕禁在南京狱中，仲甫先生虽然被莫斯科认为托洛斯基派而开除，但托洛斯基到底还是共产党，所以依然被捕了。在未判罪之前，我入狱看过他一次，判罪以后，也看过他一次，仲甫先生在京的旧朋友很多，大家已忘记他是一个共产党，还待他是对于新文化曾有功勋的一个人，虽然名为监禁，倒很自由和舒服。我见他时，真是头发秃白，形容憔悴，仲甫先生本来有些秃顶的，现在年力渐衰，更秃白可怕，我自然不愿再提往事，只是关心他的生活如何。仲甫又表示感谢我招呼君曼夫人，我只有唯唯，心内有说不出的凄怆。中日事变，仲甫以政治犯的原故释放了，一天我在佛海家里和他吃饭，我们只谈中日问题，更不复谈国共。我在廿七年十月底在大场失守的第二日奉命往意大利晤黑索里尼，廿八年二月归抵汉口，自后更没有机会相见，我在成都时还听见他住在重庆附近乡间。后来到了国府还都，佛海告诉我，仲甫也赞成和平，只是无法脱离内地，不久便听见仲甫逝世了。我们两个人虽然有过一重公案，究竟没有恩怨可言，听见他逝世，不禁有人往风微之感，假使仲甫能来，或者我们还可以共同做一番事业也未可定呢！

谭平山呢，在汉口时我也见到了。以前我在南京实业部时，知道他住在欧洲比利时，他的困苦，大家是知道的，我曾接济过他一次，对于他的儿女在沪求学，我也曾为

小小帮忙。人到中年，哀乐备尝，恩怨都了。平山为人什么都好，只是责任心过轻。当日在上海他不替我辩诬，我想也不是存心捣我乱，恐怕是怕麻烦，他对党事还是不大愿负责，对于朋友闲事更是懒得管了，我早已不想做共产党，这一段经过还是忘记算了。我们在汉口谈过几次，我的经过他大约全知道的，至于他的近状我也不再问。两人谈谈国事，一次我们还在一家饭馆吃回鱼，饮酒搳拳，欢笑如昔。我只间接听见他替蒋先生草过一个方案，因为那个方案后来还交张群先生修改，我也被邀参加的。平山年纪虽然只比我大几岁，但看来真老了，头发本来已鬓有二毛，我们相见时更斑白而稀少。酒量也减了，豪情也尽了，班荆道故，不禁感慨系之。

张国焘先生也在重庆相见了，我们知道他已脱离共产党，还替蒋先生做反共的工作。国焘先生和我分别十七年，看他长得胖胖的，谈起话来矜平躁释，绝不象在上海开代表大会时那样锋芒，倒象言必规行必矩一个绅士。气质真可以随时代变化的，我于国焘先生尤可见之。

朱德和叶剑英也在我未赴欧前在佛海家见过了，佛海一天约我见见朱德和叶剑英，说他们已到南京，和他们谈谈也很有意思。一夜顾祝同先生带了他们来，朱德似乎矮了许多，颜色也苍老了，叶剑英还是旧时的神气，沉默寡言。我想起叶先生在广州暴动时要致我于死地，而今日倒客客气气的谈话，不由得心内好笑起来，但他们今日变了一个生客，我又怎能笑出口呢，只好谈些不着边际的话。朱德说我不会老，大约是滋养料充足之故，我只好微笑，人之易老与否大半原因在遗传，但我又何必根据唯物史观和他作遗传学的辩论。叶剑英很沉默，一半是他的脾气，一半大约也有些不好意思，我想他和我见面时，也会想到广州当日两方拚命厮杀的情形罢。

在汉口的参政会内，我见了不少共产党人，参政会内有十个共产党的代表，老朋友的董必武、林祖涵、邓颖超，全都在会场见过，但是除点头之外，没有交过言。那时在参政会内，我虽然不是参政员，但被指定为国民党参政员的指导者，张君劢先生笑我是英国国会的 Whipman，指导者的职务，他们是知道的，恐怕因此更不会和我有好感。

我参加和脱离共产党的经过就是如此了。在西安事变之后，在庐山谈话会之前，我在南京忽然接到钱大钧先生由牯岭来一个长途电话，说蒋先生要我到庐山，庐山本来被人认为终南捷径的，我自廿一年到南京，终我在实业部之任没有到过，这次既然有要事，只好一行。在庐山蒋先生和我谈完一般事之后，说共产党的人你有见过吗？我说没有见过。他问我还有熟人没有，我说就有也只是如林祖涵董必武旧人，若新进如陈绍禹等，我只闻其名，未见其面，蒋先生默然，我也告退了。蒋先生是不是要我和共产党联络，我不知道，但是我的为人不能用权谋术数，更不愿见口似心非的朋友们。而且当时我已看透国共合作是一种把戏，共产党抬出民族招牌也是一种把戏，我既不愿而且不惯玩这一套把戏，不要说主角我不来，就是跑龙套我也不干，只好在台下一个角落看看算了。现在重庆方面的国共斗争果然由温火而至白热了，我们且看看下文罢，然而为着屡次的捭阖纵横，中国的命脉也因此削弱尽了。

民国三十二年初稿

中国共产党的形成

葛萨廖夫

如果要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起源的日期，那末最准确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我们所以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在这年的五月四日，反日运动席卷了全国。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盘据了中央政府，正在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出卖着国家。日本和他们订立极端不利于中国的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将中国的最主要命脉的几条铁路归日本掌握。条约的缔结是和中国在凡尔赛会议上受侮辱同时发生的。这就激怒了中国青年，特别是学生们，因为他们满想战后的中国是可以自由呼吸的。他们这时已经进入了“直接行动”的阶段，但是不是有组织的。他们使用了暴力手段，他们痛打了中国驻日公使，并且攻打了几个政府机关。在巴黎，中国学生还企图刺死中国公使和交通系的首脑。这时局面异常紧张，群众性的积极的革命运动可以说是从此开始。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它开始是完全由学生领导，并且只有学生参加的，不久工人也加入了。在一九一九年的六月里，北京、上海各地都不只是学生和知识阶层，工人群众也关心起来，参加了运动。工人们这种新的阶级觉悟表现在他们有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要求。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华北，北京和天津一带地方出现了一种新组织，叫做“十人团”，是不超过十个工人的团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人们有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的强烈要求，但是发展得还不够还不能组成一个政党。

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们正努力研究有关中国革命方向的各种学说，但是没有人去计议或者从事实际工作。可是在一九一八年，陈独秀（这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却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和几个朋友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开始宣传有关工人阶级发展和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等问题。另外，又定期出版名叫“告北京人民”的一种传单，他的活动进行不久，几个月后就被捕入狱了。出狱后因为不能在北京继续工作，他就到上海去参加戴季陶所出版的期刊工作。上海是个工业高度发展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人群众。当时中国即没有工会，也没有工人政党，陈独秀因此从事这两方面的组织工作。到一九二〇年初，陈独秀在上海集合了少数几个人为工人出版一种报纸，叫做“劳动界”，另一种专为上海本地出版的，叫做“伙友”。在那时极端反动的情况之下，他们曾经用不同的方法去吸收年轻的革命者，他们在上海成立“外国语学校”，聚集了优秀的革命者，准备把他们分配在国内工作或以后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去学习。这个学校在一九二〇年大约有六十个学生，大多数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中国有的地方团比党先成立，有的地方同时成立）。其中分配在国内工作的学生，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下，形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他们首先在上海着手工会的组织，因为上海当时还没有工会。

最先组织成功的是机器工会，接着是印刷工会和纺织工会。从这里可以看出工会组织是先在技术工人里得到成功。然而困难是经常发生的。组织工会和进行其他工作都需要经费，但是简直筹不到款。销售“新青年”杂志的收入是唯一的经费来源。

一九二〇年初，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组成了，到年中大约有七十个成员。这个小组在工人里有很大的威信，它致力于组织和指导工人运动。道理很明显，这个运动不能仅限于上海，如果仅限于上海的话，整个组织会很快的消灭掉。事实上也是如此，上海小组成立后不久，其他各大城市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一九二〇年九月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组员八人，其中六个原是无政府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黄凌霜。另外两个人是共产主义者，其中之一是李大钊。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和北京的一样，是由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组成的。这种“结合”的时间不长，北京有三个无政府主义者不久就退出了。但是由于随后就有邓中夏等四人参加，北京小组的力量反而加强了。他们马上进行印发传单、出版小册子和“劳动音”周刊等工作。

当时北京的局面反动得很厉害，进行更具体的活动是十分不可能的。经过了一些时候，北京小组才在京汉路上的长辛店建立起工人夜校。开展这个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由于这里工人的思想比上海工人还要落后。从印刷各种鼓动性的刊物，出版报纸和开办学校来看，北京小组的工作即使不是在上海小组的直接指导之下，也是在它的建议之下进行的。当时，上海小组为建立全中国性质的共产党打下了真实的基础，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正中心。不论怎样，在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中国共产党小组，一在上海，一在北京。

同年秋天，仍以革命家和国民党党员自居的陈炯明驱逐了广东反动督军莫荣新。陈氏占据广州之后，就把住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请到广州来领导广东政务。同时他又邀请在上海的陈独秀到广东负责教育工作。这时在上海关于共产主义力量的聚积与组织工作已经多少有些基础，陈独秀虽然无意于教育工作，他决计趁这个机会到广州去进行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

参加广州小组的有谭平山等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在广州较好的工作环境里，根据他在京沪长期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为共产党草拟了一个党纲，提交广州小组研究。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陈独秀所拟的党纲和他们的基本观点相矛盾，因此宣告脱离小组。他们的脱离和京沪两地无政府主义者的脱离一样，对党小组毫无损失，更没有发生任何恶果。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多大的区别。他们不在群众里进行任何工作。群众很少知道他们，说得更准确些，群众简直不知道他们，所以群众对他们的脱离没有任何反映。广州小组终于采纳了（虽然并没有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这个党纲，并且开始工作，成立了训练广州及其他各地工人的宣传鼓动员学校，并且出版了“劳动者”周刊。

也许可以说，广州小组的成立，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第一页第一行。

上海、北京和广州差不多是包括了全中国各个方面的三个中心，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几个主要中心：上海是全中国的工商业和政治的中心，北京主要是政治生活和大学校的中心，广州长期以来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自然要从这些地方

开始。这些地方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打下了基础，它的继续成长和向其他地区发展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不到半年，湖北、湖南和河南各省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党组织的运动在国外留学生里也开始了，在那里个别的共产主义者不久也出现了，在东京巴黎和其他地方，甚至在学生中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起来了。

工作在发展着。可是，人们一开始就感觉到缺乏足够的和强大的力量来指导酝酿中的共产党的成长和它的活动。由于力量不够，党遇到了几种困难，其中之一是工作范围问题。党自然会首先计议到要拿如此贫乏的力量来担任整个社会运动，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将力量集中到比较容易做到的几点上去。那时认为组织工人的工作，也就是工会工作，是这样的一点，因此便把最优秀的力量投到这里。要这样做的另外一个理由，便是虽然工人阶级的人数是大大的增加了，但是工会运动却进展很慢，反动分子又开始打进工人阶级内部。因此派遣最优秀的力量到群众中去组织工会，在当时是最妥当的决定。此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三年中，集合了各个革命者，在全国几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建立了小组，为出版事业奠定了比较恰当的基础，了解了群众的情况。由于做了这些事情，到一九二一年初，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粗略的轮廓了。这三年应当认作是一个进行初步工作以便奠定党的最后的基础的时期。

由于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小组同志们三年来坚持不懈的工作，获得了以下的成绩：上海有了某种形式的组织，参加的或赞助的约七十人，这些都还不是党员，因为党还没有产生。北京约有十人，广州人数与北京相同。有三种报纸，分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版。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比共产主义小组人数多一倍。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组织也获得了一些工作经验。这些经验诚然只是一些同志个人的，还不是属于整个组织的，但是总可以作为今后工作的基础。

取得了以上所说的成绩，党进入了一九二一年。

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获得了上述工作成绩的小组同志，要继续推进工作，便必须成立更正式的组织。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只有六、七十个和组织多少有些联系并且真正积极工作的人。其余的只能算做“同情者”。参加大会的代表有十二个，都是最积极的分子。会议是极端秘密地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尽管警察和宪兵多方侦查集会地点，会议还是很平安地进行了。大会的发起人，希望这次大会解决一切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陈独秀因为在广州事忙，没有能够参加，只把他所拟的党纲提交大会考虑。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成立小组时的成分复杂和思想分歧的情况，在这次大会上重现了。到会的十二个代表里，包括了社会主义的学术研究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因此意见很难一致。陈独秀草拟的党纲提交大会讨论。这个党纲特别着重于党员教育、党内民主、党纪和争取群众的必要等问题。在党纲上他提到：“党的当前问题还不是夺取政权，这是将来的问题。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必须进行许多准备工作。”这样温和的纲领有些代表仍然嫌它过激。有的代表却主张党根本不需要什么固定的纲领。

现在举一个大会思想分歧的情况的例子。在讨论陈独秀所拟的党纲的时候，代表李汉俊提议说："在德国和俄国都爆发了革命，但是这两个革命走着不同的道路。在苏俄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德国是民主制度。我们和这两国的联系很差，不知道那一个对。对陈独秀所提的，党的纲领和策略等问题必须在透彻研究了这两种革命以后再做决定。因此必须有些同志到这两国去研究这些问题。"李汉俊就是拿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党的最重大的问题。

由于大会上竟出现了这种显然的机会主义思想，要讨论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大会上也没有提出来。

李汉俊一班人一直发展到拒绝进行一切积极的革命工作。他们反对党干预工会运动，反对出版共产主义著作，甚至反对一切"政治"。他们只同意"研究"。这就是学院派。他们认为应该先去"研究"来求"知"，然后再去"行"。他们的口头禅是"倘若我们研究了俄国、德国和西方的革命，领会了革命的实质，根据这些知识，选定要走的道路，然后再去实行就很容易了。"

若不是大会上多数代表抵抗了李汉俊（陈公博赞成李的主张）的机会主义倾向，党便会毁灭，更确切地说，党就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组织，已组织起来的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也会垮台。当时工人群众和一般跟革命运动发生关系的群众，还没有对他们的领袖进行监督的力量，而且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但是多数代表们深深感到这是党的存亡的关键，对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姑息退让都是无益的。大会根据这个观点去处理了上述问题。在大会上对这种危险倾向进行了有决定性的抵抗，并肯定了党的集中制，党纪和党的最终目的（夺取政权），以便将来作为党纲的基础。大会决定党的名称是共产党，它将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进行工作，它的最终目标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夺取政权这点是使得李汉俊、陈公博等机会主义者最为不安的。第一次大会决议：凡有保持非共产主义倾向的思想的分子应当立即出党。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纲领给了党多方面的帮助，使它能够在今后顺利地进行工作。大会选举了第一届中央委员，陈独秀当选总书记。

陈独秀当选后就离开广州，到上海去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委员会。但是他刚到上海就被逮捕了，直到出狱后才能开始工作。陈独秀仍然按照他过去的原则，首先从加强工人运动着手，而且在上海也便于这样做。为了领导工人运动，特别成立一个"部"。接着开始组织出版工作，成立了出版社，从事出版共产主义著作，例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党纲"、"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还有"苏维埃政权制度"、"俄国共产党党纲"、"俄国革命史"等。这些著作多半是从英俄文翻译的。由于出版社负责人错误地认为这类书不好销，必须赠阅，结果弄得出版社因为财政不能支持，不久就停办了。这个错误不仅应当由出版社主持人负责，主要责任应当由领导出版社的中央委员会担负。这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即便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也不大清楚自己的力量。共产主义著作尽管那时印行的不会是几百万本，而是很少量的，他们还怀疑能否销售。这自然是个错误的见解，这是由于过低估计自己的力量产生的错误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宣传鼓动工作和共产主义著作的发行工作都开展得很慢。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与其说是

热心革命的读者不欢迎这些读物，毋宁说是由于出版工作处理得不好和材料选择得不适当。

虽然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很慢，尤其在工人阶级中很少成就，但是，工人运动在全国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地区进展很快。从前党在工人群众中只成立了些小组，这时就有了成立工会群众组织来代替这些小组的可能。大规模的工会组织在上海的机器工人里首先成立，接着在纺织和印刷等业的工人里也成立了。重要的是这时参加工会的不仅有工人群众，也有职员。这个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是和工业的兴盛繁荣并行着。

尽管工业有了普遍的发展，工人境遇需要改善的地方却很多。于是以经济罢工形式出现的、纯粹经济性的，所谓"积极性的工人运动"出现了。罢工首先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爆发。中国共产党党员积极参加组织这个运动。他们深入工人群众，到工人区去宣传经济斗争和成立群众性的工会的必要。但是党在这个斗争里也遇到许多困难，尽管工人群众情绪高涨，他们仍然觉得共产党的建议太冒险了，他们认为工人运动应该不超过法律允许的范围。最落后的分子甚至怀疑罢工的建议动机不纯，并且带有煽动性。这是工人极熟悉根底的、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三年的那些"工会"的影响。事实上，一般工人们对于共产党很不了解，党员的地位又不合法，不能暴露自己的"真面目"。这样，工人们就疑惑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密探，至多不过是孙中山派来的鼓动者。工人们认为不论这些人是从那里来的，他们总是要利用工人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因此，对一些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怀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不得不进行一番宣传解释，经过相当长的时候才使工人们明白过来，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产生在无产阶级巨大中心的上海，然后发展到北京、广州、汉口等地。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程序也是这样的。在华北的北京和天津，工人运动也差不多同时开始发展了。如前所述，在北方已经成立了工人夜校，主要是铁路工人的。上海的"外国语学校"成了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训练工人的场所。同样，长辛店车站的夜校就成了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吸收党员的地方。所不同的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只是训练，并不吸收党员。除了学校之外，共产党员们还常常在工人休息的时候到茶馆饭铺去找他们。这也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共产党员必须首先和包工和工头们打交道，换句话说，就是要和企业里骑在工人头上的人发生关系，这件事看来虽然奇怪，却是必须的，因为除了大多数的铁路工人之外，中国工人全都受着包工的束缚。不难了解，共产党员和包工之流是不相干的，因为要想和这些人谈通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竭力使工人脱离包工和工头等人的影响。但是进行这件工作也有很多困难，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到一九二一年五月，才终于收到了一些效果。他们在长辛店车站召开了一个一千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包工问题。这个会是共产党对个别工人和小群工人所经常小心进行的一部分工作。在这个会议上，使人明显看到工人头上的包工势力可以说差不多肃清了，共产党将群众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机已经到了。党提出的必须成立群众性的工会的口号，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赞同。这样，一九二一年五月工人运动也就在华北开始了。

我们可以这样有把握的说，到一九二一年，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已经在中国各工业中心的城市开始了。这一年上海各产业工会都成立了。全国的铁路都成立了铁路工会，工

人运动逐渐扩展到河南、直隶、湖南和其他各省的矿山工人中。这次工人运动的特点是有完好的组织和十分正当的性质。所谓“正当”，指的是这次运动是由工人们和工人阶级的政党进行的，和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间政客、投机分子所搞的各种“工人运动”不一样。有了良好的开端，随后的工作就是巩固已有的阵地，防止投机分子再度混进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所有有关的工作，从始至终都是由共产党担负，并且是在它的绝对领导之下进行的。

还有一件事标志着一九二一年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工作的重要性。由于党的努力，中国参加了一九二二年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民族会议。大会召集的目的就是组织一个远东各民族反对华盛顿会议和它的决议案的运动。党用各种方法争取中国代表参加这个会议。党通过期刊、各种会议进行了最广泛的宣传，阐明派遣代表参加大会的必要。在这方面党遇到不少反对者，他们不仅对这个建议表示消极，而且积极阻挠，不让它实现。党打破了这种顽固的抵抗，终于组成了参加大会的代表团。代表一共三十多个人，包括学生、工人和国民党的代表，另外还有共产党员。值得注意的是，它代表四个组织，更确切的说，代表中国社会结构里的三个阶层：即是工人、知识阶层（指学生）和某种范围内的小资产阶级（指国民党的周围群众，因为国民党在当时特别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至于说到政治信仰，除少数代表以外，多数人没有什么明确的见解。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既无确定的纲领，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党没有时间也不可能使代表团取得一致的见解。代表们自己也不可能完成这件工作。代表们对大会的当前任务的含义不十分明了，因此不可能在会上提出什么政治纲领来。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减低代表团的重要性，因为它所参加的是一次有国际意义的大会。华盛顿会议十分之九的工作和时间都用在“太平洋问题”上，太平洋问题又有很大的部分就是“中国问题”，这就大大增加了中国代表参加远东民族会议的重要性。我们甚至有把握这样说：如果没有中国代表来参加，大会就会失掉它全部的重要性。

以上所叙述的是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一九二二年中党所经历的与所进行的事项的梗概。

（摘自葛萨廖夫著《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活动》）

留法勤工俭学的斗争和旅欧总支部的建立

何长工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民族灾祸和阶级苦难日益深重。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受到西方思潮——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大都苦心焦思，希望能到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这时，恰巧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在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动员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这一倡导得到了这些青年的响应。特别是其中一些已初步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先进分子，认为到欧洲去更接近已取得革命胜利的俄国，更便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经验。因此，在湖南、四川、广东、北京等地，都有不少青年报告参加这一运动。经过千辛万苦，远涉重洋，去法国留学。我当时也是参加者之一，回忆起六十年前和同学们在法国的劳动、学习和斗争生活，至今仍感亲切。因此，把它写下来，供研究这段历史的同志参考。由于时间过久，所记可能有错误和遗漏，尚希参加过这一运动的同志予以补正。

一、毛泽东同志为勤工俭学运动日夜奔忙

一九一八年六月，新民学会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接到了杨怀中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告诉他北京有一些教育界人士正发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号召青年学生去法国半工半读。毛泽东同志便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集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了留法勤工俭学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说明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目的和宣布"会友向外发展"的计划之后，还鼓励大家说：我们的同志应该到国外去学习，各方面的问题都要学习和研究；不但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也要学习革命理论和一些先进国家的革命经验。我们学到了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之后，就可回到祖国去各地搞革命了。

为了进行具体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先派蔡和森同志去北京联系。不久（大约在一九一八年九月），自己又带领罗学瓒、张昆弟等同志二十多人去北京。到了漯河北面的郾城时，遇沙河涨水，铁路被毁，车不能行驶。个别同志为困难所动摇，说：去北京，就有这样的困难；去法国，要飘洋过海，困难不知该多大！毛泽东同志鼓励大家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中国正是黑夜漫漫，风雨如磐，四万万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受熬煎。我们立志救国，还怕这点困难吗？毛泽东同志的话，鼓舞了大家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火车停驶期间，毛泽东同志组织大家到郾城附近的农村进

行社会调查，使同志们增加了对当地农民的了解。

到了北京以后，毛泽东同志和罗学瓒同志等八人曾住过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这是一处破旧的小院，北房两端有配房，毛泽东同志和罗学瓒同志等八人，就挤住在这间长不到一丈、宽不足八尺的东配房小屋里。毛泽东同志后来曾风趣地回忆说：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一间小屋子共八个人挤着住。晚上我们八个人挨得紧紧地睡在一个炕上，挤得透不过气来；谁要翻身的时候，必须预先警告两边的人。

第二天，蔡和森同志介绍了联系情况。新的困难和问题又摆在面前。原来"华法教育会"并未为勤工俭学学生创造出国的条件。它既没有为勤工俭学学生筹集出国的旅费，更没有为他们向留学国安排好工作和学习的场所。一切毫无头绪。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不少人的情绪有些波动，用焦急的眼光凝视着毛泽东同志，期望他指点办法。否则，身无分文，久困北京，进退维谷。还有人在想，如果不能去法国勤工俭学，那就到南洋做苦工，然后再设法去欧洲。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安慰大家：我们既来了，就不必急，先安顿下来，再找一些人商量，会想出办法来的。

当时在北京的还有罗喜闻、毛羽顺、高风和我等十二个湖南华容同学。我们原准备去南洋做工，路经广东时，遇到黄强，他介绍我们到北京去联系留法勤工俭学，所以我们先于毛泽东同志他们而到达北京。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找到罗喜闻后，问可否去南洋？罗答：去不得。因为南洋的苦工，大半是卖"猪仔"去的。那里的外国农场和矿场主，都是雇用中国人来管理中国苦工。这些人很凶恶，不但克扣工资，而且任意殴打苦工。何况，你们都是学生，他们不会要。毛泽东同志听了以后，坚决反对去南洋，认为如果去南洋，莫说难以留法勤工俭学，恐怕连回国也成问题。因此，决定暂留北京，继续想办法。

后来，经过杨怀中老先生的协助，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发起人蔡元培答应开办预备班，将已经到京的勤工俭学学生收留在预备班，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法语，为将来出国做准备。最初，成立了三个预备班。一个班设在长辛店。这个班的人数最多，他们一方面学习法语，一方面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作工，和工人接近，向工人学习。一个班设在保定。这个班有机器十台，勤工俭学学生既可学法语，又可做工。一个班设在直隶（今河北）蠡县布里村。蠡县的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有纺织机器，可供学生实习。后来，各地来京的勤工俭学学生越来越多，原来的预备班已容纳不下，所以，又在北京大学、北京法文专修馆等处增设了几个预备班。

毛泽东同志在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学习和生活问题之后，就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当时最要紧的是筹备赴欧旅费。毛泽东同志在杨怀中老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该退还湖南的粮、盐两税的超额余款存在俄国道胜银行的利息，提取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毛泽东同志的辛勤工作受到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赞誉和爱戴。当时，罗学瓒同志从北京寄回的家信中，曾经这样写道："毛泽东组织预备班，出力最多，他的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在毛泽东同志的组织和关心下，怀有救国救民伟大理想的勤工俭学学生在预备班努力地学习。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长辛店、保定等地留法勤工俭学

预备班的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成为这个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飘洋过海初到法国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生，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后，便开始分批陆续由上海出发，飘洋过海，前往法国。由于贫困，我们只能坐三等或四等舱，那里空气混浊，特别是当海轮航行在赤道线上时，舱内闷热，更加令人难忍。许多学生都是初次航海，每当遇到大风的时候，就只好躲到舱里，饱受眩晕呕吐之苦。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之后，我们才抵达目的地——法国马赛港。当时出面接待中国学生的中国驻马赛领事，竟是一个法国人。学生们一看就凉了半截。这位“中国领事”，对学生漠不关心，就连学生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事后得知，这种任用洋人充当中国领事的有损国家独立尊严的事，在驻美、驻英等领馆中也同样存在。所以，当学生们一到法国，就觉得举目无亲，都有一种海外孤儿的感觉。

到达法国后，勤工俭学学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工作。因为有了工作，才能生活，也才有可能把节省下来的钱作为学费。但是，当时的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工厂关闭了，一时还未恢复；有些以前生产军用品的工厂也停产了。同时，法国工人又大批从战场复员回来，也要找工作，据当时估计，仅巴黎的失业工人就有二十万人。所以，我们这些新来的外国人，要在法国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在法国，当时也有一个“华法教育会”的机构，它本来是应该负责照管勤工俭学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但它是一个官僚机构，对学生的事情很少过问。勤工俭学学生经过重重困难，才找到仅足糊口的工作。为了生活，为了求学，勤工俭学的学生们什么活都干。如有的人到钢铁工厂和煤矿去干重体力劳动；有的人进手工作坊当小工；有的人去饭馆餐厅作勤杂工；有的人到菜市场卖菜或送牛奶。当时失业人数众多，资本家趁机压低工资，所以这班学生整天辛勤所得，也仅够糊口而已。还有一部分学生则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每日向“华法教育会”领取一点微薄的“维持费”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来的理想——半工半读，也就烟消云散了。

三、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蕴积在勤工俭学学生心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这一天的早晨，住在巴黎近郊的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高呼着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公使陈箓蛮不讲理，学生们怒不可遏，直逼陈箓。陈箓狼狈不堪，在法国警察保护下慌忙逃脱。大家把这次斗争称作“二八运动”。这次运动，震动了巴黎。吓坏了中国的反动政府，也唤醒了勤工俭学的学生们。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大部分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人。他们在祖国垂危之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海外，同法国的工人、农民一起参加

反对资本家和农场主的斗争。这些斗争活动，触怒了法国的和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就连那时在法国的反动政客李石曾、吴稚晖等，也感到十分恼火。于是，他们沆瀣一气，抛弃了“提倡勤工俭学”的假面具，对学生们进行污蔑、打击、迫害。“华法教育会”本负有代勤工俭学学生找工作、找学校的职责，这时不但不履行职责，竟诬称学生“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致使多数学生陷入工不能工、学不能学的困境。

这次“二八运动”还有个导火线。那时国内报纸曾刊载一则消息，说是国内的一些团体募集了三百万法郎的捐款，资助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但是这笔捐款很长时间并没分发给学生，于是学生们便去询问“华法教育会”。他们支支吾吾，不作明确答复，甚至否认其事。学生们拿出报纸作证，他们才不得不承认有这笔钱。但是他们又说什么钱是汇来了，但尚不够数；而且需要补助的学生人数有待登记，每个学生可分多少亦待确定。总之，百般推托，借故拖延。实际上，他们早已贪污中饱，将这批捐款套购外汇谋利或买古董私藏了。学生们洞悉这一真实情况后，怒火中烧，就如同点燃的火药桶一样，猛烈爆发了。

先是，当“华法教育会”及李石曾、吴稚晖等的“提倡勤工俭学”的假面具被揭露以后，一些先进的勤工俭学学生就开始聚集起来，商讨互相自救的办法。在巴黎近郊蒙达尼公学学习的张昆弟、李富春等同志，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一方面互助自救，一方面从事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该会章程第一条写明：“本会以行社会革命为宗旨”。

“勤工俭学励进会”成立以后，参加的同学不少，无形中成为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群众组织。它对推动勤工俭学学生的团结和争取进步，起了一定的作用。

正在这个时候，国内外对勤工俭学学生的压力日益加紧。北洋军阀政府借口“国库奇绌”，拒绝资助；并令公使馆将在法国的无工无学的学生“遣送回国”。“华法教育会”也落井下石，通知勤工俭学学生今后不再发给维持费。这一来，大多数勤工俭学学生面临绝境。当时就有个别学生被迫跳河自尽，以抗议这些反动措施。

“勤工俭学励进会”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一方面加强对同学们的互助自救，同时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派几个同志去公使馆交涉和斗争，但没有结果。

要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只有团结起来，对反动政府的驻外机构进行斗争，才有出路。这是当时大多数同学的共同呼声。

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八运动”的前夕，“勤工俭学励进会”在巴黎一家咖啡馆里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口号，决定号召在巴黎和巴黎近郊工读的学生，第二天都去公使馆示威请愿。

第二天一早，四百多名学生陆续从巴黎各区到达公使馆前，将公使馆团团围住，派出以蔡和森同志为首的代表十人和女生代表一人，去见公使陈箓。陈箓开始拒不见面。在学生们的压力下，才不得不答应于下午一时在公使馆附近的塞弗方公园和大家见面商谈。

下午一时，陈箓来到公园。但他对同学们的要求，即救济有困难的勤工俭学学生和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和学习，却一口拒绝。他说：“你们是‘华法教育会’组织来的，

有困难应找他们去，公使馆管不了。”当同学们退一步只要求他向法国政府交涉，多招收一些中国学生作工时，他仍是顽固地拒绝，说："我办不了。我没有责任管这些事。”当时在场的学生们看到陈箓这种恶劣态度，怒火越来越大，站在前面的几十个人将陈箓围住。陈箓情知不妙，拔腿就跑，这时，突然警笛长鸣，一队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法国警察闯入人群中，保护陈箓逃去，并举起警棍向学生们乱打。学生四处逃避，其中有四位学生代表被法警捕去。

中法反动当局这些暴行，立刻激起了旅法各界华侨的愤怒抗议，纷纷写信声援学生并向陈箓提出严重责问，国内也来电抗议。被打散的学生，那天并没有散去，当晚就继续在“华法教育会”楼上召开会议，一致表示要斗争到底，直到被捕的代表放回和救济问题、工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在学生的强硬要求下，陈箓才不得不被迫请法国当局将捕去的四位学生代表释放，并将国内汇来的一部分捐款分发给有困难的同学。

这次斗争，以勤工俭学学生的胜利而结束。通过这次斗争，学生们进一步看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周恩来同志曾把这场斗争的经过，写成通讯寄回国内，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华法教育会”的创办人李石曾和北洋政府驻外官僚陈箓等欺骗和迫害青年学生的罪行。这是我们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向反动当局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斗争。

四、旅法侨团掀起“拒款”怒潮

“二八运动”过后不久，即一九二一年六月初，北洋政府派出的专使朱启钤来到巴黎。据朱自己的表白，他的任务是代表总统徐世昌，来法接受巴黎大学颁发给徐的一个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随朱同来的却有一个交通系的头子，专以出卖国家权益向外国借款为业的吴鼎昌。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朱启钤这次来法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果不出所料，当时正在巴黎的周恩来同志，于六月十六日在法国政府一份官办的报纸上，发现了一条不太显眼但和中国命运有重要关系的消息。该消息说：

“本月十五日，法国国务会议将中国借款事列入议程，财政总长因反对此事而未列席。此人系一银行家，因此次借款之分摊，彼所主持之银行无份，故愤而离席云。”

周恩来同志看到这段消息之后，结合连日外间纷传朱启钤来法是为了向法国借款，而吴鼎昌同来但又不敢公开露面等情况，警觉到此中的蛛丝马迹，现经法报这一披露，可以说是证实了。于是，他便立刻将这一消息通知各旅法华侨社团的负责人。这时，正在圣日尔曼公学学习的陈毅同志也从一位工程师的口里，听到了中法正在谈判借款的消息，他也立刻向“工学世界社”（即“勤工俭学励进会”，“二八运动”后为适应斗争的需要而改此名）报告。一时间，这一消息便传遍了所有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华侨，大家无不义愤填膺，痛恨卖国的北洋政府。

周恩来同志一面关注每天的报纸新闻，从中分析借款动向；一面利用各种关系，调查借款内幕。后来知道，这次中国政府向法国政府借款，款额多达三亿法郎（其中一亿由经手人和北洋政府瓜分中饱，二亿名义上给中法实业银行经营，实际为了买军火打内

战），中国政府对借款的担保条件是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等。这一肮脏交易，必然要遭到中法两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周恩来同志及时发动旅法华侨的拒款运动。他和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同志一起，首先联合巴黎各华侨团体，如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室，以及巴黎通讯社、旅欧周刊社的旅欧记者等，组成了一个"拒款委员会"，于六月三十日在巴黎哲人厅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由赵世炎同志主持。到会的有三百多人，以勤工俭学学生出席人数为最多。会议发表了"拒款宣言"，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这一危害中法两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此外，还在会上宣读了由周恩来同志写的关于借款真相的调查报告，揭露了这次借款的反动目的，并指出它对我国家民族利益的严重损害，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义愤和斗志。

"拒款大会"开过以后，蔡和森、赵世炎和陈毅等同志组织了一批勤工俭学学生、旅法华工和爱国华侨代表去会见朱启钤，当面痛斥他欺骗华侨、学生，秘密进行卖国借款的罪恶行为。代表们还当众声明退回朱启钤为讨好勤工俭学学生而假惺惺地捐助的"维持费"，以示抗议。

在代表们的责问下，朱启钤开始还故作镇静，极力否认。但当代表们列举了许多事实，一一加以揭露之后，朱才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说："想借款是有其事，但还在谈判中，是否成功，还不一定。至于借款用途，主要是用来兴办实业，以富裕国家，并无其它目的……"。代表们对他的答复很不满意，并举出一些事例，证明历来北洋政府所借外国款项，主要是用来购买军火，进行祸国殃民的内战。朱启钤在群众的压力下，假意表示："你们的意见可以考虑，让我打电报回去，由政府决定。"

在代表们的严厉谴责下，朱的借款活动不能不有所收敛。当时的法国舆论界，因为看到了"拒款宣言"，也有一部分同情中国而批评法国政府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但是，无论是朱启钤，还是法帝国主义者，借款没有达到目的，他们是不会死心的。狡猾的朱启钤是"以退为进"，他自已溜去美国，借款的事却交由驻法公使陈箓继续秘密进行。法国政府当然也完全同意。借款的事，有一段时间好象是沉寂下来了。不料到了七月下旬，法国报纸突然披露，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定于七月廿五日草签。《巴黎时报》还报道说，借款额由三亿法郎增至五亿法郎，并透露说："这笔款项，其中一大部分将用于购买军火。"

当这一消息传出以后，所有旅法侨团立刻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告，表示坚决反对。领导这次斗争的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同志，更是连日集会，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于八月十三日在巴黎哲人厅，再一次召开由所有侨团参加的"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出席，当众说明借款的谈判经过和借款的用途、条件，等等。

八月十三日到了，陈箓不敢出席，只派他的秘书王思曾代表到会。会上大家纷纷揭露：这次借款，对外则丧权辱国，对内则祸国殃民，大家都表示誓死反对，并要求公使馆立即取消这一丧权辱国的借款条约，要王思曾表示态度。王思曾无词可对，只能支支吾吾，吞吞吐吐。群众更加气愤，坐在前面的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将王拖下台来，痛殴一顿。在这种情况下，王思曾才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一个"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

《声明》。这一《声明》除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外，并送交法国外交部一份。

这次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才宣告胜利结束。许多勤工俭学学生欢欣鼓舞地把这次斗争称为“国外的五四运动”。

五、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四日，即距“拒款”斗争胜利后约一个月，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揭示板上，突然出现了一张通告：

“（一）九月十四日，中国公使陈箓再次面告勤工俭学学生代表称：‘这次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停发维持费，系法国外交部意见。该部认为，这次中法借款与法国在远东利益有极大关系，而中国学生不解平日受到救助的意义，竟行反对，实属忘恩负义。停发维持费，乃自食其果。’本会特此通知。

（二）九月十二日，‘里大’（按：里昂中法大学）发出通告，谓：‘里大’为培养教授之场所，入学者须有一定财力作保证，有相当的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才能入学。”

这一通告，立即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原来，在七月二十五日中法借款条约草签以后，中法反动当局就暗中指示两国合办的“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于八月一日宣布：“由八月十五日起，将领维持费的勤工俭学学生，全部免费送入学校读书。”妄图以此收买学生。那知学生不为所动，继续积极参加“拒款”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中法当局因而恼羞成怒，取消了免费送入学校的诺言，还宣布停发维持费，向学生施加压力，破坏勤工俭学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在“拒款”运动之前，李石曾等人曾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与生活问题为名，募集经费，在法国里昂筹办一所“中法大学”，准备九月开学。勤工俭学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高兴，认为这所大学是以勤工俭学名义筹款创办的，勤工俭学学生入学，当然没有问题，不料现在“华法教育会”竟把他们的入学权利也剥夺了。这个通告，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立刻传遍，大家无不气愤。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周恩来同志从德国赶来参加了会议。他认为：里昂中法大学之所以拒收勤工俭学学生，是同我们反对中法借款有关的，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个问题大作文章，揭露他们迫害爱国学生的罪恶行为，引起国内的注意，迫使他们取消这个通告。

正讨论中，突然又得到一个消息，说：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从国内招来一百二十多名学生，大部分是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将于九月二十四日到马赛，二十五日到里昂，进中法大学学习。消息传来，群情激愤。赵世炎同志主张先下手为强，由勤工俭学学生去抢占“里大”。蔡和森同志则表示要先礼后兵，先用函电通知各地勤工俭学学生，派出“占校先锋队”，齐集里昂，先同学校谈判，谈判不成，再行进驻。周恩来同志一再强调：斗争是复杂的，敌人要逼我们陷入绝境，我们的斗争要讲究策略，要作不利的准备，还要作长期斗争的打算。他还建议各个团体的骨干，要留下一部分，负责后方和以后的斗争。会议决定：周恩来同志留下。巴黎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由蔡

和森、赵世炎、陈毅同志率领，前往里昂。

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陆续到达里昂，大家热烈地交换了意见，然后由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率领，到达中法大学，向学校当事人提出质问：中法学校的创办费，是用勤工俭学的名义募集来的，为什么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勤工俭学学生反对祸国借款，是爱国行为，为什么你们却和国内的反动政府、驻外的反动官僚一起迫害勤工俭学学生？

当时中法大学的负责人，是该校的秘书长后来当了大汉奸的褚民谊。在学生义正辞严的质问下，他心虚理亏，无词可对，只好推脱自己的罪责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无权改变。"

中法大学校址是在一处古堡内，建有三四层的楼房共五座。其中的学生宿舍，大约可容一千多人住宿。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见争取入学不成，遂转而要求拨出一部分房屋作为七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的宿舍。褚民谊对此也拒不接受。是可忍，孰不可忍！代表们便决定采取断然手段，进驻"里大"。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在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同志的率领下，一百二十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冲进了"里大"，占驻了一座楼房，并准备继续与校方谈判，解决入学问题。

勤工俭学学生激于义愤进驻"里大"的这一行动，没有想到正上了陈箓的圈套。阴险狡猾的陈箓，早已和法国当局以及当时"里大"的负责人策划了一个对付勤工俭学学生的阴谋。当时在克鲁梭工厂工作的学生代表去见陈箓，说明如果他不替学生解决问题，学生们便要进驻"里大"。陈箓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拍着胸脯担保，如果法国方面干预，他负责去交涉，最后，他还慷慨地发给了这批学生去里昂的路费。可是学生一离开使馆，他便立即打电话给法国外交部，诬告勤工俭学学生是什么"极端分子"，已经组织了一批人去里昂，强占中法大学，扰乱治安，请他们立刻派军警前去弹压。

结果，就在勤工俭学学生代表进驻"里大"的第二天，里昂警察局便遵照法国当局严厉镇压的反动指令，派去了二百多名武装警察，包围了"里大"。首先以检查姓名为由，骗走了学生们的护照，随后便以野蛮手段，实行逮捕。两个警察挟着一个学生，拖上警车，押进了里昂的一个兵营。

这时，留在巴黎的周恩来、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同志听到了这一消息，立刻四处奔走，进行营救。他们听说所谓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已带着一百二十名从国内来的学生到了"里大"，吴也是华法教育会负责人之一。于是，决定派王若飞、徐特立同志到里昂找吴稚晖，要他设法交涉释放学生代表。这个所谓"名流""学者"，其实同陈箓之流是一丘之貉。他先是骂学生不守纪律，被拘禁活该，继而表示自己没有办法，要同学们去找陈箓。

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共同策划要把这批学生代表驱逐回国，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因此，无论留下的代表如何多方奔走营救，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拘押在法国兵营的一百二十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除了有几名被保释，有几名由去兵营探视的代表设法带出(其中有赵世炎同志外)，尚有一百零四名，包括蔡和森、陈毅等同志，全部被押送火车站，转马赛上船，遣返中国。

六、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建立

在旅欧学生中，如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早就酝酿在旅欧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通过一年多来的斗争，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建立党的组织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因而进一步认识到建立这个组织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周恩来同志由巴黎前往柏林，在留德学生中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旅德支部，然后又回到巴黎，与赵世炎等同志着手筹备建立旅欧总支部的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积极筹备，旅欧总支部终于在六月下旬成立。当时，从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各地来的代表约二十名左右，都以出席勤工俭学学生会的名义来到巴黎。在代表中，周恩来同志代表旅德支部；李富春、高风、毛羽顺等同志代表旅法支部；聂荣臻、刘伯坚同志代表旅比支部。为了避免法国当局的注意和干涉，成立会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一个小广场举行。会场布置极为简朴，除每人一把坐椅围成一个圆圈外，别的装饰一无所有。周恩来同志曾风趣地说：这样布置很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成立大会由赵世炎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向大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党纲和党章。会议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讨论和一致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并同意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党的名称定为“少年共产党”。（同年十月，经过全体投票通过，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根据团中央从国内发来的指示，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第二天，选举总支领导人，赵世炎任总支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第三天，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同志领导下，又详细地讨论和决定了旅欧总支部的各项工作。一九二二年八月，经我们建议，由中央决定，我们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总支部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总支部下辖三个支部，即：旅法支部、旅德支部和旅比支部。赵世炎和周恩来同志都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

旅欧总支部建立的消息，像春风一样立刻传遍了在法国各地以及在德国、比利时等地勤工俭学的学生之中。许多进步学生纷纷来信，要求加入。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同志为了寻求革命真理，远涉重洋，到达柏林，终于找到了党。在周恩来同志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并成为总支部的骨干。

旅欧总支部成立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我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大家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斗争的方向，决心通过“共产革命”来根本改造中国。但是，身处异国他乡，斗争应从何入手呢？在讨论中，周恩来同志提出：我们党组织是新建立起来的，党员的思想水平还不高。因此，当前任务，应着重于思想建设，即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学共产主义”，并强调应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大家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意见，规定了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在总支部下设立“马克思主义研

究会”和出版一种油印刊物《少年》（即共产少年之意，一九二三年改为《赤光》），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九二三年，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党员人数增加许多。当时年纪最小的邓小平同志，也被选为总支委员，并和陈延年同志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

当时，在留欧学生中（包括官费和自费），持各种政治思想的派别不少，各派都出版自己的刊物以宣扬其政治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以《工余》杂志为喉舌，大肆鼓吹无政府主义；基督教徒用《青年会星期报》来宣扬上帝；国家主义派的曾琦、李璜之流所办的《醒狮》杂志，大肆散布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的反动理论，欺骗与毒害了不少具有纯朴的爱国思想的青年人。《赤光》出版以后，除了大力介绍马克思主义之外，还经常对上述各种反动思潮给以无情的揭露与批驳。由于为《赤光》写稿的同志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对那些宣扬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的反动言论进行揭露，遂使一些受过它们毒害的青年逐渐转变了思想，因而许多过去阅读《醒狮》的人，变成了热爱《赤光》的读者。《赤光》不但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发行，甚至在国内也有不少读者，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还专门向全国青年推荐过这个刊物。

《赤光》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好的宣传效果，首先是因为周恩来同志一直非常重视并亲自领导的结果。他亲自撰写文章，以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教育大家坚信共产主义。

从一九二三年开始，为了加速培养干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旅欧总支部便有计划地选送大批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周恩来同志每次都亲自送他们到柏林，并代他们办好去莫斯科的手续。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熊雄、聂荣臻、高风、李卓然（原名李俊哲）、白风等几十个同志，都先后去了苏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又陆续回到祖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实现，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急需大批干部，因此，旅欧总支部的骨干和成员，大批先后奉调回国。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到广州的。当时旅欧总支部即由尚留在法国的李富春、付钟等同志继续领导开展工作。周恩来同志回国后，仍然非常关心旅欧总支部的工作。他离法前曾面告留下的同志，要把旅欧总支部的文件和出版物及时地寄给他，以便了解情况和指导总支部的工作。当时在国内负责转递这些文件和刊物的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同志。

旅欧总支部的工作，直到李富春等同志离法回国后才结束。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是我党最早在海外建立的坚强组织，在我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作用。它集中了当时留法、留德和留比利时各国勤工俭学学生中最优秀的分子，为宣传马列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们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有的同志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的同志则一直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了一生。有的同志至今仍然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日夜操劳。这是旅欧总支部的光荣，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荣。

一九七八年八月

（原载《文史资料》56辑）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廖焕星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是党的最早的组织之一。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聂荣臻同志、李富春同志、傅钟同志、蔡畅同志等都与它有历史联系。此外，为人民事业光荣牺牲的先烈，如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王若飞同志、熊雄同志、孙炳文同志以及其他成百的烈士，也是与它有关系的。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于一九二二年，终止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它有完整的历史：有前史——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活动；有后史——欧美各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北洋军阀段祺瑞，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为名，而行无耻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之实。梁士诒更以参战之名，驱使十多万同胞，徒手地在东西欧战场上的最前线，替英、法、俄三帝国主义当炮灰。大战结束后，参战生还者寥寥无几。留在法国工厂作工者仅千余人。法帝国主义驯奴李石曾勾通法资本家，想在勤工俭学的美名下，再送给法国资本家以大批工厂奴隶。当时国内有志青年，为十月革命炮声所惊醒，甚欲乘机脱离本国的黑暗教育，到法国去体会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学习欧洲的工人运动（毛主席当时对勤工俭学运动亦甚赞助提倡）。因之，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前往。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先进的革命青年。

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当中，有三个特出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同志：其一，蔡和森同志以全家（母、妹——蔡畅同志、妻——向警予同志）赴法勤工俭学；其二，何长工同志年令最轻——十九岁，而出国最早——一九一九年头一批从长辛店预备学校出发；其三，徐特立同志以四十三岁的年令，湖南教育界前辈的资格，曾任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身分，赴法勤工俭学。这些革命志士到法后，以其锐敏的理解能力，马上识破了李石曾、陆征祥辈服务法国资本家的勾当。在蔡和森、李立三、陈毅、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组织了“工学互助社”，提倡走工人阶级革命的路线，以“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三个口号争取解决当时的紧迫问题。法帝国主义奴才李石曾等复假借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募捐创办里昂中法大学。但大学成立后，李石曾等竟不顾在法国流离失所的穷苦学生，却从国内运来一大批他们的亲戚朋友的纨绔子弟。于是蔡和森同志李立三同志号召无条件入学，进行占领校舍的斗争。一九二一年秋，一百零四个人组成的入校先锋队，被李石曾勾结的法国警察所包围，加以赤党罪名，强迫送回中国。

但救国与求学的斗争，在赵世炎同志、王若飞同志等领导下仍继续进行。一九二一年底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共中央建立关系。一九二二年七月底我得中央许可

赴德学习工人运动时，中央给了我两封介绍信：一封致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赵世炎同志。另一封给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张菘年。我由马赛直达柏林，未能去巴黎见赵世炎同志。到柏林后，即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共旅德支部的会议。到会的人有：周恩来同志、熊雄同志、熊锐同志（二人都于"四一二"后在广州牺牲）王圭、刘清扬、张菘年及我。会议选举恩来同志出席巴黎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旅欧总支部由三个支部组成：（一）旅法支部，（二）旅德支部，（三）旅比支部。旅比支部在比国工业城霞洛瓦，有聂荣臻同志、刘伯坚同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牺牲）、江泽民（克民）同志、熊味根同志等十余人。旅欧总支部成立大会，选出周恩来同志、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等为委员；决定出版一种党内学习与教育性质的刊物，名叫"少年"报（即共产少年之意，比后来出版的"赤光"本子大得多，系红色封面，曾出过好几期才停刊的；主要是延年同志在世炎同志住屋之楼下每天负责写蜡版油印印刷）。在第二期的"少年"报上，恩来同志还写过一篇讲解共产主义常识的论文。恩来同志回德作报告后，才参加巴黎的总支部委员会工作。

旅欧总支部在周恩来同志赵世炎同志领导之下，发动了两个有历史意义的运动：（一）理论学习的运动；（二）扑灭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生中影响的运动。一九二三年"赤光"出版了。"赤光"一出现，"醒狮"（国家主义派机关报）就垮下去了。华工与勤工俭学生都变为"赤光"的读者。"赤光"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远胜于"醒狮"曾琦李璜辈徒以克列孟梭（当时法国的专政者）为祖宗的狂吠。当时每逢休息时（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恩来同志便在巴黎底拉丁区(大学区)和近郊比央古（工厂区、华工、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中演说，无情地揭露国家主义派媚日违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或面斥曾、李（恩来同志总是与曾李对辩，或是邀他们参加我们召集的会，或恩来同志参加他们召集的会），听众鼓掌之声震屋。富有说服力的恩来同志的每次演说都遍传巴黎、比央古、蒙达尼的中国工人和勤工俭学生中。结果，争取勤工俭学生的斗争，我们得到了完全胜利，中共旅法支部成为中国人的群众党，所有进步分子都围绕在中共旅法支部的周围。

一九二三年六月，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委员会又增加了邓小平同志。出版机关报"赤光"以代"少年"报就是在这时决定的。"赤光"自出版以来，便成为小组、支部讨论的资料，实是旅欧支部法、比、德三国同志学习理论的刊物。"赤光"虽为油印，而字迹清晰，装订简雅，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创造劳动，大家曾赞扬他为"油印博士"。同时，支部又有计划地派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第一批经柏林往莫斯科，内中有赵世炎同志、陈延年同志、陈乔年同志、熊雄同志等十余人，恩来同志亲自伴送到柏林，办理至莫斯科的手续。同年十一月间，又派送第二批，内有聂荣臻同志、王若飞同志、刘伯坚同志、李俊杰（卓然）同志等十余人，这次恩来同志与我同由巴黎伴送至柏林，办理赴莫斯科手续。从此次起，由法、比、英、美经过柏林赴莫斯科的同志，不住旅馆，而分住在柏林无产阶级中心红色卫汀格（我在柏林时，长期住在此区，且长期参加此区的德共生活）的工人党员家中，极受他们的热情招待。五卅事变后，我留法、比、美等国的同志们，不断地被法、比、美等国政府驱逐

出境，他们都经过柏林往莫斯科。这些同志的旅费当时大都很成问题，在这里我应该指出皮克同志（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对中国同志的关注。他那时做德国红色救济会主席。只要中国同志请求帮助，他是有求必应的。所以中国同志由柏林至莫斯科的途中从没有感受过困难。这样由法、比、美经柏林至莫斯科的同志，不下三四十人。

旅法支部的工作是深入群众的，我们的党也是群众的党。旅法的中国侨民群众，当时有华工、勤工俭学生，有温州的小贩（以青田人为主，几布满全欧）。被派遣到莫斯科学习的，勤工俭学生固占绝大多数，但亦有华工的代表，如王西屏（温州人），如戴奎元，如与李富春同志、蔡畅同志、郭隆真同志一同经过柏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华工中最优秀的马志远同志。马志远同志于抗日战争中在高阳牺牲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旅欧总支部曾派遣几批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些是当时的国民党员。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四年应黄埔军官学校国民党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电请任政治部主任回国。继之为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有李富春同志、傅钟同志、萧朴生同志（任红色救济会工作时牺牲）、陈微明（沙可夫）同志。他们走后，旅欧总支部亦结束了。以后旅法、旅德的同志便在法共、德共中创立中国语言组。法共中国语言组曾大力帮助吴玉章同志办理“救国时报”。被法国政府驱逐而往莫斯科的同志，杨秀峰同志是最后一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因纸币膨胀，马克跌价，有大批的俭学生来德（有些留法勤工俭学生转到德国做俭学生）。朱德同志到德后，马上就团结俭学生中的最先进最优秀的分子。旅德支部，形成三个小组：（一）柏林小组，有邢萍舟（西萍、徐冰）同志、资道焜同志（“九一八”后，死难于满州）、谢唯进（允常）同志、章伯钧及我等十余人；（二）苟廷根（德大学城）小组，有朱德同志、孙炳文同志（“四一二”后在上海牺牲）、阚俊民（刘鼎）同志、武兆镐同志等九人；（三）佛兰府小组，有潘芳同志、李季等三人。在党的生活中，曾进行过思想斗争，反对过当时有托派思想后来堕落为托派的李季（他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政策，拒绝在国民党中工作），反对过个人宗派主义的张崧年。

在朱德同志领导下，一九二四年初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共合作，组织国民党，粉碎了反革命反民族统一战线的罗家伦的破坏行动（他当时在柏林。他宣传“国民党已是腐朽死尸，不能救国，要么就加入共产党”一类“左”的词句），使国民党组织成为当时在德侨民中群众的党；同时也将素为官费生少爷公子们把持的留德学生会变为我们的群众组织，变成我们的武器。孙中山先生逝世时，我们在柏林举行一次中国人的空前大游行，我们队伍由康德大街留学生会会所直到波茨坦广场的追悼会场（邓演达领队），苏联驻德大使曾莅会致悼词。

五卅事变起，包办远东消息的英帝国主义的路透社，大肆诬蔑宣传，谓五卅的反帝运动是中国人的盲目仇外运动，是义和团的再版，为再次组织八国联军作张本。旅德支部在朱德同志领导下，马上用留德学生会的名义，函致柏林各大报社，声明五卅运动系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桎梏和屠杀，中国人民的反抗是正义的，是自卫的。次日柏林全体德国报纸都以最显著的地位登出，及时地打击了路透社的诬蔑。接

着，德国共产党以不许侵犯中国为号召，在全德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中国大会。德国大学生在柏林大学带头举行这样的大会，中国留学生亦参加。社会民主党的柏林警察总监下令将参加大会的中国人全体逮捕，囚禁在亚历山大广场的单人囚房中。朱德同志和我们就在铁窗下吃了两日的黑咖啡黑面包。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政府本欲加我们以红党罪名驱逐出境来媚英。因全德工人坚决反对，柏林资产阶级的报纸如德意志普通报、柏林日报、浮西报亦斥责这种行动为失策，柏林警察当局乃不得不向我们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而请我们返寓。以后我们在德国各大城市出席群众大会作报告，社会民主党警察再也不敢惊动我们了，只指使它的机关报信口诬蔑，说报告者不是中国代表，是台尔曼使柏林德国青年乔装的。留德学生会发行一种“英帝暴行与中国民族反不平等条约斗争”小册子作广泛宣传，国际工人救济会进行组织工作，一九二六年内，全世界都有反帝反殖民地压迫支援中国的组织，并派人到中国慰问和调查。这样，就打下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反帝反殖民地压迫支援中国革命大会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朱德同志号召同志们回国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就在这年秋，他率领十余革命志士离德经莫斯科回祖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旅德支部转变为德共中国语言组。廖承志同志、王炳南同志相继为语言组的领导者。廖承志同志尽力于中国海员工会运动，使中国海员受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会的领导。欧洲有大批中国海员，集中在英国利物浦，荷兰鹿特丹，德国汉堡。他们绝大多数为广东人，有会馆，有道地的中国茶馆酒店（鹿特丹最标准），极关怀祖国。廖承志同志团结他们，组织他们于海员工会内，并为他们出了一种刊物作宣传。王炳南同志作领导工作时，已是九一八后，他办了“明星”杂志，宣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谢唯进同志则结合一些热诚的国际主义者，到西班牙参加国际义勇军，捍卫西班牙人民共和国，与德意法西斯傀儡佛朗哥作殊死战。这就是旅德支部的始末。

在英国，从来就没有过中国党的支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曾由旅欧总支部介绍一位在英国学陆军的广东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九一八事变后，才有英共中国语言组。一九三二年至三四年，英共中国语言组曾出版过宣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杂志“解放”。一九三四年五一节，英共派遣一组中国同志到莫斯科观礼，内有“解放”主编人于炳然同志。

美国也从没有过中国党的支部。美共中国语言组，是在冀朝鼎同志参加布鲁塞尔反帝反殖民地压迫大会，与旅欧总支部发生联系回美后，才与施滉同志（保定师范暴动的组织者，事败后牺牲）、徐永煐同志组织起来的。一九二七年美共派遣一批中国同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上学，章汉夫（谢启泰）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它又派遣施滉同志、刘伯唐同志（一九三二年日寇占领上海时，日寇在其寓所搜获一些反日文件，他英勇地牺牲了）、罗声宜同志、冀朝鼎同志。后来还有三批被美政府驱逐由美共介绍到莫斯科的同志。美共中国语言组有两个工会组织：洗衣馆工会、餐馆工会。依靠这两个工会，它曾在“九一八”时期创办铅印的“先锋报”，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又协助饶漱石同志办理“救国时报”。日美战争开始，它就出版“华侨日报”。

中共旅欧总支部，在我党的发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它集合了留法勤工俭学生和

留德俭学生中最先进最优秀的分子，它训练了这些分子成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的忠实学生和战友，它与各种各色的反革命派、反人民分子作过残酷的斗争，它给我国革命作了广大的国际宣传，它在民族问题上给予德法英的工贼、社会主义叛徒的社会民主党、工党领袖们，以坚决的打击。它获得这些成绩，荣誉应属于它的创始人、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赵世炎同志等人。

《劳动周刊》介绍

“劳动周刊”约于1921年8月在上海创刊（按该刊第13号发行期推算，如不脱期，确切的创刊日期定是8月20日）。共出版几期，尚待查考。据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1期“中国职工运动卅年大事纪要”中记载，此刊在1922年5月尚在出版。这个周刊是四开四版的小型报纸。我们见到的有13至16期、18期。

“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因此周刊的编辑人也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人员来担任的。在“劳动周刊”发刊词中阐明了创刊的目的：“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①由此可见，“劳动周刊”是一个执行劳动组合书记部意志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教育的刊物，也是我们研究党成立初期的工人运动的绝好史料。

党成立后，明确地规定了发展工人运动的方针，中国工人阶级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工人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接着党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劳动周刊”的出现就不是偶然的了，它标志着党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实际工作的开始，它有力地告诉人们，中国工人运动的急风暴雨的时代已经来到了。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便着手推动各地建立工会组织，开始有计划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因此在“劳动周刊”上发表了不少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压迫下所过的痛苦生活，以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控诉，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劳动周刊”指导了各地工人运动，并以各地罢工斗争和建立工会的消息来激励工人的斗争意志，指出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道路。

周刊首先揭露了资本家掠夺工人剩余价值的事实：“我们织的布，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做衣穿。我们种的谷，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煮饭吃。我们做的房子，他们不生产的人抢去居住”。②周刊用生动、具体的材料，从工人工资、工时、劳动条件以及工人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方面证明了资本家对工人掠夺的残酷程度，并且报道了工人为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向资本家进行的各项斗争。

周刊报道了当时工人极端困难的生活情景，指出工人的工资已经低到了不能维持最低生活的地步。一个纺织工人说：“现今那样物件不是已经比从前贵了数倍？独工人的

---

① 见“共产党”第6期“国内消息”。

② “随感录”，第14号。

工资仍旧与从前差不多。这是一件最不平的事。”①不仅如此，资本家还采用了各种拖欠工资和“存工”等办法来剥削工人。已见的几期周刊集中地反对了当时流行在上海纱厂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新形式——存工制度②。周刊第18号的评论说：“我们穷苦工人那能支持得来呢？一方没钱支持，一方又不能牺牲那廿多天的血汉钱，跑去他厂工作。因为向来工厂的规矩，刚进去作工的半个多月应得的工资，不发给工人，存在厂里，算作“存工”，等这个工人何时出这个厂，何时方能发还他。但遇着必须发还的时候，又总是延迟日子，因为等查出他往别的厂去作，好把他的存工再充公。”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也是长得出奇，一般至少在十二小时以上，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休息日了，有些地方，如上海宝成第二纱厂，工人工作时间达到了十五小时，周刊为此发表评论说：“以前每天十二、三小时工作，就觉得苦，现在竟增到十四小时，有的厂星期日的夜班工，得作十五小时。……详细的计算起来，每天至多亦不过能睡五六小时的觉。每月才能得到十八小时的真休息，这种制度我们还忍得过去么？”③

由于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攫取利润，工人在非常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进行工作，身心受到极大推残。“劳动周刊”经常报导工人在这方面的惨痛生活，并且指导工人进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15号的评论向工人号召说：“厂里时时刻刻仗着我们一滴一点的血力来赚钱，对于我们亦不负一点保护的责任。……在厂里每天作工的诸位姊妹弟兄，你们是世界上最有价格最有权柄的人们！你们是负着世界上创造力的人们！……你们向世界上的人们要求保护！”不仅如此，周刊还代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保护工人劳动条件的具体建议：“(一)在中国还没有规定工厂管理法的时候，请各厂皆按各国通用的法则上，对工人生命负保护和抚恤的责任。（二）在租界上，我们请求纳税华人会提议各捕房应有保护劳动条例的规定。（三）在华界，请求官厅令各厂规定管理法，负工人生命的保护。”④另一方面，工人在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折磨和虐待，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周刊号召工人起来反对厂方规定的不许工人说话、不许工人随便出入、不准看报和抄身制度等各种束缚工人自由的“规矩”。

此外，工人还经常遇到失业和开除的威胁，周刊代表工人说：“一般工人因时有生活，时无生活，……苦到万分。”⑤当发现上海大批工人有失业的迹象时，周刊及时向工人指出：“我们失业的问题又来了，日趋严重了！……听说到廿号以后，还有完全停车的消息。停车的意思就是厂里没得生活给工人做，这一来立刻就有六七千个人同时失业，……这真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大问题。”周刊号召工人对这样的问题“不要沉默”⑥！

为了摆脱工人这种痛苦的非人生活，周刊首先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建立工人自己

---

① “做工是卖身体吗？”，第13号。

② “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海劳动状况”：“存工制度规定每个工人最初半个月的工资不发，存在厂里抵押，以防备厂里工人跳厂。跳厂的时候，存工便予没收”。

③ “要和我们纺织工人说的话”，第15号。

④ “诸位呀纺织工又轧死一个”，第16号。

⑤ “劳动界消息”，第15号。

⑥ “上海将要爆发一个最大的失业问题”，第18号。

的团体——工会："工友们！我们联合的机会到了！"①"我们患难相关的苦朋友们！……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保护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②。

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周刊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的精神，大力清除了旧有行会、帮口组织对工人的影响。14号的"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一文指出："这种什么帮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利益的，对于工友自己是万分有害的。"文章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说："我们都是受痛苦的弟兄，都是没有产业的被压迫的同胞，无论他是宁波，湖北，江北，或本地，应该大家一总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周刊还揭发了政客、资本家举办黄色工会的阴谋，指出这种工会的目的是"叫工人安分守己，不要反抗总管（即厂长）"③。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主要由黄色工会组成的上海各工团联席会后，在周刊上发表宣言表示"我们只能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的攻击"；一再提醒工人："……现在凡各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要注意，若一时糊涂，恐怕又叫一班非工人的工会利用了。"④在排除了组织工会的障碍以后，为了更好地领导斗争，周刊明确地提出工会的组织形式最好是："……用产业的结合到全体的结合。……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再与别种产业的团体大大联合起来，成一个世界全体工人的大大结合。"⑤

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各地工会纷纷成立，周刊及时报导了各地工会成立的消息。从仅有的几期周刊看来，这时工人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他们已经认识到唯有"联合了群众团结起来，方能够谋到人的生活安全"⑥。有些工会明确地规定"不要店主加入"。广东各工会联盟则指出："否认资本主义，否认私产制度，尽力于生产的劳动，劳动者直接支配生产机关，及直接享用生产物，互相尊重其自由，人类平等。"⑦

与此同时，"劳动周刊"也报导了上海、广东、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工人罢工斗争，周刊对陇海铁路工人、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给予很大注意。从这些报导的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罢工斗争已经进入更加有组织的阶段了。此时的斗争往往是一个行业工人罢工，其他行业工人支援。如广州土洋木工人罢工，就得到了广东各个工会团体的支持，他们表示"誓为该业工人后盾"⑧。许多材料说明，有些资本家慑于工人阶级强大的组织力量，已经开始作了一些让步，如吴淞大中华纺织公司在工人斗争下将工人的工

---

① "今天是甚么日子"，第13号。
② "诸位呀纺织工又轧死一个"，第16号。
③ "劳动界消息"，第15号。
④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第14号。
⑤ "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第14号。
⑥ "印刷工人会铅石印组合敬告同业工友入会书"，第13号。
⑦ "工会消息"，第16号。
⑧ "劳动界消息"，第14号。

时改为八小时，周刊热烈地庆贺工人阶级的胜利："数十年来的纱厂工作，从来没有八小时工作的，其所以有这相当的工作时间，都是从五一运动以后，一班提倡劳工神圣的同志争来的。……"①另一方面，他们也向工人指出这只是第一步，要"重整旗鼓，复策进行，再用全力，争回劳动界应得的权利，和应享的自由啊！"②在这些罢工斗争中，意义较大和影响较深的还是陇海铁路工人和汉口人力车夫的大罢工，周刊用很大篇幅来阐述了这两个罢工的经过和结果。

当工人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地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李启汉同志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在16号的评论中总结了半年来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他首先对当时敌我情况作了分析："工友方面越做越起劲，开大会，发传单，打电报，四面八方请援兵。"而反动政府和资本家则是："战战兢兢，应付无方。"他把京汉、粤汉、陇海铁路工人和广三铁路工人的罢工作了比较后指出，第一，工人的罢工一定要有明确目标，要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京汉、粤汉、陇海铁路工人反对的是"厂长总管等等资本家的走狗，军阀官僚的奴仆"，为的是"工友们自身的利益和幸福"，因此"所得的结果比那广三路专为的是厂长要大要好。"第二，当时罢工斗争和工人的关系、以及它的政治意义是："无故可以开除一两个工友，将来就可以无故开除大众；无故可以扣罚一二个工友的工钱，将来就可以扣罚大众的工钱。所以为一二个工友争人格，就是为大众争人格；为一二个工友争利益和幸福，就是为大众工友争利益和幸福。"第三是工人团结的重要性。李启汉赞扬京汉铁路工人援助陇海铁路工人的行动是"工友们互助的好模范"。他再一次提出了进一步组织工人团体的方针："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更要联络相近的同业工友的团体或更进而联络全国、全世界的同业工友的团体，以为自己的后援。"最后，他要工人牢牢记住"团体的恩惠，……努力的求团体的坚固和上进。"③

"劳动周刊"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各地工人运动进行了宣传和指导，在工人中引起了深刻影响，当时"劳动周刊"被人们称为"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因此它也就更加为敌人所痛恨，"劳动周刊"创刊不久就遭到资本家的"白眼"，他们要求军阀政府"查禁"。1922年6月1日，该刊主编、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同志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在'劳动周刊'上发表可能引起骚乱及破坏治安的文章"的莫须有罪名逮捕后，6月9日周刊也就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了。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

① "劳动界消息"第15号。

② "劳动界消息"，第15号。

③ "请看谁打胜仗"，第16号。

〔附〕上海劳动组合创办劳动周刊

（一九二一年七月）

上海劳动界自从张特立李启汉包一德等创办"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劳动运动大有起色。工人的觉悟，也一天一天的进步。他们又办了一个劳动周刊，现已出四期，办得异常完善，大可以增进劳动者的智识，这真是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今特将该周刊的创刊辞揭载于下：

发　刊　词

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言论机关。我们这个周刊是不比得有产阶级的报纸，有产阶级的报纸，是只记得金钱，那里记得什么公道正义呢！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惟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中国的工人们，快快把我们的头抬起来呀！

编辑主任　张特立
编 辑 人　包晦生　李震瀛　李启汉　李新旦　刘荩人　锄　平
发 行 人　顾耕野

（原载《共产党》6号，1921年7月7日出版）

«先驱» 介绍

"先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1922年1月15日创刊，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该刊原定为半月刊，但因种种障碍，特别是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常常不能按期出版。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教育广大青年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更好地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于同年8月便首先在上海的一部分先进青年中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各地青年团也相继成立。但是到了1921年5月，由于当时入团的分子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①，形成组织涣散，加以缺乏领导骨干，社会主义青年团陷于停顿状态。1921年11月，张太雷同志受了少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②。同时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团的组织，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建立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从此，团已成为一个思想统一的战斗组织，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

"先驱"就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之后不久创刊的。开始三期为北京地方团所出版，后因被北京反动军阀政府禁止，从第4期起转归上海临时中央局出版，第8期以后均由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关于出版"先驱"的任务和目的，它的发刊词说："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精神……。本刊的第二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我们除了以上两种目的之外，还要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绩和失败之点，以供我们运动的参考。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俄国革命的状况和革命以后的建设，……将他们实际运动的真象忠实的介绍给国人。"当然，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先驱"在内容上也有所变化，而在后期则主要是偏重于讨论青年运动和团的建设问题。

正如发刊词所指出的，"先驱"曾用了相当的篇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报导和介绍苏联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它反复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革命改造意义，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指导原理"，"是推翻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的唯一的武器"；尽管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但中国之

---

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第8期。

② 同上。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改造中国社会的需要，与其他资本主义成熟的国家有同样的急迫”①。“先驱”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中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它比较着重地宣传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强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思想。在十月革命以前，人们一般都是把民族问题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起来，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但十月革命以后民族问题已经突破了这种界限。列宁根据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变化，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看作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同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结成同盟，才能在反对共同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先驱”最早译载了列宁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提纲”（未完）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的宣言”，从而传播了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是很有帮助的。“先驱”发表的少年共产国际的一些决议和远东革命少年会议的宣言等文件，大体上也都反映了这种思想，因而也是很有益处的。

“先驱”也和“共产党”月刊一样，从它创刊时起就表现了对机会主义思想的不调和的态度，在它发表的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中，都贯彻着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批判。在1922年“共产党宣言”发表75周年纪念时，“先驱”发表了一篇专文“共产党宣言后序”，概括地介绍了“宣言”发表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情况，并着重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同机会主义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在世时，他就和拉萨尔等机会主义派别进行过坚决斗争，因而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以后，伯恩斯坦之流公然发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叫嚣，第二国际不仅未与他作斗争，反而从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任意曲解，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更向帝国主义曲膝投降，公开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结果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始终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1917年10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1919年3月，第三国际成立，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就高悬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祖国的首都，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党革命派和投机派争论、分裂的焦点，这个简括他（指马克思）毕生学说精髓的‘宣言’，更大放光明于全世界。”②接着文章还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它说，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和资产阶级专政一样，同是历史上必然不可免的历程，不过无产阶级以专政为取消阶级的手段，资产阶级以专政为保持特权的目的，前者公然标出为专政，后者假装为德莫克拉西罢了。”作者驳斥了“素号马克思派巨子的考茨基”用所谓“超阶级”的民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指出“他竟然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迷信德莫克拉西政治以为可以施诸万世万万世”③，从而堕落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卫

① “马克思诞生百零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第17期。

② “共产党宣言后序”，第3期。

③ 同上。

道者。此外，“先驱”曾两次出了德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纪念专号，这些纪念文章不仅介绍了他们二人的光辉战斗的一生，而且论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揭露了右派社会党徒的罪恶活动，并号召中国的革命者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学习他们献身于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忠心地“为无产阶级服务”①。

“先驱”对苏联的情况的介绍也非常注意，从创刊号起，它就先后发表了“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劳农俄国的政治”、“苏维埃所做的事业”、“六种对于苏维埃的非难”、“劳农俄国的代表人物”等重要论文，系统地阐述了苏维埃国家的性质、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法律，以及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问题，介绍了苏联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战胜国内外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情况，分析了苏联采取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及实施这一政策的重大成果，同时坚决驳斥了资产阶级报纸对苏联所散播的各种污蔑和谬论。在十月革命五周年的时候，“先驱”又出了“苏维埃俄罗斯五周年纪念号”，来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它在一篇社论性的纪念论文中，一方面分析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指出苏维埃俄罗斯不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并且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五年来它历尽各种困难，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使这“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策源地”更加巩固，更加坚强和发展了，从而给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是受全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着最残酷、最野蛮的剥削和掠夺，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都应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苏联及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争取中国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它号召中国人民说：“中国的工人们，农人们，兵士们，学生们和全体被压迫的人们呵！人类过去的历史，是没有比今天还有光荣还有意义更值得纪念的！我们应该清楚地认明今天——这全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开辟的今天！我们要在今天——苏维埃俄罗斯五周年纪念日，振起我们的精神，鼓起我们的勇气，下了我们的决心，定了我们的方向，随同俄罗斯的先觉同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奋力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去斗争，以期打倒他们而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完全解放！”②

“先驱”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大量译载了关于少年共产国际和各国青年运动的材料，并且还出了三期有关少共国际的专号，这也表明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的性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之后就加入了少共国际，少共国际对它是有指导关系的。在译载的这类材料中不仅有少共国际活动的报导，而且也包括了“少年共产国际纲领”和许多重要决议案，以及少共国际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若干指示，所有这些文件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设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由于少共国际是在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下的世界性青年革命组织，这些材料自然也就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而给中国广大的进步青年以很大的鼓舞。而这些文件对国际形势

---

① “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第1期。

②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第13期。

（乃至中国形势）和革命策略所作的理论分析，对于青年团员们进一步提高政治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些不可多得的材料，就今天来说，也是有其历史价值的。

"先驱"不仅大力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同时还积极参加了早期共产主义者所发动的反对张东荪、张君劢等假社会主义者的斗争。张东荪等原是立宪派政团研究系的帮闲文人，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时候，也混水摸鱼地挂起了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宣扬发展资本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因而遭到"新青年"等刊物的坚决反击。在他们的反动面目被揭穿后，他们便又高唱起基尔特社会主义来，并在他们主办的"时事新报"上特辟了一个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名的专栏，作为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园地。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最大的特点是害怕革命，反对对中国现存社会进行革命的变革，企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夹缝中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找出一条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虽然倡言社会改造，实际上完全是撒谎，不过是借社会主义的旗号骗人而已。"先驱"曾尖锐地揭露了他们的这种鬼蜮伎俩，指出这班所谓社会主义者故意"把社会主义的灵魂抛弃"，而抱着一付"社会主义的死躯壳"来干招摇撞骗的勾当①；并且猛烈地谴责这班无耻之徒说："你们怕革命，你们怕革命后打破了你们的饭碗，你们就不必讲改造。冒着改造的招牌，暗中延长旧社会的命运，你们的心真可诛，你们的肉尚足食乎？""老实说吧，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你们所主张的完全是资本主义！张东荪说：'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好听之。'徐六几的说法更滑头了：'社会革命之真意义，是要生产的新方式的树立，使社会上全体建设物发生根本变化。只要是如此，至于他所用以表现的方式是暴烈，抑是和蔼，都不关重要'。既说树立生产的新方式，而又不主张革命，则树立方法自然是舍资本主义以外别没有了。你们主张资本主义就主张资本主义好了，又何必带上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呢？骨子里主张资本主义，而又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如此暗娼式的行为，可怜亦复可恨。"②

狡猾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在同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中，不仅恶毒地污蔑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用造谣的手段，宣扬马克思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就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了，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序言中也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徐六几在回答"先驱"的批评时甚至用"盲而且聋的主义者"为题发表文章，无耻地责问马克思主义者"肚子饱时高唱无产阶级专政，肚子饿时跑到资本家开的饭馆吃饭，可乎不可？"又骂马克思主义者做马克思的奴隶和"抄袭他的断句片言，便自命是他们的私淑弟子，实无异于孔老先生席不正不坐，不撤姜食，不多食，一类的信条，便自命是圣人之徒"。"先驱"无情地痛斥了这些无耻的谰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东西，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成为统治阶级，而在巴黎公社以后，他更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不但要组成为统治阶级，而且要打破旧的国家制度，建立新型的国家政权，在1875年他写的"哥达纲领批

① "革命与社会主义"，第1期。

② "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第3期。

判"中又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恩格斯写的那篇序言也完全是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就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学说。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为了反对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竟想跟着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斯巴戈之流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是枉然的，也是无耻之极的。徐六几虽然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散见了许多次"，但又说"在他们重要著作中是没有的"。然而正如"先驱"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忠实的'六几君看来，那是他们的重要著作呢？不过是批评封建制度，和说资本主义有相当功绩，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他们解释作不用奋斗不用革命不用流血的必然）一些话的著作罢了。总之，马克思解释过去的都是对的，都是重要的，但是预言将来和指示劳动阶级奋斗的方法都是错的都是不重要的了。"① "先驱"还进一步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骂"我们是马克思的奴隶，在一定意义之下我们自然乐于承受这种头衔。做一个主义的奴隶，总比机会主义好得多了，总比拜金主义好得多了。至于我们尊敬马克思，我们也不过如自然科学家尊敬牛顿、达尔文一样，因为他们都是根据着科学的方法，在各科学领域中发见了很重要的法则，裨益人类的。在天文学中虽然有爱因斯坦，在生物学中虽然有德佛黎根据着同样的科学方法证明牛顿和达尔文的错误，但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幸还没有寻着一个爱因斯坦和德佛黎。"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的走狗和祭师中世纪的教皇……也不看马克思的著作和听人家的警告，只是'盲而且聋的'，断章取义的毁谤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已②。"先驱"在又驳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无耻的责难时，无情地揭露了徐六几之流的卑鄙行径，指出他们是卖身投靠，完全是受金钱使唤的。它说："肚子饱时提倡无产阶级专政，肚子饿时跑到资本家所开的饭馆吃饭而不改他的主张，又有什么罪恶？肚子饿时在资本家开的饭馆吃饭，在现在资本主义一切物品都是商品化，都是私有的世界，当然如此。他只不受资本家豢养，因分食资本家筵席上掷的骨头而做资本主义的缓冲和社会主义的延宕者，他就比一时译'伦理与唯物史观'，一时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因吃饭的原故，把人格当商品卖的好得多了，就比那得人家的80元之薪水而顽强的主张资本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好得多了。"③而张东荪、徐六几恰恰就是这类人。

"先驱"还驳斥了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并不是完全冲突的谬论，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工团主义与修正派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的哲学——假定他有哲学——是完全偷窃伯恩斯坦的。他的历史观是不承认经济为决定其他生活的唯一原素，而认他只有一部分的势力。他亦反对阶级斗争，而以婚姻为喻，说提倡阶级斗争的，只是如那在法庭中看见离婚的簿根，遂断定自古的历史是离婚的历史的一样的粗率。"④因此，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是根本不相容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的附庸。"先驱"在同基尔特社会主义

① "答六几和东荪"，第6号。

② 同上。

③ "答六几和东荪"，第6号。

④ 同上。

的斗争中，还从理论上和事实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恶果，认定“生产方法之有利无弊的，唯有共产主义。中国要想治内部的穷困自然是非共产主义不可了；要去掉外部的侵掠，也是非用共产主义不可的。”①因此，它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此外，“先驱”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且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展开了非基督教运动的斗争。大炮、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支“尖兵”，自从基督教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传入中国以后，就象鸦片烟毒一样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不仅因为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肆意寻衅，为非作歹，俨然以统治者自居，尤其严重的是它以所谓“天主”的奴化思想来麻醉中国人民，企图使中国人民虽然生活在帝国主义铁蹄的压榨下却不自觉，因此这些“洋人”和“洋教”曾遭到中国人民不断的反对。在美国主持的侵害中国的华盛顿会议刚刚结束不久，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美国的主使下又准备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会议，散布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因而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强烈反对。于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议下，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印发传单，组织群众讲演会，“先驱”也出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展开了一个猛烈的非基督教运动。

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揭露了基督教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帝国主义通过教会所进行的罪恶活动。这个斗争实际上也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它的矛头不单是针对基督教本身，而是首先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如“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所指出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为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的产物。他们预备于本年4月4日，集合全世界基督教徒，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所讨论者无非是些怎样维持世界资本主义及怎样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把戏。我们认彼为污辱我国青年，欺骗我们人民，掠夺我国经济的强盗会议，故愤然组织这个同盟，决然与彼宣战。”②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向全国各校学生发表的通电中也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智日开，宗教日促，是以政教分离及教育与宗教分离之说，日渐弥漫于欧洲。彼昏不悟，仍欲移其余孽于域外，以延长其寄生生活；政府巨商，以利其为殖民之先导；于是四福音书遂挟金铁之威，以临东土。金铁奴我以物质，福音奴我以精神。东南文盛之区，悉变而为耶教化资本化，无复清宁之气，岂不可悲！华府会议，辱我至矣！上帝慈悲，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无端集合于我弱国之都。我爱国青年之血泪未干，焉能强颜以颂上帝。”③

“先驱”也出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专号，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先驱”发表的非基督教的论文中，无情地揭露了基督教的血迹斑斑的罪恶历史，它说：“我们试翻阅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便可以看见十字军杀人流血的手段，他们出征一次……二次……以至于三次，绵亘一世纪的时间，已经将中世纪的历史，染成血色；后来又有新旧教徒互相残杀的事；而其间血腥的基督徒对于中世纪刚萌芽的科学又极力摧残以至于将许多著

①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第2期。

②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第4期。

③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第4期。

名科学家活活地烧杀：这都是口唱上帝慈悲的基督教徒们的盛德！”① “基督教本是特权阶级的逢迎者”，最初在罗马商业社会里逢迎罗马帝政，以后领主制度的社会代兴，它就逢迎封建制度，在教会训练人民作专制主义的奴隶。封建制度倒坏，资本制度建立，它又改头换面去逢迎资本主义 。它与资本主义“狼狈为奸”，做“资本主义的伥鬼”，做“资产阶级的留声机”，所以资本主义越发达的地方基督教也就越发达，——现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是美国，所以基督教在美国特别流行。基督教既然靠向资本家摇尾乞怜而生存，所以资本家的意旨它是无不奉承的。“他代资本阶级宣传掠夺的自由，他代资本阶级宣传虚幻的平等；他瞎说博爱，他爱资本阶级的有钱有势，他爱劳动阶级甘为奴隶。”而当社会主义勃兴的时候，他又冒充社会主义，标榜反对私有财产，提倡慈善事业和禁欲主义，实际上是帮资本家掠夺劳动者，劝劳动者服从资本家。他用奴化思想“麻痹了劳动者阶级的意识，磨钝了劳动者阶级的觉悟。他活了人的命，杀了人的心；他救了人的躯壳，灭了人的灵魂。”② 总之，基督教就是帮助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恶魔，而基督教社会主义乃是“僧侣清理贵族心火的圣水”。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自己的解放，就必须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把基督置诸脑后，而牢牢地记住红色的口号：万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③ 其次，“先驱”还揭露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罪恶活动，指出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文化侵略的“先锋队”和“向导”。“基督教传播的地方就是外力蔓延的地方；传教师〔士〕所到的地方就是洋货流通的地方。我们要知道这便是资本主义帝国开辟的新市场了。外国教士到中国来，必利用一班中国人做他们的向导；外国教士创办一个教会，必在本地罗致许多知识分子。我们要知道这便是资本主义帝国利用教会豢养知识分子做走狗的巧妙方法了。④ 而这一次他们又别立名目，利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设了一个“大网”，企图“把中国的青年一起打在他们的网罗里去，供他们底驱使，做他们底奴隶而后止。”⑤ 因此，“先驱”号召中国青年们“快醒吧”，“快快起来与彼决一死战！”

但是，正当这个运动展开的时候，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沈兼士等一班人却打着“宗教自由”的招牌起而反对，因此遭到“先驱”的猛烈抨击。它指出：“现在一班青年刚刚设法逃出为害数千年，流毒无穷，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基督教的天罗地网，而周作人、钱玄同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诸先生却拚命地赶紧将他们诱入一个闷葫芦；现在一班青年刚刚在设法砸碎宗教的铜枷铁链站在为光明而战的前线作急先锋，而周作人、钱玄同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诸先生却拚命设法将他们诱入一个迷魂阵！他们所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就是迷魂汤和蒙汗药的汤头歌诀，就是诱人入闷葫芦的招魂词，就是诱人入迷魂阵的奇兵。”⑥ 因此，“先驱”警告青年们决不要上他们的

---

①“基督教与世界改造”，第4期。

②“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第4期。

③“基督教与世界改造”，第4期。

④“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第4期。

⑤“随感录”，第4期。

⑥“莫名奇妙的滑稽宣言”，第6期。

当，而要鼓起勇气，继续坚持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先驱”在发刊词中就曾指出，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形以求得解决中国问题的切实的方案，是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它曾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这方面的问题，探讨中国革命的纲领。在此以前，在中国共产主义者所主办的刊物如“新青年”（月刊）和“共产党”月刊等探讨中国革命纲领问题时，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采取俄国革命式的“直接行动”，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没有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结合，并没有给中国革命指出具体道路，因而是不切实际的。在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1922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具体道路，从而对中国共产党人制造自己的革命纲领给了极大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6月15日即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就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同时驳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用所谓“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人政府”、“废督裁兵”等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各种特权”，“肃清军阀”的口号①。而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则明确制定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理论认识上的这种变化是有重大意义的。“先驱”曾经指出：“我们从懵懵懂懂的社会主义进到马克思主义”又“从懵懵懂懂的马克思主义进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明白的进行计划”②，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走出书本，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了。

这种认识在“先驱”上也有着明显的反映。在它发表的一些论文中曾比较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两大敌人，他们狼狈为奸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最残酷的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只有打倒这两个敌人，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它说：“中国在经济方面，大部还建筑在中世纪手工业和农业的基础上，同时又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销货场与原料出产地；在政治方面，完全是封建阶级——军阀——居统治地位，同时封建阶级又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指挥和支配，因此造成十余年来的纷乱局面。”③又说：“我们中国早已堕入半殖民地的地位了。我们中国的疆域，都成了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了，我们中国的人民，都成了各帝国主义的鱼肉牛马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日、英、美、法）都拚命地利用中国的卖国军阀（如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袁世凯等）和卖国官僚（如交通系、外交系）缔结种种卖国的条约以遂其支配中国经济政治的大野心。”④因此现在的中国是：“一面受国际帝国主

①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9期。
② “对于本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感想”，第19期。
③ “对于第二次全国大会的意见”，第22期。
④ “民族解放”，第21期。

义的侵略，一面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全国大多数国民都在这两个魔鬼下呻吟着。”① 这两个魔鬼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国际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来侵略中国，本国军阀勾结国际帝国主义来压迫人民，两者狼狈为奸，都是我们人民的共同仇敌，我们非一致奋起来打倒他们不可。”② 所以“在目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联合全体被压迫人民向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进攻。”③ 正因如此，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民主革命，只有联合全国人民，并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结成“联合战线”，推翻这两大敌人的统治，求得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先驱”还抨击了胡适之流的“好人政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荒谬主张，宣传了党所确定的争取、团结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但是，“先驱”在研讨和宣传中国革命的纲领时，也有一些重大的缺点。首先是在宣传民主革命和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上，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反而认为民主革命应以资产阶级为主体，无产阶级只是积极的参加，它没有认识到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其次，是农民问题，“先驱”发表的某些文章中虽然也提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且发表了团中央关于“调查农民状况”的通告；通告指出：“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同时农业又是中国国民的经济基础，所以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农村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工作”，应“引导农民做限制租额……等运动”④。但是“先驱”并没有着重论述农民问题，没有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相反的，有的文章还错误地认为农民落后、散漫、保守、自私，只有城市郊区的农民和移垦区的农民才有革命性⑤。由于存在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对当前现实斗争的指导作用。

在“先驱”上占主要地位的是关于团的建设和青年运动的问题。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11月恢复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快的发展。不到六个月，成立的地方团就有十七处：上海、北京、南京、天津、保定、唐山、塘沽、武昌、长沙、杭州、安庆、广州、潮州、梧州、佛山、新会、肇庆；从省份看，团组织分布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河北等省。全国的团员人数达五千之多⑥。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就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所以团的临时中央局便决定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团的纲领和章程，建立全国领导机构。大会在纲领中分析了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并明确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即为完全解放

---

① “本团的问题”，第16期。

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时局的宣言”，第24期。

③ “马克思诞生百零五周年纪念日敬告中国青年”，第17期。

④ “第二十三号通告”，第19期。

⑤ “农民运动”，第24期。

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8期。

无产阶级而奋斗的组织”①。对于什么人可以入团的问题，团章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②大会选出了蔡和森、张太雷、俞秀松、高尚德和施存统等人为团中央委员，组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外，还通过了四个决议，即“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③。大会并一致决定加入少年共产国际，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少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样，自从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团就成了一个思想上组织上统一的团体，中国青年运动开始有了自己坚强核心的组织。

团的“一大”以后，“先驱”即直接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团关于时局的主张、重大事件的宣言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许多重要通告、传单大都是通过“先驱”发表的；团的一些重要活动，如发起非基督教运动，支援“民权运动大同盟”，支援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的罢工和“二七”大罢工等，“先驱”都作了积极的配合，因而成了团中央的有力助手。团中央对于“先驱”的出版和发行也非常关心，并曾专门发过“关于先驱发行问题”的通告。通告指出：“我们要想本团发展成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中心团体，非先使大多数青年都明白了解我们的主义不可，换句话说非先使本团的机关报——‘先驱’，深深印入大多数青年脑中不可。”④同时还规定凡有青年团的地方，均应委派经理员，负责派销“先驱”，没有团组织的地方，亦应由团员介绍可靠的朋友代售，以扩大“先驱”在青年中的影响。

在关于团的建设问题的宣传中，“先驱”特别强调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大多数团员是青年学生，要想使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战斗团体，就必须经常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广大团员，改造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加强他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它说：“我们不要以为本团是一个青年学生的团体，尤其不是一切讲求学问的团体。加入我们的团体，不以有无学问为标准，而以有无觉悟为权衡。我们所需要的觉悟，不是空空洞洞的什么‘正义’‘人道’的觉悟，乃是现实的‘阶级觉悟’。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正义’‘人道’，什么理想的‘正义’‘人道’，是不存在而且不能容许的。我们拿‘正义’‘人道’来号召，是不一致而且无气力的。”因此它指出，我们所需要的觉悟，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利益，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思想，无产阶级的觉悟为觉悟”的阶级觉悟⑤。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觉悟，才能成为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坚强的青年共产主义战士，只有由这样的成员组织起来的团体才能成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才能成为推动和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先锋队。同时“先驱”还宣传了团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重要性。它说：“我们要战胜我们的敌人，第一须要强固自己的组织。我们要强固自己的组织，首

---

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第8期。

②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第8期。

③ 均见第8期。

④ “关于先驱发行问题”，第16期。

⑤ “本团的问题”，第16期。

先须严明自己的纪律。”如果“蔑视组织和纪律，那就不但不要说革命了，就是小小的问题或运动也是不能对付的。”因此“凡吾同志，均应了解这种组织的精神和必要，极力拥护和尊重这种组织的训练，使本团成为一个组织强固纪律严明行动敏捷的真正革命的团体。”①

关于团的工作方针和青年运动的方向问题，在“先驱”上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基本上有三种意见。有的人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既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因此它应该主要是到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去活动，在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展开基地，推动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但是这一种意见却忽略了学生运动，似乎学生运动是无关紧要的。另一种意见是强调学生运动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文化低、觉悟差、单靠无产阶级不成就社会革命，需要青年学生的帮助，因此需要大力在学生中进行工作，培养革命战士，以便去帮助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就是说以学生运动推动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这两者都不能偏废，不能强调了这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青年团的基础应当“建筑在青年工人身上”，故应特别注意在青年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配合工会，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同时还指出，“在农民占最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农民对于青年运动有绝大的意义”，因此我们还应“实际到农村去组织与训练青年农民”，提高他们的觉悟，引导他们“冲进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如反抗加租运动等）”。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学生运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样经济和政治状况之下，学生是容易趋向革命的，故我们对于学生运动绝不可轻视，尤当引导其向工农群众中去。”②此外，也有人提到应到青年军人中去活动，教育他们参加反对军阀的斗争。

关于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在“先驱”上也曾进行过若干讨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并且一直是受党的领导的。在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团的纲领和章程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党对于团的领导关系，但是在同年9月6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第17号通告“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中则作了说明：“依第三国际的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或少年共产团）与共产党之关系，同青年共产国际与第三国际之关系一样，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须完全服从共产党的主张，在其他一切为青年利益而奋斗的方面，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有完全自主权”；并说明党和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第三国际所决定的原则议定了两条规定：“（一）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二）两团体各级执行委员会会议，得互派有表决权之代表一名出席。”③由于这个规定含混模糊，有的人竟想借此向党闹独立性，也闹出“青年团员公开地作出反对党的首领或不满意于党的文字的笑话”④。这种情况曾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邓中夏同志在“讨论本团此后进行的方针”一文中就对向党闹独立性的思想进行

---

① “本团的问题”，第17期。

② 旅俄支部：“对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第22期。

③ “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第16期。

④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大会的三个建议案”，第24期

了尖锐的批评，并明确提出青年团的“政策须与共产党绝对一致”① 的意见。也有些人希望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并决定以后完全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②。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向“二大”提出的建议中也要求明文定出“青年团与共产党的从属关系”，同时提出“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党选派青年党员二人为其执行委员”③。

“先驱”主要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一次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活动和情况，也参加了一部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它在“二大”正式开会(1923年8月)之前就停刊了，因此并没有反映大会进行的情况和刊载大会通过的各种文件。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即1923年10月20日，团中央决定继“先驱”之后出版了“中国青年”。“中国青年”进一步发扬了“先驱”的革命精神，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教育和团结广大青年参加革命方面起了更大的作用。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① “讨论本团此后进行的方针”，第22期。

② “本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23期。

③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大会的三个建议案”，第24期。

《新 时 代》介 绍

"新时代"是湖南自修大学的机关刊物。因此，在介绍"新时代"之前有必要先谈谈自修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是1921年8月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创办的一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当时党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毛泽东同志被派回到湖南领导建党工作，发动工人运动，同时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为了加强党和团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克思列宁学说，毛泽东同志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①。自修大学，这是毛泽东同志很早的一个理想：采用古式讲学和现代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学习，互相研究；同时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紧密结合，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以培养具有先进思想的体魄健壮的革命干部和社会活动分子。

湖南自修大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它不仅对学生入学的条件要求严格，并且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关于学习目的和人生观的教育。在它的"创立宣言"中就指出："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②而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更进一步明确地宣称："我们这个大学，不是由另外一些'办学'的设的，而是由一些有学问兴趣的学生感于现实教育制度不好，要……变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基于这个意义之上设的。我们这个学校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求学的人看他自己能不能真实努力，才能决定他有没有好的成绩。但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打算？（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校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③由此可见，自修大

① "船山学社"是民国初年湖南一部文人学士为讲讨王船山的学术思想而设立的。主持社务者大都是一些老学究先生，政府每月有四百元的津贴。何叔衡同志是该社的社员，与当时主持社务的一位思想开明的老先生有老朋友关系；同时这时的社长也与赵恒惕有一定的矛盾。因此在取得社方的同意后，毛泽东同志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自修大学。

②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第1号。

③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第1号。

学对同学的选择是非常严肃慎重的，对学生的培养目的是清楚明确的。

自修大学的教育制度，也和其他一般的学校不同。“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自修大学最本质的特点，是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它说：“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求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是‘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起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高深学问，但心理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学校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也明确规定：“本大学鉴于现代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①。

关于湖南自修大学的教育内容，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它非常注意劳动教育，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并在校内设置园艺，工厂，以供劳动锻炼。在该校的“组织大纲”第二十一条这样规定：“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艺园、印刷、铁工等。”②关于学习方法，自修大学着重“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也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该校组织有“哲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心理学研究会”等。对教员的要求是：“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扶助。”③

自修大学的创立，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引起了相当普遍的反映。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多予介绍和赞扬。蔡元培在看到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之后，就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他说：“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我喜欢得了不得。”它“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李石曾在一篇题为“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的文章中也说：“自修大学果能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新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以热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

①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1号。

② 同上。

③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第1号。

制度实现之先导。”在北京高等师范的“教育新刊”上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蔡孑民先生谓自修大学实兼书院与学校制度之长而活用之，我以为岂仅如此，这简直是人格教育的恢复。”①在“新时代”第2号刊载的“湖南自修大学之未来与希望”一文中也曾指出，自修大学矫正“旧制学校之缺陷”，提倡“变‘被动的’求学而为‘自动的’求学；变‘贵族式’的学校而为‘平等化’学校；打破‘虚荣的’心理，而趋重‘实际的’工夫。……吾知未来之自修大学，必庄严灿烂于‘湘水’之滨，而与‘麓山’竞秀矣。”

虽然，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教育家和学者的看法，他们主要是从教育本身来看问题，而没有从政治上认识到自修大学的本质，但从这些评论中，也可以充分地看到自修大学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湖南自修大学决不同于任何的普通大学，它是党所领导的一所培养革命人材的学校，也是党在早期对于中国的教育实行革命改造的实际试验。从它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它的具体实践来看，自修大学甚至可以说是现在我们所广泛推行的“红专大学”的雏型。自修大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曾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湖南地区党和团的许多干部，如何叔衡、毛泽民、郭亮、夏曦、夏明翰、陈佑魁、姜梦周、陈昌、罗学瓒等同志，最初都是自修大学的学生，这些革命的精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先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自修大学创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一面进行工人运动和领导反对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斗争，一面进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为了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研论中国革命问题，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理论性的杂志“新时代”月刊。关于“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正如它的发刊词所说：“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和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因此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②

“新时代”创刊号于1923年4月10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其他尚有“何谓帝国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文等。在第二至四期上刊载的主要有下列文章：“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李达）、“观念史观批评”（李维汉）、“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李达）、“环境之教育”（罗学瓒）、“共产主义与经济进化”（罗学瓒译）等。

“外力、军阀与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在初期革命活动时期所写的一篇很重要的论

① 以上三文均见“新时代”1卷1号。

② “发刊词”，1卷1号。

文。与他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是紧密地结合着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革命斗争有重大指导意义。在这篇纲领性的论文中，毛泽东同志简要而透辟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内外政治形势，阐明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共产党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必然日益壮大的道理。毛泽东同志认为国际帝国主义虽然非常希望最黑暗的“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以便于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使奉、直、皖及西南各派军阀决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勾结为恶，势必使中国“政治更加黑暗，财政更加混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然而“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人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革命分子必然“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毛泽东同志用这种辩证法的规律告诉人民：现在是混乱的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的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是正是这种反动混乱的时代，恰恰成了“革命的生母”，“民主独立的圣药”，因此，他号召革命民主派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去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说，只有革命派战胜了军阀反动派，中国民主独立的政治才算完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天才的论点。

除毛泽东同志的论文外，“新时代”发表的其他文章主要的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唯物主义思想，同时也对中国的革命问题进行探讨。如在第二号至第四号上连续发表的李维汉同志所写的“观念史观批评”一文，就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两个定理，即：“人底意识不能决定人底生活；人底生活倒可以决定人底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形式，能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之发展。”① 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作了深入的批判。同时，还对“真理”、“道德”、“自由”、“平等”、“正义”、“人道”这些社会的观念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指出这些观念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不同的阶级看来有着不同的内容，因此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文章还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国家问题，说明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随着一种经济关系的变化而“迸出”的，“国家是阶级统御的机关，是这一阶级用以支配另一阶级的工具。在古代和封建时代的国家是实行奴隶剥夺的机关；现代的国家则是资本掠夺劳动的工具；法律、教育、警察、军队……与道德、风俗、宗教、学说……等有形无形的设备则是维持这工具的柱子。”②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打破这些旧的东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逐渐消灭阶级的对抗和阶级的差别，而在阶级消灭之后，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新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的宣言”表示拥护，指出共产党所宣告的它的目的和当前的政治主张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时代”着重宣传了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严重意义，认为只有推翻他们的统治，才能建立独立自由的中国。它说：我们国家处在这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武人

---

① “观念史观批评”，第2号。

② 同上，第4号。

政治的两重压迫之下，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就不能不奋发组织起来，干一个广大的人民革命运动，来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两个障碍物，建立真正的中华共和国。

总之，“新时代”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之下，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帮助干部提高理论水平，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原载《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

《向导》发刊词*

（一九二二年九月）

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

所谓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是怎样发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么呢？老老实实的简单说来，只是市民对于国家所要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权利，所以有人说，宪法就是国家给予人民权利的证书，所谓权利，最重要的就是这几项自由。所以世界各种民族，一到了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这几项自由，也就立刻发生民主立宪的运动。这是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例外。十余年来的中国，产业也开始发达了，人口也渐渐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铁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学生、若新闻记者、若著作家、若工商业家、若政党，对于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仰这几项自由，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可是现在的状况，我们的自由，不但在事实上为军阀剥夺净尽，而且在法律上为袁世凯私造的《治安警察条例》所束缚，所以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全国市民，对于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自由，断然要有誓死必争的决心。“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只有感觉到这几项自由的确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义。

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

* 原标题为：《本报宣言》。——编者。

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钳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①，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

现在，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原载《向导》1期）

① 原句为："中国为使永消费国家"，欠通，现依上下文意校改。——编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北京大学校史资料室辑

编者按：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十月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这一些资料是从北京大学日刊上抄录的，标题下的日期为北京大学日刊出版日期。马克思当时也译为"马克斯"，这里照录不曾改动。文中所列英文书目，只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其他从略，杂志报章目录未删。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马克斯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其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底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底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

现在我们已有同志十九人了。筹集了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分。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的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一、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

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讨论会

——讲演会

——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四、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五、会员有分担购置书籍费的义务。

六、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期缴还。如会外人想借阅时，须经本会特别许可，并交纳保证金。

通讯处（一）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北京大学西齐罗章龙君

发起人 高崇焕 王有德 邓中夏 罗章龙 吴汝明 黄绍谷 王复生 黄日葵 李 骏 杨人杞 李梅羹 吴容沧 刘仁静 范鸿劼 宋天放 高尚德 何孟雄 朱务善 范齐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不论何人凡愿加入本会者，请到下列三处接洽（通函接洽亦可）。

北京大学第二寄宿舍李骏君

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北京大学第一寄宿舍罗章龙君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

会员公鉴：

本会正式成立，已经一月有余。其间经过新旧两个年关，耽误日子不少，故仅仅只开过两次讨论会，一次纪念会。起初会员虽不足二十人，现在已增至六十三人了。

本会成立之时，都讲实用，不事虚文，所以简章未定，至今尚付阙如。惟经一月余试验的结果，每次开会，例必有新会员数人加入。因此书记又不能不每次将本会议决几条实用的办法，当众重述一次。书记固不胜其麻烦，旧会员亦甚觉其讨厌。为免除这个

困难起见，特详细通告于此，务希查照。

一、研究方法

（1）讨论会——每星期六晚七时开一次（准时到会，过时不候）。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

（2）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暂时敦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由书记负责接洽。俟本会研究确有成绩后，则完全自行担任。

（3）特别研究——完全由会员自动的自由组合，现已有了三个：

A、劳动运动研究由几个感觉此项知识之需要的会员组成的。每星期三晚集会一次。

B、共产党宣言研究　由几个感觉英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为教本。每星期一、四、五晚请会员一人教授之。

C、远东问题研究　材料分三种搜集，英文的、日文的、中文的。已在酝酿中，尚未开会。

以上三个小组合，任何会员皆可随时加入。

以后拟实行固定的分组研究如下：

第一组　唯物史观

第二组　阶级斗争

第三组　剩余价值

第四组　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

第五组　社会主义史

第六组　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

第七组　经济史及经济学史

第八组　俄国革命及其建设

第九组　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

第十组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

但会员研究，选一组选三四组或全选皆可，只要力量来得及。请即来函认定，以便刻期著手实行，至要至要！

二、入会手续

得会员一人以上之介绍，或径函及亲至本会接洽，本会亦得酌量请其入会。

三、会费

（1）常费——每年分三个学期，每学期缴常费五角，皆于开学时缴纳。

（2）买书费——由各人自由量力认捐，认百元亦可，十元八元亦可，不认一文亦可。又认十元以上者，书籍所有权或归公归私，可由认捐者自愿决定。

四、借阅书报的时间及手续

阅书时间——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开馆，惟星期日则在上午八时至十二时。

阅书手续——向值日员领取，不限册数。

借书手续——向图书经理员交涉，借期至多不得过一星期。但得图书经理员认可得

连借。惟大本书籍暂不出借。

五、职员

本会为办事便利起见，暂设四种职员：（一）书记。（二）庶务并会计。（三）图书经理。以上三种为公举固定的。（四）值日员。此一种为挨次轮流的。兹将此届公举固定的三个职员姓名地址开列于下，有事可向他们接洽。

书记　黄绍谷（住井儿胡同十二号）

庶务兼会计　李骏（住东斋天八号）

图书经理　范鸿劼（住西斋黄三号）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

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兹报于下：

社会主义丛书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

阶级斗争（恽代英译）

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

马克思经济学说（李达译）

社会主义史（李季译）

社会问题详解（李季译）

经济丛书

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

历史丛书

俄国问题丛书

劳农会之建设（列宁著）

讨论进行计划书（列宁著）

杂志报章

大陆报　共产党　新青年　先驱　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　济南劳动周刊　长沙劳工周刊　晨报　民国日报　时事新报　申报　广东群报　时事月刊　妇女声。

以上各书，或系会有，或系私有，皆有符号，归众共览。尚有四五会员出金购买一百四十元之英德文书籍，当不久可到。并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五）

（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本会开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不论会员或非会员皆欢迎自由来听。

讲演人　李守常（李大钊）先生

题　目　马克思经济学说

地　点　北大第二院大讲堂

时　间　本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一时起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一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会员诸君：诸君所认购书捐款并经常会费等，多有未缴纳者。兹因需款在即，请即掷交会计李君。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二

会员诸君：本会分组办法前已通知。但尚有少数会员未曾加入何组。兹将分组名目再行刊布如左，务望从速加入，以便召集分组会议。

再〔在〕分组研究办法未成立以前，周期讨论会仍照常举行，望诸君准于每星期六下午七时到会。

第一组唯物史观　第二组阶级斗争　第三组剩余价值　第四组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斯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三个时期　第五组社会主义史　第六组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　第七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　第八组俄国革命及其建设　第九组布尔什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　第十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别通告

本会另设资本论研究组，并承陈启修先生允为本组导师。不论本会会员或同学诸

君，高兴于此项研究的，请通知东齐李骏君，以便定期召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告　第二号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会员诸君：你们借的书报杂志均请即日归还。因为本会新到英文书籍七十余种，杂志十余种并德文书籍杂志七八十种，所以要从新编号，以便检查。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图书馆通告　第三号

会员诸君：此后图书馆阅览时间，除日曜日外，每日自四时开馆至六时闭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

（一九二二年五月三日）

五月五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年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诸先生讲演。此会系公开性质。无论何人均一律欢迎。特此谨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本会上两星期，因开滦矿工罢工之事，曾发出通告，募捐援助。兹有唐山大学学生赠工会来函介绍与本校大多数同学所组织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接洽一切。兹特将唐山大学学生赠工会来函及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之宣言书登出如左：

唐山大学学生赠工会来函

径启者：敝处唐山工人三万余，因生计压逼，迫不得已，要求加薪罢工以来，已三

星期有余，而仍无良好结果。现有矿务局工人代表董君鸿犹，特来贵校报告详情。素仰热忱，想定有相当援助也。敝校同人不揣冒谬，敬代介绍。此请

学生会会长先生大鉴

唐山大学学生　工会总干事李　斌

书记张创鸣、蔡牖

11月13日

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宣言

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姐妹！

近来不是发现一桩人吃人的举动么？开滦矿洋资本家置我国矿工同胞四万六千人于饥饿冻死的地步么？此次矿工罢工的原由，实因平日遭洋资本家的牛马待遇太深，加以食料物价日涨，原定工资实难养活。请求洋资本家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又被严词拒绝。且不但不允许他们的请求，还要贿买洋人走狗杨以德派兵弹压，对于工人惨加杀伤。可见洋资本家有意乘矿工之危，使他们累死，病死、冻、饿死而后已，各界同胞！这不是洋资本家实行吃人的举动么？矿工同胞至此，乃誓守“生不如死”的志愿，不得已演成此次凄惨的同盟罢工。

矿工同胞现在忍饥耐寒支持一月了，洋资本家还是狼心狗胆要矿工做牛马，不承认他们正当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但矿工方面因得各省的援助，暂未冻饿至于死地。而洋资本家因塌矿停工之损失，反达数百万。

各界同胞！天灾火祸，固须踊跃仿助之事。此次洋资本家有意残害同胞，吾人更应如何援助，完成矿工同胞罢工最后的胜利。方能拯彼等于水火，而尽同胞之天职。

同人等义愤所迫，爰乃组织此会，向各方面募捐，维持罢工同胞罢工期内之生活。所得之款，悉数汇往开滦各矿工处，以资救济。若有同志自愿加入合作者，尤所欢迎。

本会通信处　北大第一院收发课转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本会备有关于马氏学说之书籍数百部，专为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诸同志而设。凡京内京外有愿入本会者，请致函北京大学第二院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请将通信处示知。

兹将本会组织摘录如左：

——会员　分京内、京外两种。其在本京之会员，得向本会借阅书籍（备有汉文、

英文、德文、俄文各项书籍，借期以半月为限。遇有特别情形，亦可通融）。京外会员得向本会询问购办书籍一切情形，并有与闻本会常会所讨论之结果之权利。

——会费　每学期五角，不拘一次缴清。

——开会　每星期五晚七时开会一次，讨论各项关于马克思学说之问题。

德国李卜克内西与卢森保女士殉难纪念大会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今日系德国笃信马克思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与卢森保女士殉难之第四周年之日。彼等为主义而奋斗，为无产阶级而牺牲，不惜舍其毕生精力与生命，前后与德皇及爱伯尔特派政府反抗。其身虽死。其笃信主义与实行之魄力，至今犹令人敬仰不置。本会特于今日（15日）下午一时，假厂甸高等师范学校，举行该二氏殉难纪念大会。敦请名流讲演，并当场发送关于该二氏之各种出版品。届时深希本校同学（尤其系S·Y·团员）全体赴会为盼。

北京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谨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

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新式的生产制度一天一天的把旧的生产方法毁灭，一天一天的把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去，叫他们做机器的附属物。一班男女劳工在这种新式的生产制度下面的工作情况，简直是和牛马一样。

他们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剥夺者，换到极少的工钱。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已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作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他们的健康是牺牲在这剥夺制度之下，他们定不能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从极年幼的时候，就变成了本国或外国资本家的富源开发者并变成了资本家的新式奴隶。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已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这是我们敢断言的。

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但是这些事业是必要大家都来做的，所以我们请求那些已成立的劳动团体加入这个书记部与我们共同进行。

劳动界的伙伴们呀！我们拿外国经历过的事实做比例，知道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但是资本制度在中国日见发达，我们极相信劳动者的团体也会日见发达，日见有力；并且我们相信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①]等二十六人宣言

① 即张国焘，后来堕落为叛徒。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几个有关文件

（一九二二年四——五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
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

全国各工人团体均鉴：

顷接各处工会来函，主张“五一”纪念节在适宜地点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以志盛典，且可以联络全国工界之感情。本书记部亦认为有举行之必要，特拟就宗旨及办法列后，请贵团体选派代表一人，持贵团体选派证书，如期赴会为荷！

（一）开会宗旨：

（甲）纪念“五一”节；

（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

（丙）讨论改良生活问题；

（丁）各代表提议事件。

（二）每一工团要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点：广州市。

（五）川资由各团体自备，在广州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在英界北成都路十九号本部。

（原载上海《申报》1922年4月22日出版）

决　议　案[1]

罢工援助案

提案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

理由：现在我国劳工运动，尚在幼稚时代，能力薄弱。平时即受不正当势力压迫，

① 据当时报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案共十个。现仅有决议案原文二件

在罢工时候，尤受资本家欺蔑；非我工人本互助精神，互助援助，必无胜利希望。故工人无论在何地罢工，应当设法援助，以达我工人牺牲奋斗、自求幸福的目的。

办法：

（一）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①

（二）凡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

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得受该处东家之雇请；

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

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

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

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

（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5日出版）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

提案人：长辛店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

理由：工人阶级争斗力之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比如工会是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织而成，则罢工运动每至一行业的工人陷于孤立，而容易失败。产业组合则不然。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故我们组织工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但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各种职业的工人，则仍不妨沿用职业组合法以为着手之起点。又，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

办法：

（一）凡能采用产业组合的，都应一律采用产业组合法去组织工会。

（二）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办法的，不妨用职业组合。

（三）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人，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

（四）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②

（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25日出版）

---

① 该句系参照1925年5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2期上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所摘录的该决议案原文加以订正的，“民国日报”所载原句为“或即以现在各地劳工各书记部暂担通讯义务”。

② 民国日报记者在该句后，原记有“第四项为公众临时动议议决，非原案本文”字样。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简况

今年五月一日，中国全国劳动者在广州开了个破天荒的劳动大会。听说此次大会召集时间极其匆促，其初不过由广州、上海、北方十余个工会，感受世界潮流，都觉得有全国联络之必要，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发函召集全国劳动大会。书记部发函之期，是在“五一”之前三星期；谁知此消息传出后，不论接到或未接到通告的工会，都大为欢欣，竞派代表与会。北京、天津、唐山、长辛店、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各处派代表赴粤者约三四十人，加上广州各工会代表，合计竟达百六十余人，代表工人三十余万，不可谓非我国劳动阶级一大觉悟。

此次大会，各省代表提出议案甚多。经审查委员审查结果，或归并、或注销，认为可以成立者只十余案。逐日付议，皆能仔细讨论。计议决共十案，分列于下：

（一）罢工援助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

（二）八小时工作制案（提出人同上）。

（三）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长辛店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提出）。

（四）订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唐山京奉路机务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徐家栅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共提出）。

（五）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湖南劳工会代表张理全、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代表苏兆征共提出）。

（六）组织全国人力车夫联合会案（汉口人力车夫总会代表彭大汉提出）。

（七）中国在相当期间内的劳动运动，只作经济运动不与闻政治案（徐家栅粤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提出）。

（八）尊重劳动节及儆戒工界虎伥案（中国劳动同盟会沪总部代表谭竹轩提出）。

（九）规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案（广东中国机器总工会代表邓汉兴提出）。

（十）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案（公众临时动议）。

以上十案，皆极重要。就中以“罢工援助”及“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两案为尤有关系。闻并决定明年在汉口举行第二次大会云。

（原载上海《新申报》，1922年5月24日出版，标题为《全国劳动大会之所闻》。）

劳动立法运动的几个有关文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

（一九二二年八月）

编者按：1922年8月16日，北洋军阀政府召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趁此机会，在全国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这个通告，就是为了动员全国的劳动界起来响应而发的。

近年国会制定新宪法运动，进行颇速，但对于劳动立法之制定，尚未闻有提倡者，幸吾劳动界之奋斗精神与组织能力，尚能坚持不渝，此吾人所可庆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种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望贵团体从速开会讨论，将其结果报告本部，并祈通电国务院及全国工商学各界，以增吾劳动界之声势。

（原载《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

（一九二二年八月）

一、保障政治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权，如言论、集会、结社等，为共和国家任何阶级所应享受，“临时约法”① 上虽亦有此规定，然自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法”② 之后，实际上已无形取消矣。至同盟罢工则显为法律所禁止。从而劳动界之言论与行动，

① “临时约法”，是孙中山组织的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全名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共五十六条，在第二章第五、六条中，提出了人民平等的原则和七项自由权利。其中“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一项，是和开展职工运动直接有关的。

② “治安警察法”，是北洋军阀政府于1914年8月29日公布的一个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采用警察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凡领导怠工、罢工，领导增加工资者，都在禁止之列。

已全无发展之机会。我等为脱离此种束缚计，非将此种非法命令及“刑法”① 中制止劳动运动之条文完全铲除不可。此外劳动者之团体契约权，亦应受法律之正式承认，俾免资本家乘劳动者之弱点，以单独契约劾夺其利益。又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亦吾人应要求法律之承认者，因无产阶级运动之意义所以重大者，即在其为国际的也。

二、改良经济生活。我等在今日无政府无法律的资本家制度之下，所受残酷的待遇，盖为世界所不经见。劳动时间由十小时至十八小时，休息期间无定。夜工超过八小时，童工女工，工作无限制。工资由资本家任意规定，毫无标准。失业救济及疾病保险等为吾人梦想所不及。凡此种种苦境，吾人应设法从速脱离。欧美各国之劳动者对于改良彼等之境遇，非已均奏凯歌耶？我等应参照西欧诸国之劳动法规，实现我劳动阶级之利益。此外，农民（不掠夺他人劳动之农民）之农产物价格，亦应以法律保障之，盖因农业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常为资本家或商人所掠夺，今应以法律规定其价格，俾勿使之降于所费劳力之下。

三、参加劳动管理。为解放劳动者并与以管理之经验计，应使其有参加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国家劳动检查局之权利。现时雇主所以毫不顾及劳动者之利益者，即缘劳动者对于关系自己之业务，无参加管理之权，因此劳动者之利益，永不能有保障与进步。设吾等能有参加管理之权，则必能明了生产与经济之情况，改良工厂管理制度，并匡正雇主之错误。一方促进劳动阶级之利益，他方则为将来无产阶级管理工厂之准备，故吾等应要求法律承认劳动者有此种参加之权。

四、劳动补习教育。现代社会之不平等，大半起于无受教育之机会。政府每年支出巨额款项，专为资产阶级办教育，至无产阶级则毫未顾及。此等不平，使我等永为彼辈之奴隶，故我等应要求政府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

以上为我等最低限度之要求，亦所应努力实现者也。

（原载《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年12月出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

（一九二二年八月）

编者按：这个文件最早刊登在1922年北京出版的“工人周刊”上，该刊我们没有找到；这里依据的是“先驱”第十一期（1922年9月3日出版）“少年工人与劳动立法”（澄字）一文中转载“工人周刊”的“劳动法案大纲”。原文曾参照“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和邓中夏遗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作过校改，文字上稍有变动，个别词意有出入的地方并加了夹注。

① “刑法”，是指1912年3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所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这个刑律在二百二十四条中规定：“凡工人有联合同业举行同盟罢工者，其首领处四等以下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附从者处三十日以下之拘役，或三十元以下之罚金”，把罢工完全视为非法行动。

一、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

二、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

三、承认劳动者有缔结团体契约权。

四、承认劳动者有国际联合权。

五、每日昼间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超过六小时，每星期应予以连续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依邓著简史。其他两种本子均作“四十二小时”，疑为误排——编者〕之休息。

六、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工及剧烈劳动之劳动时间，不得过六小时。

七、禁止超过法定工作时间，设有特别事故，须得工会之同意，始可延长之。

八、农业劳动者之工作时间，虽得超过八小时，但对于超过时间之工资〔“先驱”本“工资”作“工值”——编者〕，须以八小时制为标准而计算之。

九、以法律保障农民（不掠夺他人之劳动者）之生产品价格，由农民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十、剧烈有害卫生及法定之工作时间外之劳动，不得使十八岁以下之男女工为之。

十一、对于需要体力之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均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五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

十二、十六岁以下之男女工，不得雇佣。

十三、为保障劳动者之最低工资计，国家应制定保障法；制定此项法律时，应许可全国劳动总工会代表出席。公私企业或机关之工资均不得低于最低工资。

十四、各种劳动者，有由产业工会或职业工会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之经济机关、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之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十五、国家对于全国公私各企业，应设立劳动检查局。

十六、国家对于劳动者，应予以完全参加劳动检查局之权利。

十七、一切保险事业规章之订立，均应使劳动者参加之，俾可保障政府、公共及私人企业或机关中劳动者所受之损失；其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分担之，不得使被保险者担负。

十八、各种劳动者，一年劳动期间中，应有一个月之休假，半年中应有两星期之休假，其期间内有受领工资之权。

十九、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之机会。

（附白）工友们！这是本部斟酌各国劳动法拟定的，我们认为是最低的限度，并不过高，我们是非要国会都要通过不可的。但不知各位对于这十九条认为满足不满足？完备不完备？如有认为要增加或更改的请快快来函示知，以便修改。这是关于我们劳动阶级切身的利害，我们不可忽视呀！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盛况

（一九二二年二月五日）

须　除

江岸是京汉路南段最重要的地方，工友共一千多人，自去年十二月大家发起组织俱乐部之后，踊跃加入的已经上千人。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老君殿开成立大会。是日虽然雪后路途泥泞，到会的工友们不下八九百人，并有各厂长、工程师、技师、警察长及各界来宾共数十人。会场敷设，有军乐队，头二门悬挂灯彩，门外交树国旗，场中悬万国旗，中置讲演台。各工友招待殷勤，布置得极有秩序。上午十一点钟敲了，就摇铃开会。现在将开会的情形记在下面：

（一）振铃开会。（二）音乐。（三）主席报告。主席是俱乐部正主任干事杨德甫君，报告大意说："今天是本俱乐部成立的日子。本俱乐部之成立，全是各工友努力的结果。以后还盼望大家更发努力，互相辅助，共谋进步。一面还要各位职员群策群力的办事，若有不到之处，大家商量改革。我们俱乐部的宗旨是：保证生活；增高人格；改良习惯；所以成立这个俱乐部，于我们大家是极有利益的。大家为大家利益计，为个人利益计，都应该好好的辅助这个团体，发展这个团体，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想必也是大家所希望的。"（四）音乐。（五）来宾演讲，计有十余次之多，因演词过多，候下期择尤选登。（六）音乐。（七）各部员演讲。先有副主任干事黄贵荣先生演讲，略云："许多话，各位先生已说的很多了，我讲的没有别的，俱乐部是全体工友底，大家都负的有责任，盼大家都齐心齐力来发展他，大家才有幸福。再本部的章程，各位来宾，及薪（新）加入的部员，有许多还不知道的，现在来宣读一遍，解释一遍。"又由殷金山先生演讲，略云："各位工友都在这里，我们有了这个团体，要好好的辅助辅助，一些不好的习惯也要改掉，我们的人格光明正大。盼望各位工友大家齐心努力、努力。"（八）音乐。（九）燃放鞭爆。（十）摄影。闭会后，留各界来宾午餐。餐时有许多工友在旁打起锣鼓，拉起胡琴、唱起京调，音调抑扬，都极有节奏，简直同戏院名角差不多。今天这个会，真是叫人感佩，叫人高兴，叫人觉得有无穷的希望！各处的工友们！都赶快团结起来啊！

（原载《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

（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

长辛店铁路工人，计二千余人，近来他们组织了一个俱乐部，不到三月的工夫，加入的工人，居然有一千八百余人。他们即于9日借长辛店上坡店的地点，开成立大会。到会部员，共约一千五百多人。此外还有北京来宾邓某、陈某、朱某，郑州铁路工人代表凌楚藩，陇海代表林楚荣、伍子湘，彰德代表赵光前，汉口江岸代表杨述明，信阳代表邵允铨，京绥代表胡道生、张济海，京奉代表邱祥生、李如华诸人。其余如京汉路各机关办事员及长辛店警察所长等等，到的也很不少。开会时全体部员向国旗行鞠躬礼，三呼“劳工万岁”。由部员阎文周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次由该部秘书洪永福报告经过情形，言词都是淋漓周详，娓娓动人听闻。再次就是各来宾各代表的演说。他们虽然多半系工人，然而他们都已经彻底的觉悟，故其见解，迥异于其他工人。他们的演说词很长，不能于此备载，总括起来说，不外：（一）彼此联络感情，共谋幸福；（二）世界的潮流所趋□，亦当连合团结；（三）当此内政日糟，外侮日迫□时候，吾个人既系工界一分子，更宜互相接洽，以尽吾工友们爱国的天职；及（四）吾俱乐部成立之后，必须和衷共济，以图发展，使全国一致，绝不受任何方面的利用诸节。他们讲演的时候，静无人语，讲演之后，掌声如雷。开会直至三时之久，无倦容，于此可以想见他们对于该部的热忱了。讲演之后，复继以鞭爆，其响声与一般工友们高呼“劳工神圣”之声相应，振动天地。此诚长辛店工友们空前之盛况了。

（原载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4月12日出版）

---

* 原标题为：《长辛店铁工大结合》。——编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致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祝词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

汉冶萍是中国最新式、最进步的大产业，为中国中部工业制造的策源地，其一举一动足以影响全国，工友极其众多，亦最富于阶级觉悟。半年以来，举行两次阶级战争的大同盟罢工，都得着了最后的完全胜利。现在三公司底下的五大工团，联合起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结成一条强固精密的阶级战争的广大战线，开中国劳动运动未有之创局，足以使资本阶级惊心丧胆。看哪，这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雄壮！我们的心跳跃了！我们的血沸腾了！雄鸡鸣了！晨钟响了！东方亮了！世界赤了！我们高呼：

汉冶萍总工会万岁！

工友们的联合万岁！

劳动者的世界万岁！

（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年10月10日出版）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

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年10月10日出版）

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罢工宣言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

编者按：水口山铅锌矿在湖南常宁县，有三千多工人。1922年11月27日在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影响下，特别是在安源大罢工的胜利鼓舞下，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12月5日，全矿举行了大罢工，经过二十三天的斗争，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者是共产党员蒋先云、谢怀德两同志。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罢工。这里选编的两个宣言，是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3年11月印行的“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一书中摘录的。

罢工了，罢工了，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米也贵了，布也贵了，百物都贵了，只有我们的工钱，还是照从前一样，怎能养活自身呢？怎能养活父母妻子呢？我们屡次请求当局增加工钱，均分红奖，他们竟置不理，陷我们于死地，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我们组织俱乐部，原为联络感情，增进幸福。当局不但不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而一面施以矫柔和缓的阴谋，一面要杀我们俱乐部的发起人和代表。我们要救命，不得不罢工！

我们此次罢工，纯为改良待遇，维持生活，对于军事政治，与乎本局局长和职员私人无关，请大家莫要误会。有良心的人呵！快来救我们的命！快快来救我们的命！

要求的条件：

一、矿局须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并请官厅出示保护。

二、矿局以后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取得俱乐部同意，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矿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又俱乐部建筑部址，矿局须津贴建筑费一千元，划与公地三十井，在部址未建成之前，矿局须拨给公屋一座。

四、矿局须增加工人工资，分下列数种：甲，普通工资，每日在二角或二角以下者，加八分；自二角一分起至三角者，加一角；自三角一分起至五角者，加一角二分；自五角一分起至一元者，加一角四分；一元以上者，加五分。工资以月计者，亦扣成日计，照上加法。乙，窿外工程各包工，须一律改作点工，以包工原价为底，照甲项加法。丙，窿内打巷子洋炮包工，每法尺加四元，毛砂每担加三十文。丁，窿外送桶每百桶加六角，窿内送桶每千斤加二十文。戊，敲砂淀砂二厂，照原价每日加二分之一。己，运输科各种挑脚长夫，照原价每担加三分之一。

五、工人每月工资，须按月定期发给。

六、每年须增工资一次。

七、矿局须采用小礼拜为假日，凡一切例假，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以二工半计算。

八、每年阳历过年，须发夹薪一月，并给假一小星期。

九、工人因公丧命者，矿局须发给抚恤费，每年工资在一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在一百五十元以上者，给一年工资，作一次发给。

十、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矿局须与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工资。

十一、工人婚丧病假，须照发工资。在工作地病亡者，须发给工资半年，作一次发给。

十二、工人每年请假一月者，须照发工资，三年未请假者，一次可请三个月，工资亦照发。

十三、每年红奖，职员工人照薪均分，七、八、九、十年红奖，须速发给，以阳历十二月为限。

十四、各科工作轮班者，采八小时制。

十五、罢工期间工资，由矿局发给。

十六、职员工头，自后不得殴打工人。

十七、以后矿局各处添补工头，须由该处工人按资格提升，不得由职员私人录用。

十八、以上各条经矿局承认后，即须实行。

香港海员大罢工

邓中夏

海员的生活状况

中国海员的生活状况，其最感痛苦的有四：第一，是工资的微薄。普通工资每月大概在二十元以下，而物价又逐年飞涨，譬如米，一九二二年时，上海增加到百分之一二·五，香港增加百分之一五。因此，海员工资不够单身维持生活，若有家属更是困苦颠连了。故中国海员中往往有因生活艰难而做偷运军火的冒险事业。但这种事业，幸而不被破获，可得微利，不幸而被破获，本人必须潜逃，否则必须被捕坐监或被杀。第二，是包工制的剥削（粤语叫包工为“洗马沙”）。海员中有所谓“馆口”，约有三种：一种叫“洗马沙馆”，由包工头设立，与船东勾结，包揽介绍海员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须贿赂工头数十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海员工资中抽扣十三元或十五元归包工头。一种叫“君主馆”，由个人设立，营业性质，亦与船东勾结。凡加入者须纳入馆费数十元，方有候工资格。在馆食宿，由馆主收饭钱和征收其他种种名义用费。介绍工人上船作工，并不按先后秩序轮流，而是由馆主个人意志支配。一种叫“民主馆”，亦名“兄弟馆”，海员合股组织，系公共宿舍性质，自然比较公平，但海员多不识字，故必请知识分子做馆中管理先生，此管理先生积久则把持馆务，从中渔利，剥削工人。上述三种馆口，香港一处便有一百三十余处之多。自然以前两种为最有势力，很显然的，因包工者与船东勾结，海员不经过他则得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经常报效他，又随时可以取消工作，因此海员只有忍气吞声受包工制的剥削。第三，是待遇的不平等。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虽做同样工作，并不能得同等工资，普通是十与二之比，一切待遇更是悬殊。譬如住房，白种海员，一二人一间房，中国海员则须五六人一间；而且中国海员住房不是火仓附近，便是空气与光线不足之处。沿海内河轮船大半没有海员住房，货堆上、通路傍、煤炭里，便是他们的卧处。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酷虐待遇，不可胜计。第四，是失业恐慌。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手工业与农业破产，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趋大都市找寻工作，于是大都市里经常的有广大的劳动后备军。船东与包工者恃有此经常的广大劳动后备军，得肆无忌惮的对在业海员施行无情的剥削。你如不愿受此剥削，就把你挤出于轮船之外。香港一处，海员失业的经常总有一两万人。海员失业后，就只有饿肚皮，睡马路。

罢工的准备及其爆发

海员的经济生活状况既如上述，基于经济痛苦，他们就有起来斗争的可能，又何况当时世界革命潮流非常汹涌。海洋轮船来往东西洋，他们受此潮流的激动，独得风气之先，那有不发生阶级觉悟的道理？就是内地亦发生不断的自发的罢工斗争，香港机器工人罢工更给海员以眼前的实例。因此香港海员首先便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了。

一九二〇年有宝泰办馆者，企图包揽英国昌兴公司轮船的海员雇用权，引起海员的公愤。其时海员中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分子，从此便乘机开始从事宣传与组织。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便成立海员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但中国海员籍贯既殊（最多的是广东人和宁波人），方言亦异，乡土观念帮口观念又深，当时很难团结，工会依然还是空的。但工会此时已明白，要工会取得群众信仰必先从小斗争做起，于是用工会名义向轮船办了几次交涉，如抗议殴打海员，和要求恢复海员工作等，结果皆得胜利，因此群众对工会的信仰日益加深，而加入者亦渐渐多起来了。不久，工会更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的问题，准备大罢工，组织“增加工资维持团”专办此事。另组织“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以及各种秘密机关；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预备罢工后工人回广州，因罢工后事实上工人必须离开香港回广州。关于罢工经费亦着手募集。又发出工人生活表及要求条件到各埠各船给海员传观，同时并派人到各埠各船报告工会情形及罢工准备情形。另外还联络外国海员要求援助；联络中国其他运输工人要求援助；各国工会凡知道地址的便发信要求援助。兹将要求条件列举于下：

（一）工资十元以下者加五成；十元至二十元加四成；二十元至三十元加三成；三十元至四十元加二成；四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二）工会有支配工人权（按即职业介绍权）。

（三）雇工合同签定时，工会有派代表权。

一九二一年九月，工会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资方不答；十一月又提出，又不答；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第三次提出，并申言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当工会第三次提出要求前，已约定对工会有信仰的轮船海员为领导罢工的中坚。果然不到十二小时，罢工便爆发了。凡香港开往广东内地的广州、江门、澳门、梧州的轮船以及到港的英、荷、法、日、美各国的海洋轮船，霹雳一声，一致罢工。当时数约一千五百人。

罢工实施后香港政府甚为失惊，因为这是出乎它的意料之外。当晚便派华民政务司（这是专门管理中国居民的官员，当然是英国人）到海员工会，带半讥讽半威吓的劝告，叫海员回船作工，工资将来慢慢商量。工会坚持非答认条件誓不上工，此时群众挤满工会内外，大家高呼罢工口号，华民政务司只得狼狈退回。

次日，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广州。其他轮船继续到港，陆续罢工。这种形势，很快的影响到新加坡，暹罗，上海等口岸。汕头亦随即加入罢工。有些船在半路便罢工。有些

船不敢开来香港。一星期之内，罢工海员已达六千五百人。罢工总办事处设于广州，于香港设分办事处，并设秘密机关。汕头另设办事处专管汕头。

香港政府的恐慌

罢工之势既成，香港政府极为恐慌。一月十六日，宣布戒严令以恫吓罢工工人。十七日又出一通告，内中提出船主的条件以期缓和罢工。其条件如下表：

轮船种类	海员要求	船主的还价	相差
	百分	百分	百分
（一）沿海轮船	三五·〇	一五·〇	二〇·〇
（二）内河轮船（中国）	三二·五	二五·〇	七·五
（三）其他中国的轮船	三二·五	二五·〇	七·五
（四）省港澳轮船（英国）	二五·〇	一五·〇	一〇·〇
（五）其他英国轮船	二五·〇	一五·〇	一〇·〇
（六）爪哇线	一七·五	一二·〇	五·五
（七）太平洋线	一七·五	七·五	一〇·〇
（八）欧洲线	一七·五	七·五	一〇·〇
（九）澳大利亚线	二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由上表看来，海员的要求与船主的还价相差实在太远，于是海员不理，锐意扩大罢工。

的确，海员罢工可以致香港于死命。因为香港是一个孤悬海口的小岛，它的海上转运业，虽在远东是首屈一指，但是本地的出产，不能供给五十二万八千零九十的人口之用，所有一切粮食及一部分日用必需品从中国内地运来。譬如梧州的鸡鸭，广州的猪肉、牛肉，汕头的水果，上海的纺织原料和服装用品，此类日用品，都得仰海运的供给。海员罢工后，食物就骤形停顿，而物价则突然飞涨，看下表便知。

十三种食物市价表

食物（以磅计）	一月十日 价目（以元计）	一月二十四日 价目（以元计）	增加百分数
米	〇·一三（元）	〇·二二（元）	六九·二
鲑鱼	〇·四〇	〇·六〇	五〇·〇
鲤鱼	〇·一三	〇·三二	一四六·〇
鲟鱼	〇·二四	〇·二八	一六·七
龙虾	〇·三二	〇·四〇	二五·〇
蟹	〇·三六	〇·四〇	一一·一
猪肉	〇·二〇	〇·二六	三〇·〇
羊肉	〇·三四	〇·四〇	一七·六
牛肉	〇·二〇	〇·三〇	五〇·〇

牛肉排	〇·一九	〇·三〇	五七·九
鸡肉	〇·三四	〇·四二	二三·五
鸡肉排	〇·三二	〇·四四	三七·五
鸭	〇·二八	〇·三二	一四·三

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

至一月底有香港运输工人同情罢工的事。当海员罢工时，本拟联络其他运输工会一致罢工。但运输工会非常复杂，大半由工头或小买办做中心，故当时尚意存观望。后来轮船越停越多，事实上他们已无工可作，经海员工会之活动，不到半月他们就同情罢工了。从前有一两只船偷偷摸摸起落货物逃去，到运输工人全体罢工，则完全停顿。于是罢工人数增至三万人以上。此时正值中国旧历年关，香港形势更形严重。

二月一日，香港政府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及其他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并架大炮对住海员工会，将工会招牌拆去，理由是："海员工会打算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

调　停　与　破　裂

香港运输工人既一致罢工，使香港政府更为困难，对付罢工政策，软硬兼施既均无效力，不能不出于托人调停之一道。首先嗾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向海员工会调停。海员工会说："这次罢工，香港政府不但不居中调停，反而采用高压手段，封闭我工会，逮捕我工人，野蛮之极！我们只有坚持到底！"这一场调停遂无结果。

华工总会调停既失败，香港政府又嗾使东华医院用街坊名义出面调停，写信到广州请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东华医院，乃留居香港的中国绅商之大集团，其名义是一医院，其实是一社会集团，不用说是一仰承帝国主义颐指气使的洋奴组织。故在香港颇有政治势力）。海员工会派了五个代表去，于是东华医院调停之一幕喜剧便开场了。

此时因香港政府封闭工会，拆去工会招牌，故海员工会的要求首先提出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绅士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是要改变招牌，添多或减少几个字。因为香港政府煌煌文告宣布封禁，你们是知道的，这是政府的威信所关。海员代表说："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要给还原有招牌。"绅士们见话不投机，乃改变态度，说起妙语来了：你们罢工我们不反对。但你们要顾念现在香港的粮尽食绝，岂不把几十万留居香港的中国同胞活活地饿死。海员代表说："是的，香港居民将绝食，这是实情。我们早已预计到的，而且早已挂念着的。但是，我们挂念香港居民，而你们却一点也不挂念海员，我们海员老早就有几十万要饿死了。我们此次罢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饿，你们为什么不曾说一句救济的话呢？"说来说去，不着边际。海员代表声言："增加工资，改良待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香港

政府反把工会封闭，且把同情罢工的工会也封闭；还要逮捕工人，拘禁领袖，是何道理？你们为什么只替政府说话？政府既没道理，你们为什么不帮助我们。你们若有本事叫政府给还我们工会招牌，就有话可说，否则我们即刻回广州去。”海员代表立起身来要走。绅士们知难挽回，便说：我们同去华民大人处说情，可以不可以呢？海员代表表示拒绝，后经绅士再三要求，海员代表方允许。

到华民政务司后，华民司说："因为你恐吓他人罢工，故政府封闭工会，现在不能把工会招牌还给你们。恢复工会可以，但名称要改。加资问题，你们是知道的，各船情形不一样，将来或增或减，我们举出代表按照公道评判，看那船该加，那船该减。”海员代表说："恐吓他人罢工，有何证据。用莫须有的罪名，用机关枪拆去我们工会招牌，抢去我们工会家具，还说我们恐吓。中国海员罢工是多么文明哟，你看，香港自罢工后，秩序比前好得多（按意即谓市面萧条）。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我们中国海员去到伦敦，他们还要我们一共参加。现在我们还没有邀请各国工人同情罢工哩。说到加工资，如果香港政府主持公道，早就应该调解。我们三次向资方提出要求时，同时通知政府，而政府看不起中国海员，全然不管，因此激成罢工。说到将来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那我们‘唔领过的咁慨哟’（按即不上这个当的意思）。现在的问题很简单，第一送还工会招牌，第二承认加资条件，我们立刻上工，如工会招牌要改，那么加资问题也不必谈了。”海员表示明天回广州去，华民司说："西人商会要找你们谈话。”

当晚上海银行大班，渣甸洋行大班，wion 燕梳公司大班等请海员代表谈判，非常秘密，不许傍听。他们问："你们愿意华民司参加吗？”海员代表说："有什么不可以。”华民司亦一同参加。洋资本家说了一套与华民司相类似的话，海员代表亦用与答复华民司相类似的答复。说到恐吓罢工一事，海员代表否认，华民司说："是事实，现在许多人愿回香港做工，你们强迫他们不许回来。”海员代表说："省城太远了。拿香港来说吧，有馆口一百三十余间，每间总有数十人，为什么他们不肯上工？是谁恐吓他们。”说到加资一事，海员代表说："找公正人调查评判，我们不能接受，只有说定加多少，大家签了条约，才是实际。”说来说去，说了几个钟头，海员代表坚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他们说这事要请示“兵头”（按即香港总督，他有统率香港海陆军的全权，故俗称之为兵头）。一场谈判无结果而散。

到此时已是山穷水尽了，香港政府暗使华商总会约海员代表去谈话，劝他们明日莫回广州，等西商请示“兵头”看有什么商量？有罗旭初者，香港著名的大绅士，约海员代表到他的写字楼去，他说："今天的事你几人帮助我一下就可解决。”海员代表说："什么叫帮助？你不来帮助我们，反叫我们帮助你！”他说："一切都在你们身上，你们说什么就可解决。”海员代表已料定罗旭初有行贿的意思，乃说："我们什么都取决于罢工工人，那能说在我们几人身上。”说毕不顾他的强留而走了。

第二日华民政务司叫海员代表去，拿出公文来，大意与华民司昨日所说相同。海员代表立即拒绝。说："工人委托我们要恢复工会给还招牌为先决条件，现既办不到，带此公文何用？”既而说："带回公文也可以，但我们在此郑重声明，并不是接受了公文

上的什么条件。”

香港政府布置了这一个天罗地网，假使海员代表不得其人，真的，是会落在他们的圈套中的。你不看中国的大绅士、西商大老板、华民大老爷，从前眼角都不睢工人的，今则这样和顺与谦恭，甚至于表露行贿的意思，如果海员代表稍一动摇，全盘糟了。然而海员代表却不激不随，坚持到底，应付裕如，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海员代表之一便是苏兆征，说话亦以他为最多。

双方的鏖战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政府乃改变了策略，进行破坏罢工。派人到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处招集新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得此消息后，便纠合宁波海员公所阻止招募新工行动，李启汉便因此被捕入狱。但在上海所招得来的新工几百人，经过汕头时便给汕头罢工办事处说服了一大半，一小半到了香港。有几只船是给新工开走了，但技术不好，在海上发生了危险。在菲律宾印度招募得来的新工，情形大致相仿佛。海员工会除通电各处工人团体请求制止招募新工外，并派“防护破坏罢工队”暗杀招募新工者，在香港刺杀梁玉堂一名（行刺的工友被捕，工会替他打官司，一直打到伦敦理蕃院，终被判决死刑，绞绝）。因此香港政府这一新策略又告失败。

罢工海员方面的政策，便是更加加紧封锁香港。扩大纠察队的组织，分派到各海口去，禁止粮食运往香港，到处受农民工人的帮助，甚至小商人和土匪也起来帮助了，此时真是一茎菜，一粒米都不能到香港，香港粮食更行恐慌。从此双方对峙的局面更加严重。二月中旬罢工的船只有如下表：

英国	八二只	五八，三六八吨
中国	三六只	三〇，一六六吨
日本	一五只	三六，四七四吨
荷兰	一一只	二七，四一七吨
美国	八只	一四，五二九吨
挪威	七只	八，七九八吨
法国	四只	三，〇五三吨
丹麦	一只	一，四五六吨
葡萄牙	一只	一，一四五吨
暹罗	一只	九九八吨
总计	一六六只	一八二，四〇四吨

这次罢工实在太可怕了，好象时疫一样，传染得异常迅速，只要那船上有中国海员，并不要工会的命令，他们便自动的离船上岸。所以各地轮船都认香港好象一时疫区域，不敢开来，或者只在港处稍停便走，或者径直不停，由西来的直达上海，由东来的直达新加坡或小吕宋。

香港全市工人同情总罢工

调停破裂以后，香港其他工人及一般平民对香港政府皆表示愤激而同情海员。先是香港各工会曾开联席会议，议决海员罢工，我们要大家同情援助，如运输工人同情罢工不能胜利，则我们一致举行总同盟罢工。海员工会此时便根据此一决议向各工会大肆活动，工会都表同情。但不能立时即罢，因香港一般习惯，工人须到月底才能取得工资，此时正是二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会共派出七个代表，到广州与海员工会商议筹备一切，并组织“全港同情罢工办事处”。他们只提出援助海员，并未附加自己条件。

虽然如此，当前却来了一个障碍，就是香港政府得知全港工人准备同情总罢工的消息后，便嗾使机器工会（本名“华人机器会”，是香港政府御用的机关），向工人宣传说：“海员罢工我们应该援助，海员现在最需要的是经济援助，我们可以捐款，不必急于罢工。”又说：“海员罢工势成骑虎下不得背，我们应该援助他们下背。我们可组织‘全港工人调停海员罢工会’来援助他们，这才是实际。”这种宣传居然发生极大效力。海员工会得此消息后，即派在广州筹商总罢工的七个代表回港制止调停会之实现。同时海员工会召集大会，宣言：“我们工人若同情就加入罢工，不能说什么调停？调停就是妥协”。大会一致决议不受什么工人调停，要香港工人切勿组织调停机关。群众异常激昂，高呼“工人兄弟团结一致”“打倒调停机关”口号。此消息在报上布露流传香港后，港工人憬然觉悟，取消调停会，并将调停会的招牌和印信打得粉碎。从此便一意准备罢工，毫不动摇了。

二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知全市总罢工就要到来，宣布欧战时一样的戒严令，把中国各口岸所有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加岗巡查街道，离港者要铺保。香港变成战时状态，谣言四起，罢工海员率性放火烧了香港三个贮藏粮食的货仓，于是全市更起恐慌，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

但香港政府虽下战时戒严令，然而工人并不害怕，月底领得工钱后，大家收拾被袱乘夜过海，预备天亮步行回广州（因火车已停）。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街市（按即菜场）一律罢工，连住家的使役，女仆，厨司，轿夫，园丁以及水底电线工人，山顶电车夫，报馆，印刷局，轮渡夫役，饼干店伙友，面包工人，公事房使唤人，牛奶房工人都加入罢工。弄得财主佬家里，饭没有人烧，火炉没有人发，小孩啼哭没有人理，全市关门闭户，秩序大乱，全港居民都感觉是危在旦夕。然而香港政府终无如之何。只得调遣全部海陆军警巡查街道，加紧戒严。

沙 田 惨 杀

十余万罢工工人步行回广州，三五成群，络绎于道。行到沙田地方，该处有大队英国军警驻扎，禁止工人通过，并开枪向工人射击。工人非常勇敢，大声高呼：“不要

怕，前进，去罗去罗！”一呼千应，声震山岳。英兵放枪扫射，当时死四人，伤数百人，后因重伤致死者二人，是为“沙田惨杀”。工人被英兵开枪击散后，有绕山背回广州者，亦有迷失路途绕回的，也有中途闻讯退回的。但是退回并不上工，散住街上空地或楼底，军警见三四十人一堆的便枪击驱散。政府禁止饭店借给成堆的工人煮饭。

香港政府满拟此项铁血政策可以奏效，而殊不然，反因此更促起工人愤激，不肯开工，香港居民亦更同情工人。

沙田惨案发生后，罢工海员更形愤激，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一面通电国内外请主持正义予以援助。

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

我们这里要来约略说说罢工海员的精神及其生活。当工会准备罢工时，本已筹备经费，但为数极微。所得之数不够罢工海员回广州的火车费。陆续回广州的海员人数不下五万人，后来又加上同情罢工的运输工人和香港工人，其人数更众多了，罢工经费当然拮据万状。幸而此时广东政府每日借出数千元，前后共计约十万元，罢工经费赖有此源源接济得以支持（其时广东的政府是这样：一九二〇年北洋军阀发生内讧，而有所谓“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而成奉直的联合政府。南方护法讨段之目的既失，于是岑孙分裂，岑去孙来，另建立政府，自为总统，继续抗北。但孙之部将陈炯明势力益大，与孙不睦，孙不得已以广东交陈而自去广西之桂林督师北伐。海员罢工时孙陈冲突愈益紧张。陈炯明是知道孙中山在海员中有相当影响的，此次海员罢工，所以他极力表示帮助，其用意不用说是在减削孙中山的影响而欲利用之以帮助自己倒孙的事业。不然，陈炯明何至有那样慷慨？罢工海员亦非常明白这个内幕，却利用陈炯明的经济接济，而始终未被陈炯明利用去作政争）。

罢工经费虽每日有数千元接济，但人数众多，工人生活仍然是很痛苦。每日饭食两顿，每顿一毛。除饭食外，什么都没有，时值隆冬，只发棉衣一件，后来棉衣买不起，就发给麻包。工人都在地上打铺，又无被盖。刚刚此时下雨又多，道路泥泞，工人连鞋也没有穿。冷不过了，只好烧柴火取暖。大家互相鼓励着说：“顶硬上，兄弟！米俾人睇小！”（粤语，按即“坚持到底，兄弟们，不要给人看轻”之意）只对外省海员（如宁波海员）稍为优待，住小旅馆，有棉被，每日发五分钱买香烟。

广州罢工总办事处分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招待处等机关。设立宿舍数十所，饭室则设海中紫洞艇上。办事很有条理，颇能照顾全局。罢工开始时苏兆征便是总务科主任。后来，会长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被捕，由大会公举苏兆征代理会长。

此时还不知组织俱乐部扮演新剧等，罢工工人无可消遣，不下雨时就舞狮打球。后来在观音山附近开修一条马路，定名海员罢工路。

外 界 的 援 助

香港工人同情罢工援助，足见其阶级同情之深。广州工人援助亦极踊跃。就是远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亦热烈的援助，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许多次大会，并发出许多次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休戚相关之义，一面捐款援助海员罢工。最有趣的，是京汉路火车头上竖起“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从汉口回转来又飘扬到北京。这是北方军阀专制政府下破天荒的英勇的一举。在国外的华侨捐款也不少。各国工会也有许多电报表示慰问及援助，但均被香港政府扣留。其时广东有一华俄通讯社，系苏联所组织，海员工会和它建立密切关系，每日以罢工消息报告，请其转达各国。那时海员工会便常致电法国“人道报”——共产党的机关报，请其转告各国工人阶级予以援助。

此时中国阶级分化还不明显，小资产阶级不用说表同情，就是资产阶级，亦有对海员罢工表示同情，竟至以物质相援助的。

香港政府的日暮途穷

香港政府对于罢工的策略，先之以欺骗，继之以压迫，三之以调停，四之以破坏，最后出之铁血，然而均不能奏效，至香港全市工人同情罢工后，更见狼狈万状，不得已只得令沙面英领事并派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很哀怜的说：“香港几十万中国居民没有粮食，必会饿死，我们白人在那边并不多呢。”要求海员工会先准香港船来广州自由采买粮食。海员工会说：“可以，你叫船来，但买不到粮食不关我们事。”果然第二日香港用海军开一船来，但来了一天，一块肉一粒米都买不到手。叫艇艇不来。他们没有丝毫办法，只得把空船开回香港去。

海员工会知道提出解决办法的时机已到，二月七日召集大会通过下列决议案：

（甲）暂时办法如下：

一、工人月薪在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下的加百分之三十。

三、工人月薪在二十五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二十。

四、必首先承认后面丁项原则，然后可谈暂时办法。

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全体即刻复工，由公断处商议（丁）项决议案。

（乙）公断处设在广州。

（丙）公断处由下列人员组织之：

一、广东政府代表，二、英国总领事代表，三、西船主代表，四、华船主代表，五、海员代表。

公断处人数，由广东政府和香港政府商议后决定。这个公断处有讨论解决罢工之权。

（丁）中国海员工会提出下列八条，请求公断处讨论。

一、工人工资在每月三十元以上的加百分之三十，在三十元以下的加百分之四十。

二、罢工之后，复工的工人不能加以任何理由歇业或降职。

三、工资增加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

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工会介绍，以免经手人克扣工钱。

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

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

七、加工资日期由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得苛虐。

决议之后，电告香港政府，并于（丁）项所列八条之外，再加一条，“恢复中华海员工业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与被禁之办事人。”

罢 工 的 解 决

香港政府此时除接受罢工海员的要求外，再也无路可走，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政府接到海员工会电报后，叫沙面英领事要求海员工会派代表到香港谈判。海员工会派出代表四人和广东政府交涉署代表一人去香港。香港政府承认组织公断处。此公断处屡次在香港和广州开会，到三月五日，把条件议妥，签字解决，全文如下：

下列条件经各签字于条约者同意，认为解决双方争执的办法：

（一）兹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十二号在香港应支之工价，须由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一月一号起增加如下：

甲、华人内河轮船　加三成

乙、其余华人轮船在一千吨以下者　加三成

丙、省港轮船公司　加二成

丁、其余英人轮船公司（以省区港澳轮船公司之工资为底）　加二成

戊、沿岸轮船　加二成

己、来往渣华轮船　加一成半

庚、来往太平洋轮船　加一成半

辛、来往欧洲轮船　加一成半

壬、来往澳洲轮船　加一成半

（二）须订定一日期，以便各船员一律回船，由离工日起至一律回工之日止，工金照新定之价折半支给。各船东须用回其船员在其公司之船供职，又如双方允肯，则安置其在别船供职亦可。如各船回工无席位，则于无席位用他期内，须折半支给工金予他。惟以由一律回工之日起计，不得过五个半月为限。此项折半之工金款项，另委管理人管理之。

（三）各船东允愿襄助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付船员

工金之弊病。

关于工资一项，其百分比，结果如下表：

	解决条件	海员要求	相差
一、沿海	二〇•〇	三五•〇	一五•〇
二、内河（中国）	三〇•〇	三二•五	二•五
三、其他中国船	三〇•〇	三二•五	二•五
四、省港澳（英国）	二〇•〇	二五•〇	五•〇
五、其他英国船	二〇•〇	二五•〇	五•〇
六、爪哇线	一五•〇	一七•五	二•五
七、太平洋线	一五•〇	一七•五	二•五
八、欧洲线	一五•〇	一七•五	二•五
九、澳大利亚线	一五•〇	二〇•〇	五•〇

除上列条件之外，恢复原有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沙田惨案死者每人优恤一千元，也答认了。

总而言之，此次罢工算是得到胜利。自一月十二日起，至三月八日止，共罢工五十六天。

庆祝罢工胜利

罢工胜利之后，工友们自然欣喜奋发，首先就在广州举行庆祝大会，随后回香港又举行庆祝大会。会中情形，略而不叙，我们这里只简单叙一事，即启封工会时之盛况。海员工会招牌曾被香港政府拆去，三月六日，香港政府只得明令取消二月一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工会招牌亦只得恭恭敬敬地给还海员。当重行挂上工会招牌时，罢工全体海员及香港全市工人都来庆贺，人数不下十余万人，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的欢声雷动中，一致仰着头，看招牌徐徐地挂上去。爆竹连天，声震全港。

这次罢工的教训

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其性质虽纯系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然而其实际却带着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因为中国航业几乎全系外国资本经营，中国民族资本，远洋船一条也没有，沿海内河船也不及外资公司三分之一。所以中国海员与帝国主义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成了直接的仇敌。这是中国海员斗争的特殊意义。

此次罢工胜利的原因，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国内外革命潮流的激荡，是一个利于斗争的环境；在主观上则为罢工有相当准备；选择的时机适当（中国旧历年关）群众完全了解并兴奋；团结力甚强；领导者聪明而坚决；援助力量有莫大的作用（运输工人甚至全港工人的同情总罢工）；应付策略的适宜（特别是封锁香港的饥饿政策）等。

此次罢工的弱点，不在于罢工时而在于罢工后，罢工胜利了，一般领袖和陈炳生、翟汉奇之流，由骄傲而至于腐败，再进而把持会务，盗用会款，变成工贼了，工会变成空虚无力。帝国主义见此弱点故敢把亲手签定的条约悍不履行，实际上胜利条约等于一张废纸。以致到了后来一九二四年，工人群众不能不起来做驱逐工贼运动，而把苏兆征（罢工胜利后仍回船作工）从船上叫了回来整顿工会，方逐渐恢复旧观。但胜利条件帝国主义却至今仍未履行。

虽然如此，此次罢工在当时总算是胜利的，它的影响，及于全国，所以它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历史上的意义便特别重大了

这次罢工还有另一结果，就是影响广东政府把中国刑律中关于罢工治罪之条文明令取消。

（原载《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一九二二年秋
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至　愚

自去年以来，劳动风潮，络绎不绝，而以本年（一九二二年）八九月间为尤甚。上海海员罢工未息，而京汉铁路罢工随之；京汉铁路罢工甫平，而粤汉铁路又随之。其他如京绥铁路罢工、上海人力车夫罢工，株萍铁路罢工、上海华界电车工人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亦于此中发生，一月之间，盖八次焉，而交通界乃占七次。爰择其中之最大者，叙述其原委于次，以供留心企业与时局者之参考。

一　上海华商各轮船局

上海海员罢工之剧烈，几与前香港海员罢工相等，起于八月五日，延至二十六日，始得解决，历时二十有一日，停驶之轮，达四十余艘，罢工人数，近二千人，各轮船局，大受损失，而尤以招商局为最。先是自七月以来，招商局海员以今春三月内香港解决海员风潮时所决定之增加工薪案，其他公司纷纷已先实行，故请亦自今年一月一日追加起，以后即照议定之所加成数发给。此事由上海新成立之海员公会支部代表具函请求者。乃该局谓此项增加工薪，非经股东会议决或通过不能允许。酝酿既久，愤激日甚，及至八月四日，犹不见该局有允予加薪之明白的表示，各海员乃实行其最后手段，即联合已进口到沪之新丰、新康、公平、江天、新江天各轮之水手，突于五日晨，宣布一律罢工。各轮水手，遂纷纷离船登岸，以示决裂，一面则宣言须俟该局容纳各海员之要求，照约追加及实行增薪以后，方能上船复职。因海员之罢工，新江天之应赴宁波兼湾普渡班，新丰、公平两轮之应赴烟台牛庄班，均未出口。而旅客之已上各轮者，亦纷纷退票上岸，改趁他公司输。又有新康号，原本于四号即可以出口者，无如为结关之不及，以致搁延至次日，其船中货物与客人，均已上齐，正于启碇离沪，而此意外事件发生。该局得闻此信，大为惊愕，特于正午十二时开董事会议，至午后三时始散会，并未有所决议，但招商、三北、宁绍三公司，因目下商业疲滞，均决计不依允水夫之要求。盖近来航业不振，水脚因以减低，故未便考虑增薪事。水夫要求增薪，应自本年一月一日起算，尤不能照允，如是则局中于此一项须丧失十余万元。惟调停之门，并未闭塞，航业界中人之意，以为一二日内当可调停就绪，实不知大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自五日各轮停航后，他公司输之出口营业，已大为激增，如怡和之开往牛庄安东之德生、开往烟津威

海之景星两轮，货客均满载，而有容积不下之势，多半为临时报装者，即此可证其一班矣。当罢工时，上海海员全体同人分发宣言，略谓：处今日新潮澎涨的时代，工人觉悟，无复俯首帖耳，低压于资本制度之下了，窃想我们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得工值，不足为日给之计，我同业的兄弟，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百端的辛楚，比别行的工人，更有甚焉呢！所以我们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前次发起加薪，经过许多的险阻，同业中坚持到底，已得遂要求目的了。但上海方面，有少数的船务公司未加，难道我们不是海员吗？所以我们要各未加薪的船务公司，照香港订立的加工合约增加了。不料该公司不体我们的苦况，藐视我们的同业，我们发函有十余天的久，并无切实的答复，似系无磋商的余地了。这回我们惟有暂行歇业，以待公论解决罢。我同业们啊！必要毅力坚持，大众一心，必要罢工期内，不可破坏，听从我们所付托的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才好。若不遵这回罢工的规则，便是我们的公敌了。

六日为罢工之第二日。已罢工之各轮，若新康、新丰、新江天、江天及公平等号，均停泊于金利源码头，各船皆未生火，水手人等早经离舟登陆矣。而新康轮中之客货，仍装载轮中，其官仓旅客，悉皆上岸，独留统仓及甲板面之旅客依旧在船上，守待开航。至于新丰轮旁驳船，载客货颇多，因罢工而不克装输，公平号亦然。若江天、新江天两轮，则沉寂无声息，以坐待双方之解决。连日于罢工以后续到之江轮，有江安、江新号及福州班飞鲸号。两江轮则留抛浦江，飞鲸船靠泊码头。船内来货均不能起卸，渐受罢工波及之影响矣。

其在招商局方面，因适遇星期日，未曾有若何之表示，但海员方面，仍要求须照约追溯至一月一号加起，以符成案。该局只允由七月一日起增加海员工薪，而不允追加之请求。盖该局现有外洋轮十八艘，江轮十二艘，即此加薪一项，若自一月一号起算，须多支出洋七万元至八万元之间，因此未曾允可，惟鉴于加薪事之势难避免，故定于七日十时有切实办法答复罢工之海员。至海员之所根据者，为三月五号由海员公会及船主代表广州之英领事等在香港所会议协定之合同，其第一条中，载明罢工事开始于一月十二号，而追加工薪准于一月一号起，议定增加海员工资之成数，计：（一）中国内河商轮加百分之三十；（二）满一千净吨以上之其他中国商轮加百分之三十；（三）港粤澳门公司轮加百分之二十；（四）其他英国轮船之航行香港广东及澳门者加百分之二十；（五）沿外海线商轮加百分之二十；（六）南洋爪哇线商轮加百分之十五；（七）往来太平洋线商轮加百分之十五；（八）往来澳大利亚线商轮加百分之十五。

七日为海员罢工之第三日。宁绍公司之新宁绍、甬兴及老宁绍三轮之水手，前因未曾加薪，一律加入罢工。经该公司与海员代表一再磋商，至六号夜间之十一时许，双方议妥解决，宁绍公司允从本月一号起，各海员照原薪各加十分之二，故各水手表示满意，于是日照常上工，开班行驶。至景星公司亦已承认海员要求，故其万里轮已开驶北行矣。

兹将景星、宁绍两公司与海员代表签定合约录下：

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八月六日即六月十四日上海轮船公司与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所订立之增加工资合同如下：（一）须照船员原有之薪金另加如下：（甲）

内河船加三成；（乙）其余轮船（一千吨以下者）加三成；（丙）沿岸轮船加三成；（二）增加工资于第一通知书之日期，即一千九百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三号起计；（三）由罢工日到复职日，须得十足工价，不得扣除；（四）于海员签字时，须本会派有正式代表监视签字，方为有效；（五）船员如有非法行为，经公司查明，立即开除，倘有冤诬等情，经中华海员会调查核实，有权向该公司交涉，得复原职及补回原有工金；（六）本日起双方即须履行上列条件，不得互相留难违约。

八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四日。当日午后一点钟前，招商局总理傅筱庵传集罢工各轮之水手头及生火头等到总局谈话，略谓各轮之水手生火头在去年曾经加过一次工薪，何得今次又欲要求加薪；况且尔等究为余所雇用者，即如今增加工资事，为何事前不与吾直接商议，致余毫无所闻，当时仅海员公会来函曾言及之，尔等则未与余言也；局内加薪事，须股东认可，方生效力，余亦不能擅专；今年水脚大跌，生意不佳，况尔吾皆宁波同乡，余断无不尽力之处；但外间所传之尔等罢工以后，有多数人来余处欲谋夺尔等及海员之生意，此事完全造谣，盖余处并无其事也。当由各头目沥述生活程度日增，三公司中已有两公司加薪，何以招商局独不履行香港之条约，以致海员等出此下策。言次，仍请准予增加，但无结果而散。而三北公司于是日午前十时，派中西代表各一人，前赴海员公会商议调解，允于七月二十三日起照加工资。海员方面，坚持由正月一日加起，故亦未得妥协结果也。

九日为海员罢工之第五日。前此五小公司之风潮，均于是日解决，一律签定增加工薪之合同，故此项罢工风潮，只招商局与三北尚未解决耳。

十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六日。招商局之海员罢工，仍无更变，因局内坚不允加，海员坚不上工，彼此各走极端，解决之时期，尚未到达也。

十一日为海员罢工之第七日。招商局对于罢工海员，似有听任若辈如何，绝不肯接谈之意。以为予其以巨额之款（据云全体追加工资须十五万金），损失于增加工资之用途，宁可将全部之江海各轮，停做三个月的营业，虽无水脚可收，亦可节省燃煤及船员工薪与关税银之开销，即不营航务，而就上海一部分之地产收入，亦足以维持也。

十二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八日。计自上星期六海员宣言罢工以来，忽忽已逾一周矣。虽宁绍、元一等及其他各轮公司，已先后加薪解决，而招商、三北犹无消息。统计此一周中、招商局内罢工之船舶，已超过三分之二，至于三北公司之长安、德兴、宁兴、升平、之江等轮，亦在罢工停行中也。

十三日为海员罢工之第九日。海员罢工风潮发生后，迄已九日。连日由海员代表与天华、肇兴、懋昌、宁绍、元一等各公司磋商办法，次第解决，恢复原有航业。而三北公司虽有虞君洽卿口头允许增加工薪，并未实行签字，故该公司之升有、升平、德兴、长安、之江等五轮，有船员二百余人，停靠浦江，业已陆续加入罢工之内。惟宁兴一轮，已由虞君邀同海员代表磋商办法，决定逐步解决，已经签字，海员工会，亦发通告，请宁兴海员即日恢复职务。但升有等五轮，因三北公司股东众多，虞君个人不能作主，须开股东会议决后，方可决定方针。而招商一局，态度坚决，两走极端，尚无调解余地。海员工会方面，除仍由各职员发给罢工海员饭食菜券外，并在均安水手公所、焱

盈火夫公会、联益后仓公会等团体，预备为各海员住宿之所也。

十四日为罢工海员之第十日。招商局鉴于罢工之船日多，长江轮已全体停班，外洋船亦十九罢工，即该局之宜昌长沙间上游江轮各海员，亦有附和上海海员之消息，该局得信后，颇为焦急。特在总局开紧急股东会议，以期早日解决也。

十五日为海员罢工之十一日。接三北公司之宁兴一轮，曾由虞洽卿君邀同海员代表磋商办法，于十三日已经解决，惟升有、升平、德兴、长安、之江等五轮，因须开股东会议后，方能决定。该公司业于十四日派代表徐正甫邀同均安水手公所、联益后仓公会、海员公会，焱盈火夫公会各代表，开始谈判，磋商解决，嗣因双方均愿让步，就将条件删改，当于傍晚六时签字解决。海员公会代表签约后，遂即发出通告，请升有等五轮船各海员即日恢复职务，以利交通，而鸿昌公司之升利号海轮，亦于是日下午十时，由该公司经理约同海员公会代表磋商解决办法，双方均各满意，遂即签约解决。他如祥泰木行之祥泰号于十三日加入罢工后，亦于十四日议决增加工薪，恢复原有航业矣。

十六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二日。海员罢工风潮发生之后，迄已十有二天，除其他各轮船公司，业经陆续解决外，惟招商局虽允于七月一日起每人每月增加薪工洋五元。而海员公会因不满意，务须照加二成，方为公允，故招商局之风潮，犹未能解决也。

十七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三日。当由第三者调解人李君征五邀同焱盈火夫公会、均安水手公所、联益后仓公会、海员公会等各代表，讨论解决方针。李君征五将招商局业已允许于七月一日起，不论海员薪水之大小，每名每月增加洋五元等情转告各代表。惟焱盈、均安、联益等各代表佥云，既由海员公会出面要求，现在解决，亦应由海员公会共同签名，方为正当。讨论良久，当由各代表提出条件：（一）焱盈、均安两会海员要求加薪二成；（二）联益公会要求加薪三成；（三）民国十一年一月一日加起。以上三条件，请李君转商傅筱庵君，以便早日解决，而免两受损失，李允即转商。

十八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四日。因招商局股东等会议以后，仍不允由一月份起增加工资，只认七月份起；若海员能让此六个月之增薪要求，该局便可立予签订加薪合同。无如各海员坚执不允，谓非自一月一日起，与太古、怡和轮一律并履行香港议案者，任何条件，均无磋商之余地。于是两方面之主张，依然无接近之机会，而其连续来沪之轮加入罢工团体内者，已将至全部商轮海员悉入此旋涡中矣。虽已经加薪之南洋班轮如广利、泰顺等船，亦皆取一致之行动，故以彼时该局之商轮计之，业到全部航业停顿之时期矣。其所未到上海加入罢工者，只有嘉禾、遇顺、新华三轮及杨子江上游之快利、江庆二船而已。其余各轮，均已一致宣告罢工停驶者为：（甲）南洋班港粤厦之广大、广利、泰顺等三轮；（乙）北洋班烟津线之新铭、新丰、新康、新昌等四轮；（丙）北洋班而兼牛庄线者公平、图南、同华、爱仁等四轮；（丁）福州温州班者新济、飞鲸、海宴等轮；（戊）长江班之江安、江永、江顺、江孚、江华及江裕、江天等轮已全部停班；（已）沪甬班之新江天轮；（庚）上游江轮固陵号。举该局所有之定期及临时之重要各航路营业上完全中断，该局因不允加薪而受此停驶之损失，其巨诚有不胜计数者。

十九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五日。该局虽议决自七月一日起，加给海员工资，并通告各海员，嘱在一星期上工复业，无如各海员对于该局之通告，认为不满意，故未与签订

增加工资合同。而海员方面，依然坚持，非得追加自一月一日起，断不上工，故招商局虽然发加薪之通告，仍然毫无效力之可言也。

二十一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七日。因海员方面非追加薪水至一月份不肯上工，局中则执定七月一日起加，不认多加此半年薪工，致成久持之现状，故风潮未见稍息，而反有扩大之势也。

二十二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八日。该局已罢工之船，外海轮除新华，扬子江轮除快利等外，余皆辍班，在申各海员且有离沪归家暂时休息者。该局鉴于情状日非，特与海员磋商增加工薪问题，拟双方皆稍让步，以期早日解决，当即在总局楼上会议，直至下午六时，尚未议竣，惟海员与船主已经接近，此问题较有希望也。江苏韩省长以招商局航路停顿，将近两旬，若不设法解决，双方两无裨益，当即电令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当即明白调查，呈复核夺。沈知事奉电后，致函招商局董事会，请即将此次海员要求增加工薪问题之经过情形，详细见复，以凭呈报省长。

二十三日为海员罢工之第十九日。自二十一日该局开特别会议后，因双方始终为六个月薪水之追加问题，意见仍难融洽，遂致无结果而未能解决，而在航轮仍复停顿，双方之态度，依然若即若离也。

二十四日为海员罢工之第二十日。初时局中因不认海员工会及上次增加工资合同曾订明五年期间犹未届满之故，是以未即允加。迨至董事会议决从七月一日起加后，在海员方面，亦坚持非遵照香港议案追加至一月份起不可，由是双方互持不下，致延长至二十天之久。及至该局最后一次会议，方与海员公会协商容纳其请求，彼此互相让步，以便早日解决，加薪问题与海员一再磋商，大体就绪，仅条件未酌议耳。

二十五日为海员罢工之第二十一日。先是上午十时许，李征五君乘车往访招商局总董事李伟侯氏，互相磋商一切毕，乃电请素与双方接近之粤籍巨商欧锦堂君加入调停。于是下午三时十分，由欧君亲至海员工业联合会，面邀该会主任林伟民君至招商局磋商。林君以自罢工以来，从未与招商局开过谈判，此次尚是破题儿第一遭，非会同各海员公开磋商不可。于是遂由各海员推定钱孝裕（南均安社）、顾恭谟（南焱盈社）、张允来（北均安）、穆生甫（北焱盈）等四人并副会长锺筱朋与欧君前往。是时李征五君已在招商局，而该局总董李伟侯，董事邵子愉、周清泉等，均已列席。迨各海员代表至，先由李君一一介绍毕，双方首先表明前此种种之误会，致延长时间，遂开谈判。海员方面，主任林伟民当提出五项条件：（此项条件已见前）与李君等公开讨论，间有更改处，则由李欧两君竭力解释。讨论至七时三十分，双方遂表示决心，招商局以多年宾主，且有李欧两君之调停，自愿让步，于是此五项条件遂告成立，双方当场签字，于十二时全体海员一律复职，而此一段相持不下之大风潮，从此解决矣。

二 京汉铁路

罢工之起因

先是京汉路全体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敷支配，向该局要求加薪，并对于工人

之待遇上，亦提议请稍加优渥。路局当事，左支右吾，毫无确切之表示。迨八月二十二日工人方面作最后之要求，路局始漫应于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当有圆满之答复。及期工人代表晋谒路局当事，仍是敷珩，工人大为愤激。各代表遂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集议讨论对付方法，结果决定坚持永久罢工，不达目的，誓不转圜。此掀天动地之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

要求之条件

工人既全体议决罢工，于是北京、长辛店、琉璃河各地铁路之工人集于长辛店者有三千余人。共同议决八个条件，发布宣言书，原文如下：

全国工友兄弟父老姊妹们：我们长辛店的工人，因感受生活困难和一部分暴戾厂长的欺凌的痛苦，力谋自卫计，才组织一个正大光明的俱乐部。我们的俱乐部，完全是由长辛店工人组织而成的，绝对的不受任何党派的利用，亦不受任何党人的指使，只专为工人求幸福，争自由，谋得到工人应享的权利为止。这种纯洁的宗旨，在四月九日成立会的宣言书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想各工友父老兄弟姊妹们还能记忆。

我们这次到底为什么事情罢工呢？恐各界人士不明白个中真相，难免不有谣传失实之患，只得向各界人士涕泣详呈之。

（一）我们为要求革除无端虐待我们的人们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电务科段长黄绵锦，书记王龙山，机务处电汽司事谭荫棠，科长徐家楣等五人，该五人平日对于工人之虐待欺骗苛罚克扣等恶劣手段，罄竹难书。使我们不驱逐他，处在他的淫威之下，永无安宁之一日。我们已将他的罪恶，一一呈报铁路当局，当局竟不允许我们的要求，我们迫不得已，只得停止工作。

（二）我们因感受生活上的困难，并想除去厂中历年的积弊，向铁路当局要求八个条件，兹将我们所要求之八条件录后：

（1）厂中日后上人革人，均要通过工人俱乐部委员会，厂内司事，概不得私行荐人（如此可以免除私受贿赂，阴用菲材，而免假公报私的毛病）。

（2）长辛店工人，有入厂十年或七八年，未有加过一次工薪者，值此米珠薪桂之际，工人之苦况艰难，前者姑无论矣，从今起工人应每月加月薪一毛，以后凡作工够二年的工人，如没有增工薪，应立即增加。

（3）短牌工人，凡作工够二年者，均应改为长牌。

（4）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作工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

（5）此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开赴前敌者，倍受辛苦，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性命几不保，应每人增薪一级。

（6）北京、琉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处，应由当局盖立官房，以便行车工人休息，以免流离失所之病。

（7）长辛店工人甚多，几无宿地，铁路当局，应该盖设官房，以便工人住宿。

（8）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

以上所要求的八个条件，都是我们应得之权利，并没有出乎铁路规章之外，乃铁路当局，竟吝不满足我们要求，我们迫不得已，只得全体罢工。全国的工友父老兄弟姊妹们呀！我们处在黑暗地狱之下，何等痛苦，何等惨伤，我们天天象牛马样的工作，竟得不到一丝一毫好处，言之心痛，我们原不想攻击上司，他们自己天天压迫我们攻击上司；我们原不想罢工，铁路当局竟强迫我们罢工，谁是谁非，曲直当有公论。但我们工人既无学识，复无能力，望全国最亲爱的兄弟姊妹们，与我们以实力的帮助，我们是感激不尽的。

我们自八月二十四日起，各厂均停止工作，机车除军用车照常开驶外，其余长短客货票车，概行停驶。

罢工时之情形

工人既向路局提出八项条件，长辛店方面，集聚工人约三千余人，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不达目的不止”、“劳动奋斗”、“打倒国贼高洪恩”等等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二十四日下午三时，第四次客车由汉口开至，工人即全体上前阻止列车行驶。该车过保时，曹使因该车有要公须至北京，即命宪兵王司令带兵百名，随军护送至长辛店站。王司令下车，一再述明来意，并极力以调人自任，工人坚持原来主张，誓死不放。车中坐客，亦相率说项，工人坚持不依。迄六时二十分，工人因王继续劝告，乃谓路局当事，屡次失信，非先行签字，允许工人之八项要求，万不能开车；复要求列车车长，将请愿工人随车带至北京，直接向京汉路局交涉。言时工人一拥而上，所执白旗，皆插于车头。

罢工开始后过二三小时，北京方面，即得报告，立即派兵南下，欲以武力镇服工人。不知北京车站工人，与长辛店方面早有联络，兵至前门车站，工人不与行车。局中无法，乃电长辛店工人云：“罢工宣言中已言明不停止军车，此次由京南下之军车，自亦当在不停之列，希准与通行。”工人方面之答复，略谓“兵来则死，兵不来亦死，与其日受压制受饥饿而死，无宁兵来饮弹而死。如必欲派兵至此，任从君便”云云。于是兵车乃开至长辛店。车至后，兵士皆居车中，数约二百人，全体工人，亦聚集于其对面，扬旗列队，严阵以待。时有游行监察之工人数人，与二铁路警察冲突。警察以手枪向之，声言敢前进者，立即开枪，势甚凶恶。工人愤不可遏，即以胸向枪，令其立放。多数工人，即上前夺枪，未得。同时闻在长辛店北之芦沟桥车站，有游行工人六人，为警察捕去。工人乃立将此以枪示威之二警察拥入俱乐部，以为抵制。当时三千余人，齐声高叫，此俘虏之警察大为气夺。至于派去之军队，则始终未敢下车，工人与之对阵二三小时后，乃扬旗行游街运动。至于调人方面，则有山海关及唐山之工人代表劝告铁路当局，促其立允工人要求。局长亦请京中许某及警察局长作调人，宣言对工人提出之八条，立与局长商量，明日即可答复，惟请工人开车；工人不允，只允将此次由京开来之兵车开回。调人又请求将被虏之二警察放出，工人方面，已应允，对局长又提出十一条要求，迫其承认。十一条如下：

（1）前所要求之八条件，概行允许，但短牌换长牌，应六个月一换；

（2）在罢工期内不得克扣工资；

（3）不得因罢工借端开除俱乐部人员；

（4）凡出差饭费，各大小工，均为一工一饭，各站各厂，均取一致；

（5）前砖瓦窑所革除之工人九名，应即复职；

（6）工厂改良，夏天多开窗，冬天添暖炉；

（7）行车处司旗挂钩看车等人，饭钱应与第四条同；

（8）年终余利，工人应得花红，应即按京汉规定章程，照办实行；

（9）监工处北京工务处存在车厂，无论星期假日，概不休息，应照厂中工人，一律休息；

（10）以上所要求八条，从北京总局起至顺德府止，凡属工人，都应同等享受；

（11）前门段长车务段长，带同随身警士，狐假虎威，嗾使巡警持手枪射击工人，应严行查办。

调停及解决

二十四晚一千余名之工人抵西站时，该路局局长赵继贤派总段长及警务处长，往长辛店晤会工团，磋商解决办法。工人方面，仍坚持所提条件八项。警务处长及总段长，以工人所提条件，其第一项与路局行政权上不免冲突，未敢遽然承认，遂回局报告赵氏。二十五日上午，工人方面，复派代表数人到管理局，谒见赵氏，陈述工人方面所提案要求之理由。赵氏当极力安慰，允为设法，谓只须工人方面，能停止罢工，回复工作原状，所提各节，均能一一酌量容纳，希各代表回见工人，剀切劝导，不必趋于极端，以免公家工人两方互蒙不利影响等语。各代表遂退，赵局长当即将其所陈各节，逐条批示如下：

京汉铁路管理局谕：

（1）据称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虐待欺骗苛罚克扣等情。

（批）郭福祥已开革，饬人正在查办，查实当然撤革。

又据称厂中日后上人革人，均须通过工人俱乐部等情。

（批）事关局政权限，要请部里的示。

（2）据称从今起，工人应每人加月薪一毛，以后凡作工够二年的工人，如没有增工薪，应立即增加等情。

（批）准由各该处择优呈请酌加，限期开单具报。

（3）据称短牌工人，凡作工够二年者，均应改为长牌等情。

（批）准择优到期改补。

（4）据称司机工人的头等工资，应作工多少年才能得到，请当局明白布告等情。

（批）交机务处查明宣布。

（5）此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开赴前敌者，倍受辛苦，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性命几不保，应每人增薪一级等情。

（批）已屡催机务处开单候奖。

（6）北京、琉璃河、高碑店、保定府等处，应由当局盖立官房，以便行车工人休息，以免流离失所之病等情。

（批）已由工务处筹办。

（7）长辛店工人甚多，几无宿地，铁路当局，应该盖设官房，以便工人住宿等情。

（批）准愿筑休息官房，俟本路财力充裕，再筑住房。

（8）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应该发给工薪等情。

（批）此系本局定章，向无扣薪之事。

各工人等应限令即日恢复原状，此谕。

各代表见批，遂回长辛店。同时路局方面，即派京汉路警务处处长钱秉钰，驰抵长辛店，向工人俱乐部晓谕一切，并对于工人代表提出之附带要求十一项，亦已允为转达，承认工人要求，先行撤退监视军队，一面向路局磋商办法，故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之客车，已由前门开行，罢工风潮，至此告一段落。

三 粤 汉 铁 路

罢工之起因

先是粤汉铁路局长王世堉任粤汉局某差时，即拟将他省工人，尽行排去，另将其同乡之私人插入，及得粤汉局长，遂秘向某当局条陈，谓粤汉为南北要道，苟有战事，得之可以操胜，但员司工人，若非素所亲近，则不免有指挥不灵之虑。某当局极韪其议，令王逐渐淘汰，以期成清一色之北籍工人。工人中稍明事理者，早已衔之，王见机会已至，遂暗嘱张恩荣、苗凤鸣故意挑拨工人，使出于罢工自去，然后以张苗所组合研究所之天津工人，全数安置要地，如再不敷用，则另向道清铁路借用若干。此种计划，不啻掠夺千数百工人之饭碗。工人忍无可忍，请该路王局长，加以撤革。乃局长延置不理，并称张苗若有不法行为，尽可诉诸法庭。工人见局长庇护张苗二人，蔑视工人全体，遂一面电部，请于三日内正当解决，一面致同样警告于该局长，此九月七日以前之情形也。至七日期限已满，而部局均无答复，遂于八日在该路工人俱乐部开会，决定全体罢工，发出宣言书数百份，请求各界援助。

要求之条件

要求七条：（一）张苗二人革职，吴青山复职；（二）工人工资依京汉例作工满二年者，改以日资计为月资计，病假仍给工资；（三）生火夫最低工资，每月应有十二元，小工九元；（四）工匠过一年加工资，小工、帮工、学徒过半年加工资，工资应按月发给，不得拖延；（五）工人升职；应由旧工人依次升补，工人不得无故处罚，非犯路章到五次以上者，不得开除；（六）照给去年湘鄂战事时所允工人之双薪，以及此次罢工期内之工资；（七）司机、生火夫及机厂各项工人，应照京汉例给差费，请假回籍，应发减价联票，司机请假乘车，给二等免票。不达上项目的，决不上工。又临时分配调查、留守、送信、点名、总务各委员，以维秩序。

罢工时之情形

自罢工后，工人举动，极为文明，而该路王局长，则以工人情势汹汹，遂请来警察七署保安队三十人，及陆军二十五师第一团步兵一连，到徐家棚车站弹压；一面又召集其同乡天津籍之工人组织研究所，接手开车，以示抵制。故自八日起，长沙开岳开武之客货车及萍乡运煤至鄂之专车，均无一到。而武昌开岳开长之客货车，仍得照常开驶，又派武装军队，随车保护。一般工人，以铁路当局，毫不体谅工人之苦痛，反为此蛮横压迫之举，无不愤慨异常，但有军警随同保护，知非用武所能取胜。十日晚十一时，铁路当局，又令研究所一部分工人开车，当有罢工工人百余人及工人家属之妇女幼孩等，群卧轨道上，不让车行，乃军警听局长之指挥，竟以惨无人道之手段，横拖直曳，肆行杀伤，儿啼妇哭，惨不忍睹。一时受伤者百余人，投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者九人，受重伤者三十余人，受伤命危者八人。同时长沙来车到岳，岳州俱乐部工人，全体横卧铁轨，阻止去路，亦有指挥者调来军队两连，将各工人以刺刀枪托，乱杀乱击，当时毙命者六人，重伤六十余人，押解来鄂者三十七人，均囚于武昌玻璃厂。综合两处计算，横被军警杀伤者至达二百数十人之多，然工人虽受此惨痛，团体仍异常坚固。该路当局，虽日日为破坏工人团体之谋，而工人绝不为其所动，因之路局劝诱上工之计划，未收丝毫效果，仅以武装军队，随车开行，虽无一定时刻，而长短票车，一日或可开一二次，惟萍乡煤车则尚停。罢工工人，以该路恃有研究所工人服务，交通尚未大受影响，对于工人要求，自难为完全之容纳。且罢工效能，既已减缩，而长久不决，徒令工人方面，受莫大之损失，故组织请愿团与交际股，一面向当局再为一度之请求，一面向各界为同情之呼吁。不自立规约，凡在罢工期内，须各守秩序，非有徐家棚总部通告，不得单独上工，致碍团体之动作。遂于十一日在临时办公处议决四条办法：（一）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二）革除并惩办王局长；（三）从优抚恤死伤之工人及工人家属；（四）完全承认工人前次提出之七条件。不达目的，决不上工。全体工人，当即发行快邮代电请求各界援助。十二日又发出泣告全国国人书，请一致主张公道，予以实力援助。

各方面之援助

自罢工工人请求各界援助后，武昌工团联合会认此问题非一部分问题，应和全国劳动阶级，共同负解决的责任，其应声而起者，先为京汉南段工人俱乐部。该部同日晨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一致为之援助，当即发出通电，措词极为激烈。电云："北京大总统、国务院、交通部、参众两院、洛阳吴巡帅、武昌萧督军钧鉴：粤汉路工人，因不堪工头虐待，生活压迫，出于罢工，乃该路王局长，蒙请军警，杀伤岳州徐家棚工人及其家属各达数十人，殊与吴巡帅保护劳工及前次对待长辛店罢工之慈爱态度大相背谬，恳饬撤退压迫军警，撤办该路局长，抚恤被杀伤工人，允准工人要求，限十六小时示复，否则本路工人，一致行动。再工人罢工，全为本身生活问题，与任何方面无关，至于交系尤与工人不共戴天，合并申明。京汉路南段全体工人叩真。"此电送至电局，电局不敢收发，遂改用快邮，发出三十余份，限定十六小时，亦改为三日。又派出代表十一

人，分向京汉北段及京汉、京绥、京奉、津浦、陇海、道清、正太、沪宁各路，请为粤汉后援。京汉之长辛店、郑州、信阳及陇海洛阳等站工人，均已来电，限三日解决，否则将与粤汉一致行动，株萍铁路愤于军警杀伤岳州徐家棚工人之残酷，亦于十一日罢工，非粤汉得有正当解决，决不上工。安源矿工，亦深表同情，取同样举动。此外除天津籍工人及被张苗二人所煽诱者外，上海海员会及汉口码头夫公会各种工团，来函声明，愿为罢工工人之援助者，不可计数。

十二日午，京汉南段俱乐部、扬子机器厂工人俱乐部、租界人力车夫会、纱麻四局工人联合会、造币厂工人俱乐部等三十余人，在汉口法租界永庆里某号开联合会议，筹商一致援助粤汉工人办法。当即决定：（一）由各俱乐部及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限一星期内成立；（二）通电全国并海外华侨，宣布粤汉路局压迫工人之罪状，请一致声讨；（三）呈请当局撤退沿路之军队；（四）要求惩办工蠹张苗二人，以平众怒；（五）派人北上请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以为工友之保障；（六）派人赴粤汉路局，安慰受伤工友，当推定京汉南段代表陈炳生、黄玉，扬子厂代表周海清；汉阳铁厂代表赵启发等四人；（七）由各俱乐部工会筹措捐款，以救济粤汉罢工工友之生活；（八）组织援助粤汉工友宣导团。对于粤汉罢工情形，应随时宣布，使各工团了解罢工之情况；（九）如该路当局，不知觉悟，再以武力压迫工人，则武汉各工团同时罢工，以为后援。又有数工团，召集会议，对于援助粤汉罢工工人，议有六条办法。业已呈请各当道体谅工人苦痛，饬令分别施行。又组织粤汉罢工后援会，如三日内尚不解决，则联络各工团工人为大规模之游行示威运动，并预备旗帜多种，以为三日后之用。萧督以该路风潮，愈益扩大，极不以王世堉及军警横加压迫为然，特派蒋副官赴路局调查真相，又传王世堉到署，谕令和平办理。王世堉恐风潮扩大，影响于全国交通，亦派人至玻璃厂安慰受伤工人，每人给洋十元，以作调养创伤之费。

十三日，长沙方面，该路工人亦大为愤怒，新河路工俱乐部，于十三日召集会议，请自岳往长之工人彭某报告当日发生惨剧情形。报告毕，各工人莫不切齿痛恨，当经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一面并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名义，通电全国，请予援助。此次粤汉路罢工举动，本极文明，乃萧耀南遽听王世堉一面之词，横加摧残，演成绝大惨剧。长沙工界如工人、工余两俱乐部，亦于同日下午六时，在总工会开联席会议，讨论援助办法，首由主席李锡纯，报告开会缘由毕，易子琦起立，谓粤汉路罢工，现已扩大，为工人与军阀之争斗，吾人苟不急起援助，恐异日吾亦将受此惨祸，语极愤激。列席者均表同情，讨论结果，决定办法四项：（一）通电京沪各报馆各工团，宣布萧耀南罪状；（二）以快邮吊慰粤汉路各罢工工友，并请坚持到底；（三）发布传单，唤起长沙各工人之觉悟；（四）多投稿各报馆，鼓吹舆论。遂推定易子琦等数人，担负文字责任而散。至湘政府对于罢工工人，绝对取不干涉主义，并许为相当之援助，由湘路局派员赴鄂，为之疏解。又由湘段局长曾君聘、警务处长石成金等至新河工人俱乐部，温词抚慰，令其严守秩序，静候解决。曾局长并有罢工风潮发生以后与解决以前，一切工资，当概行照付，我可负完全责任等语。各工人对于湘政府态度，均认为满意，故湘段秩序甚好，绝无何种意外行动。

调停及解决

十三日晚，交通部参事周肇年奉命到汉，调查罢工情形；交通次长劳之常，亦奉命先赴洛与巡按使协商办法，于十四日晚七时五十分，乘火车到汉。京汉粤汉两路工人，排队至江岸车站欢迎，并面恳其主持公道。工人各持旗帜排队至站，约有二千三四百人以上，内有粤汉工人百余名，余则为京汉江岸之工人，秩序严整，队前有大白布旗两面，其一上书“请交通次长看粤汉路局长指挥军警杀伤工人之大惨剧：岳州死六人，伤六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三十七人。徐家棚伤百余人，重伤三十余人，命在垂危者八人，逼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九人。哦！交通次长来了，救命呀！杀贼呀！”其一上书要求条件：“（一）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二）革除并惩办王局长及张苗二工贼；（三）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工人家属，并赔偿损失；（四）完全承认前次所提出之七条件；（五）此后不得妨碍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同盟罢工之自由，否则誓死不止。”又有二面次大纸旗，上书“粤汉铁路未死工人请愿团”，其各小旗上所书标语有“欢迎交通次长救命，惩办张苗王为同胞除害！”“不自由勿宁死！”“争自由，争人格，争生存！”“杀人者死！”“救人要救到底！”“看看我们惨状，问问你的良心安么？”“哦！青天到了，请救命呀！”“交通次长呀，你看我们的惨状也伤心么？”“正义自在人心，公道望你主持！”“工人是杀不尽的！”“请别要辜负吴巡阅使保护劳工的意思呀！”“请别要辜负我们欢迎的诚意呀！”专车到站时，工人肃静无声，车停后，亦未闻有若何动静，惟见各种旗帜飘摇于惨淡灯光之下，微微发出唧唧之纸声，以破此严肃沉默之空气。少顷工人代表发言，谓我们在此欢迎次长，请次长出见，劳氏当即由窗内露出头部，与工人答礼，代表即将备就请愿呈文递上，并谓我们日在困苦压迫中，请次长主持公道，劳氏好言安慰，谓诸位如此辛苦，我实在难过，粤汉路事，明日自有正当办法，请诸位今晚回家，不必在此久站。代表谓次长允许明日正当解决，工人等不胜感激。说毕后，即向劳行礼，整队出站，劳亦答礼相送。大众行时，秩序仍极严肃。劳氏当晚宿于火车，十五日上午九时，在江岸镇守使花园内召集京汉工头及高级员司训话毕，即渡江谒萧，并召王世堉及工人代表至督署，面询罢工真相，借商解决办法，劳与萧均不以王世堉指挥军警杀伤工人为然。

十六日劳氏到车站察看情形，对于罢工工人，多方抚慰，并给予受伤垂毙者养伤费各二十元，于是劳氏遂以携带工人要求条件，附车返京。十八日午后三时，武汉各工团代表，复在汉口华阳大酒楼平台上开联席会议，讨论应付方法，结果，决定五条办法：（一）对于粤汉工人前提七条件，加各工团所提四条件，务必坚持到底决不让步；（二）再电交部，限期解决，倘再迟滞不决，武汉各工人，则一致罢工，以促当局的反省；（三）筹集巨款，以为粤汉路工友罢工期内的生活费，此款由各工团捐助约五六千元之谱；（四）通电各路各厂工友，无论粤汉路当局，出何高资，万勿应其雇请，以表示阶级斗争；（五）警告粤汉路天津工友，请了解工人无乡界、省界、国界的区别，应与被杀伤工友一致行动，勿被局长监工役使，否则将该一部分工友姓名通告全国，以示共弃。议决后，当公推某工团书记起草，分别办理。

十九日午，各代表联袂渡江，到粤汉局，提出新要求四条：（一）以释放被捕工人用专车送回原处为先决条件；（二）撤退弹压军队撤惩张苗；（三）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并赔偿损失；（四）承认前此粤汉路工人所提出的七条件，同时向王世堉提出最后警告书，限其克日承认。警告书云："粤汉路管理局局长台鉴：粤汉罢工，起于张苗虐待工人，破坏团体，阁下不察，竟从而袒护之，揆之事理，岂得谓平，倘初允贵路工人之请，革除张苗二人，焉有若大工潮发生。讵阁下不独不允其请，反指挥军警枪伤工人，伤痕俱在，矢口不认，冀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自问天良何存，况据确实调查，岳州已死工人六人，失踪者四人，重伤者数十人，捕囚玻璃厂以强盗土匪待遇者又三十二人。徐家棚重伤垂毙者亦不下十余人，昨在大智门车站已经法医验明，劳次长并给养伤费二十元。此系铁证。现贵路工人，拟有最低条件，再向贵局长要求承认，谅不致仍事迁延，藐玩工人。敝工团等本休戚相关之义，抱息事宁人之心，特再三让步，提出最后警告。务望贵局长从速省悟，克日完全承认，以平众怒，而复路政。否则敝工团等，定率武汉全体工友，以周旋于贵局长左右，前日大智门之包围，恐不难再见于徐家棚也。特此敬告，并颂公祺。武汉工团联合会、江岸京汉南段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厂工会、杨子厂工人俱乐部、汉口既济水电工会、丹水池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武汉轮工会等同启。"王世堉见代表等来势不佳，当谓我个人对于粤汉工友的七条件要求，极表赞同，但此事重大，非俟交部核定，不能负责答复，至诸位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撤退弹压军队，和优恤工人赔偿损失各条，都能即日办到。工人代表，当请其立即电部，从速决定办法，王亦答应照办。至是代表等遂回汉口，致电赴京请愿的代表，就近向部催促，以便工潮早日解决。

二十日午后，京汉南段办事处长冯沄亲到粤汉路局调停，其调停条件，系先由路局通告监工张恩荣员司苗凤鸣暂行停职，被捕工人，一律开释，弹压军队，统行撤退。至要求加薪七条件，俟得交部复电，再行核夺。工人方面，已经承认，粤汉工潮，至此稍行停顿。自此以后，因部局两方，均无诚意负责之解决办法，以致罢工工人，生活难艰，援助工团，皇皇莫定。京汉南段办事处长冯沄副处长易怀远，及俱乐部主任，因恐风潮影响，及于京汉，曾偕往粤汉路局，亲与局长王世堉当面磋商，由王亲笔复函，允许工人九条。张苗二人，亦先由路局通告停职，除名与否，能否加薪，须俟交部决定。不料王于二十一日，否认前言，不允许张苗停职，致调停上工之事，遂生波折。一般工人，以路局故意委责于部，以图脱卸，又时时欺骗工人，特于二十一日，在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开会，大家一致署名，主张非达到目的，无论如何，决不上工。又该路代表余友文、陈理应等二十余人，向京汉南段工友等，沿门乞援，京汉工人，亦纷纷责问江岸俱乐部职员，为何不早下罢工命令，以重本路工人威信，因之江岸俱乐部，于二十二日上午十时，召集紧急会议，到者百余人，决定自当日起至二十四日止，粤江工潮，尚不得正当解决，京汉南段工人，即一致罢工，以促部局之反省。又议决罢工后办法六条：（一）通电全国，举行罢工，警告粤汉当局；（二）罢工期内，请各代表负各班责；（三）罢工期内，公推总指挥一人，参赞二人；（四）罢工期内，委员会加选数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专办罢工；（五）添设纠察部，维持秩序及调查内外情形；（六）添设

交通部，传递消息。武汉各工团代表，二十二日，亦开联席会议，决定分途募捐，维持粤汉工友生活，如至某日，尚未解决，则举行大罢工，以为粤汉工人之声援。二十三日，京汉江岸俱乐部，根据二十二日议决案，急电交通部，限于二十四日内解决粤汉工潮，否则京汉南段，即于二十五日，一致罢工，是粤汉罢工风潮之形势，忽由停顿而趋于紧张矣。其通告国人书录下："各界同胞们，各地工友们！全路工人所受的虐待，真是积冤难诉呀！因为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所以一致停工，以求解决，乃本路局长王世堉，阴险狡诈，待我工人，如牛马奴隶之不若。指使他的私人，故与工人冲突，破坏我们的团体，蒙请军警，武力枪杀岳州徐家棚工人……所有死伤实情，已由劳次长路局及各工团调查确实，受伤工人，已由劳次长在大智门当面验明。并囚禁受伤工人三十二人于玻璃厂，至今十余日，不准工人家属看慰，其因伤饿寒署之侵迫，命在垂危者十余人。彼犹以为未足，私发冒名传单，借此唆使工人，自相残杀，诬陷工人，运动军警，以遂其欲加之罪，种种压迫我们工人的事实，真非一言所能尽述。各界同胞们！各地工友们！我们全路的工人，设非受了极重大的压迫和痛苦，岂有不安居乐业，而受此流离失所的惨状吗？我们不过要求生活之改良。乃王世堉竟指使军警来枪杀我们，我们本诸良心和爱国热忱，揭穿路政之积弊，乃王世堉竟逞其私欲，肆意袒护私人，我全路工人，为路政计，为自身生存计，不得不有最低限度之要求。然犹一再让步，乃阴险狡诈之王世堉，以我工友为可欺，不但不允准，乃变本加厉，多方压迫，欲以迁延手段，饿困千余工友。日前用几条空洞之条件，诱我工友上工，我粤汉工友，再四思维，以为既受重大损伤，若不得圆满解决，不但与敝路工友的人格和利益攸关，我全国工友，亦得蒙莫大影响，而至丧失人格和利益，故我千余工友，为我全国工友人格计，万难让步，且愤激异常，决议一致坚持，非完全达到前此提出之条件，誓不上工。全国同胞们，我们为正义而战，为公理而战，罢工已十余日，望你们本互助的精神热爱的心理，予我们以经济和实力的援助呀！亲爱的各路工友们，各业工友们，我们都是最亲爱的弟兄，只有我们工人是一家人。我们是你的兄弟呀！现在我们受了极大的痛苦，而且继续饿困在这里呀！全国工友们！你们忍心看着我们受摧残么？因此我们极恳切的对众位弟兄们说：我们都是休戚相关的，我们是属于一个工人阶级的，我们的痛苦，就是你们的痛苦呀！今日那些官僚军阀，可以杀我们，明天就可以杀你们呀！我们要求你们要急速与我们以实力的和精神的援助呀！现在我们千余工友，忍着饥饿和伤痛，等着你们援助呀！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启。"

京汉两岸俱乐部，二十二日，议决罢工后，二十三日，即致电交通部与洛阳，分别警告，其致交通部电云："北京交通部总长钧鉴：粤汉工人，受极大痛苦，迄未得圆满解决，武汉工人极愤激，江岸工人尤愤激，工人现已无法维持，由全体议决，要求钧座于五十四小时内，确实完全承认粤汉工人条件，时机逼迫，特此预告。京汉南段总部。"又致吴佩孚电云："洛阳吴巡帅钧鉴：粤汉工人受极大痛苦，前呈种种惨状，已承劳次长验明，确系事实，绝非诬传，现工人一再让步，该局长不予诚心解决，武汉工人极愤激，江岸工人尤愤激，已无法维持，由全体议决，急电交部，于五十四小时内确实解决，否则不堪设想矣。惶极恐极，素仰钧座以保障工人为怀，特此电呈，务望迅速

转达交部，促圆满解决，工人幸甚，国家幸甚。京汉南段总部。”至二十四日晨，武汉各工团及京汉陇海各路工人代表千余人，在江岸扶轮公会开会，群情愤激，决定至二十五日下午八时止，粤汉路事，尚无一定解决办法，京汉南段，即于二十五晚大罢工，并议组织敢死队五百名，交通调查两队各百名，以实施罢工后之动作。二十四日午冯沄复往粤汉路局，为最后调停，王世堉仍诿之于部，致无结果，冯恐京汉南段，一经罢工，南北交通将大受其影响，特急电部，请速定办法，以弭风潮，又为种种预备，以防南段罢工之实行。二十五日，交通部急电王世堉，令速将工潮解决，洛吴于电王负责解决外，并电饬萧督督促办理，至是王世堉之态度，始不如从前之强硬，午后请冯沄、易怀远、姜肇基及工人代表至局开始会商解决办法，磋商数小时，始行决定，张苗二人，停职查办，被捕工人，一律释放，至工人前提七条，亦当场批答，分别允可。关于第一项，当由路局布告，监工张恩荣，司事苗凤鸣，呈议停职，听候查办，除批准外，合行布告；第二项，亦立时传知武昌玻璃厂，将被拘工人三十二名释出，内有二十四人为岳州工友，用专车送回岳州，其余八人为徐家棚站工友，仍回原职；至第三项解决情形：（一）张苗二人革职，吴青山复职。“批答”张苗现已布告停职，吴青山如查明确系受冤，当可复职；（二）全路工人工资，概依京汉路例，作工满两年者，改以日资计为月资计。病假期须照给工资。“批答”概照京汉办理；（三）生火夫最低工资，每月应有十二元，小工应有九元。“批答”生火夫每月工资十二元，照准，小工分两种办法，新到工者给七元二角，满一年工头保举者给九元；（四）各项工匠每过一年加工资，小工、帮工、学徒每过半年加工资，工资应按月发给，不得拖延。“批答”各项工匠，每过二年加工资一次，学徒、帮工、小工满一年加工资一次，须分勤惰，亦照京汉办理；（五）工人升职，应由旧工人中依次升补，工人不得无故处罚，非犯路章五次以上者，不得开除。“批答”工人升职，应由旧工人中合格者升补，工人不得无故处罚，当然如此办理，非犯路章五次以上者，不得开除，应分别过犯轻重，须合路章；（六）照给去年湘鄂战争时，所允工人之双薪，以及此次罢工期内之工资等情。“批答”湘鄂战争双薪，现已筹款照发，罢工期内工资，调查京汉长辛店，仿照办法；（七）司机、生火夫及机厂各项工人，应照京汉例给差费，请假回籍，应发减价联票，司机请假乘车，给二等免票。“批答”各项工人，应给差费，因本路进款较少，候详定章程办理，工人请假回籍，发给减价联票，本路并未列入联运，无此权力，司机请假乘车给二等免票一节，现时各路免票，已奉大总统令取消，应毋庸议。以上各条，除路局权力所难办到各节外，余已尽量容纳，工人目的，总算达到。经调停人及代表报告解决条件后，工人异常高兴，当燃放爆竹，欢送被拘释之的岳州工友回岳，同时又欢迎徐家棚工友回站，掌声与爆竹声，一时雷动，为从来未有之盛况。二十六日七时，罢工工人，一律上工，并发出上工宣言，希望以后工人仍须通力合作，以争工界之幸福。粤汉工潮，自兹已可告一结束。至因援助粤汉而罢工之扬子机器厂，虽提有改良待遇之要求五条，而其最大关键，则在援助粤汉，粤汉工潮已了，则扬子厂之风潮，不难立就平息也。

（原载湖南长沙出版的《商业杂志》1卷，1922年11月10日出版，
原题为《交通界三大罢工之原委》）

一九二二年
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资料选辑

中共开滦党委矿史编委会辑

编者按：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反对英国资本家苛待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和要求承认工会而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罢工斗争。本刊创刊号发表的："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破坏、镇压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的罪证"一文，集中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官僚军阀镇压这次工运的罪证。为了进一步地研究这一次罢工斗争史，这里发表了："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资料选辑"，它包括罢工的宣言、文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工会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对罢工的支援；社会舆论等等。它收集的资料虽然不全面，关于这一事件散失的重要文件也不在少数，但，它仍然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正义呼声；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工人运动走向了新的历史里程。这里具体地显示了：开滦工运历史已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由孤立的、局部的斗争发展到有全国工人阶级支援的斗争。因此，这是一份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件。（关于这次罢工的概况在本刊创刊号"英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破坏、镇压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的罪证"的按语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第一部分　罢工的宣言、文告

一、开滦矿务局林西、唐山、赵各庄、秦皇岛、马家沟五矿工人联合请愿书

为恳体恤劳工，恩加薪金，并乞准予平等待遇事。窃工等服务贵局，虽非一律旧人，然综大小工算，其间多有从贵局创办以迄于今，历三十余年者有之，二十余年者有之，卜昼卜夜，终岁勤劬为贵局争厚利，只冀厚待有加，生命有托耳。当今百物腾涨，价值倍增，以工等平日所借之薪资，断非今日所能支持家计。工人工薪按岁增加，各处工厂俱有定例，乃我辈有作工十余年者竟未得加一文。甚如我工人与员司同为贵局服务，论理，待遇应持平等，乃贵局故持轩轾，遏抑工人，如煤条、慰劳金两事概可想见。事之不公，容有甚于是乎？至于星期日、年节假，以当日贵局开辟之初，尚可给回原薪，年尾偿金尤能恩给一月。在当时贵局每岁不过仅赢余百万，尚能援欧西各国之通例；今每岁已有数千万之赢余，反不若当年之体恤，使我工人感受种种之痛苦。今我工

人于共活上万分困苦，共同提出最低条件六则，敬恳我矿师默察时艰，顺应潮流，即慨然允许，则工人等感佩鸿恩，永矢弗谖。临禀不胜急切待命之至。谨呈矿师台前钧鉴。兹将请求条件附左：

（１）请求加薪分为三等：十五元以下者应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应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应加一成。

（２）我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给回一月偿金。

（３）我工人每月四星期（天）及年节停止工作，应援庚子前给回工资。

（４）工匠煤条及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偿给。凡工人每月有十二元薪金者，应得享此条件。

（５）工人在局有过二十五年者，应给养老费，并须照原薪支给；倘无大过，不得借端革除。

（６）工人因公受伤，应给回工资。倘遇因公致命者，应酌给恤金。该恤金须照月薪计，最少补至五年，应作一次补足。

开滦矿务局林西、唐山、赵各庄、
秦皇岛、马家沟五矿工人联合公禀

十月十六日

（开滦档案（下略）复制卷1.6/8，15——16页，
原卷14.2.13，67——109页）

二、大公报转载：开滦五矿总罢工宣言

唐山快函云：开滦煤矿，为东亚数一数二之产煤区域，矿域共分林西、马家沟、赵各庄、秦皇岛、唐山等五处，约有工人三万余人。每年获利数千万。自庚子之役，大好矿产，即被英、比二国攫去，言之痛心。该矿务局对待工人，异常苛刻，工人早有与资本家奋斗之决心。近年来见各处罢工甚为流行，于是该矿工人暗中结成一气，进行待遇改良、工资加增之运动。不料矿局对于工人要求，不独毫不采纳，且目为破坏治安，并指为乱党，乃派警察用武力压迫，工人被压不过，于二十三日早晨，实行五矿总罢工，发出宣言，并提出要求条件六则，非达到目的不止云。兹照录罢工宣言及要求条件如左：

全国工友们！同胞们！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矿务局被压迫的苦工人，现竟被洋资本家视若匪徒，昨日无故任意在林西扣留我们六名代表。在局中，我们原来是酷爱和平，不愿挺而走险。谁料洋资本家，这样故意来挑衅我们，我们逼迫得万不得已，才于今日（二十三日）举行这悲惨、最后的罢工手段。工友们！同胞们！开滦矿务局平时对待工人，不说没奴隶的身价，连一匹骡马尚比不上呢？往往井下发生了危险，洋人只问死伤了多少骡马，人是不介意的。因一匹骡马死了价值二三百元，一“头”工人苦命，

不过仅给百元就是了。工人因公受伤，就立刻逐出局外去，不顾你的死活。工人伤牲口，不独受罚，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其余别些污辱我们工人人格，草菅我们工人性命事实，是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用言词也是说不出来的。真是人间地狱呵！现在我们正在打起精神，拚命奋斗，不达到圆满目的不止。望全国工友们，同胞们，快快来援助呵。

条件：（同1922年10月16日请愿书所提的六条，略——编者）

（原载《大公报》，1922年10月28日出版）

三、开滦矿务局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秦皇岛工人俱乐部会员致开滦矿务局总理函（译文）

我们现在的情况实在十分困难。因为物价高涨，正如总矿师的布告上所说的一样。但是总矿师仅办理矿务局的利益，而不考虑我们的困苦，相反的还污蔑我们，并把我们的要求看作不合理。他的评述才是真不合理。我们提出要求，单纯的为了我们的工资微薄，不足以维持我们的生活费用。我们没有一点别的企图。现在，总矿师在他的布告里：污蔑我们受了别人的煽惑，这是完全无根据的。总矿师也打算用警察来镇压我们，对此，我们非常忿恨。然而我们仍保持忍耐，因为我们全酷爱和平。设若不是因为我们的六位代表被他扣押在林西，我们可能再向他递一呈文，以期达到互相谅解。现在我们完全失望。逼迫我们万分不得已才举行总罢工。这个纠纷是总矿师造成的，你不能归咎于我们。现在我们决意斗争到底。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是最低的，除非接受全部要求，我们决不恢复工作，也不进入你矿。我们宁愿死。我们现在诚恳地把罢工的目的及决心通知你。实在是矿局激起我们走向极端，这真是违反了我们的原意。我们要求你将我们现在的情况予以考虑，提出办法以便早日解决。

我们的要求如下：

除十月十六日联合请愿书所提的六条外，再增加以下四条：

1．开滦矿务局应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有权力代表全体工人；

2．以后厂矿中雇用工人及开除工人，须经职工会委员会即工人俱乐部通过；

3．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4．每年应给工人两星期假日，每三年应给予两个月的假日。当休假时应发付全部工资。

开滦矿务局唐山、赵各庄、林西、
马家沟、秦皇岛工人俱乐部全体会员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复制卷　1.6/1　18——22页）

四、秦皇岛矿务全体工人痛告国人书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公私团体、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奉沿路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因受不过生活困难，环境压迫，起来要求资本家改良，而资本家竟悍然不顾，

不得已实行同情罢工。想大家早已知道了。不谓罢工已五天了，狼心狗肺的资本家，不但不允许我们的要求，反运动中国军阀调来保安队和印度兵数千名，来包围我们，来蹂躏我们。起首，我们对于该军队，处处以文明对待，想促其觉悟，又谁知该军队受害民贼杨以德的密令，越来越蛮横，天天来挑衅，天天来鸣枪数千百响，以威吓我们。我们明知没犯罪，没有死刑。而且此次罢工，实是救命的运动，绝不怕威吓而舍了命。不料该强盗们，见威吓我们不动，胆敢私下号命，各处于二十六日同时下总攻击， 枪声四起，弹如雨点飞向我们队里来，想我们赤手空拳的工人，焉能与此强盗抵抗？在一阵暴（响）之下，唐山方面的工友，被击毙数十人，伤数百人，林西方面，死七八人，伤三十余人，赵各庄方面，死一人，伤七八人”……及各工人的家属往救，亦遭同样的惨击，一时儿啼妇哭，惨不忍闻，死伤枕籍，目不忍睹。青天白日之下，竟在民国里演出此无法无天之惨杀案，公理何在？法律何在？

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的力竭了，我们的声嘶了，然而我们决不畏缩，决不为恶势力所屈服。经此摧残后，我们三万余人的团体越巩固，殊（除）非把我们全体都打死，不然还留我们一人活着，也要为死者报仇，和他决战。缓和是不能够的。只盼望全国各界同胞一致主张公道，从火坑里把我们救出来吧！

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痛告

十月二十七日

五、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第二次宣言

全国各工团体、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开滦五矿，因为生活困难，受迫不过，才起来向当局要求加薪，当局苟具人道主义，就应当体恤工人的苦衷，允许所请。不想他们丧尽天良，视工人如牛马，大施压迫手段，调来保安队数百名，严拿工人，任意殴辱，工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于二十三日全体罢工。不料二十六日早八点，保安队全体出发，武装严厉，向工人示威，百般欺侮，工人只有隐忍不言，彼等想工人为可欺，先用枪刺横穿，继而全体向工人连放排枪数十次，计受重伤数十名，命在垂危待毙者二十余名，悲号惨目，血肉横飞，有心人不忍足（目）睹。我工人对此惨剧，惟有请全国同胞们，主持公论，加以援助，以救我们三万余苦工人于水火之中。现在全体工友益加激奋，非达目的不已。各界同胞们，报界诸君们，主持人道呀！我苦难工友们那就感激万分了。

唐山开滦五矿全体三万余工人同启

（原载《泰晤士报》，1922年10月28日）

六、开滦林西矿工友俱乐部致商会请愿书

……附属六条，申明理由如下：（一）矿底骡马，以前每匹喂养费不过七元，今则十三元左右，已加半数。比较工人，虽已布告增薪，每十元者增加一元，显不如骡马

费。刻因米珠薪桂，衣食费已加三倍之多，工价只加一成，所以我工人未敢承认。(二)五矿煤价每吨长价六毛，与我工人无关系者不必论，我等月煤亦长六毛，已受无形亏损而工价何以不增？显于公理殊觉不平。（三）前因直奉战争之际，所有洋员已送家属离林，我等紧要机关，亦曾辞工逃命，乃当道者百般留阻，应许事后奖励，至今失信未偿，反于布告中巧言保护，何不奖励以符前言？（四）电气台工人吴某，因走电焚伤，焦头烂额，经洋人验明养伤两月之久，不但恤养金分文未给，且停止薪金。此等办法，全球工厂实属罕闻！？（五）锅炉房自上工后，经洋人亲手绞车压毙王朝良人命，身首数段，而洋人工价每月数百元之多，我工人自绞车以来，曾未发生此等惨剧，每月不过十元左右，何苦乐不均乃尔！？可见求增薪金，事非妄举。（六）查外洋矿章，每逢石洞内，发竟磺磷，人皆石棉衣服以保火险。现开滦五矿未备此服，所以唐矿前年焚死四百余人。以后当备石棉衣服。以上所举，证据昭然，此等之事不胜枚举。然于我工人皆大有关系，应有相当办法，方符公允。以外最要问题，开滦未合办以前，所有花红，已行分润，而合办以后，红利未曾提及，至今十年之久并未分发，于诸条之外，当事人应有正当答复。

开滦林西矿工友俱乐部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原载《河北日报》，1922年11月1日出版）

七、开滦五矿暨秦皇岛全体工人对军警殴打工人的启事

……又二十八日，巡警殴打死伤工人以后，再加三条为先决问题：（一）此次被打身死的工人，须按西人被中国人打死的身价同等赔偿；（二）受伤残废，终身不能工作者，须永给全薪养其终身，并须另给医药费五百元；（三）保安警察须立即撤退，并须向工人谢罪。

开滦五矿暨秦皇岛全体三万余工人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日

（原载《日日新闻》，1922年11月2日出版）

八、开滦矿务局及启新洋灰公司全体工人呼吁书

工友们！同胞们！

我们确实是因生活困难，工厂主，洋矿师给的钱太少，不够食喝，迭次哀求他多给几个钱，不惟不准，反压力横加，逼得我们走头无路，没别的法子想，只好大家相率不干。不干也是我们的自由，犯不了什么罪。谁知道保安队对我们就如同土匪，任意开枪，任意残杀，演成十月廿六日早之惨剧。谅大家早已从报端得悉详情了。我们赤手空拳的劳动者，当然只好任他官厅怎样压制，坐以待毙以了这奄奄欲死的苦命罢了。幸喜社会上还有人说几句公道话，警告官厅，帮我们说出种种的苦情来。因此我们这几日

来，心中虽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尚还精神很好，团结得非常坚固，盼望资本家早日来与我们了结。并且同时以为官厅容纳了社会上一般舆论，决议出来做第三面的调解人，定不得来肆意干涉。唉！谁知道近来官厅变本加厉，硬用强迫手段，突于四日晚派警将我们俱乐部占据，同时抓去我们的代表，并掠去会中大宗的银钱什物。这样无理横压起来，将来不知道又要把我们迫到甚么地步？！苦呀！苦呀！我们五万余形将待毙的苦工人，平日被洋人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到现在简直是以亡国奴待我们，毫无公理可说处。工友们！同胞们！这是什么事，中华民国能够这样强权不说公理吗？现我们已处在九死一生的地位，已经被压迫得都不能吐一口（气）。望全国同胞们，工友们，共伸敌忾，快快前来援助啊！

开滦五矿暨秦皇岛、
启新洋灰公司全体五万余人泣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原载《泰晤士报》，1922年11月6日出版）

九、开滦五矿及秦皇岛工人致参众两院急电

参众两院诸公均鉴：十万急，为请愿事。杨以德残杀工人，媚外贪财，请即提出弹劾，依法惩办。窃工人等受经济之压迫，不得已而出于罢工，提出八条，本是最低要求，生活程度所迫，不得不尔也。奈矿务局不顾我工人等之经济即是我工人等及家族之生命，甘心以巨款与国贼杨以德反帝制余毒之保安队，而彼等竟敢甘受之以媚外，于是残杀工人六名，受轻重伤者五十七名。又失踪已查知者三十一名。失踪而未知者尚不知若干也。工人等早已受武力之压迫，众不欲生，此等情形，谅诸公已见诸报端，无须工人等再陈也。然杨以德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复于本月二日，对我工人等宣言，强迫工作，是伊之宗旨，万无更变；如唐山大街有工人三五成群，交头谈话者，均按军法从事。杨以德本一天津警察厅长而已，岂有所谓军法者，且伊之军法何以行使至唐山？更何以行使至于无罪之工人！且秦始皇并未在世，何以残杀工人至于此极？念议院诸公，既负有人民代表之重责，岂能忍数万工人受武力之压迫，以死而不救耶！抑工人等遭此大害，公等尚未有所闻耶？谨此电陈，望诸公早日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否则，工人等绝不受国贼武力之压迫，外国资本家之束缚而不得不自争人格及生活也。是以众志所向，意外之事不免发生，如果流血惨剧愈演愈烈，则工人等绝不敢负此重责也。临电不尽流涕。谨此电陈。

唐山开滦五矿暨秦皇岛三万七千工人同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原载天津《泰晤士报》，1922年11月5日出版）

十、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为声讨工贼的公启

我们秦皇岛开滦矿务全体工人，自高揭义旗，与唐山、林西……五矿同盟罢工以来，办事手续周密，一切举动文明。于今罢工已二十余日之久，曾没一位工友在市面上有所搅乱，故大受舆论所欢迎。然而一般卖国的工贼交通系，无日不仰洋资本家之意旨，来与我们作对。只以无隙可乘，故其奸计终不得逞。不谓于月之十日，忽于洋稽查员 Reckerby（李克碑）率领京奉车头进厂运煤，我们认为京奉车司机匠，亦系中国劳动者，与我们情同兄弟，万不应该受洋资本家的驱使，出此破坏我们的举动。故全体纠察队出而制止，将司机的工友带到俱乐部。该洋员亦随之前来。经我们以大义相责，该司机的工友始恍然大悟，更转恨该洋员不应愚弄他，致有此伤义气不名誉之举动，气恨不过，遽上前批其颊，及经我们恳切劝慰始罢。自始至终，该洋员亲口承认不是俱乐部的人打的他，当时并有京奉车站站长颜景棠、稽查张述三、车房总管钱振山、地面巡警署巡官李德起诸人都在场说和，有耳共闻，有目共睹，当非抵赖，何事后该洋员竟向当局控诉被我们委员某某五人殴打之事实。此显系有交通系的工贼，想因风吹火，借端诬陷，来破坏我们的团体。彼岂不知该洋员所诬告的五人，当此事起时，有的住在唐山，有的住在林西，都未闻知吗？该交通系的工贼，勾结洋人施此卑劣手段，固不置（值）我们一笑，然此种工贼交通系一日不出（除），则吾等工人一日不安，彼以中国人而拍洋人的屁骨，以此欺伪鬼诈的手段，来诬陷自己的苦同胞，虽碎尸万段，亦何以掩其辜。是以我们一面据理辩诬，一面调查此工贼，若一经查明确实，我们即以生命对待他，打死他，万不能留此蟊贼来残害人类。望工友们团体坚固，一致对待，请大家一致来铲除工贼交通系啊！

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矿务工友俱乐部公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原载《新民意报》，1922年11月10日出版）

十一、开滦五矿总工会及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代表向黎元洪大总统请愿及请愿书

开滦五大煤矿工人自罢工以来，计将达两旬之久，溯其所以牵延不能早日解决者，传闻实原于杨以德受外人方面120万元之重贿，愿用武力压迫工人，限两星期完全上工之故。连日杨以德指挥保安队横施压迫，与日俱厉，并于本月四日驱逐工人上工，强据总工会会所，及洋灰工人俱乐部与铁路职工总会会场。除将会内所有文件什物尽行劫去外，传闻尚抢去银洋600余元。最近强拉工人入矿作工。于是工人等十分不堪其压迫，于前日（九日）派出代表10名，来京向政府及议会双方面请愿。据调查所及，该代表于前日下午四时，便手执白旗，上书："开滦五大煤矿罢工代表请愿团"，"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罢工工人请愿团"，"四万六千工人请命"，"同胞啊！国贼杨以德受贿媚外枪杀我们呢！救！救！救！"，"同胞们！外国资本家压迫我们呢！救！救！救！"等字

样，首至新华门见黎总统，次至国务院见王总理。均因时太晚，仅递呈文，未获面呈一切。再次至参众两院和内政部，亦以时晚约以次日再见。此前日请愿之大概情形也。昨日（十日）一早，该代表等复行至总统府，当答以请代表等转见国务总理。在国务院候了一点多钟，总理还不见来，使左右秘书代为接见，当允将代表所有请求均当转达总理云。再次便到内务部，等了两句多钟，才得见孙次长。代表等除将呈文面交外，并略述此次罢工经过及杨以德受贿纵兵之横蛮。孙答谓工人罢工，要求生活改良，此乃世界潮流，杨以德这种对付，是不对的。但各位所请目的，是在将杨罢免，然此非现政府能办到，各位如果坚持非驱杨不可，还请面向直隶省省长处请求云云。至向参众两院请愿事宜，参议院已由议员江瀚等介绍，众议院已请议员童启曾等介绍。不日当正式提出在国会讨论。兹录其呈文如下：

具请愿人开滦五大煤矿、秦皇岛及启新洋灰公司四万六千工人代表董宏猷等为请愿事：唐山煤矿及洋灰工人，前以不堪矿局及公司虐待，为自身生存起见，请求当局改良待遇，未蒙见允，遂致先后罢工，以促彼方之反省。此中经过情形，京沪〔津〕各报载之甚详，谅在我大总统洞鉴之中。罢工以来，于今十有五日矣，工人等既感衣食之困难，复受矿局之虐待，艰苦万状，不言可知。不意处兹悲惨之厄运中，更遭天外飞来之奇祸，上月26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无端嗾使保安队袭击工人，当场击毙工人6名，轻重伤57名，追逐失踪者无算。本月四日杨复令该队拘去工人8名，非刑拷讯，并抢劫五矿总工会，洋灰工人俱乐部及铁路职工会三工团，除所有文件籍据什物荡然无存外，共劫去洋合计600余元。窃念工人亦国民一份子，唐山亦国所及之处，杨为国家官吏，竟弁髦法令，草菅人命，形同盗匪，至于此极，此不独唐山近来之剧变，亦可谓国内所未有之怪现象也。道路传闻，杨之为此，系为公司贿赂所强使，虽事无左证，然观其一意孤行，甘心犯法，不为无因。工人等现处荆天棘地之中，实受人生未有之苦痛。伏念我大总统胞与为怀，必不忍吾数万工人葬身于杨以德一人贪壑之中，用敢掬诚请愿，迅恳将杨以德即予褫职，并治明杀人抢劫之罪，则水深火热之工人，将同庆更生，感戴靡涯矣。此呈大总统。

请愿人：开滦五矿总工会及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代表董宏猷、常振常、梁鹏万、伍有临、万安全、白天柱、刘国才、刘明达、曹子才、邓扬、萧潇

（原载《北京晨报》，1922年11月11日出版）

第二部分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地工会、进步知识分子对罢工的援助

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呼吁全国工人援助开滦矿工与上海日华纺织工人罢工斗争

亲爱的工友们：现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诸位想想，不是军阀与外国资本家横行的世界吗？是的。诸公看了这两桩事件就可以证明了。

第一、唐山开滦五大煤矿，原来是我国的国产，后经庚子之乱，被英国资本家强夺去了。现在可算是外国资本家在我们中国刮地皮的地方了。外国人待我们中国人，真是狗马不如，所以开滦四万多工友为了生活困难，不能不起来反抗。谁知丧心病狂。狗彘不食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受了矿局三百万元的贿赂，竟带兵到唐山枪杀我们工友不计其数。杨贼是不是中国人？今竟对同胞施行这种手段，可恨不可恨呢？设立警厅的意思，原是保护人民的，谁知中国警察和中国军阀都是来摧残同胞呢？！

第二、上海日本纺织工厂，是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开的。是吸吮中国工友（血汗的）一个最大的所在。五月末，该厂工友为了生活困难，起了一次罢工，结果是工人失败。谁知日本资本家贿买上海警察厅，把工友所托命的工会无端封闭。工友屡次要求启封，竟致不理，且出恶言。工友到此水尽山穷的时候，自然不能不起第二次罢工了。中国约法上明明白白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权"，他们把我们天赋的权利，一笔勾消，可恶不可恶呢！可恨不可恨呢！罢工二十余天，外国资本家不得已另出方法，贿买上海护军使何丰林派兵压迫，且以"如不上工，以军法从事"来恫吓我们工友。何丰林是不是中国人？这样摧残同胞，真是狼心狗肺的人了。

亲爱的工友们！请看这两桩事件是不是军阀、警阀与外国资本家勾结？所以我们工友为生存计，为自由结社计，为民族人格计，要一齐起来援助，或以金钱，或以实力呀。我们这五万穷苦同胞呀！我们要高呼：为生存而战，为自由而战，打倒军阀警阀！打倒外国资本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原载《北京晨报》，1922年11月19日出版）

二、安源矿工人俱乐部支援开滦罢工的呼吁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各工团均鉴：开滦五矿工友为改良生活及待遇而罢工。今罢工数日，非独没有得到丝毫的结果，反酷受了洋资本家的蹂躏，利用本国讨好洋资本家的不讲人道的保安队，自相残杀了我们最亲爱的工友二人，并伤害了八人，闻之发指，言之痛心。今我们除实力的经济的援助外，希望全国的工友都应该知道同阶级的利害关系，拿出同阶级的同情心来援助他们。同时更希望我们的指导者——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速即订出计划，命令全国各工团一致行动。全国的工友们呀！赶快起来援助他们，救他们的命。

安源矿工人俱乐部

十一月一日

（原载《华北新闻》，1922年11月9日出版）

三、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支援开滦罢工的通告二则

（一）全国各报馆、各工团，转各团体公鉴：万恶的开滦矿务局的洋资本家，毫无心肝的唐山地方警察署，（对）开滦矿工人的种种悲惨苦楚（的欺压），说起来真要痛哭流涕。庚子一役，英、比将这矿山占为已有，不独到现在他们的工资未增分文，反连从前比较好的待遇一并取消了。试看今日的社会生活程度日日提高，就是他们想要拚命的去作工，也快没有命拚了；就是他们怎样的忍耐恶衣粗食，以维持这牛马似的生命，现在也维持不下去了。迫于万不得已，乃向当局和平要求增加工资，不惟不允，反唆使雇佣的保安队，任意将代表掳去，竟逼成五矿三万多工人总同盟罢工。资本家仍悍然敢为大恶，贿买几千名警兵，唆使唐山地方警察署长下令开枪，痛击工人，当场击毙二名，重伤命在重危者无数。酸心惨目，血肉横飞，凡有血气者睹此，莫不发指。且该地警署长为恶未已，竟电天津王省长指矿工为土匪，凭空捏造，真无心肝，指使警兵肆意在街上阻碍交通，非法已极。平素在唐山抽花捐，奖励赌博，使一般鲜花可爱的青年工友陷入火坑，真是为人道所不许。这种陷害无辜，为非作歹的东西，愿我同胞一致声讨。他们五矿三万多工人，被当局如狼似虎的压迫前来，已到了九死一生的地位，工人们，本工人阶级利益，快快前来援助呵！同胞们！看看恶狠狠的洋人压迫我们苦工人，请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速速予以援助呵！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十月二十八日

（二）全国各工团钧鉴：开滦矿局五矿同盟罢工六天了。此次向洋资本家执理抗争而奋斗，来洗掉几十年惨暗无天日的苛待，稍具血气的人们，莫不高喊畅快而尽力援助的呀！我们职工会和全厂工人们看了他们可怜的情形，心酸泪落，用全体力量来帮助了他们，无食的矿工们拿来还当二三天之粟。众位呀！他们并不是拿罢工当儿戏的。他们的地位，是世界上没有比他们卑贱的矿工了。工作时的工资还不够衣食。他们是卖力气的猪仔，他们的性命比马还贱。烧死埋死，死而无尸。百元的葬费，死了五六百人的恤金还比不上矿师一人的月薪。他们资本家尤以为他们没有马牛这样驯良，请来了杨以德的走狗，如狼似虎的保安警察来强迫他们工作，在街上擅放枪弹，阻止交通，打伤了、打死了几十人。在警察以为打死了矿工，如同撵了一个臭虫一样。可恤呀！可恤呀！眼看这群无衣无食的矿工们，要被资本家杀死了，饿死了。同阶级的工团们，能否给他们些

援助，使他们得增进些人格，得些衣食来挡饿和饥呀！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十月二十八日

（原载《新民意报》，1922年11月1日出版）

四、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为支援开滦矿工痛告全国同胞书

全国各界同胞们：

我们开滦五矿的工友们，因为洋资本家给的工钱太少，不能糊口，不肯白白冻饿死，不得已起来向资本家要求长工钱。这是不是极应该的事？不谓资本家心狠如狼，不但不允从我们的要求，反结交害民贼杨以德，派来如狼似虎之保安队、印度兵数千人，来相包围。想我们劳力换饭吃，是雇佣的性质，我们劳苦终日，挣的钱既不够吃用，当然可解雇不干，更有什么罪。何物杨以德，胆敢仰承洋人的意旨，嗾使其喽罗保安队，不问皂白，开排枪向我们矿工友队里轰击。同时唐山、林西、赵各庄等等工友们被击毙数十人，伤数百人，尸躯倒地，血肉横飞，工人何辜，遇此荼毒？在民主国家政治之下，青天白日里，出此大惨杀案，各界人士，再不起而昭雪，将何言乎公理！何言乎法律！本部同人，热血未冷，不忍视同胞兄弟任人枪杀，决以生命与仇敌相周旋。一为生者争人格，一为死者雪冤仇。凡我全国工友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大家还有良心吗？请一致起来为我们惨死的苦同胞们报仇啊！

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痛告

十月二十九日

（原载《新民意报》，1922年11月1日出版）

五、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为支援开滦罢工告全国同胞书

全国各界同胞兄弟们呀：

唐山五煤矿的亲爱同胞，被外国恶毒的资本家所压迫，已是无法忍受牛马生活，而全体大罢工了。为的是改良他们的待遇，提高他们的人格，别以我们中国的赤子，作他们的奴隶了。

那知该矿主竟以金钱，收买丧心病狂的杨以德，用保安队和印度兵，暗下攻击令，大加杀害，致死亡者已有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哎！杨以德！你是不是中国人一分子？你就图了每月的万元保险金和二十万的借款，对着自己的同胞，下这样的毒手么！你这种该万死的滑头官僚，我们若不教训你，你也不知我们工团的厉害，从今天起，你小心点儿吧。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痛苦同胞，必要以实力援助的，不然是不能战胜洋人的，不能达到目的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先以金钱援助，第二步当以实力罢工援助。如不能打倒这些洋狗、和万恶的杨以德，我们是不歇心的。免战牌是不能高悬的。

本部已捐去现洋三千元，暂救他们的倒悬，如不能得到胜利，我们定是趋向前敌，

作他们的生力军，打个接应战。到底看看洋人、和洋人走狗——杨梆子有多大的气力，分个你死我活不可，各界同胞快快的实力援助啊！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启

附：警告杨以德电：

处长杨以德先生钧鉴：唐山工潮，乃是受外人压迫，不得已而激起的，欲以改良生活和待遇的，并不扰乱治安的。然你用保安队和印度兵暗下攻击令，杀害他们，是什么一番用意？就图一万元的保险金和廿万的小借款，就下这种毒手，作人家的走狗，伤害自己的同胞么！请你快快改过自新，将你的保安队，急速撤回，免了你的罪恶。不然激起公愤，将你的饭碗摔了，再作你那糊信封的旧业去，可就有点悔之晚矣。

今天从敝部的团体说，是不赞成你这种行为的。若长此不改，别说有些对不住你啦！专此祝你快快改过。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原载《河北日报》，1922年10月30日出版）

六、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为声援开滦工人罢工的电报三则

忆自开滦五矿罢工以来，迄今已逾浃旬。工人之呼吁，长官之布告，议员之质问，无日不披露于报纸篇幅，乃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发出快邮代电三则，与矿工以同情的援助。爰录三电于左：

（一）致全国同胞电：万急。北京晨报、京报、工人周刊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新民意报、汉口日日新报、江声日报转全国各报、各劳动团体、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们钧鉴：此次唐山五大煤矿工友同盟罢工，既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复遭杨以德之保安队惨杀。乃杨以德更复丧心病狂，并封闭矿工友俱乐部、占据京奉路唐山职工会。我等闻讯，义愤填胸，夫我神圣不可侵犯之工人，焉能认其荼毒？除急电国务院，请其撤职重惩；并参众两议院，请其弹劾杨以德外（电文另呈），并电敝总工会所辖之各分会，嘱其分途劝募巨款，以资援救外，尚望各界人士，本怜人恤弱之心，极力援助，或捐银款、或划良谋，拔唐山煤矿工人于水深火热之中，则我工界其幸甚。谨此电闻，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叩

十一月十一日

（二）致全体阁员电：万急。国务总理暨各阁员钧鉴：此次唐山五大煤矿工友，因生活困难，受不住外国资本家压迫，迫不得已而同盟罢工。他们衣（食）不饱，居不安，展转哀呼，惨不可言状。罢工后更家无储粮，衣无重衣，此种惨苦，人民当局者，理应如何保护？乃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人面兽心，甘心作外国奴，宁肯为洋资本家之

走狗，受了资本家之金钱运动，驱使那如狼似虎的保安队，来残杀我手无寸铁之苦同胞。唉！国以民立，民依国存，总揆诸公，当以爱民为重，何得任彼罪恶滔天之杨以德越境害民，彼之所以敢大胆妄为，无非是借着洪宪余孽所制成之治安警察法，为之保障。试问现时之国，民国乎？抑帝制乎？矧诸公而认为民国也，则倚帝制法律为保障之叛徒，当即行撤职，并苛以殛刑；而帝制余孽所制之法律，亦理应即时废止，望诸公以保国爱民为重，速即抚恤唐山五大煤矿罢工工人，将杨以德撤职重惩；并取消治安警察法，全国幸甚，工人幸甚。迫切陈词，无任待命之至。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叩

十一月十三日

（三）致国会议员电：参众两议院议员诸先生钧鉴：唐山五大煤矿工友，因饥寒交迫，生活维艰，外人之压迫横施，自己之呼数毋效，逼着他们无路可走，不得已而同盟罢工。罢工固甚正当也。这种可怜人，在罢工期间，其苦更甚往日。当道者理应极力保护和援助才对，乃丧心病狂之杨以德，甘心作外国资本家之走狗，驱使那如狼似虎之保安队，以来残杀我手无寸铁之苦同胞。唉！工人何辜，遭此荼毒！窃思杨以德之所以敢胆大妄为者，乃借洪宪帝制余孽所制定之治安警察法，为彼之保障。故越境乱为，残民以逞。我等素仰诸先生公正廉明，咸以依据法律，伸张公理，保护民权为己任，故此电达诸先生，请即弹劾、重惩、革除胡作乱为之杨以德，并取消非法之治安警察法，全国幸甚，工人幸甚。

京汉路总工会筹备处叩

十一月十三日

（原载《新民意报》，1922年11月16日出版）

七、粤汉铁路总工会为支援开滦罢工的快邮代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各工团各界同胞公鉴：开滦五大煤矿工友被洋资本家残酷的压迫，是何等的悲惨！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底记载援助，纸不绝云。稍有良心者，谁不为之痛心疾首，泪下心酸。煤矿工友奋勇争斗，在罢工期内，忍饥耐冻，秩序井然。不意万恶的资本家，以非我族类相待，大肆其鹰鸷毒螫之手段，打死矿工二名，拘囚一名，受重伤而未及死者不计其数，演工界未有之惨剧。此等举动，殊属惨无人道，令人闻之发指。敝会本阶级互助之精神，不忍坐视，除急电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工会分途捐款，予煤矿工友以实力的援助外，谨此通电，务望全国各界同胞，一致声讨，予煤矿工友以绝大的援助，驱除万恶的资本家，救工友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为至盼！

粤汉铁路总工会

十一月四日

八、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为支援开滦罢工的通电四则

（一）致全国同胞电：天津新民意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北京晨报、京报、顺天时报、上海民国日报、时华新报、申报、中华新报转全国各工团父老兄弟姐妹们：唐山开滦矿务局与洋灰公司三万多苦工友，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摧残，连牛马都比不上。如今起来为争人格，争人的生活，向资本帝国主义的洋鬼子宣战了。而我们号称民主的中华政府，不独不救助我们苦同胞的生活，反调来军警大加厮杀，真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御用人、刽子手。至今我们唐山的苦工友，仍被围困于枪刺之下，子弹之中，无出生之路，呼号乏门，死者十数，伤者百余。盼望各地工友暨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一致声讨吴政府与住天津洋鬼雇用的刽子手杨以德，援救我们三万余苦工友，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呵！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启

十月二十一日

（二）致开滦工友电：

天津新民意报、益世报、北京晨报、京报转唐山开滦矿务局与洋灰公司三万余工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残如狼，毒如蝎，侵略我们中华之权，掠夺吸收我们苦工友血汗。恰不致死以继续作他们机器的附属品。我们亲爱的工友们，如今觉悟了，团结起来与这些人类大敌作战，是为我们争人的生活，阶级斗争的表现。尚望坚持到底，胜利就在眼前了。努力呵！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启

十月三十一日

（原载《新民意报》，1922年11月2日出版）

（三）致政府电：大总统、国务院、内务总长、暨参众两议院钧鉴：唐山开滦矿务局工友，因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而罢工，详情已载各报。杨以德始则纵警兵残杀工人，继则借封闭会所抢劫。民国官吏，如此横暴，视国法如弁髦，人命如草芥，演出此空前残〔惨〕剧，工人等闻信之下，愤激异常，全体一致公决：请大总统、国务院、内务总长暨参众两院，申张国法，速治蟊贼杨以德以杀人抢劫之罪，则我们亲爱的苦工友可得庆更生，亦申张国法威信之时也。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叩

十一月十六日

（四）致全国同胞电：天津新民意报、益世报、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汉口江声日报、真报转全国各报馆、各工团暨各界同胞鉴：唐山开滦矿务局工友及启新洋灰公司工友罢工，已被蟊贼洋狗杨以德杀伤百余名，本与全国各工团及其他团体与舆论界已警告该贼，不料该贼仍继续媚外而求奖，竟于本月四日，将唐山铁路、洋灰、矿务三大工会封闭；并同时派军警压迫工人上工。不是洋走狗是什么？盼望全国工团、同胞、舆论界主张公道，速救三万数千余苦同胞的命，共讨洋狗杨以德，是所切祷。

津浦铁路机务同人参考机件联合会浦镇分会

十一月十六日

（原载《新民意报》，1922年11月18日出版）

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支援开滦工人罢工的启事二则

（一）现在唐山有三万被生活压迫的工人罢工。他们的矿主（外国人）用高压手段压迫他们，请杨以德派五营以上的武装警察打他们，杀他们。同胞啊！中国没有亡，这三万苦同胞已被外国资本家压迫死了。同胞们！快起来援助你们兄弟啊！赶快捐资援助吧！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十月三十一日

（二）本会上两星期因开滦矿工罢工之事，曾发出通告募捐援助。兹有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我校学生会，并有工人代表来校接洽。顷因学生会尚未组织就绪，本会乃权派会员代为接洽一切，并介绍与本校大多数同学所组织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接洽一切。兹特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及北京开滦矿工经济后援会之宣言书登出如左：

1．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来函

径启者：敝处唐山工人三万余，因生计压逼，迫不得已，要求加薪罢工以来，已三星期有余，而仍无良好结果。现有矿务局工人代表董君鸿猷特来贵校报告详情。素仰热忱，想定有相当援助也。敝校同人不揣冒谬，敬代介绍此请学生会会长先生大鉴。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

总干事　李鸿斌

书　记　张创鸣

蔡　牖

十一月十三日

2．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宣言

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姐妹：

近来不是发现一桩人吃人的举动么？开滦矿洋资本家置我国矿工同胞四万六千人于饥饿冻死的地步么？此次矿工罢工的原因，实因平日遭洋资本家的牛马待遇太深，加以食料物价日涨，原定工资实难养活。请求洋资本家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又被严词拒绝。且不但不允许他们的请求，还要贿买洋人走狗杨以德派兵弹压，对于工人惨加杀伤。可见洋资本家有意乘矿工之危，使他们累死、病死、冻死、饿死而后已。各界同胞！这不是洋资本家实行吃人的举动么？矿工同胞至此，乃誓守"生不如死"的志愿，不得已演成此次凄惨的同盟罢工。

矿工同胞现在忍饥耐寒支持一月了，洋资本家还是狼心狗胆要矿工做牛马，不承认他们正当的最小限度的要求。但矿工方面因得各省的援助，暂未冻饿至于死地。而洋资本家因塌矿停工之损失反达数百万。

各界同胞！天灾水祸，固须踊跃赈助之事，此次洋资本家有意残害同胞，吾人更应如何援助，完成矿工同胞罢工最后胜利。

同人等义愤所迫，爰乃组织此会，向各方面募捐，维持罢工同胞罢工期内之生活。所得之款，悉数汇往开滦各矿工处，以资救济，若有同志自愿加入合作者，尤所欢迎。本会通信处：北大第一院收发课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转自《五四运动文辑》）

十、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支援开滦工人罢工的公告和传单

1．公　告

全国各学校、各工商团暨各报馆公鉴：欧战告终，真理显彰，世人皆知，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非武权之为力，实劳动之为功。而彼致和平造幸福之工人，处此物质文明生活高昂之世界，加以资本家之苛待，外界之藐视，反恩人为奴隶，天下至不公平者，莫甚于此！欧美工声，日甚一日，奔走呼吁，以谋增工资、减工时之胜利，辄以极大之牺牲，达其最后之目的。迩者吾国开滦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行之曙光也。夫矿工为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匐暗道中，面目黔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天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悯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彼工人宣言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替接，以示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日前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唐，复用种种威言，恫吓工人，冀其屈服开工。身为厅长，不察事理，反一味袒护矿局。然各工人已饱受资本阶级之苦虐，此次忍无可忍，不得已而出此举动，是以坚持到底，非达目的不止。夫劳工

神圣，人所共知，矿工为同人辟利益，原为我人增幸福，其服务于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中，所处之重要，知矿工所受之苦痛，即当与以特别之同情及援助。且该矿工所请条件，皆出于至诚之心，实至微之要求，所谓让步极矣。今矿局以图利心切，拒绝要求，且以武力压制，我人纵不愤矿局之斫丧天良，独不悯工人之痛苦乎！同人等肄业唐地，闻见较详，爰本赈助之意，谨为工人略述苦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罄极，维持困难，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囊慨助，敬请早日赐下，并请汇寄敝会会计贾存鉴代收。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谨启

（原载天津《泰晤士报》，1922年11月16日出版）

2. 传　单

我不替矿工伸冤，
谁替矿工伸冤？
我不为矿工后援，
谁为矿工后援？

我们可怜的矿工，整日价入死出生的到十八层地狱下面去取煤，弄得三分不象人，七分不象鬼，来为我谋利益，为资本家赚金钱。吾等应如何扶助他们，资本家应如何感谢他们，报偿他们，方于良心无愧。这次他们迫于生计艰难，直到万不得已地步，才起来罢工。照理而论，矿主应该如何体恤，酌加工资，方不负饮水思源的本意。谁知此大资本家，欲壑难填，不但一毛不拔，反大用他的压迫手段，叫杨以德主使保安队，放枪打人。现在我们眼看着这些工人，无告的同胞，要被那恶犬毒蛇咬死，竟置之不问么？能放回矿工的第一是矿主，第二是政府。这些工人既不幸遇着了这恶狠的矿主，又不幸遭了政府的凶横爪牙。倘我们不为他们伸冤，不为他们的后援，他们简直是白白饿死了！困死了！我想我们既有人心，岂可不加援手呢？他只有我们是救星了。起来罢！起来罢！大家起来罢！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

（复制卷1.6/1，68页，）

第三部分　社会舆论

一、响导周报第十期报导唐山学生援助罢工的情况

近旬唐山四万多罢工的苦同胞，被外国的资本家与军阀压迫和残杀，这样一桩被压迫民族的大事体，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如京津泰晤士报、字林西报等——总想捏造一些“红色煽动者”的谣言，来麻木中国人的感觉。所以近在咫尺的唐山学生

对于罢工同胞之态度怎样，乃为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民族感情和义愤的试金石。

据今日消息，唐山路矿大学学生三百余名，为援助罢工，于十三日在街市巡游，募集罢工基金。这样的消息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而且是中国知识阶级到了真正觉悟的路上之明证。全国压在国际帝国主义下的知识阶级和学生们，都要学唐山路矿大学学生的模范呵！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二、新民意报报导北京各团体援助开滦工人罢工情况

自唐山矿工被该地军队惨杀消息传出后，北京各界人士对之颇为感动。兹闻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于昨日常会时，主席提议捐款援助，当即有新自唐山归来之某君报告枪杀工人的详细情形，大意与京内报载情形相同。惟矿井内部现尚有极少数（每井五六人）车水工人，被兵士强迫作工，终日不准出井口一步。矿内拉煤车骡马因罢工无人照管，死亡枕借为状甚惨。至于罢工人数实达三万七千，情形极危者为千余包工工人。盖彼辈纯系包工营生，计日而食，毫无积蓄故也。据闻矿局对于此次工潮，处心积虑，欲以极残忍之饿毙手段对付，一面虐杀工人以寒其胆；一面迁延时日以待其自毙。在彼等推测以为工人决不能支持五日之久，故态度极为镇静。工人方面则以屯储之煤，转瞬告罄，如再坚持数日，京津铁路工厂将大受影响，而煤矿本身亦将蒙极大损失，于是四处劝捐，决为最后之奋斗。结果当地铁路职工会慨捐千八百元，山海关团体亦助巨款。上海各工团，广州海员会，汉口工团联合会，郑州铁路总工会，萍乡矿工工会均于日前来电赞助。工等遂分途劝募，不日巨款毕集，将更有一种新发展云。报告毕，即讨论进行办法，决议下列各项：（一）成立募捐队十队，分途向各界劝募；（二）宣传英人残酷行为，唤起国人注意；（三）募款队每日出发劝捐；（四）结合各团体成立唐山矿工罢工后援会。今日西城南城一带均有该游行队踪迹，后援会即于日内开成立大会。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三、华北新闻报评论：开滦矿罢工风潮之评议

资本家对待劳工，固恒以高压手段。开滦煤矿以外人主持故，其压迫当更甚一层。近年来虽曾作了几件嘉惠工人的事业，要其欺压手段未尝稍一放弃。此次五矿联合罢工，其远因在改良待遇，其近因则为代表被拘，即该局来函亦承认请兵弹压。此足概见其待遇工人如何。而风潮之扩大未始非激之使然也。工人于罢工前后之要求条件，并不算苛。该局每年赢利三千余万，均工人劳力所得来，衡情度理，宜稍示优待，今仅加薪一成于其他条件概置不提，以此而求风潮之平息，其何可得。再就今日社会生活论，百物无不较前增价半倍，罢工故纯为生活起见，而遒指为受人利用。工人实出于迫不得已而罢工，（资本家对工人）之痛苦根本抹煞，甚欲借文字之力，引诱工人上工，工人虽愚，当亦不为所欺也。然则该局果欲使风潮速平，舍放弃今日之主张，而予工人以满意

外，殆无他途也。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四、蒲伯英等三十名议员为开滦矿务局勾通军警惨杀工人提出质问

为质问事，窃查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早已发动多日，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冀求解决，反用武器压服，以至迁延至今，愈趋险恶。近更据北京各报登载唐山通讯，谓开滦五大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日形扩大。事缘本月二十四日，林西矿务局洋人以风潮尚未平息，乃设计破坏工人团体行动，私买少数工人到局工作，旋被罢工工人制止。虽经杨以德派来之保安队在场弹压，仍无效果，于是该洋人复往马家沟雇来百余人，用火车装载，向林西开来。此时工人等相率横卧铁轨之上，以要求停车。保安队便令火车司机开往，该司机因不忍残害自已同类，遂停车不进。此时车上马家沟工人，亦不愿再往林西，并令原车驶回，旋即在马家沟召集全体大会，议决于二十五日举行同情罢工。廿六日唐山启新洋灰厂工人，亦有同一之举动。而唐山铁路及纺织两厂工人，现亦拟罢工援助，共同呼吁。故罢工风潮之范围愈扩愈大。又谓先是路局方面，见风潮发动，异常着急，于是议决采用武力对待手段，遂辇大宗现金，送给当地保安队及天津杨以德，请以其兵力干涉，以至演出此次横杀工人，大背人道之惨剧。据实际调查，该路局用重利利用马家沟工人以破坏工人罢工团体之政策，已归失败。而附近各地工人又复纷纷响应援助，遂不惜倒行逆施，故有此举。事缘二十六日晨六点钟，该地罢工工人自行组织之罢工纠察团，是日适在西大街守望，路局方面，即令保安队驰赴驱逐工人，工人不允，保安队即不问理由，立即举枪施放，计当场击毙工人二人，纠察团亦被捕拿。事后调查，除当场击毙二人外，受重伤者八人，失踪及轻伤者尤不计其数，并当肇事时，全市秩序大乱，行人断绝，商店闭户。以上各节是见诸京内各报所登载者。而复询诸该地来京之人，据其所述亦大致相同。彼此参证自属实情，且同欲在该地罢工人数达五万有余，因变起仓卒，毫无准备，路局对之既同仇敌，而工人又因横受压迫，宁死不屈，目下聚处旷野，饥寒交迫，呻吟待毙，惨不忍闻。惟稍有热心志士，代为奔走呼援，而杯水车薪，补救匪易。忖思我国近年以来，因灾祸之荐臻，以至物价之暴涨，即素属中产之家，亦莫不觉生活之困难，而专以劳力作商品之贫穷工人，尤其特别感其痛苦。故年来各地工人罢工风潮连续不辍，然查其内容，无非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以图谋生存耳。尚不能说及如欧美劳工运动间有为政治作用而牺牲者也。无如我国当局匪独不体恤下情，反遇事操之过激，往往因区区之劳资争执问题，而至演出流血之惨剧。如上月之粤汉铁路及此次之开滦五矿尤其酷者也。不思社会因产业之进步而生活增高，工人因生活之增高而感受痛苦，以至于万不得已，乃出于同盟罢工，此固是正当之举动，而亦事势之必至，情理之当然。故欧洲产业最发达之国，首推英国，而工人同盟罢工风潮亦以英国最多。然每次罢工风潮，政府亦只立于仲裁地位，从未闻有对待手无寸铁之工人，如临大敌，而施以横暴之行为者。况查开滦五矿创办，悉起自国人。闻当时矿局管理尚称完善，且开办伊始，无甚把握，而工资待遇反比优良。自开平矿局改

隶英国，继滦州公司与之合并，所有大权尽移外人，彼只知饱其私欲，何计害及我国同胞，是以该局规章所定工人生命之价值不及一驴价值之高，其贱视我国工人，可以概见。又据该局近来报告，年出良煤二千五百余万吨，实获纯利金三百余万。试思此每年之三百余万纯利金，非现在惨被杀伤及横受摧残之五万余同胞出生入死，自亲牛马之役，甚至牺牲性命所得之结果耶？在矿务当局，不念工人之勤劳，对于工人区区之要求，犹靳不与。既属出乎情理之外。彼军警当道，利令智昏，不惜率兽而食人，尤为国法所不容。即同属雇用之林西矿局工人，恃势而企图破坏工人团体行动，亦殊属非是。方今国会重开，法律彰明，究竟政府对于保护劳工，有无诚意？矿局勾通工人，毒杀矿工，是否合法？地方行政长官，动辄派兵惨杀工人，究竟根据何项法律？洋人破坏工人团体行动，是否契约规定？否则，立请政府一面先行派兵驰赴该地，抚绥工人；一面对于杨以德，开滦煤矿务局及该局洋人等，任意纵兵杀人，公然破坏工人团体，皆属目无法纪，均应一并严行查办，分别惩撤，而此无告之数万工人，庶不至旦夕辗转于沟壑也。谨依法提出质问者，限三日答复。
提出者：（署名略——编者）

（原载《大公报》，1922年11月4日出版）

五、河北日报报导罢工中的工人情况

记者踯躅道上，过矿工俱乐部前，见人山人海，万头钻动，蚁聚俱乐部门首者，均矿工也。部前墙高数仞，贴粘各地工团及其他团体捐款纸条几满，所书均系某地某团体捐款若干；特此鸣谢等语。细察工人虽多鸠形鹄面，衣冠不整，然精神焕发，与平日作工时大异。彼等据邻近一小隙地，为露天会场，即就其地领取食物。每天上下午各有讲演大会，轮流讲演，内容无非是激动大家坚持到底，求得最后胜利，及报告各地往来函电援助等事。每一次讲演辄至三四小时，鼓掌喝采之声不绝于耳。彼等更组织纠察队，遍地设岗守望，或巡行街市，甚至排解纷争，代行警察职务，其纪律之严，俨然节制之师，殊令观者，惊赏不置。闻该部除公开会所外，尚有秘密办事处数处，虽同属会中执行委员，彼此所居之地尚不互相知道，故其发号施令灵敏迅速不可捉摸。以上所记，乃其内部组织之大概情形，惜记者未能尽探其底蕴以饷阅者耳。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六、北京晨报：开滦工潮愈趋险恶

唐山开滦矿局自从罢工以来，工人已经数次受保安队的摧残了。工人近来秩序虽是照旧维持，但是存粮用尽以后，难免要惹出别的乱子的。前者杨以德亲自到了唐山，强迫工人上工，工人因未允许条件，所以没让杨以德露脸。前天杨以德才从唐山回来，便把天津新闻记者召集到警厅，说了一些漠不相干的话，并且嘱他们不要登载工人的传单等件，免得工人得了胜利。今天（13日）早晨，又把从前在唐山拘捕的工人代表13人押

送来津，杨以德于本日上午8时到堂，亲自询问。因为得到别人给礼和的信，说他信里有罢工的嫌疑，所以第一便审尚礼和。礼和供称，他是唐山开滦矿的工人，别的没有什么可说。杨以德拍案大叫道："你还不照实招来，你的证据，我都搜到了"。随即让巡警从屋内取出两个茶碗，倒放在地上（即碗底向上），立时把礼和的裤子挽起，好使他露出膝盖。让礼和跪在茶碗底上。起初礼和有意不从，杨以德喝令，拿出马鞭，向礼和身上痛打。礼和受痛不过，只得跪在茶碗底上。我写到此处，心里已经不晓得有多么痛苦了。不知阅者有感否？！后来，杨以德又向礼和说："你是不是过激党派来的"。礼和说："我本是一个工人，没有什么人派我不派我"。杨以德又怒道："嘿！你还不承认啦，刑罚还是没有上够。"于是便命令左右，取出一根铁棍（重量总在15斤以上），强迫礼和双手举起，礼和因二次被马鞭打着，自当又举起来了。后来又问了几句，礼和始终不作声，杨以德也气了，随即退堂。令科长等代理询问别的工人代表，无甚结果而散。……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　录

一、罢工前京奉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致开滦机器房工友函（译文）

机器房列工友：

我们此次举动，（指唐山制造厂职工的罢工斗争——编者）虽说没得到圆满结果，但证明团体力量足以谋共同利益。要团体结得好，千万彼此连成一气，才有力量，才可与有产阶级奋斗。近闻你们工友中正在活动时期，井下工友正在努力进行。快快都起来干干。不要骇怕，也不怕损失甚么。只要组织得成，不论甚么利益都可以得到。你们生活也太苦，何不起来干干呢？你们有举动时，（我们）决计派人前来帮助一切。我们经过这次风潮，也知道一点团结组织的方法了。特此奉告，敬祝努力。

京奉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开滦总矿师1922年大罢工报告书的中文译本，第31——32页）

二、开滦五大厂矿致开滦工友传单（译文）

诸位工友们呀：现在机会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劳动工人各处都结合团体喽。现在，仅我们开滦的工友们仿佛象一盘散沙一样，所以屡次要求加薪，都被上司侮弄与压迫。如今京奉路已结成团体了。须要晓得，我们工人系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我们应该同他们联合一堆，结合成一个工人总团体，将来凡事有了后盾，方不致受资本家苛待与压迫。诸位工友们呀！快快醒来吧！大家组织仿效吧！敬此奉告，恭候努力。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开滦总矿师1922年大罢工报告书的中文译本，第32页）

三、罢工期间工人的内部组织

这一部分文件是1922年11月14日“大中华商报”所登载直隶全省警务处给各报馆的信的附件中摘选出来的。那些附件很凌乱，有的有头无尾，有的内容不明确，但从下面的几篇不完整的文件，说明了罢工期间工人的组织和纪律，是非常良好的。

纠察部：系纠察外奸乘机入厂毁坏厂中重要物件。

所有纠察员应尽力纠察，听从部长调派，不得擅离职守，最注意维持自己秩序。

调查部：调查内外奸细，如遇有破坏本会进行事宜，应即报告调查部长，再由部长传达委员会。

（一）罢工期间，本会人员应听本委员会命令。

（二）罢工期间，本会办事人员应每日集合一定地点。

（三）罢工期间，本会人员不得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在街上乱闯。

（四）罢工期间，本会人员如未得委员会正式上工通告，本会人员不得私行上工。

* * *

兹将本会人员公决条件列左：

凡系本会人员应须恪守下列规约：

（一）本会一切事务，由委员会议决后，由委员长执行；

（二）本会会员一律应服从委员长指挥，如无命令，不得私自行动；

（三）本会各职员应遵守职责任。

* * *

第十一牌

黄殿魁 刘溯本	代表正 副	二名
刘盘英 刘　富	纠察队百人长正 副	二名
王庆棠	调查员长	具名十人
王明舫	第一团长	十一名
王庆臣	第二团长	十一名
王庆福	第三团长	十一名
□□□①	第四团长	十一名
陈俊连	第五团长	十一名
刘庆玉	第六团长	十一名
陆凤阁	第七团长	十一名
刘殿功	第八团长	十一名
高　磁	第九团长	十一名
刘芳有	第十团长	十一名
丘鸿书	第十一团小人②长	十一名

① 原报纸破碎，无法辨认。

② 原文如此。

赵　秀　第十二团小人长　　　　　　十四名

总代表先生台照

黄殷魁
刘湖本　呈　禀　　九月十一日

（原载《大中华商报》，1922年11月14日出版）

四、进步知识分子和罢工斗争

下面这两封信，是知识分子参加工人运动的片断材料，它的人名无法查对，所谈内容有的也不大清楚，但是对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如何放下架子参加工人运动的思想动态，有一定的介绍，所以附载如后：

1．永慈兄：

别来北京，已经一月，未作一函，歉甚！我现居朋友处，事还没找到。虽住了这样久，也没见什么新闻，可以供献于你。只有双十节那天，看见一个七八万人的国民裁兵大示威运动。什么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张旗加入了这种运动。又有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发散传单多种。我看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大加活动，在湘省更恶的政府下，恐怕不能这样自由。黄厂被杀呀，劳动工周刊被封呀，便是一例。但是现在不知道政府方面，也有点觉悟了没有。我因为没事，对于此种问题，就在报纸上稍微看了看，那报纸上载的罢工风潮，几乎全国鼓动，皆能得胜利。这也是现在被压迫的工人的自然现象呵！这样看来，中国要变成一个苏维埃俄罗斯的国一样，怕也不难了。我在长沙，你说黄校有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分有两派，我因无研究这事之必要，也就没过细问及，现在还是够不上党派的资格，所以还是不加入。但是处在廿世纪时代，新潮日进，也就未免引起我也要来考察他一点大略。所以扶着笔写信与你，就写了这几句无多大意思的话。来信呀！贵校对于这种组织的构造怎样？内容如何？并问你对于现在的观看抱一种什么态度？你能答复我的问题吗？能够来与我谈谈分外的事情吗？

2．礼和兄：

你是我知道的，已将知识阶级小资产的心理完全去掉了。我现敢介绍你到职工会去听差，要知道我在此虽为他看得起，其劳苦比听差还高十倍。我在此万难久住，现官厅所严密的探访，所以决计回北京，休息几天，和他五矿定妥了简章。以后或再来此宣传？

我看你可速来，我已和勤培说妥了。祝你努力。

（对人不要露书生面目，宜特别殷勤穿工人衣，千万不要说你已到过俄国，只说从前某处听差就可以。）

弟　先瑞上

二十号

（原载《大中华商报》，1922年11月14日出版）

五、开滦总理杨嘉立致滦州矿务公司董事会伦敦开平公司秘书的信（译文）

依照我12月14日的函中所允诺的，兹将总稽核关于最近罢工的财政状况报告一份奉上，请董事会查照。

使人注意到此次罢工意外的直接支付的开销是181，563.94元，同时总稽核估计总损失包括售煤与直接支付的开销共为746,000元。此项损失自然不是精确的估计，但是在我的判断中要比此数更大。除10月与11月售煤直接的损失外，车皮已被分散，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直到目前，由于罢工的影响，我们仍在实际上遭受一定限度的损失。

关于成本，总稽核的数字指出，在各矿因为在罢工前提出的，以后为工人所接受的增薪结果，可以预计每吨煤的成本永久增加0.1125元。我们所已经给予的，和我们必须准备随时给予的小的让步，会使我们的成本更为增加。关于这方面，我附寄最近公布的关于工人因公受伤的抚恤金问题的通知一份，请董事会知照。

秦皇岛成本的增加，大约可按每出口煤一吨增加0.025元计算。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

（复制卷1.6/8，46甲，原卷14.2.14.10——11页）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

刘少奇　朱少连

（一）弁　言

自产业革命以后，机器的发达，渐将社会分成劳动与资产两大阶级；机器愈发达，两阶级的界限愈分明，两阶级的利益愈背驰，劳工解放运动乃随之而起。最近数十年中，西欧劳工阶级皆各组织团体，联成一气，向资产阶级宣战；或已取得政权，实行劳农专政，或已养成伟大的潜势力，仍不断地向资产阶级进攻。中国产业发达较迟，要求解放的呼声，直到最近数年中，才从久被压迫的劳动界中发出来。自从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工会运动与罢工运动乃层见迭出，而武力解散武力压迫亦随之而至，这可以证明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发达之速，势力之大，社会上一般人的视线也不容不转向于这一方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会运动及旧年九月之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在这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实，详细的披露出来，聊供伙伴之借鉴，借叨明者之教益。

（二）黑幕重重的萍矿与株萍路

萍乡安源煤矿为中国最大产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开采已二十余年，产量极富，据估计约包孕有五百兆吨之多。其采取方法，悉仿西制，电车驰骤，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全矿雇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须增加），内计窿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每日可出煤约二千余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出煤焦，除略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余均由株萍、粤汉两路及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大冶，以供两处钢铁厂之用。

萍矿原来之工作制度，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俱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头之下作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力，乃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头阶级之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与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

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

工头收入既如是之丰，则欲相安于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否则职员固可上下其手，使工头不独无红利可图，且将大折其本。工头与职员于是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买空”、“做窿”、“买灰”等弊，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

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至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

萍矿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二时。工人皆系成年工人，惟一小部分之学徒及守房子送饭等工人为童年工人，女工绝无。矿局对于工人生活的设备，极不完善。窿工有食宿处四区，计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须住四十八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每屋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房中床俱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诚一“栖流所”之不如！窿外工人亦稍有寄宿房屋，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陋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实为世间绝无而仅有者！诸如此类，均非生人所能堪。余如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卫生方面，设有一萍矿医院，然亦仅潦草塞责，司其事者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屠夫耳！

萍矿当局对于各职员工头对工人之无理打骂及无情剥削与压迫，初不加以制止，时且助长职员工头之威风以对待工人。以故萍矿职员工头得任性而行，毫无忌惮。其中重重之黑幕，实有非吾人所忍言者！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蔑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

株萍路局工友共有一千一百余人，工作制多系点工，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工人教育及卫生之设备各种，亦均付缺如。

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三）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俱乐部的成立

安源工人向来并无何等之组织。间亦有结兄弟及同乡会等小结合；但此种小结合于工人利害初无何种意义。年来因潮流之澎湃，工会运动及罢工运动既已弥漫于全国，安源工友之较为明了者，因之亦渐感本身痛苦之难忍与四周形势之可图，遂有意顺应此种潮流而谋自身之解放。

民国十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特托人介绍安源路局火车房数工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

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适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九月（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派人到安组织分会，路矿工友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之组织是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友，对于此地久受压迫困于地狱中的大多数煤矿工友，不免有向隅之憾。此间一部分较觉悟的工友渐觉此种贵族式、排他式的机械会，绝对无发达之可能，遂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书记部因是乃决定在安源办一工人补习学校及国民学校，特派李能至及蔡增准充当教员。学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成立，校址设于安源五福巷，这便是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斯时工人夜晚至校补习者有六十余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李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此外并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连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接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三月十六日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出筹备主任；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即由发起人李能至、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出示保护，当蒙批准出示在案。因官厅之保护与发起人之宣传，俱乐部遂稍形发达，乃迁入牛角坡五十二号。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当日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工友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并演新剧及他种游艺，借娱群众。

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良以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

（四）"挺而走险"的大罢工

十一年七月，湖北汉阳铁厂工友因所组织之俱乐部为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且获胜利。安源工友得到此项消息，甚为惊奇。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矿局路局方面初对俱乐部甚不注意，及汉阳铁厂既罢工，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俱为不安而思有以消弭之。又因汉阳铁厂之罢工，乃由于武力压迫铁厂工人俱乐部而起，以故对于俱乐部虽十分恐惧，但亦不敢径行压迫，遽尔封禁，只得以笼络手段假意敷衍。此时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已去长沙，部内办事人除朱少连外，尚有蒋先云、蔡增准数人。矿局当时系副矿长舒楚生握权，舒遂亲身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面恐吓蒋、蔡等，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言，希用笼络手段，借保无事。但彼时蒋、蔡等皆未为所诱动，反向工人大为宣传，谓："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俱乐部乃以此事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

事件日夜在俱乐部宣传，每日分做数处演讲，工人之来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空气愈造愈浓厚，形势愈趋愈严重，资本家恐惧之余，破坏之手段乃立至。

舒矿长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险恶，不得已乃邀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九月七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萍，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为同学）并加恐吓，促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次。他们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长沙到安源，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徐海波，沈开运等知诡计不行，乃请萍乡县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此时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忙请李能至不要发表萍乡县训令，并承认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的多数工友，并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如下：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

并限于二日内完全答复。俱乐部在此二日内，即竭力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宣传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此时群众激昂，已无可制止。及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一面即准备各项手续以谋最后之对付。当日路矿两局虽一变从前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具体答复，但尚圆滑，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至此俱乐部复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同时又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略谓："……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罢工行动，这时已勃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并声言："若本日下午四时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并本月饷银不能答复在十五发给，即行罢工。"同时矿局窿工及各处工人也都跃跃欲动。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县告示还未到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时为一九二二年（即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也，俱乐部部员时仅七百余人。

（五）罢 工 以 后

先是工友既如此激烈，俱乐部已知非罢工即无法解决；但深恐万余工友不能齐心，又恐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己部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皆有把握，且情势已迫，故于十三日夜将各处罢工命令，分别

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洲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三时，矿局东平巷电线忽然断绝，运炭电车不能行走，各工友皆已知当夜罢工，遂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工友出窿后，即争取树枝将窿口塞满，先通知当晚四时接班的不要进班，再派人在各窿口把守，并竖立大旗一方，上写“罢工”二字。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锅炉房一处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锅炉房乃供给窿内打水机、打风机之用，若停止工作一小时，全矿即将完全被水淹没；无风全窿即将着火。这一部分工作乃萍矿最险要的工作，所以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食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且万余工人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

大罢工实现后，俱乐部恐怕这日会要被封，遂把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均先行迁开，仅由俱乐部接收各方报告及发布各种命令布告而已。总指挥李能至秘密策应，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十四日清晨，俱乐部监察队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以维持秩序。各处墙壁满贴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一面并密派侦探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破坏。同时发表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又一面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将上述十七条用公函递送路矿两局，并函达两局：“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六）屡战皆北的破坏手段

路矿当局此时已不知手段之何出，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仍无调和诚意，极力设法破坏，思将此掀天风潮消灭于无形。

萍矿工头平日剥削之苛刻，前已略述。工友平日对工头敢怒而不敢言者，此时之欲尽行发泄此不平之气，固为意中事，是工头对于此次罢工，当然有切肤之痛。于是百计从中破坏，思借此以自保。其中尤以由卖工头职位每月收入数千元总监工王鸿卿（鄂人）为最厉。大罢工实现后，王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议定由各工头各去请其亲戚的工人数人，许以入窿不作工，仍照常给价。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思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均不能入窿。工人之已入窿者，复不准其出外，任其在内饥饿，候至次日下午方由俱乐部下令，将入窿之工人放出，再详加劝导，令其改悔。于是各工友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者。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李能至，悬赏洋六百元。工友闻此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不许李能至外出：即偶尔出外有所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工友保护首领如是之周到，王鸿卿狡酷的手段，自无从施为了。王便又改途易撤，想用武力压迫，遂联电镇守使，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

部，于重要地方俱安置机关枪，大肆威吓；并出价每人二元一天，请来军队数百，占住俱乐部及各处重要工作处，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起首军队把守头门，不准入内，工人愤极，一拥而入，军队无法，乃群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十六日有军队把守各工作处，保护工人入班作工；但工人乃在食宿处把守，故仍无人上工。此外复有多数工友围住工作处坐守，不准任何人入内，军队来驱，至死不退。

（七）"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

矿山工人，分子甚为复杂。在一小市镇内，万余人举行罢工，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罢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抢劫会即刻实现，天尚未黑，即纷纷闭市，市面自八九时后，除工人监察队及警兵外，便没有人行走。乃这次罢工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此时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市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平时星期日街上工人拥挤不开，独这几日内，工人皆归住房不出。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独裁政府呀！有一次工人集聚多人，军队用机关枪向他们假作射击，他们不怕死，一拥向前，势极危迫，恰好工人监察队到，旗帜一挥，便无一人不四散了。至是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叹惜他部下的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声明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李旅长盖亦知工人此举在要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有人常说工人无知识，见此也可以稍塞其口吧！

罢工后，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打听消息，如有事故，即一呼数百，如臂使指。罢工前一日李能至到车务处与矿长路局长谈话，适正有专车将开赴萍乡，工人疑为路矿两局谋挟李能至到萍乡去，于是数千工人将车务处围住，由众寻出李能至送回俱乐部始散。罢工后有一工友为戒严司令部拿去，不一刻即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声言请军队快些释放，军队拿枪驱逐，工人不动，军队不得已乃将该被捕工人释放，于是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大家便散了。

（八）资本家终于屈服了

十四日上午初罢工，就有商会代表谢岚舫及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愿任调人，工人代表出与接洽，将所要求之条件提出，当由谢、陈二君携往路矿两局，至晚回信，略谓："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谓："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

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十五日路矿两局派了全权代表到商会，俱乐部主任李能至亦到。路矿两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绝对拒绝，仍无结果。十六日早，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工人宣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同时并发表如下之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米也贵了，布也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体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工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十六日午刻两局派人来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去后，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便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多方恐吓代表，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不料这位代表毫不为动，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复谓：“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工人代表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随后舒矿长到了，与工人代表说了些工人无理罢工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代表请其磋商条件，舒氏不肯。后参谋长也来了，说了些不关紧要的话。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有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围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事请旅长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代表出外向大众解释以后，复入与旅长、矿长谈话。旅长方拿出调人的口气来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代表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言时怒不可遏。这时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回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

俱乐部组织既十分严密，群众又如是勇敢，一切破坏的手段亦均归失败。同时电机处及八方井打风打水机等险要工作，亦因烧炭告罄，势极危迫。且路矿两局职员内部分为数派，对于此次大罢工，都想利用俱乐部将敌派打倒而自握实权，暗中与俱乐部接洽者，时有其人。两局当局际此危发之秋，又迫于商会及地方士绅之请求，于是矿长李镜澄氏乃出而主张实行调和，从事磋商条件。十七日晚，两局及俱乐部代表会同商会地方士绅

等调人将条件细加磋商，订就草约；十八日早，由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定正式条约。五日之大罢工，至此始告终止。

条件原文如下：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　　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　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能至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九）罢工胜利庆祝会

条件签定后，俱乐部即召集工人到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工友到的一万余人。操场中间立了一个演说台，撑起俱乐部的旗子及国旗。下午两点钟，数百工友手持小旗拥着李能至来了。李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登演说台，宣布条件毕，接着说道：“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望各位暂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演说毕，共呼“劳工万岁！”

者三。随即数十人燃爆竹，李主任前导，群众后随，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

当日所发之上工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智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俱乐部实多所助益，该部得着安源罢工胜利的消息以后，复致函俱乐部，慰勉有加，俱乐部对此亲爱热诚之导师，实具无限恳挚之钦仰与谢意！兹将该部来函录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追忆往事，仰瞻前途，于欣幸之余，实令人起无限兴感，增无量勇气！

（十）俱乐部的改组

此次罢工的意义，对于安源工人直接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前途所发生的影响，至为巨大。而意义在安源之明而易见者，厥为打破“包头制度”。前此工头与职员之虐待工人、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以及工头职员彼此勾结弄弊之种种黑幕，至此已扫尽无余。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因是对于自己利害相关的团体——俱乐部之信仰与保护，亦跻于最高的程度了，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便乘此从新改组，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至十月始行竣事。当选出总主任李能至、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及总代表四十五名、百代表一百四十余名、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名，并委任各股股长七人，各股委员三十余人。至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始克完成。

（十一）包工制打破了——工头职员反动的结果

罢工以后，工头职员已不能勾结弄弊，不能剥削工人了。他们那种肥厚的意外之财再不能有了。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愤恨自不待言。他们心里总是时时记念着前此的甘味，渐渐图谋推倒俱乐部而恢复他们从前的权势和利益。于是萍矿工头百余人都是这样感觉着，一部分职员也从中挑拨。他们对于工程故意不负责任，一任工人自己去做，事情坏了，便说：“这是工人的过错，现在有了俱乐部，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复从中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破坏俱乐部的秩序。工头职员利害是相同的，因之渐渐团结起来，筹谋恢复原有地位的办法。十一年十月萍矿工头百余人仿照俱乐部办法，从新组织游乐部。其手段即系召集所有失业工人（在安源有数千人）及被俱乐部摒退之工人与各工头职员有亲密关系之工人联络一气。预计待稍有成绩，职员即假借他种名义，将俱乐部工人渐次裁减，再以种种方法挑拨或强迫工人罢工。待俱乐部罢工，彼即将游乐部所联络之各项工人，补充作工，旁面再以武力帮助，如此一来，俱乐部那不为所推倒？他们看错了！他们以为俱乐部唯一的手段只有罢工，他们不知道罢工是“工人的自由”，权柄完全操在工人手里，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迫和利诱的。他们想到了上面的那个办法，以为是绝妙的办法，俱乐部绝难有法抵制，必堕入此计无疑了。所以他们洋洋得意，天天开会讨论，正式组织团体。但秘其宗旨及办法，对外宣布，只说组织团体加入俱乐部。可是他们做事无经验，开会时意见纷歧，彼此争论，并临时主张刺杀俱乐部主任李能至，再行发动。此时正值李能至赴长沙有事数日即归，闻他们竟遣人在路上拦阻李能至，不

使他再到安源。不料其事为工人所知，群情激昂，誓将予以严厉之对待！群众此时之心理，对于破坏俱乐部者，有若劫其衣食夺其生命者然。故即将犯嫌疑之数工头送司法课拘押，一面质问各工头是否破坏俱乐部？是否谋杀李能至？各工头皆矢口不认，只说开会组织团体，系集议加入俱乐部及议定各处包工改成分账（合作）事。次日俱乐部即召集各工头开会，询问各工头昨日云云是否确实？各工头皆首肯者再。包工制本于工人极不利益，自罢工以后俱乐部久有意将各处包工制改为合作，自无问题。所以当表决萍矿各处包工改为合作制。此次各包头既承认愿改合作，工人方面自亦十分赞成。于是俱乐部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详见最高代表会议报告）。窿外依各处情形不同临时规定。要之，工人从正当工资外，还可得着若干红利。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乃告成功了。萍矿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萍矿之黑幕亦将廓清，于工人之利益固属无穷；为矿局斩绝弊病，亦为实业前途之大幸。此次风潮并要求矿局开除主动工头六人，其余各工头均加入俱乐部为名誉部员。自此以后工头职员皆不敢明白的反对俱乐部了。

（十二）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十一年七月汉阳钢铁厂工会罢工胜利以后，安源路矿工友阶级的觉悟愈加明了，即有联合组织一总工会的动机。徒以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提出。九月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及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先后筹备成立，于是组织总工会之提议，乃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冶向安源提议以后，俱乐部即特派代表朱少连、朱锦棠赴汉阳参与筹备事宜。适各处代表均到齐，乃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筹备处，当晚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当议定组织大纲，取权力集中制，决定总工会地址在汉阳。并议决为谋感情的密切与总工会基础的坚固起见，由第一次筹备会议各代表组织参观团，参观大冶、下陆两俱乐部，一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鼓励会务之发达，二则促大冶新厂俱乐部早开成立会。结果参观团之目的完全达到。五工团代表于十一月二十日同返汉阳，开第二次筹备会议，修正章程及代表会议细则，起草宣言，定期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三万余人之总工会，便由此组织成功了。（关于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详情附后）

（十三）几件琐事

至此俱乐部规模已立，反动派亦不敢再动，因是便太平了几个月。俱乐部除每日排解各项内部纠纷及办理各项小交涉外，即专事工友之训练。至十二月底，因十三条内有“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此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矿局以“公司无复电”，“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推诿。后经过几

许交涉，路矿两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十一、十二两月份之本饷亦因经济困难不能发给。后工人即要求将本饷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饷，矿局亦不承认。于是群众气愤，愈逼愈高，以致于怠工，致于演出各种纷乱。最后结果，路矿两局承认发给年终夹薪，惟以当时经济困难，先发夹薪之半，而将十一、十二两月份工资移作下月补发，余一半之夹薪待后缓发，风潮因以平息。

一月十七日为劳动界先驱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日，俱乐部大开追悼会演说并举行大游街。群众精神，为之一振。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之惨变发生后，中国各处工会受其影响因而被封闭者甚多。安源亦接交通部来电要路矿两局封闭俱乐部。但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路矿两局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俱乐部亦对此十分注意防范，故将此重大之风浪消弭于无形。

五月一日为劳动纪念节，全世界各处工人皆于是日举行悲壮之示威运动，且是日系安源俱乐部之成立周年纪念日，故俱乐部于是日特开全体部员大会一次，并举行游街。是日路矿两局俱停工一日，全体工友一万三千余人皆各持旗帜至大操场集合，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及俱乐部成立万岁”为口号，沿途旗帜掀天，呼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此次示威运动以后，工人更知自己力量之浩大，精神为之大振。

（十四）第二次与矿局协订的条件

十二年六月复发生加工资问题。此问题之发生，原系矿局职员私自增加少数工人工资，其中不无情面的关系。故此牵动多数工友要求照样增加工资，未几而牵动全矿。矿局不知如何办法，请俱乐部出来负责解决。俱乐部以此系矿局职员惹出，事前俱乐部并未与闻，因即声明对于此次问题不能负责，仍请矿局负责解决。但矿局以经济困难，不能普遍增加工人工资，故对此风潮之解决绝无办法，只得再四要求俱乐部帮助。同时风潮愈延迟愈扩大，此问题愈难解决，俱乐部以此难可完全卸责，但以国家实业、地方治安与俱乐部前途种种关系，不能不出来尽力消弭。矿局经济困难，普遍增加工资既为事实上所不能；他方又以时局的关系，万不能让风潮再加扩大；而在工人方面形势，非得要求增加工资不可。在此种困难情形之下，俱乐部与矿局一连磋商十余日，始设一特别办法，即由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教育经费一千元，俱乐部将工人常月费减半，聊以表示矿局职员之错误，借解工友之愤懑。俱乐部将此种办法宣布，工友甚不满意，解释无效。后由工人代表复向矿局提出租借建筑工会地皮及津贴建筑费一万元，矿局允与呈请公司实行。于是复经过半月之演说解释，工友始得相当谅解，依从此种办法。俱乐部即向矿局提出条件四条，矿局完全承认，同时矿局以近来出产日渐减少，应请俱乐部特别维持；又工人对于厂规常常不能遵守，应请俱乐部向工人加以劝告等向俱乐部提出三条。俱乐部以此均系应尽之义务，亦予以承认。于是由矿局及俱乐部续订条件七条，此次风潮遂告终结。

条件原文如下：

萍矿总局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协订条件：

一、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一百元之津贴在内）。从十二年七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应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萍矿总局舒印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刘少奇印

民国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协订

（十五）庸人自扰的路矿当局

在京汉惨剧发生四围空气恶劣之时，萍矿当局曾向公司主张停工改组（即将萍矿故意关门，将工人遣散，再从新召集工人开工），公司未加允许。随后发生增加工资问题，矿局当局报告公司，故意张大其词，谓工人如何骄傲，不服管束，并聚众要挟，无法维持等情。又以出煤减少之过，完全推到工人肩上。并以工人要求租借地皮及建筑费一万元事严电公司，作为工人骄横之左证。当局并因此电请公司辞职。公司远驻沪上，莫明真情，紧急报告既如雪片飞来，遂以为工人真正骄横无比，无法维持，一面电江西督军蔡成勋，请其派队到处维持实业，以戢工人盛焰，并请转电赣西镇守使即地相机办理。又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略谓："萍矿工潮，愈演愈烈，公司损失，为数至巨，请即就近相机办理"等语，一面并遣人调查实在情形报告公司核办。当此情形之下，适矿局工人谢怀德与路局站长伍寿廷发生小小冲突，路局职员亦故张大其词，联名具禀镇守使署，涉及俱乐部，风传此时即有派队来安解散俱乐部之举。群众得此消息，十分愤激，以为当局对待工人太无诚意，一面派出监察队多人，从事严防，如当局终不谅解，即以最后手段相见，亦所不惜；一面即径函路矿两局质问，略谓："敝部自成立以来，对于路矿两局，无时不谋其前途之发展，所以裨益于矿政路政者，实不在少数，事实俱在，有目共睹，而路矿两局对于敝部初无维护之心。敝部自维力薄，然自卫亦尽有余；徒以路政矿政之兴废，地方人民之安危，对于国家前途，关系綦重。是故敝部一切措施，但

所以谋矿局路局前途之发展。此皆竟不能为两局当局所谅解，敝部实深遗憾。今特函达，希即将贵局今后对敝部之态度，明白惠复，以释工人疑虑”等语。后各方见形势不佳，此举即无形消灭。蔡督亦以时局关系，派队到安，恐惹起政治纠纷，碍难照准等语回答公司及萍矿局。萧使亦以此事系内部纠纷，碍难以武力压迫，致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等语回答公司。俱乐部见风潮已过，亦不复追问了。

（十六）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

俱乐部宗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他如提倡工人自治，促进产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此旨终婀以昭告世人，即工友方面亦尽能了解遵行。现在萍矿出产减少，在工人方面固不无错过，但矿局缺少煤桶及缺少材料与工头职员对于工作上全不负责，实为主要原因。不料矿局恐见责于公司，将此种出产减少之错过，悉数委之于俱乐部，知之者固不值一哂，不知者且将以讹传讹，俱乐部之冤将终无剖白之日了。故俱乐部于前次风潮经过后，即召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及总管段长等开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出产办法。始则提出出产减少之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职员工头完全不负责，亦效尤偷懒，不服指挥。对于这数种原因之补救办法：由矿局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由俱乐部训示工人竭力作工，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如有故意违犯，即照规则办理。自此次会议后，烂桶已陆续修起，新桶亦逐渐添造，最近每日煤炭出产已超过二千一百吨，将恢复旧日原样。由此可见出产减少之原因，大部分实应由矿局负责，亦可见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了。

（十七）俱乐部建设方面之过去与今后

上面系一年以来俱乐部所经过的重大事件，至俱乐部在建设方面所作事业，亦不甚少，成绩亦尚不恶，其详情见各股报告，兹略述如下：

工人子弟学校，十二年度已办三校，学生六百人。工人补习学校因事实上难于进行，无甚成绩。

消费合作社亦于十二年三月开办，至今已开三店，凡五股，资本约二万元，营业亦甚发达。

又俱乐部近因经济扩充，特组织经济委员会，专事保管本部经济并审查各项账目。

又对于部员彼此间及与外人间之纠葛纷争，特组织裁判委员会，专事此项排解剖断。并设问事处于部内，受理各种纷争事件。

他如游艺、讲演、互济各股，亦均稍有进行。建筑工会、扩充学校，亦正在筹划进行中。

本年俱乐部所做的重要工作，多半为应付各种变故及各种事务上的处理，其成功仅

达到打倒包头——中间剥削阶级——制度的目的。关于工人教育及工人训练，在本年未能十分注意创办。此种设施关系俱乐部前途发展至大且巨，今后当努力于这一方面，俾工友实明了自己阶级在世界上之地位，俱乐部终极的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之途径。

（十八）结　论

在这一年中，俱乐部以幼稚的组织，新结合的群众，不断地与恶势力奋斗，尚能日跻于健全，此亦非偶然的事情。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自己之措施，已经付与工人以团结的机会及自己解放的力量。工人苟运用得法，则在长途的阶级斗争中，雄壮的凯旋声将永远为工人所歌唱。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对于路矿两局及各派反动之势力，我们要明白的恳挚的告语：历史的大轮盘，已经载着吾人向全体人类解放的方向前进，已经叫工人起来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并且为全人类——谋幸福，试问谁有力量能将这大轮盘阻住使之后退呢？“反拨适助前进”，这是物理学的公例。不要说“回天有术”，老实说，拦阻在进化途中的人们，只是促自己的生命、速自己的灭亡而已。我们盼望大家不要再做出这种历史上的大错误来！

说到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固然证明了我们精神的坚强，魄力的雄伟；但同时世界的大势——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最后的侵掠，国内军阀最后的反动，我们开赴前线的伙伴，在这种侵掠反动的炮火中，已经一排一排的阵亡了，睡在后营预备军，还在迷迷糊糊地做那“苦是命定”、“十六小时的工作是对养活我的厂主应尽的责任”的苦梦——已把我们的担负加重了，加到十分重了！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叠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时机何等紧迫，责任何等重大！伙伴们，庆祝过去的事小，预计将来的事大，我们应从今天便着手收拾预备，我们此时当高呼预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展万岁！

全国各工会的恢复的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万岁！

（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1923年10月出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亲爱的工友们！杨以德流了我们唐山工友的血还没有干，现在曹锟的兵，吴佩孚萧耀南的兵，又来流我们京汉工友的血了。我们眼看亲爱的工友们，在京汉铁路，被他们派来的兵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已经装在棺材里，有的还躺在地下。地下一片血迹，地上一片哭声，是死者父母妻子的哭声！可怜打死工友们的枪枝子弹，也都是别的的工友们造的。可怜别的工友们在兵工厂里造枪枝子弹的时候，以为是用这枪枝子弹去抵抗那欺压我们的外国兵队，那想到给军阀用来打死自己的工友、本国的同胞？这是何等悲惨可痛的事！工友们要知道，军阀残害人民也不自今日始，试数以前的事：

一、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连年打仗，最大的若直皖战争，若直奉战争，我们工人农民被他们强迫送到战线上作工打死的受苦的，计算起来该有多少？

二、湖南赵恒惕为了想强占公有的纱厂，杀了工友代表黄爱和庞人铨的头。

三、湖北督军萧耀南纵容军警打伤粤汉工友数十人。

四、天津警察厅长曹锟的走狗杨以德，带三千保安队杀伤开滦矿工三十余人，封闭唐山职工会、矿务局工会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

五、津浦铁路南段段长张电仰承军阀意旨，勾结路局破坏工会。

六、第三师下级军官受陇海路局运动，用武力逼迫洛阳工会秘书游天洋出境被害而死。

七、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纵令警察压迫丝厂女工及浦东纱厂的工人；仰承租界意旨，无故监禁帮忙邮差罢工的李启汉，现在还未释放。

凡此种种事实，详细说起来，十日十夜也说不尽。像此次长辛店的大惨杀，江岸大惨杀，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事了。我们何以受这等的压迫，受人不能受的压迫？乃是因为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有的是军队、警察、兵工厂、监狱，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工人们除了两只手两条腿能做苦工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才受他们这样的任意蹂躏，任意压迫，这就是国家的政权为军阀们独占了，我们没有一点政权的缘故。现在因为军阀们逼的人民无路可走了，就是向来很冷静的很和平的商界学界，也都不忍坐视军阀们天天拿着枪向国民逼钱，天天跑着向外国借款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劳苦百姓，卖国，将使国家破产而灭亡，人民做外国奴隶，也都要起来干涉政治了！也都要起来裁兵了！也都要起来打倒军阀！我们工人受军阀

政治的压迫，比商界学界更甚，应该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 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那时候军阀倒了，人民有政权，真正共和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那敢作威作福的压迫人民？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若不起来干预政治，我们若不能在政治上得着相当的地位，我们的身家性命，没有一天能免了军阀拿政治来摧残的危险。全国工友们联合起来呵！想保全我们的工会，想改良我们的生活，都非大家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阀不可呵！

（原载《京汉工人流血记》，1923年3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工人们，农人们，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二月七日长辛店和汉口的大惨杀，你们已经耳闻目见或身历其境了。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虚伪险诈的武力魔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戴不到几个月，现在已在全国工人之前，毕露其鲜血淋漓逞凶惨杀的真面目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而推翻一切旧势力，与新兴的敌对阶级争斗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公然戮〔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

可是京汉路总工会要告成立了，这个戴着"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便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除了他们军阀的军队势力外，还没有比他们更集中、更强大的组织力存在；京汉路总工会的出现，就是保障中国人民利益真正势力的出现，这当然要触犯了军阀的畏忌心。所以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与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

全国争自由的人民呀！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不自由无宁死"，现在我们三十九个烈士已经惨死了，军阀们从此更将肆无忌惮的向我们不自由的人民进攻了！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呀！

（原载《向导》20期）

“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全国工人、农人及一切被压迫的同胞们！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的被惨杀，想你们都已知道了。自此次罢工开始以至现在，敌人方面——军阀及其雇用的政府——利用他们的报纸电报及文告，捏造种种诬蔑及诱惑的事实，不断的来欺骗国民，以冀破坏我罢工工友团结及阻断国人对于罢工的同情援助。我们很相信：在敌人方面造谣的宣传欺骗下的国人，必然有一个很热心的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将这一次大屠杀的实际经过作较详细的一篇报告。

京汉铁路工人此次罢工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争集会结社的自由，就是约法上规定我们人民应享的自由。

近两年来，京汉工人陆续组织“工人俱乐部”。至一九二二年春，全路皆就绪，得十六个单位，每站工人过百人者即组织分会，较少者属于附近分会。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决定组织总工会。八月十日复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决定总会地点设在全路中心——郑州；在成立大会未开以前，由总工会筹备处行使职权；并决定统一名称，然后依“权力集中”“经济集中”两原则，以促成一有实力而统一的组织。整整筹备了四个多月，才于本年一月五日总工会委员长会议，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遍邀各工团各界到郑参与典礼。

因为集会结社是约法上赋与人民的“自由”，一方面军阀在相当期间内尚保持其假面，和工人谋妥协。因为这个原故，京汉工人遂得在军阀高压下发展到这个局势。宣言“保护劳工”咧！赞成“劳动立法”咧！但是工人却始终“谨防扒手”，阶级的战线日益紧切。

当国家铁路为其私产的直隶系军阀，看工人的组织愈进步，他们愈恐慌，遂不得不揭开其“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拿出摧残工人的狠辣手段来，图灭尽工人的势力。在路局方面，如赵继贤、冯沄，他们原来就是持破坏工会主义的。赵氏在先曾利用一部分工人传习所，以图工人的势力破裂，不想恶谋失败，凡示好于彼者工人群弃之，而工人的团结遂益坚实。冯氏先亦联络司电生以上的员司，组织京汉同人通谊会，与工会对抗，乃终亦未成功。自总工会成立会之召集露布以后，于是他们谋摧残的进行益急切了。赵以保系嫡派的资格，冯以京汉南局局长不啻吴大军阀的外账房，而又有两湖巡阅使署副官的资格，遂日夜奔走于曹、吴之门，以制造空气，谋复工会。而乖巧奸诈的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于靳云鹗，使其严禁开会，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于是军阀借刀杀人之计划便决定了。

仇人嫉视工会，工会未尝不知，且身处虎口，固军阀掌中物。但尚不知对方欲摧残若是之急迫，所以大会筹备皆取公开，以为如此或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至一月二十八日，而意外的消息到了！黄殿辰首先来会声明禁止开会；继而取出赵继贤致吴佩孚的电报，继又取出靳云鹗、张福来给他的命令，猜他的意思，似讨好于工人，显得此事主动者大有人在，但其心也太险恶，相持者几三日夜，工人愤激非常。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①]、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阳。

代表既到洛阳，当日（三十日）往西宫，吴辞不见，约以晚用电话谈。至晚，用电话约定次早八时谈话，次早得见该署副官长徐某及其政务科长白坚武，由他们转述吴意，只是一味敷衍恐吓，代表方面坚持愈烈，最后才由吴佩孚亲见。现在把那时谈话大要，记在下面：

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无备，激之使迅，而假手爪牙以尽歼之，其手段真辣呀！约接谈三时余，不得要领而散。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微笑中，好危险奸诈呀！

先是，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庆祝。至三十一日晚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三十一团体，代表百三十余人，尚有武汉及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三十余人。

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六十余人。本路分会——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各分会代表到者计六十五人。

赴洛代表于三十一号晚返郑，赶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态度后，全体大愤。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因为我们乃本于约法而开会，当即决议，无论如何，仍照原议，决于次日仍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开会。

二月一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

---

① 杨德甫后来成为工贼。——编者。

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妄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州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一方郑州工友全体由会所出发迎接，至距会场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拼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宗旨，及此次被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愤，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振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二月一日）下午，代表所住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遗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会所被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实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会所即被封闭。

晚间，各处代表全体集会，以吴佩孚违背约法，摧残集会，并兵困旅馆，不准来宾自由出入及相互谈话，勒令酒店歇业，不准来宾集宴，来宾出街，则以武装军警追随，在在皆待工人如囚犯，似此情形，惟有迅速引去，以免其他人民受无端惊怖。于是全体决议从速离郑州。武汉方面代表，当晚仍搭原车南下，其他各路代表概搭次日早车北上。各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此后工人地位危险万分，都说，“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同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成立会既遭如斯之摧残了，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在十分忍无可忍之下，当即通过一决议，其大要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四号午刻宣布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退后的。”并议定要求五项：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及南段处长冯沄，要求吴巡阅使、靳师长及豫省当局撤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损失洋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被军警扣留的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乐队再送至总工会；占领郑州总会会所的军警应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

"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飞龙、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的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次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最末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那知同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议，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呢！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罗网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防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沄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七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顷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先〔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告)。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告候，参谋长准亲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半途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是，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环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顷，军队又大肆抢淫，计福建街一夜连洗三

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精光。当时情形之惨暴，恐江水汉河亦为之鸣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害的时候，有工友六十人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二次，张厚生即呼喝下令，在数十被捕工友面前，将其"枭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能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辩的。杀戮之而又重诬之，军阀之肉，其足食呼？

同日在长辛店亦有大惨杀的事情。自罢工开始，各分会都一律惟总工会命令是听，赵继贤却数次威迫长辛店工友单独交涉，分会工友只以"只知总工会命令，不知其他"答之。于五号有曹锟兵开到三营。六号宛平县知事手执"绅商与军界"旗子前来劝说上工，赵继贤亦布告威吓，要工友上工，工友只以镇静处之。不意当天晚上，曹兵四出捕人，当捕去工会职员史文彬、吴汝明①等十一人，都是赤身提赴保定。在七号晨九时曹兵大队又来工会捕人，当时工会门前有工友数百人聚守，军队到时即开枪乱放，计当场被惨杀者五人，受重伤者六十余人，其屠杀之数虽不较江岸为多，然军阀之残暴亦云极矣！当时路局竟甚至于禁止工人家属购买食粮！至捕送保定之十一人，至今生死尚未明了，闻已决定将枪毙二人。

在郑州情形，尤足表现军阀摧残我争自由的人民之种种手段。在罢工的第二日，靳云鹗捕去工会职员王宗培同志等五人，加刑拷打，威迫要彼等开车，他们始终坚持"非得有总工会命令，不能开车"靳又令押赴街市，持旗招呼开车，亦没结果。靳知威吓无用，乃又改用软化手段，当即与五人大摆饮宴，遂又释放二人，要他们出来劝工人上工，二工友出即外逃。靳又出妙法，即一方面捏用五人名字，打一造谣通电；一方由黄殿辰在普乐园开一国民大会，制造几个威吓工人的决议，并大打其造谣通电（载京津各报）。不过当时只到三十余人，大半又系其署内警察，而他们用的名字却是"郑州军商政学路局"，竟假之以断绝工人的饮食和居住，这真是又好笑又可恨的事情。此外，各分会差不多都受过武力的摧残，受伤的人不知确数；信阳州分会执行委员长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从，竟被砍断一臂，至今生死未卜。

在武力蛮横压迫之下，未死的工友，他们是手无寸铁，只有是回复工作之一途了！然而他们回复工作时的勉强和眼泪，足以证明他们是终于不甘屈服的呀！现在他们的工作，是和狱囚一般，这些将使他们更需要为自由而奋斗了。

此次罢工，不但表示本路工友团结的一致，亦表示全劳动阶级联合的一致。计自罢工后三日，道清、正太等路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其他各路亦都表示参加，惜都为武力压迫，结果不得不步京汉的同一命运。有好多职员被捕，工会被封闭了。在二七惨杀之后，武汉劳动者都义愤填膺，当由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布总罢工命令，为京汉

---

① 吴汝明又名吴雨铭，后来叛变。——编者。

路工人之后援，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五军士挟一工人，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竟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被难工友；有杨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工作；他如武汉电话、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工人，事前都被军队包围，不许外出，遂不得实行。军阀以武力摧残罢工的劳动者不算，且将湖北工团联合会及《真报》封闭了。施洋同志于七日被捕，于十五日亦被萧耀南惨杀了！

全国的工人同志及被压迫的同胞们呵！

这次他们的罢工，他们的被杀，所代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呢？国人知道这次惨剧的经过，当然都完全会了解：

（一）自由是全国被压迫的人民都需要的，所以此次工人罢工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单独的利益，是为了全国人民共同的需要。

（二）军阀是全国被压迫者的共同仇人，他们此次屠杀工人，其意义不仅是屠杀罢工的工人，实是屠杀我争自由的人民，屠杀为全国人民争自由的先锋军。

全国被压迫的国人呵！自由是我们大家都需要的，京汉铁路工人此次的被屠杀是证明军阀已向全国人民很恶劣的进攻了呀！我们农商学各界人民要急速联合起来，起来做：

（一）打倒我们的仇人军阀及帮助他们为恶的国际帝国主义！

（二）同时也勿忘了我们目前还有急迫的责任，就是京汉工人是有死者三十九人，伤者三百人，入狱者二十七人，被开革失业者五百余人。这些被摧残的人及他们的家属，是正需要我们的援救呀！国人要速以财力来援救他们！援助他们恢复工会！

国人起来，起来一致的解除压迫，援救京汉工友！

全国的工人呵！你们是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保卫者，惟有你们做前导的努力，中华民族才得着自由与独立！此次京汉工友的被摧残，是证明我们更要努力于阶级的团结呀！

打倒军阀！

工人的自由团结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转自《中国工会历史文献》（一））

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邓　中　夏

上期我的《论工人运动》一文里，已把工人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约略说了。但是中国的工人状况是怎样呢？我想青年们一定要急于知道，所以我接着为此文。不过为篇幅所限，也只能说个大概罢了。

要明白中国的工人状况，先要明白中国的产业状况。我们分段略述于下：

（一）江苏区——在中国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要以此区首屈一指。此区除上海之浦东、杨树浦、吴淞外，尚有南通、无锡、苏州等处。此区以纺织为主，工业、烟草次之，余如铁工、电气、火柴、玻璃、化学制造、印制……又次之。以上各业，大半为英、美、日本和中国的资本家所办。此外就是官办的兵工厂；造币厂、造船厂以及电灯、电话、电车、自来水各公司了。

（二）武汉区——此区以铁工为主要工业，纺织次之，其他工业亦有。湖北大冶县之铁，不仅是中国许多大工业惟他是赖，就是日本也要靠他。汉阳的钢铁厂是中国唯一的大铁厂。纺织工厂除武昌官办之四局外，尚有十余家。汉阳的兵工厂规模亦大。扬子机器厂可以自造轮船。

（三）津榆区——此区从天津起至山海关止，皆包括在内。以煤为主要的工业，纺织次之。开滦煤矿，包括唐山、林西、赵各庄、马家沟、秦皇岛，是中国有名的大煤矿。天津纺织厂约有七八家，均为官僚资本所办。唐山尚有洋灰窑公司，大沽尚有造船厂。

（四）其他各地——都只有零星的新式工业，而且是矿山居多。如山东之淄川、博山、峄县，山西之阳泉，河南之六河沟，湖南之水口山，江西之安源，奉天之本溪湖、抚顺，都有极大的煤厂。至于广州以及沿长江一带各口岸，虽有工厂，并不多，故不能各划分为大工业区。

（五）交通——交通事业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凭借。可是中国的交通事业却不是“发展产业”，不过是“运输洋货”罢了。可叹！交通约分为二：（1）铁路。铁路已经筑成的，有京汉、京奉、津浦、京绥、陇海、沪宁、胶济、沪杭甬（只沪杭竣工，南段只成宁绍一小段）、粤汉（南北各成一段，南为广韶间，北为武株间），此外短路尚有直晋之正太，河南之道济，江西之南浔，湘赣之株萍，广东之广九、潮汕。余如南满、滇越，则为外人所筑。（2）轮船。海运由上海南至香港，北至天津、旅顺，东至日本，

东北至海参崴。江运由上海至长江上游之重庆、叙府、嘉定，鄂、湘、川、赣皆有小火轮驶入内地。广东东西北江亦可行轮。天津至道口镇及东三省不冰冻时亦有许多河流可以行轮。在此可附带提及的，便是各通商口岸有不少的码头搬运夫和通都大邑有不少的人力车夫。

中国产业的大致状况，略如上述。我们可进言工人状况。但是要叙述中国的工人状况，可以成功一部大书，亦只能说一个大略。

中国工人的苦况，可以从外国人赞美“中国人勤苦耐劳”声中反衬出来。外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便是中国的“劳力廉售”。所以我们可不须列很详细的表，便可知道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点钟以上，“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一生一世见不着太阳。便可知道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不过数角，“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一生一世替人作牛马。就中以铁路工人生活比较优裕，海员和市政工人（指电灯、电话等）次之，纺织及其他工人又次之，矿工、码头工、人力车夫为最苦。工人知识，亦约略与生活程度相等。

中国工人运动原是近两年的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胜利时期——亦可称为进攻时期，从前年十二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起，至今年二月京汉大罢工止。（二）失败时期——亦可称为退守时期，京汉大罢工失败以后至现在。工人运动所表现的只有两事：一是罢工，一是组织工会。有先组织工会然后罢工的，如安源、长辛店等（最多数）；也有先罢工然后组织工会的，如上海邮差等（少数）；也有一面组织工会一面罢工的，如开滦煤矿等（次多数）。罢工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有香港海员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辛店罢工、陇海罢工、汉阳铁厂罢工、粤汉北段罢工、安源路矿罢工、水口山罢工、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开滦罢工、京汉全路罢工，前八次罢工都胜利，后三次罢工却失败了。组织工会，已形成一个完全产业组合的，有“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筹备将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地方组合的，有“湖北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广东工会联合会”。其余差不多各厂、各路都有“工会”、“工人俱乐部”等，举不胜举了。不过尚有两种有力的工人，或者组织尚少，如矿工，只安源、水口山、焦作组织了；或者始终没有组织，如各口岸的码头工人。这以上都是工人运动胜利时期的大概。失败时期是怎样呢？自从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被外国资本主压服以后，接连着便是开滦煤矿罢工，被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和英国的印度兵压服，最后便是京汉全路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等和某国领事秘密协商压服了。京汉此次罢工失败，被杀死三十九人，被捕入狱二十四人，被开革失业数百人，还有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枪毙了。此次失败，军阀乘机将京汉全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一律封禁，于是影响所及，各地工会除粤、湘外，皆由公开的而变为秘密的了。虽然秘密，尚有几处工人猛进，曾联合了组织总工会，月费照收，常会照开，只差悬挂一块牌子。我们在此可告慰青年们的就是：（一）工人复仇的心极切，精神仍团结凝固，一旦时局变动，可以大举；（二）工人受了这两年新式的教育与训练，知识与技能已经增高，现在并秘密的不断的买看出版物，和社会主义者往还交谈，通讯质疑。由此看来，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应是极抱乐观，认为工人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

大的一种势力。

现在我要把我对于此后工人运动的两项意见贡献在青年的面前了。

（一）我以为此后工人运动在反动政局没有推翻以前，不可放弃了公开的工会运动。公开的工会在有时虽不可能，而且即令可能，亦有“投降军阀”，或是“劳资妥协”，徒然引导工人走上堕落的道路的危险。然我们不提倡公开的工会运动，工人最容易被引到工团主义，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结果是工人运动于中国革命完全不相干涉。这却是一重危险。所以我主张应使公开的工会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不断的输送小册子给他们看，保存并激励他们愤慨之气，团结之力，一旦有事，庶可乘时而起。

(二)我以为工人种类纷繁，固然只要是工人群众，我们便当去活动，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精力亦有限，我们应就中择取几种有力量的，于革命事业有大帮助的工人群众去活动，较为经济。我以为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市政工人五种工人特别重要，应多下工夫。

亲爱的青年们：我上次说过：“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我们一肩挑着，”但是我现在再找足一语，“我们挑着不可放下啊”！

（原载《中国青年》10期，1923年12月出版）

中国共产主义者宣言*

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处在封建经济的情况之下。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因此，社会涣散，缺乏组织力，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毫无兴趣。只是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在资本主义政府面前提出了把辽阔的中国变成市场的问题。几千年来一向闭关自守的中国陷入了被其他国家压迫的境地。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侵入中国的时期，中国人民群众就曾用直接行动反抗过侵略者。在人民起义遭到镇压以后，中国更加饱尝了外国奴役者的压迫，同时，也发觉了本国政府的卖身投靠和腐朽无能。

在斗争过程中，中国人民群众掌握了一条真理：不坚决改革本国的一切政治制度，就无法使国家免受外国奴役。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君主立宪运动，就是中国觉醒的表现之一。在与旧制度作斗争的时代里，最重大的事件是辛亥革命，它使人民群众有可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改革。在外国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压迫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政治上的成长和组织力的增强，必然会使中国越过目的在于改进国家管理的改良阶段，而走向提出民主政权的口号和要求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因袭帝制，在中国政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辛亥革命有两个历史任务，一个是推翻满清，一个是把中国从外国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革命的第二个任务包括在种族和民族独立的范围内，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有利条件。辛亥革命揭示了由封建政治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由手工劳动和手工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趋势。

中国这次革命，由于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取得胜利，提出自由社会要求的民主派与反革命的封建阶级妥协了。虽然清室被迫“退位”，反动阶级头子的财政情况极为不利，处境非常困难，但是，民主派还与袁世凯妥协，这就造成了它的第一次失败。革命政府的领袖命令革命军队屯聚南京，不敢下令渡长江，继续进攻华北。

革命政府把政权交给了北洋军阀的组织者袁世凯，北洋军阀是由所有封建主、反革命军事将领和统帅结成的一个军事派别。

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失败以后，政权一度落到民主派的手里，但它没有保持住政权，而把政权交给了北洋军阀的新首领反动的段祺瑞。民主派的妥协政策使它遭到了第二次失败。

---

* 此文是按俄文稿译成的。文件时间不详。

现在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已经离开了首都，政权落到现在北洋军阀的领袖反动派曹锟和吴佩孚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内民主分子能够完全放弃妥协政策而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民主派的第三次失败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的民主政权，只有在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胜利。

革命失败的结果，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以及军阀的反动制度更加加强了。所谓共和政体是掌握在军阀的手里，他们在半封建经济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体与世界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签订军事贷款，借以自卫。而外国则利用向中国投资的机会，通过财政奴役的方法，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和特权。

但是，对于世界帝国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支持中国的内战，因为内战可以使中国停滞不前，妨碍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外国工业品充斥中国市场，而中国资产阶级则妨碍它们剥削中国。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中国工业的发展之所以受到阻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在中国本土上所进行的不利竞争（中国资本过去是以一套经济办法如工资等级制度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地方混乱、官吏对百姓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压迫。

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大大影响了中间阶级的状况。小企业主失掉了财产、手工业者加入了失业者的队伍，农民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不能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以极低的价格把土地卖给地主。只要政权仍然掌握在封建主的政府和军阀的手里，只要政权没有从他们手中夺取过来，只要没有组织民主政府，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

民主政府就是民主派的政府。我们所指的是在彻底改革一切政治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所建立的政权。这个要求的主要意义在于民主派或数个民主党派的联合，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党派的政权，而根据本国历史要求和新的国际形势来建立政权。

由于孙中山和宋教仁（他们两人是国民党的领袖）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组织了以赵秉钧为首的国民党党员的内阁，赵秉钧任总理，他是袁世凯的傀儡。这个所谓国民党内阁的活动结果如何呢？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宋教仁想组织一个完全由国民党党员组成的内阁，但是他被刺杀了。即使宋教仁不被刺杀，他也一定会遭到与一切讨袁运动相同的命运。这次讨袁运动的起因是宋教仁被刺和江西督军李烈钧被免职。这两件事证明，实际上国民党和袁世凯是不能联合的。

国民党失败以后，"进步"党取得了政权，委托熊希龄组阁。"进步"党变成了袁世凯手中的工具。它加入政府只不过使它的名誉扫地而已。

袁世凯倒台以后，反对反革命政府的斗争，就以恢复约法，选举黎元洪为总统和召开国会三件事而宣告结束。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袁世凯的党羽真正失掉权力，他们的江山还坐得很稳。民主派的领袖则为这种胜利和恢复共和而自豪。

张勋复辟的阴谋破产以后，民主分子和冯国璋、段祺瑞（安福系的首领）这些反动军阀一起参加了政府，冯国璋任总统，段祺瑞为第一任总理。所有这一切就叫做共和国。

每个人都必须懂得，政治斗争并不是某些人争夺权力的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及其经济制度。同时还要懂得，只有在残酷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自由，才是最珍贵的东西，它是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这种方法与我们的阶级敌人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在于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所以决不能把争取民主的斗争看作是一个人或一个派别打倒另一个人或另一派别的斗争。

真正的民主派要具有两个特征：（一）它的原则要符合民主的概念；（二）它的行动应该是积极地反对封建军阀。中国现有的各个政党中，只有一个国民党可以叫做革命的政党，虽然它的民主和革命性都是相对的。国民党的党纲还没有最后制定下来，但是三民主义和发展中国工业的计划都是国民党的民主主义的反映。该党除了以议员的身份参加革命斗争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民主主义的表现。例如：广州政府不限制工人运动，废除了警察"治安"条例和禁止工人罢工的刑律。但该党的行动往往自相矛盾。它有时甚至对帝制派表示好感，并且"由于策略的原因"，有意同北洋军阀接近。如果国民党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的革命斗争中起一定的作用，那它就必须永远抛弃它的动摇不定的妥协政策。

对目前的时局，有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认为召开旧国会和使黎元洪总统复位，是保证解决中国当前政治问题的主要因素。这个观点是经不住批判的，根本不符合事实。北洋系一贯想单独控制政府，自称是继承北洋军阀的正统，因此，在他们的封建统治下，说什么国会可以实行其"法权"的根据何在呢？过去的教训清楚地证明，黎元洪在不久前任总统期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既没有解决一个政治任务，也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现在黎元洪的任期已满，在这种不利的历史情况下，有什么根据说他能够组织民主政府呢？只要军阀仍然统治着中国，居于国家之上，那末不但反民主的有组织的斗争不会停止，而且军阀本身之间的斗争也不会停止。例如，直奉（奉指沈阳督军张作霖的军事派系）战争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一

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侵入。自从这种势力侵入以后，中国曾行过几次旧式的反抗，反抗失败的结果，人民一方面因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强迫的痛苦，一方面发见了旧政治的腐败与缺点，渐渐觉悟非改良政治组织不足以抵抗外力，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

因为人民受了外来的政治力、经济力压迫的缘故，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在封建政治下的改良运动便进步到民主革命运动，毕竟推倒了几千年因袭的帝政。那次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算是开了一个新纪元。

二

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运动。自强运动里面包含民族独立及发展实业两个主旨。所以辛亥革命战争，是适应近代由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由单纯商品生产制度到资本家商品生产制度之世界共同趋势的战争，是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不幸这种战争，在中国至今尚未能成功；所以未能成功之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清室退位，袁世凯因为财政困难及名义不正两个原故，十分恐慌，而革命军队反屯聚南京，不敢渡江，革命军领袖竟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袁世凯，这是民主派第一次因妥协而失败。袁世凯取消帝制，南方护国军的实权大半落在非革命的民主派手里，遂将政权交付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段祺瑞，这是民主派第二次因妥协而失败。此次徐世昌出走，政权若仍旧归诸反动派代表北洋首领曹吴等之手，民主派若不坚守革命的方针而与军阀妥协，必然是民主派第三次因妥协而失败。民主派若永远不能用革命的手段从反动派代表军阀首领手里夺得政权，必然是永远失败。

民主派失败，便是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

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金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方八面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小工厂主小商人，受外货及大资本营业的影响，渐次坠入了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因为手工商品被外来机器品驱逐的缘故，大半流为失业游民；农民因为物件腾贵的缘故，渐次将自种地卖给地主；所有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以及无力避难的半无产阶级的人，因为连年军阀互争地盘的缘故，无辜丧了无数的生命。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

三

民主政治当然由民主派掌握政权，但所谓民主派掌握政权，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的意思，乃是由一个能建设新的政治组织应付世界的新环境之民主党或宗旨相近的数个党派之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来掌握政权的意思。

民国元年孙黄到北京和袁世凯妥协了，由赵秉钧组织内阁，赵秉钧以次的阁员都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号称民党内阁，这是何等滑稽的民党内阁！民国二年宋教仁想依援国会多数党势力组织国民党的政党内阁，结果即不被刺，也必随南方讨袁军同一失败。（二年讨袁军虽起于杀宋教仁及免李烈钧等军职，事实上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绝对不容之必然的现象。）国民党失败了，非革命的民主派（进步党）熊、梁等又组织了一个投机的政党内阁，结果只受了袁世凯一场玩弄，徒然失了政党的节操。袁皇帝死了，护国战役中止，便在拥护袁皇帝的北洋军阀势力之下，拿恢复约法、国会、黎元洪继任总统三件事算是共和再造；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又拿北洋军阀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为共和再造；这是何等滑稽的共和！我们须知道：每一个政治战争都有阶级争斗和经济改造的意义含在里面，不单是几个人进退的问题，第四阶级对于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此，第三阶级对于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我们又须知道：每一个战争所获得的自由，都是极宝贵的东西，都须有多量鲜血的代价才能够换来的，决不是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得来的。所以映在我们眼中的民主派掌握政权，乃是一个阶级推倒一个阶级一个制度代替一个制度的意思，不是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或是那几个人代替那几个人的意思。

四

真的民主派，必须有两种证据表现于人民面前：（一）他的党纲和政策必须不违背

民主主义的原则。（二）他的行动必须始终拥护民主主义与军阀奋斗。在这一点看起来，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们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民国元二年及六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但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

五

现在有一派人主张总统复位恢复国会以维法统为解决时局之中心问题，其实是大谬不然。由根本上说起来，封建式的北洋军阀不消灭，他们自袁世凯以至今日天天怀着牢不可破的“北洋正统”思想统治中国，有何总统国会能够行使职权？由事实上说起来，从前信用未失任期未满之黎总统并未能解决时局，现在之黎元洪在法律上确是任期已满，无位可复，在政治上又万不能不负解散国会酿成复辟的责任，忽然拥他复位，不但不能解决时局，而且将因此增加纠纷。国会不但延期过久已失代表民意的精神，而且其内部分裂，国民党研究系政学会安福部交通系等分子，因政治上之利害感情，互相牵制，六年八年之争持以及辞职取消新补等等议员资格问题，都各有相等的理由无法两全，因此无论在南在北，终于不足法定人数，其自身已成不治之症，将何以解决时局？即让一步说，总统是合法的，国会是可以足成法定人数的；然以一个不负政治上责任的总统和大半份失节败行的国会议员，如何能够创造民主宪法与民主政治？再让一步说，即使他们以后不至于不负责任，不至于失节败行，然而他们的命运都在军阀卵翼之下，绝对不能有有力的民主主权的党派与群众为后援，何能裁制军阀实行民主宪法建设民主政治？

法统之根据在约法，约法是什么？全部约法除了把万世一系的天皇换了由国会选举的总统以外，都是抄袭日本宪法，约法里虽然也载了几条人民之权利，同时又轻轻用“得依法律限制之”七个字打消了，这种法统不但我们不满意；就是最近的广东政府也不建设在护法上面了。况且现在主张“以恢复法统为解决时局之要图”的人，就是当年破坏法统加入讨伐西南护法的人，也就是此时在主张“北洋正统”的人，我们不知道这两个“统”将如何并立？只要有武力在手破坏法统或恢复法统都可以因利乘便自由伸缩，我们不知道这样随军阀爱憎为存亡的法统，有何神秘力可解决时局？

六

又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之唯一办法，其实这办法之内容也决不是解决时局的办法。在第三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上，联省自治自然是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况

且民国二年湖口之战，导源于袁世凯任命汪瑞闿为江西省长问题，地方分权确是当时政治上重要争点，国民党失败，袁氏专政，在野的政客几乎一致主张联邦制度，遂致袁氏下令查禁，称联邦为破坏统一——袁世凯的统一——的邪说；六年宪法会议，又因为地方制度问题，国民党与进步党争持甚烈，北洋军阀遂联名呈请总统，以反对宪法上地方分权之故，请解散国会，南北战争由此而起；由这一点看起来，地方分权问题虽然不是政治纠纷之根本问题，自然也算是民国史上政治纠纷之一种，国民党就是始终坚持地方分权，在政党的态度上，我们也不能加以非难。但是我们所认为不违背民主主义的联省自治，是由民主派执政的自治省联合起来，组织联省政府，来讨平非民主的军阀政府，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结果仍是一种民主主义对于封建制度战争的形式；决不是依照现状的各省联合为一联省自治的政府和北京政府脱离就算完事，因为这乃是联督自治不是联省自治；更不是联合卢永祥张作霖几个封建式的军阀就可以冒称联省自治的，因为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算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剧，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

七

又有一派人以为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和别的卖国军阀不同，而且有力量可解决时局。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好过张作霖，但是我们要知道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是妨碍民主政治的军阀；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是反对亲日派的人，但我们知道吴佩孚的背后也有一种外国势力，曹陆去了，将来又有继起的人为吴佩孚向英美商量裁兵善后的大借款；我们固然承认吴佩孚倒张去徐是差强人意的事，但我们要知道此次战争明白表示的原因，起点于反对梁内阁，实现于奉军入关，乃是为个人或直系受政治上的压迫而战，未尝有丝毫表示为民主政治而战。吴佩孚正在一面用兵对南，一方主张巩固北洋正统，以取得和袁世凯段祺瑞相等的地位；用兵对南是敌视民主主义的行动，巩固北洋正统即是拥护封建式的武人专政；他或者也有力量暂时解决时局，但恐怕更要因此酿成和袁世凯成功后段祺瑞成功后同样更难解决的时局。

八

要解决纠纷的时局，必须由历年许多纠纷的事件里面分析出纠纷的共通病根所在，然后才能够找出到真能解决纠纷的道路。依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列举民国政治史上重大纠纷的事件如下：

元　年　民主派举兵革命；
　　　　北洋军阀力助清室讨伐革命；
二　年　民主派因宋案及地方分权问题讨袁；
　　　　北洋军阀拥袁南征；

五　年　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称帝；

　　　　民主派起兵讨袁；

六　年　民主派在国会力争地方权，攻击段祺瑞；

　　　　督军团举兵解散国会维持北洋系；

七　年　民主派起兵护法讨段；

　　　　北洋军阀拥段南征；

九　年　直皖战争；

十一年　奉直战争；

据上列的事实，民国十一年七次战争；前五次是民主派和北洋军阀之理想及势力冲突，后二次是军阀内讧，这两种纠纷的共通病根就是军阀存在。解决纠纷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

军阀一日存在，不但他们对于民主派的战争不能停止，他们自身内讧的战争也不能停止；奉直还正在战争，直皖战争恐怕也就在目前；奉若胜了，张作霖和孙烈臣便又有战争，孙烈臣胜了，和吴俊升便又有战争，直若胜了，吴佩孚和曹锟或冯玉祥又有战争，皖若胜了，皖与奉便又有战争，皖之中徐树铮与卢永祥便又有战争，其他若甘肃，陕西，四川，湖南，安徽内部争夺督军总司令之战争，都已危机四伏。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所以军阀不消灭，不但好政府主义者所谓好政府无从实现，军阀自身之坏政府，亦必日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而全国人民之产业生命，亦必随而动摇而丧失。

九

好政府主义者诸君呵！你们刚才发出"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呼声，北京城里仅仅去了一个徐世昌，你们马上就电阻北伐军，据中外古今革命史上的教训，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军阀势力之下能实现你们所谓好政府的涵义吗？你们观察现时京津保的空气，能实现你们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和六个具体主张吗？清室倒了，统一党章秉麟等便急急主张和袁世凯妥协，反对继续战争，袁世凯死了，进步党梁启超等便急急主张和段祺瑞妥协，反对继续战争，结果都造成了反动的变乱。你们（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又那能不蹈此复辙！

国民党诸君呀！你们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应始终为民主主义而战，宁可战而失败，不可与北洋军阀妥协而失败。民国元年因袁世凯宣誓拥护共和，你们和袁世凯妥协上了一次当；五年又以恢复约法国会等条件而与段祺瑞妥协又上了一次当；现在不可又以恢复国会法统废督裁兵等条件而与北洋军阀妥协了。在北洋军阀卵翼之下的约法国会将与五六年状况何异，希望军阀自己出来废督裁兵，岂不是与虎谋皮？废督改称总司令，云南四川湖南的现状与前何异？军阀间内讧甚烈，正在相互对垒，互相防制，无论那一方面都正在增兵，那一个肯裁兵自减？从前徐树铮说，"我也赞成裁兵，但必候我的兵练齐了再裁别人的兵"。现在张绍曾说，"方今赣州一带战事方殷，豫乱虽平，伏

莽未靖，沈辽负固，窃发堪虞，军务既待肃清，各省宜有统驭，就直赣豫等省论，即或曹吴诸帅如自解职，试思四郊多垒，指挥究属何人；"他们在实际上不能裁兵废督的苦心，算是由这两位北洋派代表人物老实说出来了。你们唯有一心完成你们民主革命的使命，勿为这些欺人的好听的空话所误！

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呵！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强索军费不扰乱中央及地方财政秩序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滥借外债做军费政费以增加列强在华势力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横征暴敛想他们绥靖地方制止兵匪扰乱是不可能的；军阀不打倒，工商业怎能发展，教育怎能维持和振兴？军阀不打倒，想他们不互争地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互争地盘战争一次，农人工人商人的身家性命便跟着牺牲一次，无辜的兵士警察便跟着身罹炮弹一次，他们战争无止期，我们要停止这种无止期的牺牲，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没有别种姑息的妥协的伪和平方法可以得到根本的真和平幸福的。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根据他们姑息的妥协伪和平论，来反对民主战争，我们万万不可听从。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战争诚然是我们所不讴歌的，但是民主主义的战争，减少军阀战争效率的战争，把人民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战争，在现在乃是我们所不得不讴歌的。

十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我们目前奋斗的目标，并非单指财政公开，澄清选举等行政问题，乃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一）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二）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三）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

（四）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五）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厂卫生工人保险法。

（六）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

（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

（八）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

（九）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

（十）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十一）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

上列各项原则，决不是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之下可以用妥协的方法请求得来的；中

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先驱》9号，1922年6月20日出版）

一九二二年前后国内政治形势大事记

1921年

7月

10日　孙中山下令讨伐桂军。是日桂军右翼司令沈鸿英通电自治。粤军连战皆捷，相继占领昭平、平乐、桂林等要地。16日，陈炳琨逃走。19日，陆荣廷亦逃。沈鸿英乘虚占桂林。28日，广东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马君武为广西省长。

8月

9日　北京政府任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鄂督。孙传芳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吴佩孚率军自洛阳南下，湘鄂之战，遂变为湘直之战。14日，吴密令决京口堤，湘军死数百人，人民千八百余户尽被淹没。17日，双方下总攻令，湘军大败。27日，直军占岳州。吴至岳州召开军事会议，致书赵恒惕，劝其北附。

10日　孙中山以两广已定，亟谋由桂林取道湘省北伐，陈炯明反对北伐，孙派胡汉民、汪精卫赴桂与陈协商，孙意：北伐胜利则不回两广，败亦无颜回粤，两广由陈炯明主持，求陈接济饷械。

12月

12日　张作霖以直系势力深入长江流域，在日本支持下，积极谋排斥直系，亲自赴京。14日，迫靳云鹏去职。24日，扶助交通系梁士诒组织内阁。

1922年

1月

1日　梁士诒特赦直皖战争失败被通辑之皖系段芝贵等九人，吴佩孚深为不满。

5日　吴佩孚乘国人对梁内阁不满，通电攻击梁士诒，谓其“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直系各督通电响应。

7日　张作霖通电为梁士诒辩护，指斥吴佩孚“不问是非，辄加攻击”。

13日　中国银行团组织盐余借款联合团（按：梁内阁成立以来，财政异常困难，至十年底，北京政府向内借款已达七千万元，又以盐余向外国银行借款三千余万元，对外借款由盐余项下按月照扣，本国银行欠款，则全无着落），向北京政府索债。26日，财长张弧和该团签定合同，借此发行公债九千六百万元。

2月

26日　吴佩孚电徐世昌，反对九六公债，请立即逮捕张弧。

27日　粤北伐军举行誓师典礼，拟取道湖南进攻直军。张作霖派李梦庚为代表，赴粤与孙中山接洽，联合反直。

3 月

□日　孙中山派伍朝枢、汪精卫赴奉磋商联合反直。段派徐树铮为双方拉拢，孙段张在反直目标下，结成三角同盟。

21日　担任北伐军后方接济之粤军参谋长邓铿，由香港返粤，在广东车站被陈炯明刺死，北伐军断绝接济。

26日　孙中山以陈炯明阻碍北伐，在桂林召集会议，决变更计划，下令各军秘密返粤，陈炯明以所部多在南宁，无法抵抗，电请辞职。

4 月

10日　曹锟为张吴双方调停，张作霖电曹提出梁士诒销假等三条件，曹在保定召集军事会议，决议反奉，将所部军队交吴佩孚指挥。

19日　张作霖率军入关。同日冯玉祥奉吴佩孚令放弃陕西，率部东出潼关，巩固郑洛。

孙中山电准陈炯明去粤军总司令及省长职，令粤军统归大本营直辖。20日，陈炯明率部退出广州，转赴惠州。孙中山决定在韶关设大本营，变更北伐路线，东进入赣。

29日　奉直两军在北京附近开战。

5 月

5 日　奉直战争失败。徐世昌令奉军出关，梁士诒等交付法庭讯办。10日，下令免张作霖职。

6 日　孙中山赴韶关誓师，分三路进兵赣省。陈炯明令叶举率五十余营进驻广州，电孙中山请恢复陈炯明省长及总司令职。27日，孙令陈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桂粤军队悉归其调遣。叶举以索饷为名，留驻广州，人心慌乱。

14日　吴佩孚以孙中山用"护法"作为旗帜，谋恢复旧国会，拥黎元洪复位，以塞南政府之口，电各省征求恢复国会意见。15日，孙传芳通电请黎元洪复位。24日，民六议员（按：民六议员系指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黎元洪解散国会时之议员）在天津开旧国会筹备成立会。28日孙传芳通电请徐（世昌）孙（中山）同时下野。29日，齐燮元发电促徐退位，直系各督纷纷响应。

6 月

1 日　孙中山为安定后方，率卫队回驻广州，令胡汉民留守韶关。

旧国会议员发电驱逐徐世昌，谓其"窃位数年，祸国殃民"。

2 日　徐世昌宣布辞职。

3 日　广州议员通电不承认黎任总统，不承认天津筹备之"民六"国会。

奉张通电声称东三省自治。

6 日　黎元洪通电主张"废督裁兵。"11日宣布就总统职。

孙中山发表工兵计划宣言，主张裁兵为工，谓："直系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将所部军队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为作停战条件……直军诸将若能履行此条件，

本大总统当立饬至国罢兵，恢复和平，生谋建设”。

15日　叶举受陈炯明令在白云山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围攻总统府，捕捉孙中山。16日叶部洪兆麟率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闻讯避永丰舰，叶举通电促孙下野。

17日　孙中山亲率永丰等五舰驶白鹅潭，向粤军开炮轰击。19日，孙手令入赣北伐军回师靖乱。

7月

6日　黎元洪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以北京政府为直系把持，殊难对付，不肯就职。

8月

1日　民六议员在北京召开国会。民八议员（按：指民国七年在广州递补，民国八年为莫荣新逐出广东之议员）在上海北京组织“法统维持会”、“法统学会”，高唱民八正统之说。孙中山派覃振等入京，运动民八议员，反对国会；30日，民八议员闯入议院索打议长。

4日　北伐军腹背受敌，回粤之许（崇智）黄（大伟）一部在北江仁化一带，与陈炯明军剧战四日，本日陈军占南雄，许黄残部败退闽边。江西蔡成勋北军本日占赣州，李烈钧率北伐军败走湘边。

9日　孙中山接北伐军败退消息，知势不可为，乘英舰摩汉号至香港，13日由港转沪。

12日　越飞抵京。21日，北京21民众团体开会欢迎。

15日　孙中山在沪发表宣言，自述历年护法经过及陈炯明叛变始末。谓今后当继续奋斗，务期“合法国会自由集会”，并重申6月6日提出之工兵计划。越飞派人携函至沪与孙中山接洽（按：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云：本月30日，孙中山致蒋介石书中曾谓：“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从此彼此通讯，凡事当易商量矣”，此“某事”即指与越飞接洽事）。

16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国会开会，拟就劳动法大纲十九条，通知全国工会，号召进行劳动立法运动。各地工人纷纷响应，唐山郑州等地工会并举行示威。

9月

4日　孙中山在沪召集国民党进步分子商议改进国民党。6日指派茅祖权、陈独秀、覃振、陈树人、丁维汾等九人为改进案起草委员。

16日　陈炯明将孙中山联合苏联之密函付香港英帝国主义机关报发表。北京美日英法等国公使照会北京政府，谓越飞在华宣传“过激主义”，请严厉监视其行动。

19日　王宠惠得吴佩孚支持，任国务总理。

10月

14日　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赴奉联合张作霖，本日，汪程自奉返沪，对记者发表谈话，谓“此次孙总理令余赴奉，实抱一为民意求援之目的，以探问张雨亭意旨”。

20日　申报及时事新报载，张作霖派张宗昌赴海参威与日本接洽，奉天与海参威政府实行互助，日方接济奉张军械。28日，上海各报载，海埠运往奉天之军火，已达二十

二列车。

11月

7日　北京数千学生工人举行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高呼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苏联盟万岁，无条件承认苏联。山西、湖南、湖北各地学生亦有同样行动，留日中国学生亦于是日通电全国，主张无条件承认苏联。

15日　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代表五十余人在沪讨论改进党务案。

18日　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为曹锟嗾使，谋倒王内阁，借口财长罗文干签订粤国借款延期合同，有纳贿情事，往总统府告密，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20日吴佩孚致电黎元洪，责其捕罗违法。23日曹锟通电攻击罗文干，主张严加刑讯，吴佩孚恐津保两派分裂，直系破裂，24日，发电声明："对罗案不再置喙"。25日，王宠惠内阁全体辞职。29日汪大燮署理。

12月

10日　北京汪大燮内阁以曹锟反对，全体辞职。

1923年

1月

4日　黎元洪任命张绍曾组织内阁。

8日　曹锟谋作总统，使高凌蔚出面收买议员。

15日　陈炯明部为滇桂军所败，率部退惠州，通电下野。16日，滇桂各军进入广州。孙中山在沪命许崇智为广东总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未到前，由魏邦平代。

26日　入粤桂军沈鸿英与吴佩孚勾结，谋消灭国民党在粤势力，发起江防会议，约胡汉民、邹鲁、魏邦平参加，预为布置，企图一网打尽，届时仅拘捕魏邦平一人，胡汉民离粤赴港。

孙中山在沪与越飞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按：越飞不久即往日本热海养病，孙中山命廖仲恺同行，据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政治报告中云：廖与越飞"在热海同住了一月。此时东方人不知道的许多事情，廖同志已知之甚详，如俄国之现状，苏联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苏联帮助中国之原因，都十分了解。所以……廖同志由东京回粤，帮助总理做联俄工作，当时许多同志怀疑，而廖同志却很勇敢坚决的去干……因为有一个月之久，和越飞互相辩论，把各种问题通通研究过了"）。

2月

15日　孙中山由沪启程南下，21日，经香港入广州，22日发表实行裁兵宣言，指斥吴佩孚"对于自治诸省均欲以武力削平"，要求各系实行裁兵。又筹备在粤组织大本营。

3月

2日　孙中山在粤宣告大元帅大本营成立。

7日　曹吴以南方又组织大本营，迫张绍曾明令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以之抑

制孙中山，张率全部内阁阁员辞职。但终以曹吴命令难逆，20日，令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

23日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沈鸿英为桂军总司令，24日，下令沈部驻肇庆及西江北岸。

25日　沈鸿英通电谢绝北政府任命以释孙中山之疑，28日，并表示遵照孙中山命移防西江。

4月

10日　沈鸿英以移防为名，集中军队于新街韶关等地，秘密召开军事会议。16日，沈通电就北京所委广东军务督理职，宣言驱逐孙中山，并令所部六七营由白云山进攻滇军司令部。孙中山偕杨希闵亲自督战，通令讨沈。

26日　曹吴谋倒张内阁，由冯玉祥等率旅团长百余人借口索饷赴国务院滋闹。张绍曾允赞助曹锟“最高问题”（按：指运动总统选举），愿供给款项。

新四国银行团和华盛顿会议

胡　绳

上节所说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的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直接对象，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中国代理人以严重的打击；这是因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对中国的侵略行动还正在酝酿布置，一时还不十分显著的缘故。

欧战快结束时，美国已准备凭借优越的金融势力侵入中国，和日本决一高下，其第一着做法就是建议成立新的四国银行团，这在前一章中已提到了。美国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向英法日三国提出邀请书。美国提议的内容是要由银行团来垄断中国的一切政治借款与经济借款，而且参加银行团各国所已得的各种借款优先权都须让给四国银行团。这样的办法是日本不愿意完全接受的，因为日本在满蒙所已取得的独占权绝不愿意轻轻让给列强共享。所以日本一面由官方表示参加，一面通过其“民间舆论”表示反对。

一九一九年春，与巴黎和会同时，四国银行团的筹备会议也在巴黎举行，虽得到了初步的协议，但日本想使满蒙划在银行团业务以外的企图未能达到，所以又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美英日三国政府间为这问题进行正式交涉，你提一个觉书，他提一个照会，积下了一大堆档案。归结起来，所争论的无非是：日本方面说：我在满蒙有特殊利益，在《蓝辛石井协约》中且已得到美国的承认；而且我之坚持在满蒙地位，并非排斥你们，其实不过是为防范俄国的“赤化势力”而已。美国和英国方面则仍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做题目，反对日本独吞满蒙；但也表示，既然你一定要坚持，事情总好商量，不妨再具体划定满蒙的那些铁路（已修的和将修的）不属于四国银行团范围之内。——这样协商的结果，便由美国的银行团代表雷蒙特（Lamont）到日本，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成立了协议。同年十月十五日这新四国银行团（以别于清朝末年的四国银行团）正式成立于纽约。

日本对结果很满意。当时的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中说：“英美法三国政府为尊重日本之国防及经济生存起见，已承认日本之特别地位。”①。美国也很满意，因为在这新四国银行团中美国已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在这时的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看来，利用日本来监视革命后的俄国，是有利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完全取消日本在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区的特权，能够略加限制也就可以满意了。

美国组织新银行团的作用和企图究竟是什么呢？美国公使芮恩思在一九一九年的六月间向北京政府递一备忘录，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兹根据当时的中译本节录如下：

---

①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卷下，页二八〇。

……新银行团之组织，非欲以外人参预中国政务凌驾华官，而操纵中国也。中国之统治权，仍由中国人掌之。吾人深知中国人若处适当情势之下，必能自理其财政、铁道及实业诸政，今惜情势未当，故为银团计，为中国政府及人民计，应即促成之也。（这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财政铁道及实业诸政尚不应当由中国人"自理"——引者）。

……嗣后政府借款，无论其为行政性质，或实业性质，其接洽与用途，皆应明白宣示。俾债权者得知其详。此非干预之意，特为中国利益计，自宜与债权者开诚相见，协商一切立信改良之方。

……新银团，则以巩固中政府为宗旨。盖若中国国基稳固，百废俱兴，则各国之获益必较互争势力范围为多。故该团成立之后，必以适当方法保护中政府，俾能实施其发展行政及经济的新计划，而免蹈瓜分之祸。

……新银团之作为，将完全根据债权者，并得保证之原理，非图控制中国行政，或置洋员于华官之上也。夫一国之最好担保品，厥为政治修明，故银团应得预问之事有二：一为全国收支应完全公开，以昭大信，二为任官惟贤，并加以任事永久之保障。

……且银团代表必须有查账之权，察其收支与国家预算是否相符。设有官吏与官署不能恪遵国家预算，或舞弊等情，一经查出，应由中政府立即惩究。……①

这个说明不能不使我们想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话。在表面上看来，口口声声说的是不要干预中国政治，不企图控制中国行政；但其实不过是用转一个弯的方式说出，这计划就是："中国的统治权仍由中国人掌之"，却由外国人来监督和实际负责，中国政府的一切财政收支均须向银行团报告，任银行团来查问，对于一切官员的任免，银行团都有权过问；于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政府实际上就成为银行团的代理人，对这样的政府，银行团自然是愿意尽力使之"巩固"并加以"保护"。所以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地指出：

美国……企图组织新银行团——国际帝国主义的托拉斯，想用经济优胜势力，尽量把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掠夺中国的优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

但是因为日美间的矛盾并未能即行减消，而且英美、法美之间也还存在着矛盾，所以四国银行团虽已成立，却未能立即行动起来，美国大资本家的全部阴谋在当时也就还不能马上实现。一九二一年初作为美国各银行代表而来中国的史蒂芬(F.W.stevens)说：

若美国单独借款于中国，不特为日本所反对，且招英国之忌，而法国亦必随英日之后而抵抗之，是美国必以势孤而让步，故反不如请英法日加入新银团，而共同投资之为愈也。……余此次之担任代表职务来华，固深悉在华各国之同床异梦，未尝不以是而深自警惕，以冀无渝余职守也。②

既然是"同床异梦"，自然就仍旧有相互的竞争了。尤其在日美之间，为中国利益的争夺在这几年间是相当激烈的。

例如在四国银行团筹组期间，美国人贝克（Earl Baker——任北京政府的交通部铁道会计顾问）在一九一九年提出过一个"美日英法中五国共同管理中国铁道计划书"，想把所有中国已成和将筑好的铁路，不论是中国自有的，还是某一个外国所控制的，都一起变成五国共同管理。对这计划，英国方面也很热心，但是因为日本坚决反对，终于没有能成功。又例如在四国银行团成立后，一九二一年一月美国的联邦电报公司（Federal Telegraph Co.）和北京政府订立了《无线电台借款契约》，规定这公司承办建设上海北京广州汉口哈尔滨五处的无线电台，并在十年内有管理这些电台之权。英国与日本方面都表示抗议，尤其日本最强硬，因为他已先和北京政府订过类似的契约。

① "梁燕孙年谱"卷下，页四四——四八。

② 史蒂芬和交通系财阀梁士诒的谈话，见"梁燕孙年谱"卷下，页一四二。

美国政府虽出面支持联邦电报公司，也没有能得胜，只好把这问题不了了之地拖延下去。

在这情形下，美国就从两个方面力求压倒日本：一方面在列强的国际关系上，一方面在中国的内部政治上。

在国际关系方面，因为《英日同盟条约》在一九二一年期满，日本虽想续订，但英国已表示踌躇，美国努力设法废除这条约，想拉拢英国和别的欧洲国家来共同加压力于日本，对他在远东的势力给以某种限制。因此，美国便在英国的同意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发起举行一个"军缩会议"，兼讨论远东与太平洋问题（即通常所谓华盛顿会议）。

至于在中国内政方面，日本已在欧战期间扶植起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势力，控制着北京政府，这显然是日本的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所以日本在反对四国银行团的组成时，北京政府也跟着反对；等到日美间已经协商妥当，北京政府也就闭口不响了。美国英国既然要加强在中国的势力，自然也不放弃这一方面的努力。他们所选择的支持对象是同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相对立的所谓"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就是直系的领袖。一九二〇年七月在这两系军阀间爆发了一次大战（所谓直皖之战），结果皖系大败，段祺瑞及其安福系丧失了政权。所以在新银行团成立时已是直系军阀取得较大权力之时，这也正是美英势力在中国的一个成功。但日本却也并非完全失败。因为经过五四运动的浪潮，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看出皖系势力过于声名狼籍，难以久存，所以他又使用起他的另一个工具，就是在关外的军阀张作霖（所谓"奉系"）。在直皖之战中，奉系军阀采取了与直系军阀一致的态度，共同推翻段祺瑞。在直皖之战后，北京政府便成为直奉二派势力共同的脏物。亲日派官僚仍能在奉系武力卵翼下活跃于北京政府中。当美国发起华盛顿会议时，吴佩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其势力于长江流域上，而奉直两系的暗斗已日渐显露了。

华盛顿会议的主要分子是美英日法意——第一次世界战争后的"五强"，所讨论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其实只是中国问题。荷兰，葡萄牙，比利时因为在中国保有帝国主义权利，所以也是参加者。中国被邀出席。这会议由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开会，至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闭会。我们既已知道了在华盛顿会议前的英、日、美三国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在中国内部各军阀集团间反映着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斗争与结合的情形，并且已知道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正是在"五四"后的中国人民觉醒与斗争开始昂扬之时，根据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于这会议的结果就很容易了解了。

美国英国对于日本仍只是想加以适当的限制，而决不打算也不可能消除他作为远东一霸的资格。所以关于一般的军缩问题上，在会议中就决定，美英日三国的海军吨数限制为五五三的比例。在美英看来，日本保有这样大的海军军力，是既足以镇压东方各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势力而又不至于为害于美英两国的。日本看定了美英这种想法，所以故意处处留难要挟，使美英奈何他不得。会议未开始时，日本已声明不愿意在会议中讨论"个别国家间的问题和既成的事实"，这样就把中日之间的各种问题一笔勾销，根本使其不可能在会中提出。美国英国对这也并不坚持。所以会议中关于中国问题便只限于所谓"原则"问题的讨论。至于山东问题的悬案虽然势非解决不可，也不摆在会中讨论，

而在大会以外由中日代表进行“直接交涉”，英美代表则出席“调解”。

美帝国主义者很想借这个会议的机会来造成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良好”印象。在会议开始时，美国即赞许北京政府的代表在会议中提出关于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取消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等等要求。这的确一时在一部分中国人中又造成虚幻的乐观空气，以为美国这回真是要大大帮助中国了。可是会议的结果是什么呢？原来这些问题都化成了些空洞的原则的决议，具体的解决办法都要等列强派员分别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查研究”了以后再说。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不过是一种愚蠢的骗局。

华盛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臭名昭著的决议就是所谓《九国公约》。对于这公约的缔结，美国是最热心的，所以全文中贯彻着的中心就是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所谓门户开放，如我们在本书中已不止一次地分析到的，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的代名词，又是美国想借强大的经济势力来独占中国的烟幕。《九国公约》的内容是以明白的条文说出了这些。可耻的是在华盛顿会议中居然由北京政府代表第一个提出门户开放的原则。第一次会议里面北京政府代表即提出所谓“十项原则”，其中第二项就是：

中国极赞同门户开放，即所谓有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故自愿承认并实行此主义于中华民国各地方，无有例外。①

接着，美国代表卢特（Root）提出了“四原则”，经大会通过：

一、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二、供给中国以完全的和无阻碍的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巩固的政府；

三、运用各国之权势，以求切实建立和维持在全中国领土上各国的商工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四、不得利用中国现状以求取特殊权利，而致减削各友邦臣民的权利，并不得奖助有害于各友邦安全的行动。②

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北京政府所乞求的和美国政府所积极主张的就是把中国置于各国势力的共管之下。继卢特的四原则之后，美国代表休士（Hughes）又向大会提出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案，其中除了具体规定“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内容外，并且规定：

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在一切外国政府与国民，不论是否参加缔结本约，请求经济上的权利和特权时，都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处理。③

结果，就以卢特的四原则和休士的门户开放案为基础形成了《九国公约》的条文。如果在华盛顿会议前，门户开放还是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美国，为侵略中国的行动所用的漂亮装饰，那么现在变成是应中国军阀政府——帝国主义者的卑贱的代理人的请求而在列强间的共同盟约了。

美国对这结果很满意，为了使日本肯签字于《九国公约》，不惜在各种具体问题上顺从日本意志。日本既在具体问题上得到胜利，对这一般原则的成立也就无可无不可。美国以为，《九国公约》的原则将使他今后“合法”地在中国充分发展势力。日本也不觉得这样的原则就会实际上妨碍他的行动，后来到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老实不客气

①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卷下，页三〇八。

② 包：“门户开放主义与中国之关系”，页二二一——二二二。

③ 同上。

地撕碎了这一纸公约。

所以在整个华盛顿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蛮横地坚持其“既得权力”，美国竭力绥靖日本，想把日本行动限制在不致妨害美国的范围内，英国及其他国家既怕日本发脾气，又附和美国。而中国在会议中则表现为听凭别人摆布的可怜的存在，可耻地出卖了民族利益的北京政府一面既已自甘于做帝国主义的奴才，一面又以自己能“平等”地列席于列强会议上而十分得意。

于是也就很清楚，华盛顿会议并不真能缓和日美间的矛盾，更不能使中国人民上当。因此华盛顿会议过后，我们就看到中国国内，各派系的军阀以各帝国主义者为后台而进行更猛烈的火并，同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也更向前发展了。

（摘自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附〕关于华盛顿会议的一些资料

英日同盟与四国协约

英日续盟问题

英日续盟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导线，第一章里已经约略说过。本文为叙述四国协定成立之线索，所以对于该问题再作一番较详之讨论。英日同盟的成立造因于两国帝国主义之联合，换言之，便是两国企图排斥俄德平分在华的势力。第一次同盟条约于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伦敦签字；当时伊藤博文极力拿联俄恐吓英国，英国明知日本意在联英抗俄，但因为忌嫉俄国在华势力的澎涨，所以互相利用成就了东西洋两岛国的同盟。第二次同盟条约是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二日签字，这次约文和第一次不同的地方，便是：英国默认日本吞并朝鲜，反过来日本承认印度为英国领土不加侵害。第三次同盟条约是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签字，这次约文和上两次比较有两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上两次条约专为对俄，此次将德国加入对待之列；第二，英国固为美日猜忌日深特要求加入“两缔盟国之一方如与第三国缔有总括的仲裁裁判条约时，在该仲裁裁判条约有效期中，对于缔盟国他方不负本约所规定与第三国交战之义务”一条。大战结局俄德两帝国相继崩溃，这种同盟本来已经丧失继续之原因。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条约满期，英日两国为什么又声明继续有效一年，疑疑迟迟不肯作废呢？原来大战以后，日本国势澎涨已经有独霸东亚的形势，英国若放弃同盟不但旧日在华的势力不免被日本侵蚀，即印度的领土权也岌岌可危，——这是英国迟疑的原因。至于日本，若继续同盟则对于中国可以和英国狼狈为奸，不致受他国的猛烈反对，对于美国可以孤美国之势使英美不得联合，所以特意把皇太子弄出去作运动的工夫。

但英日续盟美国以利害冲突反对甚力，英国要和日本继续同盟立刻伤了美国感情。拿战后经济状况说，英国疲弊万分，只想求美国帮忙，绝不敢得罪美国；拿种族和外交政策说：英美同种同文毕竟血厚于水，况且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又是拿不伤美国感情为第一要义。所以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间的伦敦帝国会议，对于英日续盟问题讨论多日尚不知何去何从。后来乔治，寇仁和巴尔福等费尽心血才想出一种“两面讨好从中取利”的政策，——这就是英美日三国太平洋会议的起源，也是华盛顿会议的导线。这时候英国已经决定拿英美日三国协定作取消英日同盟的代价了。

哈定总统发起华盛顿会议的第二天——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一日——英相乔治在下院演说，有“日本为吾人之旧同盟，二十年之盟约不特有益于彼我双方，且有益于远东之和平。中国尊重英华双方之友谊者颇不乏人，吾人极愿助成其利益。美国现今国民之目的及思想与吾人极称协和，吾人深愿与之协商及协作。……吾人第一要义即系与美国为友谊的协作，……其次，即维持对日之亲交与协作。”一大段话，便是这种两面讨好政策的正式宣言。华盛顿会议开会以后，英国代表团极力发挥这种政策的手腕。他们一方面组织宣传机关散布流言，说英美商业及海权如何冲突，美日国交如何危险借以暴露美国国际的孤立。一方面使日本代表德川出头提议三国协约，暗中联和日本代表团协力圈笼美国，他们所用的手段简单说只是拿英日续盟作运动新协约的工具，美国不赞成这种新协定，他们便要继续同盟。

（摘自《华盛顿会议小史》）

中国在会议上的提案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中国在华盛顿会议所提的议案，可以分做基本原则及特别事实两种。特别事实的提案共计八件，基本原则的提案即是所说的十大原则。这十大原则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午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施肇基提出的。全文如左：

关于远东政局之讨议，中国在事实上自占最重要之位置。中国代表团曾慎重考虑认为有在最早时机提出一般原则之必要，以此等原则定为本会解决一切问题之先导也。至原则之特别实施本会当有相当之决定。关于此节容后再为提出，今先提原则数项，宣读于后。当吾人制定此等原则时，已抱定寻求各项条规之目的，庶目前及将来远东及太平洋各种政治经济问题得照此等条规谋正当之解决，而有关系各国之权利及合法利益亦同受相当之注意。故此等原则盖所以谋中国一部利益及世界全体利益之融会协和也。中国所欲贡献者非徒维持和平，更愿促进各国物质之进步与文化之发展。中国亟愿开发其天然之富源供各国人民之取给，同时则希望享受自由及平等的往来。为达到此等目的起见，中国应享有各种必要之机会，就本国人民之才具及需要从事于政治制度之发展。中国现正与艰难问题奋斗，此等艰难问题盖为国家积极改革政体所不能或免者。

此等问题中国自能解决，惟须有机会从事于此耳。所谓机会者，不徒指中国应免除他国侵略之危害而言，且指应就时势之所许者，将剥夺中国行政自由及妨碍中国征收充分国课之一切限制悉行解除。

中国政府依照大会之议事程序特提出左列之一般原则以备大会解决关系中国各项问题之应用。

一、（甲）各国约定尊重并信守中华民国之领土完全暨其政治上行政上之独立。

（乙）中国自行准备声明不将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之任何部分割让或租借他国。

二、中国因完全赞成所谓门户开放主义或中国有约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之故，准备接受该主义实施于中国全部不设例外。

三、为增进相互间之信赖并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和平起见，各国允许除先期通知中国与以参与之机会外，彼此不缔结直接影响中国或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一般和平之条约或协定。

四、各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一切特别权利，特别利益，豁免权或成约，不问其性质或契约上之根据如何，均须宣布，凡此等要求或将来之要求未经宣布者均视为无效。其已知及将宣布之权利，特别利益，豁免权或成约当加以审查以便决定其范围及效力，如经审定有效，当使与本会所宣布之原则相合。

五、所有中国政治上司法上行政上行动自由之限制应即时取消，或于情形所许时从速废止之。

六、中国现有成约之无期限者应添注合理且有定之限期。

七、凡解释让与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之条文时，依公认解释原则所谓绝对照让与国利益解释之方法办理之。

八、将来遇有战事发生如中国不参加者，中国处于中立国地位之一切权利应完全尊重。

九、应订立和平解决之条文，以便处理在太平洋及远东地方之国际争议。

十、关于太平洋及远东之国际问题应预订将来会议之条文，以便按期讨论俾签约国得一决定普通政策之根据。

关于十大原则的提出国内外学者下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有的说中国不当首先提出抽象的原则的；有的说中国所提的十大原则空空洞洞不值一钱的。我以为原则提案是不能少的，不过中国代表团所提的十大原则不能使人满意罢了！怎说原则提案不能少呢？先就当时外交情形说：第一，英日各国对于原有在中国所劫夺的权利利益都不肯放弃，我们若首先提出积极的切实的基本原则鼓动了世界舆论的同情，英日为世人耳目起见对于目前原则虽不赞成对于将来事实提案或为少许之让步；第二，原则之提出是美国授意中国代表依照议事程序作的，我们当时虽预料美国不能实行利他主义给中国帮忙，但却不敢断定美国不能因为我主义的政策间接裨益中国，不但我们这样，就是日本当时也捉摸不定美国的真正态度，毕原忽然称病即是一个明证；所以美国第一次的意思我们是无法谢绝的，况美国又以主席资格及议事程序来呢！再就中国民族精神的宣扬说：第一，我们一切希望都发生于图谋中国国民一部幸福和世界人类全体幸福之一念，我们提出原则可以乘机宣扬我们的使命；第二，我们所要的是除去酿造未来战争的祸因和世界和平的障碍物，我们提出原则可以反复申述我们想望和平的热诚。

但是，我虽然赞成提出原则，我却不满意中国代表所提的原则。中国代表打算用原则把各国拉入圈套，所以措词命意多所顾忌，而不知外国的外交家都是精明强干毫不吃亏！我以为我们提出原则不过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能达到以前所述打击英日的锋锐宣扬民族的精神即算成功，初不必求其通过。因此，这种原则似应如下之积极：

一、废除侵害中国主权或不合法之占据，设施及建设；

二、取销一切不合法或侵害中国主权之条约或协定；

三、解除中国政治上行政上司法上行动自由之一切限制；

四、中国政府及人民以传统的四海兄弟主义待遇外国侨民；所有外国在中国之租借地，势力范围，特别权利，特别利益，独占权，豁免权及其他妨害国际平等之权利应即废止。

这四条原则，第一条可以包括山东问题，撤退外国军警问题及裁撤外国邮电各问题；第二条可以包括取销廿一条，英日同盟及蓝辛石井协定诸问题；第三条可以包括关税自主，取销领事裁判权诸问题；第四条上半有机会均等的意味但变作本国文化的名词，下半为实行上半之必要条件。中国代表团若提出类似这种积极的切实的基本原则，并仿照许士海军案的办法将主要事实的提案如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诸问题附带上去作为原则的实行（较小的案子可以后提，若附带上去难免他们拿小案子敷衍我们），原则提案虽难通过，然原则的力量未尝不可使英日法各国对于事实提案少示让步。即不然五千年和平民族的真精神也有相当的宣扬，决不至物质精神都归失败！再看代表团所提的十大原则：第四，第五，第六三条是十条中最有用的，但文字上尚有应当斟酌的地方；第一，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六条似乎过于消极，实际上怕没有什么拘束力。说到第二条，那是以门户开放为中国门罗主义那位施公使的得意作品；在积极一方面是抵制日本把持东三省和蒙古，在消极一方面是增进对美的感情。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纯粹是美国为抵制在中国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弄出的，他所要求的只是“有饭大家吃”并不一定和租借地或势力范围冲突（美国学者作这样主张者很多）。如今租借地和势力范围都未废除，我们主张门户开放只不过便宜美国罢了，于日本是毫无所损。况且海约翰的门户开放只及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他所说的机会均等也只限于商业。现在我们提案说“实施于中国全部不设例外，”又把“工业”二字加入，我们虽声明“门户开放不是把中国全开为商埠”——这话是施肇基后来在委员会里声明的——但饿虎似的外国政治家望文生义，自然要那样解释。将来外国的商业家实业家一定要跑到中国实行“在当地弄原料，在当地制造，在当地贩卖”的政策。以中国产业的幼稚，领土主权的不完全，行政和司法的不自由，这样国际的大规模资本侵略恐怕比海陆军还要利害呢！什么提倡国货，什么抵制外货，恐怕都要成为画饼罢！我说到这儿或者有人要说中国不这样作也防制不住外国资本的侵入。这话在理论上是对的，但没有条约的根据他们毕竟有许多不便之处。即如日人在奉天一带早已实行杂居了，二十一条还特别要求杂居者也只是求一根据要点方便罢了。

总而言之，中国代表提出基本原则是对的，不过原则不当这样失脚这样消极，而且原则之下不当不附带主要的特别事实提案。假如认为原则附带事实有不便的地方，也应

当由顾王两使将山东案和廿一条提出。即不然，后手也理应抱定目的誓死力争。谁知原则的提出既没有什么决心，事实的议案更缺少魄力。以致山东案受人愚弄移到会外交涉，八大事实提案如关税自主，取销领事裁判权，裁撤外国邮局，撤退外国军警，废止租借地，取消势力范围，撤废外国无线电台及取消二十一条闹得没有较好的结果，连十大原则自身也未完全通过。我国代表——尤其是以外交家自命之某某两使——之柔弱无骨，畏首畏尾，实在没有宣扬五千年民族的真精神。关于此点等到第八章再详细解剖，此刻且不必细说。

（摘自《华盛顿会议小史》）

九国条约全文

美利坚合众国，比利时，英帝国，中国，法兰西，意大利，日本，荷兰，及葡萄牙为采取保持远东局势之政策，巩固中国之权利利益，增进中国与他国间根据机会均等之交往起见，决定缔结以此为目的之条约。因此特派全权代表（代表名单略）互示其全权委任状，经认为良好妥当，遂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除中国外约定：

一、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与行政的完全。

二、与中国以最充分最无累害之机会俾得自行发展并维持有效力而稳固之政府。

三、以其势力认真建设并维持全体各国在中国全境内之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

四、不得利用中国情状营求特别权利或特别利益致妨害友邦人民在中国之权利，并不得为有害此等友邦人民安全之行动。

第二条　缔约国约定不得相互间，或单独或会同与他国缔结足以违反或妨害第一条所述原则之任何条约，协定，合同及了解。

第三条　为使各国在华工商业门户开放或机会均等主义，得更有效之实用起见，到会各国除中国外不得营求或助其国民营求？

（甲）任何协定之足于私利本位上设定有关中国领土某特定部分商业及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者；

（乙）独占权或优先权之足以侵夺他国人民在华经营合法贸易实业或参加中国政府及地方当局各种公企业之权利者；或其范围，有效期间，及地理关系足碍机会均等主义之实施者。

但本条上列之规定不能解作禁止取得因经营特别商，工，财各业或鼓励发明研究所必需之财产或权利。

中国承认以本条上列规定之原则，应付外国政府或人民对于经济权利及利益之请求，不问该外国是否本协定之当事国。

第四条　缔约各国不得扶助其人民相互间因企图创设势力范围，或规定于中国领土特定部分享受共同排他的机会，而缔结之任何协定。

第五条　中国承认中国境内所有铁路不得实行或容许各种不正当之差别待遇。

如关于运费及方便，不得以乘客之国籍，或乘客来去之国家，或货物之原产地或所有人，或货物来去之国家，或在中国铁路运输前后搭载此等乘客或货物之轮船或他种运输机关之国籍或所有人为理由，直接间接为差别之待遇。

中国以外各缔约国对于上述铁路，有因让与权，特别协定或其他原因处于或其国民处于管理之地位者，应负担同样之义务。

第六条　中国以外各缔约国约定对于将来中国不参加之战争，完全尊重中国之中立权；中国声明中国为中立国时遵守中立义务。

第七条　缔约国约定无论何时遇有一种情形发生，经缔约国中一国认为有关本条约规定之实施，并须为实施之相当讨论者，缔约国应为完全且恳挚之交涉。

第八条　非本条约签约国之国家，凡有经签字国承认之政府，且与中国有条约关系者，应邀其加入本条约。为达此目的美国政府当对于非签约国为必要之照会，并以所接之答复通告各签约国。任何国家之加入，自美国政府接到加入通告时起发生效力。

第九条　本条约应依缔约各国宪法所定手续批准之，自批准书全部寄存华盛顿之日起发生效力。美国政府当将批准书之认证誊本分送其他各缔约国。

本条约用英法文作成，存储于美国政府之档库，其认证誊本当由美国政府分送其他各缔约国。

上列各全权代表以诚意签字本条约。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作于华盛顿。

附带决议

美利坚合众国，比利时，英帝国，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及葡萄牙，

为订定处理因执行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华盛顿所签关于各国一般政策条约第三条及第五条而发生之问题，并企图保持远东局势，巩固中国权利利益，及增进中国与他国间根据机会均等之交往起见，

决议——在中国设立审查部，凡因执行上述条款而起之问题，可交由该部审查及报告。

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在华盛顿所签关于中国关税条约第二条所规定之特别会议，应制定组织该部之详细计划请当事国采择。

中国宣言

中国自身准备发表不将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之任何部分割让或租借他国之了解。

（摘自《华盛顿会议小史》）

统一，借债，与国民党

（一九二二年九月）

和　森

辛亥革命既已成功了十一年，民主与封建之争——在袁世凯时代为共和与专制之争，袁死后为护法与非法之争——何以至今还不能结束呢？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并未解除，北洋派领袖且因其武力而完全承袭新政权，政体虽然是新的，而支配阶级则仍然是旧的。旧支配阶级——即封建的军阀与官僚——要扩张并巩固其地位，第一步就不得不增加其武力以压迫革命阶级并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二年独立失败，革命阶级完全解除武装而被驱逐于政权与领土之外，北洋派乃更进一步，实行推翻共和恢复封建政治。袁世凯死，段祺瑞承继其地位，自此以至于现在的曹、吴，政权总不出北洋派的掌握。

由此我们可得一个重大的教训：旧支配阶级的武装不解除，旧军队不完全解散或彻底改组，新支配阶级——即革命阶级——的统治权是不能保持的，他的革命是要被推翻的。所以法兰西大革命，罗拔士比极力破坏旧军事组织，撤换一切封建阶级的司令长官，最后第三共和之所以巩固，也是因为旧军队解体，共和国新军队完全成立之故。最近俄罗斯革命之所以成功，苏维埃政府之所以不能动摇，也是因为在十月革命前，用宣传手段，完全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第一步是废除军队中的死刑——，到一九一八年更完全遣散旧军队而改建工农阶级的红旗军。假使他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不完成这种根本工作，他们的新政权也是迟早要落于旧军阀之手，他们的革命也是迟早要被旧势力推翻，如中国辛亥以来的故事一般。

所以从这一点说来，中国现在政治问题，实在去真能解决之时还远，因为全部政权还在北洋军阀手里，北洋派的武力依旧是政治舞台上的主人。在这个时候谋政治上的统一，除彼此把他当作一种暂时的政策之外，真正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自孙中山先生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此事在形式上看来，吴佩孚之舍陈（炯明）联孙，及孙之弃奉而与一比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实质上怎样呢？据曹吴艳电看来，不过是空空荡荡称赞老孙的宣言罢了；至于他们对于江西问题是丝毫不肯让步，不任〔让〕民党有立锥之地作根据。然则直系之联民党，不是想利用民党为统一借款的招牌吗？不是与杨度近日对国会问题的主张同样用意吗（大要不外消灭护法名义，以便北洋派统一中国）？曹锟不过是北洋系一个死军阀，值不得我们多说，吴佩孚虽然比较进步一点，但他将来能抛弃北洋军阀的地位加入民主主义的战线吗？他对于曹锟言必称大帅，行必称服从，若长此下去，至多不过是一袁世凯或段祺瑞

第二要了，所以现在革命群众对于联吴之视为有意义，不过在剿灭红胡子之一点，因为张作霖一派野蛮势力之急须剿灭，于革命进程上乃属必要的。至张作霖剿灭后的吴佩孚怎样，乃系另一问题，决不要因此而疑虑张作霖灭亡之不利于势力均衡，因为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

由上看来，政治上的统一，显就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

孙中山先生迭次宣言曾说："政治上之统一，自以国会真正恢复为必要条件，"又说"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非常局面虽因陈炯明之变乱而终局了；但政治问题绝不会一下解决，因而革命之局还是不应收束的。比如"国会自由行使职权"一项，看来虽似平常而实际非铲除军阀不能做到，所以孙先生第一次宣言曾说"夫欲约法之效力不坠……在扫除一切不法之武力，否则国会之行使职权，不但徒托空言，抑且供人利用"又说："故直军诸将为表示诚意、服从护法起见，应首先将所部半数由政府改为工兵……其余半数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此改编。"第二次之对外宣言全局和平之第二项办法，也说"必铲除多年祸根之军队势力，非各省督军统治下之兵队悉照予六月六日改编工兵之计划则和平不得而期"这都是些探得病原的说法，但是以大义责军阀是无效的，必须此后继续用革命的争斗的手段才能做到。就工兵计划一项而说，民主革命的胜利确定，采工兵制以改变新军，是很有益的；若在现状之下，各军阀各自采用起来，则不但于时局无益，而且反可延长封建政治的命运，增加武人割据的势力。比如就近日吴佩孚发表之兵工计划而说，他说现在每一兵须费国库银五两，他的计划实行，只需银二两便足，这样一来，吴佩孚有事时，可就原有饷额扩充他的军队到二倍以上，并且军队饷源有生产的经济基础，封建的，割据的局势，不愈加严重巩固吗？各省割据的军阀大大效法起来，将来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无论从何方面说，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民众，轰轰烈烈继续做推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民主革命。至于政治上的统一，万不宜苟且将就以上当。

属文至此，偶然检阅本月八日的《民国日报》，看见"美报记孙总统之谈话"颇觉一惊！今把这个新闻抄在下面：

世界新闻社译英文日本《广智报》上海通信员索克思氏八月二十五日通信云：孙中山今日对客谈论中国之国际地位，谓中国之内部政潮欲求解放，必须先从解决财政入手，尤以解决北京政府之对外借款义务为特要。中山之态度，赞成外资继续参加于开发中国富源及建筑道路。彼云"在北京前此开始拖欠外债之前，欲先谋统一然后整理财政，其事虽非不可能，然极困难，今已不复如是矣。"中山谓北京若无一有效力之政府，能实施其命令于全国，并收集各省之税款而不遭阻挠者，则统一之举，徒属空谈。而国家之还债，若不恢复，则设立此种政府显然为不可能之事。中山于未觅到若干解决中国财政问题之方法以前，不准备加入北京政府，彼以为当小数薪金尚不能付之时，断然无法处理北京大局。关于彼有总统希望之说，彼云："倘余得有美国及其他中国欠债之国之保证，证

明中国提出关于归还过期外债借本之提议，将得优惠之考虑，又保证在依据外人良好顾问不久即将实行之整理时期内，新银团将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余将往北京。”

据这个新闻看来，似乎孙中山先生注意于北上谋统一，而以解决财政为入手办法。倘若得美国等欠债团[国]之保证及新银行团给与垫款以供寻常行政用途，则可以北上。这个新闻确实与否，不可得知，但我对于借款及新银行团颇有点意见，略写于下。

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位，最近经过华盛顿的宰割会议，更把他活活地放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协同侵略的“门户开放”政策之下，以为实现“国际共管”的地步。然则自动的借外资以开发中国实业，乃为国际帝国主义者所不愿闻，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标准，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故决不会容许中国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所以中山先生之机械借款说，英美法日的资本家，是不欢迎的。然而这种计划，实为中国民族独立自强的要素，不过其达到之方法，在事实上只有下列二途：

（一）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盟。

（二）努力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压迫，建立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仿照苏维埃俄罗斯之不损主权、不受束缚的招致外资及权利让与等等政策，迅速的、自主的开发中国大工业。

这两个方法，是最可能、最妥当的方法，是经济落后国和半殖民地所应当走的道路。惟有向这样的道路走才有解放的希望，惟有向这样道路走，才能得到独立与自由而不致永远为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奴隶。假使我们不察，只知梦想那些要永远隶属我们于他们经济利益之下的英美法日帝国主义者，来借款超渡我们，这不但不智，而且反要误了我们解放的前程。所以在这样的选择之下，国民党的外交方针，有从新估定之必要。

“美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换过说，就是最会使掩眼法、最会用宣传术以宰割中国的“好朋友”。他对中国除成功了“门户开放”“国际共管”的局势之外，更为中国组织一个新式的东印度公司叫新银行团。他口口声声为的是中国好，口口声声非等中国统一后不投资。其实这样不投资的高调，就是要迫使穷极无聊的北京政府早日承认他。现在呢，他的方针变了，想在未统一前借些钱给中国去“统一”了，但是要一切关盐烟酒等税收作“总担保”，并且监督用途，管理财政。团此我们应该觉悟在民主革命未完全成功，军阀未完全消灭以前，中国既无统一之可能，更无借款之必要。多借一笔款，多养几日兵，便多延长封建的军阀几日生命。倒不如饷竭兵变，他们要灭亡得快些。

总之，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三十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在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力，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涨高，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之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勿让土耳其基玛尔氏所领袖的国民党专美于前！

（原载《向导》1期1922年9月出版）

四派势力与和平统一

（一九二三年一月）

蔡和森

本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发布和平统一宣言，略谓："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张使护法问题完成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对于粤事主张讨伐叛国祸粤之陈炯明……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去陈逆而戡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斯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竭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曩者法统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转捩，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当已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彻底，且及毁法之徒谬托于恢复法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庆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备战之消息乃嚣且尘上……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诚心，而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亦其致此之缘故。试举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辜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何以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率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又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以前，四派暂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倘蒙各派领袖谅解斯言，文当誓竭绵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有谓须俟统一始可议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谈。何者？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其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画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有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一人监督之……诸公朝赞，则夕可商诸施行……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统一则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奋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

我们从文字上分析上列宣言，可得五个要点：（一）中山认调和四派势力可以立刻实现中国永久而非形式的统一，即所谓拟用和平方法来图统一；（二）中山以周旋于四派之间调节其利害自任；（三）调节其利害的入手方法，为四派暂是[时]划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相干；（四）统一之先决条件为和平，和平之先决条件为裁兵，主张

用兵工政策，来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五）主张敦请一个友邦为裁兵的佐理，并举行裁兵借款，债权人有参与监督用途之权。

直系奉系皖系是什么东西？是前清遗留和外力扶植的封建势力。西南势力是什么东西？除了现还忠于革命的领袖外，都是由封建残局孳乳出来的新军阀。（中略）关于统一问题，我们早就从事实上理论上论证过："政治上的统一，显然不是混合或调和各大军阀的旧势力可以做成的，乃须经过不停的革命奋斗才能真正成功。若舍却革命的宣传与行动，只与军阀谋统一，结果只有上当"；关于和平问题，我们认十一年以来民主与封建之争的主要原因，在旧支配阶级的武装未解除，北洋派领袖至今因其武力而承袭政权，所以我们屡次高声肯定，用和平方法去与军阀谋裁兵是做不到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根本破坏旧军事组织，由民众武装去解除旧支配阶级——军阀的武装。我们这种肯定是科学的归纳过去十一年的事实之肯定，不如此，和平统一是无望的。现在即使调和四派势力的政策能告成功，结果至多不过是维持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如划疆自守各不相侵……），换过说即依然是不统一不和平的局面。我们从纯客观的事实观察，从阶级争斗和国际的眼光观察，中国统一的形式只有两样：一是维持现状的封建的协调于内外势力范围的（如联省自治等形式）统一；一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族的统一。前样的统一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需要的；后样的统一是中国被两重压迫的人民所需要的。换过说，前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拚命反对；后样的统一，中国人民应拚命促成。现在中山的政策是促成前一种的统一呢，是促成后一种的统一呢？从这点推论，我们不能不说中山现在调和四派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

我们固然知道小资产阶级和平空气还布满全国，人民左袒革命的还属极少数；我们固然知道国民党此时若继续北伐等军事行动将愈惹起商民的误解和畏避；但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大革命并不是要国民党纯粹建立在军事行动上面，（中略）也不是要国民党只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不去领率种种零零碎碎的民众运动和政治要求（中略）；我们乃是要国民党建立在有系统之革命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的群众宣传上面；我们不是空想的忽略实际的革命家，对于一时还不能根本推翻的军阀和至今还不感觉革命需要的商民，并不反对用一种适当的政策去证明武人怙乱之下的和平企图之不可能；但我们反对国民党离开革命的地位而以周旋于四派军阀间的调人自处；我们更反对国民党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友邦"（或美或日）来合作中国的内政，因为这样一来不仅犯于与军阀妥协的毛病，而且犯了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的嫌疑。

象中山这样太右的和平妥协政策，在上年六月和八月间发表还不失为稍有意义，因为那时全国商民更是死气沉沉，一面又梦想黎元洪"鱼电"的骗局或能实现。现在民间空气就比较的不同了，纵然商人与虎谋皮的希望还未尽消，但同时他们已觉到和平哀求的手段终难有效，所以准备举行全国的大示威，而继之以罢市罢税等抵抗；此外智识阶级与工农阶级间的空气更形愤慨激昂。不意国民运动的领袖忽于此时出此右极的政策，简直比民间现在的空气还更右！"打倒军阀"渐渐成了士农工商普通的口号，而国民运动的领袖反高唱与各派军阀大调和！试问革命分子对于国民党将作若何的感想!?我们更要问，现在国民党的民众基础在那里？国民党直到今日还是局促于局部的军事行动而疲

于奔命，对于基本的革命宣传工夫一点没有做，就是我们屡次所要求的全国大会至今也还没有召集！国民党长此在无民众后援的空架子上做上层的工夫——而且专门是做与军阀相周旋的危险工夫，一旦失败下来，不但一个民众的波涛引不起来，而且民众将认他的失败为应得之咎。假使中国有个象俄罗斯共产党一样的民众势力基础的党，于此时采用和平统一的政策号召各军阀，那么各军阀不听从时，马上就有几百万工人几千万农人起来拥护这种政策而与军阀宣战。现在国民党那里说得上这个呢？不久中山这次调和各派军阀的和平统一的号召失败，我们敢说在民众中一个影子也没有。所以象有民众基础的俄国共产党来采用一个这样右的政策或还没有什么大的危险；但象无民众基础的国民党来采用一个这样右的政策，前程是很危险的！

（原载《向导》18期，1923年1月31日出版）

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

（一九二三年六月）

春　木

国民党应当是国民的党，是领导国民群众的政党；所以他的职务应是组织国民群众，在国民群众宣传，鼓起国民的精神。国民党和国民群众须有一种密切的关系；无论何时国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国民党应立刻就去帮助他们的奋斗，去指导他们走正当的道路。要在国民的心中有国民党是能代表他们，能代他们利益奋斗的观念。这样一个国民党方能算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这种国民党准成功无疑的。土耳其的国民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

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无怪乎国民不愿认国民党为他们的党，实际上国民党没有做他对于国民应做的事情，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我们不能说国民党的分子没有参加近年来的各种国民运动，并且的确国民党人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亦很尽了一分力量。但是个人的行动和党的行动是大有差别的。例如上海六月三日这次国民大会，有许多国民党的人物参加在内，但是国民党的面目没有拿出来。据说国民党有意在国民群众运动中不把旗子树起来，因为恐怕国民党的旗子树起来了反把群众吓跑了。这种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日日和国民接触，使他们渐渐相熟，知道国民党是他们的党是为他们奋斗的党，于是国民党才会得国民的拥护。如果大家不相接近，愈离愈远，那末国民党将变成无国民的政党。国民党的现状就快要到这个地位了，这是国民党里的稍明白的分子都能觉察到的。国民现在所以怕国民党的名字因为国民党一直所采的方法和一切混蛋的政团如安福系，交通系，直系，奉系等的无甚差别，固然在主义上面自然大有不同。如果国民党能把以前错误的政策改过来，注意于国民群众运动，注意于国民的宣传，国民非特如现时的怕惧国民党将欢迎之不暇。所以国民党不应当如旧礼教的女子怕抛头露面而不见国民群众，应在各种国民群众运动中高树国民党的旗子接近国民，指导国民，鼓起国民精神。这才是真正国民的党，这个国民党一定能如土耳其的国民党能达到同样的成功。

（原载《向导》29期，1923年6月13日出版）

〔附〕孙中山一九二一年对外宣言

四年以来，爱国之士，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名为南北之争，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而已。北方人民，对于南方宗旨，固表示同情；观其历次所行运动及抵抗，与南方同一宗旨，此其明证矣。北京政府对于名义上受其管辖之省分，亦失其统治之权力。一任军阀之劫夺人民，荼毒地方；北京政府，反须听军阀之命令，而军阀且因争权而互斗。近彼派中竟有大逆不道，与俄国帝党联络，攻陷库伦者。前北京政府内部空虚，呈倾覆之势；外人之占据，且骎骎由北而南；中国之为国，正处于最危险之地焉。自一千九百十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虽有新选举法，制造新国会之成立，均无法律之根据。凡此种种行为之不合法，竟由徐世昌自行承认。去年十月，彼曾命令行新选举。不依新选举法；即依旧选举法；然而新选举法者，徐氏地位之根据也；旧选举法者，与徐氏地位不相容者也；是自称总统者，已自认其名分之不正矣。际此时期，国家生命，如此危险，北京又无合法能行使职权之政府。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受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一千九百十一年，文曾被选为大总统；执政未久，旋即辞职。当时用意，在促成南北之统一。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举文为大总统之国会，固代表完全国家，不分南北者。是以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的，修明的，政府管理之下。列强及其人民依条约契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当尊重之。令图最大之利源，或为天然，或为工艺，必悉与开发。则全世界经此数年大战损耗之后，亦可因此获有裨益。诸所措施，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南方各省既处良好政府之下，享受正直的，建设的政治而益发达。深信其他各省，不久即脱离军阀之羁勒，腐败之政治，而奉承本政府之主权。于是渴想之统一，即可成为事实矣。又责任虽重，然以北京政府之不合法及无能力，自信尚能达其目的。北京政府已不为国人所公认，彼之幸存，不过据有历古建立之国都，因而得外国之承认。一千九百一十三年，国会组织之民国政府，曾经友邦之承认；本政府亦为此国会所组织者，应请各友邦政府援此先例，承认为中华民国唯一之政府。本政府当局，绝无挟私图利之见，咸怀竭力为国之心。其所代表之主义，民国而得生存，且得在国际上固有其应有之地位，则其主义终必优胜。主义维何？曰自由，曰法治，曰公益。孙文

〔附〕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宣言

中国之所以革命，与革命之所以成功，原因虽繁，约而言之，不外历史之留遗，与时代之进化而已。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以愈广。以言民权：则民为邦本之义，深入于人心；四千余年残贼之独夫，鲜能逃民众之斧钺。以言民生：则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由学理演为事实；求治者以摧抑豪强为能事，以杜绝兼并为顺德，贫富之隔，未甚悬殊。凡此三者，历史之留遗，所以侵渍而繁滋者，至丰且厚，此吾人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者也。然民族无平等之结合，民权无确立之制度，民生无均衡之组织，故革命战争，循环不已，盛衰起伏，视为固然，而未由睹长治久安之效。近世以来，革命思潮，磅礴于欧，渐渍于美，波荡于东亚，所谓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乃由磨砻而愈进于光明，由增益而愈趋于完美。此世界所同，而非一隅所能外者。我国当此，亦不能不激励奋发，于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矣。

本党总理孙先生文，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俾民治臻于极轨，国基安于磐石；且以跻于有进而无退，一治而不复乱之域焉。夫革命之内容，既异于前代；革命之手段，亦因以不同。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取独夫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于民众之未喻，则劳心焦思，瘏口晓音，以申儆之；且不恤排万难，冒万险，以身为之先。及其既喻，则相与戮力，锲而不舍，务蕲于成而后已。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本此宗旨，爰有兴中会之组织。事出非常，顿遭挫折。继以时势之推移，人心之感动，志于革命者，乃如水之随地而涌。于是更扩而为同盟会。党员偏于各省，而弥漫于海外。主义之宣传与实行，前仆后继，枕藉相望。党员为主义而流之血，殆足以涤尽赤县之腥膻矣。清廷既覆，民国肇兴，以为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宪政实施，宜有政党；故国民党因以成立。中更癸丑之变，痛邦基未固，国难方殷，复有中华革命党之改组。集合同志，努力与卖国称帝者为敌。及帝制既踣，革命之进行，于以停止。既而武人毁法倡乱，国内汹汹，连兵数载，未获宁息，同人感于主义之未贯彻，责任之无旁贷，乃更组织中国国民党，以与全国人士共谋完成民国建设之大业，而期无负初衷焉。盖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溯自兴中会以至于今，垂三十年，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顾所成就者，为主义之成就；而所挫折者，则非主义之挫折。特进行之偶然颠踬而已。民国以前，吾党本主义以建立民国；民国以后，则本主义以捍卫民国。前此数年，为民国与非民国之争；最近数年，为法与非法之争。反对者挟持之力非不甚强，然卒于一蹶而不能复振；盖其所施为者，违反国情，悖逆时势，有以使然也。然亦惟反对者之梗阻，与中立者之

观望，遂致民国之建设事业，进行迟滞，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得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所求最后之成功已耳！所谓成功者，非一人一党之谓，乃中华国民，由阽危而巩固，而发扬光大之谓也。本党同人，爰据斯旨，依三民，五权之原则，对国家建设计划，及现所采用之政策，谨依次陈述于国民之前：

一、前清专制，持其宁赠朋友，不与家奴之政策，屡牺牲我民族之权利，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位矣。故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其大要如左：

甲　励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

乙　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

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欲践民权之真义，爰有下列之主张：

甲　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

乙　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之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

丙　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

三、欧美经济之患，在不均，不均则争。中国之患在贫，贫则宜开发富源以富之。惟富而不均，则仍不免于争；故思患预防，宜以欧美为鉴，力谋社会经济之均等发展，及关于社会经济一切问题，同时图适当之解决，其纲领如左：

甲　由国家规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价税法；在一定时期以后，私人之土地所有权，不得超过法定限度；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报价值于国家，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得依报价收买之。

乙　铁路，矿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规模之工商业，应属于全民者，由国家设立机关经营管理之；并得由工人参与一部分之管理权。

丙　清查户口，整理耕地，调正粮食之产销，以谋民食之均足。

丁　改良币制，以实货为交易之中准，并订定税法，整理国债，以保全国经济之安宁。

戊　制定工人保护法，以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徐谋劳资间地位之平等。

己　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

庚　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徐谋地主佃户间地位之平等。

同人所计划，尚有不止于是者。右所陈述，特其涯略。其余国家重大事项，将依本党规程，就专任委员研究之结果，继续就商于邦人君子。谨此宣言。

中国国民党本部

〔附〕孙中山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和平统一宣言

北京黎宋卿先生，张敬舆先生，冯焕章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张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珊先生，洛阳吴子玉先生，南京齐抚万先生，杭州卢子嘉先生，并各省农工商学各界各报馆转全国国民鉴：文于往年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对于国事主张使护法问题完全解决，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对于粤事主张讨伐叛国祸粤之陈炯明，以申国法而靖粤乱。今者讨贼诸军已逐去陈逆，而戡定粤局。则障碍既除，建设斯易。文于抚辑将士及绥靖地方外，当尽心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并务以求达护法事业之圆满结束。如是庶几六年以来之血战，卒得导民国于法治之途，凡诸为国牺牲者，可得代价而少慰；而此分崩离析之局面，亦卒得归于统一，文始获与国人雍容讨论以图治。惟旷观全国，以北京政府尚未纯践合法之涂辙，故犹多独立自主省分，北京命令不能遽及，统一之业仍属无期。回忆年来南北纷争，兵灾迭见，市廛骚扰，闾阎为墟，盗乘隙纵横靡忌，百业凋残，老弱转徙，人民颠连困苦之情状，怵目恫心。窃以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前者西南起义，特因护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于今日则各方渐有觉悟，信使往来，力求谅解，较之昔时已为进步。曩者法统之复亦可为时局一大转捩，诚得西南护法诸省监护匡助以底于成，此时之中国已入于法治之轨。徒以陈逆叛变，护法政府中断，而北京政府所为，遂致任情，而未及彻底。且以毁法之徒，谬托于恢复法统，国会纠纷及今未解。而于人民所渴望之裁兵废督诸大端反言行相违，不复稍应其求。而增兵战备之息，乃嚣且尘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长此不悛，匪特求治无期，助乱速祸，实未知所止。今之大病固在执政柄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诚心，而国中实力诸派利害不同，莫相调剂，亦其致此之缘。试举今日国内势力彼此不相摄属者，估较计之，可别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护法诸省。此四派之实际利害果以何冲突，亦自难言。然使四派互相提携，互相了解，开诚布公，使率归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为天职，则统一之实，不难立见。文今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在统一未成之前，四派暂时画疆自守，各不相侵，内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约，以企统一之成。倘蒙各派首领谅解斯言，文当誓竭绵薄，尽其力所能及，必使和平统一期于实现。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张皇武力滥行招募而可讼言和平以话人者。诚知兵多之足以乱国祸民，则减之惟恐不速，不容借端推诿，以黩武之私衷，为强国之誓论。各派首领不乏明达，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其间当大有其人在也。当此谬说有谓，须俟统一后始可议及裁兵者，此未免为怙乱之谈；何者？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盖拥兵以言政则政紊，拥兵以言法则法乱，强权盛则公理衰，武力张则文治弛，此必至之期，国人所身受，语焉能详者也。不裁兵而言和平，犹挟刃以谈揖让；不和平而言统一，犹视斗争为求友好。愚者且窃然嗤之，而况并世之贤豪，岂复昧此而谓国人可欺耶！然而非

徒责难之谈，堕空之论，其裁兵办法，可以坐言起行者。文筹之已审，其纲要有三：一、本化兵为工之旨，先裁全国现有兵数之半。二、各派首领赞成后，全体签名敦请一邦为佐理筹画裁兵方法及经费。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监督机关外，另由债权人并全国农工商学报各团体，各举人监督之。其详细条目，则由专员妥订。诸公朝赞成则夕可商诸施行。此在诸公一转念间，而国民将感拜嘉赐。文亦当率西南诸将，敬从诸公之后不敢有避。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财政实业教育诸端始获次第为理，国民意志方与以自由发舒而不为强力所蔽障。其为统一，则永久而非一时，精神而非形式；国人同响于法律范围之内，而无特殊势力之可虞。盖兵者所以防国而非私卫及假以窃权之具也。能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轨，以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域，百世实利赖之。不然者，民严可畏，不戢自焚。文爱国若命，将不忍坐视沦胥，弗图振救。诸公之明，当不复令至此。语曰："人之好善，孰不如我"。诸公当代人贤，谋国有素，其一聆鄙言而决然许之，毅然行之乎！？此实诚悃之忠言，期代人民呼吁，而冀诸公相与为实践以矫虚与委蛇之失，而塞河清难俟之机也，敬布区区，愿闻明教。孙文·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于上海。

〔附〕上海各团体发表废督裁兵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

欧战结束而后，世界人类，咸悟兵凶战危。太议主张，限制军备，乃成事实。我国岁出三万万有奇，而军费直耗至三分之二，各军阀自由招募，保卫个人地盘禄位，增兵无已，目前统计全国已有百五十余万，年年递增，害伊胡底。四万万主人翁，除以血汗年供二万万余两军饷而外，所受军人酬报者，十年来之哗变劫杀，南战南，北战北，南北交战等之流离颠沛，与奸淫掳掠而已。老填沟壑，壮散四方，京、津、川、滇、黔、湘、粤、桂、赣、闽、鄂、豫、陕等战线内之兄弟姊妹，无辜饮弹。血溅草莱，尸横郊野。十年三千六百余日枉死冤鬼，不知有若干万人。更因兵患酷烈，无力经营，酿成水旱灾荒，连年冻饿死者，又不知有若干万人，农工失业，商务摧残。教育破产，青年失学。斫断元气，危及国本，要皆中华民国军阀之最著成绩，而为国民所身受之永远纪念者也。

今幸世界潮流所迫，全国一致主张废督裁兵。黎公鱼电，各督赞成。浙卢首先自废，限定六月，化兵为工。新疆杨督，实行废兵，积极进行，为天下先。全国同胞，顶祝敬佩。无如各省应者寥寥，殊堪危惧。鱼电主张废及镇守使，日前乃犹有镇守使之任命发现。夫国民被电骗久矣，简单言之，吾人只求能移每年二万万之军饷，作兵士筑路与垦牧生产工作之费用，绝不愿再供数万万军饷，以自杀自焚。尤不愿裁兵废督之频频出诸空谈，亟盼全国官吏，与国会议员，彻底觉悟，各凭良心，首先办到裁兵一件大

事。其他百结，均可迎刃而解。若兵不能公平裁处，一切国宪、省宪、自治与联省自治等，均是骗人之假名词。共和幸福，绝难实现。而吾侪四万万主人翁，且将有万劫不复者矣。今特集合沪上各团体，组织裁兵促进会，以试验一般主张裁兵废督请自隗始之伟人先生，对于此举，有无诚意。主人翁虽被压迫，毫无实力，然而民意所在，即舆论所归，即正义所系，虽有强权武力，如秦政威廉，终归失败。是以满清百日而亡，洪宪八旬而殂，其余历历可数之军阀，亦莫不因违背民意，而倾复逃亡。以项城之雄，虽能伪造民意，而终不致胜民意，余则更无论矣。今既全国一致主张废督裁兵，正宜顺从民意，永留去思，而救己身与民国之危亡。且可逍遥自在，安作富翁，子孙世守，永无亡身破家之危险，不亦善乎。试观世潮趋势，军阀已成弩末，各省如不食言，法卢杨两公先行自废自裁，一转移间，百万不生产之人，悉化为生产之人，向之祸国殃民者，一变而为福国利民。为海内军阀要人乎，试决心放下屠刀，立地自能成佛。岂但流芳民国史乘，而欧美列强，亦无不倾心崇拜我国最仁德之军阀，真能爱国爱民善始善终者也。良言苦口，略尽于斯，吉凶祸福，悉在军人自召。我工界同人言之殊愧不文，而耿耿愚衷，务期达到息事宁人群生乐利之本旨，庶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谨特宣言，诸希共鉴。德音惠赐，尤切感铭。

中华全国工商协会
中华国货维持会
粤侨联合会
华侨联合会
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
中国花边联合会
旅沪商帮协会
中华全国道路协会
中华工商研究会
等二十余团体同启

（原载北京《晨报》，1922年7月12日出版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一九二二年九月）

蔡和森

（一）乱源的分析

一个时代的政治变化，有一个时代的经济变化为基础，所以近世政治史上的民主革命，不过是经济史上产业革命的伴侣。中世纪末，封建制度既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大企业的桎梏，所以被桎梏的资产阶级便起来推翻封建而建筑近世的民主政治。

因为资本主义的东侵，民主革命的潮流自然也要随着波及东方被侵略民族的弱国和经济落后国。故中国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数十年严重压迫之下，便发生了“改革内政以图自强”的革命运动。

然国内农业手工业的经济基础虽日被压迫，日见崩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却不容许其起一种强大普遍的变化，因而经济地位上强有力的革命阶级没有形成，不过少数觉悟的革命党，凭借饱受外国刺戟的外埠华侨势力，奋斗不息，勉强完成辛亥革命罢了。

故中华民国，乃是革命阶级羽毛未丰，将就封建的旧支配阶级势力，与之调和妥协而后苟且成立的。这样一来，更加以国际帝国主义扶植旧势力以图自便的捧袁空气之压迫（当时捧袁外论，英美主之，压力极大，对于民党吹毛求疵的疑惧或诋毁，极力制造中国非袁则亡，则惹干涉，则不被承认等空气），及全国还无革命意识的小资产阶级和平、统一、妥协等倾向之鼓荡，自然新政权不得不完全落于封建的军阀与官僚之手。由此就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自帝制，复辟，以至今后假名统一与联治之争，那一役不是根源于未曾解除武装而且反为新统治之主人的封建余孽呢？

所以今日不但直、奉、皖各系军阀为前清遗下的北洋派嫡系；就是川、湘、滇、粤等经过民主革命领域的新军阀，也是在这封建政治的残留局面之下孳乳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正确的肯定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看“努力”十九号）！我们要高声说：他那种牵强皮相的分析是很谬误的。

（二）封建残局下的政治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

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这样的阶级战争，发生于一定的经济情形和国际情形之下，谁也不能否认。假使经济地位上的革命阶级早已成长，假使国际帝国主义不忌革命党统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那末，十年之中民主革命总可完成，把旧支配阶级解除武装而退处于无权。这样，则中国现状早已上了民主政治轨道，由新支配阶级来制定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都是容易解决的事体，何至酿成内乱与战争？只缘新旧支配阶级同时并立，旧势力反占优势而握得政权，所以元二年间总统制，内阁制，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以及同意权之争，才成为北洋派与国民党爆裂的导火线。所以这些政制上的争执，不过为内乱的导火线而已。新旧势力之不能两立，才是内乱的真实根源。

所以要国体政体确定，非先确定新旧两阶级的胜负不可，要靠妥协、调和来立国定政，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旧势力完全推翻革命，解除革命阶级的武装，封建政治才能完全恢复；也只有新势力完全制胜反革命，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成立不然宪法制定也是无效的，政制修明也是徒然的，换过说：新旧阶级的地位没确定，死文字的规定，不能发生作用。

国家政权，系建筑在阶级抵抗上面，为这阶级用以统治别阶级的机关，只能属于一个支配阶级而不能有两。若一国有新旧两个胜负未分的支配阶级同时存在，各据政权或武力以相抗，则其现象必为内乱与战争，或妥协苟安之局，而其政治，必为半新半旧非驴非马的东西。所以中国现在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争斗，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

由此可以断定：在这样情形之下，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换过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

（三）军阀所要的统一与联治

假使民主革命成功，民主政治有确立之可能时，政治上的单一制与联邦制，不过为宪法上一个容易解决或修订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现在横在我们之前，则完全为另外一回事。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位置动摇时改称省自治（如浙）或打算取消省自治（如湘赵）；又如湘赵最初之因首鼠两端而宣布省自治，粤陈之想王广东，反对北伐而主张联省自治……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所以统一派的军阀最忌联治，联治派的军阀最忌统一，换过说，就是为帝者不愿众建为王，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或则为帝不成而思王，为王不愿而思帝，完全为军阀间一种斗剧。

可是在这样武人主倡的联省自治说之下，却激起一部分政论家和智识者"将就现状""因势利导"的赞同，认为是解决时局的惟一方针。最近胡适之先生在"努力"十九号发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他估定联邦运动的作用为"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

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他更找得与军阀作战和推翻军阀的工具为省议会。这不可不说是联省自治论中的大进步。

但我要明白告诉适之先生：你这种英国式的议会政策用在政治问题解决后——即封建的军阀被推翻后——是有点作用的，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军阀没有铲除的时代，省议会无法免掉他们的制造、强奸、蹂躏和压迫，如此而可望充分发展地方的潜势力，来和军阀作战，来推翻军阀吗？故适之先生当承认：你这种和平改良的议会政策，原先想借议会来推翻军阀，结果只有军阀推翻议会，这是武人政治下的必然律，证以过去现在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否认的。

适之先生一若承认过去为法治而不为武人政治，故将督军总司令权力扩张之原因归于地方之无“权”；又若承认今后也为法治而非武人政治，故主张赋地方潜势力以合法的“权”，使之到省议会里面去与军阀作战，并“大胆”肯定打倒军阀割剧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剧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

（四）中国唯一的出路

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换过说就是怎样革命。若忘记现状——封建残局——以为改变一种政制就可以止乱定国，那末，不将乱源嫁于政制，便将政制认为是止乱的方法。胡适之先生便完全犯了这种错误。在今日而讨论未来的政制可以说是无病呻吟，毫无意义，若讨论现实的政制，则决不能置现状于不顾。所以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势必成为割剧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奠定，唯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在现状未完全打破之前，地方政权不能脱离军阀之手，中央政权也不能脱离军阀之手，所以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是强有力的革命党；不是武力的统一，但是革命的统一。我们既不梦想一个将就现状或超越现状的宪法来统一，更不梦想大批军阀来统一；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统一的目的要建筑在最大多数贫苦群众的幸福和全国被压迫民族的对外独立之上，才能够真正的统一。

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漫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知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所以革命数十年，议论卅载，上不能破坏旧军事组织解除军阀的武装，而反使封建残局孳乳延长；下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而坐失了许多可以扩大兴奋的宣传运动之机会。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萦情于现成的势力及不可得到的外力帮助而不能自已，致使可以澎涨的革命潮常常因而收缩，乃反蔑视群众无力，或诬群众麻木，不知真正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的。这些都是真有改革精神之政治家政论家所应急于觉悟而改变的。可是现象不然，或则仍然梦想借外力以废督裁兵，或则仍然梦想联合几派现存的势

力来统一，或则梦想改变一些纸上的制度来和平改良。够了！这些过去都已试验了，现在须得觉悟起来罢！大家试想想：不要以为除革命外还有别的出路，不要以为革命没有办法，假使能将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精神去求助于群众；假使能把一部分工夫去做违法的工作，破坏旧军事组织和纪律，激起兵士们的自觉心；假使能够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那末，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的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

（原载《向导》2期，1922年9月20日出版）

廿九

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

——驳章士钊之“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
（见十二年四月十八及十九两日之上海申报）——

（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

瞿秋白

（一）中国现时的国会并非代议制！

章士钊说：“……论者八九左袒议员无耻之说（指江苏省议会‘教育费议案’之争而言），目击号称神圣之议士化为粪土，不胜慨然，彼窃以为己身……设与时会步入议林，断乎不作此等下流无耻之事。呜呼！此诚一孔之目论，自视太高视人太卑，忽略人类共通之弱点，而绝未察及代议制所以致病之症结也。”章氏此番议论真好极了，大可一辟中国人的唯心观，“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等的空谈。不但如此，他还想指出代议制致病的症结。我们且洗耳恭听。

“代议制者，吾国古无有也，近来有此一物。徒以欧洲诸国以此为文明之标识也，吾捧心而效之，点缀共和，于焉取资，——殊不知欧洲之有是制，乃出于事势之适然，——而非创议建国在逻辑非此不可。”既如此，章氏以为代议制不适宜于中国——在逻辑可以不取。然而中国竟有了他十二年，你说奇不奇？难道仅仅因为学步欧美？

这却很费研究：还是先有逻辑再有中国的呢，还是有了人类社会再发生一切科学的？社会制度，假使已能由人按逻辑拟就随意装置，那就天下也可以不用如此多事了。我们比如看历史，先看最客观的事实的描写：

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二三年亚洲东南部的中国里发生一种国会制度，其中议员如此这般的坏，做了如此这般的丑事，闹了不少笑话，闯了不少穷祸。

中世纪末，“代议之设滥觞英伦”，自此，“欧人运用议会，已数百年，社会繁昌，按时有进，虽非理想之绝论，要不失为实用之良规。”

此种叙述虽暂时不说到此制度的“因”，亦不涉及他的“果”，可是有时间有空间；——假使按此时空关系再加各方面的考察，作根本的研究，——其时其他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基础，就可以显示中国国会所以成其为“中国国会”的缘故，英国议会所以成其为“英国议会”的原因。再进，根究设此制度之后所发生的现象，也就可以追得到他的本源，而且看见他以后的倾向。若是脱离时空，不着边际的说“代议制”，甚至于将

一切乱祸之根源卸罪于代议制，那就何以异乎康有为之骂共和！同是一种倒因为果的怪逻辑。

要知道：英国有如此这般的议会“乃出于事势之适然”，中国有如此这般的国会，亦“出于事势之适然”，假使说一好一坏，那亦是适然的好坏。英国当初设不发生议会制，亦必有其他制度代之而兴，以应工业国之需要。中国此时设不学欧美，亦必有其他现象勃然爆发，以显农业国之崩坏。英国工业那时有蒸蒸日上的情势，即使没有议会，亦是好；中国农业此时在日就崩败的地位，即使没有国会，亦是坏。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因，当然不能生两种相同的政治制度的果。英国代议制，的确不错，“不能离纳税二字，别成一义。代表者何？质言之，即代表入税者之荷包也。……近世资产集中，所谓荷包大概为少数资本家所佩戴，荷包之大者每得多士，尤大者尤多士。”以至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无不如此。中国的国会议员既不是〔足〕以代表纳税人，当然更不能拥护“民权”，只有假借名义兴风作浪，卖身拜寿，——十二年没有改造，还在耀武扬威。

我们即使用客观的形式逻辑：“工业发达的国家方能有代议制；中国工业未发达；所以中国尚未有代议制成就。”这却与事实还相符。假使揣章氏的意旨，要用主观的逻辑：“工业发达的国家方可采代议制；中国非工业国；所以中国不应当采代议制。”那么，我请章氏放心——中国现在还并没有采英国式的代议制，照章氏自己的叙述，就可见中国的国会制并非代议制。中国的国会与英国的代议制相比较，只有一点相同：“国会”两个字是从西文“巴力门”译过来的。难道因此便可以说中国已采代议制？中国国会所代表的人及其所行使的职权，绝对与代议制相异，难道能说中国国会中的恶现象，甚至于国会外的政治上一切纷扰昏乱，——都是代议制之赐？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到创造资产阶级式的代议制之时；即使抽象的数量上的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当年英法民主主义初兴时的工商业，然而他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也与英法当年大不相同；况且中国原有的农业经济蜕变而入于工业经济之过程，更与当年的英法相异。英法工业之渐入于汽机时代，是自动的进化，不但有纯粹的经济独立，而且有由独立而更进一步的侵略倾向。中国工商业之发展，迎受“汽机文明”，是受动的外铄，因此丧失其经济独立，而几乎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之附庸，英法小农业固然亦渐渐破产，同时却因其经济独立，可以渐生机器化的大农场以代小农，中国小农的破产，既由于外国货物之侵占市场，更因经济已失独立，便绝无缓步从容以自力经营大农之可能。因此，英国议会中可以渐渐发现大农地主，已经变相的封建诸侯的代表，以及大资本家，工商业银行家的代表；而中国国会中商人既无政权，农民还在睡觉，只剩一班高等流氓。中国不但并没有采代议制，而且本来就没有采代议制的可能。（这是十二年前，——章士钊所谓“学步欧美”时的话。）

至于国内政治的纷扰昏乱，是中国此种经济动象的反映，国会不过是此万恶之中的一恶；并非因有国会而政治纷扰，亦许因政治纷扰而产生这种国会。

（二）中国国会已成军阀政治之一机械

章氏又说，英国的国会及代议制，因有“荷包”所以好，中国没有“荷包”，所以坏。

诚然不错，中国不是工业国，所以没有“荷包”。然而“中国不是工业国”并非不应当采代议制的理由，而正是采代议制而现如此种种情态的根源。换言之，亦就是采代议制而无工业国家式的“荷包”之客观的原因。中国的国会议员难道没有中国式的荷包？这都有彰明较著的事实足以证明。

国会一类的东西，在一国之中不外有两种作用：一、为治者阶级把持政权或新兴阶级夺取政权之工具；二、为治者阶级各部分之间的调节机关或此各部分间之斗争的表显发露之处。至于维持国会议员的生活费，——所谓“荷包”，还是第二层问题。然而这种“荷包”必是治者阶级或新兴阶级担任，——换言之，即议员为猎狗，治者阶级或新兴阶级为猎人，某猎狗为某猎人所用，当然必受此猎人之豢养。——这都是一个通则。英国的治者阶级是大农地主及资本家；英国议会就代表他们，压迫无产阶级；——英国资本家等正用得着议会。中国的治者阶级是军阀，中国国会就代表他们，压迫劳动平民；——中国的军阀正用得着国会。（难道以前的王揖唐对于段祺瑞没有用处？现在的吴景濂对于曹锟没有用处？）英国议会里常常表显保守党（地主）自由党（工业家）之间的斗争；中国国会里亦常常表显所谓皖派直派奉派等的斗争。英国议会中政党的“荷包”，由地主资本家供给；中国的政客及选举费——中国式的“荷包”，由军阀担任。（袁世凯的参政院，段祺瑞的安福部，曹锟的红萝厂，岂非实证！）

可见中国并非没有“荷包”，不过“荷包”的形式不同罢了。因“荷包”形式之不同所以有章氏所指出之四点不同之处：（一）欧美为政不必以贿成，中国必以贿成；(二)欧美政客失势而生活费有着，中国政客今日失位明日即同饿殍；(三)欧美政党之政略人才均余裕，中国则穷促；（四）欧美议会与选民间之情感不伤，中国则人民恨议员刺骨。前三者只是英国治者阶级富裕而中国治者阶级穷窘的表征。至于第四项，则章氏以资产阶级的观点立言，所以觉英国议会不可恨，而中国议员可恨，——因章氏所谓“人民”是资本家，他在英国自己处于治者地位能运用议会，自然不恨他，而在中国他还处于受治地位，，不能运用议会，自然恨他。英国议会于无产阶级间之感情，章氏亦能说“不伤”吗？

英国地主资本家所取得“荷包”的方法，——就是剥削工人，掠夺殖民地，——假借人道主义的美人，实际上即以商业手段，组织工厂的方法，经营托辣斯的金钱魔力，渐次积蓄而来。中国军阀取得“荷包”的方法，——就是攘得权位，卖官粥爵，指使政客兴风作浪、明火执杖的抢来。章氏以为前者比后者好些。章氏以为英国议员因此“为君子易为小人难”；中国议员亦因此而“为君子难为小人易”。此处所谓“君子”，真正是“远庖厨的仁术”！英国取得“荷包”的方法，吸取劳动平民血汗的方法，比较的精密隐藏，外表不大看得出来。中国人却“野蛮”，格外做得出来，使亲自参与其事的

人，天天眼见油锅炮烙（享不到英国文明人的“眼不见为情的福”），所以一时有动于其“不忍人之心”，说出几句“良心话”，然而这不过是“个中人语”，是以为研究中华民国开国史的材料，而不足以说明代议制不适于中国。

如此说来，中国并非没有“荷包”，——中国自有中国式的“荷包”；因此，中国也无所谓不适于用代议制，——中国自有中国式的国会制。欧美治者阶级富裕，所以他取得“荷包”不以政治为手段；中国治者阶级穷窘，所以他取得“荷包”即以政治为手段。章氏之所谓“代议制不适于中国”，其实根源乃在于此。不论国会省会的议员，无不是大军阀小军阀的机械，其理由亦正在此，——盖非军阀亦不能借政治以取得“荷包”。此种政象中，我们已明见中国没有工业国家式的荷包及代议制，章氏通篇所说也仅是叙述此种政象，并未说出他题目里的“何以不通”。——本来就无所谓应当不应当，更无所谓适不适。于此可见，章氏的“设问”先已错了，更不必说答案。

章氏不应当先设一主观的死逻辑的规则“非工业国不应当采代议制”；更不应当说：“中国议员的腐败是学步欧美采取代议制之结果”；尤其不应当说：“中国没有荷包，所以代议制有害。”

事实上是：（一）中国既非欧美式的工业国，所以还并没有欧美式的代议制；(二)中国国会，因其经济基础的畸形，自成其为一种畸形的制度；（三）中国经济基础中发生一种中国式的荷包，以维持中国式的国会省会制度。

（三）中国何以有如此的国会制？

若要讨论研究适与不适的问题，应当先有客观的考察对象。所以我们且不问代议制适不适，先问如此的中国国会制何以发生？

中国议员所“代表”的是各派军阀，所行使职权，是播弄撮合此各派军阀。此等军阀何从而来？一、中国以前是宗法社会的农业国，遇着外国帝国主义工商业的侵略，自然起一种“民族的反射作用”；然防御强寇已非万里长城所能为力，于是练“新军”，采用欧美军事技术。此种“新军”，如小站的袁家军，就是现在军阀的根源。二、农业国养绿营驻防尚且养不起许多，何况“新军”？新军之外，外国帝国主义者因欲变中国为其商场起见，耐不得“东方鄙夫”的生活方法，于是威迫利诱令中国开辟商埠，设电邮铁路矿山，一切新政随之而来。国库支出大大的增加。租税重重，小农小商手工业者安能不破产，流为盗匪，由盗匪而变成“兵队”。三、国家财政政策自上而下的影响之外，还有外国货物的挤轧，外国吸取原料的操纵，小农小商手工业者更要破产……以至于成为“兵队”。如此之多的盗匪，如此之强的骄将，所谓“天下大乱”的祸端已经毕具，满清皇帝当然要退让，等新的“真命天子”来即位。可见军阀的来源，“北洋正统”是新军，非北洋派是盗匪，他们当此时机自然要争雄竞霸抢治者阶级的地位。中国旧历史上“换朝代”的时候，亦有这类的群寇，——然而现在却成军阀。以前群寇的发生虽亦由于贫富不均，然而小农小商的破产决没有现在之多且速，骄将权臣的势力亦决没有现在之性质。由此可见，古时的群寇，大半还根据于所谓“农业社会”而发生；独有

现时群寇发生的原因里却已掺入帝国主义的新动力。

正因此种"一乱"的发生原已不同前，所以由此"一乱"再进于"一治"的途径，也就大异。往时兵将毕具之后只要添一班大小军师，便可以肉搏血战求得一统四海的结果。现在却因为：（一）帝国主义侵入，带了枪炮军舰以至于飞机潜艇的"欧美文明"来；(二)帝国主义侵入，促进中国都市省会之商业的畸形的发展；(三)帝国主义侵入，交通方法大变，外交事务繁剧，于是肉搏血战的笨方法不行了。各派军阀的争雄，既因战争工具已大复杂，战争经费已须妥筹，战争场合已经窄狭——外侨是不可不"保护"的，所以均势难破——决打不痛快。刀枪剑戟早已无用；屠城抢掠已不足以供军饷；运兵交战往往有"人"掣肘；于是此时的军师也就难做了。军师的来源向来是所谓"士"。现时更经帝国主义的洗刷，刷得一班旧式的"士"都没用处了，不得不用新"士"。不论这种新式军师个人的费用已经不得不大，就是"国内的外交"，轮船火车的价格，也就容不你以三十千制钱一年的"童子师"的局面，来相比拟。何况再加上枪弹炮子养兵的粮饷，自然必要用"新式的财政家"，要用一个什么"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以各军阀备战的手续比古昔难得多，决战的费用大得多，"平时"的维持局面之方法也复杂得多。——那能由得一个真命天子痛痛快快的统一。只有一法：——大家既当不到真命天子，姑且割据称雄。于是更不得不就各地剥削商民，帮着外国资本家促进农民的破产，——盗匪因此更多，小军阀因此更加丛生。统一四海的局面更难实现。各派军阀于是更不得不求新式军师（政客议员）来敷衍政局，维持均势，——国会，宪法，联省，自治，无一不是缓冲的必需品。由此可见，古时群寇争王的战场，还大半在所谓"农业社会"的环境里；独有现时群寇争王的战场，却已经陷入帝国主义的新环境。

中国以农业国陷入工业世界之后，历代乱世军阀的旧形式，不得不因其策源之点有异，而造成新局势。此种新局势不但令军阀有时需用国会云云，议员云云，内阁云云，省议会云云，以为缓冲，而且有时不得不假借此等名义以遂割据或统一之阴谋，——眼见得假名"天命"不成，必须假名"民意"。于是国会等在某一局势之下遂成军阀所必须之机械。即此亦足以反证中国已非旧式宗法的神权的纯粹小农经济的国家。

中国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政治上的结果，得一现代式的军阀，经济上的结果，除助长盗匪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现象：（一）当初以军事技术的输入，引用外国资本——以至于一切'新政'无不如此，——外债的经手，关税的管理，铁路的建筑，实业的振兴，都是陷入工业世界后所不得不发生的反应或奉迎的步骤。于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决等不到由小手工业从"民间"渐渐生长出来，必须急急于"官营"。（二）"新政"既行，旧时"士"的制度早已破坏，"士"的阶级受社会地位上的破产。这些半新不旧的洋务家，只有以官署为企业来做"无本钱的生意"；一批一批的秀才举人，洋翰林洋进士，强的直接插手于官营的新"实业"，弱的滚入于卖官鬻爵的粪蛆堆中——科举已不得不废。此等"万不能的"知识阶级只剩这一条道路，是他们最有利最轻便的发财法门。有此二因而生"官僚资本家"。古昔"叔季之世"此等败类一则没有这样多，二则没有这样巧（那时真正的农业社会里，还学不到"西洋把戏"：如借债回扣，办军械赚钱等类)，乃是因为没有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锻炼。如今这类东西如此之多，如此

之坏，已非旧式官场所能容。于是少数的“交通家”“财政家”“外交家”呢，成为财阀。大多数呢，要做官就不得不另想妙法，——旧式的贿赂方法不足运用，拜把子认义父的形式太窄狭，——只有国会省会，可以假借民意敲竹杠讨官做。因帝国主义的打击，社会阶级间起如此之大的变化，发生此等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古时富贵人的乱天下，还大半在所谓“农业社会”的公律中；独有现时富贵人的乱天下，却已显出资本主义的影响。

军阀不称天命而假民意，政客不称从龙而冒充民意，究竟也与“永世不变的”旧中国有些不同罢！欧洲资本主义因寻东方奇富的印度而发展；中国“农民”也就应西方的招请，而出国去寻资本主义，请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的酬酢开始，中国的农民就已经传受着西洋仙法，一变而成商人，——这商人而且愈变愈大，章士钊等类“东方鄙夫”之“逻辑”中，那里有此等神奇古怪的变化！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也有些特色——是帝国主义强力逼出来的。（一）帝国主义正要原料，中国商人就出洋去做掮客；中国“移殖的”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发展，然而帝国主义的文明已经走得很远，容不得你受此冲动再回国整理生产的工业继续发展——帝国主义已经代办。（二）帝国主义正要销货，中国商人就在洋场上当“康白度”（买办）；中国国内的商业资本主义因此发展，然而帝国主义却怕你自己开发富源当地制造生产品，便用强迫关税阻止工业的发生——帝国主义自己暂时亦不来办工厂，只是销洋货收土料。有此二因，所以中国最初只有纯粹依赖外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而不容易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中国小商小手工小农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破产，无从渐渐容纳于工厂，成为无产阶级，却多流入兵匪，其原因亦正在此。）然而商业的规模始终比古时中国大得多，复杂得多，破坏小农经济的力量，也利害得多。最初一期，国外的中国侨商尤其壮大的快，他们感受外国压迫也尤甚。他们一面促进小农破产，造成“革命”的“人材”；一面真正想要“民治”保护他们的利益。国内商界因市面扩大，——加入世界市场，也模模糊糊有些这样倾向。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中国式的革命，也正因此。革命的最早期，华侨（资本家）确有些想要代议制的国会。然而他们的力量，纯是不生产的商业资本，究竟太弱。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占，国民经济中生了如此的膨胀病，挤出此等单纯的“商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古时富贵人乱天下的祸根，还大半缓缓酝酿于所谓“农业社会”的内心；独有现时富贵人乱天下的祸根，却已是受着外力促起——为资本主义所震发。

中国以农业国而受此帝国主义的逼迫，早已滚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旋涡中，成了世界经济里的一个齿轮，——销售货物，供给原料，迎受投资的殖民地。于是中国亦已堕入工业世界的泥犁狱，有这从自给经济一跃而入银行汇兑的怪局面。因此，官僚资本主义急遽生长，无根之草不得不凭借帝国主义及军阀；因此，他只能以政治为营业，极需“如此的国会制”。因此，商业资本主义在国内不能尽组织生产的天责，却妄想自卫利益，求为治者阶级，真正要求代议制；——亦因此恰好为破产的士绅（政客）所据以为“参众议院无限公司”开张的吹牛广告。有此，更足以证明中国确已为新式畸形的官僚商业资本主义的国家。这都是十二年前的话。如今十二年后，章氏还在说农业国。

中国十二年前的暴乱，近因起于国内两个新兴阶级，争取统治者的地位。一、军阀

阶级（财阀及政客附），二、商业资产阶级。中国商人阶级不能如英法当年，由商业资本直进于工业资本组织生产，为数又不多，经济力为列强资本主义所掩；——所以辛亥革命时他刚一抬起头，就受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击。治者阶级实际上已是军阀；然而军阀一则始终见此隐隐中的资产阶级力量，二则内部之间无力统一，三则现代中国处于“文明的”外国人监视之下，四则“官僚资本家式”（政客）的军师要有新的运用方法，——所以必需国会，以便涂饰耳目巧于操纵，于是不得不有国会。军阀阶级之天性即与英法当年新兴的资产阶级异；再加以军阀并非生产阶级，本只能以蠹国病民为聚敛方法，——所以当然较英法当年新兴的治者阶级穷窘急迫，取得金钱豢养议员的方法，当然做得穷形极相。于是不得不有中国式的荷包。

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入，已经成为军阀的及官僚商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商业资本要求代议制，官僚资本破毁代议制——（他们自作自为不用代亦不用议；）军阀蹂躏代议制——（他们以此玩弄利用官僚资本哄骗搅扰商业资本）；于是成就了如此这般的国会制。这才是历史的逻辑。呀！——中国的发展史却偏不照着章氏的逻辑；章氏曾以“逻辑”鸣于世，“原来也是个银样蜡枪头！”

（四）中国国会制与所谓“农业国的传统社会主义”

章氏的逻辑是“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由上所论，已可见今日中国，绝非单单“农国”两字所能表示其经济组织。况且农业国工业国的涵义很泛：——美国战前亦称为农业国，难道亦没有代议制？英德同为工业国，政治现象各不相同。此间各个性都应当细辨，岂能以死逻辑强纳之于一律的规范！因此代议制的性质亦各国不同。章氏以为凡能采代议制的国家都是一般无二的工业国，凡不能采代议制的又是一般无二的农业国吗？我亦无暇，不必详驳，且只称赞他的古文学太好了。——很可以套一套古诗“鱼戏莲叶东”调子：“欧洲呢，一万里东是工业国，一万里西亦是工业国；中国呢，一万年前是农业国，一万年后还是农业国。”这种逻辑已成“化石”，可以与埃及的“木乃伊”同入古物陈列馆了。

他总以为中国模仿“荷包国”，所以“此一辈人（议员政客）……造成一种浮华虚伪之习。……以国力所万不能供给之事，人能所不应获得之资，而为之得之。”——算是代议制的罪状。代议制在农业国内的罪状诚然如此。可是假使中国若仍为章氏理想中之“农国”，请问：何以此辈人能造浮华虚伪之习呢？“章氏的农国”之中那里来的汽车，那里来的轮船？章氏以为可以不坐的，为什么他当年到云南岑西林处去来来往往都坐他？为什么往往吃大菜？不对！不是此辈人造成浮华虚伪之习。即使现时恢复章氏理想中之农国制度，——一尊皇帝，也要浮华过以前的皇帝万倍，袁世凯的大典筹备处，章氏没有亲眼见过吗？实际上是：帝国主义造成此辈人，并造成此辈人的浮华，更造成“非农业的”现代中国，使中国不得不发生如此这般的国会制。岂能容得你自由愿意模仿不模仿。历史日日在流动中，断不能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若说中国经济如此窘迫，确实不能担负现今的议员费用；那么，此种现象的客观的原因，看我上节所论自可

明了。帝国主义使中国不得不多化钱，却又天天夺中国的钱去。况且一切养兵邮电铁路学校的“新政”何一不是间接为帝国主义逼迫出来的费用且亦有逼迫出来的生产机关，并不仅止于议员政客的浪费浮奢。其中一半是适应“现代中国经济生活”而发现的，一半是发现之后更成为紊乱中国经济的祸源。军阀的兵费远超过于议员岁费之外，何以章氏不说起？由外债的本息动摇及铁路款项的乱拨，其紊乱金融的影响比议员岁费大得多，何以章氏不说起？可见绝不关于农业国与否，代议制与否；而在于“人民”能否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那时打破如此的国会制，运用群众实力创造，真民治的代议制。今年上海商人的“理财裁兵制宪”运动就足见开始运用的倾向，虽极不正确，而始终已经明明表显：中国已非旧式的农业国，已由此变成畸形的商业资产阶级国，——中国资产阶级还想以和平手段争回此国会保障他们的“民治”。不但如此，今年农商部修订法规，居然有工厂法，工会法，——而且有商人代表参与，更足见大资产阶级已着手运用，虽极无希望，而始终已经明明表显：中国不但早已成商业国，而且欧战后已有机会发展了些可怜的工业（东洋经济年鉴还有统计数字证明中国近年渐进于工业国呢），——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竟想以妥协手段，超越此国会，取得立法权。一国之财力并非不足供给代议制等新政机关；而是因为军阀侵占住了，使生产的不能生产，消费的格外浪费；并且因为帝国主义钳制住了，使要开发的不能开发，已开发的受他的挟制吸取。中国平民正已有客观的需要：——自力推翻此二者，整理一切新式生产机关，创造非荷包的代议制。

（商人要求制宪，商人参与修订法规等事实，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歧路。他们现在不敢用革命手段就想辟开劳动群众，甚至于与军阀妥协来压迫劳动群众。殊不知道：在中国的环境里，民主运动若脱离群众立刻想实现“荷包代议”，永世不能成就。因为没有劳动群众的力量，商人阶级决不能脱帝国主义及军阀之束缚，财政永不得清楚，“经商”永不得安宁，实业永不得发达，此在题外，暂不详论。）

中国经济生活的现状，已经又渐出商业资本的阶段（欧战的影响亦大）。所以近年来最大的现象：海员罢工，铁路罢工，矿山罢工，纺纱业罢工以及其他；罢工工人已渐团结，积极组织；亦自然趋于运用自力争取立法权政治权要求最普遍的代议制。可见全国经济生活已渐入工业的范式，——不然，若仅有北京缝穷婆与广州缝穷婆，他们何必联合？工人争结社自由权，争罢工权，争国际结合权，——这就是经济生活中有此要求之明证。所以中国不但早已非农业国，而且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混流并进的现象，——这亦是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使然。中国工业发达的途径与欧美大异，政治运动也必不同。中国资产阶级要自力发展，非去军阀不可，非去帝国主义不可。然欲去此二者，则必须借重中国的劳动平民及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亦就非对社会主义让步不可。如此的国会制或者对于资产阶级可以将就，而对于劳动平民绝对不能相容，——他并须超过代议制而更进一步。所以将来中国资产阶级亦必附合于此道路与劳动平民同进方能发展。中国国会制正当力求其进于真确到底的代议制，代表真正大多数劳动平民的制度。

章氏反说："彼步亦步（学欧美代议制）于是为政治之径途大出乎三千年来吾国哲人论士，所设轨范以外，而一部分人因抚拟新式政治之所享用挥霍，与吾国经济之生活状态太不相称，一不相称，而古来所贵乎均之传统社会主义因之大破。"实际上行向近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章氏要中国退回古代的均产社会主义！其实"士农工商四民共戴皇帝，一百年或五十年相杀一次以均财产的"旧中国，——所谓"农业国"的政治现象，那里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臭味？中国国会制破坏了这种本来没有的社会主义，又算是一大罪状！

若说这是轨范，请问：人类历史由你先制好了模型再来进行，好不好？不但章氏之"中国为农业国"的前题已破，而且他的历史根本观念就错，何必再驳他的论断？

章氏不应当说现在中国还是农业国；更不应当说，中国是农业国，就永世停滞，不会进于实不能不供给"代议政治"的"非农业国"；尤其不应当说，中国模仿工业国因而破坏了传统的社会主义。

事实上是：（一）中国正在由宗法式的农业国，依历史的逻辑，渐进于商业工业国；（二）因中国此种经济发展过程乃受帝国主义的侵铄故成外强中干的病态，所以有一时期的当然的竭蹶窘迫的情形；（三）正因此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倾向，——乃是以其民族运动与世界社会革命运动相联结，而求真正的民权运动。

（五）向后转还是向前进？

章氏最后仍是说："今图改革，请从农始。"农当然是要改革的，——大农生产，土地国有，农业的机器化。然而看章氏通篇的意思，他很可惜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破毁了，很想向后转。当然要废止代议制，——废止尚未实现的代议制，恢复本未曾有的社会主义！当然要使他所谓农业国国力能供给政费。势必至于复兴八股封闭学校，废铁路邮电，先做成一真正旧中国式的农业国；从此闭关自守，再来研究小农村中恢复"乡三物"。不然呢；——生生制造出俄国古制"密尔"的乡村公社于中国，或者实行无政府，更省得政费，若是如此，真妙极了！

中国的农业国早已受帝国主义的强奸，破瓜而成官僚商业资本国，产生出如此这般的国会制。如今章士钊还想他返归农业国。英国议会已经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能——就只不能变女为男。章士钊的"非代议制的农村立国主义"却真正万能了，——他却能变已嫁的少妇成处女。

章氏明明说"高谈道谊，有何效能！"——貌似唯物论的观点；实际上他极力想向后转，不向前进，要使人人都不出哲人论士所设轨范，甚至于要斡旋天地，倒转历史，——纯纯粹粹的唯心论。人家以道德立论，教议员勿贪，他更以理智立论，教议员相信他的死范畴："中国是农国"，大家来照着他的逻辑废代议制。这是逆着实际经济动象的幻想。

历史的逻辑却教平民向前进，必使他不得不扫除帝国主义军阀议员政客，整顿生产机关财政机关，创造"非荷包的代议制"，真正的民主政治，——尤其要联合全世界真

进步的社会主义派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中国如此这般的国会制不过是过渡期的当然现象而已，没有实力（实际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的势力）是不能以空言逻辑否认他的。要废除他，看平民的实力！此种实力正在增进呢。

历史的逻辑，在于经济动象中社会实力步步促起制度的改进，——是永久流动的。没有一种制度能“适”于永久，亦没有一种制度能“适”于预定的轨范。所以客观对象既明，便可以知道：——不必讨论制度与经济基础“适不适”，而当研究运动的趋向与经济动象“顺不顺”。

凡是社会中的“新活力”，必能自觉此种趋向，而积极顺其优势运用锻炼其日增的实力，——向前进！至于章士钊的向后转，正因他的思想反映社会中垂死的旧阶级。所以他这篇文章既然是他这二十年前童子师个人的忏悔语，亦就是中国旧士绅阶级全体的垂死之哀鸣。此种社会思想的流派——东方文化农村立国等说，梁启超章士钊等人——却亦是中国现时之必然的社会现象。

（原载《前锋》创刊期，1923年7月1日出版）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

（一九二二年九月）

陈 独 秀

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但是我以为任何国家若采用这个制度，最圆满的理由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经济状况不同之上，其次是建设在各部分聚居的人民语言宗教不同之上，至少也必须建设在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扩大之上，这种合乎民治主义的进步制度，决不是武人割据的退步制度可以冒牌的。

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正是中外人所同恶的“督军政治”：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器，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因此中央财政枯竭，以内外债及中央政费无法应付之故，国家濒于破产；又以大小军阀在省外省内互争雄长之故，战祸蔓延，教育停顿，金融恐慌，百业凋敝，继此以往，国力民力日益削弱，必然要至灭亡的地步。

我根据以上的理论与事实，我断然不敢承认联省自治，能够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

中国本部人民的经济状况，都在由农业及手工业渐进到工厂工业时代，南北大致不甚相远；本部语言发音虽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语言构造则完全相同；宗教虽有佛道耶回之分，而无分部聚居之事；至于说人民之自治的要求与能力已经扩大到联省自治的程度，除造谣外别无事实可以证明；在上列的事实基础上而提倡联省自治，简直可以说是无病而呻。

近来的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这个事实，我想无人能够否认。这种无病而呻的联省自治论，在这班军阀首领自然是有病而呻；所以我敢说现时的联省论，隐然以事实上不能不承认已成的势力为最大理由，是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之联省论，不过冒用联省自治的招牌，实行“分省割据”“联督割据”罢了。而且国内政论家若存苟且的心理，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这种已成的势力，遂轻假以自治之名，则希图割据的武人得了时论的援助，人奋其私，师旅团长都可以效督军总司令之所为，假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一省之内又复造成无数小酋长的局面，更陷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诸君又将以他们“不能立时放弃自治”为理由，以为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他们已成的势力，来主张“联道自

治”“联县自治”吗？

联省制即联邦制的理想，固然是我们所不反对的，自治更是我们所赞成的，但是我以为我们人民的政治能力，才发达到都市自治的程度，若说已能勉强运用省自治制，此则为常识所不许；不能而强欲其能，至不惜以武人割据冒居其名，其结果，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因为人民真能运用自治制度的联邦，未必定有害于统一，而武人割据的联省自治却去统一太远了。

* * *

最近的《努力》周报上，有胡适之先生和陈达材先生两篇赞成联省自治的文章，我现在略写点不同的意见如左：

适之先生说：“我们总不懂孙吴二氏怎样能抹杀省的一级，我们至今不解国中研究政治事实的人，何以能希望不先解决省的问题，而能收军权于国，何以能希望不先许省自治而能使县自治！”我请问适之先生：怎见得不赞成联省自治便是抹杀省的一级？不能收军权于国，如何能够解决省的问题？（即以安徽为例，不能除张马等人军权，有何方法可以解决省内各问题。）据何理由县自治必须建设在省自治的基础上面？

适之先生说：“试问国宪制定颁布之后，各省就能拱手把兵权奉给中央了么？那些已行自治的各省，如湖南，如广东，就可以自行取消他们的自治制度了吗？那些正在经营自治的各省，如云南，如四川，就可以立时放弃自治了吗？”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象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先生称许湖南广东是已行自治的省，云南四川是正在经营自治的省，原来时贤所主张的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了。我们诚惶诚恐这种进步的政治组织，关外胡帅也会采用。自治！自治！天下罪恶将假汝名以行！

适之先生说：“只是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权的代价”。我要问：先生所谓已行自治的省和正在经营自治的省，都是军阀用兵力取得的，他们肯以军权换省自治吗？他们果真是为了省自治才拥兵割据吗？他们宁肯抛弃军权不肯抛弃省自治吗？先生这种公平交易的估价，恐怕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

适之先生既已称许明明是割据的军阀为已行自治或正在经营自治，为何又说“只有联邦式的统一可以打破现在的割据局面”？

适之先生力说：只有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可以解决时局，胜于武力统一；我们知道前此上海和会，费了许多时间及金钱，各代表各政客闹了无穷的笑话，结果还是吴佩孚两次放了几天炮，才解决了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陈达材先生主张联邦制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交通不便，（二）是因为人民组织能力薄弱。我以为交通不便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现象；他以为交通不便，各省人民不能在政治上表现他们的意志感情，例如任免云南省长，须听命于数千里外之北京政府，他们的意志感情怎么能影响北京政府？我要问：适之先生所谓正在经营自治的云南省长唐继尧，已行自治的广东省长陈席儒，是不是足以表现云南人和广东人的意志感情？人民组织能力薄弱，不能监督政治，诚如陈达材先生所云，正为如此，我们应该觉悟在人

民没有运用省自治制这大能力的时期，断然不宜妄行采用联省自治即联邦制，因为采用联省自治制而省民的政治能力不能运用，此时省政府，下无人民监督，上又无中央制裁，则军阀割据暴吏横行的现象其何能免！

陈达材先生又以为在国民无政治能力状态之下，欲求政治进步，必先做到左列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权力的分散，（二）是政治饭碗支配权的分散，（三）是军人与政争之分离；这三个条件，与联邦制实完全适合。我要请问：照现在的政象，不知道政府权力还要更分散到什么程度，陈达材先生才觉得痛快？此时中国政权是集中在一个中央政府吗？人民分途监督省政府的效力在那里？中央政府还有政治饭碗的支配权吗？各省在邻省在省内，因为地盘饭碗的自由竞争连年开枪放炮，象陕西四川湖南云南贵州老百姓所受地方分权致启争端的厚赐，陈达材先生全然不知道吗？中国政治饭碗总只有这样大，无论支配权如何分散，同是供不能应求，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开发实业，不是饭碗支配权的分合问题。此时中国政治的实质，已经是联邦而非单一制，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军人与政争分离了没有？

我常说，中国已经是无政府状态，不必再鼓吹无政府主义了；中国的政象已经是超联邦以上的地方专权，不用再鼓吹什么联省联邦制了；我以为任何好名词好主义好制度，而不为社会实际生活所需要，必不足以救济社会的病痛；拿联省自治来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因为中国此时的病症，是武人割据不是中央专权，省民政治能力不能接受省自治权而采用联省自治制度，除增加武人割据的扰乱以外，必无其他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主张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断然不可怀苟且的心理，以为他是已成的势力，来承认他助长他。割除这种恶势力的方法，是集中全国爱国家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统率新兴的大群众，用革命的手段，铲除各方面的恶势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若在现时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上有害于国家统一，下无益于民权发展，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所以我对于这种政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敢为我敬爱的朋友们垂泣而道之。

（原载《向导》1期，1922年9月出版）

〔附〕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九日）

章炳麟

民国成立以来，九年三乱。近且有借名护法，阴图割据者。自湖南建议，破走北军，光复旧壤；而四川亦击走滇黔，自固疆围；广东之于桂军，骎有灭此朝食之势；下及湖北江浙，靡不以地方自治为声。是知敬恭桑梓，无滋他族，为人心所同然，亦事势所必至。欲济横流，在此道也。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自县知事以至省长，悉由人民直选；督军则由营长以上各级军官会推。令省长处省城，而督军居要塞，分地而处。则军民两政，自不相牵。其有跨越兼圻，称巡阅使，或联军总司令者，斯皆割据之端，亟宜划去。此各省内治之大略也。然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借过高，致总统总理二职，为夸者所必争。而得此者，又率归于军阀，攘夺一生，内变旋作。祸始京邑，鱼烂及于四方。非不豫置国会、以相监察，以卵触石，徒自碎耳。今宜处置中央政府，但令有颁给勋章，授予军官之权；其余一切，毋得自擅。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券之权，犹在各省。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攘权之事。联省各派参事一人足资监察，而国会亦可不设，则内乱庶其弭矣。或云，外交大权，中央不能专主，则应敌为难。不知今日所公患者，不在外人之追胁，而在中央之贩卖路矿，以偷一时之利耳。中央之所贩卖者，其实还在各省，而非中央自能有之。以中央去人民远，密谋贩粥，人民无自审知；比其觉察，则签约已成，不可追改。此正外患所由生也。今使事涉某省者，皆由该省督军省长副署负其责任，监军省长去人民近，苟有奸，事易宣露。身为是省之人，而与外人朋比以贩粥本省人民之公产，千夫所指，其倾复可立而期；虽甚贪愚，焉得不深自敛戢。故外交权归于各省，则贩卖自止，而应敌反易，外患亦以渐息矣。此种联省制度，为各国所未有，要之中国所宜，无过于此。若但如德美联邦之制，则中央尚有大权，行之中土，祸乱正未有艾也。谨议。

（原载北京《益世报》，1920年11月9日出版）

〔附〕我们的政治主张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蔡元培　胡　适等

我们为供给大家一个讨论的底子起见，先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张，要求大家的批评，讨论，或赞助。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飘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我们应该回想。民国初元的新气象岂不是因为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吗？当时的旧官僚很多跑到青岛天津上海去拿出钱来做生意，不想出来做官了。听说那时的曹汝霖，每天在家关起门来研究宪法！后来好人渐渐的厌卷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隐的退隐了；于是曹汝霖丢下他的宪法书本，开门出来了；于是青岛天津上海的旧官僚也就一个一个的跑回来做参政谘议总长次长了。民国五六年以来，好人袖手看着中国分裂，看着讨伐西南，看着安福部的成立与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东的卖掉，看着军阀的横行，看着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够了；罪魁祸首的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

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五）我们对于现在的政治问题的意见。

我们既已表示我们的几项普通的主张了，现在我们提出我们的具体主张，供大家的讨论。

第一、我们深信南北问题若不解决，一切裁兵，国会，宪法，财政等等问题，都无从下手。但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由南北两方早日开始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暗中的勾结与排挤是可耻的，对于同胞讲和并不是可耻的。

第二、我们深信南北没有不可和解的问题。但象前三年的分脏和会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应该预备一种决战的舆论做这个和会的监督。我们对于议和的条件，也有几个要求：

（1）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因为这是解决国会问题的最简易的方法。

（2）和会应责成国会克期完成宪法。

（3）和会应协商一个裁兵的办法，议定后双方限期实行。

（4）和会一切会议都应该公开。

第三、我们对于裁兵问题，提出下列的主张：

（1）规定分期裁去的兵队，克期实行。

（2）裁废虚额，缺额不准补。

（3）绝对的不准招募新兵。

（4）筹画裁撤之兵的安置办法。

第四、我们主张裁兵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裁官”的办法。我们深信现在官吏实在太多了，国民担负不起。我们主张：

（1）严定中央与各省的官制，严定各机关的员数。如中央各部，大部若干人（如交通部），中部若干人（如农商部），小部若干人（如教育部）。

（2）废止一切谘议顾问等等“干薪”的官吏。各机关各省的外国顾问。除极少数必需的专家之外，一律裁撤。

（3）参酌外国的“文官考试法”，规定“考试任官”与“非考试任官”的范围与升级办法。凡属于“考试任官”的，非验考试，不得委任。

第五、我们主张现在的选举制度有急行改良的必要。我们主张：

（1）废止现行的复选制，采用直接选举制。

（2）严定选举舞弊的法律，应参考西洋各国的选举舞弊法。（Corrupt Practice Lbws）详定细目，明定科罚，切实执行。

（3）大大的减少国会与省议会的议员额数。

第六、我们对于财政的问题，先提出两个简单的主张：

（1）彻底的会计公开。

（2）根据国家的收入，统筹国家的支出。

以上是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的几个主张。我们很诚恳的提出，很诚恳的请求全国的人的考虑，批评，或赞助与宣传。

十一，五，十三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員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員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知行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員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員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員
徐宝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　征	美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　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

（原载《努力周报》2期，1922年5月14日出版）

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

（一九二〇年）

1．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照着它的本性，对于一切平等的问题，惯抱着抽象的或形式的态度，对于民族平等的问题也是如此。在人类个性平等一标语之下，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声言无产阶级者与私有财产者、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而暗地却以此欺骗被压迫的阶级。平等的思想本身是商品生产的关系之反映，它被资产阶级变为反对消灭阶级的工具，以人类个性绝对平等做借口。平等的要求之实际的意思，是在于阶级之消灭。

2．为着符合我们根本的职任——反对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揭破它虚伪的假面具，代表无产阶级反对而且企图推翻资产阶级的压迫的共产党，应当对于民族问题，第一，不以抽象的或形式的原则为观点，而以历史的具体的，尤其是经济的情势为观点；第二，要把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从普通全国民的利益的观念分将出来；第三，把被压迫的民族，不独立的，无法律平等的民族，同压迫的民族分开，而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虚诈相反，——我们要知道这一种资产阶级的虚诈本是财政资本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性，资产阶级扰乱民族平等的观念，掩饰殖民地的受压迫。

3．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国主义战争，在各民族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面前，非常地明显把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虚诈揭露出来。这一次战争因布列斯立脱瓦和约与凡尔塞和约，指示了我们，胜利的资产阶级如何主张民族解放与民族自治，如何照着自己经济的方便规定民族的界限。对于资产阶级，民族的界限也成为贸易的对象了。所谓国际联盟——不过是一个保险证，胜利的资产阶级用之以为相互巩固在战争中的所得；恢复民族的统一及联合已经被让弃的地域之趋向，照着资产阶级的意思，仅是战败的民族对于新战争之企图而已。被破坏的民族之用人为的联合，一部分当然于无产阶级也有利益；但是无产阶级仅仅用革命奋斗的方法，将资产阶级推翻，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的自由与统一。国际联盟及一切战争后帝国主义协约国的政策，更揭露了这一种真理，促进各国的，无论是先进国家的或是殖民地的劳动群众之革命的斗争，加速破坏了市侩式的民族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下，民族的平等与协作是可能的。

4．从以上所解释的根本的原理，可以确定共产国际对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政策，——要使各国家与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共同做革命的斗争，推翻地主与资产阶级。因为只有这个联合，才能保障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若不推翻资本

主义，则一切民族的平等与阶级的消灭是不可能的。

5. 世界政治的环境现在将无产阶级专政放在议事日程上面，一切世界政治的状况都集中于中央的一点：全世界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而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应当将全世界先进的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及被压迫的殖民地的民族□信非与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不可之解放的运动，统都拉在身边而指挥之。

6. 因此，在现在的时候，不可仅限于承认或宣言各民族劳动者间的接近，而必须使一切民族与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罗斯结一很坚固的同盟，且照着每一个国家之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每一个落后的国家之资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而规定这一种同盟的形式。

7. 联邦制度是到各国家劳动者完全统一之过渡的形式。联邦制度在事实上已经表示出自己的适宜，如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及对于内部各民族的关系。

8. 共产国际的职任在这一方面，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用经验来研究、审察建筑在苏维埃制度上面之初生的苏维埃联邦运动。承认联邦制度为达到完全统一之一个过渡的形式，必须趋向最密切的同盟，同时又要注意：第一，无苏维埃共和国之坚固的同盟，则被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所围绕的苏维埃共和国家是不能保持存在的；第二，苏维埃共和国家间应有很坚固的经济同盟，否则为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与劳动阶级生活的改进是不能实现的；第三，建设全世界经济统一的趋向，在资本主义下已经表露出来，而惟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此趋向才能完成。

9. 在国家内部的关系之范围内，共产国际之民族政策，不能仅限于形式的，毫无实际上的价值的承认——一切民族皆是平权的；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为这样形式上的承认，仅限于形式上的承认；无论他们承认自己是否如此，或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总不能做到民族间的实际平权。

不但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在议会内或在议会外——要极力揭破资本国家破坏民族平权压迫弱小民族的黑幕，指示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宪法之无用；而且要：第一，向群众解释只有苏维埃制度能真正地给民族的平权，开始组织无产阶级，然后团结一般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奋斗；第二，一切共产党直接帮助殖民地民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若不如此，则反对殖民地民族之受压迫，或承认一切民族皆有自治权，不过是虚话而已，这也就是第二国际政党的政策。

10. 口头承认国际主义，而在宣传鼓动的时候，则暗代之以市侩的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这不但是第二国际政党中之普遍的现象，就是从第二国际退出的或自称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也有很多是这样的行为。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成见（这种成见在种种形式上表现出来，如人种的仇恨，民族的诬谤，反犹太主义）奋斗，且使之为重要的行动，则将一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支配世界的政治）改为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至少也为许多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支配世界的政治）之职任更迫切而重大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宣布承认民族平权为国际主义，而保留着（现在且不必说这种承认是口头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自利主义；可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A、一国

家的无产阶级的奋斗要以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标准；B、无产阶级已得胜利，资产阶级已被推翻的民族，为着消灭国际的资本主义，要能有巨大的牺牲。

因此，在完全资本主义而有工人政党（的确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家中，与投机主义的、市侩平和主义的虚伪（它们将国际主义的观念混乱了）实行奋斗，实为现在第一重要的职任。

11．对于封建的宗法的关系还巩固之落后的国家及民族，便特别谨记以下之数点：

A．一切共产党应在事实上帮助这些国家之革命的解放运动，帮助的形式应以该国家的共产党之力量为转移。压迫的国家之工人应当为积极的帮助，因为殖民地依赖压迫的国家之工人处甚多，关系也较密切。

B．应极力与反动的、中世纪的神权阶级的影响（如传教会……）奋斗。

C．特别要帮助落后的国家中之农民运动，反对一切封建制度的统治及遗迹；务使农民运动带有更革命的性质，将农民与一切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组织苏维埃，同时实现欧洲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同东方的、一切落后的、殖民地的农民革命运动之大团结。

D．反对一方面反对欧美的帝国主义，而同时增加土耳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之大回教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

E．在落后的国家中，应极力免除非真正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放运动纠染着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要帮助殖民地与落后的国家之革命运动，是欲使落后的国家之将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在自己特别职任的意识上，有所团结，有所训练；这一种特别职任是在本民族中与资本阶级德谟克拉西运动奋斗。共产国际在落后的国家中，应有时要暂时地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妥协或协作，但是绝不能与他们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虽然这种无产阶级运动或尚在萌芽的形式。

F、在一切落后的国家之劳动群众中间，应极力说明，揭破帝国主义国家的虚诈——帝国主义国家利用被压迫国家中之特权阶级，表面上建设政治独立的国家，而在实际上，在经济、财政与军事方面，则全为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协约国的帝国主义与犹太的资产阶级勾结，主张光复犹太的故土，在巴列斯廷建设犹太国家，——照表面上是很正大的，其实在巴列斯廷犹太人犹占很小的少数，若犹太国家建立了，不过是把亚拉伯人给英国剥削罢了，牺牲罢了；这实在欺瞒被压迫民族的劳动阶级之最好的一个例证。在现在国际环境之下，除了苏联而外，是没有什么救星的。

12．帝国主义列强对于弱小殖民地之时间很久的压迫，使被压迫民族中的劳动群众，不但对于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怀着仇视，就是对于压迫他们的国家中之无产阶级也没有信任。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各国社会主义首领之叛变，在“保护祖国”一个口号中，极力为自己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出力，压迫弱小民族，强掠殖民地，自然要增加被压迫的民族中之劳动群众对于压迫他们的民族中之无产阶级的不信任。消灭此种不信任与民族的成见，仅仅在先进国家里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消灭后，而且在落后国家里经济起了大变动之后，才可以达到；否则，这种不信任及成见，是不会很快地就消灭了。因此，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对于落后的民族间之民族的感情，特别要十分注意、谨慎，有时为着要消灭这种不信任，应当在可能的范围让让步。

若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落后国家中之劳动群众没有自由统一的趋向，则对于资本主义之胜利，绝不能很迅速地完成。

附加议案

1．规定共产国际与被压迫而有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中的革命运动之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前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世界革命史现在正在经过这个时期，就是正确明了这个相互间的关系，成为一定的必要了。欧洲大战及其结果很明显地指示了我们：被压迫国家的群众与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世界的资本主义集中化了，例如大批的殖民地的军队与工人发送战场，参加战事，这实与欧洲无产阶级运动有重要的关系。

2．欧洲的资本主义吸聚自己的力量，最大部分是自殖民地的领土，而非自欧洲工业的国家。为着保存资本主义的存在，则必须要有宽大的剥削的来源，且对于殖民地的市场加以监督或管理。美国——帝国主义的首领，感觉生产过剩的痛苦已经有一世纪了。倘若没有宽大的领土做销售商品的市场与供给原料的来源，则美国的资本主义将久已消灭了。一方面把持非洲、亚洲无数万万的居民处于奴隶地位，而同时英国帝国主义也就把持住自己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使之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

3．从殖民地所取得的额外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之最重要的来源。欧洲的无产阶级仅仅在这种源泉完全消灭之后，才能推翻资本主义的制度。

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企图恢复自己原有的状况，极力剥削殖民地的天然财富与人的劳动。因为剥削殖民地的居民，欧洲的帝国主义才能给予欧洲的工人中的贵族许多礼物，贿买他们。同时欧洲的帝国主义用输入自殖民地来的贱价货品的方法，减低无产阶级的生活费；资产阶级预备情愿牺牲在本国内所得的额外利润，而保存着从剥削殖民地所得的额外利润。

4．一方面使殖民地分立，一方面在本国内起无产阶级革命，如此才能推翻欧州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共产国际应当扩张自己活动的范围。共产国际应当与在被压迫的国家中之参加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有密切的联络。为着世界革命之早日成功，则必须此两种势力为共同的行动。

5．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集合的意志。他的使命是组织全世界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是一军事的主体，应当团结全世界革命的势力。

为资产阶级文化所浸润的第二国际，却未度量到殖民地问题之重要。对于第二国际，则欧洲而外无世界。欧洲的革命运动与其他非欧洲的革命运动有相互提携的需要，对于第二国际是不明了的。第二国际的人物不但不与殖民地革命运动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而且自己成了帝国主义者。

6．压迫东方民族的帝国主义自然阻止了他们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取消他们达到如欧美一样水平线的可能；帝国主义的政策，总是趋向于把持住殖民地的工业之发展；所谓土著的无产阶级（工业的无产阶级）之存在并不久。

土著的、地方的小手工业生产将位置让予帝国主义国家之集中的大工业，结果使大

部分的人民迫不得已从事农业，而输出原料到国外去。在别一方面，我们看出土地很快地集中于少数资本家地主之手，使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数目日见增加。这些殖民地中之大部分人民，都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之下。这种政策的结果，群众反抗的精神仅经过很少数中等阶级的知识阶级表现出来。国外的压迫是妨碍社会生活之自由的发展之一个大势力，所以革命之第一步，应推翻国外的压力。因此，我们帮助殖民地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并不是赞成土著的资产阶级之民族主义的趋向，而是开辟殖民地的无产阶级之一条解放的道路。

7．我们可以看出日离日远的两种运动：一，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爱国主义运动，徒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的独立；二，贫苦的农工群众为着自己解放的运动，否认一切的剥削与压迫。第一种运动企图管理第二种运动，并且已很有成效；但是共产国际应极力反对这一类的管理，而促进殖民地的工人群众之阶级的觉悟。因此，殖民地革命之第一步为推翻外来的势力，但是最重要而且必要的职任，是建设农工之共产主义的组织，使他们能够随手建设苏维埃共和国。因此，在落后的国家中，民众之到共产主义，并不经过资本主义之发展，而只要受先进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之指导，发展阶级的觉悟就可以了。

8．实际的力量，殖民地解放运动之基础，并不囿于很狭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之民族主义派。在殖民地中已经存在许多有组织的革命的政党，并且与工人群众有密切的关连。共产党欲与殖民地革命运动有关连，应经过这些政党或团体，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在现在的时候，他们的数量还不多，但是他们是群众意志的表现，引导群众向革命的道上走。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对于殖民地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有密切的关连，可以经过他们与一切革命运动以物质的、精神的帮助。

9．殖民地的革命在初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的，但是当革命的开始，共产主义的先锋就占在领导的地位，则革命的群众可以因渐渐所得着的革命的经验，而走上达到目的之正确的道路。倘若完全用共产主义的原则解决农民问题，则将成为很大的错误。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殖民地中之革命应适用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纲，如瓜分土地等。但是这并不是说，革命的指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手里。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在最初的可能时，极力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建设农工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之工作，应当如先进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之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一样，好为着绝对地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制度。

（原载《新青年》（季刊）4期）

莫斯科的“东方民族大会”开幕了

△全世界劳动阶级团结的表征
△研究太平洋会议所讨论诸问题
△远东各国代表百余人参加
△演说中还有中国女代表

诸君：“太平洋会议”是干吗的？就是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几个大资本国商量怎样宰割东方民族——中国尤其是他们的目的物——的会议。我们东方民族到底是听其宰割呢？还是不服气呢？人心不死，谁愿意做他们的奴隶，做他们的牛马，做他们的桌上菜，俎上肉？既然这样，我们东方民族就该联合起来，反对他们啦。这个“东方民族大会”就是这样发生的。

这个“东方民族大会”，非同小可，完全是我们全世界劳动阶级组织起来的。世界之上，劳动阶级的人最多，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戮力同心扫除这可恶的资本家，推翻这资本家的鸟政府，真是不废吹灰之力。

据莫斯科来电，远东各国民族及社会团体代表百余人，因研究已在“太平洋会议”所讨论的直接关于中国和高丽之各项问题，本定在伊尔库次克开会，后因他故，改移至莫斯科。至这个会所决议的事情，大约不□“太平洋会议”所处置之各项议案。已于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了，现在把开幕演说的情形，写在下面：

首由第三国际会长俄人金诺维夫主席，致开会词，大意说：“凡事只怕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就能战胜资本阶级，这是个个相信无疑的。故唯一希望，要全世界劳动阶级一致团结起来作战，自然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三国际和以前各种团体不同的地方，就在不仅要变成欧洲劳动阶级的团体，而且要联络全世界的工人；又不仅要文字上通声气，而且要更为事实上的携手呢。今日以前，我们和东方各国向不联络，关系很少。这次会议，我们东西劳动阶级大家来商量几个方法；大家来反对，‘太平洋分赃会议’，大家来革资本家的命，大家来建设劳动者的世界。”云云。

接着是日本最著名革命家卞他耶冯演说。他说：“最讨厌的，最可恶的，是我们日本和英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他们把东方民族压得死死的。我们趁此机会，团结起来，扫除这些最讨厌的最可恶的国家。”云云。

中国代表张伯源演说。他说：“很好！我们这个会议，有绝大的希望。自此以后，我们劳动阶级，必团结一致；我们各民族间，必联络一气；我们革资本家的命，必一举而成功。”云云。

高丽代表金君演说。他说：“怪呵！俄国从前不是帝国主义的地方吗？现在变成劳动阶级集会的场所。美国不是号为民治主义的中心吗？现在反变成世界资本家和帝国主

义者集议掠夺方法的场所。那个还说美国好呢？说美国好的，不是汉奸，便是糊涂。现在远东劳动界代表前来莫斯科和西方劳动界代表一块集会，这就是东西联络的表征。此后我们敢断言全世界劳动阶级，必共同团结，以赴战场，和资本家奋斗了。”云云。

中国女代表王女士演说。她说：“女子要求平等自由，和男子是一样的。俄国是现今世界上第一个解放女子的国家，载在法律。我们中国女子愿追随俄国，而与世界资本家宣战。”云云。

蒙古代表演说。他说：“以前远东形势，是日本军阀压迫中国，中国军阀又压迫蒙古劳动阶级，这是不合理的。自由之蒙古人民，认为东方的解放，全靠共产主义俄国的援助。”云云。

美国共产党代表演说。他说：“二十年来，美国资本主义澎湃不已，今‘太平洋会议’正在打主意怎样使各国工人的血汗快快的变成资本家囊中的元宝，我们不可不合力反对他，抵御他。”云云。

最后主席鼓励大众，好好做第三国际的忠实分子。于是第一日之会议告终。

（原载《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4期）

〔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缪楚黄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影响的会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日本以及爪哇等远东国家的代表团。中国的代表团，有三十人左右，是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的代表；有工人、农民的代表，也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学生、文化团体的代表，也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有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太原、杭州、唐山等城市的代表，也有湖南、山东、安徽、广东、浙江等各省的代表。中国最早的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瞿秋白、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等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代表团。

大会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列宁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的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大会开了一个星期。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揭露了当时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罪恶，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

方无产者的援助下，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大会着重地研究了中国问题。大会尖锐地斥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和无耻："日美英法的强盗们，正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来造成他们生活的甜适。这些强盗们并不将被压伏的民族当人类看待。他们所图谋的只是利益，只是黄铛铛的金子。为了诛求这些，几百兆人民的生命，在他们眼睛里，真不值什么。……中国的苦力——世界上最受富人们掠夺和压迫的奴隶——迫而为这些强盗们勤苦一直到死。在工忙的时候，中国农人们要一天做十六个钟点的工作，甚而至于十八个钟点，但享受他们的劳力的收获的却是外国的投机家、吸血的人们和他们的走狗。"大会揭穿了华盛顿会议侵略中国的阴谋："对中国他们所采用的，便是他们一切抢夺利益的分配要协调，而且承认在这个恶毒的侵略里是让美国资本家来做领袖。……他们要组织一个新银行团、一个国际托拉斯、来做……军事、财政、实业的侵略"。大会认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劳动的制度"，"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人自己手里"。大会号召："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为了完成上述的革命任务，大会号召建立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向不破坏自己利益的人们高呼"，"向以受压迫人们利害为关与的人们高呼"，"向受虐待而却不愿再继续下去做奴隶的人们高呼"。大会以无限的信心鼓舞着代表们：只要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我们一边的是大多数，我们团结起来是有很大的力量"，"我们一定要得着解放"。

上述大会的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说来，是非常新鲜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刚成立，对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大家都知道党的最后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怎样奔赴这一目标，在奔赴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经过那些道路，很多人是不清楚的。经过这次会议的启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就是要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代表，不久回到祖国，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共产主义的纲领和民主革命的纲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有效地动员了广大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和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相适应，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也给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影响。在这次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党员，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中的民主势力是估计不足的，甚至存在着一些嫌恶的情绪。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在一起开

会，一起讨论有关民主革命的问题。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派了一批党员和青年团员，跟国民党联合进行革命活动，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准备了条件。

附注：本文是根据这次大会的代表柯庆施同志的回忆以及一些零星的文字材料写成的。文中的引用语，系摘自“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原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4期）

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

——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

（一九二二年）

萨发洛夫

同志们，全世界的资本制度是再没有比现在更飘摇的了。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这场帝国主义大战，凡作壁上观的或只略为参加的都收了渔翁之利。这番大战，一方面固然毁坏了欧洲一大部分，把欧洲资本制度的根基都摇松，一方面在美国和日本，却因为欧战的缘故，工业上大大的得了发展。查一查日美对外贸易统计表，就可以知道。大战期内，日美资本主义工业莫不突飞猛进，没有人不相信他们确实能享用胜利的果实，而确实是帝国主义大战中的胜利者。可是慢慢的，危机来了。一九二〇年三月，日本的全工业界就起了恐慌。对外贸易突然低落，重要的银行，破产的无数。这恐慌是从日本的缫丝工业中起首的，立刻蔓延到北美洲的合众国。于是资本主义最兴盛，原料最丰富，生产力最强大的美国，第一回看见他自己拥了六百万失业的大军队。据最近的报告，美国的经济情形仍是一点也没有进步。

帝国主义战争既把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掘空了，所以日美帝国主义不得不连带着下水。全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业已失掉平衡。一方面是无限制的生产，而一方面，因为欧洲颓败，有多少市场可以给美国销售货品。如是资本制度的基础算是狭小得多了。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曾议决一个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这决议案清清楚楚的说，欧美帝国主义政策不但摧残全劳动阶级就是农村小资产阶级也会遭蹂躏的，而且资本主义必定也要维持劫掠的殖民政策，设法征服未经发展的大陆，争夺新殖民地。

既然帝国主义的大战和战后的资本主义危机先后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弄小，殖民地问题就不得不变成帝国主义的世界政策之最重要的问题，远东诸民族既然足供帝国主义竞争和抢夺，自然众目睽睽，都注视到远东来了，为的要利用远东贮藏丰富的天产和低廉的劳动重建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帝国主义的威权了。资本主义这样的危机是从来没有过的，资本家这样贪得无度亟图抢掠也算无以复加了。

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案，直捷了当的说，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一切民族形式平等的口号，所谓各国民族不问是工业先进国或工业后进国或独立国，殖民地，一律平等的观念，简直是一种诳语，第三国际的决议很指摘这些诳语，揭破那用伪德谟克拉西语调遮盖的诡谋。

本会远东各国代表报告他们国内状况的时候，和讨论季诺维侯夫同志的报告的时候，各位同志已经很深刻的把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所谓一切民族平等的口号，是个什么东西，描写得明白极了。各位同志已经说得很清楚，民族平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是怎么一回事。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面，决不会有民族间的平等，因为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常常想去臣服被压迫的民族，就是强大国家的资本家常常想掠夺工业后进国，以后进国的廉价劳力，掠取后进国的天然富源。而尤其要紧，不可不在本会中格外提及的，更要促起大家注意的一桩事实：就是去把结全世界资产阶级和把结帝国主义强国的法门，并不是救助被压迫民族和半殖民地的道路。诸位中间有好多人，一年或十八个月以前，曾信赖巴黎和会，盼望这班帝国主义强盗中的一派或那派去帮助他们的，现在都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现在已经觉悟向这般强有力者呼吁求助的无用了。我们要知道，凡压迫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也决不能得到自由；希望一个资本家或地主的政府能够把象日光，面包，空气一样重要的自由，给与被压迫民族，那是没有的事体。

同志们，国际共产党素来与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处在对抗的地位，也与欧美资产阶级列强处在对抗的地位，现在向被压迫的民族宣言说：只有你们自己能解放你们。但是你们要得解放，就非和国际无产阶级并肩前进不可。国际无产阶级正在争夺他自己的社会自由，他们彻底明白，要打破全地球上资本主义的圈套，要在全地球上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办到，非把人类中最后进的一层人，最不觉悟的无产阶级，最后的人类生力军，都唤醒过来，加入这争自由的大斗争不可。世界的帝国主义已经把日本，中国，高丽，蒙古，满洲的运命和利害连锁在一起了，要是不与国际无产阶级连络着来共同作战，这些国家没有那一个能够独力得到自由和独立的民族发展。要明白这一层，我们须先把这些国家中的现状审察一番。

远东各国，大多数是工业后进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路上不过才走最初步。还顶着外国的压力在外族战胜国鞭策之下走这资本主义路途上的初步。这些国家中间的大半是农业现状，是小作农私有制度。忽然外面闯进来了一些海盗，到他们国里去，要剥削他们。那些后进国里又有一种习惯，经过多少世纪的传袭，已把所有劳苦人们的手脚都缚住了，又把他们一切自由和独立发展的机会都阻抑了，简直不能发出一种自觉的势力。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便利用中国，高丽，和其他远东各国的中世纪式封建制度去剥削他们的天然富源，多量劳力和原料，以为肥润他们自己的用处。把远东被压迫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步趋弄个明白，是个个共产主义者，个个革命家，个个诚实的德谟克拉西派的责任。

第一：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过在欧洲资本和本国市场中间做一个媒介物。中国商人是一种买办，欧洲资本家靠他们在本国人中间，在无知无识的农民中间去经营商业，去帮着破坏维持几百兆人民到现在的本国工业。外国的资本，象一种太上制度，威压在无数后进人民和后进劳动群众之上。来参加讨论的中国南方代表，曾告诉我们，中国的国外资本怎样逐渐地括尽劳动群众根本的生存之源。那位代表曾给我们各种工业的详细报告，并且说明他们被外资摧残到了何等地步。外资捉住了一个工业后进国并在那里巩固他的威权后，一种分工就出来了，贵族的欧洲人的工作和后进的本国劳动群众的工

作，简直有天壤之别。中国人将永远成为牵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他把最后的所有物送给村上的盘剥者，由这盘剥者再把他的血汗送给外国资本家。本地的手艺人必须丢弃他的手艺，他那原始的器具要和欧美大市场中的制造家竞争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这些手艺人，这些破产的农民，于是失掉他们经济上的根本，只得过一种穷苦无告的生活，成为一种半无产阶级，成为一种在欧洲帝国主义宰制之下不能改良他们的贫苦人们。

欧洲资本，把重要的海港，重要的内地交通，重要的政治中心都握在手里，他的权力已经遍处皆是。要证明这种资产阶级的宰制，我们是不妨举出那些在中国根据于所谓治外法权而演成的种种割让来做例子。外国帝国主义把可攫取的都攫取去了，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机要的权利都被他们攫取去了。外国资本已经把受压迫群众的命运操在手里了，要强迫他们照了他自己的意思去工作。资本主义在外国是尽了一个极大的促成革命的作用，他把散漫的群众聚到工厂里，教他们尽力操作，把他们组织起来，把革命的精神染给他们，然后教他们为自己的利益作战起来；但是在被压迫的民族则不然，资本主义并不开发后进国的工业，不过处处注目在把他们永远监在这种不开发的境地而尽量吮吸他们的原料。在欧洲，资本主义曾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但是在殖民地，他夺去了他们的生计，使他不得做有用的工，只得流为盗寇，靠劫掠所得去奉赡他的身家。在高丽，在中国，这种情形是实在而且普遍的。从这里面，正可完全暴露出欧美国际资本主义的自私心呵。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发展未开发国的工业，反而是在用种种方法阻碍这些国家的工业的发展，丧失大批群众的生命膏血，使他们劫掠利益永远继续。所以当这些国中资产阶级民治主义革命党的代表希望在巴黎和会和其他同性质的会议中得到帮助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一次不遭过厌恶，藐视，并对于他们利益的完全不了解的。他们的所以不被了解，因为组织这些会议的代表，正是从一个只知道侵略这些国的阶级中选出来的。中国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几个政系维持了一个封建的无政府局面，这情形是从一九一一年起直继续到今日的。中国封建制度取一种军阀官僚组织的形式，这种组织，统治一种家长式的小农经济制度。他们常常内讧，外国的资本主义就故意挑拨，鼓动这些国内战争，好把中国弄得四分五裂而在战争中及战争后取得利益。

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不知羞耻的强盗政策。要晓得这种公开的武力政策，很可以把帝国主义大战开衅以前日本“黑龙”党内一个黑白爱国团所发出的公文为例证。日本有名的帝国主义政策领袖们在这公文里不要脸的公开说着：“我们必须立刻设法使中国的革命党，帝制派和无论那种的不满的分子发生扰乱，扰乱起来，就可以推翻袁氏政府”。

“同时，我们必须在中国人民的上级人物中间，选出一个最有势力的人来，帮助他平定内乱，建立一个新政府。要做这件事，我们非用自己的军队不可，假如我们的军队能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秋毫无犯，那么要他们承认一个愿与日本联盟的政府是不难的事。”

“要挑拨内战，现在正是一个机会。现在我们缺少的只有经费。但是日本政府假如肯利用这机会拨出一笔款来，那么暴动立刻就会起来的。以后，我们底政策就可以进

行，就很容易达到目的。可是欧洲风云日紧，开衅在即，要做须赶紧做了，因为这种机会真是所谓千载一时，坐失了是不会再来的。”

“在研究中国政府的现在形式，我们必须考虑共和式政府适合于中国人民的需求到什么程度。从民国成立到现在，我们只听见处处的失望怨恨这共和的政治。这连那些起初赞成共和的，现在也承认他们自己错误了。所以将来假使维持这种现在的政府，中日亲善的目的是难于达到的。其理由如下：自从民国成立以来，一切共和的根本原规，一切道德，一切社会目的都和君主立宪的根本原则和目的相冲突。一切法律一切行政都是不同的性质。所以如果日本利用现在的机会，中国势必改组他的国家组织，模仿日本的样式，只有这样，远东问题才能达到完满的解决。假如这样，那么平定了中国内乱之后，不但建立了一个新中国政府并且在亚东大陆上建立起一个大陆帝国来，而且这帝国是处处和日本的现行制度相合的。日本对华政策，是求中日两国的永久结合，果能达到以上所说，岂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么？”（Dr Neue Orient.Vol.V.No.7/8.Pages 234—235.）这些人，说话倒是很老实的。他们底侵略政策还不曾实地经营，或者不如说，还不曾大规模的布置起来，已经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于是把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披露出来了：怎么去引起扰乱，怎么去阻止一个有规则的经济发展的一切可能性，并且怎样去取得这受压迫国家里的天然富源。以后出来的事，便是这计划的直接结果了。他庇护中国民族中的渣滓——强盗分子——和督军，使他们延长内乱，造成民国的破坏。国民党的代表有一句话是把中国北方一九一七年忽兴忽灭的那个北京政府描写得很好的。他说：“这些人，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坐坐汽车，借借外债。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卖国，一点一点的卖给外国强盗；他们的第二件事，是每天，每小时，每分钟，他把自己卖给外国强盗”。

自然用不着说，扰乱中国的军阀强盗后面，有外国资本家象走棋一般地在那里把他们搬弄，日本帝国主义用我上面所引的那样老实那样不要脸的公文表出他自己的意思，也是不足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驱使着他们做出来。由日本到中国的输入，一九〇八年是五十二兆（一兆等于一百万）两，一九一七年增到二百二十一兆两。一九〇六年，由日本输到中国的货价等于全输出量百分之十四，到一九一七年，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差不多增了三倍。一九一七年以后，日本对华输出更是增加不已的。这是趁着其他各国的强盗顾不到的时机，赶快在满洲，在中国北部，建立日本的势力范围，也无非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有许多烂货销不掉，要来趁趁机会。欧战兴起，日本本想牵着中国加入战争，过一刻，说是嫌中国贫弱，便老实不客气代中国来担任那个高贵的使命，说是为保护中国的利益，对德宣战，实在不过是一种帝国主义侵掠的外交诡计罢了；便是这诡计的证实。占据山东。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工业后进国——如中国，便造成惨酷的劳动状况，在工厂里面，在各种工业里面，本土工人的待遇，惨酷到极点。譬如一九二〇年在两个雇用六千工人的最大铁路工厂里面，有百分之三的工人死于肺痨症。矿工之死于肺痨症的达到百分之九。看了这样的事，人总要以为日本资本主义和其他的同类既然在工业后进国中造起了这样不人道的劳动状况，那么对于他们本国的劳动者总要待遇好些了，岂知不然：在日

本，每一千妇人中每年有二百六十六件肺结核案，和二百十七件其他的结核菌病案发生。在丝职工业中，每千人中有三十四件肺结核和四十七件其他结核病菌案；在纺织工业中，肺结核者有二百一十；其他结核有二百八十。在麻丝工业中，肺结核有一百十四，其他结核也有一百十四。可见那些从中国劳动群众中刮去的血汗并不是拿去润益日本的农民和劳动者的，全归到日本资本家和地主手里去了，他们是打劫别国肥润他们自己的，而且从这肥润之中使他们更能用更野蛮的手段去剥削他们自己的工人和农人的。现在，日本的工人和中国的工人中间，死亡率渐渐增加到可惊的程度了。看到这样，我们又要想起马克思描写初期资本主义聚敛时代所引述的话了。

现在生原料这样缺乏，全世界都喘息在穷乏下面，尤其是金属工业方面一无所有，自然怪不得英美法日的资本主义都要看着中国眼红起来。我把全世界存煤总数念给你们听听：美洲的合众国，存煤有3,838千兆吨；加拿大有1,234千兆吨；中国有996；德国有423；英国本部有189千兆吨。可见数国之中，若专拿煤讲，美国是最富。同时，你从表上可以看出，一个中国所藏的煤比全欧洲还富两倍，英国做了几十年供给欧洲工业的煤矿，德国因为产煤富，能在工业场上突飞猛进，但是这两个所共有的煤却不过中国的一半。而中国呢，产煤事业刚在开始，而用的又是原始的方法。一九〇〇年，产煤额只达五百万吨，一九一七年才有二千万吨。中国工业，只是现在才开始建设。

一九一三年，采一点西法的工厂和作场，数目只有一千九百十三个；雇用的劳动者，只有630,962名。在21,713件企业之中，有347个是装着机器的，其中298个用的是蒸汽机；此外用电力摩托的有一百四十一个，用各种其他发动机的事业有二百十二个。男的劳动者数目是478,000，女的劳动者数目是212,000。到一九一三年末了，公司可以说是经营实业的，有三百六十五个了，投资总数是69,857,000元，1,857,000元的后备费在外。据最近的统计，中国的工厂和作场企业可以分作以下几支：

农具厂	六、〇三〇家	雇用工人	三四、七四五
纺织业	四、六五二：	…………	二四九、三二四
食物业	六、一七五：	…………	一八一、七三九
纸及印刷业	二、一三四：	…………	六四、三五二
金属业	一五八：	…………	四、〇四九

(Der Neue orien, Vol, 11№2. Pagelo)

这些工厂中间，凡属本国人开的，用的大概是手艺人。凡属大规模的工业都在外国资本家手里。假如我们由经济的观察点来观察中国，我们不得不说他，在工艺的发展场上，前途有无限的希望。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国有这样的天然富源，世界上没有一个别的国象中国一样人口繁密，更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象中国那样惨酷的被掠夺，除非除开印度。美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对于抢掠中国的资产原料是一样的关心；可是对于发达中国的实业都是一样的没有关心。例如，华盛顿会议和会议中成立的四国同盟，不但是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那中国资产阶级派出来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民治派，也不能在那一方面有半点希望。中国的工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能靠外国的资本主义和美英日的资本主义的扶助来发展的，因为这件事不是这些强国的利益所在，因为这正是和他们的殖民地

政策及资本主义的利益相反的。

我们现在还是来打算打算那些放在中国劳动群众前面的事罢。放在他们前面的第一件事便是免去外国人的束缚。凡是中国的政客，若有和无论那一个帝国主义携手的形相暴露时，不但共产党人有严加攻击他们的责任，个个有良心的中国民主主义者都有这个责任。季诺维侯夫同志说得不错，中国政治家中现在有不少亲美派。他还有一句话也说得不错的，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没有想靠英美日资本主义的帮助挤到列强位置的心思。因为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他的利益所在只是把中国利用作一个劳动蓄积地和原料取汲场，所以这种希望是成立不起来的。中国现在的第一件要事就是举行一个有力量的争斗去推翻那些在国内支持着封建式无政府状态的势力。一切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必须联合为中华联邦共和国作战，而且他们决不可以只在上级社会——就是所谓智识阶级——中活动为满足，他们必须直入群众中间去，在一个能减低生活费的民主主义政府的标语下鼓吹，活动。无论那一个钻营谋利者都是想抢劫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是被外国资本家，日本官吏，中国督军和地方上放债人抢掠剥削。现在第一件要事就是去唤醒这一班群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是中国的柱子，若不唤醒这班农民群众，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假如不唤醒农民群众，不告诉他替代这些毁坏国家的并为未来中国人民掘着坟墓的苛政重税而设立一种一律的税则并且设立被人民选出和为平民负责任的政府，单是几个劳动小团体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急进分子是成不得什么事的。假如不这样决不能希望什么结果。中国的农民渐渐也在欧洲人所有的耕植地上受欧洲人的剥夺，在本国地主的田地上的，是受地主的剥夺，他们利用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剥夺农民佃户。我们必须提出土地国有和重征外国租借地的租税等呼声。这不但是共产党的呼声，凡属真想替这广大群众做一点事唤起他们来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都应该主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应该知道不由这种呼声博得大群众的同情，要革命，要推倒外国人的统治是永远不成功的。在这一件事上，是不该有疑问的，是必须充分了解的。现在中国劳动群众和群众中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采用一种单一的所得税。他们必须为那一面做督军们的牺牲者一面被当做炮灰的中国农民大群众建立一个联邦的统一的共和国。

中国的劳动运动是正在学步的时候，我们不在最近的将来造空中楼阁。我们不希望中国劳动阶级立刻就得到那日本劳动阶级所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的指挥地位。但是青年的中国劳动运动是在一天一天长大起来了。现存那些根据于同业偏见或各方面都显出旧行会组织的团体必须重新组织——使他们成为纯正的无产阶级的团体，这是第一课。我们必须极力反对用工头制的旧式掠夺方法，因为他已成为资本主义掠夺勾当之直接先锋。同时我们必须明明白白的说：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的劳动者必须踏稳他们自己的脚步，不可和任何民主党或资产阶级分子混合。推开窗子说亮话，我们十二分知道，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和这些在民族革命组织中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民治分子决不会有若何激烈的冲突的。然而同时，我们必须告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说：若果他们要想抑制中国劳动运动，若果他们想利用中国的工会去遂他们零零碎碎的政治活动，想把这

些工会限制在旧式手艺组织的精神上或宣传劳资两阶级融洽的论调——在这些范围以内，我们对他们决不饶让。我们是帮助无论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但是也只看他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他。我们定要说：谁不帮助民族革命运动的，是一个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蟊贼。但是同时也要说：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觉醒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国民的蟊贼。我手里有一张广东中国机器工会的报告，那报告是这样结束的："罗素说：假如有人问我中国怎样可以不用资本主义开发实业，我就要首先答他除非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工会的代表，本报告的作者，也和这有名的英国哲学家同具一个见解，罗素是腐败的社会调论的和社会主义的代表，我们知道的，中国劳动者必须拒绝欧洲殖民家这种腐败的调和的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所指出来的路，而去走全世界劳动者所走着的路——共产主义。我们知道的，不把中国变成一个真真的共和国而在中国谈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欺骗。劳动阶级决不可自己与中国农民阶级隔离。他非去和他们携手，给他们光明，教育，和共产主义的观念不可。当然的，中国眼前未必能起社会革命，也未必有立刻组织苏维埃的要求，但是同时，苏维埃理想是适合于民众革命争斗和革命民众去压服民治主义势力的最好组织的福音，必须宣传。因为苏维埃是个个国家中劳动群众手里的最好武器，无论他是工业劳动者的国家还是农民的国家。这是近东和中央亚细亚的几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所能最确信地证明的，这种经验决不能经过远东而不留丝毫影响。

至于高丽劳动群众的问题要比较简单些。在高丽也和在中国一样，我们也要扶助一切民族革命的运动，只要他不与帝国主义妥协坚向民族解放的目标进行，我们用不到因为他们有的是农民组织有的是宗教团体等等而多所顾虑。

我们心里固然完全明白这个运动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然而我们还要扶助他，象扶助任何求解放的民族运动一样，因为他是攻击帝国主义的，因为他是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协调的。我们要求高丽的劳动者也要照这方针进行。推翻高丽贵族政治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在高丽提倡联合战线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须用最坚决的态度表示吐弃一切用妥协或和平手段去希求获得民族解放的政策。一九一九年的三月革命——高丽人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是一种被蹂躏民众的反抗，但是无结果的反抗。当高丽人民热血潮涌，向日本军队的机关枪赤手前进的时候，何尝不死得轰轰烈烈，然而这样反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个个有良心的民主主义者都必须承认：唯有武装争斗，唯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肩并肩前进，世界的劳动者方能战胜外国的兼并者和压迫者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华盛顿会议以后，靠了法国和美国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助力，怎样把高丽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释放出来的迷梦，打破得干干净净了。今后的高丽，不是亡种，就是在革命的途上救出他自己，此外没有第三条路了。日本在朝鲜的行为是只有英国在印度的行为可以相比的。不信，请看下面从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度支表中摘出来的几项开支数目。

据日本高丽总督的正式报告如下：

	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

高丽前皇室赡奉费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日本高丽总督薪金	三、一九二、〇〇〇	七、二〇二、〇〇〇
警察和宪兵费	一九、八三六、〇〇〇	四一、九四〇、〇〇〇
建筑牢监费	………………	三六〇、〇〇〇
学校费	七七三、〇〇〇	一、二二八、〇〇〇
公共卫生费	七〇九、〇〇〇	九一二、〇〇〇
驻防高丽日军费	一七、二五九、〇〇〇	一五、三八三、〇〇〇

可见日本的军阀，日本的官吏，算账的时候，他是把进款的大部分作为继续他们劫掠兼并政策的用途的。高丽现在是已经被日本征服而且受虐待屠戮的了，所以为高丽人民为中国人民争得民族解放，乃是日本劳动阶级的第一件重要职务。日本劳动阶级不可不知道仇敌在自己国内。他是远东第一个革命势力，也就应该由他首先向日本帝国主义下大打击。不然，中国高丽的镣铐固然是不得开放，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一天存在，日本劳动阶级自己亦终于一天不得解放的。

同志们，我的时间很短，但是我还愿意把我们在日本应该做的事务简短的说一说。

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很发达和前程无量的庞大劳动阶级的国家。他有二百五十万的工业劳动者，六百万不与大工业相连的无产阶级，五百万以上的小作农和半劳动者——这种数目，假使照革命的数学计算起来，是可以致资本主义的命的。日本是采取德国制发展的。日本的官阀已经顺了资产阶级的发展，并且已经把其中富厚些的一部分吸收到他们中间去了，现在元老院和大资本家的联合是最高统治者。日本是一个财阀专制的国家戴着立宪的假面具。其实，大权是握在天皇和旧日的封建贵族手里的，那些封建贵族，大都与各种企业有连带关系，他们仍旧象往昔一样，把日本人的命运握在手里。他们有的和陆军相连，有的和海军相连，有的和各种船坞船厂相连。日本地主们贵族们变成为资产阶级的资格自然很充足，甚至人人知道是"神明之胄"的天皇也是一个大旅馆的东翁。说也好笑，现在的世界上好象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了，神明之胄，也居然可以开起建筑公司，大船厂等等来。在这里，我们目睹了财阀政治和封建余孽的结合。日本的资产阶级，在服从精神中，在军国主义和专制政体的奴隶精神中长大起来，是不能解决民族问题的。日本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在小团体状况中。有一部是和大地主们连络的，主要的属于军国侵略的政党叫做"政友会"。有一部分，一面带军国主义的色彩一面又俨然带些急进派的臭味，这也是专门压制劳动阶级的财阀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当日本渐渐挤到各大帝国主义的行列中去，自己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时候，日本劳动阶级也开始在劳动运动的路上走他怯弱的第一步了。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包容五万工人的，就是那"友爱会"，友爱会的首领就是那模范的骗子，美国刚伯斯的朋友铃木。这会成立在一九一一年，铃木和一班与工商界代表直接有关系的知识阶级，在里面把持一切。还有许多国家社会主义的代表——退职的将军，往来出没其间，鼓吹帝国主义专制国之下的劳资协调。但是战后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群众不能安生，于是闹米风潮骤然爆发，罢工波涛层出不穷，才开始把日本劳动者从资产阶级知识者的指挥之下解放出来。一九一四年只有五十次罢工，一九二〇年多到一百八十五次；一九一四年，牵入罢

工风潮内的平均人数是一百五十八个，一九二〇年增到八百七十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即是表明劳动阶级已经觉醒了，劳动者已变成有自觉的势力了。日本劳动阶级中的大多数是不曾晓得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当罢工烽起中，统治阶级用恐怖手段恐吓那些到庙里去祷告神明的劳动者，把他们驱散时，他们口里喊的还是：劳工万岁，天皇万岁。这就表明日本劳动阶级还不是站在稳固的基础上。但是铃木君却已经失势，一九二〇年，一个急进的分翼已经组织完成，各工会和这分翼日出席于议会。现在到此地来的许多同志，起初都自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或自称工团主义者。后来和我们谈过几回话，并考察了俄罗斯革命中的成效，明悉了国际革命运动的意义的时候，他们恍然大悟，断定他们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伙伴，是共产主义者。片山潜同志曾说前此日本自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现在都把上面“无政府”三字丢去，单称共产主义者了。这是一个大胜利。实在日本劳动阶级中的良好分子对知识阶级和他们的政策构成一个确定的态度，无非是一个对于铃木君介绍到各工会中去的社会调和精神和专制精神的反动。并且这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实在和别人一样，个个都是好的国际共产党员。

同志们，在这里团结的劳动运动中的最有力分子的团体，实与远东的命运有极大关系。日本无产阶级正在成为一支革命的势力了。

假如我们看一看统计表，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乡村藏着充分的燃烧的材料，当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起来的时候，一定可以大有所为。

据一九一六和一八年的户口调查，农业人民中，二一九、八五九家或百分之四是有七·八五英亩以上的土地的；一、四四九、三四〇或百分之二十六又五是有四·九〇英亩以上的；三、六九六、一六八或百分之六十九是只有二·四五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大地主中有一二五·六以上英亩的人，只有三、四九五或百分之〇七。差不多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所有的土地都不到两英亩，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常在一种半饥馑的状态中了，他们真是命苦。这些佃农和乡村劳动者当然是我们对压迫者争斗时的天然同盟者。看到他们联结起来成一个半佃农的独立组合去争得租债条件的改良，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起始觉醒了。看了他们的开始与工人阶级相结，要求他们帮助的那些事实，我们极可以相信日本的工人阶级是要走俄国革命开始时所走过的通路——就是实现劳农协力的革命。他们前程无限，我们现在不得不明白确定地说：虽然劳动阶级是那么幼稚，虽然他的地位是那么困难，然而解决远东问题的责任还是在他们身上。日本劳动者中妇人占有百分之五十，其中百分之二十五战时才加入劳动军的。这种日本劳动阶级的复杂内容，阻碍他们去用他自己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在他方面，当革命的先锋号召日本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之间成立一种结合，便因为这种结合一定能使劳动阶级在争全民政治共同革命争斗中站着主要的地位，并且能使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获得领导的地位。苏维埃为革命争斗和支配的机关，日本群众必须坚决提出这个口号。

自称无政府共产主义或工团主义的同志们，却有一层疑虑，以为经过民主主义的争斗，恐怕徙陷于妥协状态而张大民主主义的迷梦。但决不是这样，他们现在已经说明白了。因为在日本他们不曾遇见真能利用政治武器去助无产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者。

假如现在我们告诉劳动阶级说，推翻了天皇，推翻了军国主义和伪善，这话中并没

有请他们和那些资产阶级党派——不论他们叫做什么名称——妥协的意思。也并没有请劳动阶级不要起来做一个独立的政治上地位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用示威罢工，和在必须的时候，用武装暴动，起来推翻日本的财阀和军阀的统治。他的意思是说，要除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狼狈为奸，劳动者必须掌理一切生产。

日本劳动阶级面前的责任是一个国际的责任，这责任所要求于他们的是：他们须担任这争斗中的最重要部分。远东的命运，高丽和中国的命运，都靠着日本劳动运动觉醒和他的势力的长成。这个例子须让个个资产阶级明白：只有和无产阶级运动结合，只有帮助无产阶级的运动，才能够达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所以，远东劳动阶级面前的职务，第一件就是谋各被压迫国家的解放。凡是民族运动，只要他是向帝国主义压迫作战的，我们都要帮助，对于求助于帝国主义者或国际帝国主义外交的一切倾向和团体，我们必须毫无怜恤地迎头痛击。重要的职务就是从内部破坏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建筑。我们相信日本的劳动阶级一定能很好的尽他们的职务。我现在要说一说大会关于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的各节，要把他们适于远东现状。

我们个个人都明白，只有苏维埃俄罗斯的远东化，只有国际共产党和国际劳动力的远东化，并且只有这样的远东化，然后能救高丽、中国、满洲、蒙古的被压迫民众。只有这样一种"远东化"才能够把他们从帝国主义的压制之下解放出来。

同志们！我们这会议——我们这些讨论的主要结果应该是这样，一切来参加这会议的人都要彻底明白民族革命与劳动运动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并不想把我们的见解勉强那一个承受，我们并不想向那一个强迫实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并不想请那一个未加入时期的人到共产党里来，我们并不想施行强迫的苏维埃政治。不过同时，我们却要说既然我们扶助民族和民主主义的运动，我们应要求你们以忠实的态度对劳动运动，对共产党，对劳动阶级。我们号召对于帝国主义举行一个毫不客气的争斗。这个会议必须创造和助长东方一切民族的国际的团结。这个会议定要实现一个中日两国革命的劳工，农民和一切真心奋斗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的联络。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却不可误会我们只扶助殖民地上的无产阶级运动。这些工业后进国家中没有多少无产阶级，单扶助他们是不能成事的；这不是他们的错处，却是他们的不幸了。

我们讨论的结果自然必须个个人明白，假如无产阶级群众们在这运动中独立前进，假如那些被压迫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能在民族革命的运动中做领袖，当栋梁，民族革命运动的胜利的机会将增加无数。我们讨论的结果，必须使个个人明白，日本的无产阶级是将来解决远东问题的主力军，与日本无产阶级，日本的共产党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结成兄弟般的团结，不但对于一个能操胜算的争斗是不可缺的条件，并且是中国高丽的群众摆脱帝国主义的羁轭得到真真的和最后的解放所不可缺的条件。

远东劳动者解放万岁！

远东劳农集合于国际共产党旗帜下面的团结万岁！

东方问题之题要

——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通过——

（一九二二年）

一、东方革命运动之勃兴

共产国际之第二次世界大会（一九二〇年），就已经根据于建设“苏维埃行政制度”于东俄诸民族之间的经验，又依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发达，议定于此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独裁制为长期间的斗争之时，对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原则。

从此以来，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诸国。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屡起反抗运动，一天比一天急激，这就是欧战后帝国主义之与时俱深的经济政治危机之结果。

凡此种种反抗运动，由下列诸例可以看出：（一）图谋瓜分土耳其的“塞维尔斯条约”（Seivrcs Treaty）已经完全破产，土耳其之民族的独立及政治的独立已有完全恢复之可能；（二）印度中国高丽埃及摩洛哥美索波达美亚诸国之民族运动猛烈的兴起；（三）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之不可免的危机，引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而无产阶级亦已能进于独立的阶级斗争；（四）东方诸国劳动运动之勃兴，正如雨后春笋，而共产党的组织亦几乎各地都有。

由以上征引诸端，可知诸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基础”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反抗军阀的斗争，更形剧烈；且今已大非昔比，此种斗争已非纯由封建阶级所引起，——当初是此等国内的资产阶级还时有愿与帝国主义妥协之意呢。

因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帝国主义战争，以及随着此次战争而生的危机，（尤其是在欧洲，）列强在殖民地所施用的强力乃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亦因此等环境，而世界资本主义之经济的基础及势力范围缩小，致使殖民地上帝国主义的争长更形剧烈，于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系统之均势局面也扰乱了。（小亚细亚英法之争煤油矿，太平洋上日美霸权之争雄等皆是。）

因此，各殖民地受帝国主义的压力稍轻，而列强彼此仇视的态度加甚，于是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本地的资本主义易于发达，这都是帝国主义列强钳制之下的漏网。列强各国资本家向来在殖民地上，享有工商业，及租税的“超越利润”（Excess profits）之独占权，故常力谋隔离此等殖民地于国际贸易之外。殖民地上之民族运动今乃起而要求民族的经济独立，实足表证此等国家之资产阶级已有发展的需要，殖民地本地的生产力之发达与世界帝国主义之利益相矛盾，绝对不能调和，盖帝国主义的实质，本在于利用世界经济之各部分间有生产力发展程度之不同，方得达其独占“超越利润”之目的。

三、斗争的形势

诸殖民地上之落后程度，可于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之驳杂性中见之；此种驳杂性正可反映其自封建制度或自封建宗法制度进于资本主义之种种过渡形式。所以此等运动之理想亦自有那种驳杂性的痕迹。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大半都先为“商业资本”，其发生发展既在封建制度之基础上，又在杂合，参半，过渡的形式中，故此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欲离官僚地主而独立，必定经过极混淆极困难的途经，这最足以障碍那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之成功，——因外国之帝国主义在落后的民族中无处不利用本地社会阶级之上层阶级（封建的或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的），以为其统治权之代理人，（中国之督军，波斯之封建官僚；埃及之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印度之贵族〈Zimendars〉及地税包办人〈Talngdars〉。）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若变成群众的革命运动，那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治者阶级，不但不能引导，并亦决不愿引导此等斗争。仅在封建宗法制度尚未崩败之处，其本地贵族尚未完全脱离群众，如游牧民族或半游牧民族之中，——此等贵族的代表人物，能积极为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如美索波达美亚，摩洛哥，蒙古）。

回教诸国间民族运动第一次的标语为“大回教主义”，各强国的外交家却只能利用此群众的偏见愚昧，以抗实际的平民运动（如英法之赞成回教国联合）。可是，等到民族解放运动勃兴扩大之后，宗教式的标语，“大回教主义”即为具体的政治要求所代。最近土耳其人要求“嘉李法脱”（Kaliphate回教教主）脱离政权，即是一证。

一切民族革命运动大都在于要求民族统一及政治独立。而无论那一国里，这种问题的解决必须民族运动能吸引劳动阶级并绝对脱离封建阶级之关系，方着实际；这种运动纲领之中更须包含民众的社会要求。

共产国际知道代表一民族之争政治独立的意志者，于历史上的种种不同的情形中，可以是极不相同的阶级，——所以对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都予以援助。同时，决不可以疏忽：——只有一贯到底的革命方针，根据于群众积极的斗争，绝对脱离一切与帝国主义妥协以谋自保其统治阶级的地位者，——方能指导受压迫的群众取得胜利，殖民地本地的资产阶级若与封建的反动派相结合，足令帝国主义者充分利用此“封建的无政府状态”，——利用其各派各系首领间之冲突，利用其各宗族间之争竞，利用各地方各城乡之间的对抗，利用各教派各宗派之间的斗争等，致使民众运动之组织破坏。（中国，波斯，苦尔狄斯坦，美索波达美亚。）

三、农民问题

大多数东方国家里，（印度，波斯，埃及，叙利亚，美索波达美亚），农民问题确是反抗列强专制之解放运动中之第×最重要的问题。帝国主义既剥削落后民族之大多数的农民而令破产，自然使农民丧失其必要的生活费，同时却因工业不发达，仅散处于少数商镇之间，故尚未能容纳乡村的余剩人口，而此等人民又不能桥游外国。于是此等农民乃穷乏不堪，留在乡间反变成农奴。先进各国，在欧战之前每以“工业危机”为其社会生产之“调节标准”，——而在殖民地此等，“调节标准”乃为饥馑。帝国主义既渴欲以最小耗费取得最大利润，所以竭其全力维持落后国家中“封建式的重利盘剥制度”

以剥削劳动力。有几国内，譬如印度，帝国主义将其本地封建国家之土地独占权，收归既巳，于是地税一变而成封建式的债务，而印度贵族及“地税包办人”乃变成帝国主义之经纪。其他各国内，则帝国主义假手于其本地之大地主的机关收取田租，如波斯，摩洛哥，埃及等。因此，凡是要求脱离土地上封建式的债务以及一切封建制度的束缚，此等斗争亦有反抗帝国主义及封建大地主之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一九二一年印度之摩佛拉（Mophla）反抗英国人及地主之暴动；一九二二年之锡黑（Sikhs）暴动，即足为例）。

只有农民革命，以“没收大地主”为宗旨者，方能引起大多数的农民群众而与反对帝国主义之斗争以极大的助力。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怕提起农民问题中的标语（波斯，印度，埃及），——足见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或“封建资产阶级的”地主有密切的关系，即在政治思想上亦不能离之而独立。殖民地之种种革命分子，都可以利用此种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首领与游移不定的态度，加以严格的有系统的批评，揭穿他们的“骑墙主义”。此等骑墙主义最有害于劳动阶级的组织及团结，如印度人之不合作主义的策略之破产就是明证。

东方落后国家之革命运动，假使不能以大多数农民群众之行动为根据，决不能有成功。因此，东方各国革命党却应当明白规定其关于农民问题的党纲；——应当要求完全消灭封建制度，以及大地主制度和包办地税制度之遗迹。欲农民群众积极参与民族解放之斗争，必须提出彻底变更土地制度之要求；并当督促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充分容纳此一革命的党纲。

四、东方之劳动运动

东方之幼稚的劳动运动最近几年其本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至今就是最主要的东方工人阶级也还只在过渡时期，——正从小行会的工场过渡于资本主义的工厂之时。因为当初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智识者来引起工人阶级之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以最初期的职工组织及职工运动，往往为此辈智识者所指导，最初一期中，此种运动往往不出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谓“全国共同利益”的范围。（印度，中国之罢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官僚及管理员）。甚则竟如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说，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仰幕苏维埃俄国政治上道德上的威信，并迎合工人阶级的心理，欲自掩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意向，往往号称“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藉此得以诱惑无产阶级的团体，令忘其自己“阶级组织”的直接职任，——这有时或是无意之中自然流露的现象。（土耳其之“埃喜尔部”Eshil Ordu自称共产主义派，而实为“大土耳其主义”；中国的国民党有几个代表自辩为“国家社会主义派”。）

然而东方落后国家中近年来劳动阶级，政治运动及职工组织确亦很有进步。譬如东方诸国，已无一处没有独立的无产阶级团体，就是显例，——固然这些团体大多数都应该经过改造，以免一切“闭关自守”“狭义团体”等等弊病，共产国际最初即巳注意于东方劳动运动的潜势力，——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足以证明其实为共产主义旗帜之下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真正国际联合。至于第二国际及第二半国际至今没有于东方落后国家中得一同志团体，固为他们是欧美帝国主义的“仆御”。

五、东方共产党之主要职任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看着劳动运动，只当他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而国际的无产阶级却注意于东方幼稚劳动运动的“革命的将来”。东方落后国家处于资本主义之下，不出巨大的代价，——即不忍受列强资本家野蛮的剥削压迫，就决不能获得近代的文化与技术。东方劳动者当与先进诸国之无产阶级联合，不独因为要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且亦因为只有先进诸国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之后，他们方能于开发生产事业之际得到大公无私的助力。东方劳动者与西方无产阶级联合更可以开出一行向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途径。苏维埃制度是落后诸国从原始的简单生活进于最高文化共产主义之过渡方法，唯采此制则过渡期间之痛苦最少；可以代替全世界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分配制度者不只有共产主义。旧俄帝国之下解放出来的殖民地，已有应用发展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足以为证。只有苏维埃制度方能保证农民革命之完成。譬如东方有几国农业的特别状况（人工灌溉），向来是以封建宗法制度的协作组织维持的，现在已经为掠夺的资本主义所毁坏；此种地方就确有必要：设立一种苏维埃国家制度，方能从事于有系统有组织的整顿办法，以应公众之需。因气候及历史的关系，东方“小生产协作制”确当在过渡时代占一重要位置呢。

殖民地革命运动之客观的职任，实超过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限度以外，亦就因为他的最后胜利绝不能与世界帝国主义之统治相容。当初则殖民地之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式的智识阶级确为革命运动之先驱，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农民群众自即加入此等运动；可是等到群众之社会利益刚占优势，那富的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式的地主就立刻脱离运动。殖民地幼稚的无产阶级始终为一长期的斗争所困，自成其为一整个历史时期，——此种斗争要反抗帝国主义的剥削，要反抗自己的统治阶级，——因为这些阶级力谋垄断一切实业利益以至于文化，而想使劳动平民永陷于原始状态呢。

无产阶级若能为取得农民中之同情而斗争，则必自成就其政治上的领袖地位。只有此类预备工夫，训练团结无产阶级并及于与之联合的各社会阶级之后，他方能进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此种主义，在东方落后国家之环境中，较其在西方，必尤为虚伪。

殖民地之共产主义者，若以“防卫”独立的阶级利益为名，固执“当单独反抗帝国主义之压迫”的意见，都是最不好的一种机会主义，足令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大失信明。借口于怕“国民统一”，怕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行“国内和平”而竟至于实际上与工人阶级日常利益相隔离，这是最危险的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工人政党及共产主义者，有一双方的职任：——一方面，力谋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诸问题作更彻底的解决法，即直接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别一方面，组织工人农民为其事阶级特别利益而奋斗，并利用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之间的矛盾，而自取其利。此种工人阶级的政党，既有其特别要求，自可兴奋无限的革命能力，决非资产阶级之自由主义的要求所能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劳动阶级应当知道：只有扩大加深那反抗列强帝国主义的运动，方能令自已阶级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换一方面言之，唯有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之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及其运动中之锻炼方能增长此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力量。

东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共产党，多少尚在未发展的阶段中，尤当参与一切运动，

务使时时得接近群众。同时，又应当竭力排除劳工组织之中的宗法制度，小行会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势力，以此保障劳工组织，令勿受改良主义的传染，而使成群众的奋斗的组织。再则，当竭尽心力，组织最大多数的农民劳动者及男女手艺工匠，务以他们日常生活利益为根据。

六、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

西方因在聚集已组织的精力时期，取"劳工统一战线"的标语；而在东方则现时必须要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此种策略在于积集革命的生力军以抗帝国主义。生力军之所以亟需征集，其重要原因在于国内的治者阶级倾向于与外国资本家妥协，漠视民众的根本利益。正如有"劳动统一战线"的策略，则在西方易于暴露社会民主派之不忠于无产阶级利益；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则在东方亦易于发见某一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派之态度不明，宗旨不完。这一标语，也足为发展革命意志之助，且使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更为确切，导入于实际斗争，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并亦反对一切封建制度的遗臭。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劳动运动，第一当先在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内获得独立的重要的地位。当有独立的基础，且能维持永久的独立，方可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暂时的结合，亦且必须结合。无产阶级应当特别提出要求：——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废除一切封建式的权利与特权，要求妇女之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等等——这是因为照现时的情形，苏维埃制度还不宜提出来。同时要使农民，半无产阶级与劳工运动生极密切的关系。当向劳动群众明白讲解劳动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及苏维埃共和国有联合之必要，——因这亦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中重要职任之一。殖民地革命而欲终得胜利不再败退，唯有与诸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结合之一法。

半殖民地诸国（如中国，波斯）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派与一帝国主义国家或数帝国主义国家相结合，其危险已至，或希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而自己获得政治的独立（土耳其亦有危险，——而且比殖民地更甚，此种结合，每每划分本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权限，借以保形式上的政治独立，而实际上将永使此国隶属于世界帝国主义之下。

劳工阶级明白承认，在此反对帝国主义之革命的斗争中，有欲得"息力"之处，每须为部分的暂时的妥协，确亦可以，且本不可免；然劳动阶级极端反对帝国主义者与国内治者阶级之间的妥协，瓜分权力，使治者阶级保持其阶级的特权。无产阶级要求联络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鲜明旗帜。再则，为铲除社会政治两方面反动分子势力及保持劳工阶级自己的利益起见，当有极坚决的行动；要求组织上的自由权，以便劳动者的阶级斗争；要求更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以扼制反动派去其政权（如民主共和国，农田改良，税制改良，宽广的自治基础，劳工立法，童工保护，产母及婴孩保护等要求）。现在就是在独立的土耳其，劳工阶级并没有享受到组织的自由权，这可以当作一个好榜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待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如此。

七、太平洋沿岸无产阶级之职任。

反抗帝国主义的战线，一半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互相仇视滋长不已所促成。这种

互相仇视的局面，今已可断定世界第二次大战，必在太平洋区域内爆发，不然就是国际革命兴起，方免此战祸。

华盛顿会议之召集，即在企图缓和这种危机，然而按之事实，这次会议只有使帝国主义彼此间的冲突，更为深广更形剧烈。最近中国张作霖与吴佩孚间之冲突，是日本与英美资本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并未真能调和利益之明证。第二次世界大战，蒙其害者不仅是日本，美国，英国，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荷兰）也必同受波及，——损害之大必远过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欧战。

东方各国共产党所应尽的职任，乃是在群众之间广为宣传，警告他们来日大难，唤醒他们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十分努力，告知他们只有苏维埃俄国是一切受压迫被剥削的民众之屏障，——尤其是太平洋沿岸诸地共产党应该努力。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美国，日本，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际此战祸危险之大，不仅应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并应尽全力去净劳动运动中助长战争的动机，预防资本家利用“爱国”观念，“人种”观念。

此种动机为移民问题，有色人种劳动廉价问题。

契约劳动制为今日南太平洋植糖业召募中国人，印度人充当工人之唯一方法。这种事实，强迫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要求政府颁布禁止移民律，以排斥有色人种，如美国，澳洲皆有此种举动。这种禁止移民律使有色人种与白色人种冲突日益加厉，更足破坏劳动运动的联合力。

美国，坎拿大，澳洲共产党应该努力进行，作废止上述法案之运动，并须向本国劳动群众剖明，此种法律引起国际间的仇恨，最终仍是害及本身。

另一方面，资本家亦反对上述的移民律，他们却因为一则可以使廉价的劳动自由输入，二则可减少本国劳动者的工资。要破这种毒计，只能竭力使白种劳动者之职工联合会吸收移入的黄种工人。同时，努力作要求有色人种与白种工人之工资一律的运动。这种策略，一方面既可打破资本家的毒计，别方面又可表示国际无产阶级绝无种族的偏见。

为施行这种策略起见，太平洋沿岸诸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应集代表开一“大太平洋会议”，以便商定正确的进行计划，并组织一相当的机关，俾可联合太平洋诸种族之无产阶级。

八、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职任

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非常之重要的意义，所以必须格外的加紧在殖民地上的工作，帝国主义诸国的共产党尤其应当努力。

法国帝国主义在压抑本国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时，用他殖民地的奴隶充任反革命的战卒。

英国和美国呢，既然剥削殖民地而得“超越利润”遂能略分余润与本国的“劳工贵族”（aristoraey of labour案：即言，得有分外增加高级工人之工资的可能）如此从事贿买，因使劳动运动分裂，——至今还是继续行这种政策。

凡领有殖民地的国家，其共产党当格外努力援助殖民地之劳动运动及革命运动，与

以物质上思想上的援助，并须定有系统的规划进行。殖民地上之欧洲工人有些俸给甚厚，其间遂流行一种“殖民地化”的伪社会主义的思想，凡共产党都应当竭力反对这种倾向。殖民地上的共产党工人当与其本地工人一致要求具体的经济改善办法，（白色人与有色人受同等的工资，同等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法等等）。

埃及，阿吉斯（Algiers）等处欧洲工人特立组织共产派的团体，反足以助资本家张目。共产派组织而依国籍为标准，正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相冲突。

凡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都应当向劳动平民宣传，说明颠复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内的统治权之必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当在他中央委员会之下，特设一殖民地委员会，专任其事。共产国际对于东方共产党的辅助，第一步就当为创办印刷所，以各地本国文字印行种种报章杂志。殖民地上尤其注意，各种欧洲人的工会及当地驻扎的军队。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不应有丝毫疏忽，令政府，资产阶级及机会主义的社会党，得以对于殖民地行掠夺政策。

（原载《新青年》1期，1923年6月15日出版）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二年七月）

一　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

（一）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现今这般资本主义进程中，全世界有十二万五千万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的人民（还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万万数数的无产阶级）辗转就毙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处极少数银行家工业家和他们政府重压之下。除非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组织完全铲除，这种惨酷的现状是决不会消灭的。这个现象最值得弄个明白，因为个个中国人（不但是劳动阶级）都应当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个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获得最大的市场，来销售他过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夺的市场，只有印度、中国、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丽、黑西哥、安南、南洋群岛、南部和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夺取那些市场的竞争是免不掉的。竞争的结果，便须诉诸战争。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便是发源于英、德两系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近东市场的冲突。

上次世界大战的成绩，即是屠杀了数千万的劳动群众，瓜分德国的殖民地，毁灭德、奥等的经济基础，使他们变为英、法的殖民地，并把全世界的经济秩序破坏无遗。战后，那些帝国主义的国家又企图恢复战前经济原状，来挽救资本主义根本复灭的厄运，便想将战争的巨大损失取偿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因此，他们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

帝国主义者开多少次的会议，都不能免去日、美在最近将来的战争趋势和英、法非相见于疆场不能解决的冲突，不过他们常常被逼着去救济资本主义无法挽回而日见扩大的世界经济恐慌，冀图避免社会革命的锐利锋芒，故不得不借此种会议的分赃妥协行

为，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来掩盖他们中间的裂缝，以苟延此不可免的大战时期。同时并可在此苟延期间之内，加劲劫夺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富源和劳力，一方可以勉强按住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使之不能即时脱离羁轭，俾得从容补偿前次大战的损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准备。

许多年来，东亚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国铁踵压迫之下，上次大战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东亚各民族又更加厉害。美国勒住菲律宾群岛，一面用假装慈悲的态度，一面继续他的经济侵略，不稍放松。英国扼着印度的喉颈，刚柔并用的压倒印度独立运动，以维持每年一百万印度劳动群众死于英国资本家的长爪之下的现状。安南农民更是奴伏在法兰西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牛马一般的种出米谷来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尽可每年饿死多少万种米的农民，但何时都缺不了法国米商成千万石的米粮输出。日本榨取高丽人民的血汗，更是横暴无比，日货尽量的输入，米粮强迫的输出，使二千万高丽农民处在饥饿而死的境遇。

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二）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开始于一八三九年英国舰队的攻击。这次攻击实是资本主义最著名的卑污强盗行为，因为他的起因是由于英国政府和商人要强迫把鸦片毒害中国民众。从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攻打大沽，直到一九〇一年义和团反抗“洋人”的暴动，促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四十三年间，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宰割中国的流血时期，也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时期。二十世纪的开始，已是到了列强因掠夺而互相冲突的形势。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为的是争夺满洲，战争的损失，又挖取中国人的血肉去填补。

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帝国主义者掠取了中国辽广的边疆领土岛屿和附属国，做他们新式的殖民地，还夺去许多重要口岸，做他们的租界，并自行把中国画成几个各自的势力范围圈，实行其专利的掠夺事业。在中国自已领土之内，三分之一的铁路为外国资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铁路也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债权主人管理；外国的商轮是在中国的海口和内河里面自由行驶；邮电是受严密监督；关税也不是自主的，是由外国帝国主义者协订和管理的；这样，不但便利于他们的资本输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国经济生命的神经系已落在帝国主义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国资本家还在中国占据了许多矿山，并在上海天津等商埠开设了一些工厂，鞭策百万的中国劳工在那些矿山工厂里，做他们生利的奴隶。同时又加上外国商品如潮的输入，慢说布匹纸张之类，旧有的针和钉都几乎绝了种，因此生活程度日渐增高，三万万的农民日趋于穷困；数千万手工业者的生活轻轻被华美的机器制造品夺去，而渐成为失业的无产阶级。中国因为每

次战争都要被索去一批现金赔偿，加上鸦片和商品的吸收，现金日见减少，又加上二十万万外债连本带利不断的盘剥，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几个外国银行家的操纵，国家和民众的经济生活都陷在极恐慌的状态之中。帝国主义者还贿赂中国的官僚政客，派遣许多的顾问牧师，出版报纸，设立学校——这是企图更顺利的达到他们贪婪掠夺的目的。同时为防止中国民众的反抗起见，帝国主义者的列强又掠得实际统治中国人的领事裁判权，并派遣军队警察军舰驻守于中国领土之内。

（三）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起后，欧、美各国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占领胶州湾，并用恐吓贿赂等外交手段以最著名的二十一条压迫中国，意在使中国变为他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侵入了中国各种行政、财政、军事、外交及其他一切政治机关的血管里面，控制中国经济生命，自由指挥北京政府，以完全实现他的侵略政策。这样虽然填满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欲壑，但是却引起了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嫉妒，日、美两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的冲突于是起了很深的一道鸿沟。

到了大战告终，所谓巴黎和会，便是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和从新画定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东和远东的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在那次会议席上，日本既是先行获得中国的利益太多，美国帝国主义者又难于迁就，冲突无从调和，关于中国问题遂搁置而不能为平均分配的解决。

然日、美互争掠夺中国的强盗行为，已是表现得极其明白了。

美国既不能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调和关于中国的冲突，相互获得平均利益，便企图组织新银行团——国际帝国主义的托拉斯，想用经济优胜势力，尽量把资本输入中国，以达到掠夺中国的优越地位，做完全管理中国经济的主人翁。但日本却已占得中国领土的最大部分做他专利的势力范围，又岂肯轻于让步，所以新银行团的计划未能即时实现。

在这样日美冲突状态之下，形成中国的特殊政治状况。日本帝国主义者先后扶助安福系、张作霖、新旧交通系等当权的北京政府，为的是要利用北京政府为实现日本侵略计划的工具。英国便站在吴佩孚派的督军后面，为的是要借此巩固他在长江一带的权利和势力范围的推广。美国却勾结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级分子，想用掩眼法来实现他国际托拉斯的经济侵略政策。但是这种步骤不一致的侵略方法，究不能即时发展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处于利益冲突日甚的地位。

（四）

英国在战后的欧洲市场日被排斥，生产过剩，经济恐慌，故以发展远东市场为救济的唯一道路，而又陷于与日本冲突日见紧张的地位，同时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问题：英国还是继续与日本同盟来垄断远东的权利呢？还是和美国联合来实现共同侵略远东呢？在这种纠纷之下就产生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为的是要从新分配他们在远东的市场，

希图调和那不可免的日、美和英、美的两种冲突。远东问题在英国帝国主义者看来，是他许多掠夺殖民地问题中间之一个，所以英美战争，或许可以久延时日，但是在日本乃只有这个唯一的大市场，在美国也只有这个唯一可供发展的大市场，所以日、美冲突万难减轻，而战争必在最近期间内爆发无疑，华盛顿会议那能为力呢？不过他们在爆发之前，拿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丰富物产和劳苦群众，搁在各国集于华盛顿的外交家银行家的晚餐席上，平均各个的贪欲，从新宰割一次罢了。

华盛顿会议所以标榜减轻军备，完全是要欺骗在军备负担底下呻吟而将起来革命的劳动阶级。军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柱石，资本主义国家不但需要他来侵略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裁减军备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主力舰吨数比例和陆空军备保持的竞争，愈现出帝国主义者怎样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计划压迫劳动者的阴谋。

华盛顿会议中之主要问题——中国问题，是在美国胁制之下解决的，结果，他们承认日本在满、蒙和东部西伯利亚独占的掠夺，将中国置在他们共同侵略的"开放门户"政策之下。美国之所以采用海约翰以来的旧调，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开放门户"政策的采取，显然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成功。多少年来驾驭中国的英日同盟虽是废了，但这次成立英、美、日、法的四国吸血同盟——虽然他的根基极不稳固——却要做比他加倍有力的侵略。美国所领袖的新银行团，从华盛顿会议算是加了一层保障，将要使农人的中国变成国际托拉斯进贡的藩属，从此中国的贫苦农民要纳租税给那些外国的银行，中国所有的实业要归为外国银行的私产了。

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

（五）

所有上述那些事实，都是帝国主义的列强怎样必须侵略中国怎样宰割中国和剥夺中国工人和农人的贪婪的写真。

帝国主义者们还口口声声唱什么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的名词，想把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强国压迫弱小民族的行为，轻轻隐瞒过去。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

但是被压迫的中国劳苦群众最要明了现今世界大势，不能从受压迫的痛苦中加快的救出自己来。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大战以后，英国生产力停滞，法国经济破产，美

国生产力过剩，而帝国主义者简直没有恢复战前经济原状。他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用意是互相尊重其所得权利，互相维护其掠夺物的相互保险政策，结果又被他们自己拆散了。

华盛顿会议把日、美冲突弄得更加明显，柔鲁会议英、法背道而驰，已是回复到比大战以前的形势还更危险；大战的“破坏”既然已将资本主义的墙脚掘掉了一大半，他旦夕有发生塌倒之可能，还能说及恢复和再造吗？这便可说明世界资本主义的命运已离他的末日不远了。在另一方面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俄罗斯——全世界劳苦群众革命势力的柱石——不断的从根本上打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了五年的奋斗，势力日见巩固；德国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达到极烈的顶点，英、美、法、意等国常常发生极可怕的罢工运动，已动摇了资本主义的老巢穴；就是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声势浩大的兴盛起来，至于印度、埃及、爱尔兰、高丽等被压迫民族，受了前次大战和俄罗斯革命的影响，独立革命运动日见有组织，日见紧张，业已惊得帝国主义者心神不宁了。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迅速伸长的确证。

而且这两种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联合日趋密切，这个联合的革命势力必定会把世界资本主义的枯骨架推到资本主义自己掘成的坟墓里去。最近数十年之内，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势力，已是大有进步，而且还会增长起来。但是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二、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

（一）

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军阀们一方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唆使，一方为自己的利益把中国割据得破碎不全：张作霖之占据东三省，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这样的情形，即是中国政治上一切纠纷内讧的复杂基础。

中国目前政治状况又另开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一方便利于帝国主义的列强实行华盛顿会议所决定的共同侵略政策，一方延长中国的纠纷情势。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为的要协助吴佩孚打倒日本在北京的优势，达到他们自己把持中国政治中心的欲望；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希图维护著名亲日派张作霖所栽培的交通系内阁，以保持他对于北京政府的优越地位。这次战争的结果，吴佩孚扫除了张作霖在北京的势力，但是张作霖在满洲的势力

并未失坠，仍足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做专心掠夺满、蒙的刽子手。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美国并不愿意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制造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实现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便转过头来，与日本强颜携手，企图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如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个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国傀儡政府。英国更又赞助暴露了反动行为的陈炯明，铲除孙文派在广东的民主势力。这样他们利用军阀，阻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造成军阀势力下之有名无实的统一政府做英、日、美的共同工具的计划，已是显明极了。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呢！民国成立十一年，几乎年年都有战争，不是军阀压迫民主主义革命战争，便是军阀内讧，如直皖战争和奉直战争等。现在那些督军间的冲突，无处不现出严重的形势，加以帝国主义者无穷的操纵，因此内乱是有加无已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因为中国还是军阀把持和割据的时代，故在现今"统一"呼声之下，发生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派军阀假联省自治的名义实行割据，同时他派军阀假统一的名义压迫南方的民主革命和蒙古的自治，以增长自己的威权。两派所假借的名义虽然不同，而其各想延长武人政治的命运，则是一样的。但是本部各省（东三省在内）经济上绝无根本的不同，而民国的历史，若以十年来武人政治所演出的割据现象便主张划省为邦，以遂其各霸一方的野心而美其名曰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十年来，一切政权业已完全分于各省武人之手，若再主张分权，只有省称为国，督军称为王了。所以联邦的原则在中国本部各省是不能采用的。至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不然：这些地方不独在历史上为异种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根本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澎涨，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

（二）

那些帝国主义者，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他们曾经百端阻挠中国经济自动的改进：如他们不让中国人民自己建筑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及川汉铁路，强迫清政府借他们的款子来兴工，以及他们夺取汉冶萍公司之类。但是这样阻挠的结果，曾激

成剧烈的反抗，对他们经济的垄断政策加以打击。而且外国资本家初到中国的时候，究不能独立经营，只好借助中国商人和雇用中国账房、买办、经纪人之类，做掠夺勾当的中间物。这么一来，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大战期内，欧美商品不能顾及中国，日本商品又遭抵制，遂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如是中国资本主义也渐渐在扬子江流域一带兴旺起来了。

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那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只不过做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中间物罢了。而且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的发展和利益，反扶助中国军阀，故意阻碍中国幼稚资本主义的兴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如一九一九年的排日运动。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还有一层，中国的知识阶级，商业的和工业的资产阶级，要自己能够避免美国的愚弄，他们的民主运动才能依正轨进行。

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户和农业雇工。第一种占最少数，第二、第三两种的贫苦农民至少也占百分之九十五。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自从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以来，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也是日趋困苦，甚至破产失业，加以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增加了手工业者无产阶级化的速度。这个大量的群众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

中国劳动运动已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起来，香港海员和其他工人为经济要求的罢工运动，足够证明工人们的伟大势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三）

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审察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的农民都应该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相信在现今的奋斗进行中间，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三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

（一）

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已）保护失业工人等；
2．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4．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在压迫

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呀！

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现在他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又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同前进！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和平，自由，独立万岁！

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国际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

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二年七月）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

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已是衰萎，社会革命的势力已日见澎湃，只因无产阶级自己营盘里有许多奸贼，很下流的替资产阶级服务，变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厉害的敌人，把这股革命狂潮暂时按抑下去了。因此造成世界帝国主义者为恢复他们经济起见，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进攻的情势，如各国资本家减少工人工资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在资本家向无产阶级进攻之情势中，第三国际召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联合的战线，共同抵御资本家目前的进攻。

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还是强盛的时候，是不断的向她进攻，因此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应该尽力保护苏维埃俄罗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议决：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维埃俄罗斯——，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并要邀集中国的被压迫群众，也来保护苏维埃俄罗斯，因为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C.P.C”的决议案

（一）现在世界的大势如下：

A、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破坏了。

B、世界的资产阶级现正向着无产阶级进攻：他们倍加劲来掠夺劳动者们，以图恢复他们亲身在大战中损毁的经济秩序，无产阶级只有联合在一道战线上来反抗这个进攻。

C、在经济秩序毁坏了的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

力，来补偿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因为争夺市场，他们中间发生了新的冲突，如日美间的冲突和英法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都是制造下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

（二）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四万万贱价劳动力的人民，早已是世界帝国主义者们争夺之市场了，现在他们的心和眼更都着重在这个市场。

（三）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种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已能为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反对封建制度的军阀了。世界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在中国造成他们各自更大的特殊势力，他们又争相扶助中国封建的军阀，使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遭着非常的阻碍。

（四）在这种状况之下，自一九一一年开始的革命势力和进行变成了十分微弱；十一年来的中国依然是重压在军阀横暴和战乱之下，致使资产阶级工商业受了阻损，不能发达；农民经了多少不堪忍受的摧残，工人阶级的痛苦日增不已。

（五）中国本部是在军阀封建割据之下，吴佩孚一派军阀企图以武力统一南北，现又恢复旧国会以为统一的手段，这些均不能做到南北统一。

（六）现在中国本部做不到和疆部统一，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情况和本部不同，他们互相也有差异。

（七）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倒封建制度的军阀，建设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

（八）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认为最近要极力要求：

（1）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2）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6）各种自由权；

（7）制定保护工人农人和妇孺的法律。

（九）这些要求是与在现在情形底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很有利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力来争到他们。

（十）因此，中国工人要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下，一方面加入民主革命的战线，一方面做增进自己阶级地位的奋斗。

（十一）中国工人要联合在各种工人阶级组织之内，成功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力量。

（十二）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我们加入民主革命的阵线，完全是以他为达到工人阶级夺得中国政权的一步过程，所以我们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

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

人类经济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

的及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及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

人类现在的历史，正在阶级战争的奋战途中，不但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大部分还未得着胜利，即民主对于封建的战争也并未终了，尤其是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不但在社会习俗上，即在国家统治权上，封建的势力仍然大部分存在或完全存在。在这种封建势力统治的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就没有什么效力，所以为人民幸福计，民主革命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这时他们压迫的程度和无产阶级能够抵抗的程度，乃看无产阶级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所发挥的组织能力和战斗能力至何程度而定。

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在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之下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胜利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乃因为在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不如此无产阶级便无法得着为自己阶级开始团结所必须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我们应该号召全世界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去加入此种战争。我们须告诉他们：此种战争虽不能完全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却是解除工人农民的痛苦使工人农民到权力之路的第一步。同时又须告诉他们：无产阶级加入此种战争，不是为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们的牺牲，乃是为了无产阶级眼前所必须的自由而加入此种战争，所以无产阶级在战争中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发表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是能够应付时势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后更应扩大此主张，并规定进行计划如左：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倾向共产主义运动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会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廿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　　*　　*　　*

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照录）

（一）每日的宣传和运动须具真实的共产主义性质，并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的共产党员编辑，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讲介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政出现之必要。

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

凡属第三国际的党众，无论在报纸里面，公众集会里面，工团里面，合作社里面，不仅要系统的攻击资产阶级，并且要攻击与他通气的各色改良派。

（二）凡要加入国际共产党的组织，必须一律的系统的从一切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中（如党的机关，编辑部，工团，议院团体，合作社，市议会）排除一切改良派和中央派而代以证实的共产党——在战初的时候，不要顾借以初出行伍的劳动者代替经济富足的战士。

（三）阶级斗争，差不多在欧美国家中，已入了内乱时代，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党就不要以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法律为能事了，他应该到处创造与合法机关平行的违法机关，以便在决定的时候，完成对于革命的职务。在施行戒严令或非常法律的国家，共产党一切行动不能合法发展时，合法行动与违法行动同时并进为绝对必要。

（四）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的法律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

（五）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工人阶级者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部分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落后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故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他应当使共产主义工人常常与乡村相交接；假如拒绝这种工作，或委托这种工作于可疑的半改良派之手，那就等于抛弃无产阶级革命。

（六）凡愿意属于第三国际的党，应该告发一切爱国主义和平主义的虚伪与错误；应该普遍的指教劳动者使其知道除了由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外，国际联盟所标榜的什么国际仲裁，缩减军备，民主主义的改造，一点也做不到，并且绝不能救出人类于帝国主义无穷的战杀之中。

（七）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承认与改良主义和中央派的政策有完全的确定的分裂之必要，而且必须在党员与组织之内宣传这种分裂。共产党一致的行动，惟有付了这个代价才为可能。

国际共产党命令的不许讨论的要求这种分裂，应在一个极短期间即行成就。国际共产党不能容许著名的改良派屠拉第、考茨基、伊尔峰登、郎格特，马克文兰尼，老列尼辈有权自命为第三国际党员，混到这个里面来演把戏。假如这样一来，他们又要飞速的把第三国际弄成第二国际一样的。

（八）关于殖民地与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凡在资产阶级私有这些殖民地或压迫其它民族的国内的党，应该具一种特殊显明的方针。凡愿意属第三国际的党必须严厉告发“他的凶恶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的威压”；对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不但口头赞助，而且要在实际上赞助他，要求驱逐帝国主义者于殖民地之外，使本国劳动者对于殖民地的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发生真实的友爱感情，而且在宗主国军队之中，维持一种继续的运动，反抗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压迫。

（九）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在工团，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工人群众的组织里面，必须从事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运动，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使一切工团都共产主义化。他的责任又应时时刻刻揭破爱国社会党的叛逆和中央派的犹疑，一切共产党核心，应当完全受党的节制。

（十）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都应努力坚忍的攻击亚姆斯德登的黄色国际工团，他们都应坚忍的在工团内部宣传与亚姆斯德登黄的国际必须分裂的思想。并应以一切势力拥护加入于国际共产党的红色国际工团。

（十一）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应审他的议院团体的构造，排除一切可疑的分子，使议院团体不在口头上而在实际上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务令一切共产党议员将其一切活动，隶属于革命的宣传和运动之真正的利益之下。

（十二）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级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议的职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

（十三）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斗争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

淘汰一些模棱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

（十四）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他们必须不懈的鼓吹劳动者拒绝为〔攻击〕苏维埃共和国送运军火军需，并须在派去攻击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中努力从事合法的或违法的宣传。

（十五）一切至今还保守在社会民主党旧政纲上面的党，必须立刻根据国际共产党的精神，参酌他们国内的特别情形，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新政纲。照例，凡属于第三国际各党的政纲，必须经过国际共产党大会或他的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某党政纲不得执行委员会批准时，该党有请愿于国际共产党大会之权。

（十六）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当兹内乱激烈的时代，国际共产党与他的执行委员会，自应计算各国争斗的不同情形才通过各种普遍的决议，并且审定其可行，才要强迫执行。

（十七）按照以上一切设定，凡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应一律改变他们的名称。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命名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名称问题不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际共产党业已不客气的向资产阶级旧世界和一切黄色的旧社会民主党宣战，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把共产党与旧社会民主党及冒了工人阶级旗帜的官僚社会党之不同，在全体劳动者眼前，弄得极明白。

（十八）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

（十九）凡已经加入及表示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于尽快的短期间内，——至迟不得过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后的四个月——召集非常大会说明这些条件。各党的中央委员应把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决议宣传一切地方组织完全了解。

（二十）凡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而还未根本变更旧方略的党，必须由在第二次大会前已公然宣言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一切重要中心机关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例外的事须经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核准，才得行使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第七条所载的中央派的代表，保留行使例外之权。

（二十一）凡排斥国际共产党一切条件和原则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非常大会的代表同样处理之。

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

一

在经济先进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既安然发展过好几十年，于是与他表里为用的议会政治，也随着渐趋于巩固。在这样背景之下，无产阶级政党议会行动，就渐渐变为投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议会行动，换过说，就是第二国际的议会行动，德、奥、法、比的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简直以全付精力集注于这种合法的哓舌的改良行动之内，而把无

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运动及其他一切必要的违法工作抛在九霄之外。

二

第三国际产生于投机主义改良主义流血的破产之中，换过说，即产生于第二国际投降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中——重行估计无产阶级参与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民意机关”的价值：他把马克思主义上面改良主义的油烟完全抹去，阐明无产阶级议会行动的革命性质；设定无产阶级参加抛弃、退出资产阶级议会，及完全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步骤；并且把这类合法的行动完全隶属于违法的革命行动之下，至此的革命的议会行动，成为激起或辅助无产阶级一类革命风潮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

经济落后的中国，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场和半殖民地，一面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武人势力的宰割物和糜烂区域，因此民主革命未成功，议会政治还未确立。虽然形式上设立了各级议会，但因为武人势力的干涉和蹂躏，常常处于破坏、胁迫的恐怖之中。

四

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所以应当跑入这种时常被封建的武人势力所胁迫破坏的议会中去，高声告发代谢不穷的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所扶植的武人政治的罪恶，酝成民主革命最高的潮流，以期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又在各级议会中，辩护无产阶级和贫苦农人经济生活的利益，以反抗本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对于劳动者一切的压迫。

五

中国共产党为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起见，按照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规定如下：

A、国会候选人名单，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省会、市会、县会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所提全体或一二人不能胜任时，令区及地方委员会改提。

B、候选人资格不限于什么“学识”和“经验”，应尽情提出本党中最勇敢最有革命精神的劳动者。

C、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委员会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本党议员之个人及团体（共产党议会团体）绝对不能自由。（国会

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省会市会县会议员各项的演说稿，须预先交中央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审定。

D、本党一切议员须利用议员不可侵犯的身分权，参与议会外一切群众运动和违法的组织。每次示威运动发生，本党议员必为示威行列的领袖，跑在群众的前面。

E、本党议员必须常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接触，每年必须到选举他的区域往返几次，召集选民开种种会议，演说政治经济国际等情形及访察群众的新要求。他们在议会中的演说稿，必须用一切工人农民妇孺都能懂解动听的文字常常汇印成小册子散布于城市与乡村。

F、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消其议员资格，并开除出党。

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

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工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手艺或某个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单独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切实研究这些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行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

按照中国劳动运动的现状，和我们过去活动的经验，以及近代欧洲运动的教训，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应以下列各项原则为根本方针。

（一）劳动阶级和劳苦群众从资产阶级掠夺中解放自己的奋斗，必须伴着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进行。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工会运动范围内，必须集中他的力量为产业工人的组合运动，如铁路、海员、五金、纺织工人等。

（二）工会是为什么成立的？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造的东西。这个事实，便是工会真正的出发点。

（三）工会应该明白并且认识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的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所以工会不但不去调和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还要使这种争斗更加紧张。一个争斗接着一个争斗，在两个争斗之间工会的组织愈增强固，预备第二次争斗。如将工人的会费多数存作罢工基金是必要的，但同时工人必须避免自己立在不利地位的情况中争斗。

（四）工会应该努力做工人改良状况的运动，凡在资本主义之下能够改良的，都要努力去做。同时须使工会向着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进行，就是完全打倒工银奴隶制的资本制度，并造共产主义原则改造社会。

（五）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于为劳动立法运动。同时使工会明白：获得劳动立法和争得劳动改善条件，均必须工会组织得强固，在资本制度下，要能

够使劳动立法劳动改良条件真正实现，都必须劳动者的力量能够压迫政府和东家才行的。

（六）我们的同志也时常有主张工会不做政治运动的，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趋势，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会使工会运动软弱永远处在非法的地位。工会必须做民族独立政治的和市民的权利与自由（包括普通选举权和废除罢工刑律的运动）的奋斗，并在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占独立的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工人们得到最后的胜利。但同时这个奋斗的用意是真正无产阶级争斗的革命宣传，不是投机主义者政治运用的用义，所以要防备非无产阶级工人们领导他们，须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自己。

（七）固然工会可以为反对一个工头或一个雇主而奋斗，但是工会务必把握住看作一个阶级来对抗，对抗工头任意压迫工人的制度和包工制各种运动，都要变成有普遍意义，才能使工会扩大，真正成为阶级的行动。

（八）工会有两个最重要而须努力做到的职务：一种是团体契约，一种是同样的劳动要得同等的工钱。单独契约是很利于雇主掠夺的工具，他利用了这种工具便可随他的意思来进退工人和操纵劳力的卖价，工会需要努力争到：工人进退和一切待遇的条件不得由雇主向工人单独缔结，要工会代表工人和雇主的协定。将工人分成了若干——种族性的，年令和体力——种别，据着这些分别来定工钱的高低，这是资本家欺弄劳动阶级最巧妙而残刻的一种手段；资本家不但可用这种手段去更贪婪的掠那些弱的和幼的劳动者，且可将劳动阶级裂成了若干利益有差的组派，要他们自相忌恨，自相较争，工会在这种场合便须努力争到“同样劳动须给同样工钱”；不论他是洋人或华人，不论他是男子或妇女，不论他是壮年或幼孩和老头，只要他们做得是同样的劳动，便须给他们同等的工钱，不得据生理及社会的分别给他们不同的工钱，但同时不要弄错，所谓“同等工钱”不是将高的工钱减扣了去就低的工钱，是要将低的提到和高的同等地位，这两种职务是工会的基础职务，前一者的成功，是可使工人对工会增加了信赖，吸收他们大群的加入运动；后一者的成功，是可免除工人们中间的相冲突，做到了阶级团结的一致。

（九）工会的性质，不能与行会一样，不能有雇主在里面，同时只要是赚工钱的工人，不论男女老少、信仰、地域、种族、国籍、政见、熟练、不熟练等区别，都须加入工会，因此工会不得有收费过重或经过严重审查等办法，以限制工人的加入，这样才能使工会变成一个阶级的群众的工会。

（十）工会最主要的活动是与资本家和政府奋斗；互相帮助，联络感情不过是次要的目的；因为工会是一战斗的团体，不专是共济的机关。

（十一）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

（十二）工会的构造须要很快的使他成为团结很紧的、中央集权的和有纪律的产业组合。产业组合工会内部不能依职业分为一些“自治”组，因为这是会使工会成为不能战斗的破碎团体。

（十三）工会最好的基本组织是工厂委员会，每种产业下的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组织一个工厂委员会为基本单位，再组织一个产业组合，但工厂委员会须属纯粹工人的组

织，绝不可用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混合组成之。同时工厂委员会又不可离工会而独立。

（十四）但是工会只是产业组合的构造，还不算最好的工会，真正的工会除了是产业组合的构造和以革命为目的以外，还须要有阶级一致和纪律的训练，就是要使全劳动阶级都联合起来，决不可有一个工厂或一部分工人的特别利益与一个产业组合的利益冲突之事发生，也须调和一个产业组合和全国劳动阶级间的利益。

（十五）各国革命的工会必须有统一的联合，去同全世界资本主义奋斗。这个全世界革命的工会的统一联合，就是赤色工会国际协会，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上面的原则组成工会带到赤色工会国际旗帜之下，同时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须免去向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事，如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免得中国贱价劳力被外国资本家雇用了去排挤外国高价劳力等。

（十六）共产党与工会的分别是，共产党是所有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不管政治见解怎样），工人们在工会里去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与共产党向同一目的进行，但是较缓的全阶级的组合。如战争一样，军队中有一个先锋，所有这大量的军队都跟着这个先锋前进。共产党也可说是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所以共产党无论在那种劳动运动之中，他都要是"先锋"和"头脑"，决不可不注意任何工会活动，并要能适当的诚实的和勇敢的率领工会运动。

（十七）共产党为实际率领工会和实际为无产阶级的先锋，必须在工会中和各个工厂委员会以及一切的劳动团体中，组织强有力的团体。很少有例外。

（十八）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组织的工会里面活动，不得任意引导工人脱离已成的工会，我们的战术是要在他们势力大的工会里面，渐渐积成势力，推翻国民党无政府党或基督教的领袖地位，自已夺得领袖地位。

（十九）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

附 加 议 决 案

前面的议决案是关于重要产业工人的工会运动，是最重要的，现在还有几点次要的议决案，照录如下：

1．工人消费合作社是工人利益自卫的组织，共产党须注意和活动此组织。

2．较进步的行会里，共产党也必须进内去活动，为的是要把行会里的雇主驱逐出来。结合性质相近或同一原料作工的各种的行会，组成一个工会。

3．很守旧的行会和资产阶级为愚弄工人起见所组织的团体俱乐部、学校等，共产党也要进去活动，在里面组织小团体。

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

一

机器生产力的进步，幼弱的劳力也成了可供引用的生产要素，结果在好些企业里边便加入了少年劳动的队伍，他们同样的与成年工人成了必要的机器附件。但资本家还与少年工人的经济待遇却是普遍的都较对成年工人为尤苛酷。因之少年劳动者成了受掠夺阶级较更受掠夺的部分。

无产阶级少年不只成了资产阶级可榨出更大量剩余价值的目的物，且为他们驱使了去做保护他们掠夺旧的和做新掠夺的武器。每个发达到了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须组织坚强的军备做他的柱石；这组织中是要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劳动者做他的主力，帝国主义国家不但需要军备去劫掠弱小民族，且需要他来镇压本国劳动阶级的反抗和革命，在每次战争和内乱里，组成了军队的劳动者逼于资产阶级的驱使，疯狂一般的去屠杀他们本国和外国的弟兄们，为了资产阶级利益的保持和争夺，劳动阶级中不知有多少万鲜花一般可爱而强壮的青年生命染血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上了。

在资本阶级这样残酷的掠夺和不害羞的利用之下，欧洲少年劳动的先驱们举起了他们反对的旗帜，他们要勇毅的为了他们经济利益反对军备而奋斗，不幸，这种运动有多少年为黄色的“社会主义”者陶冶的青年所玩弄，他不曾得将他革命的光焰放高，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柏林会议，是国际无产阶级少年痛恨帝国主义战争的屠杀而聚千百的青年，这次会议才组成与无产阶级少年赤色的国际团结——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所采的标语是“向劳动的群众中去！”他决定了各国少年劳动者奋斗的新责任；他决定了在国际共产党政治的领袖之下，独立的做无产阶级少年运动的引导。

凡是受掠夺的少年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共产主义少年要去活动的地方；要在这些地方组织他们引导他们做种种经济的奋斗；这是吸引他们归依共产主义革命队伍旗帜最有效的道路。

将资本主义世界整身推入他已打就的坟墓，实有待于劳动者阶级认识的增加，革命的教育在无产阶级少年运动当中成了很紧急需要，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就在他们日常的奋斗当中。组织的本身就要是个训练的指导师，每种运动都要是训练少年劳动者成为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的课程。

帮助世界劳动者祖国——苏维埃俄国——的赤卫军，反对资产阶级的军备！

世界的经济秩序已为帝国主义群破坏了，世界的资产阶级现要求加劲掠夺他们本国劳动者和弱小民族企图恢复大战前经济原状，在这个进攻之中劳动阶级最先做炮灰的自然是最受掠夺的少年劳动者了。目前是十分需要：劳动的少年与成年联合成一个国际的联合战线来反抗这个进攻。

二

天产殷富和有四万万贱价劳力人民的中国，八十年来早已成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劫掠和争夺的目的物了；现在中国的重要经济生命是已全操在外国资本家掌握之中，同时国内政治是为极反动的封建军阀们所统治，他们各据一方为了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和各自的利益的争夺，互相战争不已。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达已到了使新兴的资产阶级起来反抗外国侵略势力和打倒封建制度，建设一个独立民族的民主国家的运动，但这种势力常压服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相利用的压迫之下，从一九一一年至今未能成功。

这种情形决定了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最近奋斗的重要责任。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他不但要在共产主义与少年国际领导之下，为了少年劳动者经济和文化利益而奋斗，将他们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少年军旅，他同时要联络中国一切被压迫的少年们的革命势力在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引导他们做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奋斗。

共产主义少年在中国的运动是要成个大群众的性质。他切要记着他是以劳动少年的利益为第一的，他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他要将革命的少年劳动者大群众的坚强团结成了他的唯一主力。

三

所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所采取的纲领和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了实际革命需要而下的重要结论。他认为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运动中重要的部分。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常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

为了促进两团体关系的密切和协谋各种运动的顺利起见，大会认为两团体在各级组织中有互派代表的必要；至于此项职务如何实现，应由两团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实际情形协商决行。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一

几世纪以来，平等自由的原则，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国装饰门面的口头禅，可是在他的制度之下，经济既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之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

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获得了完全平等的权利。他们业已在实际上参与改造社会的工作，与男子毫无区别。如共产团、公共食堂、公共洗濯场、儿童养育院等都渐在建设之中，以图根本解除妇女家庭的奴隶地位，可是妇女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五年工夫所得的自由和平等，远过于妇女们在欧洲资产阶级专政之下经过一世纪奋斗的结果。这便可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

二

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的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

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惨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所以中国共产党除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之外，并应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他目前为妇女奋斗的是：

（一）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遍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二）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三）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要高声指教全国妇女们，这些运动，不过是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跳进妇女解放的正路。

三

第三国际，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所以他的里面包括共产党妇女国际为其一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必须为妇女特辟一栏，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尽快的时期内实现第三国际这种决议。

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

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

（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

（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

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须依据左列诸原则：

（一）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

（二）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

（三）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

（四）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

（五）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

（六）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离开党的支配而做共产主义的活动这完全是个人的活动，不是党的活动，这完全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

（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

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要使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的活动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党员一人介绍于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许可，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报告区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始得为正式党员；但工人只须地方执行委员会承认报告区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为党员。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者，或已经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章 组　　织

第四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每一个机关或两个机关联合有二组织以上即由地方执行委员会指定若干人为该机关各组之干部。各组组织，为本党组织系统，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

第五条　一地方有两个干部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方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六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

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干部人员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随时任免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

第十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一条　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过半数区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三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定之。

第十四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六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七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八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十九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十一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二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四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五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

（三）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漏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六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　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派捐。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七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七月一六日——二三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

“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一切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中国军阀，尤其是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

“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注：《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根据珍妮、德格拉斯选编的《共产国际文件》刊载的全文，译载如下：

一、中国唯一的重要革命组织就是国民党。它的基础，部分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还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国内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尤其是由于这一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对于尚未从其他阶级中的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

三、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乃是有利的。

四、但是，在这样做时，不应该放弃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政治特点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组织，并要有一个严格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具体任务是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从而为一个群众性共产党奠定基础。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该有别于任何其他的政治团体而举起自己的旗帜，同时却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任何矛盾。

五、关于外交政策，中国共产党应该反对国民党向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代理人——中国军阀和那些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人所提出的任何建议。

六、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该设法说服国民党将它自己的力量同苏俄的力量结合起来，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

七、中国共产党不应该与国民党合而为一，也不应在民族革命战线的那些运动中放弃自己的主张，不过，只要国民党奉行在客观上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在所有这种运动中支持国民党。

〔附〕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摘译)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马　林

同志们：

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我接受委托赴上海考察远东各国的运动情况，建立联系并调查是否有希望和可能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问题。

我直到一九二一年三月份才可能动身。据莫斯科给我的通知，一九二〇年八月到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已在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这个书记处负责在日本、朝鲜和中国进行宣传工作。魏廷斯基曾在上海工作过。一九二一年六月书记处又派出尼科尔斯基接替其工作。当我同期到达那里时，便立即取得了同该同志的联系。在那里他同我一直共同工作到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几乎每天我们都要会面。在这六个月期间，当局亦未为我们设置任何困难，尽管我在上海是人们所知道的，而且我也在荷兰领事馆登了记。此时，为（共产国际宣传局）工作的还有中国的Bramberg（？字迹不清）同志。（我）也同他经常在一起商讨安排工作。

在从欧洲经过苏伊士运河到上海的路上，警察当局给我找了一些麻烦。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捕。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所有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英国当局在科伦坡、巴东、新加坡和香港各港口城市对我进行严格检查。由于我的被捕使日本当局也了解到我在上海，因而使我去朝鲜和日本之行成为不可能。这一年四月份当我打算经过满洲里返回来时，日本人拒绝发给我沿南满铁路而行的签证。荷属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取得了联系，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并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由于这座东方大城市内运动发展缓慢，使我在短短六个月的工作时间里有可能同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爪哇人以及苏联的同志们保持联系而不受任何影响。此外在上海各国租界区内需同许多国家的官方当局打交道，而这些国家间又常常存在着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使得有可能很好利用上海作为同那里的各国进行联系的渠道。同美国可以每周联系一次，同日本每五天一次，同菲律宾每六到七天，新加坡每十天，爪哇十四天。在组织上我同伊尔库茨克书记处并没有联系。书记处负责的范围只限于中国、朝鲜和日本；而我除了这些国家外，还有菲律宾、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度（尼西亚）。

我在上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来自伊尔库茨克的信使通知我说，执行局已任命我为该书记处成员，并按伊尔库茨克已作出的决定让我在上海留下来。事实上，我从未成为该书记处的成员。我从未收到过伊尔库茨克给我的材料。我所收到的寥寥几份共产

党读物还是从爪哇给我寄来的。尽管上海和伊尔库茨克之间目前十四天之内就可以取得联系，但是直到我动身离开上海之前，都从来无人过问给我寄送材料的事。直接的通讯联系更没有见到过。因此，我并没有参与制定该书记处工作策略和整个工作的问题。在尼科尔斯基同志同我一起在上海的期间，我的工作只限于同他一起执行书记处所交给他的任务，我放弃了一切独立性活动，为的是避免进行非组织活动之嫌。因此对于这个后来撤销了的书记处的工作策略问题我不能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对朝鲜人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伊尔库茨克设立这样一个共产国际机构对远东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它距离（远东各国）太远，而且无法越过满洲里同东方保持经常性联系。赤塔局也同样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直到目前为止，那里的人们从美国、伦敦、或者汉堡收到材料要比从西伯利亚更快、更好。

从六月初到十二月十日期间的工作

A，中国。在上海的工作是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的。虽然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工人运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知识分子当中掀起的巨大激愤情绪已经完全平息下去。学生运动的领袖们从政府方面得到机会纷纷到国外去继续学习。从此学生运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除唯一的一个例外（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只有广东的工人联合在现代化的组织之中。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帮和秘密团体，如上海的青红帮，则只是障碍工人运动健康发展的东西。现代工厂工业为数还很少。尽管现代工业，特别是外国资本的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工厂工人在中国人民群众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侨居新加坡、科伦坡、荷属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的海外中国人均是中国的大资本家，但他们在中国国内却并没有投资。根据德国一个关于中国的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中国的产业工人大约有40万。至于上海和香港，则为数微乎其微。尽管劳动条件极差，但在工业中心寻找工作的贫苦农民却非常之多。直到现在大部分工人同他们的农民家庭保持着联系，在工作若干年之后都返回农村。工厂里有大批女工和七岁以上的童工。他们的工资微薄，比如纺织厂里的童工每月不超过十个先令。而工作时间却长达十二个小时。熟练工人每月也不超过两个英镑，大部分工人是文盲。

中国人中大部分是农民，虽然很穷，但都是小私有者。内地同资本主义的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过去在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中进行的阶级斗争，在中国农民中还没有发生。印度和朝鲜农民所必须承担的繁重赋税，在中国却是见不到的。因此农民群众之中差别不大，政治上不具什么意义。他们消极忍受着军阀之间的不断内战。这种内战已成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常事。在中国占有利益的各国势力之间的对立，更大大激化了这种内战。这个国家的整个生活，在政治上还被这些外国势力所操纵。目前，还没有可以在现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受过教育的阶级。

在魏廷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以陈独秀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小组。陈独秀几年以来主办《青年》杂志。这个组织在七个到八个中心地区有它的支部，但在

全中国其成员总共不超过50—80人。他们借助工人（业余）学校的形式进行工作。但这种工作在魏廷斯基同志离开之后，终因没有财源而不得不停止下来。陈同志到广州，在广东省政府内任职，负责组织教育工作。

一九二一年七月各地区代表到上海开会，决定建立一个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支部。尽管如果建立一个宣传组织将更好些。这个党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要求陈同志放弃他在广东的工作，担负政治领导工作。当时出版了一份《共产党》月刊，并在上海、广州和北京等中心城市重新开展有计划的组织工会的宣传工作，此后在北京和上海还由职工国际代表帮助出版一种周报。在这两座城市和广州重新建立了工人夜校，培训工人运动骨干，若干共产主义小册子被译成中文出版。七月上海会议，曾因法国警察采取的措施而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中断。陈同志在广州的教育工作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来自国民党方面，遂于八月底在共产国际代表的邀请下到达上海，负责这个小党的政治工作。此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劳工书记处，该书记处出版一种新的周刊，并同若干劳工组织建立了联系。但却立即遭到秘密行邦组织的干扰和破坏。该书记处支持了几次为改善工资待遇而举行的地区性罢工斗争。但在上海本身却并没有建立起重要的现代组织。由于该共产党只是秘密活动，所以并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成绩。它没有同南部中国的国民运动取得联系。这个小组织同我发生着持续的联系。尼科尔斯基同志接到伊尔库茨克的指示称：该党领导机构的所有会议均必须有他去参加。中国同志们对此表示不同意。他们不愿接受这样的监护权。因此不免时常有些困难发生。一段时间之内上海曾坚持实行只有对那些本地区支部认为确系真正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才准备登记为党员。后来放弃了这种对组织工作的人为限制，入党比较容易了。上海的青年组织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间，曾发展到二百名成员，但一九二一年夏又大量减少了。一段时间里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完全中断了。自从张太雷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返回后，对青年的宣传工作又有计划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华南地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宣传取得了重大成绩。

当伊尔库茨克通知要中国、朝鲜和日本各派代表参加东方人民代表会议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采取了措施，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派同志分别到广州和若干其他城市邀请现有的各联合会。共产国际的代表为此亲自去找孙中山的国民党进行联系。该党中央设在上海。该党派出一名代表赴伊尔库茨克。在这次会谈中决定，我于十二月动身前往桂林孙中山的总部，并同广州国民党领袖们建立进一步联系。张太雷同志被派往日本，邀请那里的同志参加伊尔库茨克代表大会。

上海和北京所出版的几份周报均是定期发行。还有《共产党》月刊。该月刊大部分内容是翻译作品，我们设法使《青年》和《共产党》两个月刊合并，因为两者内容大致一样。在我动身离开之前，《共产党》停止出版了。我曾同该党中央领导机构就出版一份政治性周报问题进行过几次商谈。但这个计划直到当年四月还没有付诸实施。

华盛顿会议期间，翻译出版了执行局的论文。这次会议所引起的政治震动远远比不上凡尔赛会议那样大。在几个城市里组织了游行。我们党也参加了这些游行活动。然而并没有形成一个反对华盛顿会议的普遍运动。因为尽人皆知，孙逸仙政府并没有派代表赴华盛顿与会。

共产主义读物的翻译与出版工作是由党负责进行的。比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即是由一位中国同志翻译出版的。

* * *

十二月十日至一九二二年四月底同国民党的联系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我带着作为翻译的张太雷同志，在湖南进行内地旅行，去拜访孙逸仙，他的军队当时集中在桂林。在那里我作为孙逸仙的客人逗留了九天，然后到广州，在广州海员罢工期间我每天同国民党领袖保持着联系。在广州总共呆了十天，后又从陆路到达汕头。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上海我听到的关于中国运动及其发展前景的印象是消极的。但在南方我却看到那里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会获得成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这次活动中，该青年组织的两名领导人遭到逮捕并被当地政府杀害。对于开展青年实际工作，在内地条件尤其困难。因为那里的社会情况还处于一种中世纪状态之中。没有运输工具。我曾到过许多村庄。那里见不到欧洲和日本货。所有东西均自己生产。在这样的地方，同手工业者打交道是很难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现在我首先谈谈国民党组织的性质。同若干领导人交谈之后，我了解到国民党由以下四类成员组成。

1．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男人。他们参加过辛亥革命。多数领导人是在日本或法国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孙逸仙在内。他曾向我表示，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孙逸仙的三个助手所组成的一个团体，一度曾在广州出版过一种马克思主义月刊，这一工作在北伐战争开始后才停下来。在我所接触的一些军官中，也有不少人对俄国革命和红军组织很有兴趣。

2．移居国外的人，即国民党组织中的资本主义分子。这些中国人一直在财政上维持着工人党的存在。他们期待这个党能实现统一中国、恢复秩序与安定，消除混战局面和对外维护中国的独立。这一中国资产阶级，旅居于外国殖民地，只是最近才开始在中国设立资本主义企业。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国民党的领袖们永远也不可能反映这一部分人的要求。

3．南方军队的士兵。这些阶级属性不固定的分子境遇非常不佳。尽管某些将军反对，士兵仍然加入了该党。属于国民党的青年军官们在士兵中间进行宣传。孙逸仙本人到达桂林之后，也曾多次在集会上讲到国民党的这一目标，其中特别强调效仿俄国军队的榜样。

4，工人。孙逸仙特别在广东省和移居国外的工人当中有着长期的联系。他的党的

领导人支持广州的工会组织，在罢工活动中向来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在这一年一月份的海员大罢工中，我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整个罢工都是由该党领导人所领导的。罢工工人参加了该党的民族主义示威，一切财政支援均来自国民党方面。而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却同罢工的海员们没有任何联系，没有采取任何支持这次罢工的行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只能秘密活动。与此同时，国民党与罢工工人保持着如此密切的联系，致使广州、香港、汕头有一万二千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

该党的纲领使这些不同的派别有可能加入该党。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即三项原则：反对剥削统治，争取民主和所有公民都得到人的生活（即指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译者）。最后一项孙逸仙和他的同志们解释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九二〇年孙逸仙曾发表一本论中国经济发展的书，提出了他的一个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在该书前言中提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孙逸仙设想通过向外国借贷来实现中国的发展，但必须排除任何对中国事务的政治干涉。当第一次革命运动中国民党组织被袁世凯控制，许多党员转到了敌人的营垒之后，在国民党的纲领中便提出了第四项原则——纪律原则，即要求党员对主席必须无限服从，入党时要举行宣誓，表示绝对服从。然而正是这第四项原则却成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发展该党工作的一个障碍。孙逸仙就曾向我抱怨过他很不满意那些热衷于社会主义、好搞小团体小宗派但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益处的青年知识分子。该党另外一些领导人则向我表示从满洲人失败后，党在知识界的号召力大大增强了。因为该党的民族主义原则不再象以前那样突出了。党纲的写法使社会主义者能够加入该党。在党员当中也有各种社会主义派别倾向存在。自从孙逸仙出师讨伐北洋政府以来，该党的情况变得不正常了。代表大会没有召开。孙逸仙具有独裁权力，如同在南方政府中的情况，他就是这个政府的总统。此系在广州组成的中华民国国会授予了孙中山这个独裁权。他自己还是这次北伐的发起人。而该党书记陈炯明将军则从北伐一开始就成了他的对手。陈认为国民党暂时应限制在广东省内活动，他反对推选孙中山为南方政府总统，因为他不主张中国集权，而主张分散，建立一个各省自治的联邦。他同情吴佩孚的政策。当时北伐战争的全部费用几乎全由广东省支付。陈炯明不愿为北伐承担责任。虽然三次请他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但他都仍留在广州不动，拒绝参与此事。因此当时南方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即陈炯明的队伍呆在广东按兵不动。一、二月份这两位国民党领袖之间还没有破裂。我曾经同孙中山就承认并联合苏俄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三次长谈。他认为华盛顿会议已造成一种对中国更为不利的形势。联合俄国的问题只有当他的北伐取得成功之后才有实际可能。他表示在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他将立即公开与俄国结盟。他认为如俄国和中国联合在一起便能实现亚洲的解放。但过早地同俄国联合将会立即招致列强对他的干涉，他对我表示，他认为只有在不同俄国结盟的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不受大国干涉地解决中国事务。我指出：他的民族主义宣传同样也将导致这种外来干涉；但他却不能放松这种宣传，否则他的整个地位就将仅仅依靠几个将军的支持，这些将军们充其量也只能支持他达成第二个南京妥协。多次的事实表明，一些曾经支持他的将军后来叛离了他，目前陈炯明的例子就证明孙中山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他在一月份只能做到非正式地同苏俄结盟并声明愿意把一

位他的亲密同志派往俄国。

在广州我曾同南方政府的若干成员接触，他们都赞同俄国革命。特别是著名的首届国会的议长张继，表示支持在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并希望南方的运动也能够得到北方中国革命组织的支持，或者来自蒙古或西伯利亚的支持。只有陈炯明——我同他进行过三次长谈——根本不赞成实行党的专政。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作为福建省革命军的将领，他完全支持俄国革命。但俄国的发展，使他向右转了。他认为有可能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广东省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排斥私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很大自治权的民主政府形式。他认为在整个中国实行中央集权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纲领也是不完善的。他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党。他愿在经济上支持一个由共产党人做编辑的日报。过去在罢工中也总是帮助过工人。他自己也希望派一个代表到俄国去，表示如果共产国际能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他并不反对。并希望利用俄国军事顾问帮助改造军队。尽管他在谈话中对孙中山表示强烈消极的态度，但当时还不至于公开破裂。后来由于他的副官遭到杀害，他自己也被解除广东省长的职务，遂导致了破裂。他率领他的军队撤退到省里，准备对付孙中山返回广州所采取的行动。他战而胜之，驱逐了孙中山，解散了南方政府，并声明同情吴佩孚的改组计划。当我在陈炯明处逗留的那个月，陈已经得知孙中山打算同满洲军阀张作霖结成军事同盟。那时他表示拥护这一策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吴佩孚。

广东政府直到现在仍在省里有独裁权，迄今并未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在广州也没有采取任何表明其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措施。在广州市政府机关内有几个工人代表参加管理，但他们人数极少，根本不可能产生影响。工会组织远远超越了中国的社会情况。建筑工人有一个很大的现代工会，在省里也有若干分会，他们举行了几次要求提高工资的地方性罢工行动。这个工会组织在几个同志影响之下，它正在寻求同中国其他城市的地方工会组织之间取得联系，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机构。比这个组织更为重要的是海员工会，大约有一万二千名会员。他们在针对轮船公司和港英政府的一月大罢工中，由于国民党的支持而获得了胜利。在五金工人中，迄今还存在着旧形式的工人组织。但人们正在着手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会联合会。我相信，如果广州的工会会员已有五万人，这个估计是不会太高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收到过共产国际宣传局的宣传读物。我认为把广州的入工会的工人们同共产国际宣传局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那里还有一个工人互助组织，由一位从美国归国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国同志领导。一月十五日该组织和青年团为纪念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而举行了一次游行，有二千工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小组却没有参与这一宣传活动。

省政府建立了一所学校，培训国民党的宣传人员。那里还有一所广州工人夜校，该校的教学计划中也有社会主义理论课程。

在结束中国南方的旅行之后，我便到北京苏联大使馆做了汇报，并对苏联在南方的代表机构作了委托。公使将我们给□□□和共产国际的临时报告转发到苏联。鉴于我不能通过陆路去西伯利亚，遂于四月二十四日离开上海。此前，我又同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做了几次商谈。对我们的同志，我建议他们放弃对国民党的不

介入态度，而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因为在这个党里很容易同南方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在活动中（共产党）小组不能放弃它的独立性，相反我们的同志必须共同研究确定应该在国民党内采取什么策略。国民党领导人向我表示，他们愿意在该党内提供进行共产党宣传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的同志却不同意这个意见。只要共产党不同国民党从组织上联合起来，他们这个小组织进行宣传工作的前景就将是暗淡的。只有青年工作比较好些。有一位苏联同志是青年国际的代表，在上海同我们的张太雷同志一起筹备在广州召开青年代表大会。该大会已于五月召开了。特别是在南方青年组织的工作非常开展，如果把这些地方性组织联合在一起，就可以创建出一个有影响的青年组织。我还建议我们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把中央迁到广州去，并且必须在那里公开进行活动。……

致

共产党的敬礼

马　林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莫斯科

说　明

1．关于在广州设立办事处。

广州是远东唯一的一个可以在那里设立常驻代表机构而不受该地政府当局干扰的城市。在那里建立三个国家之间的联系通过香港条件极为有利。同时借助中国海员散发在那里出版的书报也不会困难。鉴于新兴的中国运动，特别是南部中国运动的形势，鉴于（该国）工会运动的开展，以及当前朝鲜人运动所面临的困难，日本工人运动的重要现状，这一切都迫切需要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宣传局派出常驻代表到广州。比如：对即将召开的朝鲜人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应该派出一位代表与会，甚至参加它的筹备工作。

（王文博译自荷兰文影印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
给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

（一九二三年五月）

“为要发展民族革命与建立反帝战线，就必须同时发展农民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就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而达到这一目的之唯一办法，则就只有不倦的宣传和实际上实现土地革命的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院庙宇的土地，无代价的交给农民，取消苛租，取消现行税则，取消税卡，取消包税制，取消官僚制度，建立农民自治机关，以处理已被没收之土地等等。”

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根据〔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苏俄与东方》一书中刊载的全文，译载如下：

1．中国国民革命和反帝阵线的建立必将伴随一个农民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口的基本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即引导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到运动中来，革命才会成功。

2．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策的中心。由于其他的考虑而忽视这个基本点，就是不了解社会的、经济的基础的充分意义，而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确立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彻底摧毁中国封建制度的胜利斗争。

3．所以，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必须致力于建立工农联盟。这个任务的实现，只有通过持续的宣传和真正实现有关土地革命的这样一些口号：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且把这种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废除使人挨饿的田契的实行；废除实行“压榨”的现行的租税；废除各省之间的关税壁垒；摧毁高利贷制度；铲除贪官污吏；成立农民自己的政府机关来着手主持没收土地，等等，等等。

4．在这些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利用关税收入，盐业垄断等等都是操在外国资本家手里的事实，来教育广大的穷苦农民认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必要性。只有在反帝阵线中提出土地问题的基本口号，我们能有希望取得真正的成功。

5．勿庸待言，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最近的大罢工清楚地显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力量结合于工会，是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任务。

6．因此，我们坚持早先的立场，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国内代理人封建地主的国民革命”，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南北两方的工人运动。

7．至于在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之间的内战，我们正在支持孙中山，但是我们要求国民党通过系统的宣传和舆论来发动一个广泛的国民政治运动。这样一个以国家的独立、统一、民主为政纲的运动由于能够吸引广大群众去进行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将赋与孙中山的军事行动的意义。

8．共产党必须继续影响国民党赞助土地革命。在孙中山的军队所占据的地方，必须坚持实行没收土

地以帮助最穷苦的农民，必须坚决采取许多其他革命政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证孙的革命军队的胜利及其在农民中受到欢迎；而且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

9．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国民党内尽量防止孙中山和军阀之间的联盟，这些军阀是仇视苏联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苏俄是西方欧洲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人民两者的盟友。孙中山和军阀之间的联合使国民党运动变成一个军阀集团反对另一个军阀集团，这不仅会导致民族阵线的灾难性的崩溃，而且也会使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共产党的信誉扫地，因为它们同国民党在反帝斗争中紧密相联。

10．为了防止国民党的上述偏向发生（尤其是要防止孙中山的这种偏向），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要求召集一次国民党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动一个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问题，必须成为讨论的中心。

11．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个运动在中国已经被中国人民坚持废除著名的二十一条而重新发动），必须被党广泛地利用起来。我们党必须扩大其目标，增加其人数，直到这一运动成为一个普通的反帝运动：我们必须坚持废除为英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力量加诸中国的一切条约和协定（治外法权，义和拳赔款、关税抵押）等等。

12．中国共产党必须把抵制日货运动视为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斗争中的民主联合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政府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取悦于外国帝国主义。

13．在反帝运动中，为了聚集大量的中国民主阶层，我们党必须力求找到合适的方法（行动委员会或国民会议，等等）。首先，我们必须引导国民党和革命学生的组织致力于此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开幕，历时八日，至六月二十日闭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三十多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十九人，有发言权的十余人。来宾和非正式代表十余人。参加大会的除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和广州各地的代表以外，还有浙江、山东、满州和莫斯科的代表。代表共代表中国的共产党员四百多人。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代表大会。日程上的主要问题是讨论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讨论的根据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这是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这是第二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这是第三个问题。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关于这个问题热烈地讨论了两天，最后通过了。

关于工人运动的决议：在各个省成立铁路总工会、矿工总工会和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而且必须注意广州、哈尔滨、山东的工人运动和改进工会。

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为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利益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必须实行分工。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女同志必须在一切妇女联合会和妇女团体中进行工作，而且不要忘掉女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

农民运动：在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民问题只是在理论上进行了讨论，没有作出实际的决定。

工人运动的口号：恢复（被封的）工会，集会自由，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男工和女工待遇平等，禁止使用童工。

农民运动的口号：人民投票选举地方自治机构，打倒富农，没收土地，分给最贫困的农民。

共同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章龙、谭深山（可能是谭平山之误。——译者注）、毛泽东、王荷波（京浦铁路工人）、韩德龙（译音）、（京汉铁路工人）周沙良（译音）（萍乡煤矿工人）；

候补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丁培（译音）（京奉铁路工人）、张良工（译音）（京汉铁路工人）；其中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秘书。

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有：新青年季刊（每三个月出版一次），前锋日报、响导，此外，还有北京的工人周刊，警钟（译音）（湖北），劳动周报（广东），新□□（上海），新时代（湖南）。

（本文译自俄文，作者不明）

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一九二三年六月）

中国人民受外国及军阀两层暴力的压迫，国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险到了极点，不但工人、农民、学生感觉着，即和平稳健的商人也渐渐感觉着了。

目前北京政局之纷乱儿戏，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工会，学生会日在压迫摧残中，山东河南兵匪之猖獗，外人之借端要挟，并要拿回华盛顿会议所赏的利益，沙市、长沙日本水兵之暴行，外人强令棉花出口，吴佩孚齐燮元争相制造广东之战祸，吴佩孚萧耀南合力助成川乱；又若未来的奉直战争及直系军阀之内哄——在在可以证明内忧外患更复加于国民之身，除集合国民自己之努力，做强大的国民自决运动，别无他途可以自救；也在在可以证明本党一年以来号召的："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之国民革命运动，不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常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国民革命，这种求救于敌的办法，不但失了国民革命领袖的面目，而且引导国民依赖外力，灭杀国民独立自信之精神；（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因此，中国国民党不但要失去政治上领袖的地位，而且一个国民革命党不得全国民众的同情，是永远不能单靠军事行动可以成功的。

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

中国国民革命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①]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②]

现在我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第二次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的人太少了，不能搜集很多材料。又由于被迫害，许多材料遗失了，所以看法可能不全面。

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因此，代表会议以后，杭州委员会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再增加两个委员。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对这个建议。当上海加紧进行迫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到那里去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我们开始改进机构。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着手执行我们的计划，猖獗的反动派，在京汉大罢工以后，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离开北京回到上海。改进机构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上海迫害得非常利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的局势也不稳定，因此，还是不可能改进中央机构。

上海和广州小组由这两个市的地方小组组成。北京、汉口和长沙（湖南）的许多地方小组已联合成地区小组。郑州小组在京汉铁路罢工时瓦解了。

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领到经费约有一万五千[③]，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这笔经费分给了各个小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联络和发行周刊的工作上。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的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

现在共产党员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国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妇女三十七人，另外有十个同志还被关在牢狱里。

去年我们只有二百党员，今年入党的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个工人。

杭州会议以后，我们间断地出版了日报，这种间断的情况是由于罢工造成的。该报共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到六千份。但是我们的日报在初期遭到了批评，现在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广州和上海等地出版了周报。

关于京汉铁路罢工事件，我们出版了小册子，很多情况下，我们发表了声明。“新青年”杂志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现在改为三个月出版一次。出版了前锋月刊，刊登了中

①本文内的“代表会议”可能是“代表大会”之误。

②日期可能有误。

③货币单位不详。

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国际政治形势问题的文章。

在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了远东人民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分子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统一战线是有缺点的。我们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第二次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够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而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

在“争取人权运动”方面，正如第二次代表会议所决定的，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争取人权同盟”。在北京，参加这些新组织的大部分是学生；在山东和广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们始终是反对军阀的。只是在组织京汉铁路员工时要与“交通系”作斗争，同时吴佩孚也反对“交通系”，只是那时我们才没有反对吴佩孚。但是从罢工时起，我们就猛烈地反对了吴佩孚。然而，中央委员会与吴佩孚有过来往，这是不应该的。

我们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下工作的。打倒军阀的口号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还没有很大的影响。党员要更加注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现在我谈谈关于工会的宣传工作。从上海谈起，上海的工业最发达，最先进，但是工人组织很落后。开展运动很费力。很多工人组织，只是空有其名。我们与一个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组有联系。国民党与海员和制烟工人有联系。我们对于上海应更加注意。

在北方的铁路员工中，我们在京汉线上有最好的组织，但是在罢工时瓦解了。京浦路的组织只是一个空的形式，实际上并不存在。京奉路的组织是秘密的。在津浦路上，工人被分化为许多同乡会。在京奉路上，到现在为止，还很难于把不同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

湖南、湖北和广东的联合会与我们有联系。湖北的炼铁、制烟和纺织等产业部门的工会，以及人力车夫组织，都与我们有联系。汉阳工会有很大的前途，是中国最大的工会，可以成为典范。萍乡的矿工工会的力量在二月罢工时有了损失，但是仍然保存下来了。

湖南几乎所有的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加入这个联合会的还有萍乡的矿工。粤汉路的组织也参加了这个联合会，其余的组织是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广东的大部分工人组织是手工业工人的联合会。建筑工人的组织也在我们控制之下。

我们党的女党员只有十三个人。中国的妇女运动还很不发展。我们对广州和湖北的“妇权联合会”有一些影响。这种联合会在北京和上海也成立了。

现在我想就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第一，我们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都可以归咎于这一点。许多知识分子怀着革命精神加入了党，但是对我们的原则没有认识。工人表现出有脱离知识分子的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

宣传工作进行得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

工作。要在妇女中进行工作，女党员的人数也还太少。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现在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国总工会的口号，而不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同时，在他们中间，还应该宣传拥护民族革命。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员往往不完全信赖党。即使党有些地方不对，也不应当退党。我们应该纠正我们的错误。此外，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彼此很爱怀疑。

我现在谈谈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里并没有组织，五个委员经常不在一起，这样就使工作遭到了损失。

中央委员会的知识也不够，这是罢工失败的原因。我们的政治主张不明确。大家都确认中国有实际民族革命运动的必要，但是对于我们应当如何为民族革命运动服务的问题，我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在于政治观点不够明确。

我们经常改换中央所在地，也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现在我想对个别的中央委员提出批评意见。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他很容易激动。

张国焘同志无疑地是忠实于党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最大的错误。

邓（译音）同志在唐山和口（译音）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在广州造成了很多困难。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最近才纠正过来。

* * *

陈独秀报告以后，我发了言，指出他的报告非常悲观。至于说工人运动和政治积极性，那是有成绩的。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党应该建立起更好的组织。明确规定出版杂志的费用。最后，我还指出，知识分子和工人在党内必须很紧密地结合起来。

（该文件不是原件，是按俄文稿译成的）

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三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一、帝国主义与中国旧经济。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的结果，乃产生帝国主义；把殖民地变做他经济机体的附庸，就是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中国旧时的宗法社会，因为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割地赔款，强辟商埠接受外债等，就开始崩坏。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

二、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性质。

外货之输入，虽然使中国的手工业生产适应了他而渐渐趋向着集中，但是外国大资本生产品之占领中国市场，几乎同时断绝了中国的大工业发展之可能；原料之输出，虽然使特种农产物的收集和流通渐渐进到了新式的组织，但这样便紊乱了中国旧时经济基础之宗法社会的农业。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国内国外的商业，便独作偏畸的发展，工业被外力阻住不得正当发展，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等小生产者渐渐失掉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失地的农民，他们人数之众多和失业失地之迅速，比起国内工厂等新式生产机关的发展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这些新式生产机关自然容不了他们。

这种经济的大变动，只有极少数的官僚和极少数的大商人（财阀）趁火打劫得了些便宜；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便一天一天失掉了他们生活的保证，他们遭受贱价劳力的剧烈竞争，他们遭受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使他们无法生活。商业经济的市场越开展，外货之输入原料之输出越增多，而同时生产方法之改进甚少，宗法社会崩坏之过程因而甚缓。而且国家在对内对外的新环境内，令政府不得不滥征各种节税，故生产事业更因之而毁坏日甚。

三、现代中国的政治现象。

失业的人越多，极幼稚极少数的工业生产越不能收容，兵和匪就越多，中国最初因为要抵制列强而来用近代的军事技术，添设“新军”这本不是积弱的中国所能担负，尤其不是宗法式的皇帝所能驾驶；而且中国旧时的经济生活极其散漫，并没有成为一个集中的经济区域，这些散漫的半独立的区域，到处都能够将财阀的经济力去供给军事长官

或土匪，使他们都有所凭借；因此就造成了军阀统治的政治形势。中国军阀之存在及发展，又大有赖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便不惜向列强低首，甘心做列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军阀有此种种凭借，便互争雄长，引起不断的内乱；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谋利用中国一派军阀，相互争夺其势力范围，又酿成了无穷的冲突。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斗日趋剧烈，中国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争斗也日趋紧迫，不但如此，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稍微有一点发展，劳资的争斗也就稍微有了一点萌芽。

这种种争斗的表现，到欧战以后就更发显著了。

四、欧战后中国社会中各种争斗的形势。

帝国主义的列强各自尽量的发展，而又相互攘夺，因此酿成欧战，结果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但在各殖民地却恰好趁此机会勉强发展了他们的工业；一面世界的社会革命时期从此开始，打断帝国主义战争的横流，许多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做许多殖民地革命之自然联盟者。中国身处于“国际殖民地”的地位，欧战以前列强在华虽然互相恶斗，但尚能勉强维持其均势，中国的政权也就因为这个均势尚能勉强保存于本国军阀之手；固然亦因此而中国在欧战中之经济发展仍是横受各方牵制，并未能有长足的进步，然在这一期中国工业极小的发展中，毕竟露出了少数的无产阶级，渐渐可以加入世界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因防御社会革命而力求恢复资本主义的威权，更竭全力来侵略中国这一个唯一的“自由”市场。其侵略方法，愈进于攫取财政权及移殖资本之倾向，愈要勾结军阀煽动内乱；于是辗转相因，使“游民化”“兵匪化”更成为中国之普遍的经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势力自然不免涣散。况且中国经济生活中骤起骤落的危机，无一不受正在崩坏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影响——列强大资本生产品之倾轧，原料之垄断，机器购买之限制以及关税金融之操纵，都使幼稚的中国工业发展遇到莫大的障碍。再则欧战后列强间的均势时有破裂之虞，已屡屡引起其代理人（军阀）中间的战争；其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更将引起太平洋上的世界大战。因此种种，可以证明中国之经济力，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之下，永无独立及充分发展之可能。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自然亦极难发展集中其争斗主力。因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民族民主的总争斗就日趋激厉，日益迫切。

五、中国之国民革命及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革命中所占的地位。

中国处于现时这种状况之下，资产阶级不能充分发展，因之无产阶级也不能充分发展，阶级分化不充分的全国人民，皆受制在资本主义及本国军阀之下，不能不要经济发展而行向国民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的阶级，多为列强的经济力所束缚，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有些还囚在宗法社会的陷井里。至于农民当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六、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

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

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还应当努力扫除宗法社会的余毒，以增加国民革命运动之速度。

七、中国无产阶级之争斗及其最终目的。

中国民族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革命，在世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不期而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战线相联合，故中国无产阶级参加此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反对宗法社会的国民革命，其意义实在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与国际帝国主义及军阀根本上不能不冲突；而劳动平民及无产阶级的解放，尤其与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根本上不相容：国民革命之进行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所以中国无产阶级更当参加此种国民革命，以先锻炼集中其能力而取得政治争斗中的位置，方能于世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立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以进于无产阶级的共产社会。

八、中国无产阶级争斗之方式。

凡属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争斗必是政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争斗，当然也是一样。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中国劳动平民反对军阀制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但是工人阶级，必须取得政权方能将生产资料归之于社会公有，达到他最高的目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自限。

九、共产党之任务。

中国无产阶级，同时须从事国民运动及阶级运动这样复杂的争斗，其职责在非常困难，而其发展程度又非常之幼弱。所以他争斗必与世界无产阶级的争斗有最密切的关系。此种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

中国共产党根据上述的理由，特定出最小限度的党纲，以为目标的要求。如下：

1、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

2、肃清军阀，没收其财产，以办公益的生产事业。

3、铁路银行矿山及大生产事业国有。

4、实行无限制的普遍选举，选举期当在休假日。

5、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6、公私法上男女一律平权。

7、平民须有建议权，罢官权，撤回代表权及废止法律权；中央地方重要的国家职员须民选。

8、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的关系由各该民族自决。

9、实行都市和乡村自治。

10、划一币制，禁止辅币之滥发及外币之流通；财政公开。

11、废止厘金，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每年审定租税一次。

12、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全国教育经费应严重保证。教员应受年功加俸；到相当年龄应享受年老金。

13、改良司法，废止肉刑和死刑，免除一切诉讼手续费。

14。废除雇佣军队制度，改行民兵制。军饷公开。

15。供给并改良都市贫民之住宅，规定限制房租的法律。

16。限制一切日常消费品的最高价额。

17。农民利益的特别要求：

A。划一并减轻田赋，革新陋规。

B。规定限制田租的法律，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

C。改良水利。

D。改良种籽地质；贫农由国家给发种籽及农具。

E。规定重要农产品价格的最小限度。

18。工人利益的特别要求：

A。废除包工制，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制（工会议定雇佣条件）。

B。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者续做夜工。

C。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息。

D。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

E。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之童工；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F。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

G。制定强迫的劳动保险法（灾病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

H。救济失业之工人。

此草案通过于第三次中国共产党大会，作为底稿；并议决令各地方郑重讨论后，尽一九二四年一月前将作批评、修改及增补之条文意见等，汇交中央局，以便交由出席国际大会代表带往第五次世界共产国际大会作最终之决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一）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给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

（二）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乎完全操于

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利用其在华政治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

（三）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

（四）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之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因此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

（五）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六）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七）我们在国民党中，须注意下列各事：（1）在政府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2）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并阻止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3）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4）须努力使国民党与苏俄接近时时警惕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

（八）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同时我们特别的工作，须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因此，在劳动群众中须有大规模的国民运动的宣传，扩充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并当于群众中普遍宣传“国民运动中拥让劳动阶级利益的必要。”

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听了赴第四次国际大会代表报告之后，大会决议：

（一）对于第四次大会所议决各案愿彻底履行。

（二）现时的世界大势是：世界革命潮流日益低落，反动的势力弥漫全欧，苏维埃俄罗斯的生存及发达日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威胁。全世界无产阶级此时的重要任务是在要

求资本家政府承认俄国与俄国恢复和平的通商关系，以拥护他们的唯一的祖国，免受帝国主义的摧残。

（三）世界的资产阶级进攻，使劳动阶级的地位沦落，劳动阶级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所得工资尚不能维持其生存，同时劳动阶级内部有改良派分裂无产阶级，力助资产阶级破坏罢工及示威运动。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奋斗的口号是为劳动运动的统一。

（四）对于东方问题的决议案：大会特注意其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两种工作：即一面为国民革命，为达到殖民地的政治的独立奋斗；一面须组织工人及农民，利用资产阶级之冲突，执行为他们特别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争斗。

（五）大会承认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次由联合的基础之组织，改组到集中的基础之组织，并以为这是进到组成一个集中的国际大共产党的第一步表现。

劳动运动议决案

（一）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对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应从速召集全国各路代表会议讨论各路统一之工作，改造筹备委员会及讨论救济二七被难工友之方法。

（二）哈尔滨及山东两地在产业及地位上皆甚重要，该两地方之劳动运动不可忽视。哈尔滨方面之劳动运动更宜作与苏俄工人联合之宣传，现时反对苏俄之趋向亟宜纠正。

（三）广东方面劳动运动，须注意新式产业之工人。至进步的手工业工人组织同时兼须整顿，促进其阶级觉悟。省港澳三方面的产业的及手工业的工人组织，须适用国民运动口号作统一运动。省港澳三方面产业上甚为重要，在该地方之劳动运动，须设法改职业组为产业组织，以增加工人势力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压迫。

南洋华工为数极大，须设法使其与国内工人发生密切关系，但须纠正其省界国界分别之趋向。

（四）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

（五）工厂劳动运动须通用下列口号：（一）男女工资平等；（二）废除未满十四岁之童工；（三）推翻包工制；（四）星期日休息；以引起男女工争取自身利益之觉悟。

（六）为养成劳动人才起见，在适当地点设立劳动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宣传及组织之知识。

（七）劳动组合书记部今后之责任为组织天津哈尔滨山东上海等处已组成之路矿等工会以外之各种工会。

（八）在半殖民地中国之手工业工人占多数，在手工业中之劳动运动中除加薪减时

口号外，消费合作运动或要求红利运动亦宜注意，但须纠正劳资妥协之趋向。

（九）大的产业工会，尤其是海员工会，须设法引起其与赤色职工国际联合。

农民问题议决案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付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越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关于党员入政界的议决案

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

青年运动议决案

第三次代表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以组织及教育青年工人为其重要工作，在出版物上应注意于一般青年实际生活状况及其要求。

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遍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的宣传，应从一般的学生运动引导青年学生到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于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

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根据本党第三次大会关于国民运动与国民党之议决案极力参加国民运动。

妇女运动议决案

（一）劳动妇女运动，在去年的蓬勃罢工运动之中，已表现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之

重要与意义。但同时男工间女工间之冲突亦随而发现。此种冲突之来源大致由宗法社会轻蔑妇女之习惯与成见，还保留于男工之中，以致女工在工会中常感男工侮弄之痛苦，因而另思组织女工会，此实为工人阶级分裂之危机，关于此点应尽力宣传，不仅要号召男女亲密团结，而且要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至接触女工初步方法或办工儿院，或办女工夜校亦方法之一，并可酌量情形因时制宜。

（二）一般的妇女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此等运动年来在各处皆已发生，但是既不统一，又不活动。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与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继承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妇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至我们指导此运动的态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轻视此等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们的运动，第二，阶级的主义的色采不要太骤太浓，至使他们望而生畏。

（三）妇女运动委员会及出版物，为集中本党女党员之活动及系统的指导全国妇女运动起见，应设立妇女委员会以外，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精神中心，应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一）中央执行委员会由本常年大会选出，其一切行动对大会负责，在两大会之间为本党最高机关，管理各区各地方之行动，发行用本党名义之出版物，并管理派遣做青年、妇女、劳工、农民等工作之职员。

（二）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九人组织之。中央委员缺职时应以候补委员补缺。大会后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分配工作并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其余四人分派各地，赞助该地方委员一同工作，每星期将所在地情形报告中央局一次。

（三）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名义行使职权，由执行委员会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三人，其职务如下：

委员长主席一切中央局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会议，遇委员长缺席时，由中央局互推一人代理委员长之职权。

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会计在中央督察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并对于各区各地方及本党一切机关之财政行政负责。

（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每四个月开一次，中央局每星期开会一次。

中央局自己或经中央执行委员四人之请求，可召集特别会议。在请求书上须说明开会讨论之问题及其理由。

（五）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

（六）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局之一切决定，以多数取决，但召集临时全党大会之议决，须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取决。

（七）中央执行委员会，须在全党大会开会日期前至少两月通知召集，附寄议事日程草案，并请地方于通知后一月内交齐议案。各地方议案须互换。

（八）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在开会一月之前寄与地方。

（九）中央委员会财政报告，由大会指定审查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不得当选）审查后报告大会。

（十）如有本党区代表三分之一党员之请求时，执行委员会必须在接到请求书之一月内召集本党临时大会。请求书上必须说明请求召集临时大会之理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党员入党时，须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之通过，地方委员会之审查，区委员会之批准，始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

第三条　凡经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承认之党员，当通告该党员所在地之地方委员会，亦须经过候补期；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

第四条　党员自请出党，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

第二章　组　织

第五条　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不满五人之处，亦当有组织，公推书记一人，属于附近之区或直接属于中央。（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直辖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处，则由中央直辖之。）

第六条　一地方有十人以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得派员至该地方召集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会由该会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员召集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直接隶属中央。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得以区执行委员会代行该地方执行委员会之职权。

第七条　各区有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有组织区执行委员会必要时，即派员到该区召集区代表会，由该代表会推举五人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并推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因事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区之范围，中央执行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九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五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任期均半年，组长任期不定，但均得连选连任。

第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

第十一条　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之各种议案及各地临时发生之特别问题，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均得指定若干党员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处理之；此项特别委员会开会时，须以各该执行委员会一人为主席。

第三章　会　　议

第十二条　各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之。各地方每月至少召集全体党员会议一次（其有特别情形之地方，得改全体会议为组长会议，但全体会议至少须两月一次）。各区每三月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该区全体党员代表会议一次，每五人有一票表决权。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每四月开全体委员会一次。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全国代表临时会议。有三分之一区代表全党三分之一党员之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四条　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

第十五条　凡一问题发生，上级执行委员会得临时命令下级执行委员会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

第十七条　中央及区与地方执行委员会，均由委员长随时召集会议。

第四章　纪　　律

第十八条　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九条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

第二十条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

第二十一条　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之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或命令。

第二十二条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倘与本党党纲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所定政策有抵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之。

第二十三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加入一切政治的党派。其前已隶属一切政治的党派者，加入本党时，若不经特许，应正式宣告脱离。

第二十四条　凡党员若不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特许，不得为任何资本阶级的国家之政务官。

第二十五条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第二十六条　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党纲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

（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

（三）无故欠缴党费三个月；

（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

（五）不守纪律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

（六）泄露本党秘密；

地方执行委员会开除党员后，必须报告其理由于中央及区执行委员会。

廿五

第五章　经　　费

第二十七条　本党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

（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三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两角，在三十元以上至六十元者缴一元；六十元以上至百元者缴二十分之一；在一百元以外者缴十分之一。失业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

（二）党内义务捐。由地方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

（三）党外协助。

第二十八条　本党一切经费收支，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配之。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修改之权，属全国代表大会，解释之权属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条　本章程由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日——二十日）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时局之危机，现在大家都觉悟了，大家都想起来挽救了，只可惜稍迟了一点！

时局之危机来源甚长，此次曹党驱逐黎元洪，不过是长久酝酿之危机中屡次发现之一个最近发现的结果；大家对于这一个最近的结果都大惊小怪起来，而对于酝酿此结果之根本原因却不甚措意，象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如何能救危机四伏之中国！

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与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这些连续不断的变乱，都是北洋军阀势力存在与列强势力相勾结之自然的结果。他们多存在一日，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利用他们侵略中国的程度便增高一日，这就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原因。去年奉直战争之结果，我们知道一面是奉直势力的消长，一面也是日美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所以当时吾党对于时局主张，曾说过恢复国会，联省自治，黎元洪复位，吴佩孚得势，都不能解决时局；曾说过只有以民主的联合战线，继续革命，打倒军阀及军阀背后的外国势力，才是救济中国的唯一道路。

即以此次曹党之乱而论，也非旦夕的骤变。去年奉军战败，美国在北京的势力，几乎取日本代之，那时曹党本欲拥曹代徐，其所以未即实行者只以曹党中分缓急两派（现在还是如此）：缓进的洛阳派吴佩孚主张暂时利用黎元洪为傀儡，直系取得实际的政权，一面以武力削平南方统一中国，一面以金钱包办宪法，然后利诱威迫国会议员拥戴他们的大帅做很体面的合法总统，所谓"武力统一北洋正统"，就是当时吴佩孚号召的政纲；急进的天津派曹锐、边守靖等，迫不及待，即欲拥曹登台；当时吴佩孚势盛，曹、边等只得屈从了他的主张，可怜的黎元洪遂因此做了一年替直系军阀监印的傀儡总统。曹党阴谋酝酿至今，一方面因为削平南方为期愈远，制宪之语徒为黎元洪延长监印时期；一方面又得到美国及亲美派基督徒冯玉祥之助；遂不顾一切而悍然驱逐黎元洪。曹党所恃者，不但冯玉祥之兵力，尤其是以外交系顾维钧等为中间人获得美国之金力，欲以重金贿买国会议员及军队，攘窃政权。短视的国民，视黎、曹争政为时局危机之焦点，其实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曹党敢于逐黎，因其背后有大力者（美国）之援助，所以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

因为大家不甚措意时局危机之根本原因，所以此时各方面解决时局之舆论，仍不免趋向几个错误的观念：

（一）拥护黎元洪。黎元洪依附军阀窃取高位，在法律上本无根据，在政治上勾结军阀御用之国会与张内阁而为三角同盟，杀工人，伤学生，妄发命令造祸闽粤，以恋位故不惜逢恶长乱，其罪不在曹、吴之下；此时政学会拥之抗曹，纯系利用时机，以报私怨而窃政权；其他直系政敌欲以猪黎为傀儡，拥之于奉或浙者，均应为国民所不齿。

（二）拥护段祺瑞。段派与直系素不两立，安福罪恶，世界所知，彼等亦欲利用国民恶曹心理，起而恢复其势力；张作霖、卢永祥之于段，亦犹吴佩孚、冯玉祥、齐燮元之于曹，将来即有变化，其结果亦不外北洋军阀直皖两派首领夺政之争，这两派首领背后都各有一派帝国主义的列强在那里做后台老板，无论谁胜，都非国家人民之福。此等反动的北洋军阀，无论何派利用时机，出而组织政府，窃取政权，曹与非曹，均应为国民所否拒。

（三）国会南迁及制宪。贪横无耻的国会议员，久为曹锟所驯养，或云其中亦有贤良，何以始终同流合污无所表示？代表全国商人、工人、学生各团体，都已先后宣告否认此国会，不知其尚能代表何种民意？我们认定国会南迁及国会制宪之说，都是违反民意的主张；此种鲜廉寡耻违反民意的国会议员，无论其将来投靠何方，其所定宪法所选总统，国民都一概认为无效。

（四）团结西南联省自治。西南诸将之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无异于北洋军阀，以此而谋联省自治，仍是联督自保之老文章；若云团结西南以抗北方，观往察来，只是地域上南北割据之争，绝无政治上封建民主之别。主张此说者，不是失意政客欲挟西南为奇货，以达其总裁头衔及分脏会议的欲望；便是贪鄙腐儒欲据此以为拥黎地步而已。

（五）借助列强。创造独立的国家，建设革命的政府，端赖吾民自力，真能艰苦奋斗而成，断不能效有些朝鲜民党，不自努力革命，而呼号于巴黎华盛顿会议，希望外国承认之助力，得以成功。勾结列强的军阀固为人民所痛恨，而痛恨军阀者亦往往有借助列强以制军阀的谬误观念，象这样懒惰取巧依赖外力的国民，不懂得军阀列强勾结的关系，如何能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反之，我们是要求一个以国民自力，由革命而建设的政府，由任何外国帝国主义者所支配所援助的政府，国民都誓不承认。

同胞们！用以上五个方法中任何方法反对曹锟，都不是国民应取的正当态度；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若是国民党看不见国民的势力在此重大时机不能遂行他的历史工作，仍旧号召四个实力派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其结果只军阀互战或产生各派军阀大结合的政局，如此我们主人翁的国民断不能更袖手旁观，例如上海总商会所发起的民治委员会即应起来肩此巨任，号召国民会议以图开展此救国救民的新局面。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由此国民会议所产生之新政府，须以真正国民革命的势力，扫荡全国军阀及援助军阀的外国势力，然后才不愧为统一全国的人民政府，不是一个偏安一隅的政府，更不是一个各派军阀合作受列强势力所卵翼的

政府。同胞们只有这一条路，是真能救济我们中国人逃出外力军阀二重压迫的道路。

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

打倒勾结列强压迫人民的军阀！！

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

（原载《先驱》24号，1923年8月1日出版）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陈 独 秀

人类社会组织之历史的进化，观过去现在以察将来，其最大的变更，是由游牧酋长时代而封建时代，而资产阶级时代，而无产阶级时代；这些时代之必然的推进，即所谓时代潮流，他若到来，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间上各民族以环境所演的机会不同，虽至进化之迟速大相悬绝（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长社会，东方之封建军阀社会，西欧南北美之资产阶级社会，俄国之无产阶级社会，同存于今世），而在时间上，进化的历程恒次第不爽，这是因为人类治生方法，次第变更发展，由简单而复杂，造成次第不同的经济组织而为社会一切组织进化基础的缘故。

中华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顿在家庭农业手工业自足的经济制度之下，及与治生方法进化较速的西欧民族隔绝这两个原因，封建军阀时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汉以至今日，社会的政治的现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复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不能取而代之的缘故。

明代西力东渐，这是中国民族思想制度发生空前大变化的最初种子；清代鸦片战争，这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两次战争，这几乎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近代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在西欧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铜墙铁壁都被他打开，封锁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锁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两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驱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资本民主主义之转变时代，“富强”“维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满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纲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们喉咙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终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现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资本民主主义的现象，或者也很可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们主观的愤恨鄙厌心理，终于敌不过客观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终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刚毅辈无论有如何威权终于失败。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资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资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资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现。所以单以满汉民族冲突解释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观察，忘了经济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经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资本民主派富强维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满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论。当时革命与立宪两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两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换句话说，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说是满汉民族之争。

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说成功，实质上可说是完全失败），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阶级势力集中而有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们大部分只看见目前的损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们将来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们资产阶级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们便现出小资产阶级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继续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诸帝政余孽北洋军阀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资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们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两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现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阶级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经济的历史的观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说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论，却大部分不出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而属于世家官宦堕落下来非阶级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阶级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资产阶级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说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说明他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阶级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释，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在也没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状况及中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在国际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正负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没有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伟大的人物主持，其结果只能造成这一二伟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组织变更，也没有一个阶级代替他一个阶级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现在统治阶级（北洋军阀），而没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阶级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我们对于这种左倾的观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业上，这

种浪漫的左倾，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每个阶级的革命，都要建设在每个阶级的力量上面，决不是浪漫的左倾观念可以济事的。

同时我们对于右倾的观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来在各阶级的革命当中，实际参与的只是该阶级中一部分最觉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来为全阶级的利益奋斗，决不是全阶级的动作与意识，并且全阶级中一定还有许多失了阶级性的分子同时出来依附敌对的阶级，来做不利于自己阶级之反革命的行动，这是历史上现社会上常见不足为奇的事。因此，我们虽然主张中国国民党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同时也不主张国民党有极力与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之右倾的观念。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的现象：（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的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国家财政机关与军阀官僚势力，造成了畸形的商业资本，专以卖国行为增加他们货币的富，他们自然而然要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的列强而反对革命，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所营的工商业规模极小，没有扩大的企图，没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对于民主革命恒取消极的中立态度，这种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他们打倒妨碍工商业发展的一切军阀，并且为他们排除援助军阀而又压迫中国工商业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因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非排除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或为完全自主的国家，实行保护政策，决不能完成资本民主革命，所以中国资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维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他们为做官扒钱计，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险的时候，他们是丝毫不负责任的；就是在没有困难艰险时，他们也有使勇敢纯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他们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军阀阶级，一足立在资产阶级，调和两方面革命冲突，结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资产阶级，封建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资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军资妥协”更险恶于“劳资妥协”，官僚的资产阶级正是军阀与资产阶级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资产阶级中卖阶级之蟊贼，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资妥协”来卖无产阶级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们也知道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微弱，尚不足克服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现有一条活路横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产阶级携手，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经济现状，军阀阶级已与资产阶级显

然分开，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官僚资产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联成一个战线，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原载《向导》22期，1923年4月25日出版）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陈 独 秀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卵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没有例外。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中国，连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断然不可怀丝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说自甲午战败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

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绩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阶级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们虽未能预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资产阶级渐渐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便是他幼稚之征验，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军阀）势力发展他自己阶级势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现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势力薄弱之自然结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现，遂一口武断中国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视了。

商业工业资产阶级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资产阶级。他的势力原来是依赖外国势力（卖国）及本国贵族军阀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资产阶级，而且是真正资产阶级——工商阶级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属此类。直皖奉直两次战争，固然是军阀间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诒内阁，却算是扫除中国资产阶级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吴佩孚颇表同情；有人说吴佩孚打倒梁内阁是军阀阶级的胜利资产阶级的失败，这完全是梦话。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命运。例如在欧战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满了全印度的资产阶级；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货外资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阶级便渐渐有了经济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资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摇头，有几个资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军阀统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扬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马上改变从前小视自身的态度，不再说什么“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了，好象乡下土财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们的开始发展，便遇着军阀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货输入原料输出等妨碍他们的发财自由，他们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理财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反对军阀为总统，否为代表军阀阶级的现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更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倾向了。

他们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现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们主观上的意识决定的，乃是他们客观上的经济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阶级都有

他阶级的利己心，他阶级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终没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说是希图组织商人政府，又说这是发达资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调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则，比起军阀军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资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之资本主义的高调，却一面拥戴军阀，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纯粹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虽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贵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们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资产阶级，阶级的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资产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以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固不及大资产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知识阶级特别发达，所谓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贵族与平民（农工商）间，恒依附贵族而操纵政权，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说，其仕宦久而门阀高者，自身且成为贵族。他们在历史上操纵政权尤其垄断教权的优越地位，比欧洲中世僧侣阶级有过之无不及。即以近事而论，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输入之故，旧的士的阶级固然日渐退溃，而新的士的阶级却已代之而兴；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的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而且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最近全国学生大会，不但议决了许多国民革命的议案，并且议决了几件为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议案，这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

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所以他主观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阶级的幻象，这正是知识阶级和纯粹资产阶级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子，他们提出所谓“不合作”“农村立国”“东方文化”“新村”“无政府”“基督教救国”“教育救国”等回避革命的口号，固然是小资产阶级欲在自己脑中改造社会的幻想，然而他们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

（五）

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有驱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规模的抗税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组织，便无人敢说连国民革命他们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见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马上便可在农民间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争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设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规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则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损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纯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中，工人阶级一旦感觉得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许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绝缘，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脱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阶级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经济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阶级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现象。第二，只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员及铁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现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经济争斗。第三，真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纯粹无产阶级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证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在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们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阶级的单纯经济争斗，没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军阀政府手里，工人经济争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军阀，所以经济争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争斗。我们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争斗，只是一般的政治争斗，即全国各阶级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争斗，不是工人们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军阀，间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经济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阶级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结果是：（一）工人阶级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阶级在此革命的争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阶级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无论工人阶级有任何急进的主张，都不过是一个主张，实际还是站着一步不动；（四）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线，结果必是脱离了政治争斗的路线，躲到经济争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脱离政治的经济争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阶级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统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阶级强壮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阶级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便易于发生紊乱阶级和改良妥协的倾向，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只有开门出去参加复杂的争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门来取寡妇处女式的防闲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险。工人阶级只要有了独立的组织以上，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争斗的动作联合和经济争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争斗，于工人阶级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险。反之，关起门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争斗之联合战线，到有上文所说的危险呵！

（七）

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军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结果不过报仇泄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统治阶级。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们应该赞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简直是见鬼；因为没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废纸。

同时，我们也须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阶级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乃建设在剥削本国工人阶级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们死命的，也正是他们本国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状况，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轻视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2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

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军阀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

（原载《前锋》2期，1923年12月1日出版）

〔附〕卑之无甚高论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独　秀

高论倘能救世，孔孟之称仁说义早上把世界弄好了。

罗素离中国最后的演讲“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面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智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不彻底，更要责备他和从前热心主张的世界主义反背了。我独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他又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公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但是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生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这句话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我也以为这正是对中国人很适当的卑之无甚高论。

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坯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

一国中担任国家责任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将这重大的责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这种事实决不是高论能够掩住使我们可以不承认的。

吴稚晖先生说：“现在只好令列宁杀了我们，然后我们再杀列宁。”我想吴先生这种卑之无甚高论的论调，不专为老腐败而发，也并为一般自命为觉悟的青年而发。

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迫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

我希望不愿意民族的自杀之人，勿闭起眼睛妄发不认事实自欺欺人的高论！

（原载《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孙逸仙博士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授权发表下记宣言。在越飞君留上海时，与孙逸仙博士为数度之谈话，关于中俄间关系，披沥其许多意见，对以下各点，尤为注重。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列举之原则。越飞君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敌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再来中国南部，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

孙逸仙　越飞签字

（原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

〔附〕越飞和孙中山谈判的简单经过

我们从香港到了上海，暂住在孙先生的家里。不久，苏联派了特使越飞来上海，直接与孙中山先生会谈。孙先生和越飞见了几次面，都为英国帝国主义特务走狗探悉。特务跟上了苏联特使越飞，越飞便不得不离开上海。但是，孙先生这时因事不便远行，而且又怕惹人注目，坏了事情，反而不妙，和越飞继续洽谈的这个责任，又落在仲恺身上。9月，越飞先去日本，仲恺和我随后亦到。我们这次行动极为秘密，对朋友们都没有透露只字。当时仲恺的哥哥在日本做北洋政府的驻日本公使，我们自然更不敢让他知道内幕。不过估计到了东京之后，为了工作，我们如果能够住在仲恺哥哥的家里，当会更为方便。于是以带许崇清给他第六女儿做媒为掩护，使他哥哥不怀疑，并避开外人耳目，以利于与越飞进行会谈。仲恺的哥哥当然不会明白我们之到日本是为了越飞的，因而欢天喜地的招呼我们和他未来的女婿在他家里住下。我们就在这堂正的理由之下，利用了“公使馆”的有利条件，秘密地展开了和越飞会谈的工作。不料，即使是这样地煞费心机，我们后来也给日本的“特高课”跟踪上了。东京眼看也站不住脚，仲恺便迫得只有和越飞相约，各找借口去热海温泉会合，共同研究反抗帝国主义及中苏联系的初步意见。其后孙文越飞宣言签定便是由于仲恺和越飞二人在热海的会谈，准备了双方交换意见的基础，研讨了细节等等技术性的工作的。

孙中山先生虽然已开始和苏联联络，但还未正式开始改组国民党。因为一来那时还没有革命根据地，开会也开不成，二来在国民党内还须要经过一番说服教育的工作。1923年，孙先生为了要夺回广东这个革命根据地，便命令许崇智和利用杨希闵、刘震寰等分头从东江和西江直攻广州，驱逐了陈炯明。春天，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任大元帅。但杨希闵等本身原来就是军阀，并无意革命，无非是借这机会在广州花天酒地，做他的盗贼勾当，贩烟聚赌，暴敛自肥，无所不为。杨希闵、刘震寰这批军阀的所作所为，都违反了孙先生的革命意旨，使孙先生十分激愤。至于在革命阵营外部，帝国主义勾结各方面反动势力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样内外的形势之下，广东的革命政府已到了存亡断续的关头。要想起死回生，只有彻底改组国民党，标明革命意义，团结真正革命的党员，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来扫除一切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1923年冬，孙中山先生宣布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中左派力量和仲恺极力赞助，积极参加筹备、策划的工作。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极大支持和帮助，因而有了很大的进展。在国民党改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仲恺被选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农工部长。

（摘自何香凝忆廖仲恺，原载《红旗飘飘》第1集）

〔附〕苏联政府外交部门负责人与孙中山的往返信件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

Г.В.齐契林致孙中山的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

亲爱的孙中山博士：

人民委员会给予我一个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在几个月前代表南方国会致工农政府的贺词一事表示感谢；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自1911年以来在特殊困难条件下继续领导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人致敬。

敬爱的导师，您不久前曾在致俄国工农政府的贺词中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建立以承认俄、中两国伟大无产阶级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持久和平。

我们所理解的由于我们两国的劳动阶级的普遍友好而建立普遍和平的这一伟大任务，是工农政府自从政权由资产阶级政府手里转到人民手里的时刻起的全部活动基础。我们的这个纲领反映在和平法令中，——敬爱的导师，您是知道这个法令的。在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宣读的我们关于东方各民族的宣言中，也曾重申这个纲领。

我们也和您本人一样，在我们的道路上遇到无比的困难。力图在俄国恢复君主制度的帝国主义政府、资产阶级的雇佣兵——捷克斯洛伐克匪帮① 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刺刀层层包围着我们，把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截断了。和您的联系也中断了两个月。我们的共同敌人通过银行和资本家所腐蚀的报刊在远东散播谎言，向中国人民隐瞒下列真相：工农政府仍然存在，正和过去一样高举无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和欧洲强盗们的旗帜进行着有力的、顽强的斗争。

我们的遭遇是痛苦的，斗争是在力量悬殊之下进行的。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准备同这伙强盗勾结的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

---

① 即指1918年5月开始的，在伏尔加河沿岸、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这次叛乱是协约国列强所策动的。——"国际生活"编辑部注。

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

让我们在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更紧密地联合我们的队伍。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两国无产阶级联盟万岁！

我们怀着最真诚的愿望祝中国劳动阶级兴盛及其敬爱的导师孙中山博士幸福。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
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

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信

（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齐契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这封信是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到达的。我之所以迟迟未作复，是因为想见见为您送信的使者，他本来应当是将信从哈尔滨寄给我的。因为他至今还未能来广州看我，我就决定先回答您兄弟般的敬礼和关于恢复中俄商业关系的建议。

首先，我应当告诉您：这是我从您或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最近两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报纸上曾经有几次报道，断言好象莫斯科向我作过一些正式的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万一从您的同僚中有谁已往曾寄信给我或现在正寄信给我，那末让我告诉您，我还没有收到过一封信。

我应当简要地向您说明中国是怎样一个情况。且回溯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当时我的政治事业，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开始并迅速普及全国的革命中获得了自己决定性的表现。革命的结果，是推翻了满清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当时被选为总统。在我就职后不久，我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因为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比我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外国列强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象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费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袁世凯很快就开始了恢复帝制的勾当。如您所知，我们已经将他击败了。

他死了以后，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土匪头子，叫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因此，可以正确地断言：在与日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北京实际上是东京的工具。莫斯科在自己与北京的一切正式关系上应当好好地估计到这个情况。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

在您写信给我以后，我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的总统。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因为一、它本身的权限是根据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立宪会议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和一部唯一的中华民国组织法；二、它的成立是为了执行在法定的中国国会中按照约法所赋予全权的政权机关的决议，现在国会会议正在广州举行。我的政府也是实际的政府，它的权限已经为中国西南诸省及其权力所及的其他各省所承认。

现在，因为地理条件，我还不可能和你们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只要看一看中国地图，您就可以看出：我的政府管辖下的领土是在扬子江以南，而在这片领土与满洲和蒙古的“门户”之间，——只有经过这些“门户”才可能建立商业关系——有张作霖及其同盟者横梗着。只要还未建筑起包括在我所计划的中国铁道系统内的大铁道干线，那就没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通过新疆的“门户”。

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我最近九、十年以来都在从事于这一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发生某种形式下的积极的外国干涉，我希望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一事业。外国干涉是很少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西方列强。它们大概已被北京喂饱了。

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期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象莫斯科样，我一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

向您和我的朋友列宁以及所有为了人类自由事业而有许多成就的友人们致敬。

您的真挚的孙逸仙

又：这封信是经伦敦苏俄商务代表团转寄的。如果它能安全无阻地到达您手中，就请通知我，以便我今后能经过同一个中间人与您联系。如果从莫斯科来的信将由你们在伦敦的使节转寄的话，我就这样地建立联系来接收它们。

（摘自《孙中山选集》上册）

致孙中山博士（广　东）

（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请您接受我最衷心的问候，并深深地感谢您在俄国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经受严重考验的时期所表示的友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于真诚希望实现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并且不顾敌视这种关系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抗而使这些利益建立在巩固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所以派我到贵国来。

我们深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一定能紧密地团结起来，以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把我们两国看作只配充当受奴役和高利贷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我认识到横

在这条道路上的那些困难，但是，贵国同胞到处一致对我所表示的极大同情和真诚接待，使我重新充满信心。

亲爱的博士，您是新俄国的老朋友，我在实现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建立最紧密关系的伟大任务的事业中指望得到您的帮助。这种友好关系是我们两国人民自由及和平发展的保证。

加拉罕①

致加拉罕（北京）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您过分珍视我对新俄国的永恒友谊，使我深为感动。我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您所捍卫的思想体系②的任何批评，不可能妨碍并且也没有妨碍我和您的这一共同看法：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要求制定一个共同的政策，这一政策可以使我们生活在和其他大国平等的条件下，并可以使我们摆脱凭借强力和以经济上的帝国主义方法而行动的国际体系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奴役。

您说得对，您到中国后所受到的同情和殷勤接待使您重新觉得有了信心。我相信，我国同胞真诚地希望您的使命成功，特别是希望您在交涉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的问题上获得成功。但是，您的最大困难在于同您谈判的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它除了绝对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外，甚至不再具有国家政府的样子，因为实质上它的外交宁愿奉行某些外国列强的愿望和指示，而不愿把中国这个独立自主国家的切身利益当作准则。

在被任命来和您进行谈判的北京代表为您而举行的招待会上，您已看到了中国效忠外国利益这种行为的明显例子。他建议您们照美国的榜样来制定苏维埃政策，而您理所当然地回答说："俄国永远不会仿效美国的榜样，而且也不在象临城照会③这样的文件上签字。俄国永远不要求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也不会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法庭或行政机关。俄国放弃侵犯中国人民的主权或利益的所有一切租借权和特权。您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确立完全和绝对平等的原则。"

我应该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致敬，并感谢您给目前北京的主子们的这个忠驯奴仆所上的这次永志不忘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课。

孙中山

中华民国，广东政府大本营

---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曾率领苏维埃代表团到中国与北京政府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谈判结果签署了1924年5月31日的条约。——"国际生活"编辑部注。

② 英文原文为"the oydey of Ideas"。——"国际生活"编辑部注。

③ 指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的集体照会，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尤其是要求把中国铁路交由外国监督。——"国际生活"编辑部注。

亲爱的加拉罕同志：

我必须证实，您的非常宝贵的通知已收到了，这个通知是在我来到前线召集军事领导人会议时送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稍微延迟到昨天才发出回电的缘故。现附上电报副本以兹说明。

我大概无需申明，您是可以指靠我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给予您的帮助，以使您在中国的当前使命有所进展。但是，您会发现和北京集团进行谈判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集团在其同俄国的关系方面实际上执行的是使馆区的命令。王正廷要您们效法美国的榜样，而他的这个愿望就清楚地表明了，将来指导他和您们进行谈判的究竟是哪种势力。

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在承认曹锟所领导的任何一个新的行政当局时总有一些交换条件，所以我毫不怀疑，北京政府这次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把这些条件和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这回事联系起来。

如果您发现没有希望在不损害中国人民的主权、并使新俄国和其他外国列强能处于国际平等地位的这样的条件下和北京进行谈判，那么您或许可以看出，到广东来和目前正在组织中的我的新政府进行谈判是适当的，以免空手回莫斯科去。资本主义列强将试图通过北京和利用北京使苏维埃俄国遭受一次新的外交失败。但是，请您随时注意，我已经有决心、并且现在就有可能粉碎这种要使您和您的政府受到侮辱的任何企图……

您的非常真诚的

孙中山

致加拉罕

（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

我现在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作为俄国部分“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邹鲁启程途中，将由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代替他。敬希查照。

孙中山

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博士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于北京）

亲爱的同志：

我已会见了派到北京来就俄国部分“庚子赔款”① 基金问题与我进行商谈的广东大学教授易培基。

我们已经交换过几次意见，商谈了如何保证南方教育利益的问题。至于在三人委员会中包括一个南方代表的问题，这未必可能，因为北京内阁必将反对。因此，只剩下一条可以保证南方学校利益的可靠道路，这就是通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在上述的委员会中进行调解。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和易培基教授达成了协议，我将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

我非常感谢您派了一位教授到我这里来，因为他在“庚子赔款”基金这个复杂问题上将会向我们提供宝贵意见，这对于我们是会有好处的，因为北京内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制造许多困难。

祝 你 安 好

加 拉 罕

（原载苏联《国际生活》1957年第11期，《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孙逸仙给苏俄驻北京代表的电报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发自沙面）

谨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致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诚挚的贺电。

全国代表大会之宗旨是：继续并完成一九一一年所开始的革命，以求中国之复兴，使其摆脱军阀和资本主义之压迫。我们了解到：软弱和分裂的、但拥有无穷宝藏的中国是可能在近十年中燃起世界战火的亚洲巴尔干，而统一了的、解放了的中国则是亚洲和

① 1899——1901年中国的“义和团起义”，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的反帝起义，它被外国军队镇压下去了。参加1900——1901年武装干涉的有美、英、法、德、奥—匈、意、日和沙俄。

在“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以后，武装干涉者迫使中国在1901年9月7日签署了“最后议定书”，其中除去向各帝国主义国家作了新的让步外，还规定中国必须在39年内共赔偿巨额赔款45，000万两，加上利息共98，200万两。

1918年1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停止向中国征收支付给俄国的“庚子赔款”，而鉴于1924年5月31日苏联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苏联在特别宣言中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子赔款”，并把这笔“赔款”完全用作改进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基金。——“国际生活”编辑部注。

全世界和平的最好保证，如果不是唯一保证的话。

代表大会热望获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并向首先表现这种同情的俄国人民表示感谢。中俄两国人民应当沿着自由和正义的道路携手并进。

我代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谨向我们伟大的邻邦苏俄致以兄弟的敬礼。

孙　逸　仙

孙逸仙给格·维·奇契林的信

（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于广州）

亲爱的奇契林同志：

谨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写给我的一封很有意味的信。您说得完全对，我党的基本目的是要掀起中国人民的强大运动，一个革命的、建设性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组织和宣传。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我们希望将来在中国作出你们党在建立新的国家观念和新的管理制度方面所曾在俄国做过的一切。

由于这种缘故，我们需要忠告和帮助，并且希望从您和其他同志那里获得这种忠告和帮助。

我热烈地祝贺你们的外交使在唐宁街① 在法律上承认你们政府这件事情上所获得的卓越胜利。毫无疑问，为了获得这个胜利的果实，还需要作许多努力。但是，你们对克松主义的胜利无疑会引向其他的外交胜利。

列宁同志的逝世引起我深切的悲痛。但是，幸而你们党的工作是奠定在广泛的基础上，因而，我们伟大的同志的逝世不致影响你们坚强的手所创建的大厦。

我欢迎您所提出的关于我们今后继续保持接触的主张。这不仅对于我们彼此间交换意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在世界的斗争中能作的共同努力也是必要的。

敬祝您的政府继续获得成就。

谨致以兄弟的敬礼

孙　逸　仙

（译自苏联《国际生活》月刊十月号，
选自195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

① 唐宁街——伦敦的一条街，英国外交部所在地。

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大本营讲——

孙　中　山

各位同志：此次吾党改组的用意，志在将本党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向来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吾党历年在国内的奋斗，专用兵力。兵力胜利，吾党随之胜利，兵力失败，则吾党亦随之失败。故此次吾党改组之唯一目的，在乎不单独依靠兵力，要依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人民之心力与兵力，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两者之间，究竟应以何者为基础？应以何者为最足靠？若单独依靠兵力，是不足靠者，因为兵力之胜败无常。吾党必要先有一种基本力量做基础，然后兵力有足靠之希望；假使没有一种基本力量作基础，虽有兵力，亦不足恃。

吾党在中国内地，以兵力奋斗而胜利者，已有三次矣：武昌起义，推翻满清，建设共和，是吾党兵力成功之第一次也；袁氏称帝，讨袁军兴，推翻洪宪，是吾党兵力成功之第二次也；张勋复辟，提倡护法，其后徐氏退位，以至陈炯明谋叛，北方武人亦承认护法，是吾党兵力成功之第三次也。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达革命之目的，是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① 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如近几天，陈逆炯明率其部下迫攻广州，以做孤注之一掷，我军本其奋斗之精神与之抵抗，已将陈逆部队打得七零八落，在广州方面，亦可说是兵力之成功。但将来能收得效果若干，将来结果如何，诚不能预定，且将来所得结果，是善果抑是恶果，亦不能预定。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之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决其成功，盖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党员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质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谓之成功，靠党员方

①当时中国人民没有普遍积极参加革命，正是当时革命者对人民与革命都缺少认识的结果，孙先生在下面就讲到，当时的所谓革命党怎样自己就不要革命，连孙先生本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

是成功，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方是真成功。

如何是以党员打胜仗？即各凡属党员，皆负有一种责任，人人皆为党而奋斗，人人皆为党的主义而宣传。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此种奋斗，可谓之此主义征服。以主义征服者，是人民心悦诚服也。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即此之谓也。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矣。而国内之纠纷日甚，且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其原因维何？简括言之，即是吾党奋斗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党党员非不奋斗，但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其最大原因也。至此等错误思想发生之原因，不能不稍详细述之。回忆武昌起义时，我从海外遄返上海，当时长江南北，莫不赞成革命，即如上海一隅，虽至腐败之老官僚，亦出而为革命奔走。惟当我初抵上海时，凡吾党同志，以至绅商学各界，甚而至于一般老官僚，都一齐来欢迎，其中有一官僚，极郑重的对人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我当时亦听闻此话，甚为诧异。不久，则见所谓革命党人所办的报纸，所赖以指导国内舆论者，亦持此论调，真是怪事。夫一般官僚，在未革命之前，为满清出力，以残杀革命党人为能事，在革命军兴之时，又出而口头赞成革命。当时一般官僚，尚未知革命党有何等力量，但彼等最怕的就是革命，如果"革命军起，革命党兴彼辈必不能生存，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之。后来民国成立，即有政党蜂起，其实有共和党，统一党，种种色色，不胜缕述，大都皆以取得政权为目的，但完全未有革命党。于是宋教仁、黄兴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但当组织国民党之时，我已经辞了临时大总统。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立于失败之地位。我当时是极为悲观，我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只有放去一切，暂行置身事外。后来国民党成立，本部设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长，我决意辞却。当是时，不独不愿意参加政党，而且对于一切政治问题亦想暂时不过问。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及至宋案发生，一般同志异常愤激，然亦未有相当办法，遂联同致电日本，促我返国。我回上海时，见得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之主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所有宋教仁未被杀之先一切来往电文，宋教仁被杀之后一切来往电文，皆已搜集起来，已经证实宋教仁之被杀，主谋者确是袁世凯，毫无疑义。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一般同志，误以为宋教仁之被杀是一个人之事，遂以为不应因一人之事而动天下之兵。我极力劝各位同志，要明白宋教仁之被杀并非一人之事，且勿误认，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他办法。而各位同志仍然不肯赞成。当宋教仁被杀时，全国舆论皆甚愤激，即外国亦不直袁氏所为。袁氏借债之举，因此大受打击，而吾

党在国内势力，亦殊不薄弱，倘能于此时起而继续奋斗，吾党大有可为，袁氏不足平也。无如各位同志皆不赞成，此种时机遂至错过。不久袁氏借债成功，钱已到手，可以施用武力政策，遂向吾党示威，先免去吾党四个都督，吾党遂起而与之对抗，因而二次革命以起。惟此时时机错过，故二次革命终归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各同志多再亡命于日本，大都垂头丧气，但我此时反极为乐观。然必先使多数同志奋斗之精神复活，方能继续吾党革命事业，于是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集合吾党之革命份子，专从事于革命事业。从前吾等不敢公言革命，因避去革命党之名义，而有同盟会之组织，但此时在日本竟公然提出中华革命党以相号召矣。然当时亡命在日本之同志，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他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正是成功，据有十余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我再三苦劝各同志，谓自成功以至失败，其时间不过三年耳。尔等不要专向从前的地位著想，尔等不要忘记了时间。尔等若专向地位著想，以为从前有十余省地盘，有钱又有兵尚且失败；若如此想，一定想不通的。尔等要向时间上著想。吾党成功时，有十余省地盘，有钱又有兵，诚然不错；但尔等必要追想三年以前的事。吾党人在三年以前，都是一般亡命之徒，何尝有地盘？何尝有钱？何尝有兵？吾党成功时间，不过三年，尔等可将三年间事情，作为一场大梦，复回三年以前的革命精神。自庚子以后，或一年一次而革命，或二年一次而革命，总共革命之起不下十有余次，而每次之失败，各位同志总未有灰心，何以经过武昌之成功后，遂反至灰心？吾等在三年前，类皆百折不挠屡仆屡起，此是何等精神，何等奋斗？我今日希望同志恢复从前所具之精神，继续奋斗而已。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众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众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耳。当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之信用益大，吾等之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之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之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各同志经我此次苦劝之后，大众一齐恢复从前革命之精神，共同起而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唯之一宗旨，是以革命之精神，而图主义之实现者。后日袁世凯称帝，中华革命党遂起义于广东、山东、长江流域各省；未几袁氏死，而黎元洪继之。当时各同志，又不能继续奋斗到底，人人以为黎氏复职，民国政治可以逐渐整理，不肯继续革命。后来张勋复辟，吾等实行护法，然革命始终不能彻底，稍有少许成功，即行收束，以为妥协而革命事业终未能成功。

以上所述，每党之奋斗，多是依靠兵力之奋斗，故胜败无常。若长此以往，吾党终无成功之希望，吾党三民主义，终无实现之一日，所以有此次改组事情之发生。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形成一中心势力，各同志从今日起，要认真去干革命事业，各同志要将革命事业，作为本人终身事业。必要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完全实现，方可算是吾党成功。但是此等成功，不能单靠战争，因为战争要靠军人，而现在一般军人多是不明主义者。彼等不是为主义而战争，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战争，故单靠军人奋斗，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不过现在军人适逢其会，故与之合作耳。然此是借人之

力量以干革命事业，而终不可靠者也。吾党所需者，是在革命精神，吾等对革命于三民主义，应当有坚决的信仰，要使吾等皆愿意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吾等必先具有此决心，有此志愿，然后用宣传的方法，使全国大多数人民，皆与吾等具有一样的决心，一样的志愿，能吸收多一个同志，就可减少一个反对党。

至现在吾党有多少党员，实在甚少。吾等应当固结团体，讨论一种好方法，努力去宣传，于最短期间，使广州百余万人民，皆变成革命党，做吾等同志；又费若干时间，努力去宣传，使广东三千万同胞，以至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有过半数变成革命党，做吾等的同志。此真是吾党的大成功。如此做法，就是国民党党员之战胜。我党从今日起，努力做去，务要达成到党员战胜，方得谓之成功。如其不然，若专靠兵力，虽百战百胜，亦不得谓之成功。就如以前所述三次之胜利，皆旋得而旋失，胜败互见，何得谓之成功？推究其故，实有许多缺点，且许多工作未做，此种工作在革命后固未尝做，在革命前亦未尝做。其所以未做之故，因为吾等未曾发明有好的方法；且因为知识不足，尚未看见此种道理。故革命成功以后，许多革命党人，反借革命以谋个人利权，养成个人势力，一俟个人势力既成，反而推翻革命。所以革命虽经三次成功，而革命主义依然不能实现。其最大原因，皆是专靠兵力而党员不负责任，所以有此恶果。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宣传事业几乎停顿。即革命未成功以前，吾等非不从事于宣传，但当时宣传方法皆是个人的宣传，既无组织，又无系统，故收效仍小，故可谓之人自为战的宣传。至武昌起义以后，则连人自为战的宣传亦皆放弃，而不肯做矣，人人皆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皆停止奋斗，殊不知以前之所谓成功不过靠兵力之成功，而非党员之成功。吾党欲求真正之成功，从今以后，不单独专靠军队，要吾党同志，各尽能力，努力奋斗；而且今后吾党同志的奋斗，不要仍守着旧日人自为战的奋斗，要努力于有胆识、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之故。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的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们之主义，且至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但有许多人以为俄国是过激党执政，我们学俄国，岂不是学过激党？殊不知俄国当革命未发动之初，诚不免有许多过激的思想发生，盖俄国革命党首领，多是具有丰富之学识与高深之理想故立论之间操之过激者，实在难免。但俄国人做事，不专尚理想，多是以事实为依据，如行路然，检择其可通行者而后行之。故俄国当革命之时，国内有许多党并立，如社会民主党，民主革命党① 等，而皆不能成功，今日成功者，是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者，在其能合乎俄国大多数人心，所以俄国人民莫不赞成他，拥护他。……（下略）

---

① 1917年与布尔塞维克并立者，为社会民主工党孟塞维克派、社会革命党及立宪民主党，所谓民主革命党不知何指。

〔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黎　澍

孙中山是以民主主义的政纲开始他在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活动的。在一九一一年以前，他所领导的同盟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的高涨，帮助他们获得了推翻满清统治的胜利。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是软弱无能的。他们甚至在政权还没有到手的时候就以为革命成功了。他们抛弃了革命的政纲，以对封建阶级的妥协代替了封建阶级的斗争。从此以后，孙中山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一九一一年革命失败，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六年反袁世凯失败，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三年护法战争失败。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明大会宣言时，总结他在一九一一年以后的奋斗说："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① 由于历次失败的惨痛经验，孙中山晚年在十月革命的启示下，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了他的最伟大的一次转变。他把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主流汇合起来，为资产阶级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绝望里"一语很好地概括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战争以前的景况。从以下的分析和叙述中我们将不难看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　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

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一年革命爆发以后，无例外地认为，满清统治的结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随着革命的成功就会到来一个政治民主和工商业繁荣的好时代。他们只求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革命的形势早早结束，好让他们在一种"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理想。这种想法可以拿当时的一个叫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的团体发表的宣言来做代表："往者忧世之士，亦尝鼓吹工业主义，以挽救时艰而无效也，则以专利之政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达，为绝对的关系。明达者当自知之。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此其时矣！"②

① "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近芬书店版"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革命党及党员者"第六十八页。

② "中国革命记"（上海自由社编）第二十五册。

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在这时候的一切行动也正是反映了这种软弱的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对前途的虚妄的幻想。武昌起义时，孙中山在美国，他完全没有想到如何给革命党人以领导，却以在国外向美国、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事“外交活动”为己任，希望这些政府同情和援助中国的革命。他也不考虑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他在从巴黎归国以前发给民国军政府的一封电报中说：“欣悉总统选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①

这时同盟会内部迅速发生分裂和涣散。在武昌起义以后领导组织政府的宋教仁、陈其美等形成了自己的中心。他们一开始就放弃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采取了与反革命分子相妥协的方针。孙中山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他当时曾经“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②。这个主张当然也只能说明孙中山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忘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可是宋教仁、陈其美等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拒绝加以考虑。孙中山“忝为总统，乃同木偶”③。其他如章太炎等早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就宣布脱离同盟会，单独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联合会”，并在各地不断地与同盟会分子闹摩擦。以后在湖北又出现了孙武等所组织的小团体“民社”，企图以拥护黎元洪为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因此，在当时就出现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种说法甚至在同盟会中也有人接受。一切封建旧势力和君主立宪派分子更是竭力宣传这种说法来瓦解革命派。被任为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的张謇（君主立宪派分子）一九一二年一月给黄兴写信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消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密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可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愿公熟思之。”④这所谓“统一”就是要把革命军统一于封建旧军队；所以不仅是“革命党消”，连革命军也“消”了。黎元洪在一九一二年二月致南京临时政府及各机关电中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⑤

在这情形下，孙中山虽然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仍只能提出辞职，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事实上，这就是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代替满清政权，而甘心情愿地拥戴换了一个面目的大地主和大买办的政权。可是甚至在这时候，资产阶级还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了。

---

① “总理全集”下册文电类第二页。

② 同上书上册“心理建设”第四十页。

③ “致邓泽如及南洋同志书”见“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类第六十五页。

④ “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一二七页。

⑤ 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第六四七页。

孙中山在这时说："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①一九一二年八月他和黄兴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还宣布对袁世凯深信不疑，号召国人拥护袁世凯。他同意袁世凯提出的以维护袁世凯统治为目的的"内政大纲"八条，并接受"全国铁路总监"的空头职务。他说，他要以在野之身用二十年时间修铁路二十万里，使中国成为一个交通发达的近代国家。而且孙中山这时也居然当真地为他的修建铁路的大计划而奔走了。他已沉醉在这种幻想中间，以为可以不管政治的情形是怎样，只要发展工业就可以使中国进步起来。

其他还有许多同盟会分子，以宋教仁为首，幻想着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建立资产阶级的国会与责任内阁。他们拉拢了许多政客官僚组成"国民党"，以争取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和造成在内阁中的势力。

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三月暗杀宋教仁。接着他又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大借款协定，以此作为实行"统一"的资本，消除在南方几个省分中的属于国民党的地方实力。到这时，孙中山才从他的不问政治只管修铁路的幻想中警觉过来，但这时国民党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动和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了。孙中山虽然主张立即举行革命，来反对袁世凯，但是应者寥寥。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的所谓"二次革命"其实只是在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的软弱的还手，并且很快就失败了。

孙中山再度逃亡到日本，一九一四年他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但这时在他的旧同伴中愿意参加他的革命组织的人越来越少了。照孙中山自己的说明，当时许多国民党人的想法是，"则犹有信赖袁氏而策其后效者；有以为其锋不可犯，势惟与之委蛇而徐图补救者；有但幸目前之和平，而不欲有决裂之举者。"②孙中山这时虽有重新发动革命之志，但是由于他对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国内政治社会的情况也没有正确认识，所以究竟应该组织怎样一个革命政党，他的认识是很模糊的：

第一，中华革命党只提出反袁的目的，既没有把袁世凯与他所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势力联系起来，也没有把袁世凯与中华革命党宣布要加以屏斥的官僚和伪革命党联系起来，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的革命纲领。这就决定了中华革命党在袁世凯倒台以后，必与同盟会同样趋于涣散。

第二，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在革命以后有特殊地位：起义前入党者为"首义党员"，在革命时期为"元勋公民"，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起义后和政府成立前入党者为"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为"有功党员"，有选举及被选举权；政府成立后入党者为"普通党员"，在革命时期为"先进公民"，仅有选举权利。用个人利益来吸引党员，事实上决不可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而只能得到党与人民群众分离的结果。

第三，在入党手续上抄袭了会党很多落后的强迫性办法，如党员入党须宣誓"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并在誓约上按指模等等。孙中山本意是鉴于同盟会的涣散，以为用按指模发誓的办法就可以形成巩固的团结，其实同盟会涣散有其更深

①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民国三年四月解临时总统职后在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讲，见"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三民主义者"第七十一页。

② "讨袁二次宣言"——民国五年五月九日，见"总理全集"上册宣言类第二十一页。

刻的原因，决不是用这种形式上严密的办法就可以决定问题的。

第四，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实际上还远不如同盟会。同盟会有对敌人的思想斗争，有在群众中的鼓动工作，而中华革命党没有。中华革命党的活动限于军事冒险。孙中山曾经委任了一些人为海陆军司令，到沿海沿江各省去活动。但是这些人全是光杆，又缺乏与群众的联系，不能有有力的行动。一九一四年六月至十月在江苏浙江的几次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上海的肇和军舰起义，都相继失败了。这些个别的起义事件既不足以动摇袁世凯统治，也不足以扩大影响，却用去了孙中山的极大的力量。

因此，孙中山虽然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进行了反袁的斗争，但是在袁世凯政权临近崩溃，在反动集团内部发生分裂的时候，孙中山却没有能力掌握这种局势。反袁的领导权落到了一些地方军阀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某些派系的手里。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了。继袁世凯而起的仍旧是北洋军阀的直系和皖系势力。

反袁世凯斗争的失败，事实上不过是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的延长。这些失败充分地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资产阶级既然不能动员广大农民力量来彻底进行民主革命，既然不敢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决裂，因此它就随时为自己所制造的各种幻想所迷惑，它也就不能组成坚强的领导革命的政党，在这些年头里，孙中山曾一时陷入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泥沼中，一时又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但终于没有找到革命的出路。他不能不等到备受挫折以后，经过十月革命的启示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才发现新的前途。

二　在军阀混战中继续失败

孙中山在反袁斗争失败后并没有找到革命的出路。他在讨袁以后进行的所谓“护法运动”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和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孙中山是把一九一二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当作共和国的象征的。但实际上，所谓“临时约法”不过是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中资产阶级的一种软弱的民主要求的表示，那个国会也并不是具有战斗力量的机关。所以继袁世凯掌权的军阀段祺瑞先是在反袁各派要求之下宣布恢复约法，并召开国会。不久又悍然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在约法恢复时，孙中山居然又表示对这种军阀反动统治寄以希望，他说：“今北京存约法，复国会，共和形式已具。纵非革命党执政，仍不必有所顾虑。要之既曰共和，则凡赞成共和者皆可执政，吾人只排除反对共和者。现执政者既为赞成共和之人，纵使非倡发共和制度之主张或输入共和思想者，仍当望之信之，使展其所能。若有反对共和之证，乃可起而锄之耳。”① 等到国会解散后，他才表示对北洋军阀绝望。他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率领脱离北京政府的第一舰队到广东，联合宣布“暂行自主”的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的地方势力，自成一局面。这时他的口号还只是“护法”，就是维护一九一二

---

① “心坚则不畏大敌”——民国五年九月三十日在欢迎从军华侨大会演讲，见“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一般内政及外交者”第二十六页。

年的约法。

应该说，所谓一九一二年的约法，几年来，在北洋军阀任意作弄和蹂躏之下，已成为对软弱的资产阶级的讽刺。广大劳动人民固然从未关心过这个约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也对这个约法失去了兴趣，大概最关心它的就只是在一九一二年根据这个约法而产生的那个国会的一班议员。所以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决不能起动员广大的革命人民的作用。他在广东所成立的护法军政府，所依靠的其实只是西南的地方军阀。桂系和滇系的军阀当时欢迎孙中山，是因为可以利用孙中山来增加“自主”的声势，可以提高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的资本。他们和孙中山的合作只能是有限度的和暂时的。

所以孙中山虽然做了护法军政的大元帅，却不能不俯仰随人。这正是由于他脱离人民力量而走到的绝境。

到了一九一八年四月，西南的这些小军阀已和北洋军阀渐渐的形成了妥协。他们发动了对护法军政府的改组，取消大元帅的职务，改设“政务总裁”七人。孙中山被置名于七总裁之列，和一些老官僚军阀齐名。孙中山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他被辞职离开广州到上海。在辞职通电中，他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①。

孙中山到上海后处于一种孤立的、很难有所作为的状态中。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改变了中华革命党“实行民权民生二主义”的政纲，恢复了三民主义的政纲。但这时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还只是大汉族主义，企图同化满蒙回藏为一大民族，缺乏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国民党也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但是仍缺乏使政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组织路线。孙中山的计划是“首在去彼假护法以实行破法之桂派”②。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他的全部希望不能不寄托在陈炯明的粤军身上。

粤军是孙中山在任军政府大元帅时期不顾桂系的反对而建立起来的。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几乎全部集中于粤军。可是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军队的领导是十分无能的。他们永远无法防止新军阀的产生。随着粤军的成长，粤军首领陈炯明便变成了军阀。一九二〇年九月粤军从闽南打回广东以后，十一月孙中山重回广州。陈炯明被任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控制者。孙中山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就任非常总统，成立正式政府，并收编了两广境内的全部滇军、桂军、湘军以及各色土杂部队，为数达十余万人，积极准备北伐。这时北京政权已落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手里。孙中山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及皖系军阀段祺瑞订立了一个夹攻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三角同盟，企图利用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发生的奉直战争中一举消灭直系势力。而陈炯明却与四邻军阀联防互保，实行联省自治，并暗中勾结吴佩孚，准备在孙中山出师北伐的时候来击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的广州政权，内部是依靠陈炯明的势力，对外是企图和奉系皖系军阀合作。很明显的，他还是处在一种异常不稳定的局面中。

陈炯明的靠不住是很明显的，这点孙中山自己也看到了。他在一九二二年初设法迫

---

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下册第一〇二六页。

②“护法之役致林修梅书”，见“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类第一八三页。

他在广东所成立的护法军政府，所依靠的其实只是西南的地方军阀。桂系和滇系的军阀令陈炯明自请辞职，但他并没有能根本消灭陈炯明的势力。同时，奉系和直系军阀战争进行得很迅速，还尚未等到孙中山出兵北伐，奉军已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胜利者。狡猾的吴佩孚这时通电恢复旧国会，表示他也是拥护一九一二年约法的。各省督军省长纷纷通电响应，并要求孙中山和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一班所谓名流学者如好人政府派的胡适一流人也向孙中山大喝倒彩。护法的结果，竟是首倡护法的孙中山陷入空前的窘境。

可是，更严重的情况出现在孙中山的后方。陈炯明的辞职是形式上的，实际上他和直系军阀有了更密切的结合。一九二二年六月，当孙中山从韶关回到广州的时候，他便发动他的部队公开叛变孙中山，袭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之中避登在一个兵舰上。于是他被自己的“老部下”逐出了广州，再一次退避到上海。

这是孙中山所曾经遭受过的最严重的一次失败。这次失败使孙中山完全陷于绝望之中，使他不能不看到，按照过去的老一套的办法是绝对不可能完成什么革命事业的了。就在这次失败以后，孙中山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转变。

三　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正当孙中山在广州被陈炯明部队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①。在这一文件中，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的党纲虽不完全，而表示于公众的三民主义和发展实业计划，都是民主主义的色彩；他的行为，除了革命运动以外，该党议员于民国元二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及六年（一九一七年）在国会和敌党抗争的内容以及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都算是拥护民主政治的表示。但他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国民党为保存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主张“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是根据在此以前不久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方针提出的。这次大会的宣言②正确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局势以及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的关系，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目前斗争纲领和“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并进一步分析了统一战线的阶级基础，号召工人、贫农及小资产阶级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毫无疑问，这两个文件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

---

①“中国共产党五年来的政治主张”第二十四页。

②同上第一页。

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见了他。刚到中国的苏俄代表越飞也会见了他。他们向孙中山伸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友谊的手。

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开始了他的转变。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这时孙中山回到上海还不到一个月，便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及总纲的机构。一九二三年元旦发表的国民党宣言说明它已经开始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此以前，孙中山曾经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看到了群众的力量，认为"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更不能再拒绝吾人也"①。可是孙中山那时还没有明确的依靠群众的思想。一九二三年元旦宣言却已经有了"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和"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②的认识，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纲领。其他如实行不以财产为标准的普选制度、保护人民自由权利、制定工人保护法及土地法等，也都比国民党在过去任何时期的纲领更接近人民的要求。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又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正式确定了联俄政策下的平等的中苏关系。他对于十月革命的多年以来的同情和获得苏俄援助的渴望，在这个文件上有了充分的表现。在了解十月革命和获得苏俄的忠实援助以后，孙中山便作了一个坚定不移的结论："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③他发现"何以革命不能成功？皆由于方法未善之过。……中国革命六年后，俄国才有革命。俄国革命党不仅把世界最大权威之帝国主义推翻，且进而解决世界经济政治诸问题。这种革命，真是彻底的成功，皆因其方法良好之故。"④因此他决心"重新做过。……由今日起，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⑤。孙中山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存着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总以为帝国主义国家会同情和援助中国革命。现在他彻底醒悟过来了。他在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等的一封反对联俄联共政策请愿书上批示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⑥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旬，广西境内的滇军和桂军各一部，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军广州，逐出陈炯明。孙中山旋即重返广州。

孙中山的新的革命路线立即引起了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嫉视。拥护孙中山回广东

① "救国之急务"——民国八年十月十八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见"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一般内政及外交者"第三十一页。

② "中国国民党宣言"（民国十二年一月一日），见"总理全集"上册宣言类第三十七页。

③ "致蒋介石书"，见"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类第二一四页。

④ "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民国十三年一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讲，见"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革命党及党员者"第六十五页。

⑤ 同上。

⑥ 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三〇五页。

的滇桂小军阀不久便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倡乱。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为了劫夺广东关税，截断广州政府的经济来源，竟派遣大批军舰到广州实行恫吓。可是军阀和帝国主义这些恶毒行为反而加强了孙中山的反抗精神。他拒绝向帝国主义低头。广州市人民也举行了争回关税主权和抵制美货英货的示威运动，给他以有力的援助。到一九二四年，广州发生了英帝国主义策动的商团叛乱事件，孙中山就在他的对外宣言中对帝国主义表示了更为坚决的态度："从前有一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①

四　坚决的转变和勇敢的斗争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通过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会后又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各人民团体派代表举行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产生统一全国的而不是偏安一隅的人民政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国民党发表改组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

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民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有了新内容的三民主义。第一，民族主义有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内容。而在此以前，民族主义曾经是单纯的排满思想（如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或大汉族主义（如在一九二〇年）。由于反对帝国主义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民族主义也就有了革命的力量。第二，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宣言②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为了使政权不为军阀官僚所篡夺，宣言又规定："民国之民权，惟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反对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权利。"这个规定概括了孙中山在一九一一年以来的失败经验，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真精神的。第三，民生主义直接提出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限制私人资本的原则。关于土地问题，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在"耕者有其田"的演讲中，孙中山又进一步主张废除地主制度，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作为"平均地权"的实际内容。关于节制资本，宣言规定，有独占性质的大规模企业归国家经营，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宣言最后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待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主张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加强革命的力量。并决定"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

① "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见"总理全集"上册宣言类第五十七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见"总理全集"上册宣言类第四十五页。

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这样，在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包括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重新解释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则是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战斗的旗帜。

孙中山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说明宣言旨趣的演讲中指出，“发表此项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与从前不同。……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打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对外的责任，要反对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之复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要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①

从这个庄严的声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从他历次失败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何等痛切，他的转向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彻底的革命又何等勇敢和坚决！

可是孙中山的这些满含着辛酸的教训，后来全部被他的无耻的叛徒们糟蹋了。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造成的全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的高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终于被孙中山的叛徒们断送了。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仍旧是孙中山的失败。因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是和孙中山在思想和革命实践中所存在着的缺点分不开的。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始终存在着革命性和妥协性的矛盾。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并存，使他的思想成为一种兼容并包的庞杂的思想，缺乏严格的体系。思想上的这种状态，反映到革命实践上来，就为他的事业的失败种下了前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当时几乎只是孙中山个人和少数主要干部的决定。在决定以后，也没有在党内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准备。孙中山依靠共产党做工作，可是他没有清除留在他身边的右派分子和投机分子。右派分子用各种方法包围他，企图阻挠三大政策的实行。孙中山在右派分子包围中并没有动摇他的革命的决心，但也没有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他采取敷衍态度，以为把他们撇在一边就行了。对于建立军队，孙中山也同样没有放弃来者不拒的收编军阀部队的老办法。所以广东虽然在当时已是一个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根据地，但是政权仍操在戴着革命假面具的军阀手里，孙中山的主张不能真正贯彻下去。这是广东在政治上的阴暗面。

孙中山本人当时也还没有完全放弃利用军阀力量来打倒北京政府的思想。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及皖系军阀段祺瑞联合，企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举兵北伐，消灭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势力。但他的北伐军尚未出师，而奉直战争已迅速结束。

张段代曹吴执政，乘机邀请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也想“拿革命主义去宣传”②，试一试张段能否接受他的主张，实现和平统一，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

---

① “国民党宣言旨趣之说明”近芬书店版“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革命党及党员者”第六十八页。

② “北伐之意义与希望”——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广州欢迎会演讲，见“总理全集”下册演训类“关于一般内政及外交者”第二十五页。

孙中山在“北上宣言”①中宣布，他的目的“不仅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要求“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举行召集有各界人民团体、反对吴曹各军及各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共同解决国内问题。他的主张是鲜明的，与张作霖、段祺瑞尖锐地对立着的。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说：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②他宣布他决不与北方军阀相妥协，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

张作霖，段祺瑞邀孙中山北上本是要软化他，使他参加军阀集团，替他们作傀儡的。现在孙中山沿途宣传他一定要张段服从他的主张，并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张段对他的北上自然感到非常苦恼了。当时段祺瑞正在以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名义召开以分脏为目的的“善后会议”。孙中山到了北京以后，右派分子曾经竭立包围孙中山，要孙中山牺牲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与段祺瑞妥协，参加“善后会议”。这时孙中山病势已重，可是孙中山在他一生最后的时间中，斗志愈益坚定。他突破了右派分子的包围，拒绝与段祺瑞妥协，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

孙中山坚持这种斗争不屈的精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时为止。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在他逝世以前留下了继续奋斗的遗嘱和给苏联友人的一封恳挚的信。后者表示了他对于实行三大政策的最后的信念，他在这个文件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孙逸仙。”③

孙中山在逝世以前留下的这个文件具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因为这时他在北京，他已经与奉系和皖系军阀有了直接的接触。对于这些军阀之靠不住，对于军阀统治的实质，他有了十分痛切的认识。这时他的心念既转向中国的将来，他就不能不转向与苏联携

---

① 见“总理全集”上册宣言类第六十四页。

② “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招待上海新闻记者演讲，见“总理全集”下册演讲类“关于一般内政及外交者”第五十四页。

③ “致苏联遣书”，见“总理全集”下册函札类第二三一页。

手——转向与世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携手，不能不转向“唤起民众”①——转向与民众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携手。孙中山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正是由于他在晚年能够勇敢地接受四十年来的失败经验，坚决实行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他的这种转变是完全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照这个方向走，在国际上倒向苏联一边，在国内倒向共产党一边，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看到了封建买办势力被迅速摧毁的胜利，反之就必然走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绝境，如象他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一样。

① 见“遗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2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576
SS号=10273504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1923年7月）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1923年8月1日）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
〔附〕卑之无甚高论（1921年7月1日）&陈独秀
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
〔附〕越飞和孙中山谈判的简单经过
苏联政府外交部门负责人与孙中山的往返信件（1918年—1924年）
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
〔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孙中山和国民党&黎澍